外国文学史丛书

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意大利文学史

（修订本）　张世华　著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国文学史丛书

LA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意大利文学史

（修订本）　　张世华　著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大利文学史/张世华著. —2版(修订本).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
(外国文学史丛书)
ISBN 7-81080-019-1

Ⅰ. 意… Ⅱ. 张… Ⅲ. 文学史—意大利
Ⅳ. I54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7758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总机), 35051812(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谈志耀

印　　刷: 上海市印刷四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875　字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 5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0-718-8 / I・072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古罗马文学

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铁器时代，意大利真正进入了历史时代。在这一时期中，意大利开始受到进步的地中海中部和近东地区日益显著的影响。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同腓尼基、希腊的移居者的接触也不断增加，其中，腓尼基人多数集居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西部沿海地区，希腊人则大多出现在意大利南部。这些外来民族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上古意大利铁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有意大利西北部的古拉斯卡文化、威尼托地区的阿特斯泰文化，以及流传于整个艾米利亚地区和意大利中部其余地区的维拉诺瓦文化。后来的伊特鲁利亚文化就是在维拉诺瓦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据史料记载：维拉诺瓦文化分布于意大利北部伊特鲁利亚和中部拉丁姆一带，以其发祥地波伦亚附近的维拉诺瓦村而得名 其居民在公元前一千年代初期便开始使用铁器，从事农耕和畜牧，住地有类似城寨的坚固围墙，有火葬及将死者骨灰高高置于陶罐或铜罐中的习俗。公元前 7 世纪初，伊特鲁利亚人将一种东方化的文明引入托斯卡纳的维拉诺瓦文化之中，致使该文化原先的特征逐渐消失。

应该说，意大利之所以能从原始落后的状态转变成欧洲古代文化中心，主要归功于希腊人和伊特鲁利亚人。他们都为寻找富饶的新大陆而漂洋过海来到意大利，并在公元前 8 世纪初在半岛上播下了文明的种子。希腊人于公元前 8 世纪到达意大利后，定居在意大利南部沿海一带以及西西里的东部和南部，并在那里逐步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城市。至于希腊殖民者，由于他们同意大利人在政治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故最终未能统治意大利，然而希腊

的铜器和陶器制作技术，以及希腊的城市建筑和雕塑在意大利半岛上广为流传，从而对意大利文化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伊特鲁利亚人原为意大利中部伊特鲁利亚地区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亚平宁山以西及台伯河和阿诺河之间的地带，公元前 6 世纪时，其都市文明达于高峰。伊特鲁利亚文化的许多特点后被统治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所吸收。伊特鲁利亚人是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曾建立繁荣的商业和农业文明,从墓葬中发现的赤陶雕像及反映战争、狩猎、舞蹈、聚会和音乐的壁画,较形象地体现了其艺术成就的特征。另则，伊特鲁利亚人擅长金属加工，是极为出色的工匠，以致意大利中部地区不少先前的小村庄后来逐步发展成为贸易频繁的城市。

约在公元前 2000 年,拉丁人部落开始在意大利半岛中部拉丁姆地区定居。其后,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高卢人陆续移民到意大利,一起构成了早期的意大利居民。所以,罗马文学所用的语言是包括伊特鲁利亚、希腊、高卢等语言因素在内的拉丁语。据有关史料记载，拉丁语的最早文献可追溯至公元前 6 世纪,那是一件外衣饰针上的四字铭文，用希腊字母雕成。即使经过 200 多年的战争,罗马征服意大利之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岛上的居民由于种族不同，仍没有统一的语言作为彼此间交流思想的工具。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渐渐采纳罗马人的方言,即拉丁语作为共同的语言。然而,在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阶层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讲的拉丁语依然有着明显的差异。在由罗马人统一起来的意大利半岛上，罗马文学在原来举行宗教仪式时所唱的诗歌和演出的笑剧式对话的基础上有了迅速的发展，在公元前后的 200 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在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罗马帝国开始走向衰亡,一大批被罗马人称为‘蛮人’的民族(大部分为日耳曼民族)趁虚而入。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罗慕洛斯 · 奥古斯都被废黜,日耳

曼首领鄂多亚克登基，意大利被划分成好几个政治区域。当时，意大利各区域的历史和命运尽管不尽相同，但是彼此之间依然长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拉丁语继续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共同语言。另则，公元 1 世纪从巴勒斯坦南方传入的基督教在昔日帝国的疆域内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并渐渐成为人们共同的宗教信仰，这对于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毋庸置疑，政治上的长期分裂给语言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因素。在罗马帝国时期，尽管各地区人民的日常口语由于方言的干扰而有所差异，但他们还是有着共同的文学和语言。西罗马帝国崩溃瓦解后，“国家”这个概念日益淡薄，各自为政的局面使拉丁语的地区差异逐渐增大。由于教会独揽文化大权，当时除寥寥无几的神职人员以外，绝大部分人目不识丁。以往比较统一的语言经潜移默化，分化成各种不同的方言，即所谓的“新拉丁语”。即使是作为文学语言的拉丁语，也同古罗马时代的语言大相径庭。

公元前 8 世纪，位于台伯河上的罗马古城开始在军事、商业、政治方面向外扩张。历经数百年连绵不断的战争，罗马逐渐将整个意大利半岛并入自己的版图。罗马帝国的疆域在鼎盛时期除意大利半岛外，还包括西欧的绝大部分、西亚的一部分和非洲的北海岸。到了公元前 3 世纪，罗马已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强国，其奴隶制经济、政治迅速发展，物质与文化亦益臻丰富，到帝国初期（公元 1、2 世纪）达繁荣阶段。在文化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文学如大加图、西塞罗、恺撒的散文，瓦罗的拉丁语论，维吉尔、贺拉斯、奥维德的诗歌；建筑艺术如科洛西姆大斗兽场，万神庙以及大量的剧场、水道、桥梁、凯旋门、纪功柱等；史学如恺撒、李维、塔西陀的著作；哲学如卢克莱修的唯物论，西塞罗、塞涅卡、马可·奥勒留的唯心论；科学如大普林尼的博物志；雄辩术如格拉古兄弟、西塞罗的演辞；以及集法律、政治体制之大成的罗马法等。公元 1 世纪基督教兴起，2、3 世纪广泛传播，并开始形成基督教文化。公元 3 世纪

后罗马奴隶制社会濒临危机，其文化亦渐趋衰落。古罗马文化是西欧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许多成就，特别是建筑、法学及拉丁语，对后世西方各国都有较大的影响。

第一节　古罗马文化的起源和影响

一、科学

古罗马的科学是在总结意大利本土和地中海诸民族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较突出的有农学、天文学、医学和军事测量等。

罗马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科学一直比较发达。罗马人善于吸收希腊人和迦太基人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造性地发挥。公元前 2 世纪中叶，古罗马政治家和作家大加图(Cato，Marcus Porcius)写了《农业志》(De re rustica)一书，据说是为一友人而作，谈论经营庄园和致富之道。这是罗马的第一部农业著作，它不仅总结了大加图本人长期从事农业经营和管理的心得，而且还总结了前人在这一方面的实践经验，系研究罗马共和国奴隶制经济的重要资料。公元前 1 世纪中叶，瓦罗(Varro，Marcus Terentius)也写了《论农业》一书。它由 3 个部分组成，内有农业、畜牧业及饲养鸟类和鱼类的实用指导，并对于如何组织罗马奴隶制经济繁荣时期的农业劳动作了较为突出的介绍。到了公元 1 世纪，意大利农业经济开始走向衰落，这从古罗马农学家科卢梅拉(Columella，Lucius Junios Moderatus)撰著的 12 卷《论农业》(De re rustica)一书中可以找到明证。鉴于意大利农业不景气，该书对农业、园艺及畜牧各业的经营管理提供经验，主张精耕细作，并告诫庄园主“将土地交给懒惰的奴隶耕作，如同交给刽子手去行刑”(卷一)。

公元 1 世纪中叶，著名的科学著作还有大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公元 23—79)的《自然史》(Naturalis Historia) 和盖伦（Claudius Galenus，约公元 129—199）的《药物治疗》(Metodo nella medicina)、《医术》(Arte medica)等。大普林尼，古罗马大科学家、作家，生于意大利北方科摩城之骑士家庭。早年在罗马接受教育，当过辩护士 后服役于德意志、西班牙、高卢、非洲各地，历任高级军职。他一生中著有哲学、历史、修辞学等各种作品，《自然史》成书于公元 77 年，共 37 卷，是一部百科全书式著作，包罗生物、天文、地理、矿冶、农业、园艺、医药、艺术诸门类，被誉为人类古代经典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在中世纪欧洲，许多较大的隐修院都藏有《自然史》。盖伦，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今土耳其境内)，其父为几何学家和建筑师，其思想对拜占庭及伊斯兰文明产生深刻影响达 1 400 年之久，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科学也起了重要作用，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学理论大家，他在把古希腊医学和解剖学的知识加以系统化的基础上，于解剖学、生理学及医疗学方面，有许多新的发现。他认为研究和治疗疾病应以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知识为基础，并提出血液循环和‘动物元气’学说。他的医学理论，尤其是解剖学，直到 16 世纪对西方医学仍然有很大影响。

二、建筑

宏伟壮丽的建筑是古罗马人留给人类的一件艺术瑰宝，其规模之宏大，装饰之富丽，技艺之精湛，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媲美的。其实，早在共和末帝国初，罗马的建筑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公元 1 至 2 世纪当帝国进入繁荣时期后，在罗马的建筑物里更融入了奢侈豪华的风格，凯旋门、纪功柱、剧场、宏大的市场、公共浴场、竞技场、广场以及由许多石砌拱门构架而成的水道相继建成。据史料记载：古罗马统帅庞培在罗马建筑了第一所

石造的大剧场；古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则自称“他接受的是一座砖头的城池，而他留下的罗马却是一座大理石的城市①”。

以供奉朱庇特等神的万神殿是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建筑，由古罗马政治家阿格里帕始建于公元前 27 年。教皇乌尔班八世曾誉此为举世无双的建筑；米开朗琪罗也称赞它“由天使建造，非人力所为”。万神殿的规模宏大，构造和设计都极为卓越。它穹顶直径 43 米,基座以上高 22 米，是现代以前最大的穹顶；除其最低部分外，内部不见有砖拱座的痕迹，其确切的建造方法至今不明。

古罗马时代的另一座标志性建筑，是由弗拉维王朝皇帝于公元 70—80 年修建的罗马大斗兽场。公元 82 年后，图密善皇帝又加建了上层看台。在这之前，斗兽场差不多都是在山麓处开挖后围成的，而大斗兽场则是在平地上用石料和混凝土类的材料建成的。椭圆形长轴为 190 米,短轴 155 米,可容纳 5 万观众,除进行角斗士徒手拼斗或人兽搏斗以外，甚至可模拟海战。

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罗马国家在向外扩张征服意大利的过程中，以及随后为了军事统治的需要，罗马人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陆续修筑了通往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道路，有的甚至穿过亚平宁山口直达亚得里亚海岸。主要有阿皮亚大道、弗拉米尼大道、埃米里亚大道。此外，还有起自罗马城，向北与埃米里亚大道汇合的卡西阿大道；起自罗马城，向东通往萨谟奈地区的拉丁大道等。道路都用石料建造，且宽度测量相当准确，被誉为罗马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随着罗马向意大利境外不断扩展，在各行省亦广泛铺设道路，并使之与罗马沟通；这些道路对各地人民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①《璀璨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杨兴乐、杨俊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96 页。

三、罗马法

罗马法是古罗马奴隶制国家法律的总称，它是世界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而且对后世影响最广泛的法律，是罗马人留给人类文明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

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公元前 5 世纪中期制定的十二铜表法，系先前各项习惯法的汇编。随着罗马国家的扩大和发展，奴隶制阶级为维护统治和保障其私有财产，不断将法律的内容和程式加以发展和系统化。但唯有享受罗马公民权的人，方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这时的法律称"公民法"或"市民法"。公元前 4 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罗马征服意大利并大举向外扩张，越来越多的非罗马人沦为罗马臣属，"万民法"便应运而生；它实际上是罗马统治范围内的"国际法"。公元前 1 世纪后期建立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帝起至公元 3世纪，罗马法学之研究甚为发达，皇帝常授于著名法学家以解释法律的特权，兴起各种法律学说及学派，扩充了罗马法的内容。212 年卡拉卡拉帝发布敕令，授予帝国全体自由民以公民权，为此"公民法"与"万民法"已不再有区别。帝国后期法学研究不如前期之盛，然而历代皇帝继续整理并编纂法典，罗马法体系已基本形成。罗马法实质上应包括公法与私法，但因其私法部分尤为完备而对后世影响很大，故研究者每以罗马私法用作罗马法的同义语。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较发达的条件下，买卖、借贷、债券、债务、合同契约、遗产继承等项，以及其他涉及所有权者，罗马法皆有详细的研究和规定，它是我们所知道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但是在罗马法中，奴隶不具有人格或权利，连其人身都是属于主人的。

公元 6 世纪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在位时，编制《国法大全》，包括 4个部分：《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后世所称的罗马法概指《国法大全》而言，它对欧洲各国私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它不仅为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战胜教会和世俗

的封建势力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还为资产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提供了现成的法律形式，是近代欧洲大陆国家立法所遵循的范本。19 世纪初,拿破仑制定的《法国民法典》,即以此为主要依据。

第二节　古罗马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作家

古罗马文化同希腊文明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同时又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在罗马文学史上，李维乌斯 · 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约前 284—前 204)是罗马史诗和戏剧的创始人。据史料记载，他原来是希腊奴隶，后为李维乌斯家成员所释。他的主要译作是荷马的《奥德修记》(Odissea),译文以粗略的意大利萨图尔努斯韵律写成，从残存的近 50 行诗以及西塞罗和贺拉斯的评论来看，作品几无诗意。但它是第一部重要的拉丁文长诗，也是文艺翻译的第一部范本。除外，他还译有数部希腊悲剧。

奥古斯都时代是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屋太维恩宠诗人,诗人为他歌功颂德，诗歌也就成了歌颂帝国和元首政权的工具。这一时期最著名的诗人有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等。

一、维吉尔(Virgilio，Publio Marone，前 70—前 19)

维吉尔是罗马帝国初期著名的宫廷诗人，被罗马人看成是他们最伟大的诗人，这一评价得到后世的认可。维吉尔生于意大利北部曼图亚附近一小土地所有者家庭,在罗马接受法学教育,但他放弃律师生涯，热衷于诗歌与哲学，自认是伊壁鸠鲁学派的门生。在维吉尔青年时期，罗马共和国已接近尾声，内战四起。维吉尔对纷乱的政治形势表示极大的憎恨和恐惧，倾注所有的精力在诗歌创作以及同诗歌有关的研究上。后得屋太维赏识，赠与他坎巴尼亚的一座田庄，并在景色绮丽的那不勒斯置庭院供其写作。维吉尔一生未婚,他的前半生过的是学者和近于隐士的生活,但是他

的诗歌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并为此结识不少罗马各界的重要人物。

他对意大利农村和在农村耕作的人民的爱是贯穿他全部诗作的主旋律。30 岁那年,他发表第一部著作《牧歌集》（Le Bocoliche）,这本诗集使维吉尔一举成名,并为他打开了通向奥古斯都大帝周围上层社会的大门。这些田园诗徜徉在希腊阿卡狄亚的田园牧人世界里,通过流畅的歌描摹了被理想化了的生活情景,在这里牧人们在阳光下歌唱他们淳朴的欢乐，悲叹爱情和死亡给他们带来的的不幸。其中，有些诗篇或直接或通过比喻使诗歌的意境和现实世界结合在一起，为田园诗的创作体裁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牧歌集》由 10 首牧歌组成，是维吉尔首次将这种形式新颖的抒情诗体带入了罗马文学。这些牧歌秉承了希腊田园诗的赋诗风格，但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诗集中某些对话体的牧歌是抒情的恋歌,诗人通过牧人的形象,塑造了他同时代的人,体现了同时代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幻想。诗句中臆想的牧人世界所表达的政治主题，往往与诗人自己的命运紧密相连。

他的第二部巨著是长诗《田功诗》（Le Georgiche）,创作于公元前 37 至前 30 年间内战的最后阶段，他将它献给奥古斯都帝的主要辅弼之一、文艺的主要保护人梅塞纳斯。该诗反映了作者迫切要求恢复意大利传统农业生活的心情，诗中除了描绘农民生活，论述节令对农业的关系,并介绍农事知识(关于耕种、植树、养蜂和饲养牲畜等方面的实用指导），还对大自然作了生动而深入的描绘，并对意大利乡村美景和农民在粮食归仓后的喜悦等题材作了精心的刻画。

维吉尔出生农村，对意大利人民淳朴的道德和宗教传统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写作一部史诗（当时被视为诗歌成就的最高形式）的想法始终萦绕在他心间。创作于公元前 29 至前 19 年间的 12 卷叙事长诗《埃尼德》（L’Eneide)圆了维吉尔的心愿,这部被公

认为其代表作的长诗形象地体现了他理想中的罗马。《埃尼德》记述一位特洛伊王子在意大利建立第一个居留地的故事，通过使用预言、幻想的手法再现罗马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以神话史诗为屋太维的祖先追溯神的系谱，使长诗的作者获得了世界声誉。《埃尼德》表述的想象中的罗马是一个崇高的罗马，诗人通过迦太基女王和反对罗马生活方式的狄多这两个人物形象，探讨人的苦难和悲伤，并借此烘托长诗的主题“建立罗马帝国是如此伟大的一项任务”。这部长诗用了维吉尔整整 11 年时间,在作者死后才发表,因为他生前没来得及对它进行整理和修改。维吉尔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拉丁语诗歌的革新者，被认为是罗马高度完善的诗歌语言的创造者。他的作品脍炙人口，被誉为罗马一代诗宗，对中古诗人（如但丁）及近代诗人有相当影响。根据维吉尔同时代人的说法，维吉尔创作叙事长诗《埃尼德》的初衷是想同荷马的诗作相媲美。这部以神话故事为创作素材的长诗是遵照奥古斯都大帝的意志所作的，也反映了作者的宗教观念。长诗由各个完整的叙事诗组成，共同的主题将它们同罗马史连在了一起：按照神的意志，埃尼斯离开被希腊人攻克的特洛伊城，最后漂泊至意大利，在古罗马的土地上建立了王国；许多预言、梦兆和一切其他象征都说明他的后代将要统治全世界，后来他确实在梦中获悉，罗慕路斯将成为罗马未来的奠基者。这一部史诗无论对于罗马奥古斯都时代的国家成就和理想，还是对于了解维吉尔敏感、孤独的内心世界，都具有丰碑的意义。

二、贺拉斯(Orazio Flacco，Quinto ,前 65—前 8)

贺拉斯是奥古斯都皇帝时期杰出的拉丁抒情诗人和讽刺作家,生于南意大利古代地区阿普里亚境内的维努西亚,其父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但在贺拉斯出生之前就已获得自由。贺拉斯早年曾去罗马和雅典受教育,攻读文学和哲学。在成为诗人之前,他曾

经醉心于政治上的自由思想。恺撒被杀后，公元前 44 年爆发内战。贺拉斯曾参加布鲁图斯统率的军队，为共和国而战，公元前 42 年在反对安东尼和屋太维战役失败后，他返回罗马，但父亲在家乡的田产已被没收。因处境窘困，他当过文牍，开始从事诗作；后经奥古斯都主要政治顾问之一梅塞纳斯的引见，跻身于宫廷诗人行列，并深受奥古斯都的赏识。公元前 20 年左右，他实际上已成了罗马最大的诗人。公元前 8 年，在梅塞纳斯谢世后一两个月，诗人也与世长辞。

与维吉尔不同，贺拉斯始终竭力与宫廷保持一定的距离，作品很少涉及尖锐的政治问题，对君王的赞美也极为含蓄。他拥护共和政体，但他的诗歌却崇尚个人生活的幸福在于心灵的安宁和善于满足的‘中庸之道”,歌颂美酒、爱情,鼓励人们与各种世俗的欲念和恶习作斗争。贺拉斯是一位博学多才、一丝不苟的大诗人，对作品中的每一诗句，他都经过精心的琢磨和推敲。他以写讽刺诗和抒情诗著名,早期的作品有《讽刺诗集》（Satire)和《长短句集》（Epodi）.

贺拉斯对西方文学发生重大影响的作品是他的《颂歌》（Odi）和《书札》（Epistole）:《颂歌》共 4 卷,公元前 3 卷(包括 88 首短诗)发表于前 23 年,第 4 卷发表于公元前 13 年,赞美爱情和友谊,颂扬屋太维的光荣和罗马帝国的伟大。这部抒情诗的题材广泛，其中有规劝性的组诗，也有探讨人生意义和爱情问题的诗，抒情化地表达了作者的思想。《颂歌》中有的写对朝三暮四的爱情的感受，有些则描写人与人之间深厚的友谊，也有赞美“酒神”的诗篇。除外，在这本集子里，还有一些政治题材的诗，以十分婉转和含蓄的笔调叙述奥古斯都大帝和安东尼之间的斗争。《颂歌》的最后一首诗是著名的《纪念碑》,它曾多次被译成各种现代语言,同时也成了后人摹仿的典范。普希金根据这首诗写成了著名的《纪念碑》。

《书札》共 2 卷,第 1 卷是生活哲理,第 2 卷以文学评论为主，

在欧洲古典文学中影响深远。《书札》集中讨论了文学和诗歌评论问题，其中有很大的篇幅描写作者自己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他声称，他在诗歌中提出的批评是为了社会的公益，他确信一位优秀的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公正善良的人，要作为教育者和文明启迪者有益于社会。他的诗歌虽继承了拉丁的、尤其是希腊的传统，但绝不是机械地模仿，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贺拉斯把早期希腊抒情诗介绍到拉丁诗歌中来，他改变希腊诗的格律使之适应拉丁语，成为正规的格律，并用它写出罗马化的诗篇，给人以优美和庄重之感。他的赋诗法后被人称为"贺拉斯体颂歌"。

三、奥维德(Ovidio Nasone，Publi，前 43—前 17)

在奥古斯都统治时代，罗马诗人奥维德是当时杰出的诗歌大师中最年轻的一个。奥维德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地区苏尔莫纳镇，家道小康。由于他是罗马骑士阶级的成员，其父企图把他培养成为官场人物。少时在罗马和雅典学习修辞和法典，又去西西里岛和近东游历。其后做过司法小官，但不久便开始潜心致力于诗歌创作。他一生曾 3 次结婚，仅最后一次婚姻给他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据说，他写的《爱的艺术》使他招致非难，奥古斯都大帝以维护道德风化为名，于公元 8 年将 50 岁的奥维德流放到黑海边的托米（今罗马尼亚的康斯坦察城）。奥维德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 10 年，受尽了思乡的折磨。为此，他以哀愁之情写了《哀歌》(Tristia，5 卷)和《黑海书简》(Epistulae ex Ponto，4 卷)，感情真挚，如怨如诉，恳请奥古斯都予以宽恕，后终未如愿而客死异乡。

奥维德的全部创作，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爱情诗，神话诗及流放时期所作的诗。他早年便显露出超凡的文学天赋，因罗马社会放荡生活的影响，作品沾染了颓废淫佚情调。早期诗作《恋歌》(Amores)和《爱的艺术》(Ars Amatoria) 的主题是情爱和情爱的

勾引,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繁华、机巧和对声色犬马的追逐。《恋歌》是奥维德前期的成名之作，包括 49 首诗歌，表现诗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一个名叫柯丽娜的女子的爱恋。《爱的艺术》共 3 卷，抒写恋爱的技术，甚至露骨地描写男女之间的性爱。实际上,《爱的艺术》不失为一本杰作,它不仅包含形形色色讽刺社会和个人的精彩篇章，而且还传神地勾画出罗马生活的种种习俗。

为后世传诵最广的是 15 卷长诗《变形记》（Metamorfosi），以古典神话为题材，将故事情节与奇异的变幻（人变成动植物等）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后人掌握希腊神话的通途与捷径，也给他带来了世界性的荣誉。《变形记》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机智风趣以及丰富的想象力。由于他的叙事状物的卓绝才情，使数 10 种希腊传说有了最后确定的文本。《变形记》是一部六音步的叙事诗，给奥维德带来了至高的荣誉。全诗共分 15 章,近 12 000 行,收入了 200 多则古希腊罗马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故事，均以“变形的神话”作为主题。叙事诗的创作素材大都来自希腊的神话传说，经诗人别出心裁的艺术加工，巧妙地将它们串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主要描写从混沌初开、乾坤始奠起的第一轮变形到恺撒被刺、化为天神为止的最终一轮变形。奥维德笔下天神们的风尚，完全能使人联想起他那个时代罗马的社会风尚，他们同罗马上层社会的人物一样，也分有权势的‘贵族’和受人管束的‘平民’,相互倾轧,搬弄是非，男女神之间甚至互相玩弄和通奸。可以说，没有任何其他一部文学作品为后世保存了如此之多希腊先人的丰富想象的成果，诗人的才华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

在 5 卷本的《哀歌》中,奥维德倾诉了流放时心中的种种痛苦感受。《哀歌》的内容十分丰富 有作者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有给他忠实的妻子写的书简，有对患难之交的朋友表示感激及对叛变他的朋友表示遗憾，有恳求为自己辩护的呼吁，也有对异乡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抱怨和对孤独生活痛苦的描述，最后还有对诗歌和诗

神的赞美，这是他流放时期中唯一的精神慰藉。除外，他还写有一部未完成的长诗《岁时志》（Fasti，6 卷),每月一篇,记载罗马年历和宗教节日，其中有叙事部分，也有取悦皇室的篇章，被公认是民族的诗篇。

四、西塞罗（Cicerone，Marco Tullio ,前 106一前 43）

西塞罗是罗马政治家、律师、古典学者和作家，生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地区的阿尔比诺一骑士家庭。在导致罗马共和国灭亡的内争中，他曾徒劳地维护共和制度，但作为罗马最杰出的演说家则名垂史册。他早年在罗马、雅典等地学法律、修辞和哲学。公元前 89 年服军役,公元前约 80 年在一起法律诉讼中为罗马喜剧演员罗希乌斯辩护，从此在法律界立下威名。公元前 70 年他因发表演说，弹劾西西里总督维列斯贪赃枉法而名闻政坛。前三头同盟成立后，他曾被放逐。公元前 44 年恺撒被刺后，他热衷于恢复共和政体，连续发表反安东尼演说，居元老院首席。后三头同盟成立后，他被安东尼部下杀死。他一生著述甚丰，今存演说辞 50 余篇，最著名的是《为米洛辩护》(Pro Milone)。他受学院派与斯多葛派影响，深具折中主义色彩。唯心哲学方面有《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论神之本性》（De natura deorum)等,修养著作有《论老年》（Cato Maior de senectute）、《论友谊》（Laelius de amicitia）等。除外，他还写有政治论文《论国家》（De Republica)、《论法律》(De legibus)等,以及大批书简。

在政治方面，西塞罗不停地诽谤对手，对朋友的美德则夸大其辞 西塞罗遗下书信 900 多封,其中 835 封是他自己写的，信中对事情的叙述不够客观。作为诗人，西塞罗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较著名的有长诗《我的执政》（De consulatu)和《我的时代》（De temporibus suis），但因包含自我吹嘘成分而在古代就受到批评。作为演说家，西塞罗在政治和诉讼方面颇有声誉。当时的罗马演说家

分成亚细亚派(音调铿锵、词藻华丽、风格超逸)和雅典派(直率、质朴），但西塞罗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派，他认为一位优秀的演说家应该吸取不同派别的长处。他指出，演说家应具有充分的文学、哲学、法律、历史等知识，要有束缚对手和左右听众心理的能力。他的演说辞内容充实，说服力强，讲究层次和对称。他的伦理思想倾向于教条，在宗教方面则是个不可知论者和有神论者；在政治上，他鄙弃民主政体、寡头政体和君主政体，主张混合政体。他的作品文笔流畅、优美，被后世誉为拉丁文学的典范。在哲学史上，西塞罗的重要性在于他传播了希腊的思想，并给予了罗马和欧洲一套哲学术语，现今的不少哲学概念都来源于他。

五、瓦罗（Varro，Marcus Terentius ，前 116—前 27）

瓦罗是古罗马著名学者和卓有成就的讽刺家，生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地区利埃迪镇的骑士之家。青年时期曾在罗马学习语言和历史，后去雅典，从学于柏拉图的门徒安提奥卡斯。公元前 49 年‘内战’前担任过保民官、市政官、大法官、财务官、海军将领及西班牙驻军长官等职。公元前 76 年任庞培的财务官时参与镇压古罗马政治家、将军塞多留领导的起义；内战中反对恺撒。恺撒当权后不计前仇，授命他筹建罗马第一所公立图书馆。同时代人西塞罗及后世圣·奥古斯丁均称赞其博学多才。他生性爱国，立志通过他的作品使罗马更加伟大；他竭力使罗马的未来与它光荣的过去联系起来，在罗马帝国建国前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瓦罗约写了 74 部计 600 多卷著作，题材广泛，包括法学、天文、地理、教育、文学、历史、哲学、法律等门类。今仅存《拉丁语论》(De lingua latina)残篇及一部较完整的《论农业》（De re rustica）。其中，《拉丁语论》原是献给西塞罗的，它不仅是一部语言著作，而且也是各种题材的宝贵史料来源；《论农业》则是一部为培养对农村生活的热爱而写的对话体作品，共有 3 部分组成，内有农业、畜牧业的实用

指导，是研究公元前 1 世纪意大利奴隶制经济的重要资料之一。另外，瓦罗还仿照公元前 3 世纪著名哲学家梅尼普斯的赋诗风格，著有数量十分可观的散文讽刺诗，共 150 卷，但留存仅 600 个片断。

六、李维(Livio，Tito，前 59—后 17)

李维是罗马三大历史学家之一，与萨卢斯特和塔西陀齐名，所著《罗马史》在他生前即成为经典著作，并对直至 18 世纪的历史撰写风格和历史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生于意大利北部威尼托地区帕多瓦城，早年任教师，后长期居留罗马，与奥古斯都帝过从甚密。主要著作有《罗马史》(Ab urbe condita libri)，共 142 卷，叙述自罗马建城至公元前 9 年的史事，现存 35 卷(1 至 10 卷，记述前 754—前 293 年；21 至 45 卷，记述前 218—前 167 年)及部分残卷，既歌颂了罗马帝国，也隐喻了对旧日共和制的怀念，为此奥古斯都曾称其为"庞培派"。在罗马几位历史学家中间，唯有李维没有参加过政务。他不是从政治上解释历史，而是从个人和道德的观点看待历史的进程。李维与西塞罗、塔西陀共同奠定了记叙历史的新风格。他创造了一种灵活多变的文体，为此古代评论家昆体良曾说，这种文体"像奶汁一样富有营养"。李维自己也写道："当我叙述古代的事迹时，我的心也成为古代的了①。"李维采用文学笔法著述《罗马史》，且书中夹杂神话和传说，这不能不影响史实的可靠性，但仍为罗马重要古史文献，亦古代文学名著。

七、塔西陀(Tacito，Publio Cornelio，约 55—约 120)

塔西陀是罗马帝国雄辩家、高级官员、历史学家，或许当属用

①不列颠百科全书 1999 年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 10 卷第 149 页。

拉丁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史学家和散文作家之一。他可能出生在山南高卢一个旧贵族家庭，从小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受过良好的教育。早年为律师，后任会计官、司法官、行省总督、执政官、亚细亚行政总督等职，倾向共和，反对帝制。

塔西陀的主要著作有《日耳曼尼亚志》（La Germania，记述莱茵河上罗马边界地区的状况，以及日耳曼人的分布、习俗、宗教、社会制度、淳朴道德和原始陋习）、《阿格里科拉传》（De vita et moribus Julii Agricolae，记其岳父阿格里科拉在不列颠任职情况，特别详细地记述了公元 78—84 年任不列颠总督和晚年在图密善统治时期的情景）、《历史》（Le Historiae，记公元 69—96 年之史事）、《编年史》（Gli Annales，记公元 14 年奥古斯都帝去世至公元 68 年尼禄统治结束的史事）、《演说家对话录》（Dialogus de oratoribus，指出公民自由的缺乏和政治、社会的堕落是雄辩术衰微的原由）等。其中，《历史》是一部经得起时间磨炼的作品，文笔尖锐有力，叙事有声有色，其文体完全适合于描写内战期间错综复杂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塔西陀是一位思路清晰的文体家，他的拉丁语生动、有力，富有节奏感，行文艰深凝练，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其史书观至今仍为史学家和文学界认真研读。

八、卢克莱修（Lucrezio Caro，Tito，约前 98—前 54）

卢克莱修是古罗马哲学家和诗人，以其唯一的一首长诗《物性论》（De rerum natura）而知名。其生平事迹很少为人所知，大约出身于骑士家庭。《物性论》共 6 卷，均用六音步诗行写成，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他采用优美的诗歌语言叙述了世界的起源，原子不停的转动，以及生与死的学说。《物性论》主要抒发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观点，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并非神造也不受神的支配，它们是由唯一真实的物质即不可分的原子所构成；人的‘灵魂’和躯体一样，也是由原子构成的，躯体死

亡则人的‘ 灵魂 ’也归于死亡,因此人不应存有对死后的恐惧。在全诗的末尾,诗人描述了雅典的瘟疫,而同这一阴暗的死亡景象相对照的则是开头向维纳斯神吁请的春天与诞生的景象。另则，卢克莱修在认识论上主张感觉是认识的基础，指出私有的贪婪是人世间的罪恶。所以,《物性论》在古代哲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它以无神论启迪人们自觉地摆脱宗教迷信的束缚，它也是后世了解伊壁鸠鲁哲学的重要文献。卢克莱修是一位与宗教迷信作斗争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启蒙者和唯物论世界观的先驱。

据考证,卢克莱修《物性论》的标题是对伊壁鸠鲁的主要著作《论自然》的标题的解释,也是对他仰慕的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同一名称教训诗的解释。卢克莱修把他的论述分成 6 卷,每卷的开头都有措辞十分讲究的引言：第 1、2 卷确立了宇宙由原子构成的原则 第 3 卷说明原子的结构和灵魂必然死亡的道理；第 4 卷谴责情欲,描述感官知觉、思想和某些身体功能的机制 第 5 卷讲述世界、天体的创造和运作,以及人类和生命的演化 第 6 卷解释大地和天空的某些特殊现象。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是一部运用优美的诗歌语言写成的哲理长诗，不愧为古罗马一位有独特见解的哲学家和诗人。为此,马克思称他为‘ 朝气蓬勃的、叱咤世界的大胆诗人。’①

①《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2 卷第 57 页。

第二章　　萌芽状态的意大利文学

公元 1000 年之后，同整个欧洲一样，由于教会内部的一系列改革和十字军东侵，意大利的经济开始复苏，城市也重新崛起，从而为商业的蓬勃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先决条件。诚然，城市的再起在欧洲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意大利，它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意大利的中、北部地区，富有强大生命力的城市国家渐渐把周围乡村中的大片土地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防御外来的各种干预，尤其是抵制帝国插手其内部事务，这些新兴的城市国家想方设法巩固和扩大自治权力。因此，13 世纪的意大利历史不仅自始至终贯穿着帝国和教廷之间的剧烈斗争，而且还记载着城邦诞生、发展和兴旺的全过程。

1183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绰号‘红胡子’)被迫在康斯坦萨和约上签字，承认了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城邦的自治权。这一事件对新兴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城市国家在形式上仍然接受“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但实际上却享有铸造钱币、制作武器、自行管理司法和选举自己首领等重要权力。新兴的市民阶级(商人、手工艺者、工场主等)原先均为非神职人员，但他们从事的社会劳动促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望。人们普遍感到有必要掌握文化，以借此抒发思想感情，改善本职工作。甚至连那些在商人货仓或手工艺匠店铺里当学徒的年轻人，也开始学习算账和看书识字。

第一节 概 貌

帝国的衰亡和城邦的诞生，为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温床。面对风雨飘摇的政局，朝廷越来越多地启用平民出身的官员管理帝国疆域内各省的事务，寻求得力的法官为其合法统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不宁唯是，慑于封建体系全面崩溃的政治趋势，教会也需要造就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为其利益效劳，以迎合新文化的潮流，宣扬基督永恒的真谛。文人们汲取古代文化的营养，模仿古人的写作风格，竞相翻译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孜孜不倦地阅读和研究经典著作，满腔热忱地编纂百科全书……这样，带有浓郁民间色彩的通俗语文学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相继问世。这是一种深为广大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即使是一些没有什么阅读能力的平民百姓也能领悟作品的内涵，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人们内心的呼声。通俗语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赋予了"国家"这一概念新的含意。人们认真学习和刻苦研究古罗马的法律，并从中寻找抨击中世纪司法的理论根据。不少人对金钱主宰世界的不合理现象展开热烈讨论，并指出"在人类的理想王国里，除了富裕的物质生活以外，精神文明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贵族"不应该只是达官显宦后嗣的代名词，人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高尚的品行和聪明的才智。

从公元8世纪至12世纪，通俗语的运用日趋广泛，不管是在日常的生活用语还是在深奥的文学语言中，通俗语的声望日隆、颂声日高。遗憾的是，早期的通俗语文学作品现已几乎全部失传。1924年，有人曾在意大利北方腊万纳古城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公元8世纪末用通俗语写成的4首谜语诗，这是迄今为止幸存于世最古老的通俗语文字资料，它们为意大利语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但是，通俗语的广泛运用并不意味着拉丁语已销声匿迹。恰恰相反,在 13 世纪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拉丁语和通俗语并茂共存，同一个诗人往往交替使用拉丁语和通俗语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伟大诗人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就是一部用通俗语写成的光辉诗作，因为作者欲让更多的人领悟《神曲》蕴藉深沉的诗意。而他写的《帝制论》和《俗语论》却采用了拉丁语,因为作品的对象是社会上层博学的文人。到了 16 世纪末，人们才开始广泛运用通俗语撰著科学和哲学著作；而拉丁语直至 18 世纪后期始终是意大利中学生一门必修的语言课程。

随着城邦的不断发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定居，并在进城后自发组织起各种同业会。一旦从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禁锢中解脱出来，人们犹如逃离樊笼的小鸟，贪婪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日趋繁荣的城市生活，无疑对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昔日寥若晨星的教会学校已远远适应不了社会对文化的需求。城邦的统治者拨款兴办公共学校，聘请知书达理的文人教授知识。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除男学生外，学校还招收一部分女学生，这在以前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简而言之，城邦的兴旺发达和文化的繁荣，是与通俗语文学的诞生相辅相成、休戚相关的。

在公元后的数百年中，罗马文学虽然有过繁花似锦的鼎盛时期，但在意大利半岛上，并没有因此形成一种被民众所广泛接受的统一的民族语言。在当时的意大利，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为了让其他地区的人也能看懂自己的作品，文人们就以拉丁语为语言基础，对方言进行适当的修正，并尽量避免使用地方味过浓的词藻。随着时光的流逝，逐渐形成了以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统一文学语言，也就是今日之意大利语。从 13 世纪初叶起，诗人和作家开始以通俗语代替拉丁语从事文学创作。

通过以上的表述，萌芽状态的意大利文学的概貌，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通俗语文学诞生在 13 世纪，然后在 14 世纪得以广泛流传。通俗语由意大利各地不同的方言组成，其中较主要的有西西里语、托斯卡纳语、翁勃利亚语以及法语化的威尼托语等。13 世纪后,拉丁语依然存在,并且在某些领域内仍十分流行;有一部分意大利诗人则采用法国北方的方言和法国南方普罗旺斯语赋诗。

2. 新颖的文学诞生在一个阶级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环境中，每部文学作品无疑都打上深刻的阶级烙印。当时的文学作品大体上可分为民间文学、宗教文学、宫廷文学等三类格调迥然不同的形式。

3. 萌芽状态的通俗语文学，积极反映城邦时代新兴资产阶级对文化的迫切需要以及其革故鼎新的政治主张。尽管大部分作家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律师和公证人在数量上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4. 新文学使新兴市民阶层在文化和美学方面的要求得到满足。当时新建的一些大教堂和公共广场不仅宽敞明亮，而且富丽堂皇、璀璨夺目。人们不仅希望作家通过作品传播文化知识和新的概念，而且还要求他们叙述美丽动人的故事和创作流丽超逸的诗篇,以激起他们心中美的共鸣。

5. 通俗语文学在 13、14 世纪以预想不到的气势迅速发展。13 世纪 20 年代,早期通俗语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现花团锦簇、竞相争妍的盛景,但丁的不朽巨著《神曲》也在 14 世纪初问世。随着新文学的繁荣兴旺，托斯卡纳地区首府佛罗伦萨方言的权威日趋巩固和提高。诚然，佛罗伦萨文坛上的 3 部扛鼎之作(但丁的《神曲》、彼特拉克的《歌集》和薄伽丘的《十日谈》),为佛罗伦萨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人们积极摹仿他们的写作风格,佛罗伦萨逐渐发展成为意大利文化的发祥地。

第二节　流派及代表作家

一、民间文学

在早期的通俗语文学作品中，民间文学显得尤为活跃，它是当时社会下层民众思想意识、文化生活、情趣爱好的生动写照，深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由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局限，此类作品现存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在民间文学的推广和流传方面，游吟诗人无疑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些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诗人四方遨游，时而在广场扮演丑角；时而在音乐声中引吭高歌；时而以哑剧的表演形式吟诵诗文。他们中一些颇有才华的人赢得了贵族或皇室的青睐，被召进宫内为达官贵人助兴取乐。在不存在印刷技术的城邦社会中，游吟诗人在无形中为传播文化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民间文学作品的题材丰富多样，格调不一，叙述的主要内容如下：在光华如水的夜色中，男子在情人窗下唱着情歌；黎明时分，情侣们依依不舍地喃喃私语；出阁的女子埋怨丈夫，悲叹命运的不幸；青年女子向父母诉说心中的隐私；男女双方发生争吵或冲突等。有一些作品还隐含着明显的政治色彩，或穿插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增强艺术感染力。城邦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既得利益，有意识地组织民间诗人赋诗，并将他们的诗歌张贴在城墙上，以此作为博取民心的一种手段。

民间文学的诗人文笔恣肆，不拘泥形式或规行矩步，不为追求繁丽的词藻而斟酌雕琢，而比较自由流畅地抒情达意。他们深知，民间文学的广大读者要求的是扣人心弦、妙趣横生的情节，而不是瑰玮的文字或精雕细镂的诗韵。这不禁使我们想起 20 世纪初曾风靡一时的美国西部影片，尽管它们的主题大同小异，但经导演的艺术处理后，表现手法却各不相同。

在民间文学作品中，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诙谐诗占据着一定

的地位，是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尤其是它的现实主义描写，常常使听众在哄堂大笑之后得到有益的启迪。契可·安乔里埃利(Cecco Angiolieri，1260—1313 ）是这一方面较杰出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意大利第一位诙谐诗大师。他于 1260 年左右诞生在托斯卡纳地区美丽、幽静的西埃纳城，1313 年初去世。关于他的身世,后人知道的很少,但从他写的 150 首十四行诗推断，他出生在一个富裕阔绰的贵族家庭，其父母生性悭吝，不允许年轻的诗人在外挥霍钱财，寻欢作乐。安乔里埃利自幼酷爱放荡无羁的生活，其诗歌的风采豪放不拘，独树一帜，截然不同于当时十分流行的文字艳丽的爱情诗。他的诗作语言生动，对生活中种种不谐调的事物感觉敏锐，擅长于运用朴实无华的日常用语，独具匠心地勾勒出一幅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画卷，那幽默诙谐的诗句常使人听了之后仰天大笑。他在诗歌的末尾往往精心地安排一些滑稽、荒诞、直率、风趣的词语,含意深沉,耐人寻味。《倘若我是一团火》（S' i' fossi foco）是他的一首名闻遐迩的十四行诗，曾得到过很多文学批评家的肯定和赞赏：

《倘若我是一团火》

倘若我是一团火，我欲将全球焚烧；
倘若我是一阵风，我欲在宇宙掀起狂飚；
倘若我是江河之水，我欲将整个世界吞掉。
倘若我是上帝，我欲将瀛寰沉入万丈深渊；
倘若我是教皇，我将为教徒遭殃而欢笑；
倘若我是皇帝，我欲用宝剑将所有人的首级砍掉。
倘若我是死神，我欲把父亲寻找；
倘若我是生命之神，我将离开父母远飘。
倘若我是契可，我将一如既往，

把年轻美貌的女子留在身边，
老妪、跛子赐予他人作酬报。

作者运用毫不隐讳的语言描写男女之间的爱情，全诗充满荒诞无稽、置若罔闻、疯癫不堪的情调。我们在欣赏他的诗句时，耳边仿佛隐约响起酒店里的客人们在聆听诗歌吟诵后的欢声笑语。

鲁斯蒂科·迪·腓利波（Rustico di Filippo，1230—1295）和福尔戈雷·达·圣吉米尼亚诺（Folgore da San Gimignano，1270—1332）是另两位颇有建树的诙谐诗作者。鲁斯蒂科生于佛罗伦萨，因其爱情诗和诙谐诗在托斯卡纳地区享有盛誉，曾得到佛罗伦萨著名诗人布鲁奈托·拉蒂尼的高度赞扬，幸存于世的有他的 29 首爱情诗和 29 首滑稽讽刺诗。他的许多诗取材于佛罗伦萨市民生活，富有地方语色彩的诗句生动活泼，对女子以及其政敌归尔甫党人的嘲讽是他诗歌的主题。

福尔戈雷曾写有 32 首十四行诗，主要以颂扬上层市民的欢乐生活和抨击其政敌吉柏林党人为主题。他的诗歌语言清丽文雅，用词讲究，着重描绘包括狩猎、比武、宴会等内容在内的上层市民的悠闲生活图景。

二、宗教文学

在城邦时代，宗教迷信仍然是思想、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13 世纪时，在基督教内部形成了两个新的组织，即分别由圣·方济各作为奠基人的方济各修会和西班牙修士多明我创导的多明我修会。两大修会的信徒日益增多，他们除了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以外，还掌握着一部分文化大权，当时驰誉整个欧洲的法国巴黎大学和意大利波伦亚大学就是由他们主管经办的，欧洲各国的学生慕名络绎不绝地前去扣门求学。

方济各（San Francesco，1181—1226）是 13 世纪意大利宗教文

学的代表诗人。他于 1181 年出生在翁勃利亚地区的阿希西城一个富商家庭。年轻时，他生活放荡不羁，骄奢淫逸，后在阿希西同贝鲁嘉一次交战中被俘入狱。在狱中，他抚今追昔，深为岁月蹉跎而嗟悔无及，其宗教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获释后，他离群索居，遗世独立，慷慨解囊救济贫苦百姓。1209 年后，经教皇英诺森三世准许，他独树一帜，成立了方济各会。

方济各的一生及其文学作品，在意大利的宗教史和文学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他的影响下，其为数众多的弟子经常出没在社会下层的平民中传播人类的博爱精神，这在无形中为通俗语的推广和文化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围绕着他坎坷的一生，很快出现了带有强烈宗教民主色彩的传奇文学热潮，不少作品给他戴上了一轮神秘、奇异的光环。方济各本人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拉丁语和通俗语的珍贵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他于 1124 至 1125 年间用翁勃利亚方言写成的宗教诗篇《万物颂》（Il cantico delle creature），可谓是意大利文学史上最古老的丰碑之一。他运用韵味浓郁的散文体，通过对水、火、死亡等的赞美，颂扬了创造万物的天主至高无上的恩德及人与人之间兄弟般的情谊。作者在离开人世前两年根据传说写成的这一诗篇，为后人研究意大利早期通俗语文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意大利 13 世纪宗教文学的另一位著名诗人为翁勃利亚地区陶迪城的雅科波尼（Jacopone da Todi，1236—1306）。他经历坎坷，终生郁郁不得志。1268 年，他的爱妻溘逝，这使他对宗教的态度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决心摒弃世俗浮华，开始笃信以贫困赎罪的教义。1278 年，他被方济各会接受为世俗修士，后因修会内部派别之争入狱，获释后不久即忧郁而死。他给后人留下不少人们在教堂忏悔时所唱的赞美诗。雅科波尼的宗教诗充盈着对神寄托的殷切冀望，并给人们以启迪：获得上帝永恒的恩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即使和天主在一起时，精神上感受到的欢乐也是一瞬

即逝的。他曾在一首诗中，通过对一位神父的发问启示人们：神学无法给人们带来任何裨益；在上帝面前，学问渊博毫无用处。他的赞美诗中交织着他对上帝的赤诚之爱和自己内心的悲痛。诗人以含蓄隐晦的笔调，赞咏苦修主义的美德，贬责世俗的恶习，因为在他看来，世俗浮华是一切罪孽的祸根。他的第七赞美诗《天国圣女》（Pianto della Madonna ,又称《圣母的眼泪》)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作品，作者的宗教思想和写作风格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体现。诗中出现的罗马教皇的使节、圣母、耶稣和人群从不相遇，圣灵之地在作者的笔下显得分外神秘莫测和不可捉摸。

13 世纪宗教诗篇的作者自称为淡泊明志之士，也就是说，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单纯是为了抒发宗教感情，颂扬某一位圣人的高尚美德，或是同对立派展开唇枪舌战。作者一般不署姓名，这给今天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尽管如此，宗教文学对意大利 13 世纪的社会和文化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这里仅举一例说明：1256 年，翁勃利亚地区有一名叫拉尼埃利 · 法萨尼的人，他四出游说，狂热地煽动宗教感情，人们竟然对他所宣扬的世界末日已经到来的诡谲说法深信不疑，并把这种说法奉若神明。为了拯救灵魂，他们竟互相鞭笞赎罪，直至鲜血淋漓。这种愚弄人们的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荒唐可笑，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宗教信仰确实起着主宰人们灵魂的作用。

三、西西里艺术诗

西西里艺术诗是 13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西西里腓特列二世朝廷中以爱情为主题的一种诗歌创作流派，是诞生在但丁之前的一种萌芽状态的文学，同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抒情诗如出一辙。

此类艺术诗的作者是一群聚集在腓特列二世宫廷及其子曼弗雷迪周围的西西里和托斯卡纳诗人。“西西里派”诗人采用刻意雕琢的西西里方言，而不用普罗旺斯语。作为意大利爱情诗的标准

媒介，他们还在普罗旺斯、法国北部和阿拉伯诗歌传统的影响下，开创了两种主要的意大利诗歌体裁，即十四行诗体和短歌体。除了他们以外，连王室的达官显宦和游吟诗人也是此类艺术诗的作者，这在无形中为艺术诗的流传和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西西里艺术诗派中的著名诗人有贾科莫 · 达 · 伦迪尼(Giacomo da Lentini)、贾科米诺 · 普列埃塞(Giacomino Pugliese)、利纳尔多 · 达奎诺(Rinaldo d'Aquino)等。这些诗人熟悉普罗旺斯游吟诗人的诗歌以及法国北部和德国歌手的诗歌,曾创作出许多作品,其中大约有 125 首流传至今，全部用西西里方言写成。这些诗中约有 85 首是短歌，其余大部分是十四行诗。伦迪尼是大部分十四行诗的作者,通常被认为是这种诗体的开创者,生前负有盛名,被后代诗人(包括但丁)尊为大师,但丁在《炼狱篇》第 24 首中曾称赞过他。他把普罗旺斯诗歌的主题、风格和语言移植到意大利,并灌注以自己独特的贵族风格；他的抒情诗有 40 余首留存至今,其中包括十四行诗、短歌以及论辩诗,均以爱情为主题,诗句委婉清丽,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以下选译的是伦迪尼所作的短诗《奇妙的爱情》(Meravigliosamente un amore mi stringe)中的前两节：

奇妙的爱情勾住了我的魂魄
使我久久无法忘怀，
宛如一个客居异地的人
同一幅画让他梦绕情牵。
你那美丽的倩影，
是我心中难以排遣的思念。

你就是那画中的人儿
我把你深藏心间，

你可知爱你的人多么虔诚，
哦,天呀,悲痛深重难言！
我怯生生踟蹰不前，
望着你，却不敢把爱情奉献。

在今天看来，西西里艺术诗在技巧上并不十分娴熟，作品除了一些描写悲伤、苦恼和爱情以外,大多运用繁难复杂的格律,缺乏真实的感情，故显得比较单一和呆板。但它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流派，却幸存了很长一段时间。托斯卡纳诗人以及柔美新诗体派诗人均模仿它的格调，但丁也曾赞扬和肯定过它优美的诗体和绮丽的文采。西西里艺术诗派的十四行诗及其变体不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诗歌形式，而且也是欧洲各地的主要诗歌形式。

显而易见,此类诗文是属于阳春白雪范畴的文学艺术,它反映了宫廷贵人的闲情逸致和奢侈浮华的生活；同时他们也借此炫示自己举止的高雅,学问的渊博和情操的超逸。所以,这类诗歌的主题,所描绘的女子形象和采用的语言十分相似,有时简直无法鉴别作品究竟出于何人之手。诗歌描摹的女子都出自同一个模式：金发生辉,端庄高雅,雍容华贵,品行高尚,绰约飘逸。

同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抒情诗一样，西西里艺术诗也是一种贵族化的文学艺术，故带有较大的局限性。13 世纪是充满着激烈社会斗争和严重宗教危机的历史时期，其间出现了像马可 • 波罗和方济各等颇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然而，教会同帝国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封建贵族同城市新兴资产阶级之间的剧烈冲突，人民要求掌握文化及平等社会地位的强烈呼声，都没有在这些诗篇中得到反映;诗人们花费大量笔墨着力描绘的,是达官贵人闲适的生活和安逸的情致。1266 年，继意大利南方培奈万托一战之后，腓特列二世的后裔败于法国人之手。尔后，日耳曼民族在意大利半岛

上的地位每况愈下，昔日的文化中心也随之从西西里转移至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形成了以圭托内为首的托斯卡纳典雅诗流派，但是那里的爱情诗在内容、形式和文字等方面仍保留了腓特列二世宫廷诗歌的格调。

四、托斯卡纳典雅诗派

1254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之子曼弗雷迪被选为西西里国王。教皇亚历山大四世两次把他逐出教门，并于 1255 年另立英格兰的亨利三世之子埃德蒙为西西里国王。后曼弗雷迪率兵击退教皇的军队,于 1258 年 8 月在巴勒莫加冕。但新教皇乌尔班四世却把西西里王国的王位给予安茹的查理。 1266 年在意大利南方贝内文托一战中，曼弗雷迪兵败身亡。另则， 1282 年西西里爆发晚祷起义，导致法国与阿拉贡之间争夺西西里王国长达 20 余年的争斗,1302 年之后岛上开始了长期的西班牙统治。西西里王国失去了在意大利及整个欧洲的政治主导地位以后，意大利的文化中心也随之从西西里转移到意大利中部的托斯卡纳地区，逐渐形成了风格典雅的艺术诗流派,在内容、形式及语言方面秉承了西西里诗派和普罗旺斯抒情诗的传统，并在托斯卡纳各城市迅速传播开去。托斯卡纳典雅诗派的创始人是圭托内 · 达 · 阿雷佐(Guittone d’Arezzo,1235—1294) ,故也被称为‘ 圭托内诗派 ”。

西西里诗派抒情诗在托斯卡纳地区风行之际，圭托内为该诗派的核心人物。他曾尝试混合采用地方方言、拉丁语和普罗旺斯语,而不采用西西里诗派用的华丽词藻及刻意雕琢的笔法,精心写成形式复杂的爱情诗。除了爱情诗以外，他在宗教诗方面同样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260 年佛罗伦萨归尔甫派在蒙塔佩尔蒂失败后,他曾写有遐迩闻名的《啊 苦难何时终结》(Ahi lasso,or è stagion de doler tanto) 一诗。他还创作了一种用口语写的民歌体宗教颂诗。这些颂扬上帝的诗篇成了普遍采用的形式，尤其在世俗

社会集团中颇受欢迎。除外，他的 41 封书简属于意大利书简体中最早的文献之一。新诗派诗人追求艰深晦涩的词句和奇特怪谲的韵律，刻意描摹城邦社会的生活画面，反映市民阶层中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心声；他们给爱情诗涂上一层浓重的宗教色彩，诗句中颂扬的女子已不再是“凡间端庄典雅的淑女”，而是“上帝派往尘世的、具有高尚思想情操的天使”。正因为如此，他们这种对爱的诠释后成为“柔美新诗体”爱情诗的灵魂。

但丁在《俗语论》一文中严厉地批评圭托内诗派作品中夹杂着的市民阶层的粗俗声音，并指责它们损害了艺术抒情诗优美、高雅的风格。尽管如此，托斯卡纳派诗人还是在西西里艺术诗和柔美新诗体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推广和传播托斯卡纳方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五、柔美新诗体

继西西里和托斯卡纳艺术诗流派之后，柔美新诗体渐渐赢得较高的声誉，从而成为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二个重要的里程碑。 13 世纪末和 14 世纪初，在波伦亚和佛罗伦萨两地形成的这一诗体新颖的抒情诗渐露峥嵘,并因但丁在《神曲》“炼狱篇”第 24 首中的一个定义而得名“柔美新诗体”。但丁曾称新诗体的创始人、波伦亚诗人圭多·圭尼泽利为“我的导师”，并高度赞扬他的爱情诗优美、秀丽的文辞。除他以外,另有一些佛罗伦萨诗人摹仿新诗体独特的风格从事诗歌创作，他们每每在诗中提及好友的名字。这些自命清高、自称‘与世无争’的年轻诗人相互间感情甚笃,他们积极组织诗社,抒发共同的艺术观点和政治理想。除圭尼泽利以外,该诗歌流派的代表诗人还有圭多·卡瓦尔坎蒂和契诺·达·比斯陶亚。

这类抒情诗的主题不外乎颂扬男女之间的爱情，但是诗人独辟蹊径,把对异性的爱慕之情极力精神化,从而打破了法国普罗旺

斯和西西里抒情诗的陈旧框子,以焕然一新的笔路,创造出新颖的赋诗法。在作品中，男子对女子的仰慕和思念不再是单纯在感情上对异性的追求，诗句中也没有缠绵悱恻之类俗套的内容。爱情成了超然物外和神化了的高尚情操；尤其是圭尼泽利和但丁等人把爱情同宗教信仰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把它描绘成精神恋爱的结晶。圭尼泽利曾虚构过一段饶有趣味、含意深沉的对话:诗人去世后,天主责备他在尘世将全部的爱倾注在一个凡间女子身上,而诗人则认为此种责难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所眷恋的女子正是天使的化身。但丁也指出，他迷恋的女子是从天堂神奇般地降临尘寰的上帝的使者,是她拯救了他负疚的灵魂,使他成为神魂超拔、纯洁无瑕的人。简而言之，诗人心目中的女子无异于基督教徒心目中圣母的形象。但丁和卡瓦尔坎蒂的天才使这个诗派达到全盛。但丁曾指出，他是有意识地选择温柔的和带有音乐感的语言来写爱情诗的:他在《新生》中所穿插的献给贝雅特丽齐的优美的抒情诗，充分证明了他卓越的天赋和不同凡响的成就，他笔下的贝雅特丽齐不仅有天使般的容貌，而且成了他遨游天堂时的带路人。

圭尼泽利(Guido Guinizzelli，1240—1276)一生坎坷,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本人诗歌的温柔风格，而其生动形象的语言和清新感人的诗句所传播的则是一种新的爱情理论，其代表作是他的短歌《爱情藏在他温柔的心里》(Al cor gentil rempaira sempre amore)。同其他柔美新诗体的诗人一样，圭尼泽利也认为：女子的高尚和尊贵与其血统无关,它来自她的心灵;人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品质和文化修养,才能达到精神的完美。应该说,在当时以出身论尊贵的封建社会里，这种态度无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他的诗歌质朴清丽,富有音乐节奏感,下面选译的他的一首十四行诗便是明显之一例：

我真诚地赞美我心中的女神，

她是晶莹的玉簪，娇艳的玫瑰；
她宛如璀璨的星斗，
能与天上的众神相媲美。
她是微薰的和风，翠绿的堤岸，
我欲将五彩缤纷的花卉，
连同奇珍异宝一起向她奉献，
她使爱情更加纯洁高贵。

在她面前，矜夸者无地自容，
因为她端庄典雅，淑静温存，
你若不信，我们可以作证；
在她身旁，卑鄙者无法靠近，
因为她神力无比，
凡见过她的人，恶念顿时消失殆尽。

卡瓦尔坎蒂(Guido Cavalcanti，1255—1300)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阔绰的教皇派家庭。这位但丁的至诚好友生性怪僻，酷爱诗文，积极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在他留下的约 50 首诗歌中，大部分是献给两位女性的：一位是诗人于 1292 年在法国图卢兹遇到的芒黛塔，一位是诗人称之为“春天”的乔万娜。他在抒情诗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赞美她们高尚的情操和感人的美德。应该说，造成极大痛苦的爱情是他诗歌的常用主题，较著名的抒情诗是《因为我希望再也不会回去》(Perch' i' no spero di tornar)。另外，卡瓦尔坎蒂还写过一首名闻遐迩的抒情诗，从理论上对男女之间的爱情作了精辟、完整的分析，它包括爱情的实质、爱情的起源、心灵的本能、爱情的作用、爱情的力量和理性等方面的内容。这首诗为我们深刻领悟柔美抒情诗提供了一把宝贵的钥匙。尽管诗人依然沿袭精神恋爱诗的创作格调，但他的诗同圭尼泽利的抒情诗在诗意

上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 他着意刻画爱情在情侣的眸子、心灵和精神上的流露，以拟人化的艺术手法细腻地描写爱情给人带来的怅惘和内心的极度不安。透过他那反映爱情给人造成精神和肉体痛苦的诗句，我们似乎看到了诗人欲冲破天主教神秘主义的束缚而不能自己的内心世界。卡瓦尔坎蒂才华出众，文学修养与哲学修养均颇深湛。许多评论家认为他是但丁之前意大利最优秀的诗人。他的诗歌多以爱情与死亡为主题,委婉流畅,质朴动人,深受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者们的推崇。下面选译的是他的诗作《灿如云锦的玫瑰》中的最后一节：

上帝赋予你
光艳照人的容颜，
使你成为皇后般的天仙。
莫让你的脸庞
让我感到如此疏远；
也别让你一泓清水般善良的心
将我挫伤。
即使你认为
我对你真诚的爱过于荒唐，
也别让我看到你责备的目光，
是爱赋予我一往无前的勇气，
任何力量和克制，都无法阻挡。

契诺·达·比斯陶亚(Cino da Pistoia，1270—1336)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在波伦亚大学攻读法律,著有被高度赞扬的拉丁文评论《法典诠释》(Lectura in Codicem)。1334年他返回比斯陶亚,并在那里度过余生。他是最多产的柔美新诗体诗人之一，他的诗篇虽然在内容和情感方面深度不够，但格律优美，曾受到但丁的赞赏，

对彼特拉克也有很大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彼特拉克称契诺是他的老师,并写诗哀悼他的逝世。

柔美新诗体的抒情诗表达了当时城邦社会贵族文人的心声，他们因政治上不得志而喟叹，试图沉醉于对理想情人神化的描写之中,以此忘却内心的怅惘。显然,诗意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且主题单调,寓意奥赜深邃。就文辞言,柔美新诗体派的诗人刻意求工,追求繁丽的词藻、优美的韵律和不同凡响的笔调,以示自己超人的天赋和高雅的情操。尽管如此，作为诗歌创作的一个流派，柔美新诗体在意大利诗歌文学的发展史上仍起过重要的作用，并为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形成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他们吸收了前人语言的精华,在佛罗伦萨语的基础上,创造出新颖的文学语言,后成为不少诗人效仿的典范。在意大利文坛上，从彼特拉克到薄伽丘等文学鸿儒,乃至 14、15 世纪出类拔萃的诗人罗棱佐·美第奇和波利齐亚诺，都曾模仿过这种以精神恋爱为主题的新颖赋诗法。但丁的早期抒情诗集《新生》则将柔美新诗体更朝前推进了一步，使诗歌的颤音更富有艺术生命力。

六、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

在 13 世纪意大利文学史上，值得在此一提的还有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和他的《游记》（Il milione）。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诞生在威尼斯一个商人之家。约于 1271 年,他随其父亲尼科络和叔父马特奥来中东和远东，1275 年至上都,赢得当时我国元世祖忽必烈的信赖，担任过重要官职，仕元 17 年,游历几遍中国。1295 年他回到阔别 24 个春秋的家乡，在威尼斯同热那亚的交战中不幸被俘入狱。在关押期间，他对同牢的比萨语法家鲁思梯慊讲述他在东方 20 余年的历险生活和所见所闻，后由鲁思梯慊用法国北方方言笔录成书。《游记》盛道东方之富庶、文物之昌明，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东方神秘国土中的政治、经济、社会

风貌和风土人情，描绘作者当初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帕米尔来东方途中的种种艰难险阻。原法文版的书名为《世间奇闻录》，遗憾的是原稿早已失传，现存的只有拉丁语和意大利语的译本，其中意大利语版的《马可 · 波罗游记》早在 1309 年之前就流传甚广。这本散文体的游记有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文学作品，更可贵的是，它为我们研究中世纪东方的文明史和 13 世纪末叶意大利商人的思想情操提供了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书中有关东方国家经济情况的描述引起了西方世界强烈的兴趣，因为它打破了中世纪长期形成的陈旧观念，第一次以一个商人的思维逻辑描绘耳闻目睹的一切，从政治到经济，从纸钱到煤坑，从奇异的景色到传统的习俗,意象新颖,文笔奇崛,不愧为 13 世纪意大利散文体文学的扛鼎之作。《马可 · 波罗游记》问世后,很快被人们争相传诵，成为脍炙人口的一部文学著作，它对 13 世纪之后新航路的开辟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三章　　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文学

1096—1291 年间，西欧封建主、意大利商人和罗马天主教会,打着从穆斯林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的旗号,对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先后发动了 8 次侵略性远征。东侵的参加者目的各异：西欧封建主和骑士想要掠夺新的领地和农奴；意大利商人力图控制东部地中海的商业；罗马教皇则盘算合并东正教，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和财源；许多无以为生的农民受教会和封建主的欺骗宣传，最初也参加了十字军，幻想到东方去寻找乐土。十字军东侵最后以失败告终，它给东部地中海沿岸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使西欧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牺牲。然而，十字军复苏了欧洲在 11 世纪初进行的旨在加强东西方联系的活动，促进了东西方各种形式的交往。对意大利而言，十字军东侵给其一些滨海共和国带来了经济发展的契机，他们在叙利亚地区各基督一拉丁国家建立了重要的殖民地，并拥有巨大的特权。为此，11 世纪全面复苏的经济,到了 12 世纪因十字军东侵而突飞猛进。

意大利滨海城市贸易活动的不断繁荣不仅具有政治影响，而且还有利于城邦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积累。总的来说，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发展，北部地区要早于中部地区。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去世(1197 年）到腓特列二世取得最后胜利的 20 年,是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城市国家摆脱帝国统治的 20 年,也是城市国家对外扩张和内部变革极其重要的 20 年。欣欣向荣的意大利城市国家不仅带来了经济的昌盛，而且也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人们以新的热情学习古典文化,重新评价自然和人类的关系,艺术创作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由于借鉴了新颖的罗马艺术，建筑风

格有了很大的改观，城市面貌焕然一新，罗马艺术在 12 世纪进入其辉煌灿烂的时期。虽然城市国家的新生活在文学上的反映不如在艺术上那样成绩斐然，但在 11、12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已不再局限于记载圣徒传奇故事或进行神学辩论，而开始描述当时的大事，尤其是新生城市国家的最初功绩。到了 12 世纪下半叶,文学创作开始进入全面发展阶段。另外， 11 世纪末罗马法研究得到了不少国家的支持，研究热潮的形成代表了世俗精神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第一节　文艺复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紧随着帝权的结束而发生的教廷危机，导致公元 1309 年罗马教廷迁往法国阿维尼翁，直至 1377 年才迁回意大利。在这同时，意大利北部及中部的自由城邦加强了独立，波河河谷以及托斯卡纳大部分城镇的经济都有了显著发展。滨海城市(威尼斯、热那亚等)继续控制着香料及其他东方产品的贸易,诸如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内陆城邦的工商业活动(尤指毛纺及染色业)欣欣向荣,促进了资本积累及金融活动的发展。托斯卡纳、伦巴第、威尼斯以及罗马的银行家,都为欧洲君主和教廷的军事活动提供财政支持,从而增加了他们自己的特权和政治影响。

新兴的城市中产阶级对军事活动不感兴趣，他们不得不寻求强大的封建家族的保护和支持。这些封建家族不久以人民的名义获得了原先城邦的统治权，他们的权力范围往往大大超越原来的城镇及其周边地区，遍及更为广阔的领域。从原来的自由城邦转变为新的封建公国的过程，标志着早期的城邦已过渡到了真正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力量,随着其经济实力的扩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在 14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封建领主中，最有雄心的要数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这个家族的创始人基安 · 加莱加佐执行野心勃勃的扩张政策,把领土扩展到波河河谷的大部分地区,直至

热那亚、翁布里亚和托斯卡纳，然而当推进到教皇领地和佛罗伦萨时，却遭遇到了坚决的抵抗。与此同时，已经征服其他威尼托领地的威尼斯共和国，又占领了布雷西亚和贝尔加莫等地，然后推进到阿达河畔。这时，佛罗伦萨共和国已经日薄西山，1378 年爆发梳毛工起义，1434 年美第奇家族夺取了政权。数年后，西西里国王阿方索·达阿贡纳夺取了那不勒斯王位，而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则被斯福查家族取代。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由于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以及土耳其人的威胁，1454 年 4 月 9 日威尼斯被迫和米兰斯福查家族签订洛迪和约。按照和约，斯福查家族获得米兰的政治权，而威尼斯则重新收回贝尔加莫和布雷西亚。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强大的意大利城邦议定，组成“意大利联盟”以确保至少半岛上 40 年的和平稳定。在洛迪和约签订后的 40 年中，摆脱了外国统治的意大利，从国家形式上看，似乎已达到了相当发达的程度，最后还形成了五大强国。这五强决定着半岛的命运，它们之间的均势似乎使意大利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然而，深入一步看，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

在经济方面，15 世纪的意大利并不像前几个世纪那样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因为其他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意大利的经济仍然是繁荣的，别的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身又促进了意大利的贸易，尤其与法国、西班牙、德国的贸易空前繁荣。如果说 15 世纪的意大利工业出现了一些衰退的迹象，那么农业却蒸蒸日上。工业上积累的或不再使用的大量资金转移到了农业上，加上大量伐林造田，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工程，广泛种植牧草和经济作物，农业出现异常繁荣期，这无疑为文艺复兴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

1454 年米兰斯福查家族和威尼斯签订洛迪和约后，出现了一

段短暂的平稳时期。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里，斯福查家族夺取了热那亚；斯福查和美第奇等原先基础较为稳固的领主也由于积极推行任人唯亲政策的教廷的挑拨而变得四分五裂；那不勒斯王国发生叛乱。这种种迹象显示，意大利城邦虽然具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却因封建主义的分裂而缺乏建立稳定的政治和行政构架的能力。

在 15 世纪，欧洲的探险热情日益高涨，新的土地相继发现。其实，早在哥伦布在世之日，就有一大批土地被发现：西班牙人胡安·德拉科萨和意大利人阿梅里戈·韦斯普奇于 1499 年确认了委内瑞拉海岸；西班牙人华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通过达里安湾到达太平洋海岸。但是，推动发现新大陆航行的动力并非完全出自科学上的求知欲，而是西欧人感到有必要寻求一条直接通往印度洋的新航道，以最终摆脱意大利人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新大陆发现后，随之而来的是殖民地的开拓。西班牙虽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从中极大地增强自己的实力，但还是建立起庞大的殖民统治。葡萄牙人以极大的热情去发现新土地，扩大占领地，在这方面它比西班牙动手早，并不断地与西班牙为敌。英国和法国也不甘示弱，紧紧跟上。地域的伟大发现，不仅使世界摆脱了中世纪观念的束缚，加速了精神的解放，而且还引发了一场真正的经济革命。遥远的东方的产品通过海路源源不断涌入，欧洲的贸易中心不再是地中海国家，而是大西洋沿岸国家。这些国家从征服地攫取来的贵重金属使欧洲货币充足，资金大量积累，地产贬值。以土地为财富的封建贵族的势力进一步削弱，从而导致了以这个阶级为主体的国家日益衰落。曾几何时，意大利垄断着几乎整个地中海上的贸易，而随着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向大西洋的转移，意大利在经济上遭受了沉重的打击。由于航运探险，特别是美洲的发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和法国等国都显著扩大了它们的经济势力，这一形势标志着意大利经济走向衰弱的开始。

16 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已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

家逐渐形成，而以教皇为首的罗马天主教会竭力维护旧的封建秩序，阻碍社会的进步，因而成为矛盾的焦点。另外，神职人员道德上的颓废加速了宗教的衰败，这无形中为改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517 年，马丁·路德揭开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运动很快席卷德国大部，并得到了帝国的许多国家的支持和热烈响应。事实上，到了 16 世纪上半叶，几乎所有欧洲国家，有的经过新教革命完全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有的则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它们一方面承认罗马教廷的权威，另一方面又牢固地扎根在本民族的国土上并受本国君主的统治。为了消除马丁·路德领导的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影响，教皇保罗五世被迫召开特兰托大公会议，组织天主教会对付宗教改革运动。马丁·路德在 1521 年被罗马教廷宣布为异端并逐出教会，但由他发起的改革声势有增无减，在很大的程度上动摇了意大利在欧洲精神世界的领导地位。

由于上述的几个原因，当时的欧洲强国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扩张势力时就没遇到太大的阻力。为争夺意大利，1494—1559 年间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发生战争，同时伴有其他西欧国家对意大利政治的干涉和意大利内部各小国之间的纷争。战争使意大利蒙受巨大的损失。为结束意大利战争，1559 年 4 月在卡托·堪布累齐签订和约，由法国分别与英国和西班牙签订了两个和约。依约，法国放弃了在意大利所侵占的大部领土，西班牙则占领了意大利领土的大部，和约表明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已被西班牙所取代。意大利不再是创造欧洲历史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那些依旧保持独立的国家，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上，其作用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发生在 15 世纪下半叶和 16 世纪上半叶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所导致的后果，包括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影响，不久就逐渐显露出来。虽然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文化，仍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继续影响欧洲其他国家，可是意大利在现代欧洲文化、科学和政治运

动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欧洲各国，至少是各日耳曼国家，都由于基督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日益开放的思想而获益匪浅。

文艺复兴的结束和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使意大利文化失去了在欧洲长达两个世纪的统治地位。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欧诸国，在文艺复兴文明耕耘的新文化的推动下，得以在肥沃的民族土壤上自由地、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反过来强有力地影响着意大利文化。在这一方面，科学上的影响要比文学艺术更迅速、更全面。在自然科学方面，直至 17 世纪初叶，意大利还保持着重要地位，可是在整个世纪内，意大利昔日的优势已让位给了外国。在文学方面，意大利的文学作品越来越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作者更无法同法国、西班牙和英国遐迩闻名的伟大作家相媲美。在艺术领域，人们对意大利新一代的艺术家逐渐失去兴趣，当时在欧洲声誉卓著的意大利画家和雕刻家寥若晨星，惟独巴罗克建筑风格依然风靡欧洲。

我们通常称作的‘文艺复兴’，是指 14 至 16 世纪在欧洲许多国家先后发生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运动。该词源于法文 renaitre，原意为‘再生’，后意大利艺术史家乔尔乔 · 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 年）在其《绘画、雕刻、建筑名人传》（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scultori e architetti）中，始用‘再生’一词来概括这个时期文化活动的特征。 16 世纪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基本上承袭此概念，认为文艺在希腊罗马的古典时期曾高度繁荣，而到中世纪却衰败湮灭，直到此时才获‘再生’与‘复兴’。但此时的文化并非古典文化的简单恢复，而是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反封建斗争的反映，所以这一名称并没有把这个时代的特征充分地表达出来。

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是意大利，后扩大至德、法、英、西、尼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在 14 世纪，意大利北部城邦中富裕的商人、手工业工场主、银行家逐渐成为新兴的统治阶级。这个新兴阶级需

要文学艺术丰富精神生活，反映政治理想，也需要科学技术增加自己的财富。在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和人文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意大利的文学艺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文主义就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思潮，它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思想，为文艺复兴的到来吹起了响遏行云的号角。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指的是从 1492 年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 · 美第奇逝世,至 1529 年堪布累齐和约确立西班牙在意大利统治地位前后的数十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中，意大利文艺、科学领域内涌现出一批诸如马基雅维利、阿里奥斯托、米开朗琪罗、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等出类拔萃的俊杰。与此同时，15 世纪上半叶欧洲的政治均衡局势已如大江东流之水一去再不复返，意大利随之沦为现代列强法国和西班牙争权夺利的战场。连绵的战争使意大利的政治、经济、文化蒙受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另外，哥伦布在地理上的重大发现和马丁 · 路德改革天主教会的倡议，也对意大利的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了 16 世纪，西班牙已控制了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不少城邦已转变为由专制暴君统治的封建式公国，半岛上的经济和商业呈现出一派凋零的景象。尽管如此，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以旺盛的生命力和璀璨的艺术光泽在意大利诞生了,在文学艺术的百花园中,诗歌、绘画、雕刻、建筑和音乐等方面人才辈出，成就尤为突出。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中，作家的创作热情变得更加饱满，他们热爱生活，渴望自由，要求了解和反映现实。其中，不少人抛弃了中古时期梦幻文学的象征手法，开始注重写实，从而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学奠定了基础。诚然，连绵的战争、外族的入侵、每况愈下的经济，以及罗马天主教廷威望的衰落，不可能不在文学艺术家们的作品中留下深深的烙印。

同人文主义者相仿，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也将古籍视作复兴现代文化的光辉典范，但他们更注重艺术上的再创造，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形式上的模仿。他们颂扬美德，认为它是人的本能与理性

的统一体，是检验一个人品行道德的准绳。他们更重视人的尊严和自由意志，把人的理性和创造力置于一切事物之上。他们向往恬静的田园生活,试图以此逃避充满各种矛盾的现实生活,忘却内心的纷扰。他们在作品中颂扬人生昙花一现的欢乐，栖身于遐想中海市蜃楼的美丽梦境之中，流露出怊怅、迷惘的消极情绪。16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条件给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制造了种种不利的因素,尽管如此,外国侵略者在进入意大利半岛之后无不为那里璀璨夺目的文学艺术而惊叹不已。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在佛罗伦萨、罗马、乌尔宾诺、费拉拉、曼图瓦、那不勒斯等文化重镇,各贵族世家的宫廷依然是文化生活的中心,保护文艺的政策使那里贤达荟萃,科学文化领域呈现出一派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但文人依旧是寄人篱下的侍臣,无法成为自食其力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领域内花团锦簇盛景的出现,有赖于中国发明的印刷技术在西欧的迅速推广,文艺作品读者的人数在短短的几十年中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以前，为抄写一部古籍，一些专以抄写为业的人得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不久,各地纷纷建立起小型出版社,书籍的迅速流传大大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有一位出版商，仅他一人就在数年内将彼特拉克的《歌集》重印了 22 次,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重印了 30 次，这在文艺复兴之前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以人文主义思潮为主流，它以深刻的思想内容、高度的艺术概括、自由的结构、包罗万象的人物、生动有力的语言,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表达了新兴阶级的理想和广大民众的愿望,推动了欧洲文学的发展,对人类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囿于历史条件,在 14、15 世纪，建立一个统一的意大利仍然是乌托邦式的美丽幻想。在整个亚平宁半岛上，数十个大小不一的城邦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的局面，各自称霸一方，严重阻碍了各

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倘若我们翻开 14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的地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南方的那不勒斯由法国安茹王朝统治，西西里和撒丁岛则是西班牙阿拉贡王朝的势力范围；中部地区除了教皇国(其疆域从罗马一直延伸至翁布利亚、马尔凯和罗马涅地区)以外，其余是佛罗伦萨、西埃纳、比萨共和国的地盘；北部地区的列强除了热那亚、威尼斯共和国之外，还有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萨伏依公爵、曼图瓦的贡萨加家族、维罗纳的斯卡利杰利家族、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和帕多瓦的卡拉雷西家族等各自为政的封建公国。应该说，14 世纪以后处于分裂状态的、迷宫似的意大利，宛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镶嵌画。

实际上，我们通常称作的‘文艺复兴’，一般指的是发生在罗马以北广大地区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在南方以及半岛上的其他地区，文艺复兴清新的和风似乎并没有在那里吹拂过。因此，如果不了解意大利 14、15 世纪政治上的分裂局面，也就不可能真正懂得文艺复兴在意大利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13 世纪中叶，是意大利通俗文学的全盛时期，并迅速赶上了法国北部和南部的文学，以至于名列中世纪欧洲文化的前茅。当时的意大利文化，尽管大部分具有中世纪时期的文化特征，但就其内容而言，都具有明显的非宗教性质，被公认是古代世界结束以来第一批非宗教文化。13、14 世纪的意大利之所以能站在文艺复兴的前列，除了上面讲述的原因以外，还得归功于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位佛罗伦萨的文化鸿儒，以及以彼特拉克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的再度繁荣。但丁用具有无限魅力的诗篇改变了政治、宗教、神学以及历史的面貌，诗句中充满了对和平的热切渴望，对正义的满腔热忱，以及对拯救意大利和人类的坚强信念。彼特拉克广泛搜集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并从中发现了一种不以神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首先提出‘人学’与神学的对立，在其作品中揭示了近代早期的思想与中世纪思想的矛盾。薄伽丘则通过对日常现实生活

的仔细观察，塑造出一群栩栩如生的人物，创立了一种仿效古典风格的意大利散文，辛辣地嘲讽天主教士的虚伪和荒淫，斥责贵族的贪暴，宣扬人文主义世界观。作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主要思想，人文主义反对宗教教义和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正是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三位佛罗伦萨的文化巨匠，为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奏响了序曲，使人文主义运动于 14 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兴起，并在 15、16 世纪传播至欧洲各国。

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同属意大利城邦时代的三位伟大文学大师，他们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城邦兴旺的社会特征，从而为意大利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神曲》、《歌集》和《十日谈》无疑是这三位人文主义先驱长年焚膏继晷的结晶，充分反映出他们超人的文学天赋。但值得指出的是，他们所处的充满激烈政治斗争的城邦时代，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浩如烟海的史料和极为丰富的素材。但丁坎坷的一生及其文学著作就是明显的例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中古梦幻文学式长诗《神曲》难道不正是 13 世纪佛罗伦萨共和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生活浩繁的画卷吗？

第二节　但丁和他的《神曲》

一、生平

但丁(Dante Alghieri，1265—1321）是意大利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最伟大的诗人，也是世界文学大师之一。他诞生在佛罗伦萨教皇派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年轻时，他专心攻读诗文，曾在佛罗伦萨著名作家布鲁奈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门下学习修辞学，并同柔美新诗体的代表诗人卡瓦尔坎蒂和契诺等人友情甚笃。1295 年，因其父亲之愿，他同一个名叫杰玛的女子

结为夫妇，并生有三个孩子。据诗人自己的回忆，他在 1274 年和贝雅特丽齐邂逅相遇，因一见钟情而缠绵悱恻，并且终身虔诚地怀念着她，并把她当作完美的品德、崇高的精神和理想的化身，后又成为他多部文学名作的创作灵感和素材。据有关史料记载，贝雅特丽齐的真实姓名为贝齐，嫁于银行家希蒙尼为妻，1290 年病殁。但丁采用柔美抒情诗的风格将他对贝雅特丽齐炽烈、诚挚的爱倾注在抒情诗集《新生》中，尽管诗中叙述的内容与事实有较大的出入，但她猝然病故的噩耗确实使诗人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促使他抛弃世俗的浮华，赋予他奋发向上的动力。

但丁颠沛流离的一生是同佛罗伦萨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始终紧密地连在一起的。13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教皇派分裂成互相抗衡的两大党：一方是以契尔基家族为首的“白党”,成员中以暴发户为主，他们不愿意接受教皇的予取予求，一心要保持他们的独立和自由 另一方是以多那迪家族为代表的“黑党”,成员中以破落户为主，他们想借助教皇的势力复兴他们的家产，对教皇采取妥协态度。起初，但丁执意不介入这场是非之争，但他极力主张佛罗伦萨的独立和自由，反对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凌驾世俗王权之上的矜夸态度。1301 年 10 月，卜尼法斯八世派人前往佛罗伦萨调停党派争端,但实质上他企图借此机会挫败“白党”的力量,这迫使但丁同“白党”站在一条阵线上。当时，但丁是佛罗伦萨共和国六个执行委员之一,但“黑党”倚仗教皇的势力狐假虎威,为所欲为,对“白党”及其他政治上的劲敌开始进行残忍的镇压，居然给但丁加上“诈骗”和“反教皇”的莫须有罪名，并将他判以放逐两年的徒刑。诗人无视毫无根据的诬告，拒不回佛罗伦萨受审。翌年 3 月,他们没收但丁的家产，开除他的公职，并将他判处火刑。被迫在外流亡的头几年中，诗人曾串连其他政治流亡者，致力于重返家园的活动。但不久，他发现这些所谓的志同道合者都是些软弱无能之辈，只得暂且放弃返回佛罗伦萨的念头，再入诗歌之园，期待未来正义

的钟声。深切的思乡之情和寄人篱下的悲郁始终啮啃着诗人那颗破碎的心。然而，在外漂泊流亡的岁月正是但丁卓有成效、奋笔疾书的几年。其间，除《神曲》外，他还撰著了《帝制论》和《俗语论》，以隽永的笔触，平铺直叙的文体提出反对教皇干预政治、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的主张，论述统一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观点。

1308 年，亨利七世被选为皇帝，但丁久闻亨利的公正贤明，心中又一次燃起重归佛罗伦萨的希望之火。他一方面投书意大利各诸侯，规劝他们停止互相残杀；另一方面又亲自联合一班流亡者，要求亨利七世伸张正义，让他们得以返回日夜思念的家乡。可是，亨利七世于 1313 年一命呜呼，但丁的满腔热忱和美好的希望也随之化为灰烬。诗人悲伤失意，忧心忡忡，唯一的精神安慰就是读书、作诗，他先后在万洛纳和腊万纳为《神曲》的定稿终日操劳。其间，他谢绝了赴波伦亚任教的诚意敦聘，对“加冕诗人”的桂冠嗤之以鼻，唯独返回佛罗伦萨的夙愿至死不渝。 1321 年 9 月 13 至 14 日之间，这颗世界文坛上的巨星陨落了。

二、主要作品

1. 《新生》(La vita nuova)

《新生》是但丁一生写的第一部诗文合璧的诗集，汇集了从 1283 年前至大约 1292—1293 年间但丁的诗作。这部被但丁称为“小书”的杰作共 42 章，每章都很简短，并附有对 25 首十四行诗、1 首民谣和 4 首抒情诗的评注 第 5 首抒情诗因贝雅特丽齐的去世而戏剧性地中断了。据史料记载，贝雅特丽齐于 1290 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丁大约在 1292 至 1293 年间把赞美、悼念她的诗篇重新加以整理，以散文体为楔子贯穿其中，编成一本抒情诗集，并附以记事和注解，抒发对所爱女子的一片赤诚的爱慕之心。下面所译的一首歌咏贝雅特丽齐的十四行诗选自《新生》：

她向人致意时
是多么的温存，多么的谦顺，
谁也没有勇气举目凝望她
舌头颤栗却默不作声。
衣着淡雅的她走过时
耳畔闻听一片赞美之词，
来凡间展示上帝创造的奇迹，
她好似来自天国的女神。

她的眼神，充满柔情蜜意，
见过她的人
都说她是美丽和温馨的化身。
她嚅动着嘴唇仿佛在说，
“叹息吧,为了爱”,
她是爱情的象征。

今天我们在阅读但丁的早期作品《新生》时,仅仅在诗句中寻觅作者初恋时感情上微妙的变化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剖析诗人的这部处女作：他同卡瓦尔坎蒂之间的深厚友谊及其对他的影响;作者对柔美新诗体的热爱和赞扬;贝雅特丽齐在诗人情感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潜入作品意境的纵深处,对由梦幻、寓意、象征交织在一起的艺术风格,以及作者通过理想化的“圣母”形象表达他对哲学、道德热烈追求的内在涵义,有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了解。

同卡瓦尔坎蒂一样,但丁也认为,对一个诗人来说,不管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诗歌绝不是一出戏剧或一件装饰品,也不是炫鬻个人才华的文学形式。在他看来，诗人必须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深入了解问题的内在实质，否则他就不可能在诗句中流畅地表达当代

人的心声。倘若我们想认真探讨《新生》的历史意义和文学价值，我们就不能光是陶醉在其优美感人的意境和流畅、华丽的文采之中，因为更为重要的是但丁在文学创作上反对规行矩步的大胆尝试、他的一丝不苟的写作态度，以及他在语言上力求创新的可贵精神。但丁通过由十四行组诗和散文楔子组成的抒情诗，倾诉对贝雅特丽齐超逸的赤诚之爱，继承并发展了柔美新诗体创始人圭尼泽利的赋诗法。在但丁的妙笔之下，贝雅特丽齐成为诗人走向理想境界途中思想和精神上的指路人，是温存和美德的化身，是天主派往凡间拯救他灵魂的天使。

《新生》是但丁的一部重要文学作品，但它在思想内容方面没有涉及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诗句中蕴含着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艺术上也欠成熟。尽管如此，《新生》仍然是今天意大利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资料，它记载了但丁年轻时代的文学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作者将世俗爱情和他对天主虔诚的爱戴和谐地交织在一起的创作思想。在诗集中，作者叙述自己在九岁(诚然，“九”只是个富有象征性和神奇色彩的数字，是“天主三圣体”给作者的启迪)那年初次邂逅贝雅特丽齐的情景，以及九年后诗人又一次同她相遇并对她产生爱慕之意的心情。在诗集的开端，但丁以缱绻的深情描绘对她的思念，但从不提及她的真实姓名，只是通过颂扬其他女子隐晦地表白自己的心怀；在末尾部分，作者采用柔美新诗体精神恋爱的赋诗法，将贝雅特丽齐描摹成一个天使般的女子，诗人对她的爱慕也随之升华为精神世界的精炼和灵魂的超拔。贝雅特丽齐病逝的噩耗使但丁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他终日缠绵徘恻，踽踽独行，思想感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诗人因陷入精神危机而感到前途渺茫的时刻，又是她在天堂给他指明了出路，她的话语犹如一股暖流汩汩流入诗人干涸的心田，他决意辍笔，直至能恰如其分地描写她高尚的节操和无以伦比的美德。贝雅特丽齐在冥冥之中不时追随其左右，激励他兑现少年时对她许下的诺言，即建树起一

座丰碑(指他的文学作品),以表示对她的悼念。

2.《飨宴》(Il convivio)

这是但丁于1304至1307年间用通俗语撰著的一部学理作品，取材于作者本人在外流亡前后的生活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当时的痛苦、愤慨和忧伤。从时间上推算,《飨宴》很可能是继《新生》之后的第一部作品,其主题思想和《新生》迥然不同,涉及的内容亦相当广泛。按他原先的计划，全书分成十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其他十四部分均包括一首充满象征和比喻的诗歌和一段评论。遗憾的是，作者仅仅完成了四个部分的写作，就当时人们关注的文化艺术问题论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文学著作的四个含意(字义、寓意、奥赜的神意、道德观念),知识的实质和‘贵族’的定义等。书中盛赞通俗语的优点，抨击封建等级观念，带有明显的“人贵于品行’的人文主义思想。

但丁写《飨宴》很可能有其一定的实用意图：当时他漂泊异乡，欲以此向收留他的贵族达官表明自己渊博的学识，以及在文学艺术方面不同凡响的造诣。但丁通过这一部哲学著作，昭示人们向博学者的筵席靠拢，字里行间隐含着作者欲用智慧和博学重新扣开佛罗伦萨大门的炽烈愿望，表达了作者“游子回乡”的迫切心情和洗刷不白之冤的强烈愿望。

但丁之所以运用通俗语撰著这一部具有深奥哲理的学理性著作，是想以此表明，通俗语不仅可以用来描写爱情，而且也可同拉丁语一样论述哲学思想，从这一点来说，《飨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用通俗语写成的第一部学理性文学著作，为意大利的学术性散文体创作奠定了基础。但丁在《飨宴》的第一部分中，花了许多笔墨阐述通俗语瑕不掩瑜的特征，言简意赅，为维护和提高通俗语的地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城邦社会的新兴贵族阶层并不通晓拉丁语，他们渴望繁荣通俗语文学作品的创

作活动，以满足自己在文化知识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文学作品的读者已不仅仅是昔日为数甚少的教会僧侣和神父，这支队伍正在不断扩大之中，为了普及和推广文化知识，务必进一步确立通俗语的权威，使其成为被广大民众所乐意接受的文学语言。

在《飨宴》中，但丁的政治和哲学思想几乎已完全成熟。在这部著作中，他第一次热烈地捍卫罗马帝国的传统，并直率地指出：帝国直接受命于天，而不受命于教皇；是天命促成了帝国的发展，并帮助帝国谱写历史。另则，但丁还对灵魂回归上帝这一天生愿望的概念作了诠释，认为它需要通过榜样和教义的教育，否则它会被误认为是导向尘世的目的，社会也会被它的毁灭性力量所摧毁。在《飨宴》中，但丁在他的政治思想和他对人类欲望的理解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他认为：倘若教皇贪图尘世的权力，这时就不可能存在能将欲望引向上帝的高尚的精神典范；倘若帝国国势衰弱，就不会存在足以从物质上限制这种欲望的法律。在但丁看来，这就是意大利陷入混乱的原因所在，而正是他这种希望改变现状的想法,促使他开始了写作《神曲》的壮举。

《飨宴》中的素材并非作者凭空臆造，这些素材有的来自古希腊杰出哲学家、科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理；有的来源于中世纪伟大哲学家托马斯的著作及圣经中的绝句；另有一部分则援引自拉丁语作家和阿拉伯评论家们的著作。显然，但丁以他广博的学问和满腔的创作热忱，赋予了《飨宴》以强大的生命力，尤为可贵的是,他对‘ 何谓贵族 ’的精辟分析,使人读后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他认为“: 贵族 ’不是出身门庭高贵的代名词,他是个人高尚的美德同天主宽仁的恩赐相结合的产物；出身卑微的人也可因其渊博的学问、高雅的举止和超逸的情操而成为受人称颂和爱戴的贵族。这一番带有明显人文主义思想色彩的至理名言，在当时的中世纪意大利社会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

3. 《俗语论》(De vulgare eloquentia)和《帝制论》(De Monarchia)

《俗语论》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用拉丁语写成的论述语言问题的专著,为《飨宴》第一篇的姐妹篇,几乎和《飨宴》同时成书。《飨宴》的第一部分，实际上是一篇论述以严肃的诗歌语言为基础的诗歌创作技巧的实用论文。在《飨宴》的最后一段中，但丁预言了俗语的光辉未来":这将是一道新光,一个新太阳,它将在筋疲力尽的太阳落下后升起，并将照亮由于旧太阳没有照亮而一直处于阴影和黑暗中的人们。"但丁描述的革命无非是以教会占主导地位的拉丁文化的没落，以及世俗的、用俗语写作的城市文化的诞生。但丁把自己视作这两种文化之间的一个哲学家、调停者，其使命是帮助教育刚刚获得公民权的广大读者。在《俗语论》中，但丁除了对俗语的赞美外,还以《圣经》为根据,论证了语言的起源,并第一次提出了创造意大利全民族语言的标新立异的主张，认为西西里艺术诗和柔美新诗体派的诗歌语言最近于"优秀俗语"。另则，但丁在《俗语论》中还论述了诗歌的体裁问题,同时指出,通俗语完全可以用来写作题材高尚的文学作品，如爱情、战争和骑士行为等。但丁还以亚平宁山的东西坡为界，系统地对意大利各地的 14 种方言进行分类，认为它们无一能成为有权威的全民族文化和诗歌语言。为此，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理想的民族语言必须集各地方言之大成，而意大利的统一将加快它的形成。《俗语论》开创了研究意大利俗语的先河，为以后意大利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308 年 11 月，卢森堡的亨利伯爵当选为德意志皇帝，翌年 7 月，卜尼法斯的继承人、法国籍教皇克雷芒五世宣布亨利为罗马皇帝，并说亨利将在罗马圣彼得教堂被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丁积极支持帝制，因为亨利七世的登基再次在他的心中燃起返回佛罗伦萨的希望之火，他看到实现他夙愿的日子正在日益临近。但是，后来教皇克雷芒转而反对亨利，这使但丁大失所望。为此，

但丁约在 1313 年左右写下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论战性论文《帝制论》,他在此文中发展了《飨宴》的政治论点。在克雷芒的欺骗行为引起的一片愤怒气氛中，但丁将他论战的锋芒转向教皇，反对教皇坚持其权力应大于政治统治者的立场，即反对帝国的政治权力应来自教皇的论点。在《帝制论》的最后几段中,但丁写道,上帝为人类设计了两个目的：其一是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这种幸福以地上乐园的形式表现出来；另一个目的是享受永恒生命的幸福，它体现在天上乐园的形象中。尽管这是两种不同的目的，但是这两种愿望却并非没有联系。但丁在其《帝制论》的结束语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罗马政府完全不应该服从罗马教廷，因为在某些方面我们追求尘世生活的幸福就是为了得到不朽的幸福”。《帝制论》是一部拉丁语政治理论著作，作品结构严谨，逻辑性强，阐述了作者欲重建帝国和教廷两个最高权力机构之间正确关系的政治理想。然而，囿于当时欧洲的政治形势，但丁的政治主张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4. 《神曲》(La divina commedia)

关于《神曲》写作的具体日期现已无法考证,据薄伽丘所说,但丁早在流亡之前就着手写作，后由于政治迫害无法返回佛罗伦萨而辍笔.数年后,但丁的家人在无意中发现‘地狱篇’开头几首歌的手稿，其好友迪诺阅后在精神上得到了莫大的启迪和安慰，这才将原稿交还给作者，并鼓励他继续将它写完；在但丁谢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误认为《神曲》尚有‘天堂篇’的最后 13 首待补遗,但丁之子雅科波曾想替父亲写完这部旷世巨著以遂心愿，后来但丁托梦给儿子,告诉了他‘天堂篇’最后 13 首文稿珍藏的地方,事情这时方算了结。显然，薄伽丘的这种说法富有神话传奇色彩，按一般的说法,但丁自 1307 年左右开始写《神曲》。

但丁给他的长诗题名为《喜剧》,按中世纪的传统观念,这一文

学术语意即 结局令人喜悦的故事。这样,作者在写作风格和语言风采方面不必过多地拘泥形式，可比较自由舒畅地抒情达意。1555 年以后，人们为了表示对这部文学巨著的崇敬，给它加上了“神圣 ”二字,指的是长诗主题高深莫测的神威和巍峨崇高的意境。作品问世后不久，人们争相传诵，在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人们把它视作一部圣书，由文人在教堂向公众宣讲和进行评论。当时，即使是一些没有什么文化修养的下层市民，也能背诵《神曲》中的精彩片段,有人甚至干脆把《神曲》称为《但丁》。所有这些，都因为这部带有中世纪浓厚宗教色彩和人文主义萌芽思想的作品，生动地反映了中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勾起他们对来世无穷的遐想。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意大利半岛上的通衢巷陌,到处可听到长诗的颤音。

今天我们读《神曲》,往往会因其浩如烟海的素材而感到如入迷宫,得借助注释领悟诗人的原意,那是因为作品揭示的中世纪社会面目毕竟离我们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但在 13 世纪末叶,人们却将它奉若神明，在感情上同长诗中的意境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神曲》中描绘的人死后遨游天堂的美好憧憬曾经牵动着多少人的心！佛罗伦萨的富家子弟曾在阿诺河上组织划船比赛，把一只只轻舟装饰得华丽夺目,据说在船只下沉后,能看到《神曲》中摹绘的地狱的情景。

《神曲》的故事概要：

《神曲》结构完美,卷帙浩繁,根据诗人对幻游三‘ 冥界 ’的描写,分为《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分。在大赦圣年的 1300 年春天,也就是但丁 35 岁(所谓的‘ 人生的中途 ’)那年,但丁在森林迷失方向,唯一的出口又被象征淫欲、强暴和贪婪的母豹、雄狮、母狼等三只凶猛异常的野兽挡住去路，诗人进退维谷，因惊慌而一时不知所措。此时，拉丁诗人维吉尔应贝雅特丽齐的派遣前来给他

指路,并诚挚地告诉他 若想化险为夷,务必经过地狱、炼狱和天堂等三个冥界。就这样，但丁在维吉尔的陪同下，开始了历时 7 天(4 月 8 日至 15 日)的神秘梦游。

诗人随着维吉尔首先下地狱。那是一个形似大漏斗的万丈深渊，底部在地球的中心点，上端在北半球。根据但丁的想象，北半球为大陆地，而耶路撒冷为其顶点。在由上下 9 层组成的地狱里，关押着怙恶不悛、恶贯满盈的罪人，各层间有台阶相连。第 1 层为“候判所”,即收容生前从未洗过礼的俗人的地方,古代许多诞生在耶稣之前的贤哲，如诗人荷马、哲学家苏格拉底等，均聚集在这一个光明的特别区域。第 2 至第 5 层,是关押纵淫乱的好色之徒、贪婪吝啬者、浪荡子、生性暴躁和游手好闲者的场所。第 6 层里集居着一些邪教徒。第 7 层是自杀者、败家子和高利贷者容身之地。第 8、9 层里囚禁着犯有叛国、欺诈或诡骗罪行的人。但丁在地狱中目睹了每一层的情景，遇见包括教皇、皇帝和权贵在内的不计其数的各类人物，例如昔日坐在罗马至高无上教皇御座上盛气凌人、专横妄为的卜尼法斯八世，如今也耷拉着脑袋，成了阶下之囚。在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来到地球中心，即地狱魔王撒旦伫立的场所，然后两人顺着螺旋型的小径穿越地球中心，来到净界山下，依稀可见瓦蓝的天空和灿烂的群星。但丁运用极其丰富的想像力，以地狱中罪人们所受的刑罚为主要写作题材，抒发他自己的思乡之情和昭雪冤仇的决心，故事情节亦随着他在地狱的游程而步步入胜，而诗人塑造的许许多多形象生动的人物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

在耶路撒冷正对面的南半球上，有一座圆锥形的山，由一天使划船把诗人送至这炼狱之山，山巅就是灿烂绚丽的天堂。但丁随维吉尔拾级而上，只见炼狱大门前的几层斜坡上，集结着一些生前未赎清罪孽的人，他们正等待着进入炼狱补赎罪过。诗人借助神灵的威力，在梦幻中经过一段陡峭险峻的山坡后进入炼狱之境，眼

前展现出一派突兀森郁、神秘莫测的景象。上下 7层环山腰的圆形小路，越往上直径愈小，上下之间有阶梯相连。罪人们按罪孽的轻重(骄、妒、怒、惰、贪财、贪食、贪色)分居各层洗涤灵魂中尚存的污垢，殷切地等待着登上山巅伊甸乐园这一幸福时刻的早日来到。在炼狱中，罪人们眼前不断出现修德行善之人的形象，一面不时地为在尘世犯下的罪过嗟悔不已，一面努力纯净着自己的灵魂。同炼狱中的罪人一样，但丁每登上一步，都有一个天使在他的额头上拭去一个象征罪过的‘ P’,字(“P’,为意大利语中‘ 罪过 ’一词 Peccato 的第一个字母），因为在他进入炼狱之前，曾有一个天使用寒光四射的利刀在他额头上刻上七个 “ P’ ,字。这里与地狱不同 ,罪人们不永久呆在自己的层里，他们等待着涤除罪过即可灵魂超拔，登上山顶。那里是一片林中空地，芳草萋萋，百花吐艳，即天主恩赐于人类的天国乐园。当一个灵魂洗清罪孽，归真反璞的时候，便可进入天堂，那时整座炼狱山到处响彻巨大的欢呼声：“ 光荣归于在天的上帝 !”

抵达炼狱山顶峰之后，维吉尔即辞别但丁而去。一方面，诗人在炼狱已洗净罪过，不再是罪孽之奴隶；另一方面，维吉尔乃地狱候判所中的一名贤士，并非基督之信徒，不能陪同但丁进入天堂。此时，在奇妙的梦幻之中，贝雅特丽齐绰约的身影又一次出现在诗人的眼前。如果说维吉尔象征着世间学识的话，那末她则代表着神学无以伦比的威力。但丁与贝雅特丽齐在地上乐园相会，这时，他梦游三冥界的神奇故事发展至顶点。

在贝雅特丽齐的陪伴之下，但丁目睹了伊甸乐园里象征人类发展史颠峰的图景 诗人首先下了‘ 忘川 ’,河水使他忘却痛惜的往事 ,接着又用‘ 优乐埃 ’的水浸渍身子 ,他又一次记起平生所行的善事，心灵纯洁的诗人这才和贝雅特丽齐一起升上天国。

但丁以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天体论作为 “ 天堂 ” 的擎天柱 ,把太空描绘成由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

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等同一个轴心上的九重天组成的球面体(但丁称其为“永恒的轮盘”)。与地狱和炼狱不同,天国里的人全部云集在九重天外的无穷大的天府，簇拥在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四周，云蒸霞蔚，绚丽灿烂。在贝雅特丽齐含笑目光的引导下，但丁从此天到彼天，陶醉在眩目的光芒和无比的幸福之中。在第八重天,但丁在接受了 3 位圣人(彼得、嘉科莫、约翰)关于神学三美德的询问后，神魂超拔，随同圣人培纳多一起进入神秘的苍穹，一窥基督教“三位一体”最深邃的奥义，于是幻象和诗篇嘎然而止。

但丁以梦幻故事为题材，采用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法和一节三韵句诗体,把《神曲》写成长达 14 233 行的长诗,气势澎湃,天趣盎然，不愧为世界文坛上罕觏之千古绝唱，读起来犹如溪水奔流，铿锵有声，又如高长的龙松，如障如屏，似幢似盖。全书连同序曲的第 1 首,共 100 首(“地狱”、“炼狱”、“天堂”各由 33 首组成)。就艺术而言,《神曲》结构严谨,语言丰富,为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语言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丁和他的《神曲》：

自 1307 年直至 1321 年离开人世为止,但丁为写《神曲》辛勤笔耕了差不多 15 个春秋。他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综合了他一生的坎坷经历、政治见解和文学创作的丰富经验,生动地再现了 13 世纪后期的意大利社会，可谓是佛罗伦萨共和国走向衰亡时期的一个缩影。

在《神曲》虚构的神奇世界里,但丁从地球的表面出发,穿越地球中心后拾级而上，直至天国之苍穹，遨游了充满魑魅魍魉的地狱，世俗罪人洗涤罪孽的炼狱和圣人荟萃的幸福天堂。他同不计其数、栩栩如生的人物交谈讨论,勾画出许许多多寓意深长、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纵横跌宕,盘陀交错,笔端奇趣横生。诗人将自己描绘成梦游地狱、炼狱和天堂等三个神秘冥界的主人公,而在他

之前，只有基督教会的领袖和古罗马人的祖先才有此至高无上的荣耀。这位特殊的旅行者，随着故事情节一步步向纵深发展，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十分自然地同《神曲》中描摹的人物和情景融合在一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但丁的《神曲》是一部充满政治色彩的历险小说，而其主人公正是作者本人。

但丁是长诗《神曲》的核心。他运用娴熟、巧妙的隐喻艺术手法,在长达 14 000 余行的诗句中倾诉自己对祖国佛罗伦萨共和国真诚的赤子之爱和因蒙受耻辱而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愤懑，字里行间不时地显露出他对乌托邦式的和平、昌盛的美好世界的憧憬。他殷切地期望帝国和教会重归于好，至死仍梦幻着理想中的仙山琼阁。象征罗马帝国的雄鹰和比喻基督教的十字架，犹如中流砥柱支撑着这部文学巨著，但丁以此为轴心，精心设计出历经三个神奇冥界的梦游。在作品中，诗人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始终同他本人的厄运交织在一起，因为正是诗人在外流亡的不幸遭遇促使他奋笔疾书，并给他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素材，倘若无此写作基础,《神曲》也就不可能存在。在 20 余年的流亡生活中，诗人饱尝了人世间暴力和不公正给他带来的辛酸痛楚，漫漫长道荆棘载途，要到达“ 地狱 ”中描绘的沐浴着阳光金辉的山峰，得借助神灵的威力,光靠俗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同‘ 炼狱篇 ’和‘ 天堂篇 ’相比，“ 地狱篇 ’可谓是《神曲》中最优美生动和感人肺腑的一部分,寓意深沉，璀璨夺目。但丁不为追求作品外部的美而过多地斟酌文字，但他坚忍不拔的个性和独辟蹊径的艺术风格，赋予了整部作品诱人的魅力,而这正是《神曲》的伟大所在。

就语言而言，作者仿效中世纪喜剧的艺术形式，比较自由、舒畅地抒发感情,不拘泥于规矩绳墨。诗人在‘ 天堂篇 ’中,言辞恳切地启迪人们由天国圣人揭示的充满神学深奥含意的真谛，恰如其分地引用罕见的拉丁文短语和华丽雅致的词藻烘托天堂神秘莫测的气氛。在“ 地狱篇 ”中，诗人采撷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生动形象的

比喻，恰到好处地给一些虚构的情节涂上一层具有浓郁民间色彩的艺术光泽。比如：诗人将罪人描绘成水蛇口中挣脱逃命的青蛙和热锅中沸煮的肉块，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外，但丁还借用法语、普罗旺斯语和新拉丁语丰富自己的创作语言，以大胆创新的精神，将高深的哲学语言同平民百姓的日常口语有机地糅合在一起，使《神曲》的诗歌语言带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喜剧风采。

但丁丰富的想像力和谙练的隐喻写作技巧，使《神曲》在语言方面永远成为后人的楷模。他往往寥寥数笔即惟妙惟肖地勾勒出迥异的景色和各种不同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文笔简洁而遒劲，优美而不俗，使人读后难以忘怀。这里，我们不妨举一例说明：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曾用数百行诗句描述希腊神话中传奇人物尼俄伯的不幸遭遇，而但丁却只写了短短的三行诗，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故事的主题。类似这样的例子在《神曲》中俯拾即是。正因为如此，《神曲》问世后，在整个意大利社会激起了强烈的反响，立即成为脍炙人口的文学著作，其影响在相距但丁时代八百余年的今天依然不容低估。

在但丁离开人世后的数百年中，《神曲》的命运时好时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意大利文学史的见证。15 世纪初叶，但丁一度被视为平庸的民间诗人，即使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主义的狂热支持者仍对《神曲》抱有偏见。到了 17 世纪，但丁的《神曲》仍犹如深埋于沙土之中的明珠，没有引起人们充分的重视。一直到 18 世纪初叶，那不勒斯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维柯对但丁的光辉诗篇予以高度的评价，并将他誉为意大利的荷马和一位把整个中世纪文明史反映在作品中的伟大诗人。从此以后，《神曲》誉满全球，后来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浴血奋战的英雄儿女，也极力赞扬这部不朽的经典著作。实际上，在维柯之后，但丁的名字始终同荷马、莎士比亚并列，成为西方文明史上三颗永不陨落的巨星。

第三节 彼特拉克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 年）在肯定现实、肯定人生、反对禁欲主义方面比但丁更坚决、更彻底，这反映了中世纪世界观同人文主义思想在他内心的激烈冲突。他曾大声疾呼"凡人要关怀凡间的事物"，"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里……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① 他代表作《歌集》中的著名政治抒情诗《我的意大利》，不但谴责封建君主的败行劣迹，揭露教会的腐败，而且号召意大利人民为实现和平与统一而战，激荡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彼特拉克是继但丁之后又一位佛罗伦萨著名诗人和人文主义学者，如果说但丁总结了过去，那么彼特拉克则展示了未来。他以优美、秀逸的抒情诗著称于世，他的大部分作品均以其丰富、敏感的思想和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为写作题材，诗歌风格继承了普罗旺斯和意大利"柔美新诗体"爱情诗的传统，但打破了传统诗歌充满神秘的象征和人物形象偶像化的陈旧框框，使爱情诗更接近生活，轻松明快，富有激情，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为欧洲抒情诗歌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成为近代西方诗歌中的一个重要诗体。

彼特拉克的人生道路比较平坦，没有但丁那样饱览人间沧桑的经历，政治上也远没有但丁那样活跃。他热爱生活和自然，渴望人间的幸福，追求爱情和荣耀，但却无法同宗教传统和禁欲主义思想决裂，诗句中蕴含着一个从中古过渡到新时代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矛盾，抒发了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爱情观念。诗人第一次提出'人学'和'神学'对立的概念，否定教会世界观和禁欲主义教条，这对冲破封建束缚和宗教桎梏，推动文艺复兴运动的深

① 《西方文学思潮概观》，王秋荣、陈伯通著，海峡文艺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 页

入发展，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一、生平

彼特拉克出生在托斯卡纳地区亚雷佐城，其父是佛罗伦萨的一位公证人，和但丁同时被流放。诗人幼年时曾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小城居住，后随家人迁往法国的阿维尼翁。正如彼特拉克在写给其兄长的书信中所回顾的那样，他在这一时期中除了埋头钻研诗文以外,生活上放荡不羁,沉湎于风花雪月的世俗浮华之中,以至这倏忽即逝的数年，以后成了他终身的遗恨。1343 年之前,诗人一直安逸地生活在阿维尼翁,其间,为了搜集希腊和罗马的古籍抄本,他曾漫游法国北部、德国和罗马,研读各种手稿,结识了不少大学者。与此同时,他开始创作拉丁语和通俗语抒情诗,声誉随之与日俱增。

在彼特拉克的一生中，有三件事对他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一,1327 年，诗人在阿维尼翁一座教堂内与劳拉邂逅，爱慕之意蓦然而生，赤忱之爱从此成了诗人精神世界的支柱、创作的源泉和生活的动力 其二,1336 年 4 月 26 日,诗人兴致勃勃地登上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省旺托索山巅。他一面眺望展现在脚下的令人神魂失舍的美丽景色，一面欣然翻开终日携带在身的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的名著《忏悔录》,书中的绝句“ 有人不顾路途遥遥赶往观赏巍峨的群峰、潋滟的海浪、长长的河道、浩瀚的大海和不断运转中的星球，然而他却不懂得自爱 ” 使他触景生情，感叹不已。这一纯粹出于偶然的巧合加剧和激化了早就潜伏在诗人内心世界中的宗教信仰同生活欲望之间的冲突，成为他终身的隐痛 其三,1341 年复活节，诗人在那不勒斯参加由法国国王罗贝尔托亲自主持的公开考试后,荣获‘ 加冕诗人 ’的桂冠。不久，诗人同时接到罗马和巴黎方面的邀请，后因诗人本人的意愿，庄严、隆重的加冕典礼定在罗马卡皮托利丘举行,诗人多年祈望的功

名和荣耀终于成为现实。

1343 年至 1353 年间，诗人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意大利巴尔马城，但经常去各地漫游，同时继续不辞辛劳地搜集古典著作和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其间，他的兄长决意摒弃世间浮华，献身上帝“崇高、神圣”的事业，诗人闻讯后思绪纷扰，精神上陷于无限的悲痛之中，他欲随其兄长同去，但又无决心彻底抛弃不胜翘企的功名和对恋人劳拉的缱绻深情。1348 年，诗人在巴尔马惊悉劳拉已在席卷整个欧洲的瘟疫中离开人世的噩耗，内心因失去恋人而悲痛欲绝。之后，诗人四处云游，开始了长期的流浪漂泊生活，无一固定住所，最后于 1374 年 7 月 17 日在意大利帕多瓦城南面的亚尔瓜镇与世长辞。根据诗人生前的遗愿，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在亚尔瓜镇，至今仍保留着彼特拉克的故居和墓穴，每年前往凭吊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深情地缅怀这位被誉为“意大利诗歌之父”的人文主义伟大先驱。

二、历史地位和政治理想

13 世纪的意大利文人，往往为保全既得利益而将自己的命运同某一朝廷或某一城邦维系在一起。彼特拉克却与众不同，按今天的说法，他是一个“无国籍游民”。当时，在朝廷供职的文人几乎都拜倒在某一位权贵脚下，忠实地为其利益效劳，而彼特拉克绝非此类跟在主人后面亦步亦趋之辈，相反，封建贵族老爷们都以能请到他这样的嘉宾而深感荣耀。与但丁不同的是，彼特拉克不直接参与政治事端，他只是以顾问或训诫者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他曾写过措辞严厉的诗篇呵责和告诫权贵们停止互相杀戮；在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战事纠纷中，他当过伸张正义的仲裁者……1347 年罗马市民揭竿起义反对贵族的暴虐统治，彼特拉克曾写信给起义者的首领，积极鼓励他以更大的战斗热情同贵族斗争下去，起义不幸失败后，他又为被俘的将官四处奔走，到处呼吁。彼特拉克在

作品中大胆地提出"人学"与"神学"的对立,严厉斥责罗马教廷束缚人们思想的经院哲学;他在作品中抒发盼望祖国统一的爱国热忱,并为新文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彼特拉克是中世纪意大利和整个欧洲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他的足迹所到之处连成了一张偌大的无形之网，将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连接在一起。人们广泛抄录、传诵和研究他的书信和抒情诗，他写下的那些永垂不朽的诗作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他的名字已永远载入世界文学史册。

彼特拉克一生在诗苑辛勤耕耘，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写下了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因而被公认为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之一。确实，彼特拉克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的回潮，因为彼特拉克心目中的读者是罗马帝国、阿维尼翁教廷以及各城邦中的广大知识分子、政治家和贵族，这是远远超出意大利半岛范畴的一支庞大的读者队伍。他用拉丁文写的叙事诗《阿非利加》（Africa），讴歌了古罗马统帅西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他因此赢得了加冕诗人的桂冠。彼特拉克的代表作《歌集》中的抒情诗则是用通俗语写成的，那是因为诗人将它看作是一部并不太重要的著作，仅仅是他本人内心世界隐秘的袒露；而他采用拉丁语抒发政治理想，阐述对宗教信仰的见解，诠释含意深奥的哲理，为的是赋予其作品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强大的生命力。

彼特拉克感情丰富、奔放，热爱生活和大自然，但他却无法摆脱中世纪宗教和禁欲主义思想桎梏的束缚。他曾给家人和好友写了大量的书信，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倾诉禁欲主义和宗教观念的紧箍咒给他在精神上带来的无形压力，语言平铺直叙，委婉动人，反映了诗人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崭新思想。彼特拉克的政治、哲学观点同但丁的大相径庭：但丁把"罗马帝国"视作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至死对帝国的兴旺昌盛寄予光明、美丽的希望，憧憬着帝国同教廷携手共进，将福音带给广大民众的美好

未来；彼特拉克却直言不讳地断定，帝国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他甚至将帝国视作异国的一种政治机构。彼特拉克诚挚地热爱意大利，但他并不只是把意大利描绘成罗马帝国一个美丽的花园，他殷切地期望意大利成为一个君主政体的统一国家。他通过颂扬和赞美意大利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表达对意大利寄寓的热切希望，抒发渴望祖国统一的理想，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芒。

三、抒情诗的独特风格

倘若我们仔细阅读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我们将不难发现隐匿在诗句中的作者多愁善感的性格和椎心泣血、忐忑不安的情绪。耐人寻味的是，诗人绝大部分的作品均未能写完，虽经他多年反复琢磨、修改，有的诗篇甚至花费了他毕生的时间和精力，但他总感到不尽满意。他的代表作《歌集》，是诗人在 1366 至 1374 年间汇编而成的一本抒情诗集，包含着他一生中各个时期所写的抒情诗，但事实上作者早从 1336 年起就着手整理、修饰他的诗作，并不厌其烦地对每一首诗在文字上进行加工、润色和提高。从诗人遗留下来的手稿上可看出，他有时在一部诗作完稿 20 余年后还再次加以修改，有的则在稿纸的边缘处写上“有待进一步修改使之益臻优美”的旁注。他的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一方面反映了诗人汲汲于成名的希冀，另一方面则流露出他面对禁欲主义的桎梏彷徨不安的矛盾心理。他渴望得到世俗生活的欢乐和幸福，但却缺少足够的勇气同旧传统彻底决裂；他具有赤诚的爱国热情和争取祖国统一的信心，但又蔑视广大民众的力量，终日为心中深刻的矛盾而深感忧伤和苦闷。下面选译的一首十四行诗比较形象地表现出他这种矛盾的心理：

我迈着缓慢、疲惫的步子，

踽踽独行在荒野，思绪万千，
仔细看着地面，
以免踩上他人的足迹。
我找不到任何隐蔽处，
避开揣度我内心感受的目光；
我虽神情沮丧，
但心中却燃烧着爱情的烈火。

河川或丛林，高山或平原，
都熟稔我的秉性，
但无人了解我内心的忧伤。
我无处寻觅险峻的道路，
而爱神从不光顾荒僻的小径
同我开诚布公地促膝谈心。

诗人在艺术上永不满足的可贵精神，蕴含着他心灵深处伤感失意的情愫。自 1327 年起,他开始赋诗歌咏对心中爱慕的女子劳拉的眷恋之情，在诗句中极力赞美她崇高的精神品质和婀娜多姿的形体之美。起初，彼特拉克采用柔美新诗体的精神恋爱法描摹对劳拉的爱慕以及自己失恋后的痛苦，但在攀登旺托索山归来之后,神学的感召和现实生活的诱惑在他内心的冲突日趋激烈,他的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急剧的变化。诚然，彼特拉克宗教感情的皈依，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罗马基督教思想家和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的影响。彼特拉克将好友馈赠的奥古斯丁撰著的《忏悔录》奉若至宝,终日携带在身,作者在书中叙述的他如何忘却世间欢乐、一步一步向上帝靠近的心路历程,在彼特拉克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力，使他渐渐疏远世间浮华，为虚度的年华嗟悔不已，但他始终没有足够的勇气完全抛弃世俗生活的欢愉。

与柔美新诗体的诗人不同，彼特拉克并没有把劳拉描绘成前来给他指出通往天国之路的天使，纵然她有美丽的容貌和高尚的美德,但她毕竟是一位远离天主的凡间女子,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美丽非凡而又栩栩如生的女子形象，这使爱情诗更接近于现实生活,表现出新的人文主义精神。

四、主要作品

1、《我心中的隐秘》（Il secretum）

《我心中的隐秘》是诗人在 1342 至 1343 年间写成的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拉丁语著作，被誉为欧洲第一部尚未写成历史的内省分析文献。诗人巧妙地虚构了他与圣人奥古斯丁之间持续 3 天的对话,就死亡、宗教思想与世俗幸福的冲突、禁欲主义与肉欲爱情的矛盾等问题展开了坦率、真诚的讨论。圣人诚恳地指出了诗人的过错和弱点,鼓励他彻底忏悔自己的罪过,启迪他从惰性和倦怠中摆脱出来，并给他指明了一条通向理想境界的道路。在持续 3 天的促膝长谈中，真理女神自始至终默默无言地谛听着他们两人内心世界的表白。在全书的末尾，诗人向奥古斯丁透露了心中的隐秘,即对劳拉的赤忱之爱以及在文学创作上企求功名的愿望,但是，他却缺乏足够的勇气向圣人立誓彻底抛弃他在人生道路上这两个最大的追求。

在这一部忏悔录式的文学作品中，彼特拉克第一次运用文学形式毫不隐匿地公开他心灵深处的隐痛和秘密，恰如其分地刻画宗教思想与生活欲望在他身上的冲突,他跋前踬后,欲根治心灵上的创伤,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作品感情真挚,描写细腻,形式优美,节奏感强,读来真实感人。另则,彼特拉克从西塞罗和维吉尔使用的创作语言中寻求细腻的表达方式和惟妙惟肖描写内心情感变化的写作技巧，使拉丁语的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正

因为如此,他的爱情诗独树一帜,逐渐形成了人称‘彼特拉克体’的新颖抒情诗流派,广泛流传于意大利、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成为后人师法的典范。到了 18 世纪，意大利又一次出现模仿彼特拉克抒情诗的热潮。

2. 《凯旋》(I trionfi)

《凯旋》是彼特拉克在 1340 年前用三韵体着手创作的通俗语寓意体长诗，他将它奉献给劳拉。长诗带有醒世色彩，充满禁欲主义情调,诗人在 1374 年辍笔之后始终未能完稿。诗人以但丁的《神曲》为创作模式,采用启示、比喻等艺术手法,虚构了一幅幅包括爱情、贞节、死亡、荣誉、时光、永恒等内容并富有神话色彩的梦幻图案，自始至终贯穿着诗人对劳拉纯洁无瑕的爱。作者在其一位挚友的陪伴下,目睹了一幕幕十分壮观的场面,其中‘死亡’第二篇中的一段生动描写催人泫然泪下:劳拉再次出现在彼特拉克的梦幻之中，只见她温柔地依偎在诗人的身旁，向他喃喃地吐露自己曾暗恋过他的隐情，抚慰着诗人受伤的心灵。同他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凯旋》表达的是作者因心力交瘁而意欲寻觅永恒安宁的愿望，但如今的桑榆暮景更加深了他伤感、倦怠的情绪；他孑然一身，感慨万端。

在但丁的诗篇中，神学的威力占主导地位，而彼特拉克抒情诗的主旋律却是情感世界千姿百态的变化。他擅长描绘内心微妙的变化和抒发爱情的痛苦与欢乐，表现出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无怪有人称但丁为伟大的文学家，彼特拉克为富有现代精神的抒情诗人。

3. 《歌集》(Il canzoniere)

彼特拉克的著名抒情诗集《歌集》是一曲人间幸福的赞歌，表现了人文主义者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又称《未完

成的俗语集》)是诗人智慧的结晶以及他在诗苑长年辛勤耕耘结出的硕果。这部由 366 首十四行体抒情诗组成的诗体日记，记载了诗人对恋人劳拉忠贞不渝的爱情，歌咏了美丽的自然风光，抒发了他渴望祖国统一的理想。《歌集》由“圣母劳拉之生’和‘圣母劳拉之死”两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描写诗人热恋的感受，以及肉欲爱情的罪恶给他带来的无限悲痛；第二部分宣泄了诗人失恋后的沮丧，描绘了劳拉充满柔情地抚慰诗人的梦境。诗人采用了离合诗的赋诗法（即几行诗句头一个词的首字母与最后一个词的结尾字母组成合成词的一种诗体）点出劳拉的名字，真是巧夺天工，笔意超逸。此外，诗集中还选人一些以政治为题材的诗歌，比如《十字军之歌》和《我的意大利》等，诗篇的主题超越了诗人对劳拉的爱情这一内容。在新诗歌的历史上，抒情诗首次被编排在一起，形成一幅五彩斑斓的锦缎，浑然自成一体。那是两个世纪以来抒情诗传统中锤炼得最完美也最有生命力的作品，在形式和语言方面，均开近代抒情诗之先河。

《歌集》是彼特拉克献给所恋女子劳拉的一部抒情诗集，是他一生精神世界的生动写照。但值得指出的是，劳拉对他来说是美和德的理想化身，她并不像中世纪诗人笔下抽象的、无形体的“圣母”。他欲克制对劳拉的眷恋之情，但深感有罪的情欲之火仍然在他心中燃烧,在爱情和上帝面前,他犹豫不决,悲痛欲绝,即使劳拉死于瘟疫的噩耗也未能使他的感情冲突得以平息。诗人感到，如今桑榆树梢上已涂满了夕阳的余辉，失去的欢乐不可能再回来，倘若劳拉依然活在人世的话，或许会被他的一片赤诚之爱所感动。在诗集的末尾部分，他意味深长地安排了一组富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抒情诗和一首颂扬童贞圣母玛利亚的庄重抒情诗，为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生感到懊悔和痛惜，诚意恳求圣母在他归天的前夕恩赐他片刻的安宁，使他能在安详的气氛中乘鹤西去。比如，他在《歌集》的第一组十四行诗中感慨万千地嗟叹道：

诗句零散
记载着我少年的倥侗
蕴含着我心底的凄楚，
初涉人生
竟将花前月下的欢愉
误作爱情醇厚的甘露，
蹉跎岁月
只留下一片惆怅哀愁
却毫无半点怜悯宽恕。
而今的我
成了身孚众望的名士
负疚人自知羞与为伍，
世俗浮华
宛若一瞬即逝的光束。

彼特拉克的《歌集》绝非只是一则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更不是一部记叙作者恋爱史的日记。他的抒情诗，第一次将世俗生活中的痛苦和欢乐从万物之主套在人们头上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在意大利的诗歌创作史上，爱情还是第一回被描绘成现实生活中有血有肉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这一部不朽的世界古典名著才得以彪炳千古,流芳百世,永载世界文学史册。

为了完美地表达自己丰富的思想感情，彼特拉克认真地研究普罗旺斯抒情诗和柔美新诗体抒情诗的赋诗法，并吸取拉丁诗人和其他一些不为人们熟知的 13 世纪意大利诗人的长处，这大大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他形象地把自己比作一只在百花丛中不断采蜜的蜜蜂，终日不辞辛劳地为人们酿制飘溢着馥郁芳香的甜蜜。他曾耐人寻味地表白“：我喜欢沿着古人走过的路走下去,但不总

是踏着他人的足迹……我乐意模仿别人的东西，但不愿以葫芦画瓢，即便摹拟也不该过甚……我爱在合我心意的地方踩下脚去，有时则喜欢出格，探索前人从未走过的路①。”

艺术形式完美精致的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后成为各国诗人模仿的一种诗体。在 13 世纪及以后的数百年中，彼特拉克的作品对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竞相传诵他的优秀诗篇，他的许多挚友和弟子不久成为人文主义文化第一支队伍中的核心力量。

第四节　薄伽丘和他的《十日谈》

乔万尼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2—1375 年)是另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他在一生中创作的传奇诗、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和论文，既对彼特拉克，也对佛罗伦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故被誉为彼特拉克和佛罗伦萨之间的一座桥梁。薄伽丘的作品独辟蹊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十日谈》，犹如嘹亮的号角声，报知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第一次以文学的形式，向主宰欧洲精神世界长达一千年左右的天主教会发出了有力的挑战。

一、生平

薄伽丘是佛罗伦萨一个商人的儿子，母亲是法国人。幼年时，薄伽丘被送往他父亲经商的那不勒斯居住。他自小酷爱诗文，对买卖丝毫不感兴趣，他父亲出于无奈，只得顺从他的意愿，让他专心钻研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以致他后来成为佛罗伦萨第一个通

①《意大利文学史大纲》，Giuseppe Petronio，Palumbo 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80 页。

晓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他对商界的贵族气派、宫廷中的骑士排场及封建制度的豪华有了切身的体验。他又曾研读教会法，与宫廷中的学者以及彼特拉克的朋友和崇拜者过从甚密，从而有机会欣赏彼特拉克本人的作品。1340 年，薄伽丘父亲经营的商行猝然破产，家境随之每况愈下。在这一时期中，薄伽丘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佛罗伦萨，他积极参与这个城邦的政治生活，极力拥护共和政体，反对与贵族沆瀣一气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与此同时，他的通俗语和拉丁语作品也开始崭露头角，声望日隆。1350 年，薄伽丘在佛罗伦萨结识了彼特拉克，两人一见如故，情趣相投，感情十分融洽；之后，他们之间的书信来往甚密，友情亦日趋笃深，这对薄伽丘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薄伽丘于 1373 年从那不勒斯回佛罗伦萨之后病魔缠身，伤感失意，晚景凄凉，有时甚至不得不以抄写他自己及他人的著作度日。1373 年 10 月，他开始在佛罗伦萨一座教堂里讲授但丁的《神曲》，至 1374 年初因病体不支而终止。1375 年，他凄凉地与世长辞。当时，佛罗伦萨遐迩闻名的文学家弗朗哥·萨凯蒂曾写有一首诗寄托对他的哀思，诗中叹息道：薄伽丘的死使诗坛黯然失色，文化艺术界花团锦簇的盛景也仿佛随他同去。有人甚至说：没有薄伽丘，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学峰巅便是不可理解的。

二、主要通俗语作品

薄伽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自幼接受富有人文主义萌芽思想的教育，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有着明显的反映。倘若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将会发现，他的写作风格不同于但丁或彼特拉克，作品中既没有深奥的哲理，也没有令人费解的神学教义或华丽的词藻。在他的早期作品中，他仿效法国叙事体文学作家和游吟诗人不同凡响的艺术表现手法，把广大民众视作心目中的主要读者，但他同时又蔑视民众，认为他们是“没有知识的贱民”。尽管

如此，他为求取文学创作上的功名和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辛勤工作了一辈子。应该说，薄伽丘的创作态度是严肃认真的，他的作品虽然充满着各种矛盾，但却积极反映了文艺复兴初期人民渴望摆脱中世纪封建教会的桎梏并求得解放的思想感情，富有浓厚的民主色彩。薄伽丘的早期作品大部分是一些以爱情为主题的传奇式叙事诗，但由于对现实生活观察敏锐，并且讲究气魄和辞藻，因而很快便在意大利国内外产生影响，使他笔下的意大利语能与拉丁文学巨著中的文字媲美。另则，他还使游吟诗人口叙的八行体诗提高到文学水平，并成为意大利诗歌的通行体制。

1340 年薄伽丘返回佛罗伦萨，在其后的 10 余年坎坷的生活中，他的创作技巧益臻成熟。1341—1342 年间完成诗歌散文合集《亚美托的女神们》（Il Ninfale d'Amedo）；1342—1343 年，完成寓言诗集《爱的幻影》（L'Amorosa visione）；1343—1344 年，完成具有心理洞察力的散文体小说《菲娅美达的哀歌》（L'Elegia di Madonna Fiammetta）；1344—1345 年，还完成长诗《菲爱索莱的仙女》（Il Ninfale Fiesolano）。另外，他在青年时代还写有散文体长篇小说《菲洛可洛》（Filocolo）、长诗《菲洛斯特拉托》（Il Filostrato）以及其他作品。其中，以八行体诗格写成的长诗《菲爱索莱的仙女》描写仙女孟索拉与牧人亚菲里库的恋爱故事，被认为是除《十日谈》以外薄伽丘最优秀的作品。散文体小说《菲娅美达的哀歌》主要描写作者本人对那不勒斯国王罗伯特的女儿玛丽亚的爱情，小说是以一个被恋人遗弃的女子进行独白的形式写成的，中间穿插了一些生活细节和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根据中世纪的传统习惯，菲娅美达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名字，意即“爱情的火焰”。作者仿照彼特拉克的创作思路，巧妙地设计了在教堂初遇菲娅美达一见钟情的情节；但菲娅美达生性轻浮，她以虚假的柔情骗取了作者真诚的心，他为此悲痛欲绝，毅然同她中断了一切往来。在这一则虚构的爱情故事里，菲娅美达既不是柔美新诗体派诗人颂扬的天

使，也不像彼特拉克笔下的劳拉，她只是一个沦落风尘的普通女子而已。薄伽丘的这些作品在艺术上虽然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但却摆脱了当时颇为流行的雕琢文字和堆砌词藻的浮夸文风，抨击了禁欲主义，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而为他的旷世之作《十日谈》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继《十日谈》之后，薄伽丘于 1366 年左右写成了短篇小说《大鸦》（Il Corbaccio），这是他最后的一部作品。在小说中，作者采用幽默的文笔嘲弄了一位寡妇。实际上，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欲借此发泄心中的不满，指桑骂槐地讽刺所有女子在道德和形体上的缺点，隐喻女人是一切邪恶的根源。

三、《十日谈》（Il Decameron）

《十日谈》是薄伽丘在 1349 年至 1353 年间创作的一部世界古典文学的光辉巨著。作者采用叙事体的文学形式，在书中撰述了一百则内容各不相同的故事，在每一篇前都写有楔子和序言，勾画出一幅庞大的社会生活画卷。

1348 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可怕的瘟疫。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等地，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黑疫”中丧生。昔日繁华的佛罗伦萨哀鸿遍野，丧钟乱鸣，到处呈现出一派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景象，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在这场灭顶之灾中，三个受过良好教育、机智勇敢的青年男女在圣玛利亚福音教堂邂逅相遇。为了躲避这场可怕的瘟疫，他们一起来到城外的一所别墅蛰居。在 10 天的时光里，他们为愉快地消磨午后的休息时间和忘却天气炎热给人带来的烦躁情绪，决定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故名《十日谈》。这些故事集中反映了薄伽丘对尘世欢乐的追求和对人生无限的热爱。小说虽取材于中古游吟诗人的传说和东方故事集如《一千零一夜》和《七哲人书》等，但主要反映的是当时意大利广阔的社会现实。作品面对现实，将人间百态尽情展露，难怪有人把它与《神曲》

并列,并称之为《人曲》。

如果说但丁是对爱情表示同情，彼特拉克仅仅表现为对爱情的抽象和一般的赞美，那么薄伽丘则具体地描写了人的爱情生活，并由此提出了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芒的“幸福在人间”的观点。作者的构思独具匠心,设计巧妙,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几乎包括了作者所处社会的每一个生活侧面。绘声绘影的叙述，栩栩如生的描写,千姿百态的人物,曲折离奇的情节,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给人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它不愧是冲破中世纪寒意而傲然绽开的一朵奇葩。《十日谈》中有福星高照的幸运儿，有结局欢乐或悲伤的爱情历险故事，有闪耀智慧火花的美丽格言，也有怪谲荒诞的轶事和赞美骑士勇敢、豪放精神的传奇故事，无论内容或文体，都与中世纪传统的文学作品大相径庭。无怪《十日谈》问世后，在意大利社会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人们将它视作至宝，爱不释手。英国的乔叟和莎士比亚、法国的莫里哀、德国的莱辛和西班牙的维加等欧洲著名文学家，都曾在艺术构思上从《十日谈》中得到过有益的启迪。

正如薄伽丘本人所说,从总体上看,《十日谈》是一部运用喜剧语言写成的文学作品。诚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在语言的运用上草率从事，反之，他刻意求工，擅长选择一些生动形象的日常用语，从侧面点染和烘托人物的不同性格，使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作者的神笔之下，即使是目不识丁的村妇或淫荡子弟都有着自己强烈的个性。另外，作者在写作过程中，还恰如其分地揉进一部分法语、普罗旺斯语、意大利各地的方言以及高雅的文学语言，描绘出一幅幅闪烁着艺术光辉的生动画卷。值得一提的是，他有意识地运用手中之笔努力提高通俗语文学作品的威望，为它们的合法地位大声疾呼。作者在《十日谈》第 4 天故事的序言中写道:“这些故事我都是用那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成的，而且写的还是散文，又不曾署名，只是平铺直叙，不敢有丝毫卖弄。可是，

我依然逃脱不了遭人妒忌的厄运，那一阵阵无情的狂风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彻底领悟聪明人常说的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苦难’才不会遭到他人的妒忌。”①事实上，薄伽丘采用了多种多样的讽刺隐喻手法,语言鲜明生动,文笔精练,以《天方夜谭》式的框架结构将一百个故事组织得浑然一体。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揭示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表达了人民的意愿，不仅为意大利的散文创作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短篇小说树立了典范。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运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在作品中勾勒如此庞大的社会生活图景。

在 14 世纪中叶的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乃至思想领域内,依然占据着全面的统治地位。薄伽丘正是在中世纪开始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写下了他的扛鼎之作《十日谈》。全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人文主义思想，统治了西欧一千余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遭受如此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号角揭开序幕的。

薄伽丘是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被称为“人生百面图”的现实主义小说《十日谈》中,勇敢地向主宰人们精神世界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进攻战，无情地鞭挞了一部分天主教神父虚伪狡黠和阴险可恶的本性，对荒谬诡谲的中世纪禁欲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在这一方面，他比彼特拉克又前进了一大步。殊不知，在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封建制度精神支柱的罗马天主教会，实为压在人民头上一座沉重的大山，它不仅对广大民众进行政治上的压榨和经济上的剥削，还实行无孔不入的思想控制和精神统治。正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一

① 《十日谈》,卜伽丘,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341 页

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①。”如果人们不首先撕破天主教会在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布下的、硕大无朋的无形之网，他们就不可能成功地摧毁世俗的封建制度。《十日谈》的一百个故事，首先把批判锋芒指向宗教教会的腐朽。作者独具匠心地采用幽默、诙谐的笔法，辛辣地嘲讽了教皇、主教、修道院院长，乃至神甫、修士、修女的虚伪和狡黠，影射教会的腐败和堕落，对罗马教廷巧妙而深刻的讽刺耐人寻味，一则又一则内容生动的故事，不得不让人读了之后掩卷深思。诚然，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薄伽丘和《十日谈》这部不朽的著作，毕竟他是一位生活在中世纪末期的意大利文人。纵然他用笔如刀，辛辣地嘲讽教会的僧侣和修道院里貌似虔诚的修女，在砸碎统治西欧近一千年之久的天主教会精神枷锁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薄伽丘写《十日谈》的动机是出于反对封建教会。作者虽然令人折服地勾画出宗教的本来面目，但他没有从本质上揭露罗马教廷的腐朽。薄伽丘自己也是一个笃信上帝的信徒，与但丁不同的是，他不承认上帝有主宰世界的神威，也不为一个人离开尘世后的命运担忧或操心，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和欢乐就在人间。

薄伽丘丰富的想象宛如浩瀚的大海，但透过令人眩目的故事情节，我们还是可以清晰地看到，爱情和智慧犹如两根无形的金线，把一百则不同格调的故事串联在一起。他热情讴歌爱情和智慧的伟大力量，运用娴熟的写作技巧，将两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成功地塑造出情场幸运儿潘菲洛、失恋汉子菲洛特拉托、活泼快乐的第奥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他本人在一生三个不同阶段中的精神面貌。他在《十日谈》中描绘和歌颂现世生

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对中世纪的法律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有力的控诉。正因为如此，《十日谈》自 1471 年在威尼斯初版之后，始终遭到各种封建势力，尤其是教会方面的仇视。1497 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活动中,《十日谈》的不少珍贵版本,连同其他一些文艺作品,作为“邪书”被扔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付之一炬。尽管如此，《十日谈》在 15 世纪的印行达 10 版以上,在 16 世纪又出了 77 版。从以上的两个数据，我们清楚地看到，这部以新颖的文学形式写成的短篇小说集在当时深受欢迎的盛况。显然，它的影响已越过了国界，薄伽丘不仅是属于意大利的，更是属于整个世界的。

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提出了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主张一切以‘人’为本,用人性来反对神性,提倡人道与神道抗衡,顽强地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欲摆脱封建约束和宗教枷锁的世俗愿望。而人性，在作者的笔下突出地表现在世俗爱情上。他赋予爱情以全新的诠释，将它视作一种新的道德，新的人伦。在他看来，纯洁的爱情是男女之间高尚情愫的流露，理应得到大家的祝福，因为这种真实的情感乃人生中的一个积极因素，是幸福的源泉。另则，薄伽丘还在他的这一部旷世之作中，极力歌颂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力量。通过书中一百则内容各异的故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自然把人创造得又美丽又匀称，所以人有能力创造和征服一切，而不必屈服于上帝或教会的安排。

诚然，像任何优秀作品一样，《十日谈》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有它的局限性。在薄伽丘身上，既有战斗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在整部作品的艺术构思上，也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和广大民众之间尚有距离的不足之处，字里行间仍蕴含着一些封建说教气味浓重的东西。例如，作者在全书中特别用心撰写的最后一个故事，篇幅特别长，他在赞扬女主人公逆来顺受的秉性的同时，刻意表现出基督教一贯渲染的谦卑顺从的“美德”，这一绝非偶然巧合的情节

值得引起我们深思。

事实上,在《十日谈》问世不久,薄伽丘采用中世纪文学传统的梦幻形式,于 1354—1355 年间写了短篇小说《大鸦》。他在这一部自己最后的文学作品中，斥责爱情是淫荡的肉欲，诅咒女人是邪恶之源，从而暴露出他消极落后的一面。晚年，薄伽丘甚至表示愿意弃"邪"归"正",打算将《十日谈》和他自己的其他著作都付之一炬，幸好被他的好友彼特拉克劝阻才作罢。尽管如此，天主教会并没有因为薄伽丘在晚年的忏悔而宽恕他，有人甚至在他死后将他的坟墓掘掉，墓碑也被扔在一边。

意大利 19 世纪著名文学评论家德·桑克蒂斯称:《十日谈》是继但丁《神曲》之后的《人曲》,薄伽丘是替代欧洲中世纪道德秩序的新道德秩序的先驱；在《十日谈》中那些轻佻甚至放荡至极的篇章背后表现的是对精神世界的颂扬，以及对道德价值的肯定；《十日谈》有意表现人们与命运抗争并学会去征服命运，宣布了欧洲已经进入一个以人和现世生活为中心的崭新时代。

第四章　　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文学

14 世纪是意大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中世纪近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些禁锢文人创作思想的陈旧惯例濒于危机，而新颖的文学尚未破土而出。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开始萌芽的人文主义思想,在 14、15 世纪已有了很大的发展，意大利文坛上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繁荣景象，一批富有艺术才华的文学家脱颖而出，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奏响了序曲。

第一节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运动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在欧洲产生最早的地区,早在 14、15 世纪，其北部若干新兴城市的手工业已十分发达，银行和商业发展迅速。据历史资料记载，当时仅佛罗伦萨一地，直接靠毛织业为生的居民就占据了全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口，该行业雇工高达三万余人，在欧洲各国市场上跃居显著地位。随着工商业的发展，佛罗伦萨银行业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到了 13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钱庄、银行已遍及西欧各大城市，所发行的金币成为西欧和整个地中海地区享有极高声誉的货币，其工商业经济已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城市面貌，在新经济的推动下，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城区在一两百年内扩大了好几倍。

薄伽丘于 1375 年逝世，当时佛罗伦萨的政治形势似乎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但实际上从此时起，由彼特拉克和他的先辈们所播下的人文主义种子开始结出硕果。 1378 年佛罗伦萨的无产阶级发出了挑战，爆发了梳毛工人的起义。起义者焚毁富人邸宅，推翻

旧市政机关长老会议，另组由梳毛工人兰多领导的新政府，此次起义虽最终归于失败，但它却是西欧历史上雇佣工人反对工场主的第一次起义。应该说，佛罗伦萨是欧洲 14 世纪人类个性发展得最为丰富的城市，为后来意大利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和艺术之都奠定了基础，使意大利最早冲破中世纪的余焰，表现了人的觉醒。正如瑞士著名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说“：在近代国家中间，意大利最早出现了文明生活习惯，他们讲究礼貌，重视言辞，举止娴雅，服装整洁，居住舒适，注意教育和体育。他们是欧洲的老师①。”诚然，意大利特殊的有利地理位置，对它海外贸易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地处地中海航线中心的意大利，一直是东西方联系的纽带，这为其北部诸城发展国际性的贸易，创造了不可多得的有利环境。

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死后的一百年中，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拉丁语的回潮，一些颇有声望的作家和诗人，无视通俗语已成为当时人们交流思想的唯一语言工具这一事实，否定通俗语在上两个世纪中赢得的合法地位，重新采用拉丁语从事文学创作。他们在作品中竭力颂扬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绝对权威，甚至对但丁的不朽之作和彼特拉克、薄伽丘的通俗语作品侧目而视，嗤之以鼻。更有甚者，他们把中世纪的文学巨匠但丁贬斥为“迎合皮鞋匠和面包师情趣爱好的拙劣诗人。”然而，这个时期文学方面的特征，事实上正是在通俗语和古典拉丁语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才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拉丁语的发掘，不仅引起了意大利语在表达方式上的变化，而且还使它在语法和词汇方面得到了发展。否则，意大利语的成熟将会推迟 3、4 个世纪。另外，由于世俗人士在宗教方面所占据的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雅各布·布克哈特，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81 页。

重要地位，在拉丁语的影响之下，意大利各地区的方言益臻成熟，甚至连这个时期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倾向也开始滋长。

尽管拉丁语在‘遁世隐居’很长一个时期后得以重返文坛，但是通俗语文学创作活动依然没有完全衰落下来。当时，社会上只有为数不多的神职人员会读书写字，懂得用拉丁语写作，至于通晓拉丁语的文人更是寥若晨星。人们在教堂举行宗教仪式时仍用通俗语吟诵颂词，游吟诗人在广场当众朗诵的史诗、传奇诗、抒情诗以及友人之间来往的书简，也都是用通俗语写成的。实际上，但丁和彼特拉克都是作为意大利语诗人受到赞扬的。彼特拉克在他36岁时，在罗马市政厅接受了诗人的桂冠，尽管当时是为他的拉丁语作品给他授奖，但实际上他的拉丁语著作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而他的推崇者们，更主要的是赞赏他用意大利语写诗所赢得的声望。与但丁一样，彼特拉克也喜欢采用意大利语写格调华丽的抒情诗篇，他为此赢得的声望直至晚年仍是激励和鼓舞他的精神力量。他的抒情诗流传甚广，这些诗篇不仅在意大利，而且也在法国和英国，对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再则，彼特拉克在努力摆脱中世纪拉丁语陈旧规则的同时，潜心研究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力求从他们的创作语言中寻找细腻的表达方式，恰如其分地描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情感上的细微变化。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拉丁语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从而为日后通俗语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彼特拉克给他的继承者们留下了一笔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在他之前，无论法国或意大利研究古代文化的任何学者，所未曾做到过的。

14世纪末，意大利的城市共和国逐渐向君主政体国家过渡，新兴的统治阶级不但需要新颖的文学艺术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反映政治理想，而且还需要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增加社会财富。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世纪式的旧文学显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前一代人的文学作品中，人

文主义者未能找到抒情达意的合适创作风格，他们因此追本溯源，缅怀古罗马的光荣，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宝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反映新时代的语言工具。他们在希腊和罗马的古籍中，发现了古代社会灿烂辉煌的文化和一个令人惊讶的新世界。他们开始广泛搜集希腊和罗马的古籍抄本，并加以翻译、整理，进行悉心的研究。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所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①古希腊孕育了人类童年最优美的文学，希腊神话以及之后出现的希腊史诗与戏剧，追求光明，酷爱生活，肯定和赞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的自我意识。继古希腊文学而诞生的罗马文学，则富有许多新的创造，它丰富了欧洲古代文学的艺术宝库，架起了古希腊文学和欧洲近代文学之间的桥梁，拉丁诗人奥维德和维吉尔后来成了人文主义作家努力效仿的楷模。人文主义者在希腊、罗马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新世界，并在古代社会灿烂似锦的文化中，看到了中古文化相比之下鲜明的差距。他们普遍认为，古典文化乃一切世俗文化之精髓，因而开始广泛寻觅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予以翻译和整理之后进行锲而不舍的研究。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兴起了搜集古代文籍、收藏古籍和建立图书馆的热潮。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艰涩、繁冗的文体，力求维护拉丁语的规范和纯洁，以古代作品为楷模，采用典雅、严谨的文字从事文学创作，对一代文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一文中所描述的那样"：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②在崇尚古典文化的风气之下，古代的诗歌、历史演说、文论、

①《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②《〈自然辩证法〉导言》，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4页。

传记等各类著作得以重见天日并广泛流传于世，从而为人文主义文学提供了思想启示和艺术规范。在思想方面，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反对宗教迷信的、从物质原因对世界本原的探求，激发了人文主义者对教会、神权的否定；希腊神话中对"人"的价值的颂扬，复活了人文主义文学以"人"为中心的号召；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伦理学，则成了人文主义文学反禁欲主义思想的先声。总之，人文主义者将具有深邃内涵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作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使自己也具有同样的不朽价值。

值得指出的是，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的文人不同，他们不只是把古代的经典著作奉为圭臬，机械地跟在古人身后亦步亦趋。他们本着批评的精神，创造性地研究古代作品并吸收其中的养分，通过理性的分析以检验真伪，决定取舍，这种有批判的模仿反映出人文主义者思想上的革命因素。对一些早已在历史上盖棺论定的理论依据，他们重新提出疑问，从而改变了中世纪文人把古今混为一谈和给古人换上新时代衣装的错误做法。他们从古代人那里汲取养料，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在一遍又一遍地研读古籍的同时，努力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正由于如此，法国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那段至理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高度……①"作为人文主义文学的伟大先驱，但丁就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典故作为自己的创作题材。再比如 15 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罗棱佐·瓦拉经过精密考证，证实作为教皇有权在政治上统治意大利和西欧之依

①《巨人肩上的侏儒》，E·耶奥内奥，1969 年那不勒斯版(见《园圃》1967 年第期)。

据的《君士坦丁赠礼》乃是赝品,因为它所用的拉丁文,不是公元 4 世纪君士坦丁时代的拉丁文，而是公元 8 世纪的拉丁文。为此,瓦拉受到宗教异端裁判所的追捕，后由于西西里国王阿尔丰沙五世的庇护,才得以幸免于难。

在 12 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什么东西可出口时，从东方,从拜占庭、大马士革、巴格达运来了珍奇的物品,除了香料和丝绸之外，中世纪的手抄本还把希腊一阿拉伯文化带进了基督教的西方，这为欧洲人吸收外来文化中有用的养料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好机会。例如：在中世纪，希腊古典作品因无人过问而散失不少，而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就是通过阿拉伯的译文才得以幸存，后来又译回到拉丁文和希腊文,引起日益广泛的研究。所以,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最初的兴起,事实上首先源自知识的发展。当时对古典的拉丁文和希腊文手稿的收集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而在这一股新文化的潮流中，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不愧为伟大的先驱。在这一方面,阿拉伯人无疑是主要的中介者,许多古典作品正是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和受拜占庭迫害的犹太人流传到了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后来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重新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当时，寻觅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一直深入至巴勒莫，西西里的诺曼底人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腓特烈二世，曾在那里出资兴建了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复兴运动宫廷。在搜集古籍的热潮中，翻译家们无疑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他们为保存和发掘优秀的古代文化建树了不朽的功勋，是他们以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填补了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即使是在哲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例如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都由于翻译者们的辛勤劳动才得以流传下来,人类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历史才得以建立。人文主义者以自己所从事的文化活动,确立了各学科之间的新关系,推进了新文化的发展,而这

种文化发展的新趋势首先使意大利，其次使欧洲各种广阔的生活和知识领域发生了深刻的革新，并且明显地对后来的几个世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是一个把研究古典文化、复兴希腊一罗马精神遗产，同当时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起来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新，其范围大大超过了意大利学者或城市宫廷狭小的生活圈子。在西方,正是古代希腊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促进了人文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古代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不受教会的统治，它以人为本,其广博高深的内涵表现了人的理智和创造力,是人文主义者最好的思想库，人文主义正是古典文化和近代意识的结晶。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所‘复兴’的也正是古代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并由此产生了人文主义文学思潮。简而言之,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后世西方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提供了浩如烟海的创作题材。殊不知，莎士比亚、弥尔顿、莫里哀、歌德、拜伦、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都曾在古代文学著作中借用有关题材，而其中的希腊神话更是西方作家反复运用和不断发掘的意象。古代希腊罗马文学深深地积淀在西方文学发展的流程中，它像雨露一样滋润着后世文学的成长。

经考证，人文主义一词的英文原名 humanism 从德语 Humanismus 转译而来，而该德语词又是一位德国名不见经传的教育家,于 1808 年在一次关于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实际上,早在 15 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就把教授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师称为 umanista，把讲授法律的教师叫做 legista，把他们所教的课程统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意即人性修养。尽管在人文主义发源地的西方，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人们对它可能有不尽相同的诠释,但是其核心不外乎一个‘人’字,反映了人对自身利益的关注。

在长达近一千年的中世纪，禁欲主义和宗教观一直束缚着人

们的思想，上帝被赞颂为人类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而人们只有受尽人间的苦难方可在死后进入天国，并得到永恒的幸福。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在论述人的世俗生活灾难深重时曾大言不惭地说：“人原本是软弱无能的动物，在尘世间他注定永远与痛苦和罪孽为伴，只有当他进入天国之后，其灵魂才闪烁神圣的智慧之光。”[①]诸如此类的论点，在经院哲学家们的著作中俯拾即是，至于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更是不厌其烦地向人们传播“唯独基督耶稣才能拯救人类”的宗教思想。实际上，所谓的“创世说”和“原罪说”反映了下层广大人民的痛苦境遇和呼声，以及他们在现实中反抗不成、改善无望，转而在宗教中寻求精神慰藉的消极态度。

围绕着“尘世生活充满罪恶和痛苦”一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作出了有力的回击，其中，由佛罗伦萨著名人文主义者曼内蒂撰写的哲学论文《论人的尊严与卓越》更是一篇响遏行云的檄文，彻底驳斥了英诺森三世宣扬的宗教思想。曼内蒂在文中热情颂扬人在生产、商业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中所具有的无限创造力，并充满自信地指出：在现代(即文艺复兴时期)，人已经战胜了自己永恒的贫困和无能。[②] 他的这一英明论断宣告了人逆来顺受、卑躬屈膝时代的结束。

随着意大利半岛上诸多城市国家商业的不断繁荣和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对自身的价值和人的无穷创造力的认识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在拓展贸易的征途中，意大利的商船顶住了怒号的海风和汹涌澎湃的狂涛，即使是斜坡上终年覆盖着白雪的高山，亦没能阻挡住意大利商队前进的步伐。作为纺织原料的羊毛，在未加工前看上去既粗糙又不整洁，但是经纺织工灵巧的手，纺成的线神奇般地变得绵软、白净。同样，艺术家笔下的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Josef Macek，Editori Riuniti 1974 年版，第 297 页。
②同上，第 298 页。

写生和人物肖像，也显得那样的真实和栩栩如生。城里一座座巍峨的塔楼，有力地挺向那白云飘浮的天空；乡间胜似花园的田野里，一年之内能收割两茬庄稼。是谁创造了这些人间奇迹？是谁神奇般地从土地中获取数不尽的财富？是人，是富有伟大创造力的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博学之士开始将注意力转移至人的自身价值上，因为人才是当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

彼特拉克虽说不是第一个对人文学表示兴趣的人，但是他却以一个伟大创新者的所有天赋，使人文主义有了生命。彼特拉克认为，一切哲学和智慧的核心在于如何加强对人的研究、认识和教育。他说："上帝的世界是经过七层铅封的世界，非凡人智力所能理解"；"我不想成为上帝，……我是凡人，只要凡人的幸福。"①人文主义者首先在许多古代希腊罗马作品中发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新世界，那里崇尚人和自然，与中世纪崇尚神权和禁欲主义的基督教文化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将自己的视线从天国和上帝移至尘世和凡人，放弃神主宰一切的观念，主张在研究自然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人的研究。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完全相悖，人文主义者积极探索自然，研究科学，崇尚理性、智慧以及从经验中得来的知识。人文主义者看待人和宇宙的原则是，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人文主义者在讨论中最喜欢谈到的一个问题，便是积极活跃生活与沉思默想生活孰优孰劣的比较。在这一方面，薄伽丘无疑是一位优秀的人文主义作家，他在其代表作《十日谈》中讲述的一百则故事，集中体现了他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间幸福的追求。

通过对人类文明史的思考，人文主义者对人潜在的创造力和智力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他们认为人应该是一切美好事物积极

① 《意大利人文主义》，Eugenio Garin，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 页。

的创造者。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将人视作仅仅是天主的臣民，其思维和行动均受到很大的约束，一切都处于被动的状态之中。相反，人文主义者则将人的自由意志直接与义务、认识、自由行动,以及为赢得世俗生活的幸福而采取的积极态度结合在一起，尽管他们尚没有能力完全摆脱神权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在对于人的积极生活进行新的探索方面，佛罗伦萨早期著名人文主义者萨鲁达蒂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注释奥古斯丁的著作时，坚持把人间的城市同天国的城市充分地结合起来，因为他认为灵魂总是以肉体为依托的。萨鲁达蒂还认为，热爱世俗生活乃人之天性，人们只有在今生的生活中进行了战斗，完成了自己的事业，没有虚度年华，才有资格颂扬为了来世而过潜修生活的光荣。曼内蒂高度赞扬人的尊严,坚持认为人的行动,即使是‘认识’,其目的都应该在于征服自然的科学行动；他赞美大自然是一个充满着人类创造业绩的和谐世界,认为人的作用就是‘行动和认识’。阿尔贝蒂则进一步提出了闪烁文艺复兴思想光芒的格言:‘德行战胜命运’,①指出是获得光荣的人的劳动，使家庭和城市变得富裕起来。

人文主义者提出的‘行动和认识’的口号,体现了文艺复兴发展至顶峰时期,他们对‘人的命运’的崭新的诠释。对他们而言,所谓‘行动’,指的是以服务城市共和国为宗旨,积极参与公共活动和政治生活。阿尔贝蒂曾说过:‘我相信,人不是生来虚度慵懒岁月的,而是要活跃地从事丰功伟业’;②他坚持认为，人只要有足够大的勇气，是能够制服命运的。对于阿尔贝蒂那样的人文主义者来说,生活就好似一条湍急的河流,而死神正埋伏在岸边,随时准备将那些被困在浅滩中的人带入冥府。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淌过湍

① 《意大利人文主义》,Eugenio Garin,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01 页。
② 同上，第 300 页。

急的水流奋力向前，只有这样，人才能够赢得尘世生活的欢愉。另外，在与汹涌的波涛搏斗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应该向他人伸出援助之手。正如萨鲁达蒂所说：“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有两个：祖国和朋友……关心、爱护你的家庭、孩子、亲戚、朋友以及包容一切的祖国，并为他们效劳吧！这样做，你的灵魂就不可能不升入天堂，并为上帝所喜爱。’①

劳动乃文明生活的支撑点，这是公民人文主义另一个典型的思想观点。在文艺复兴时期，对某些人文主义思想家而言，劳动不再是上帝谴责天堂流亡者的诅咒语，反之，他们将劳动赞誉为人的天赋，是世上美好事物的创造者。阿尔贝蒂认为，人的尊严寓于劳动中,而且仅仅寓于劳动中;在文明社会中,道德和幸福共存,而道德和幸福几乎就是人们对上帝最高的祈求。他指出，所谓工作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文明地交往，因为“人……是为了人而生的。”毋庸置疑，人文主义者诸如此类的观点，其批评的矛头首先指向封建主和出身名门望族的贵族老爷。阿尔贝蒂说：“有的人不愿勤学技艺，不愿努力工作，不愿在完成艰巨的任务中汗流浃背，那他又怎么可能赢得像别人那样的威望和尊严呢？”②他认为,人生下来不是为躺着让自己腐烂，而是为站着做事情……不是为了在无所事事中忧伤地消磨时间，而是为了从事宏伟壮丽的事业。人文主义者普遍认为，人降临人世不是为了贪图安逸，而慵懒对能够创造一切的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

在文艺复兴时期，时间的概念第一次被人视作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像钟上的时针毫不留情地不断转动，清晰地记载着人短暂的一生。懂得时间珍贵的商人们，总是想方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成买卖，他们甚至试图通过修改法律条文，达到尽快

①《意大利人文主义》,Eugenio Garin,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27 页。
②《意大利文艺复兴》,Josef Macek, Editori Riuniti 1974 年版,第 301 页。

解决贸易纠纷的目的。那时，为调解手工业作坊主之间的矛盾，特别法庭在周日或其他节假日照样审理案件。颂扬勤劳和批评懒惰的人文主义者开始意识到，时间乃文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他们因此对古代哲学家论述时间的讲话或文章，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密切的关注。正因为他们深刻感悟人生的短暂，他们才能懂得珍惜时间的必要，并力求在每一段有限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成果。早在 14 世纪，彼特拉克就曾将性情浮躁、步履匆匆走向死亡的人，比作懵懂度日的野兽。阿尔贝蒂则进一步把人为了争取时间而展开的斗争赞誉为人创造新价值的本性和义务。他说：“大凡懂得珍惜时间的人才有能力创造世上的一切，而知道如何合理安排时间的人则定能驾驭一切事物。”① 曼内蒂甚至将上帝比拟成一位商人，时间则成了一种必须妥善保管的珍贵商品。

从另一层意思来说，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还带来意识形态领域中全新的理念。新的概念促使人们开始为珍惜和充分利用时间作出孜孜不倦的努力，想方设法争取在每一天，乃至每小时内创造更多的财富。人们同时间展开竞赛，他们的生活从此融入了新的节奏。即使是艺术家，他们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努力描绘类似的富有现代气息的思想倾向，认为有时候人们为赢得时间而产生急躁情绪，甚至狂想。罗棱佐·美第奇曾赋诗描写人们看着时间如流水一般从手指缝里悄然溜走时心中痛苦的感受，提示人们合理安排时间，因为它本是来自上苍的恩赐。乔尔乔涅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画派的一位著名画家，他的作品构图新颖，色彩具有丰富的明暗层次，善于将人物和自然景色融为一体。他曾在一幅画中描摹一位老妪，并配有意味深长的文字：“岁月不待人！”② 再比如，被誉为佛罗伦萨艺术大师的列奥纳多·

①《意大利文艺复兴》，Josef Macek，Editori Riuniti 1974 年版，第 302 页。
② 同上，第 303 页。

达·芬奇曾说过：人生宛如摇摇欲坠的一摞砖，在瞬息间便倒下了。他还说,有些人活着充其量也不过是在消化食物,填饱肚子和制造粪便,因为对他们而言,除了将自己养成肠肥脑满以外,尘世间万物皆空，也没有劳动之美德可言。[①] 由此可见,在文艺复兴时期,如何合理利用时间,已成了新生活的口号和追求财富的商人们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

由于人们,尤其是商人,对"时间"这一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富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变化，节俭和积累财富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人广泛的认同和重视。诚然,对于封建贵族和高级教士来说,"时间"和"节俭"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这同他们所追求的权力几乎毫无关联。但是对于广大的城市平民而言，金钱就宛如鲜血一样的重要，因为充足的财富是提高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有力保证。在此种特定的社会氛围中,一系列主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强制性法律应运而生。西埃纳城于 1330 年颁布了限制奢侈的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禁止市民用珍珠或宝石装饰衣服,不准举办奢华的宴会、婚礼或洗礼仪式，提倡勤俭节约。阿尔贝蒂在其重要作品《论家庭》中,论述了婚姻、教育子女、治理家庭和结交朋友等问题,极力推崇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佛罗伦萨的著名史学家、政治论文作家圭恰尔迪尼曾在回忆其父亲充满哲理的话语时说:"我父亲对我说过，你袋子里的一块金币要比你花掉的十块金币更使你觉得体面。"[②]人文主义者们有关节俭的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新生贵族的思想情操。这种颂扬珍惜时间、厉行节约的做法,显然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道德准则相悖,集中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新思想。

在文艺复兴时期，绝大部分人文主义者都致力于普及教育的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Josef Macek，Editori Riuniti 1974 年版,第 303 页。
② 《意大利文艺复兴》,Josef Macek， Editori Riuniti 1974 年版,第 304 页。

宣传，鼓励与他们同时代的人接受教育，并完善自己的学习方法，当时密集的学校网络几乎遍及整个意大利半岛。人文主义运动初期，佛罗伦萨重要哲学家费奇诺就曾意味深长地将人类的知识比拟成一棵参天大树,其根须虽苦,但结出的果子却甘甜可口;他主张,人活在世上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应以被称为希腊"七贤"之一的古雅典诗人梭伦为楷模，直至临终前的一刻仍在学习新的知识。人文主义者为探索新的知识领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和商业的发展，而且还为科学的诞生和艺术创作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在这一方面，薄伽丘早就阐述过人文主义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准则：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完善自己的人性。阿尔贝蒂则进一步阐明了人必须接受教育的原则，认为人性的本质就在于使人们具有更高的文化素养。

在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也变得更加文明，许多城市以其众多富丽堂皇的殿宇为人们提供了高水准的生活环境。不少古时候兴建的供水管道逐一被修复，一些新的饮用水管道相继开通。另外，许多城市还建造了为众人造福的公共澡堂。与此同时,人们的用餐环境,以及住房、衣着也有了明显的改善。人们不仅养成了餐前洗手的良好习惯，餐桌上还铺上了桌布,且摆上了餐具。西埃纳13世纪著名诗人契可·安乔里埃利曾在一首十四行诗中描述他的德国之旅，当谈及阿尔卑斯山北麓国家的人同意大利人在用餐方式上的差异时,他说:"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人,用餐时围坐在不铺台布的餐桌边,身着粗布衫,还常常七个人同吃一盘菜;他们甚至不知盘中为何物,惯于撩起衣服的下摆拭去下巴上的油垢。"①诗人安乔里埃利觉察到的异域人在生活习俗方面的差异,到了14、15世纪则进一步扩大。就居住环境和用餐方式而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远比欧洲其他国家来得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 Josef Macek, Editori Riuniti 1974年版,第305—306页。

优越和文明。一旦人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他对生活势必会提出新的和更高的要求，其生活水准亦会不断提高。应该说，是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颂扬改善了人日常生活的质量，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教会大肆宣扬的以“神”为本的神秘主义,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充分肯定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然而，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尚无法鉴别，物质生活的改善究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还是阻挠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归根结蒂，他们始终被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想所束缚，看不清存在于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所造成的危害：其中，有一部分人因受到压制而感到窒息；而另一部分人却获得了更高的社会福利，充分享受着宁静、自由的生活。人文主义者在颂扬人的本性和尊严的同时，每每喜欢将平民和富人的社会地位混为一谈，忽视广大民众每日间被迫从事的劳动的艰辛，并对他们濒临绝望的痛苦，以及贫困、凄惨的生活不屑一顾，眼里看到的只是新生贵族渊博的学识、豪华的宅邸和家中品味高雅的摆设。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恰好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特征，也反映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的局限性。诚然，倘若我们因此抹煞人文主义运动在颂扬人的本性和肯定人的无限创造力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那将是一种愚蠢的、错误的观点。要知道，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理想始终与日趋文明的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在文艺复兴时期遭受重创，人文主义者的大声呐喊，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积极的回响，而他们为确立人的尊严和地位而作出的不懈努力，同样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和对人性的赞美，不仅为资产阶级新世界的诞生添砖加瓦，而且也为人们指出了一条通向人的创造力得以充分、自由发挥的光明之路。应该说，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为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

在文艺复兴时期，个人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不管是在手工业作坊、货船或商队，还是在银行、市政厅、法庭、学校、艺术家工作室或科学实验室，个人的能力逐渐成为事业得以发展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人们不仅积极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努力积累金钱和财产，并以超群的才干和高尚的德行赢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不再是城里一群无足轻重的庸人，反之，他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和不同凡响的创造力。对于这即将形成气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们显然不能因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而贬斥它。殊不知，在文艺复兴初期，以及后来它发展至顶峰的阶段中，个人主义在某些场合代表的是进步势力。当时，大凡积极、勇敢和渴望功名的有教养者，均对城市国家的繁荣昌盛充满信心，且将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他们深刻领悟到：个人的抱负和前途同国家利益应该紧密相连；为赢得更加充分的自由，自己得不懈地努力，只有这样，往日受人任意欺压和宰割的日子才不会再回来。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不少天才，而所谓的天才都具有个人主义的明显特征。

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几乎每个人都试图摆脱缺乏个性的人群，以体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潜质。就拿外表装束为例，早在 14 世纪末叶，人们的穿着打扮开始显露出各自的个性，已无服饰的主流可言，这在佛罗伦萨表现得尤为特出，充分表明了人们着装的自由。人们无须再为展示自己独特的服饰而感到不自在，而裁缝们也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根据顾主不同的社会等级量体裁衣。无怪当时有人抱怨说，佛罗伦萨的市民破坏了着装的规矩，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服式，毫无顾忌地走上街头。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第一次从历史的视角看待古代世界，认为它是一种凭自身的价值单独存在的文明，既遥远生疏，又令人流连忘返。彼特拉克 1337 年初访罗马时，被古罗马的废墟所深深折服，竟感动得‘没有言词可以形容’。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人，则将

关注的目光聚焦在个人以及其应享受的权利上。他们在古代世界中,找到了实现个人理想的精神支柱,因为那个遥远的世界赋予了神式的英雄、政治家、博学者以及艺术家莫大的荣耀。因此,人们在好多城市里建造高大的纪念碑，以缅怀古代英雄的丰功伟绩。比如,在帕多瓦法院的庭院里,人们建造了一座坟墓,将古罗马历史学家、文学家李维的遗骨埋葬在里面;曼图瓦的市民为纪念出生在该城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在 14 世纪专门为他铸造勋章，上面还刻有他的肖像;在科摩,人们于 15 世纪末叶为缅怀被称为“科摩城之子”的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和小普林尼,在大教堂正面竖立起两尊高大的雕像。应该说，在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颂扬个人美德的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到了后来的僭主政治时期，追求功名的欲望逐渐转化成对权势和名誉的贪求，以及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凌驾于众人之上的、近乎疯狂的私欲。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政治理论,正是这种绝对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人们为此把政治当作权术,主张君主为了达到统治国家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值得指出的是,在人文主义者创作的文艺作品中,除了个人主义色彩以外,还强烈地表现出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论点,这在一部分人文主义作家的著作中显得尤为突出。实际上，许多人文主义作家的悲观论,源自存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恰恰体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并致使他们对古代世界优秀传统已过时的论点持批评态度。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是以怀疑论或悲观论为原动力的，只有平庸之辈才会觉得，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始终一片光明、完美无缺。彼特拉克将自己的悲观主义称作“慵惰”的产物,它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忧闷和痛苦,但是仍不失为一种积极的因素。和他同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彼特拉克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被古代灿烂的文明所征服,同时对未来充满瑰丽的希冀。然而，由于彼特拉克能深刻领悟现实社会

虚弱、变化无常的特点，并对自己和当时的社会有一个正确的估价，所以并没有因为忧悒无度而陷于绝望。即便如此，在彼特拉克的悲观论和其他中世纪学者的处世哲学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后者往往喜欢在修道院静谧的氛围中作苦行主义的默想，试图以此来治疗心中的创伤；诗人则为了不让自己在精神上被绝望的心情彻底击垮，始终不遗余力地设法缓和内心的矛盾，在诗句中袒露悲观思想的同时，尽力排遣心中的郁闷。

如果对彼特拉克来说，悲观主义只是光亮与阴影之间的冲突，那么对他的后继者而言，它则是一幅由许多形状各异的阴影组成的、变幻莫测的图案，因为他们更深切地感受到人降世后凄惨的命运和人生转瞬即逝的悲凉。这种富有中世纪色彩的先验论，在绘画、雕塑等形象艺术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中的不少作品着意描摹来世生活的图景，画面上的尘世每每宛如海市蜃楼，隐喻人世繁华的虚幻和空濛。随着先验论和悲观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颂扬死亡逐渐成为文艺作品刻意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并在15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找到了繁衍的合适土壤。人文主义者似乎不再是社会中的成员，他们往往把自己置身于众人之上，以冷漠的目光审视着地上的芸芸众生，对他们的言行则采取讥笑或嘲弄的态度。不宁唯是，有人甚至建议大家逃离尘嚣烦杂的城市，去乡间寻觅孤独的生活环境，因为在他们看来，绿色的田野乃世上最理想的幸福乐园。他们痛恨自己所处的一味追逐金钱、利润的社会，欲远离充满各种社会矛盾的都市生活。正如人文主义者、哲学家费奇诺所说：当权者严禁杀戮，但同时又准许制造杀人的工具。费奇诺以及其他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过度的忧伤使他们看不到生活中一丝的光亮。他们在情感上与其同时代的平民百姓相距甚远，喜欢将自己封闭起来，以至于无法驱走笼罩在心头上浓重的阴影；他们往往在作品中颂扬放荡不羁地追求世俗欢乐的人生哲学，以此抒发前途未卜的怅惘。佛罗伦萨僭主、遐迩闻名的

文艺保护者罗棱佐 · 美第奇曾为狂欢节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感叹像青春般瑰丽的美好岁月将转瞬即逝，号召人们尽情享受世俗的欢乐。到了文艺复兴后期，不少人文主义者把文艺同政治生活截然分开，认为个人内心世界的幸福是衡量一切的准绳。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薄伽丘早在《十日谈》中提倡的“幸福就在人间”的人生哲学，已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植下了根。

人文主义者向往世俗生活的欢乐，美好的憧憬犹如早春清新的和风一样沁人心脾，赋予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勇气。他们渴望社会的安宁、团结,对自己的祖国充满挚热的爱,刻意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女子妩媚的形体之美。作为一种新颖的文艺形式，裸体形象艺术破土而出,歌咏爱情的诗歌摆脱前人的窠臼,独创一格,诗句中欢快地跳跃着赞美肉体享受的颤音。许多作家摒弃传统的创作模式，开始采用写实的风格描绘男女之间的性爱。在这一方面,人文主义运动时期重要拉丁语散文作家勃拉丘利尼无疑开创了先河，他的作品对美丽的自然界和优美的人体所作的描述使人们明白：人除了精神以外还拥有完美的肉体。勃拉丘利尼反对禁欲主义和寺院的静修生活,指出完人也应该享受尘世生活的欢乐;他还在自己的散文作品中,毫不掩饰地描绘男女之间的性生活,袒露自己的风流韵事。米开朗琪罗用了近 6 年时间，完成了一幅体现画家大无畏艺术魅力的壁画,绘出了数以百计的、等身大小的裸体群像;他以超人的勇气,采用裸体形象体现人的品质,抒发自己的人文主义思想。壁画中显露全身的裸体形象引起了教会的非议，教皇不得不让另一位画家给壁画上所有人物的裸体下身添画了布条。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社会，妇女的尊严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同，与中世纪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曾几何时，居住在封建贵族阴暗城堡里心情忧郁的妇女，由于环境的限制,无法体现女性应有的价值;而今生活在繁华的城市里,她们的

许多美德,比如勤俭持家、精打细算的秉性,才得到了充分表现的机会。在城里的一些学校里，年轻女子甚至可以和青年男子并肩而坐，其中有的还同男子一起从事商业活动。随着接受公共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人数的不断增加，第一部专门为妇女撰写的书籍问世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那是著名人文主义史学家布鲁尼在 1422—1429 年间为一位贵夫人著述的一本小册子,作者在书中论述了妇女接受文化教育的问题,认为除了像天文、算术、几何等学科不太合适年轻女子以外,她们在其他方面的智力和学识决不逊色于男子。另则，随着妇女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商人们的妻子和女儿的形象也成了肖像画画家创作的重要题材。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画家列奥纳多・达・芬奇最负盛名的画作《蒙娜・丽莎》,塑造的就是佛罗伦萨一位皮货商的妻子,画中她那神秘的微笑,是一种古代妇女矜持的美的表现,显得那样的端庄和稳重。今天，我们倘若科学地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我们就能充分理解,当时的一些艺术家为何借用古希腊神话题材,努力在作品中表现裸体女子的形体之美。实质上,这是一种反封建的艺术思想的反映。佛罗伦萨著名画家波提切利是意大利现实主义绘画艺术的先驱者,他作于 1485 年间的《维纳斯的诞生》，线条在美神的裸体上变得极为流畅，色调明朗和谐，形象秀美清淡。再比如,提香于 1518—1520 年间画的《酒神祭》,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事迹，画上右角仰卧的裸女即是宁芙仙女的醉态,表现了人生的欢乐和享受,反映了人们在长期神学思想禁锢下产生的逆反心理。诚然,在文艺复兴时期,妇女还无法彻底摆脱中世纪封建意识套在她们脖子上的精神枷锁，即使在 15 世纪之后的数百年中，妇女的解放依旧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美好理想。再说，天主教会极力宣扬妇女必须服从男子权威的观念，婚姻的“神圣性”像绳索一样将她们牢牢地套住。

作为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对世俗生活的欢乐以及人的社会

性和个性的研究，始终同对自然的探索紧密相连。出生在帕维亚的数学家、医师、哲学家、星占学家杰洛拉莫·卡尔达诺曾说“：对于人来说，最大的欢乐和幸福莫过于认识天空的奥秘，认识自然界内部的契机,认识神的思维和宇宙的秩序。’①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形而上学地将人放在同自然相矛盾的位置上，以至人缺乏探索自然奥秘的勇气，被迫接受天主教通过圣经、教堂的神职人员传播的天意的安排。文艺复兴运动解开了套在人们脖子上的绳索，填平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为造成的鸿沟，使人们开始按照自己的意愿，毫无拘束地密切关注周围的世界和大自然中的各种规律。人们为寻找新的大陆出海远航，翻越高山峻岭开拓新的通商线路，进入地下深处寻觅贵重金属、染料以及用于发展生产的各种原料。随着实际经验的不断丰富，他们开始下意识地摒弃传统的偏见，逐渐明白发展意大利城市同认识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关系，中世纪经院哲学人为设置的障碍随之逐一被铲除。晓星满天的黎明和霞光倾斜的黄昏，赋予了画家无尽的创作灵感，在安勃洛乔·罗棱采迪、彼埃罗·德拉·弗朗切斯卡、彼埃罗·德·柯西莫、列奥纳多·达·芬奇、波提切利和乔尔乔涅等画家的笔下，自然再一次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诚然，自然不仅为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源泉，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自然科学也成了许多人研究的课题。

第二节　重要的人文主义者

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绵延三百年之久,内容浩瀚,异彩缤纷。其间,从 14 世纪下半叶至 15 世纪上半叶可谓是最为繁荣的时期，人文主义者如群星灿烂，遍及整个意大利半岛。他们大多属于官僚阶层,自幼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崇敬古代文明,努力从希腊罗

① 《意大利人文主义》,Eugenio Garin ,三联书店 1998年版,第 181 页。

马文化中汲取思想上的养分。他们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全面和谐地发展个人的才智。人文主义越出了学校、少数学者及作家的范围，渗入城市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在文学、艺术、哲学及史学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没有浪漫主义那样旗帜鲜明的文艺纲领，但是它曾经是打击中世纪封建文化的有力武器。从 14 世纪 70 年代开始，由彼特拉克、薄伽丘等播种和耕耘的人文主义的种子绽放出绚丽的花朵，并逐渐发展成广泛的文化思想运动。

一、利诺 · 科卢乔 · 萨鲁达蒂(Lino Coluccio Salutati, 1331—1406)

萨鲁达蒂是人文主义早期著名学者，被视为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他生于托斯卡纳地区比斯托亚城，儿时随家迁居波伦亚，曾在那里学习法律，后成为公证人。他于 1351 年返回故里,并自 1375 年起直至谢世担任佛罗伦萨政府文书长的官职。其间，他积极参与该市及意大利全境的复杂动乱的政治活动。在从事法律和政务的同时，他始终将佛罗伦萨视作自己的故乡，与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友情甚笃，并对古典文化的研究表现出满腔的热忱，后成为佛罗伦萨共和政治和人文主义活动中遐迩闻名的一位中心人物。他之所以能在佛罗伦萨社会中建立起自己牢固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得归于他积极提倡人文主义思想，并注意把人文主义活动和参与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他在 1375 年起任佛罗伦萨文书长之后的 30 余年中,逐渐成为当地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和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即使在进入暮年后，他仍开始学习希腊语。他还是藏书家和“佚失”手稿搜集家，藏有大量古拉丁文著作和中世纪著作。

作为哲学家、政治家和文人，萨鲁达蒂在研究古典作家的思想与写作风格方面所作出的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在 1392 年发现

了西塞罗的信札集《致家人》，以及他自己留给后人的大量公文和外交文书。在他去世后出版的信函集里，既有公函，也有私人信件，都用当时被称为西塞罗体的优雅拉丁文写成，字里行间充满了古典的引喻，后成为意大利文牍通信的典范。难能可贵的是，萨鲁达蒂通过自己的著作，力求把古典学术研究与他所处的现实世界联系起来，充满哲理地抒发了“人运用自由意志可以战胜命运”的观点，强调了作为一位共和政体公民的自豪感和责任感。他用拉丁语写给其他城邦首领的书信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正由于如此，米兰的统治者吉安·格雷亚佐·维斯孔蒂曾夸张地说：萨鲁达蒂的一封信函可抵得上一队长枪手的威力。萨鲁达蒂一生忙于政治及行政事务，但对人文学科有浓厚兴趣。除了信函和文书以外，萨鲁达蒂还撰著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哲学论文，讨论哲学问题，进行文学评论和考证，影响并赞助自己的一些门生。但是人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著作中明显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恰好反映出人文主义者思想上的复杂性，表现了他们犹豫和混乱的心情。在这些论文中，较著名的有：《论世俗与宗教》（De saeculo et religione，1381）、《论命运、幸运和偶然性》（De fato，fortuna et casu，1399）、《论暴君》（De tyramno，1400）等，提出了人应该积极对待人生，强调了隐居的修道院生活的优点，认为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制是最好的统治方式。

萨鲁达蒂运用他自己的权势和地位，在佛罗伦萨有力地推动古典文化的研究，使该城成为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除外，他还培养了莱奥纳尔多·布鲁尼、波乔·勃拉丘利尼、尼可洛·尼可利等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也都把他当作导师、保护人和学习的楷模。他对共和政府政治、经济事务的积极参与，为后来的人文主义者树立了效仿的典范。

二、尼可洛·尼可利(Nicolò Niccoli,1364—1437)

尼可利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殷富的人文主义者，他在搜集、收藏和研究古典手抄本的工作中倾注了巨大的热忱,从而为促进人文主义的学术活动和建立开放性的图书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所收藏的古代艺术品和古希腊、罗马作品手稿，对 15 世纪意大利的古物研究工作曾有很大影响。尼可利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抄录和整理古代手稿,校正其文本,分成章节,编纂目录。佛罗伦萨罗棱佐图书馆所藏珍贵手稿有许多是经他手抄的，其中有卢克莱修的作品和古罗马喜剧作家普拉图斯的 12 部喜剧。除外,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他那微斜的古体草书对斜体字型的发展产生过影响。

尼可利出生在一个殷富的毛纺织业主之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并终生锲而不舍地从事收藏希腊和拉丁语的古典籍作，收集古典时代的许多文物、艺术品和钱币,成为当时遐迩闻名的古籍收藏家。除此之外，他还满怀热情地参加由萨鲁达蒂为首组织的人文主义活动,并与布鲁尼、勃拉丘利尼、曼内蒂、瓦拉等著名人文主义者保持频繁的往来。尼可利在一生中，除了撰写有关如何研究古典手抄本的专著《回忆录》(Commentarium)之外,未曾给后人留下具有价值的作品，但是他的言行活动对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运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倾其所有的私产买书，支持学者去各地抄写和收购古代文献,甚至鼓励其好友、佛罗伦萨僭主柯西莫·美第奇出资买下收藏在德国北部吕贝克修道院里的一部由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撰著的手抄本。尼可利于 1437 年去世时,将他在一生中收藏的 800 多册藏书转卖给柯西莫，并由柯西莫交给圣马克修道院,条件是必须对公众开放,从而为西欧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开创了先例。

三、莱奥纳多 · 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4—1444)

布鲁尼是佛罗伦萨政治家、史学家和重要人文主义者。他不仅是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师，还先后担任过罗马教皇的秘书和佛罗伦萨政府文书长等公职。他因生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并锲而不舍地致力于佛罗伦萨共和政府的工商业与贸易的发展，死后享受国葬的殊荣。

布鲁尼出生在阿雷佐城一个富裕的粮商之家，后去佛罗伦萨潜心研究古典著作，积极参加以萨鲁达蒂为首的人文主义活动，曾用拉丁语翻译过不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的著作，并运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几部重要作品作出精辟的评价和解释。约在 1403—1404 年间，布鲁尼写了《佛罗伦萨城市颂》(Laudatio Florentinae urbis),在书中将佛罗伦萨赞誉为‘古罗马的女儿”，颂扬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度和文化成就，提出保护共和制免遭内外敌对势力破坏的积极主张。布鲁尼认为：财富本无好坏之分，因为它只是道德的基础，一种外在的幸福和力量。他曾致信柯西莫 · 美第奇，称财富的积累是无止境的，认为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可以无限制地通过高利贷和商业活动积累资本。布鲁尼还发展了萨鲁达蒂积极生活的思想，强调指出，人的使命是为了国家荣誉而工作，而且只有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人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能。他甚至提出：人原本是虚弱的，人若想达到完美的程度，只有将自己融合在城市生活中，因为城市不仅是促进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保证，而且还是教育人和培养人理想的场所。布鲁尼指出：就智力和学识而言，妇女绝不比男子逊色，故主张妇女应该同男子一样受到教育。另外，对佛罗伦萨执着的爱，赋予了他为捍卫意大利语在文学创作中的合法地位而战斗的勇气，他将意大利语视作人文主义文学最理想的语言工具，认为它具有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一样的重要性。

从 1415 年起，布鲁尼用拉丁语撰写他的代表作《佛罗伦萨人

民史》（Historiarum florentini populi），这是一部以经过校勘的史料为基础的佛罗伦萨史，书中介绍了佛罗伦萨自建城至 1402 年的历史。在这一部由 12 卷组成的著名史学作品中，布鲁尼继承了古典史学家的传统，以著名人物演讲的形式，把佛罗伦萨的历史写成佛罗伦萨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罗马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打破了中世纪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按神意而活动的结果的陈旧观念，开创了以世俗的政治观点撰写历史的近代史学之风。布鲁尼采用古典作家的文体进行写作，以批判的眼光对收集的大量史料进行比较和查证，最后才找出每一起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他告诫与他同处一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过去，切不可用当代人的观点看待历史。他以可靠的事实根据，指出共和制度在保障公民自由和激发他们爱国热情方面的优越性，强调共和制度和古典文化对城市繁荣发展的贡献。他的史学观独辟蹊径，自成一体，后来在佛罗伦萨另两位著名史学家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光大。

另外，他还用典雅的西塞罗文体的拉丁语翻译了许多希腊古典著作，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普鲁塔克的作品。他用意大利语写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传记，使人们在人文主义运动中对意大利诗歌的欣赏日益加深。

四、夸利诺·达·维罗纳（Quarino da Verona，1374—1460）

夸利诺是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他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使他被誉为西方近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出生在维罗纳一个手工业者之家，早年曾在帕多瓦学习，后去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攻读希腊文，成为当时通晓希腊语的著名意大利学者之一。回国后，他先后在佛罗伦萨、威尼斯、费拉拉等地教书，自 1429 年起应费拉拉统治者埃斯特侯爵之邀任其家庭教师。与此同时，夸利诺在费拉拉还创办了一所驰名西欧的私立学校，以满腔的热忱致力于人文主义

教育，使费拉拉成为古典学术和人文主义教育的著名中心。

难能可贵的是,夸利诺坚持免费给家境贫困的学生授课,有时甚至专门为他们开设晚间课程,悉心辅导他们的学业,全身心地向他们传授有用的文化知识。正是由于夸利诺等人文主义者的不懈努力，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远远超过欧洲任何其他国家。夸利诺在教学中首创了将高尚的道德、渊博的学识与健壮的体魄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的人文主义教育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许多学生后成为意大利各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和各个领域的活动家。夸利诺给后人留下的作品只有一本书信集，里面记载着他与学生以及其他人文主义者通信的内容，有对学生的劝告和指导，也有与好友交流教育和学术问题的心得。夸利诺为普及人文主义教育操劳终生，在当时就被公认为人文主义的教育大师。

夸利诺还是一位古典学者和文艺复兴时期西欧钻研希腊学的先驱之一，曾将一批颇有价值的希腊文手稿带回意大利。他还为不少拉丁文作家的著作编辑新版本,并翻译古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博和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普鲁塔克的著作。

五、波乔 · 勃拉丘利尼(Poggio Bracciolini，1380—1459)

勃拉丘利尼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拉丁语散文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佛罗伦萨附近泰拉诺瓦小城一个破产的药商之家，早年参加萨鲁达蒂领导的人文主义团体。1403 年起他担任罗马教皇的秘书,其间,他努力搜集古典拉丁作家的文稿以及古罗马铭刻。勃拉丘利尼在康斯坦察参加主教会议期间（1414—1418 年),曾有机会去意大利各地和西欧诸国搜集古典文献,发现了古罗马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讲词、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拉丁诗人斯塔提乌斯的抒情诗集《诗草集》、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等颇具价值的古典作品,有力地推动了人

文主义者对古典人文科学的研究。1418 至 1422 年间，勃拉丘利尼侨居英国，回罗马后一直担任佛罗伦萨共和政府文书长，其间还撰写了《佛罗伦萨史，1350—1454 年》（Historia Florentina），书中高度评价佛罗伦萨的政治和文化成就。勃拉丘利尼还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在佛罗伦萨抄录手稿时，他以卡罗林式小写字体为基础，创制了一种圆润而工整的字体，经过一代抄录人员的修饰改进，为新兴的印刷艺术提供了‘罗马式’字体的原型。

勃拉丘利尼长期为罗马教廷和佛罗伦萨共和政府服务，在此期间撰写了许多对话体散文和有关伦理道德方面的论文，抨击了教会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揭露了贵族的专横和人性的复杂，文笔大胆、犀利，字里行间蕴含着他内心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忧虑和不安。1428 至 1429 年间，勃拉丘利尼以对话体的形式写了《论贪婪》（De avaritia），批评贪婪者一味追求财富的卑劣行为，认为财富原本属于共和政府，是国家繁荣的基础。在 1440 年写成的另一篇题为《论不幸的君主》（De infelicitate principum）哲学论文中，他评论了人生与历史的无常，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无功加冕提出异议。勃拉丘利尼在 1452 年还写了一本《滑稽故事集》（Liber facetiarum），为当时的社会生活涂上一层浓浓的人文主义色彩，典雅的文风，尖锐的批评、嘲讽教士的奇闻、猥琐的笑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反映出他生活中放荡、玩世不恭的一面。除外，勃拉丘利尼还写有内容极其广泛、涉及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信札》（Epistole），所用的拉丁语与当时佛罗伦萨地区的日常口语颇为相似，格调自然、流畅，被认为是 15 世纪最优秀的拉丁语信札。他的作品语言明快，善于用人物对话阐述道德概念，与同时代其他作家迥然有别。

六、嘉诺佐 · 曼内蒂(Giannozzo Manetti，1396—1459)

曼内蒂是佛罗伦萨著名政治家和人文主义者。他出身富商之

家,早年便开始发奋学习人文科学,在短时间内掌握了许多学科的知识，为后来成为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对《圣经》作深入的研究,他还刻苦攻读希伯来语,曾翻译《圣经》中《新约》与《旧约》的部分篇章。1437 至 1452 年间,曼内蒂积极参与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担任过一系列的国家行政职务,曾出使罗马、威尼斯和那不勒斯。1454 年他与柯西莫·美第奇发生冲突后,被迫离开佛罗伦萨,先后担任教皇尼古拉五世和那不勒斯国王阿方索·阿拉贡的私人秘书,1459 年殁于那不勒斯。

曼内蒂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历史著作、哲学论文、神学论说，以及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传记。其中,他于 1432 年撰写的哲学论文《论人的尊严与卓越》（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 hominis）富有典型的人文主义精神，在颂扬人的创造力的同时，抨击了中世纪盛行的陈旧观念。曼内蒂的这篇著名论文，是针对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论述“人的渺小和尘世生活充满罪恶与痛苦”一文而作的,他在文中高度赞扬了人在生产、商业以及文艺等领域中无限的创造力,认为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人已经战胜了自己永恒的贫困和无能。曼内蒂还充满激情地将人比作一个伟大的创造者,认为人不仅具有追求快乐的天性,而且完全有能力创造世上一切美好的事物。曼内蒂指出“人不应该消极地期待上苍的恩赐,他应该为追求自身的理想而斗争,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在于行动起来，认识世界。所谓行动起来指的是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一心为共和政府效劳。”① 这篇论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宗教改革期间曾多次印行,被罗马教廷一度列为禁书。

曼内蒂还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和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佛罗伦萨是民主的典范。他在其挚友布鲁尼葬礼上的演说中，高度评价了布鲁尼捍卫共和政体、推进人文主义文化发展的

① 引自曼内蒂 1432 年撰写的哲学论文《论人的尊严和卓越》。

成就。

七、罗楞佐 ·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

瓦拉是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语言学家、哲学家、保守思想的批判家、杰出的雄辩家，以及人文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古典作品校勘学家，他的著作涉及伦理学、逻辑学、历史学和神学等领域。他 1407 年生于罗马一个律师家庭，早年曾在著名人文学者维多利诺 · 达 · 费尔特雷和布鲁尼门下攻读拉丁文、古希腊文和古典学术。 1429 年他离开罗马,1430 至 1433 年间在帕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后来,他辗转于米兰、热那亚、佛罗伦萨之间。1435 年起瓦拉在那不勒斯国王阿尔丰沙一世宫廷服务，参与那不勒斯国王与罗马教皇的政争。1448 年他返回罗马定居，在教授修辞学的同时担任教皇秘书。瓦拉是意大利 15 世纪最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文主义学者,他才思敏捷,生性善辩,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陈旧观念,当他挑起有关古罗马修辞学家昆体良和演说家西塞罗谁更优秀的论战时,年仅 20 岁。

瓦拉热衷于对伦理道德的研究，他于 1431 年撰著的论文《论快乐》(De voluptate) ，以一位伊壁鸠鲁派学者和一位基督教徒对话的形式，就人生快乐和人生目的等问题进行探讨，提倡伊壁鸠鲁派的享乐主义哲学，批评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哲学，认为追求享乐和幸福乃人的天性，而人之善正在于追求现世的快乐。瓦拉反对天主教会宣扬的经院哲学和禁欲主义，他在 1439 年写的对话体论文《论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中,反对宿命论,认为人应该有自由意志，论证了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先知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并指出神学家们为解决这一矛盾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1440 年瓦拉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论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stantini donatione)，对罗马教皇据以统治西欧的“君士坦丁赠礼”伪造文件进

行了精密的考证，证实作为教皇有权在政治上统治意大利和西欧之依据的《君士坦丁赠礼》乃一赝品,因为它所用的拉丁文,不是公元 4 世纪初君士坦丁时代的拉丁文，而是公元 8 世纪的拉丁文。该书 1517 年用德文首次出版，同年路德在维登堡宣布 95 条纲领，批判教廷政策。瓦拉的这个重要发现，动摇了罗马教皇对西欧实行统治的法律依据，为此受到异教裁判所的追捕，后由于阿尔丰沙五世的庇护，才得以幸免于难。为此，在路德时代，瓦拉被奉为宗教改革的先驱。

除外,瓦拉还凭借自己丰富的语言和历史知识,对《圣经》的注释科学地进行了批判性的研究，指出罗马教会的拉丁文本《圣经》译注中的诸多错误，认为这是因为译者希腊语功底不深所致。另外,瓦拉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摩西五经》和《福音书》均是历史人物所作而非神启,并写了对希腊文本《新约》的译注,为以后的西欧人文主义者进一步研究《圣经》与教会文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1442 年,瓦拉写了《论僧侣的誓言》（De professione religiosorum）一文，反对教士清贫、守贞的生活，认为教士不该只是以向上帝发誓的形式表示对上帝的虔诚，主张人们为合理地获取和支配财富，获得爱情和婚姻而努力奋斗。 1440 年发表的《辩证的论辩》（Dialecticae disputationes ）勇敢地对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哲学的逻辑理论进行批判，并把亚里士多德的九个范畴简化为 3 个,即实体、属性和行动，从而与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相对应；这本书既是修辞学家对逻辑学的批判，也是把哲学问题简化为语言学问题的一种尝试。他于 1435 至 1444 年间写成的《优雅的拉丁文》（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是中世纪第一部论述拉丁语语法和文体的著作，系统地总结了拉丁文的语法与修辞，指出了优雅的拉丁文最初时的渊博和纯洁，将人文主义者对西塞罗的崇拜推向高峰，后成为研习拉丁文的一部重要著作，在欧洲学校中极为流行。

八、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

费奇诺是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者、哲学家、神学家和语言学家。费奇诺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费利奈城，早年在佛罗伦萨和比萨学习语法和修辞学，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医学，并开始翻译柏拉图等古希腊哲学家的原著。他深得佛罗伦萨僭主柯西莫·美第奇的器重和保护,自 1474 年起在柯西莫赠送给他的一所位于佛罗伦萨郊区的房子里创建了柏拉图学园，一批佛罗伦萨本地和外来的人文学者，经常在那里聚集，对柏拉图和其他古代哲学家的著作进行学习、研究和讨论。除此之外，由费奇诺主持的柏拉图学园，还同意大利各地以及西欧诸国的学者保持着频繁的接触，无形中为人文主义思想在意大利和一些西欧国家中的传播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该学园拥有大量希腊手抄本，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学术中心之一。费奇诺是把柏拉图著作全部译成一种西方语言的第一人,他在 1462 至 1468 年间将柏拉图所有的著作译成了拉丁语，并逐一加以解释和评注。1492 年,他又将古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创始人普罗提诺的许多哲学著作译成拉丁语，使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得以完整地被理解和传播。他对柏拉图和其他古典希腊作家的作品的翻译和注释，促成了佛罗伦萨柏拉图哲学的复兴，影响欧洲哲学思想达两个世纪之久。

费奇诺在后半生写有好几部哲学著作，较著名的有《论基督教》(De cristiana religione，1474)、《柏拉图神学中有关灵魂不朽说的论述》(Theologia platonica de immortalitate animorum，1482)和《论生活》(De vita，1489)等，注意将基督教思想和柏拉图主义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抨击亚里士多德派的自然主义，嘲讽没有能力发现隐匿在古代寓言背后的真理的平庸诗人。费奇诺在其著名论著《柏拉图神学中有关灵魂不朽说的论述》中，将人的理性灵魂誉作联系永恒世界与现世生活、精神与物质、静止与运动之间的必然纽带，从而引申出人有无限的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论点，认为人通

过知识、智慧和自由意志，在现世生活中就能达到与神合一的境地。费奇诺指出：柏拉图的思想是最崇高的精神表现之一，只有基督教的真理能超过它；柏拉图的和基督教的关于爱的概念可以并行不悖，人类的爱和友谊的最高形式就是最后以人对上帝的爱为基础的神交。他的人文主义哲学思想以及其柏拉图式恋爱的理论，对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反映了宗教、哲学和科学领域即将发生大变革前夕人文主义者的彷徨与探索。他认为人天生倾向于宗教，这使他同低级动物有所区别，所有的宗教都包含一定的真理；他的这种学说后促成了 17 世纪自然神论思想。费奇诺用其后半生致力于柏拉图著作和柏拉图学派著作的翻译和解释工作，试图将他们的思想更加密切地同基督教神学相结合,故被誉为‘天主教的柏拉图”。

九、毕柯·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

毕柯是意大利著名人文主义学者和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生于意大利北部莫台纳城附近米兰多拉一位伯爵之家，早年在费拉拉和帕多瓦学习拉丁文、古希腊文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后定居佛罗伦萨，成为一位著名的柏拉图主义学者。毕柯才智超群，加之其学习勤奋的秉性,在 20 岁时就已被公认为是当时学识渊博的学者之一。他到过巴黎，又长期生活在人文主义的发祥地佛罗伦萨，在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之下，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佛罗伦萨，毕柯与费奇诺等人文主义者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开始对柏拉图进行深刻的研究。

23 岁那年，毕柯在罗马公布了他的‘900 论题”,引用古希腊、古罗马、犹太、阿拉伯、早期基督教、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的观点,归纳出 900 个哲学与神学命题，邀请各地学者来罗马参加公开辩论。他的论点引起了罗马教廷的震惊和不满，尽管毕柯为此

写有《辩解词》一文,但依旧被教廷判为异端而入狱,后因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美第奇等人的调停才获释。之后，在宗教作家、修道士萨沃纳罗拉的影响下，他加入了多明我修会，支持该修会提出的反对教会腐败和贵族专权的主张。

毕柯的主要作品《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讲》(Oratio de hominis dignitate,1486）是文艺复兴时期一部颇有特色的著作，反映出作者善于吸收其他哲学的精华，并把它们综合到自己的作品中。在这部著作中，毕柯大胆地提出了人不靠天命和人应该进行自我塑造的观点，认为人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选择和决定自身的命运，发展并战胜自我。毕柯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了人文主义者有关人的论述，认为人可以堕落为野兽，也可以上升为神明，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后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宣言书，与意大利 16 世纪的哲学思想如出一辙。毕柯关于人的尊严与地位的论述，对西欧的思想文化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毕柯接触希伯来神秘哲学之后，就成为以神秘哲学的理论拥护基督教神学的第一位基督教学者。除外，毕柯还写有《反对占星术的辩论》（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 divinatricem,1494），认为星星只不过是具有光和热的物体，它不可能左右人的命运，而人却可以通过观察星象，认识自然的奥秘，并在一定的程度上控制自然。尽管这篇论文是宗教的而不是科学的，但它却对 17 世纪德国著名天文学家开普勒有很大的影响。

十、乔万尼·庞达诺（Giovanni Pontano,1429—1503)

庞达诺是意大利杰出的人文主义者、散文家和拉丁语诗人,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翁布里亚地区契雷托城，早年曾在佩鲁贾学习语言和文学。1448 年起，庞达诺开始进入那不勒斯王国阿拉贡王朝阿尔方索五世的宫廷任顾问和军事大臣，1486 年后任首相,成绩斐然，在那不勒斯王国的政治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庞达诺是

一位善于奉行纵横捭阖外交政策的政治家，1495 年当法国军队入侵那不勒斯时，他以非凡的政治才干巧妙地掩息了这一起军事纠纷。与此同时，庞达诺还是那不勒斯人文主义团体中的中心人物，并自 1471 年起成为庞达诺学园的领导者。

庞达诺一生著述富宏，写有许多涉及占星学、伦理道德和文学等内容的论文，表现了对基督教世界观、人生观和教义的怀疑，也反映了人文主义者在摆脱中世纪人生观、世界观方面进行探索的努力。他的作品都用拉丁语写成，其中包括一部历史著作《那不勒斯战记》(De bello Neapolitano）、两本哲学论著《论深谋远虑》（De prudentia)和《论运气》（De fortuna）、一篇占星学诗歌《乌拉尼亚》（L'Urania)。另外，他还写有许多抒情诗，其中的主要作品《欢愉》（La Lepidina），生动地描绘了河神与仙女的婚礼，赞颂了那不勒斯绮丽的景色。诗集《婚姻之爱》（De amore coniugali)描绘家庭生活的悲欢。但是，纵观庞达诺一生中的文学创作，更具有影响力的还是他的拉丁语诗篇。他的诗歌内容丰富多变，语言生动诙谐，人物对话自然流畅，善于描写细腻的感情：失去爱妻和爱子的切肤之痛；宁静、恬适的乡间田园生活；进入暮年后心中的孤独和凄楚，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幅反映 15 世纪那不勒斯生活与文化的现实主义画卷，在 15 世纪的拉丁语作品中实为罕见，故被人称为仅次于波利齐亚诺的人文主义优秀拉丁语诗人。

十一、马泰奥·帕尔米埃利(Matteo Palmieri，1406—1475)

帕尔米埃利是意大利 15 世纪的一位人文主义作家和政治家，生于佛罗伦萨一户殷富的商人家庭，早年就开始接受人文主义教育，与佛罗伦萨的一些著名人文主义学者感情甚笃。他不仅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俗语散文作家和诗人，还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动家。在他长达 40 余年的政治生涯中，曾先后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其完美的品德和超人的智慧，为他赢得了佛罗伦萨“卓越公民”的

荣誉。

帕尔米埃利用拉丁文和俗语写过许多论文和诗篇，在他的作品中，尘世间人们的生活几乎成了一幕戏剧中的场景：上帝和天使的形象时时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而高耸入云的苍穹在人的理性思维面前不得不弯下腰来，天与地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帕尔米埃利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于 1431—1438 年间写的俗语对话体论文《论公民生活》(Della vita civile)，他从早年的教育、市民应有的社会公德、个人与社会的利益等方面论述了人成长的过程，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本人对家庭和国家的一片赤诚之爱。在这一部由 4 卷组成的对话体作品中，帕尔米埃利提出：人的存在依赖于其社会性，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荣誉组成社会，而过高尚的生活必须具有以正当的手段建立起来的坚实经济基础。他认为，从整体来说，人类的生命是永恒的，因此人人都企盼获得永恒的荣耀，希望子孙后代健康地成长。另外，帕尔米埃利还就人的教育、个人、家庭，以及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展开讨论，认为人自幼就应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应将个人的利益置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之下，为祖国的光荣和人民的公共福利奉献自己的一切。《论公民生活》是一部结构复杂、严谨的作品，其明显的人文主义观点引起了罗马教廷的不满，以至这部作品一直到作者死后的 1529 年方才公诸于世。

帕尔米埃利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他于 1464 年写成的《生命之城》(La città di vita)，在这一部以人的灵魂为主题、用三行诗押韵法写成的叙事长诗中，作者指出社会不公正的原因在于私有财产的存在，充满神学和哲学理论。就艺术风格而言，长诗仿效了但丁的不朽巨著《神曲》，诗句中蕴含着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观点。

十二、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

列奥纳多是意大利 15 世纪著名的美术家、自然科学家、工程

师、哲学家和散文作家,被公认为是一位跨时代的杰出奇才。他不仅广泛研究同绘画有关的光学、力学、地质学、生物学、人体解剖学及数学等多种学科,而且还通晓建筑术,设计过包括飞行器在内的多种机械,在其一生中享有的无以伦比的声誉,经过历史批评的过滤和净化，至今依然光彩夺目。他那广博的学识是一种精神力量，是他自己独有的力量,促使他无穷无尽地渴求知识,引导他的思想和行为,成了他以超常的智慧、非凡的观察能力研究人类创造和自然造物中的重大课题的动力。

列奥纳多生于佛罗伦萨附近的芬奇镇，是一位富有的佛罗伦萨公证人与酒店侍女的私生子，少年时代在家乡受过一位建筑师的启蒙教育，当时已显示出过人的智慧。1468 年,全家迁居佛罗伦萨,他开始在一位当时著名的雕塑家兼画家的工场里学艺,这为他日后成为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绘画奇才和多种科技研究专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列奥纳多很早就显露出对绘画和雕塑的特殊爱好,并对机械工艺技术、解剖学怀有浓厚的兴趣。1482 年起,列奥纳多开始为米兰大公效命，在这之后的 17 年中,他的才智和他的科学思想得到了完全的展现。与此同时，列奥纳多为自己设立了无穷无尽的目标，这使他的同时代的人感到敬畏和叹服。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和旷世奇才,一生都在同时间赛跑,他的不少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均由于时间的限制而未能完成。所以,如果对他的毕生事业作一个整体概括的话,人们总要称之为一部气势磅礴的‘未完成的交响曲’。由于世事的变迁,1513 年年底,列奥纳多在其学生和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前往罗马求职。他在这座‘永恒之城’前后待了 3 年,但他深感生活的孤寂,且始终遭人冷落,留存后世的大量饱含苦涩的书简反映了这位大师暮年的失望心情。 1516 年末,他永远地告别了意大利,接受年轻的国王弗兰西斯一世的邀请去法国工作，之后在卢瓦尔河畔的一所小寓所中度过了一生中最后 3 年时光。

列奥纳多通晓语言、自然科学、数学、哲学、建筑和历史，他对后人的影响主要不在文学方面，而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在绘画方面，他把科学知识和艺术想像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如驰誉全球的肖像画《蒙娜·丽莎》（La Gioconda ）生动地表现了人物内心的喜悦，壁画《最后的晚餐》（L'Ultima Cena） 淋漓尽致地勾画出戏剧性冲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另外，他还有大量的草图速写及有关自然科学、工程等方面的手稿存世，表达了"人们渴望知识"的自然主义思想。在写作风格方面，他独辟蹊径，其文笔不同于任何流派：他反对强调古典作品的权威作用，摒弃循规蹈矩的创作手法，主张自由、舒畅地表达思想。他的重要著作《绘画论》（Trattato di pittura ）把解剖、透视、明暗和构图等零碎知识整理成系统的理论，对后来欧洲绘画艺术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接近唯物主义，认为人们必须"从经验出发，并通过经验去探索原因"。[①] 他提出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在当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直至 17 世纪，他的理论才被伽利略运用在科学试验中。列奥纳多十分推崇富有创新思想的人，对人云亦云的文学创作态度予以猛烈的抨击。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他的思想得不到推广和发扬，但是他那勇于探索自然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学风，无疑是后人学习的楷模。

在人文主义文化的发展史上，列奥纳多还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散文作家。他强调观察和科学试验的重要性，把那些步人后尘的平庸作家贬低成"背诵者和吹鼓手"。尽管他留给后人的手稿绝大部分是未加整理的文字材料，但是他的散文体及其独特的创作风格，仍为科学人文主义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① 《列奥纳多·达·芬奇著作选集》第 1 卷，1935 年俄文版，第 52 页。

十三、博纳洛蒂 · 米开朗琪罗（Buonarotti Michelangelo, 1475—1564）

米开朗琪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伟大的雕塑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出身于佛罗伦萨附近卡普里斯镇一户没落的贵族家庭，自幼酷爱艺术，1488 年一度师从佛罗伦萨画家基尔兰达约，不久寄居罗棱佐 · 美第奇宫内，研究美第奇家族所收藏的丰富艺术品。他通过学习古典艺术作品和文学、哲学著作，及与费奇诺等人文主义者的交往，很早就显示出超人的才华和人文主义思想倾向。1493 年，著名的宗教“叛逆者”修道士萨伏纳罗拉被教皇逮捕后处以火刑，这使米开朗琪罗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撼，1498—1500 年间创作的组雕《哀悼基督》(Pietà) 寄托了他对那位宗教改革者的哀思，而画中抱着尸体悲哀的、年轻美丽的圣母则象征着意大利祖国。

1494 年，法国军队侵犯意大利，包围了佛罗伦萨，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打退了侵略者，并建立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共和国。1501 年，米开朗琪罗回到佛罗伦萨，从此时到 1504 年，他创作了《大卫像》(David)，这尊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雕像之一，以完美的青年男性人体表达了佛罗伦萨公民保卫自由、反抗贵族专权和外来侵略的意志与决心，体现了人能改造世界的人文主义思想特点，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裸体人像雕塑的顶峰。1505 年，米开朗琪罗应教皇朱利乌斯二世的敦聘去罗马工作，这期间，米开朗琪罗不仅为教皇设计陵墓，而且还完成了不少壁画和雕像的创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摩西像》(Mosè)、根据《圣经 · 创世记》的神话所作的一组壁画《最后的审判》（Giudizio universale）等。如果说米开朗琪罗对《大卫像》寄予的是捍卫祖国的坚定信念，那么他在刻画具有不可摧毁的威力的人物形象《摩西像》上，则是对叛卖祖国的丑类们的无比愤怒，隐含着作者对人的尊严不容亵渎的人文主义精神。米开朗琪罗用了近 6 年的时间完成了气势磅礴的多人物构图《最

后的审判》，绘出了数以百计的等身大小的裸体群像，体现了他作为画家的大无畏艺术魅力，以及正义惩罚邪恶的人文主义思想，尤其是壁画中央的那个耶稣，简直是一个意大利人民英雄的形象。

晚年，米开朗琪罗还从事过许多建筑的设计工作，其中尤以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巨大穹顶最为著名，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的建筑设计之一，体现了他在艺术创造中对美的无限追求。为了完成西斯廷教堂那 800 平方米的大屋顶上的屋顶画，米开朗琪罗在脚手架上仰面朝天整整画了 5 年，这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奇迹，这是人类生命之火燃烧的光芒，是人与命运殊死决斗并终于取得胜利的凯歌。米开朗琪罗不但被公为是文艺复兴发展至最后阶段达到顶峰的艺术大师，也是人文主义理想与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悲剧式搏斗的英雄。

第三节　闪烁着人文主义光辉的作家和作品

在 15 世纪末叶至 16 世纪初的数十年中，通俗语又一次重返意大利文坛，甚至一些文学素养精深的作家和诗人也开始采用通俗语著书、写诗，这反映了广大民众要求掌握文化的心声。尽管当时有不少人曾在学校里学过一点拉丁语，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书本上的拉丁语同他们日常用语之间的差别已判若鸿沟，而真正有能力欣赏拉丁语文学作品的人为数甚少。另外，一些封建公国的僭主极力奉行向外扩张的政策，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人生观日益深入人心，这些都是当时文化普及的积极因素。拉丁语的回潮和古罗马文化的重新发现，标志着人文主义新文学运动最初阶段的特征，人们冲破中世纪神学思想的封锁，开始对大自然和人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正由于如此，随着新文学运动的益臻成熟，通俗语很自然又得到广泛的运用。由少数通晓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知识分子垄断文坛的局面不可能长期

保持下去，因为新的统治阶级迫切需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抒发自己的感情。

从 15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上拉丁语和通俗语文学作品并行不悖,交相辉映,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譬如 波利齐亚诺是当时一位蜚声文坛的通俗语作家，但他同时又擅长运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赋诗；15 世纪优秀文学作品《阿卡狄亚》的作者桑纳扎罗曾用拉丁语著有不少诗作；遐迩闻名的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巴第斯塔 · 阿尔贝蒂的拉丁语和通俗语诗篇，均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这类反映资产阶级情趣爱好的文学作品因袭古人的创作风格,在思想内容方面同现实生活关系甚微,作者只是在现代题材的外面套上一件色彩绚丽的古装而已。这里不妨举一例说明：1475 年 1 月 28 日，佛罗伦萨举行盛况空前的马上比武，宫廷诗人波利齐亚诺从现实生活中撷材，赋诗叙述佛罗伦萨僭主朱利亚诺 · 美第奇马上比武的精彩场面，但诗人给诗歌的意境涂上了一层神奇的梦幻色彩，有意识地将读者的思路带回到维纳斯和丘比特的古代神话世界中去。所以，人文主义文学具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即使是从民间撷取的素材,也每每被写成迎合少数社会上层人士情趣爱好的作品。

人文主义通俗语文学是在意大利处于历史转折的重要阶段中发展起来的。由于世事的重大变迁,意大利一度陷于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加之人称‘ 意大利政治平衡仪指针 ’的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 · 美第奇在 1492 年与世长辞，半岛上从此出现各封建公国分裂割据的局面。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犯意大利，爆发了法国与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统治权的战争，这不仅遏止了意大利社会的发展，而且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哥伦布在 15 世纪末叶发现了美洲大陆，又加上东西方贸易因土耳其势力的扩张而陷于停滞状态,商运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意大利从此失去昔日地理上的绝对优势。另则，由马丁 · 路德掀起的改革天主教的

运动震撼整个欧洲，作为全世界天主教中心的罗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每况愈下。面对这风雨飘摇的政治形势，知识分子忧心忡忡，趑趄不前，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把自己禁锢在文学创作这一似乎与世无争的伊甸园中，采取和光同尘、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正因为如此，桑纳扎罗的《阿卡狄亚》又一次在人们心头燃起了追求古希腊田园牧歌式淳朴生活的热望，使整个欧洲为之神往。如出一辙，波利齐亚诺在诗中刻意描绘黄金时代的美好生活；博亚尔多在长诗《热恋的奥兰多》中极力崇尚华而不实的美感及轻浮的人生乐趣。虽然他们都在贵族的宫廷中供职，在政治上又相当活跃，但他们愤世嫉俗，将满心的希冀和瑰丽的梦想全部倾注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之中。

一、莱昂·巴第斯塔·阿尔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

阿尔贝蒂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热那亚一户商人之家，其祖辈原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后因与佛罗伦萨梳毛工人暴动一事有牵连而被迫迁居帕多瓦和波伦亚等地。在帕多瓦，他开始接受拉丁文经典教育，20 岁便写出拉丁语喜剧。1428 年获波伦亚大学法律学位之后，他却选择了“文学”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1431 年他来到罗马教廷担任秘书，此后的活动始终与教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陪同教皇外出巡视的旅途中，他努力搜集各种古籍，从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费拉拉的埃斯特宫廷作客卿时，他又在建筑艺术方面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他所设计的仿古式建筑至今仍矗立在费拉拉城内。1447 年他任教皇尼古拉五世的建筑顾问，两人共同主持了圣彼得大教堂和梵蒂冈教皇宫的重建以及其他宏大的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建筑工程。15 世纪 50 至 60 年代，他周游意大利各地，并写出了第一部意大利语法。1464 年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学术研究和建筑设计之中。

1472 年,病殁于罗马。

阿尔贝蒂不仅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文主义学者和通俗语作家，同时还是一位著名的建筑师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并精于自然科学、绘画、戏剧、雕塑与体育,所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的作者、著名瑞士学者布克哈特称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才智超人的全才。阿尔贝蒂为利米尼、佛罗伦萨、曼图瓦和费拉拉等地设计的一系列建筑物,标志着意大利建筑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阿尔贝蒂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刻苦学习，认为人不应贪图安逸的生活,人的幸福正在于不断地从事有益的工作。他提出,人生宛如一条水流湍急的河川,而死神正等在河畔,以便将所有在河道中搁浅的人带入冥府。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具有学习和积极行动的天赋，能够与命运抗争并战胜它。在这一积极向上的人生观的指导下,阿尔贝蒂在他近 70 年的人生中，坚持不懈地一直在努力工作和学习,涉足领域甚广,无怪他的同龄人将他誉为‘无所不通的奇才’。在文学创作方面,阿尔贝蒂用拉丁语和通俗语写成的作品体裁不一,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数量可观,歌咏了人对自由的渴望、对命运的抗争,以及对世俗幸福的追求。年轻时,他以顽强的毅力写了拉丁喜剧《醉心功名的人》(Il philodoxeos)和对话体作品若干 进入暮年后,他用通俗语写有 3 卷论述绘画的书,10 卷有关建筑理论方面的书以及 3 本论述家庭问题的书。阿尔贝蒂撰著的拉丁语和通俗语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文主义的世俗世界观，富有新兴资产阶级的萌芽思想。他主张人应该为了声望和荣誉而追求财富,认为商业与信贷是正当的金融活动 他颂扬意大利的统一,歌咏古罗马的光荣传统,指出人人都应该有满腔的爱国热忱。人乃宇宙的中心以及人必然取胜的信念，犹如一条红线自始至终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1432 年写于罗马的《论家庭》(Della famiglia)是阿尔贝蒂的一部代表作。他采用当地的方

言，依据古典范文将古代哲人，首先是西塞罗和塞内加教诲的为人处世之道，糅合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如何看待命运无常；如何应付得志与失意的机遇；如何处理家政、对待朋友与家人；以及有关教育和对公众利益应负的义务。虽是古人之见，但由阿尔贝蒂娓娓道来，参以他的人生历练，读来使人耳目一新。在文中，他还提出了家庭是社会生活中心的论点，阐述了“勤俭节约”的美德，颂扬了建立在资产阶级家庭道德观念基础上的婚姻关系。他还强调指出，家庭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表达了作者渴望意大利早日统一的政治理想。

1441 年，阿尔贝蒂在佛罗伦萨发动并组织了以歌颂友谊为主题的通俗语赛诗会，获胜者可荣膺“桂冠诗人”的称号。在佛罗伦萨僭主的热情赞助下,赛诗活动盛况空前,成绩卓著,标志着通俗语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起点。阿尔贝蒂认为：作家或诗人应该力图让更多的人读懂并领悟自己的作品，而惟独通俗语才能起到沟通思想的作用。他还指出：现代诗人的拉丁语诗篇，无论在语言还是在写作风格方面，都已达到或超过古人，他们应该尽力提高通俗语作品的艺术水平，使其益臻完美。阿尔贝蒂为提高通俗语在文学上的地位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统治阶级出于本身的政治利益，也热衷于通俗语的推广和普及。阿尔贝蒂借鉴古典散文作家华丽得体的写作风格，使自己的通俗语作品富有古典美的艺术风采，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阿尔贝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文化生活的先行者，其渊博的学识及受人景仰之程度不亚于半个世纪后的列奥纳多·达·芬奇。他的学识与成就既是多方面的又是统一的。列奥纳多的天才使他超越了阿尔贝蒂，因为他见识得更多，观察得也更深刻；而阿尔贝蒂则达到了思想上和生活上的全面性，而这正是实践文艺复兴的理想所必需的。

二、路易其·浦尔契(Luigi Pulci,1432—1484)

浦尔契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虽则自小因家庭贫寒而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化教育，但由于其家庭历来崇尚文化，加之他自幼喜爱文学,热衷于收集民间谚语,故文学素养渊深。他对人间的甘苦感悟颇深,对他而言,人生就宛如"充满甜酸苦辣、五味俱全的杂烩",这致使他生性怪僻,写作语言谐谑,字里行间每每隐含着辛辣的嘲讽。1460 年左右，他开始在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美第奇宫廷内供职,深得其家族的赏识,后成了罗棱佐家中的座上宾。他多年在美第奇家族，尤其是在罗棱佐的庇护下生活。罗棱佐先后将他介绍给他身边的诗人、艺术家,当权后又委以他不同的外交使命。但由于贫穷和困苦，浦尔契在 40 岁时不得不在北方一位雇佣兵首领手下效劳。 1470 年后,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浦尔契在征得罗棱佐的同意后,去那不勒斯等地任职。晚年,浦尔契离开佛罗伦萨迁居意大利北方，辗转于波伦亚、米兰和威尼斯之间。他把罗棱佐对他的友情和信赖视作一生中莫大的欣慰和快乐，两人始终保持着亲密友好的关系。1484 年,浦尔契病故于帕多瓦,作为异教徒被葬在客地。

浦尔契一生著述甚丰,作品均用意大利语写成,代表作为八行诗传奇长诗《巨人莫尔甘特》(Il Morgante)。1460 — 1470 年间，在罗棱佐·美第奇母亲的鼓励和劝说下，浦尔契开始创作这部作品,1478 年初版时,全诗长 23 首;1483 年重版时,他又写了 5 首,共 28 首,并改名为《巨人莫尔甘特》。作者仿照游吟诗人的写作风格，从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当政时期的宫廷轶事中撷取素材,将《巨人莫尔甘特》写成章回小说式传奇长诗。长诗概要如下：查理大帝的贴身卫士奥兰多因奸臣嘉诺的诬告，被国王下令逐出宫廷 奥兰多在一座修道院里杀死两名欺压修士的巨人,第三个巨人莫尔甘特被擒后皈依了天主教,并决定追随奥兰多,后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嘉诺策划叛乱,奥兰多闻讯返回法国,为保卫祖

国而英勇战死在疆场，查理大帝这才犹如睡梦初醒，深为自己当初轻信谗言而嗟悔；最后嘉诺被分肢处死，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查理大帝也安详地死去。

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浦尔契吸取民间诗歌的特色，构思奇崛，意象新颖，在长诗中虚构了一系列扑朔迷离的情节；在语言方面，他巧妙地揉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俚语，使全诗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一部充满骑士色彩的叙事诗中，浦尔契时而以嘲讽幽默的笔调提出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时而满腔热忱地对那些不畏艰险、聪明精悍的绿林好汉表示无限的同情，塑造的人物形象生动，个性突出，表达了作者深挚的感情和对生活的痛切感受。《巨人莫尔甘特》是一部描绘中世纪骑士生活的史诗，作者以幽默、诙谐的笔调塑造了不少滑稽的人物形象，描绘了许多令人发笑的场面，但它赞美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和人探索自然、勇敢冒险的精神，具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色彩。《巨人莫尔甘特》继承了优秀纯朴的民间文学传统，不失为人文主义时期一部重要的叙事长诗。

三、马德奥 ·博亚尔多(Matteo Boiardo，1441—1494)

费拉拉(埃斯特家族宫廷的所在地)是 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中心，那里的通俗语英雄史诗和传奇诗在当时颇有影响，并为确立通俗语在文学上的地位和尊严起过积极的作用。

博亚尔多是费拉拉人文主义文学的一位杰出代表，著名的骑士诗诗人。他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斯堪德亚诺城一个贵族世家，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酷爱文学,曾在埃斯特宫廷内任职。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犯意大利,诗人毅然放下笔杆,停止长诗《热恋中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的写作,拿起武器同法军英勇战斗,同年不幸阵亡。

博亚尔多写有数量甚多反映宫廷生活的拉丁语和通俗语诗

篇、牧歌及抒情诗,其中,他的通俗语抒情诗集《歌集》(Amorum libri tres)是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歌集》又名《三部爱情书》,主要抒发诗人1469至1471年间对安东尼娅·卡普拉拉缱绻的爱恋,由3个部分组成:第1部分讲述诗人萌生爱意以及得知恋人有意接受他爱情时的喜悦;第2部分刻画诗人遭抛弃后心中的痛苦和妒火;第3部分描绘诗人心中产生的转瞬即逝的一线希望,以及憧憬重新燃起爱情之火时的欢愉,最后以内心反省和祈祷上苍的诗句结束全诗。《歌集》的语言富有彼特拉克抒情诗的旋律和古典诗的韵味,笔调清新,感情细腻,被称为意大利15世纪最为优秀的抒情诗集之一。博亚尔多善于借景物烘托诗歌的意境,以景抒情,讴歌大自然,抒发失意后的惆怅,与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彼特拉克诗句中的忧伤、痛苦、失意和怅惘反映了新旧时代交替时期的时代特征;而博亚尔多作为新时代的诗人,他在《歌集》中抒发的欢愉和悲伤虽热烈、真诚,但只是浮浅、表面的个人情感。

博亚尔多的代表作《热恋中的奥兰多》由3部分组成,其中的第1、2部分于1483年完成,各包括29和31首;第3部分因作者猝然阵亡,只写至第9首。诗人从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的宫廷轶事中取材,于1476年左右动笔写作。他运用丰富的想像力,在长诗中虚构了一个由爱情、巫术、战争、历险等不同内容交织在一起的传奇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妙趣横生,充满了浓重的传奇色彩。全诗广阔的画卷以查理大帝在巴黎举行有两万余名骑士参加的赛马盛会作为故事的开端,东方美丽的公主安杰丽嘉在其兄长的陪同下也出现在赛马会上。公主当众宣布,她将嫁于制胜其兄长的英雄为妻,武士们倾心于她的绝色,纷纷挺身而出与其兄长决一死战。但安杰丽嘉反复无常,对自己许下的诺言后悔不已,乘厮杀的混乱之际仓皇出逃,骑士们扬鞭催马,在她身后紧追不舍,其中有查理大帝的贴身卫士奥兰多和拉那多。拉那多在森林

中饮水中邪，对安杰丽嘉的爱慕顷刻间消失殆尽，而公主却因巫术之力狂热地爱恋着他。为了保卫公主的安全，奥兰多终日随其左右，并多次打退鞑靼国王的进攻，直至鞑靼国王在一次决斗中身亡。长诗的第 2 部分主要描写非洲国王和鞑靼国王子攻打法国的战争：为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奥兰多毅然回国参战；安杰丽嘉公主出于对拉那多的一片痴情，也随同他一起回到了法国，但两人在森林中饮水再次中邪，公主转而将拉那多视作仇敌，而拉那多则出于嫉妒与奥兰多决斗；查理大帝及时赶来制止了厮杀，并将安杰丽嘉托付给年迈的纳莫公爵照看，答应在战争结束之后，把她赐给他们两人中英勇杀敌者为妻。

博亚尔多的这部著名叙事长诗，后由文艺复兴末期杰出诗人阿里奥斯托撰著的传奇体英雄史诗《疯狂的奥兰多》续完。博亚尔多以爱情和骑士的豪举为两条主要线索，在他的传奇叙事诗中铺开广阔的画面，描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热情讴歌骑士的无敌力量，成功地塑造了象征爱情的东方公主安杰丽嘉的人物形象。在博亚尔多的笔下，爱情取代了宗教信仰的地位，成为英勇行为的主要动力，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者所宣扬的世俗之爱的力量。诚然，与浦尔契的作品相比，博亚尔多的叙事诗带有明显的贵族文化特点，且诗歌的结构有欠严谨，语言层次亦不够分明。

四、罗棱佐 ·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

佛罗伦萨是 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重要文化中心，那里拥有驰名西欧的图书馆和文学社。一些久负盛名的作家、诗人、建筑师和画家都纷纷前往，寻求得以充分发挥自己才华的理想王国。在佛罗伦萨繁华似锦的文学创作活动中，美第奇家族始终起着轴心的作用。该家族原以经营毛纺织起家，后成为欧洲最大的银行家之一,自 1435 年起开始在佛罗伦萨长期建立专制的僭主政治。美第奇家族为粉饰其专制统治,一贯推行保护文艺的政策,其中人

称‘豁达大度者’的罗棱佐·美第奇的表现尤为突出。他除了在各地敦聘诸如波利齐亚诺、浦尔契、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诗人、艺术家为家中的座上宾以外，自己也著文写诗，积极参加文学创作活动，是美第奇家族中最有才华见识的人物，被公认为当时意大利威望最高的文艺保护者。即使在去世前不久，罗棱佐还在私人花园中创办了一所雕塑学校，其中的一名 15 岁的学生便是米开朗琪罗。

罗棱佐 20 岁继承其父柯西莫的王位，开始处理家族事务和主持对外的公事，逐渐显露出他在政治上的非凡才干。他奉行的纵横捭阖的外交政策确保了意大利半岛上均衡的政治局面，故被誉为‘意大利政治的天平”,许多历史学家把他的逝世(1492 年)称作意大利新历史时期的开始和民族灾难的主要根源之一。罗棱佐自幼接受人文主义思想教育，酷爱文学艺术，热情支持通俗语的普及和推广，并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和各种活动，使意大利通俗语文学创作在 13、14 世纪鼎盛时期中已取得的显著成绩更加发扬光大。

在写作方面，罗棱佐富有大胆尝试的创新精神。他的著作甚丰，体裁各异，风格不一，但对后人的影响不是很大。有人称他为“业余作家”,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实际上,正是他勇于创新的精神和大量的实践，反映了 15 世纪意大利文学创作的一个特征。他的诗篇，有的仿照彼特拉克抒情诗的模式；有的富有柔美新诗体的韵味；有的因袭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写作风格；有的模仿拉丁诗人古雅的风采；有的文笔欢跃，充满浓厚的民间文学风采。此外，他还为舞曲和狂欢节赋诗，诗意诙谐风趣，旋律轻松活泼，往往在颂扬放荡不羁追求世俗生活欢乐的同时，巧妙地在诗句中掺入幸福一瞬即逝和前途未卜的怅惘情绪。比如，他在一首为狂欢节所写的著名诗篇中感叹道：

青年男女情侣们

大好时光在于春
忘却痛苦和烦恼
一醉方休爱永存
轻歌曼舞悠哉哉
幸福长随享乐人
至于明天将怎样
无人知晓无人问

罗棱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他的作品风格各异，充分体现出他的矛盾心理：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富有异教徒的思想；他陶醉在自己出身高贵的荣耀之中，但偏偏喜爱民间的习俗。他的主要作品有 抒情诗集《诗集》（Rime）、《狂欢节之歌》（Canti Carnascialeschi）、《巴培利诺的牧羊女南琪亚》（Nencia da Barberino），叙事体作品《雅科波》（Giacoppo）和《齐内弗拉》（Ginevra），以对话形式论述哲学思想的长诗《争辩》（Alercazione），叙事诗《科林托》（Corinto）、《琥珀》（Ambra）和《爱神的森林》（Selve d'amore）等。

《诗集》收集了罗棱佐为其心爱的女子所写的 41 首爱情诗，并附有散文评注，仿效“柔美新诗体”诗派和彼特拉克抒情诗的赋诗风格，叙述他的爱情生活。长诗《争辩》共 7 章，受费奇诺的柏拉图式幸福观的影响，表示对上帝虔诚的敬仰和世俗欢乐的严厉谴责。抒情诗集《狂欢节之歌》号召人们努力追求世俗生活的欢乐，尽情享受人生的幸福，其中以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狄尼索斯和克里特岛王米洛斯的女儿阿丽亚娜爱情故事为题材的《巴克斯与阿丽亚娜》是这一部抒情诗集中著名的诗篇，诗句在颂扬世俗欢乐的同时，流露出青春和人生宛如春梦的伤感情调。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八行体叙事诗《巴培利诺的牧羊女南琪亚》（Nencia da Barberino），在这一篇模仿托斯卡纳地区民间诗歌风格写成的叙事诗中，他通

过牧羊女的叙述，感叹爱情给人带来的欢乐和痛苦。纵观罗棱佐所有的文学作品,我们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位赞颂现世生活的歌手和描写 15 世纪佛罗伦萨社会现状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句中显现了世俗生活中人的感情和追求。应该说，他的作品是广博的文化知识和丰富的艺术想像力相结合的产物。

五、安琪罗 · 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1454—1494)

波利齐亚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杰出的诗人、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古典学者之一。他善于从维吉尔,奥维德、但丁、彼特拉克等优秀诗人的作品中获取写作灵感和汲取艺术营养，并运用娴熟的技巧和优美的语言，将他人的长处有机地融汇在自己的诗句中。他一生致力于重建古代文化的工作，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学方面，可谓是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和孜孜不倦的语言学家。他的诗歌文字简洁,寓意深奥,富有哲理。他通晓希腊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对诗歌、哲学和语言学同样精通。

他原名安勃洛奇尼，出生在意大利中部蒙特波恰诺城一个公证人之家,后以他诞生地的拉丁名改名。少年时,诗人在文学方面就崭露头角,16 岁那年,就把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的部分章节译成拉丁语。1473 年左右，诗人进入美第奇府第，得以在其藏书室进行研习。他同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感情甚笃，后成了他的朋友和门客，并长年在其宫廷内供职。罗棱佐十分器重他的才华，委于他教育其子女的重任。1479 年,由于僭主的妻子对波利齐亚诺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颇为反感，诗人被迫离开佛罗伦萨，开始辗转在意大利北方各地。1480 年,他旅居曼图瓦,在两天中一气呵成他的代表作《俄耳甫斯》(La favola d'Orfeo)。同年,他应聘回佛罗伦萨,在该地的文学院讲授希腊语、拉丁语和修辞学。1491 年,他去波伦亚、帕多瓦和威尼斯等地旅行,为美第奇府第的藏书室搜集手稿。他在佛罗伦萨度过晚年，于 1494 年

病殁。

他在 1473—1478 年间写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诗歌是人文主义诗歌的最佳范例，其中包括挽诗、颂诗和格言诗。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拉丁语写成的，其通俗语诗篇数量甚少，但它们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为著名的，是以马上比武为主题的八行体叙事诗《比武篇》（Stanze per la giostra ）和圣剧《俄耳甫斯》。

《比武篇》是意大利文学的重要作品之一,它使古典文学的宏伟气势与佛罗伦萨通俗语诗歌的自然流畅相结合。诗人通过诗意的理想化手法,描写朱利奥对仙女西蒙奈达的爱情,引导读者远离繁华的城市和奢侈的宫廷生活，来到充满田园景色的神奇世界。在诗篇中,波利齐亚诺刻意描摹景色绮丽的希腊仙境;“天”和“地”和谐地融合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比武篇》写至第 2 首时,诗人被迫辍笔,因为按他原来的构思,诗中有欢庆朱利亚诺·美第奇马上比武得魁的壮观场面，而朱利亚诺当时已在一次政治动乱中不幸被美第奇家族的仇敌刺死。以马上比武为题材赋诗，在意大利文坛上并非是第一回,但与众不同的是,诗人让现代人穿上绚丽多彩的古装,把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写成一则美丽的寓言故事,全诗充满了作者对古代世界的无限怀念和眷恋，形象地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以及对古代世界的崇拜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比武篇》是一部典型的体现古典美的叙事长诗,是人文主义继承古典创作传统、描摹超自然的理想世界的优秀作品之一。

圣剧《俄耳甫斯》取材于希腊神话,描述诗人、歌手俄耳甫斯的历险故事：俄耳甫斯之妻欧律狄刻被毒蛇咬伤后不幸身亡，他因爱妻心切,独自下冥府祈求神灵相助;冥后普西芬尼被他迷人的琴声所打动(据说琴声能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答应他把欧律狄刻带回人间,条件是他在途中不得回头;将近地面时,俄耳甫斯回首看望妻子是否紧跟其后，因而使她重新堕入阴间。波利齐亚诺给

这一则世俗异教的寓言故事涂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色彩，启迪人们忘却痛苦和哀伤，脱离平庸乏味的现实生活，栖身于充满美丽梦幻的理想世界之中。《俄耳甫斯》采用了与《比武篇》相似的艺术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理想的神话世界，给人以永恒不变的美感，为文艺复兴时期古今结合的创作手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俄耳甫斯》虽以希腊神话为创作模式，且保留着中世纪宗教诗剧的艺术形式，但它仍不失为一部歌颂自然风光和世俗欢乐的优秀诗剧，在意大利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六、雅科波 · 桑纳扎罗（Jacopo Sannazzaro，1455—1530）

除佛罗伦萨和费拉拉以外,那不勒斯是 15 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的另一个重要中心，尤其在亚拉冈王朝和西西里国王阿尔丰沙五世当政时期，朝廷奖掖文学艺术，罗致大批文学艺术人才，那里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桑纳扎罗是那不勒斯人文主义文化的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散文作家。

桑纳扎罗出生在那不勒斯的一个贵族世家，青少年时代是在乡间度过的，对牧民生活的了解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之后,他回到城里,开始学习古典文化,接受人文主义教育，在庞达诺的引荐下进入那不勒斯宫廷，为弗雷德里克国王效劳。1501 年，这个王朝末代国王弗雷德里克去位后，他随同国王流亡法国。在这段时间内，他发现了几部失传的拉丁语著作，其中包括罗马诗人奥维德的《钓鱼术》和内梅西安努斯的《狩猎人》。1504 年弗雷德里克谢世后，他回到那不勒斯，并在那里度过余生。

桑纳扎罗的拉丁语作品数量甚丰，较著名的有叙述基督降世的长诗《圣母玛利亚的分娩》（De partu Virginis）和若干描写牧民生活的牧歌。在他的通俗语著作中,散文体作品《阿卡狄亚》（Arcadia）对意大利和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意大利浪漫主义派出现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它一直被誉为意大利文坛上

最优秀的牧歌。在这一部自传体田园小说中，桑纳扎罗叙述了一则凄切、动人的爱情故事,全书共 12 章，每章结尾处均附有一首诗。小说主人公辛契洛(意即‘ 真诚的人 ’)为了忘却失恋的痛苦远离那不勒斯，去希腊高原地区阿卡狄亚寻觅理想中的幸福土地，那里素以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著称。辛契洛在 8 岁那年,爱上了一位美丽非凡的少女，但他始终没有勇气向她倾诉衷肠。倥偬流逝的岁月未能平息他心中炽烈燃烧的爱情之火，他为之成天缠绵悱恻，甚至好几次在脑际闪过轻生的念头。在阿卡狄亚，辛契洛终日与无忧无虑的牧人们在一起，但是美丽的大自然景色和恬静的放牧生活未能使他忘却心中的恋人。反之，他因远离故乡，飘零异国而感到分外忧愁。最后，辛契洛在一位仙女的指引下，在梦中从地下返回梦萦魂绕的那不勒斯，但在那里，他惊悉恋人已经归天的噩耗。

就内容而言,《阿卡狄亚》描摹的是辛契洛个人的不幸遭遇,似乎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是，作品在问世后的两个世纪中广泛流传于欧洲各国，深受人们的喜爱。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在作品中描绘人们厌倦都市生活而去乡间寻求安逸的生活环境，这还是第一次。这种看破红尘、摒弃世间浮华、栖身大自然美丽景色的思想倾向,在当时的西欧颇为流行。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的一些作家纷纷模仿《阿卡狄亚》的写作风格，直至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之后，它才被人们渐渐淡忘。桑纳扎罗的《阿卡狄亚》，在语言方面以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为楷模，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对意大利文学语言的统一和散文体文学的发展都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

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文主义是“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第一种形式 ”，它既是一次全面的思想文化运动，又是一种世界观和思想体系的反映，其思想因素不仅体现在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中，而且还集中地表现了从信仰到理性的重大转变。从 14 世纪 20 年代到

15 世纪下半叶的一个多世纪中，人文主义之所以在意大利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展到欧洲其他地区,是因为西欧的其他一些国家当时还不具备意大利那样的优越条件：

其一,古罗马文明的影响。

历经蛮族入侵之后，象征着古罗马文明的罗马法和城市依然保留了下来,意大利人得以直接继承传统。罗马法的存在是中世纪意大利文化的一个伟大源泉,在这一方面,阿尔卑斯山北麓的一些国家是无法与之竞争的。人们常把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的几个世纪称为黑暗时代和蛮族入侵时代，但是蛮族入侵者在那些年代里造成的破坏,实际上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比如,长期被视为装饰品和用来表达宗教虔诚的典型建筑和艺术形式，从东罗马帝国开始就在意大利的主要领地拉文纳渐渐向外扩散。众所周知，佛罗伦萨和热那亚很早就掌握了从古罗马时代传下来的铸币技术,而作为佛罗伦萨经济支柱的羊毛工业,正是在继承始于罗马时代的悠久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传统的影响对意大利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则,人文主义的兴起,实际上是意大利人,尤其是佛罗伦萨人,对他们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史)进行思考的必然结果。14 世纪的不少文人称：从古代史结束到 14 世纪这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是一个没有修辞学和诗歌、没有伟大艺术作品的黑暗时代。他们缅怀古罗马的光荣传统,热烈地追慕包括拉丁和希腊在内的古典文学，孜孜不倦地搜集古代作家的失传抄本。随着人文研究的进展,人文学者研究古典文献的方法益臻完善,他们对希腊罗马文明的了解亦日益加深。这种对古代文明的热爱在意大利表现得尤为强烈，许多本地人氏都以自己是古罗马人的后裔深感自豪,而佛罗伦萨人则把对古代文化的向往,从单纯的文学扩展到建筑、雕刻、音乐、数学及物理等各类学科。

其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地中海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的主

要通道，而意大利的地理位置正好处在地中海航线的中心。正因为如此,意大利在 11 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中，在远东获得了殖民地。再则，有利的地理位置对意大利海外贸易的发展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其北方诸城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另外， 13 世纪的意大利，除了德国皇帝在北方仍然保持其残余的势力和法律上的影响以外，中部和南部则是教皇的势力范围，城市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商业的繁荣不仅为城市增加了巨大的财富，而且还给人们带来了从封建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希冀。城市的强大是意大利在经济和文化上走在其他欧洲国家前面、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因。

其三，经济的繁荣带来了观念上的变化。

人文主义者极力颂扬为公众事务献身的公民美德，以及商人、政治家所追求的‘ 积极生活 ’的理想,贬低苦行僧和神学家的冥思苦想、不问世事的生活态度 ;他们甚至认为,财富的获得不仅无碍于知识的积累和灵魂的得救，反而成了促进学术研究和提高道德水准的重要经济保证。人文主义对人的重视与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在文艺复兴时期始终是一对激烈斗争着的矛盾。基督教从建立伊始宣扬的就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的教旨，而人文主义者对人的价值有了全新的诠释，认为人才是尘世的上帝。彼特拉克最早恢复了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 人是最宝贵的 ”思想，认为在上帝的创造物中,人占据着最高的地位。在此基础上,薄伽丘则进一步提出,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贵贱的标准，而幸福就在人间。他们的后继者萨鲁达蒂、布鲁尼、曼内蒂、帕米尔埃利等人,又将人的自由意志和创造力提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把人看成是同上帝一样的尘世的创造者。然而，人文主义者在反对基督教惟我独尊的同时，仍然坚信基督教的绝对价值，认为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他们并不想彻底否认上帝的存在，但是他们对教会的批判确实一步一步地削弱了宗教对人的影响，全面反映了他们对来世的态度和重视积极生活的主张，

理性和信仰之间的冲撞始终左右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人文主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们的伦理和财富观念与中世纪相比也有了质的飞跃。基督教极力灌输的是守贫斥富的观念，让人们把尘世的希望寄托予天国，人文主义者则赋予了“财富”这一概念全新的内容。起初，彼特拉克认为财富是不幸的根源，只会给人带来灾难，所以人应该勇敢地忍受生活的考验。对财富看法的转变始于萨鲁达蒂，自他以后，人文主义者相继从不同的角度对财富的积极意义作了肯定。萨鲁达蒂提出，佛罗伦萨的繁荣应归功于手工业和商业，认为商人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布鲁尼不仅肯定了财富是一种外在的幸福和力量，还认为财富乃道德之基础，没有财产，德行是无力的，哲学同样是经不住风雨的。瓦拉激烈地抨击放弃财产的说教，认为道德不仅表现为忍受贫穷，还应表现为合理地使用财富。阿尔贝蒂则指出，大多数人是为了财富而工作，但财富不是最后目的，它只是获得声望和荣誉的一种手段而已，并认为财富掌握在道德高尚的人手中能产生巨大的积极作用。人文主义者新的财富观鼓励新生的资产阶级去追求积极的生活理想，树立了人的尊严,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意识。

作为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人文主义可谓是最早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它不仅使人们从宗教的长期禁锢中解脱出来，而且还建设起一种新的文化。诚然，人文主义在为新生阶级的地位和利益大声呐喊的同时，本身残存的种种中世纪陈旧观念也会不时地暴露出来。我们几乎在每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文学作品中都能发现新旧思想矛盾和冲突的痕迹，在不断的对抗中两者得以和谐地共存。归根结蒂，人文主义文化在建立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包括冲突、困难和矛盾，那是因为文化内容的变化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而经济繁荣又不能与文化艺术及政治的进步完全相互吻合。由于人文主义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特征，以及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他们显然没有能力完全实现从信仰到理性的彻底转变。

第五章文艺复兴晚期的意大利文学

自16 世纪下半叶和 17 世纪初叶起,法、英两国在欧洲的势力日趋强大，西班牙的统治地位开始走向衰落，而佛兰德尔革命的胜利则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力量。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意大利各地的封建诸侯纷纷要求更多的自治权，以便逐步摆脱西班牙统治者的控制，其中，威尼斯、彼埃蒙特、佛罗伦萨等地的呼声尤为强烈。在整个意大利半岛上，推翻西班牙统治的政治倾向日趋明朗，南方人们首先揭竿而起，先后举行了好几次声势浩大的起义，这在当时意大利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有过充分的反映。意大利莫台那诗人亚历山德罗 · 塔索尼(Alessandro Tassoni，1565—1635)曾撰文形象地描绘了当时的意大利政局：“西班牙君主政体宛如一个沉睡着的吃人妖魔，那是一个异常虚弱和不堪一击的肥大躯体，一大堆无用的落纤。”

政局的动荡导致了经济危机，这不仅抑制了商业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导致人口的明显下降，到处是一派财匮力乏、民不聊生的萧条景象。与此同时，社会的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日益严重。尽管如此，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文化活动依然十分兴旺，尤其是在政治、哲学和史学领域，创作思想异常活跃,产生了布鲁诺、康帕内拉、马基雅维利、圭恰尔迪尼等优秀哲学家和史学家，表达了意大利人民不畏强暴和教会淫威的英雄气概，以及他们对新生活所寄予的瑰丽希冀。到了 17 世纪，意大利逐渐失去了它在欧洲文坛上的显要地位，但是纵观 17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现代必将超过古代的信念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天主教会顽固地反对在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除了采取

文化上的高压政策之外,它还经罗马教皇的批准,在欧洲各国创办耶稣会,企图以此剥夺人们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因为耶稣会的会规强调会士必须绝对忠于教皇，无条件地执行教皇的一切命令。耶稣会还通过开办学校和建立文化机构等措施，将其势力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此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维护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来自教会的各种干扰无疑对 17 世纪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破坏作用。面对充满诸类矛盾的社会现实，不少知识分子进退维谷,无所适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生活十分艰难,而达官贵人却荒淫腐化，挥金如土。文艺复兴鼎盛时期的文化艺术固然五色斑斓,光彩夺目,但这种贵族化的文化艺术与 17 世纪严酷的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占人口绝大部分的下层人民依然徜徉在文化大门以外，文学艺术的社会化迫在眉睫。

也正是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哥白尼的地动说、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定律、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相继问世,从而彻底改变了千余年来人们对宇宙偏面的、错误的认识。犹如在漫长的寒冬之后到来的明媚早春，这一系列重大发现给人们带来了科学的曙光,大大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在这之前,人们一直把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论看做永恒的真谛。哥白尼建立的以太阳为中心以及宇宙无限大的新理论,不仅是科学上的重大发现,而且对文学艺术也同样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面前，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极力贬低新的科学发现的重大意义；有的人消极悲观、自叹无能，徒劳地在宗教信仰中寻求精神寄托；另有一些人则积极颂扬人的无限创造力，坚信人类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完全有可能了解,甚至掌握宇宙间的一切奥秘。当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已经进入尾声，但是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创新和守旧之间的冲突继续存在，新的哲学思想和宗教保守思想之间的搏斗依然十分激烈，象征着古代和现代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文艺复兴纵然热情讴歌与天意无关的人的伟大创造力，并竭力反对中

世纪的禁欲主义和宗教观，但它毕竟是一场建筑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基础上的复兴运动，故只是在文化上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即便如此，当时在意大利依然有一批文人继承文艺复兴的精神，在‘反宗教改革’的逆境中不屈不挠地斗争着，为传播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乃至生命，从而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第一节　新的哲学、史学和政治学

一、哲学

在 16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文坛上，塔索及其作品独占鳌头，享有很高的声誉。人文主义者继续宣传科学，反对教会僧侣和天主教的神秘主义，但由于异族的统治和天主教会对文化的严格控制，当时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互相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引导人们循规蹈矩，以传统的道德观念为行动的准绳 另一方面，它们又崇尚宣扬享乐主义的文学艺术，一味追求作品的外形美，企图以此暂且忘却令人忧虑的政治形势。

在反宗教改革运动时期，意大利逐渐失去了它在欧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政治和经济状况日趋恶化，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令人怵目惊心。意大利浪漫主义伟大作家孟佐尼曾在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中，描绘过 17 世纪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地区凄凉、悲惨的生活画面。当时，文化领域内的科学、哲学作品以及即兴喜剧的创作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广大民众仍然处于鄙陋无知的文盲状态，而许多知识分子对周围的一切置若罔闻，闭目塞听，把自己禁锢在迂腐陈旧的文化模式里。17 世纪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对颂扬、模仿古代典籍的兴趣逐渐减弱，因为科学上的一系列重大发现给他们带来了光亮和希冀，使他们在精神上感到振奋。新的一代人找到了古人所无法预知的真理，他们就好比站在巨人肩上

的一个侏儒，身躯虽小，但他要比象征古代的巨人看得远，看得准。

17 世纪新科学论著的作者不再采用传统的拉丁语从事文学写作，他们开始普遍运用通俗语，也就是意大利语撰著作品。应该说，这是意大利语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继列奥纳多 · 达 · 芬奇之后，除了科学论著以外，通俗语开始在文学、政治、哲学作品中占据绝对优势。到了 17 世纪，不仅意大利人在正式场合讲的是拉丁语，即使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界和学术界，拉丁语的运用同样十分广泛。伽利略明知自己用意大利语写成的作品无法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进行学术交流，但他决意在科学领域内打胜语言仗，从而为进一步确立意大利语在文学上的地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经院哲学世界观的日趋崩溃，自然哲学体系于 16 世纪臻于繁荣，其发展中心在意大利和德国。如果按照欧洲早期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不同程度划分，15 至 16 世纪当属萌芽时期。这一阶段中的唯物主义哲学具有明显的泛神论特征，它继承了古代唯物主义，把自然看作哲学研究的对象，并对自然的无限性有一种模糊的预感，意大利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贝尔纳尔迪诺 · 泰莱西奥和乔尔达诺 · 布鲁诺。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资产阶级思想，贯彻了面向自然、面向现实人生的思想；大多数自然哲学家对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派对自然的解释均持否定态度，他们号召人们以实验的方法认识自然，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加深了人对自然的认识。然而，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家虽然有了解自然的强烈欲望，但他们往往对自然认识不足，且缺乏有效的手段让自然服从人的意志，故对存在于自然内部的普遍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理解过于偏面，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幻想的性质。他们一般相信“世界灵魂说”，认为它是赋予万物以生机的本原，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认为，在自然中存在着神明的‘智慧”,其结果往往把自然拟人化,使人醉

心于神秘的魔法技术，其中包括占星术和炼金术等迷信活动。正如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帕尔米罗 · 陶里亚蒂在论述这个时期意大利的进步思想家时所说：“他们奠定了新的、强大而勇敢的世界观的基础，其中心是自然和人。他们否定宗教的超验论，肯定现实中神明的内在性，这为以后的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开拓了道路,尽管在形式上还远不够完善。”①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自然哲学观点不免具有一定的过渡性、不成熟性和不彻底性。

1、 贝尔纳尔迪诺 · 泰莱西奥（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

泰莱西奥是意大利 16 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他开创文艺复兴经验主义之先河，反对不依据具体资料进行推理的做法。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哲学史上，泰莱西奥无疑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创建的具有唯物主义意向说倾向的自然哲学观,首先提出了必须用实验的方法研究和认识自然界的标新立异的主张，标志着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转折。

泰莱西奥生于意大利南方喀拉勃利亚地区科森察城一个贵族家庭，年轻时曾就读于意大利当时最负盛名的帕多瓦大学， 1535 年毕业于该大学。帕多瓦在当时可谓是反对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重要堡垒，也是新兴的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心之一。后来他毕生尽瘁于自然科学事业，并成为坚定不移反对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哲学家。在一座僧院里度过 9 年后，他先后迁居那不勒斯和科森察。在那不勒斯,他创办了欧洲第一个科学院,后成为一个用经验论研究自然的哲学中心。天主教会为反对宗教改革运动,继续维护天主教的地位,于 1545 年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

① 《19 世纪意大利思想的发展与危机》 ,帕尔米罗 · 陶里亚蒂,载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55 年第 5 期第 58 页 。

兰托召开第十九次宗教会议，前后历时 18 年。其间，在罗马教廷的干预下，由泰莱西奥建立的科学院被迫关闭，学院的部分成员被宗教裁判所逮捕，而泰莱西奥本人则不得不逃往科森察，不久便在那里与世长辞。

泰莱西奥的哲学观，在其代表作《论物体的本性》（De natura rerum iuxta propria principia ）一书中得到了较为详尽的表述。1565 年，该书的第 1、2 卷在那不勒斯问世，而整部书(共 9 卷)则在他逝世前 3 年才得以出版。这部书不仅成功地表达了只有依靠世界本身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才能认识世界的唯物主义哲学观，而且还大胆提出了依据经验，首先是依据我们的感觉器官所提供的材料，对自然进行悉心研究的科学方法。尽管他的著作受到当时教皇们的鼓励，但这部著作及其另外两部较次要的作品从 1596 年起却被列入天主教教会的《禁书目录》，禁令直至 1900 年才被撤消。泰莱西奥不主张对亚里士多德或其他古代哲学权威作任何引证，反对经院哲学以堆砌玄奥术语的方法对自然作出不符合事实的诠释。他认为 物质作为‘ 某种有形体的东西 ”，不可创造，也不可消失 物质充满整个空间，宇宙间物质的数量是不变的。另外，他还批驳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支配物质的学说，认为事物的形式和类型并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是在物质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和文艺复兴时期其他自然哲学家一样，在泰莱西奥的自然哲学里，也有热与冷对立的辩证法 他肯定物质是永恒的，并用热(膨胀)和冷(收缩)解释物质的一切运动，但又认为物质中存在着灵性，有物活论的倾向。《论物体的本性》的中心命题认为，要理解物质世界中的事物，唯一的办法就是研究自然界本身。根据他的观点，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就必须注意到物质的物理性质和冷与热的各个方面。他指出，物质并不是‘ 纯粹的潜力 ”，而是一种可以触知的材料。他对动、植物的研究使他相信，热是生命的源泉，而冷只是对热的一种补充，它是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另一个积极原则。因此，

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培根把泰莱西奥称为“第一位现代人”。尽管泰莱西奥强调自然的研究,他的作品中也较少有神学的推测,但他表明自己相信上帝,相信人的灵魂永生和不朽。后来的意大利思想家康帕内拉发展了他的经验主义方法。

总的来说，泰莱西奥的自然哲学思想对于他处的时代来说还是超前的,因为自然哲学,以及对自然的实验研究的发展水平在当时还不足以提出一个真正科学的世界图景。比如他曾断言，人身上有一个上帝放入的不朽灵魂，物质与整个宇宙是上帝在往昔某个时候创造的。尽管他承认,这跟科学毫无关联,科学应当研究它那完全客观的、不依任何人为转移的规律,但是他的这一论点显然同唯物主义自然哲学观相悖。在泰莱西奥之后,伽利略、布鲁诺和康帕内拉等人,正是在泰莱西奥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并成为文艺复兴时期先进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

2. 乔尔达诺·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

布鲁诺是16世纪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主张无限宇宙与多种世界理论,摒弃传统的地心学说,并超越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恩格斯在评论文艺复兴时代时说过：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①] 在这些巨人当中，布鲁诺无疑是一位文艺复兴时期卓越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家。

布鲁诺年轻时曾在修道院攻读神学、古代语言和哲学。其间，他不仅与人文主义者频繁交往，而且还有机会了解泰莱西奥的哲学学说和哥白尼的自然科学思想，这对他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他对天主教宣扬的神学思想相抵触，于1576年被教会以‘异端’的罪名革除教籍。之后,他开始在北部

①《〈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米兰、都灵等地流浪,最后被迫离开意大利,长期漂泊在瑞士、法国、英国和德国。正是在漂泊异国他乡期间,他撰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措辞严厉地嘲讽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神学家,热情讴歌崇高的理想和科学的真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喜剧《举烛人》(Il candelaio)、论著《论宇宙的无限性和诸天体》(De l'infinito universo et mondi)、《 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Lo 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 英雄的狂热》(Gli eroici furori)和《论原因、本原和一》(De la causa principio et uno)等。1582 年,他发表 3 部研究记忆法的著作,还发表了一部用方言写的喜剧《举烛人》,生动地揭发了当时社会的腐朽。《举烛人》是一部五幕喜剧,始作于意大利,完成于巴黎,1582 年在法国出版。这部剧作的情节似乎荒诞不经,剧中充满放纵的、肆无忌惮的玩笑;但是那些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却遭到了最为无情的讥讽。布鲁诺把《举烛人》比作照明真像、澄清谬误的一束烛光,隐喻自己的哲学所阐明的真理至高无上,将以毋庸置疑的优势把对手们的愚昧与猥琐踩于脚下。布鲁诺的《举烛人》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的讽刺喜剧《曼陀萝花》一脉相承,在思想意蕴和艺术特色上继承和丰富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宝库,闪烁着探索真理和自由的光芒。1584 至 1590 年,他发表了多篇论文,就哲学与宗教的关系、物理和宇宙论学说、基督教的道德学阐述了自己独特的见解。 1591 年 8 月他回到意大利,翌年 3 月因宣扬异端学说而被捕受审。直至 1600 年 2 月 16 日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在罗马鲜花广场殉难,布鲁诺始终是一名反对封建神学的坚强战士,刚正不阿,为捍卫新哲学和新科学的真理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宗教裁判所曾企图摧毁他的身心,但多次尝试都未能使这位享誉全欧洲的思想家放弃其“异端”信念,教会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均告失败。面对宗教裁判所的宣判,布鲁诺高声说道“:你们向我宣布判决,比我听到宣判死刑更加恐

惧！是的，真理和科学是不会死亡的，它们通过火刑架，走向世界。”

在布鲁诺的世界观里，宇宙物质实体的基本特点就是本原、原因和统一，他认为这三者是关于物质的存在、生命和运动的根源。布鲁诺依据“物质实体”的基本观点，论述了关于“宇宙万物统一”的学说，肯定了一切自然现象只能是物质实体，从而彻底揭穿了教会所宣扬的所谓“神的精神实体”。布鲁诺断言，物质是一切自然物共同的、统一的基础，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依然是不彻底的，表现出文艺复兴时期“泛神论”的特点。在他的哲学世界里，上帝已完全融化于自然之中,用他的话说,自然无非是‘事物中的上帝’。值得指出的是,布鲁诺的‘宇宙灵魂’说,比新柏拉图主义任何其他代表人物更坚定地强调作为神秘力量的上帝的不可认识性。在他的哲学思想中，自然是完全可以认识的，认识自然是哲学的唯一任务，这同宗教毫无关系。

布鲁诺果断地提出“自然无限性”的主张，这不仅发展了新柏拉图主义泛神论的思想，而且还进一步阐明了中世纪哲学家关于空间无限和世界众多的学说，使之成为反神学、反经院哲学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之一。除此之外，布鲁诺摒弃哥白尼提出的“太阳是宇宙绝对中心’的观点,认为太阳只是相对的宇宙中心,因为宇宙中的任何一个行星，都可能被处于其上的观察者解释为宇宙的中心。按照他的理念，我们的地球只是太阳系的一颗普通行星，而太阳也不过是无数恒星中的一个。可见，宇宙是没有任何边际的，而其中的世界也是为数无穷的。他的这一个标新立异的科学断论，摆脱了哥白尼理论的重大局限性，激励人民挣脱由上帝创造的那个宇宙的有限界域，奔向那个从来不是任何人创造而是永恒存在的宇宙的无限辽阔的天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布鲁诺坚信，理性乃人的本性，它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发展；理性具有无限的能力，可以认识无限的宇宙。他还认为，人必须通过感觉、知性

和理性来认识自然界和物质世界 感觉是认识的基础,知性通过判断、推理去寻求真理,而理性则总结出原理和结论,从而揭示事物内在的联系和统一性。这就是说,认识自观察始,然后进入理性阶段,起初只是认识个别的真理,然后才能获得整体性的真理。

布鲁诺以一个人文主义哲学家的责任感，抛弃了“信仰的真理”而坚持了“科学的真理”,从而从理论上推翻了教会的权威,宣布人们有权怀疑宗教和经院哲学，这标志着唯物主义认识论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综观布鲁诺的哲学思想，尽管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主流是唯物主义的。作为哲学家,布鲁诺的理论影响了 17 世纪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甚至 18 世纪以来的许多近代哲学家也积极吸收他的学说。作为自由思想的象征，他鼓舞了 19 世纪欧洲的自由运动，成为西方思想史上重要人物之一和现代文化的先驱者。

3. 托马索 ·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

康帕内拉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先驱者。1568 年他出生于意大利南方喀拉勃利亚一户贫苦农家,年轻时曾加入多明我修会,不久因受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泰莱西奥的影响,开始反对经院哲学,号召从经验方面去探索哲学问题,强调必须把人的经验作为哲学基础,因而引起教会对他的强烈不满。他自幼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从 16 世纪 50 年代起,他的家乡便沦落在西班牙侵略者的铁蹄下,他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统治，内心迸发出炽烈的爱国主义火焰。就因为他的著作有明显的异端气息,他曾先后 3 次被迫在那不勒斯、帕多瓦和罗马宗教裁判所受审。自 1589 年之后的 10 年中,他先后发表了多部哲学著作。在这些他的早期作品中，他对实用主义和政治改革的兴趣已很明显 他断言,有罪的人类可以建立一个世界性的教会帝国，并通过宗教改革获得新生。1598 年返回家乡隐

居后,他积极组织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策划并领导了旨在推翻西班牙统治的喀拉勃利亚人民起义。起义不幸失败，他被指控犯有宣传异端思想罪，于 1599 年 9 月再次受审，后因装疯而幸免死罪,在狱中度过了 27 个春秋。在长期的监禁生活中，他写了不少理论著作和抒情诗，抒发政治理想，阐述他坚定不移的哲学观点,他的光辉著作《太阳城》（Città del sole ）就是在监狱中完成的。他在这一个时期中写的抒情诗，仅有少数保存在 1622 年出版的《诗选》中,它包括牧歌、十四行诗、传统爱情诗和玄学赞美诗。某些评论家认为，这部诗选是当时意大利文学中最具特色的诗歌。在囚禁期间，他曾有一度违心地表示愿意接受天主教的传统思想，主张建立一个在教皇和西班牙统治者保护之下的君主制国家。获释后,他继续和家乡的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并再次发动起义,后因叛徒出卖，被迫化名逃往巴黎。在法国他着手整理自己的著作，原计划分 10 卷出版一套全集，但不幸才出版了几卷便于 1639 年与世长辞,终年 71 岁。

康帕内拉信奉泰莱西奥的宇宙论，一生为建立意大利神权政治国家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了实现这个政治理想，他有时不得不屈服于残酷的社会现实，以妥协赢得继续生存的权利。在其 1602 年于狱中撰述的哲学论著《太阳城》中,他的乌托邦思想得到了最为充分的体现。在他憧憬的理想王国中，教皇和皇帝应由同一个人担任,因为借助于宗教信仰的力量和人民的信赖,他完全有能力将自己的美好愿望同全体人民的利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通过叙事人(热那亚航海家)和对话人(朝圣香客住地管理员)之间的谈话,在揭露和抨击当时意大利私有制社会的同时,提出建立一个无剥削、无压迫的理想共和制国家的大胆主张。他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一切事物和物质财富都应该公有,没有家庭也没有私产,人人都具有劳动的光荣感,并实行按‘需’分配的原则。在教育方面,他主张将孩子都送往公共学校

培养,还提出工人必须接受劳动教育,必须学习文化和手艺,因为集体教育和手工劳动乃是建立理想王国的重要基础。除此以外,他在书中还提及不少有趣的技术设计和发明,欲以此减轻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功效,因为他认为哲学和科学的任务就在于解决实际问题,发挥人的威力和完善人的本性。在这一部名著中,康帕内拉抒发了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企盼着理想社会的阳光能够驱散笼罩在意大利上空的阴霾。他的空想共产主义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反映了 17 世纪意大利人民反对封建剥削和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他们以自己充满睿智的想像力,共同描绘着人类幸福生活的图景。尽管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描述的一切都是一些当时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是人们透过朦胧的社会主义曙光,还是窥见了新生活的希冀。因此,《太阳城》一书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即使对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诚然,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条件,在康帕内拉的哲学思想中,存在着一些落后的因素。首先,康帕内拉虚构的‘ 太阳城 ”,与其说是共和国、毋宁说是教会国,而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只不过是一位充满睿智和信奉自然神的教皇。由此可见,康帕内拉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神权政治的迂腐观念,徒劳地试图把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结合在一起。其次,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确实具有无神论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宣扬对太阳的崇拜,相信灵魂不朽之说,赞同占星术和魔法等中世纪荒谬、虚幻的观念,主张废除家庭和实行公妻制,这种种矛盾只能证明他政治思想的空想性质。

康帕内拉自称为‘ 喀拉勃利亚的普罗米修斯 ”,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生活信念,在《太阳城》中表述了遥远的社会理想,在劳动普遍遭受鄙视的时代敢于提出‘ 劳动光荣 ’的光辉思想,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先驱。

4.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

伽利略不仅是 17 世纪意大利伟大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而且还是新科学的奠基人和优秀的散文作家。他对现代科学思想的发展有几项突出的贡献：他率先用望远镜研究星空，收集了大量事实证明地球绕日运转，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把地球看成是宇宙的中心；由于他对引力和运动的开创性研究以及把数学分析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常被认为是近代力学和实验物理学的奠基人；他还用数学理性主义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思辩方法，并坚持认为“大自然的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从这个基础出发，他发现了近代的实验方法。

伽利略诞生于比萨，其父是一位音乐家，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早年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所隐修院学习， 1581 年进比萨大学习医，大学一年级便发现钟摆的运动规律，后又根据流体静力学说发明了天平秤。与此同时，他还撰写文学评论，对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和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抒发己见,明确表示了欣赏前者的文学倾向。 1589 年,他中辍学业,开始在比萨大学教授数学，并同时进行物体下落的科学试验，终以雄辩的事实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理论。 1592 年他前往帕多瓦大学执教,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精神愉快、成果丰硕的 20 年时光。其间，他除了发明双筒望远镜外，还发现了木星的卫星群，并将它命名为“美第奇行星”。他的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引起了罗马教廷对他的猜疑和反感，尤其在他公开表示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之后，遭到了很多人的围攻和责难。尽管他重申了自己对天主教的忠诚和对圣经的信仰，教廷还是将他视作散布异端思想的危险分子。 1632 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宇宙两大体系论》(Dialogo sopra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之后,被召回罗马,翌年 7 月被宗教裁判所判处终身监禁。获释出狱后，他曾在西埃纳和罗马等地居住，最后在佛罗伦萨以南一座小山脚下的房子里凄凉地度过他的晚年。在

谢世前的几年中，这位举世闻名的伟大科学家病魔缠身，双目失明，形影相吊，孑然一身，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和旺盛的斗志继续工作和著书，于 1638 年发表新作《新科学论》（Discorsi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1642 年 1 月 8 日，他忧悒地与世长辞。为了纪念他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将他的遗体安葬在专门安置名人灵柩的佛罗伦萨圣十字教堂内。

伽利略以毕生的精力，为自然科学的复兴开路，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奠基人，尽管作为思想家，他未能完全摆脱神学上的上帝概念。他在物理、天文学等科学领域内有过重大的发明创造，一生中始终不断地同传统习惯势力，以及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所谓"永恒的真理"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那种不畏艰险和在科学上大胆探索的精神，以及他强调经验在认识自然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方法，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强调科学试验的自由，提出圣经和教义必须接受科学检验的标新立异的主张，并以他的实际行动歌颂了人无限的创造力。他的著作使昔日被人们奉若神明的宇宙观和陈旧的科学研究方法濒于危机。正因为如此，他遭到了各种反动习惯势力的攻击和迫害。

伽利略不仅是一位百折不挠的科学家，他在文学上也是一个富有艺术才华的散文作家。年轻时，他曾写过不少文学评论文章，直率地对阿里奥斯托、塔索和但丁的文学作品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他的散文体不过分注重文辞的修饰，给人以明朗、自然的感觉，在意大利散文体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二、史学和政治学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 16 世纪意大利社会的诸类矛盾，流露出人们对未来寄予的殷切期望。就艺术形式而言，它们均以仿古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彼特拉克抒情诗为摹本。与此同时，政治学和史学作品的创作也显得相当活跃，

作者们以毫不含糊的语言，更加直接地反映令人不安的意大利社会现实，蕴含着作者内心的忧虑以及炽烈的爱国热情。这些作家不仅毫无顾忌地罗列现象，抒发政治理想，而且还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激励人们将理想付诸于行动。在他们中间，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无疑是两位核心人物，其作品在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意大利深切的忧悒，引起了当时人们普遍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他们奋笔疾书，努力通过自己的著作昭示天下：天意无法决定历史的航程，只有人的力量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尽管人的力量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它是万能的 前车覆,后车诫,历史上的一些沉痛教训对现实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和启迪作用。诚然，16 世纪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尽相同，他们常为彼此观点的分歧争论不休,而这恰恰是 16 世纪危机四伏的意大利社会的真实写照。

1. 尼科洛 ·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

被西方学者称为“政治学之父“的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典型的史学家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写道“马基雅维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①他的许多不同凡响的观点对近代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基雅维利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早年就因精通古籍、学识渊博而显露出超群的才华。到他父亲一代，家中除四壁图书外已一无所有，因此他未能受到适当的教育，也未从名师学习希腊文，即使攻读拉丁文也以自学为主。这样的教育反而使他得以避免饱学人文主义所带来的缺陷，保持独创的思想和文风。自 1498 年起，他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担任过佛罗伦萨共和国司法部文书之职，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和战争事宜，直至佛罗伦萨共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5—446 页。

国崩溃和美第奇家族重返政治舞台。在实际工作中，他有幸接触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许多政治首脑人物，亲身经历了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这对他政治思想和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曾先后多次出任公使，还被派往罗马教廷和交战国比萨，以及法国、奥地利担任要职，频繁的政治活动使他受益匪浅，并从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写作素材。1512 年法国战事失利，作为其盟友的佛罗伦萨共和国也随之日益衰落，美第奇家族趁机夺回了佛罗伦萨统治大权。马基雅维利因长年为共和国效力而被罢免官职，翌年又因与反美第奇家族一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之后，他因政治上的失意而忧郁寡欢，但是生活中的逆境并没有挫伤他的锐气，他的大部分重要著作恰恰是在这一时期中完成的。他认真回顾了自己丰富的阅历和坎坷的一生，系统地整理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几乎一气呵成《论李维》（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 ）和举世闻名的《君主论》（Il Principe），不久之后又完成了《战术论》（Dell’arte della guerra ）一书。当时，他被迫离开政治舞台，无法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深为当权者不理解他那火一般的政治热情而深感痛心，欲以《君主论》向佛罗伦萨新的僭主表明心迹，以期得到重用和施展才华的机缘。但是，对于他的殷切期望和满腔热忱，当权者只是投以冷漠的目光，一直到后来他才谋得一官半职。 1518 年他创作五幕喜剧《曼陀萝花》（Mandragola） ，对现实社会的丑恶和腐败进行苦涩的嘲讽。1520 年，他秉承红衣主教朱利奥 • 美第奇的旨意，撰述《佛罗伦萨史》（Istorie fiorentine）这部史书打破了人文主义修史的传统，具有强烈的独创精神，其重要价值不在于叙事的精确，而在于有力的归纳和对事实的出色的组织。 1527 年罗马遭劫后，教皇克莱门特七世（美第奇家族后裔）的权势日益衰弱，美第奇家族又一次被逐出佛罗伦萨，昔日的僭主重整旗鼓，再度登基。马基雅维利提出恢复原职的要求，但因当权者对他怀有戒心，他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同年 7 月，这位有着远大政治抱负的社会、

国家理论家在贫困和忧悒中与世长辞。

马基雅维利是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他撰述的著作涉及政治、文学、历史和军事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其中于 1513 年写成的《君主论》为其最著名的代表作。马基雅维利深知自己是在开辟“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在他尝试过的所有文体中,包括历史、政论、小说和喜剧,都表现出他杰出的才华。综合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政治思想，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既顺应了当时把古罗马共和国视作最高政治理想的复古潮流，又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具体特征。自 16 世纪初叶起，意大利实际上已经进入政治和经济的衰落期。半岛上，在独立的共和国、公国和教皇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混战从未间断过。另则，1494—1559 年间，在意大利境内爆发了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所谓“意大利战争”，意大利一时成为法国、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各自争夺地盘的主要战场。长期的内忧外患使意大利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同时也加速了他们的民族觉醒，人们纷纷要求早日结束混战和岛上的政治分裂局面，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意大利的资产阶级。特别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城市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心中更是充满了在政治上统一意大利的热切希望。马基雅维利正是后者中的一员，他认为，若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必须坚决反对教会干预世俗王权，从而在削弱王孙贵族封建割据势力的前提下，建立强大、统一的中央集权民族国家。所以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鲜明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是那个时代的产物。

现代的一些文学批评家把马基雅维利誉为“新科学的奠基人”,因为在人类历史上,是他第一次提出‘政治独立于精神生活并区别于道德观念”这一标新立异的政治见解，并对意大利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君主论》中打破了陈旧的传统观念，阐述了生活的哲理，而一千五百余年来，教会却始终以教规束缚人们的思想，喋喋不休地教育人们努力成为“完美、高尚、虔诚的信

徒。’值得指出的是,马基雅维利虽然抨击了教会,但他并不全盘否定教会。他只是提出，教会和宗教信仰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并认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应当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为巩固其政权服务，那是因为信教的人易于管理。他把人的美德比作智慧的结晶，认为人的美德同宗教或神学毫无关联，它取决于人的品行和本能，从而打破了基督教建立起来的真实与理想、尘世与天堂、凡人与上帝之间的平衡关系。在他看来，在不存在神话和神灵的现实世界里，人的美德同命运之间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而宗教信仰只是一种统治人们思想的手段，它使下属服从上司，使军队效忠于君王。他认为宗教乃社会生活中的必要设施，肩负着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的重任。不过，他像佛罗伦萨的其他柏拉图主义者一样，也认为古罗马人和希腊人的“多神教”要比基督教好，因为后者教唆它的教徒们对生活采取消极的态度，鄙视尘世的欢乐，从而阻碍了统一意大利的前进步伐。

主要作品：

1）《论李维》

这是作者于 1513 至 1521 年间在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所著《罗马史记》基础上写成的一部政治思想论著,全书共分 3 卷 第 1 卷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结构；第 2 卷主要评述军事机构和战争事宜 第 3 卷则分析了国家稳定、繁荣和衰亡的种种原因。《论李维》反映了作者对自由的、美好的理想社会的无限向往，以及对神话般的古代共和国的崇拜。他似乎在瑞士找到了心目中理想国家的模式,因为那里风清弊绝,一片升平景象,是当时的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所无法比拟的。《论李维》全面揭示了国家政权的发展史，作者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政治体制因不完美而都不理想，应该努力建立一个集各政治体制之大成的共和制国家。另外，作者在书中肯定中央集权重要性的同时，热情讴歌人民的力量，并强调

指出：民众的看法有时要比君主的更谨慎、全面；假如说君主在制定法律、法令方面比人民贤明的话，那么人民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往往胜过君主。在他看来，古罗马时期贵族与贫民之间的冲突并没有削弱罗马帝国的威力，相反，它使帝国日趋繁荣富强。

作者在《论李维》中还指出 宗教信仰不是巩固政权的工具,而只是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标准，并在人民与国家之间起着平衡的作用。他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尽力扩大自己的疆域，因此由城市过渡到城邦国家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作者在书中提出了组织现代化国家的大胆设想，但没有指出通过什么途径达到这一目标。

2) 《君主论》

《君主论》是马基雅维利政治学说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对意大利几百年来政治实践的总结，以及他自己从政经验的理论概括。诚然，马基雅维利并不是研究国家问题的第一个学者，但他首先打破了陈旧的传统观念，第一个领悟了国家的性质和局限性。他在《君主论》中阐述了生活的哲理，而一千五百多年来，教会却始终以教规束缚人们的思想，喋喋不休地教育人们努力成为完美、高尚、虔诚的信徒。这两者之间大相径庭，而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明显具有革新倾向。在《君主论》中,作者抒发政治理想,并对意大利的前途充满坚定的信念。他认为，意大利当时仍是一个富有朝气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它完全有能力将外国人侵者全部从自己的国土上赶走。他以深邃的目光洞察现实社会，为建设意大利理想的明天提出大胆的设想；他呼吁尽早结束意大利政治上分裂割据的局面，主张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君主国。在他看来，国家的安宁和民族的力量是政治的最高法则，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手段,即使是最不道德的手段,都是有益的。他强调说,人性总是卑鄙的，人们与其说向善，不如说向恶。从这种信念出发，他向欲建立强大国家的君主推荐“皮鞭加蜜糖饼干的政策”，提出君主应以“国家利益”为其政治行动的惟一准则。这就是说，为达

到一定的政治目的，君主可以恬不知耻、不择手段。他指出，凭借美德、命运和军队的力量，新的君主完全有能力将意大利建设成一个强盛、统一的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于君主个人的才干和力量。马基雅维利意想中的新君主必须具备古代开国元勋那样的雄才大略，懂得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在犹如一盘散沙的基础上，建设起强大的国家。为此，君主在军事上必须凶悍、果断，在政治上则应该谨慎、灵活，只有这样，他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君主宁愿让人说成心胸狭隘而不可豁达大度；宁愿让人说成暴戾恣睢而绝不可宽容厚道。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强化国家政权的艰苦斗争中，君主不但要有狮子的雄威，而且要有狐狸的狡黠；如果有必要的话，君主甚至可以丢弃灵魂，背叛自己的信仰。简而言之，为了国家的繁荣和富强，君主可以玩弄一切卑劣手段而在所不惜，这就是所谓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是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社会，马基雅维利心目中头戴光环的君主是无处寻觅的，这纯粹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假设，带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另则，他在《君主论》中将人民这一重要的社会因素完全撇在一边，却极力颂扬君主的所谓“超人的才干”，殊不知，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的理论观念摆脱了道德，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以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他不是把统一祖国大业的希望寄托于人民，而是求之于霸主。

他在 1513 年 6 月至 12 月一气呵成《君主论》。在全书的开始部分，他以单纯的科学方法对不同类型的君主逐一加以分析，其中有世袭祖传的，也有新当选的，但他几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新的当权者身上，对其寄予无限的希冀。他认为，建立一个强盛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于君主个人的才干和胆识，他不必过多地考虑民意，但必须善于团结和联合各方面的力量，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防止出现内讧。为了形象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书中列举了许多古代历史上流芳百世的英杰：率领希伯来人摆脱埃及人奴役的摩

西、创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国王居鲁士、进入克里特迷宫斩除妖怪的雅典王子提修斯、罗马城的创建者罗慕路斯等。他还强调指出,在国家的政治机构中,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强大的军队是两根擎天大柱,但军队的最高统帅必须由君主亲自担任,士兵务必从本国的公民中招募，千万不可启用雇佣军。至于在对待下属的态度以及和邻国的关系方面，国家的利益必须高于一切。

马基雅维利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理论家，他总是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系统地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因而具有较大的说服力。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各类政治书籍，作品中蕴藉着他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对未来寄予的无限美好的希望，热忱和逻辑往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有时他把意想中虚无飘渺的“空中楼阁”当做行之有效的实践,但是,逻辑和理智总是在最后起着主导的作用，提出的观点往往具有坚固的理论基础。作者在书中以辛辣的措辞和鄙夷的态度评价全人类的历史，折射出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悲观情调，但他的悲观主义并不是为了折磨或挫伤敢于战胜困难的强者，失望中往往蕴含着藐视艰难的英雄气概。他在书中毫不回避残酷的现实,他不是依靠训诫,而是通过唤醒人们的斗志来改变现状。针对腐败成风和人们踟蹰不前的社会现实，他鼓励人们努力掌握自己的命运，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或借助国家的力量果断行动。他的理论冲破了旧习惯势力的羁绊，但他忽视了政治与道德观念之间的重要关系和人们在精神生活上的要求，因而引起不少人的强烈反对。

马基雅维利死后不久，在欧洲即掀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浪潮。罗马教廷为了继续保持其在精神世界的绝对统治地位，对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揭露教会腐败内幕、反对教皇干涉王权的论点,对文艺复兴崇尚的宇宙观、人生观,组织起猛烈的反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学说以人文主义为基础，摆脱了中世纪的宗教信条和神学概念,暴露出明显的桀骜不驯的反教会倾向,故成为反

宗教改革运动理论家们最大的攻击目标之一,他们甚至用‘马基雅维利主义’”一词泛指违反基督精神的异端教理,把它说成是‘欺骗”和‘无赖’的同名词。但在历史上,也有不少作家对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持肯定的态度:17 世纪的一些作家曾撰文表彰他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贡献 意大利著名诗人福斯科洛在他的抒情诗篇《坟场哀思》中,抒发了对马基雅维利的崇敬和景仰 到了 19 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人们再次肯定了马基雅维利在历史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不少为意大利的民族独立与统一而浴血奋战的爱国志士,把他誉为复兴意大利民族的先驱者,并将他在《君主论》中提出的国家学说视作鼓舞他们斗志的精神力量。意大利 19 世纪著名文学批评家德·桑克蒂斯在他的《意大利文学史》中,又一次肯定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地位，并对他的一生和政治思想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恰如其分的评价。尽管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但综观他的全部著作,应该说,他思想的主流是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的。在他身后的数百年中,一些欧洲国家的首脑仍将他的建国理论视为有益的箴言，从中吸取可作借鉴的积极因素,以巩固自己的政权。

3）《战术论》及其他

1521 年问世的《战术论》是在马基雅维利生前出版的他惟一的一部著作。1492 年罗棱佐·美第奇谢世后，枢机主教朱利奥·美第奇统治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声名显赫的贵族斯特罗齐把马基雅维利推荐给朱利奥。为感戴斯特罗齐的知遇之恩，马基雅维利向他呈献了对话体著作《战术论》。在这一部对话体军事论著中，作者运用巧妙的构思，精心设计了由将帅和文人共同参加的一场讨论,他们就战术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辩。作者认为 现代的将领应该以古罗马的军队建设作为仿效的典范，士兵必须从本国公民中征募；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来说，它至少得拥有一支由 15 000 至 20 000 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而步兵的势力应超过骑兵。

这部军事论著最深刻有力的部分是对雇佣军的各种弊端的批评，片面地认为雇佣军是导致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诚然，讨论涉及的内容并非纯粹是军事技术上的问题，政治始终像一根红线贯穿着这一部长达 7 卷的军事论著。作者谆谆告诫他的读者切莫灰心丧气，因为意大利就是为在人们心头燃起希望之火而诞生的。

《佛罗伦萨史》是马基雅维利最重要的一部历史著作，写于 1520 至 1525 年间，1525 年 6 月他把已写完的 8 卷呈献给新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像他其他早期作品一样，《佛罗伦萨史》具有强烈而独创的思想，独辟蹊径，打破了人文主义修史的传统，与其说他是以一个政治家，还不如说以一位历史学家的观点撰写历史。这部史书主要叙述和评论佛罗伦萨自建城至罗棱佐 · 美第奇谢世的历史。其中，前 4 卷主要叙述归尔甫党(教皇派)和吉柏林党(皇帝派)之间的争斗、市民革命、切尔基家族和多那迪家族的纷争、梳毛工人起义以及美第奇家族僭主政治的建立等历史事件，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思想 后 4 卷则全面评述了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地位。到了 16 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瑰丽梦想已如暮色中的落日，渐渐失去其原先的辉煌，作者怅惘心绪的流露在这部史书的字里行间颇为明显。

2. 费兰齐斯科 · 圭恰尔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

在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影响下，16 世纪意大利文坛上形成了编写历史的热潮，涌现出不少著名的学者和史籍作家，其中佛罗伦萨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可谓是一位不同凡响的代表人物。

圭恰尔迪尼出生于贵族家庭，1498—1505 年在佛罗伦萨、费拉拉、帕多瓦等地学习民法，以后在佛罗伦萨当律师。1508 年开始写作自己的家史和《1378—1509 年佛罗伦萨史》（Storia fioren-

tina)，显示出他剖析和叙述历史事件的天赋。不久便开始了他的政治和外交生涯,曾先后在西班牙、罗马等地担任各种要职,主张佛罗伦萨采用威尼斯式的贵族政体。1526 年 1 月,他奉召回到罗马,成为教皇的主要顾问之一。直至 1534 年，他一直为教皇效力，表现出非凡的行政才能。他积极支持教皇同法国结盟，以此削弱西班牙在意大利的霸权地位，后因推翻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的计划失败,加上罗马遭受洗劫,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地位岌岌可危。为此,1530 年 3 月佛罗伦萨共和国指控他为叛徒，并没收了他的家产。1528—1530 年他编纂第二部《佛罗伦萨史》,并将他的各种社会和政治观点编成一部简洁而精练的箴言和感想集《杂感》(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他从政治舞台上隐退之后，虽经努力谋到过一官半职,但由于政治上的失意,他终日忧郁寡欢。他离群索居,闭门著书,1536 年左右开始写作《1494—1534 年意大利史》(Storia d'Italia)，但未及完成全书的最后定稿便于 1540 年与世长辞。

他长年在佛罗伦萨政治、外交界担任要职,同达官显宦交往甚密，丰富的经历和坎坷的人生给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翔实的素材。但他是一位富有专研精神的学者，对历史的评价始终保持严肃认真、谨慎小心的态度。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政治家和史学家的最大美德在于慎重，即必须具有一双洞察一切的慧眼。”① 正因为如此，他多次在自己的论著中直言不讳地抨击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观点，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友情甚笃。他既不同意他的朋友不加区分地将所有古人都视作楷模或鉴戒的观点，也不赞同他试图在历史中寻找普遍规律的主张。他指出，对每一个历史事件都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切不可一视同仁,这是他政治理论的思想基础。在

①《意大利文学史大纲》,Giuseppe Petronio，Palumbo 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12 页。

他看来，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史学家，务必对每一件事作出恰如其分和慎重的判断，任何凭主观臆测得出的所谓一般规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同马基雅维利相比，圭恰尔迪尼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悲观、消沉的情绪更为明显和突出，他往往把历史看成一团漆黑，消极地认为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他曾感叹地说："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曾企求名誉和财富。我不止一次地得到过比我所希望得到的还要多的东西，但是它们却从未能给予我向往中的精神上的满足。"他把道德标准归纳成'个人利益'一词,意即人人为个人利益而生存,人除了顺应历史潮流而动以外别无它路可走。他在一生中遵循的正是上述这一条道德标准：教会和神父的腐败行为引起他内心强烈的反感,他欲加入马丁·路德组织新教的斗争行列，但为了个人利益,他还是继续信仰基督教；他对一些滥用职权的神父和暴戾恣睢的外国统治者深恶痛绝，希望自己能在临终前看到他们的可悲下场，但实际上他还是设法迎合潮流，甘心为他们服务。当然，他的悲观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同他本人的性格以及一生中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

《1494—1534 年意大利史》是圭恰尔迪尼在 1537—1540 年间写成的一部重要历史著作，全书共 20 卷，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典籍之一。这部史书实际上是圭恰尔迪尼于 1508 年撰著的《1378—1509 年佛罗伦萨史》的补充和继续，它记载了自罗棱佐·美第奇逝世至 1534 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驾崩为止的意大利史，指导思想是把全意大利分散的各城邦统一在一个强大的君主领导之下。当时,由罗棱佐·美第奇创建的一度繁荣昌盛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出现罅隙,政治形势岌岌可危,外国列强趁虚而入,意大利从此在政治上进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圭恰尔迪尼认为，佛罗伦萨的危机和美第奇家族的衰败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它们同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形势是密切相关的。他在书中形象地指出：意大利的历

史犹如一个诺大的舞台，人们的野心、奢望、私欲、贪婪都在这舞台上不间断地进行着较量和厮杀；为了维护意大利的繁荣，大家必须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他的这种思想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心声，也体现了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共同愿望。

圭恰尔迪尼坚持认为，史料必须重于考证。为撰写《1494—1534年意大利史》一书，他曾游历意大利各地的宫廷、罗马教廷、大战役的地点、事件的策源地等，他这种严肃认真的史学观对欧洲的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与马基雅维利相比，他缺乏追求崇高政治理想的火一般的热情，对人类的前途也不抱任何希望，认为人在社会现实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随机应变地维护个人利益，流露出一定的消极悲观的情绪。

3. 保罗·萨尔比(Paolo Sarpi，1552—1623)

萨尔比是16世纪意大利另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他生于威尼斯，年轻时曾加入圣母会。他刻苦攻读历史、神学和法律，并对数学、解剖学等学科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深得伽利略的推崇和景仰。他潜心研究解剖学，发现促进血液循环的静脉瓣，而且率先指出瞳孔在光线影响下有胀缩。他的友人，包括天文学家伽利略在内，都认为他是当时欧洲最伟大的数学家。伽利略遭受天主教谴责以后，萨尔比说："我颇有把握地相信，总有一天，人们在这一方面增加了知识，就会悔恨对伽利略所施加的屈辱，为如此一位伟人所受的冤枉而痛心。"1606年他被任命为威尼斯共和国神学和宗教法规顾问，开始同教会的上层神职人员有了频繁的接触，深为教廷种种腐败的内幕感到忧虑和不满。同年，教皇保罗五世以威尼斯拒不交出两名触犯教规的神父到庭受审为藉口，颁布褫夺共和国教权的决定，致使威尼斯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一度显得异常紧张。这一场权力之争后以威尼斯的胜利而告终，但萨尔比却因其反对宗教凌驾王权之上的政治立场而引起教廷对他的仇恨。不久，萨

尔比被开除教籍,其著作也被付之一炬。即便如此,教廷仍不肯就此罢休,以致他在 1607 年遇刺受伤。面对教廷的淫威，萨尔比并不气馁,继续以手中的笔作为讨伐的刀枪,在作品中抒发饱满的政治热情。

尽管有人多次指控他散布宗教异端思想，并对他和一些异教徒之间的深厚友谊加以责难，但他并不完全赞同马丁 · 路德的宗教改革观点。对他来说，有关神学问题的讨论只是一种学术上的研究而已。他反对教会过多地干预国家事务，鞭挞教会神职人员奢侈、腐化的生活。他主张限制教皇的权力,否定特兰托大公会议的决议，因为它与基督教精神背道而驰。他颂扬耶稣创建天主教的原始指导思想，不切实际地憧憬着精神世界的净化。

在罗马下令褫夺威尼斯共和国教权的前后，萨尔比著述了不少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在晚年写成的《特兰托大公会议史》(Istoria del Concilio Tridentino) ,全书共 8 卷,以彼得 · 索亚韦 · 波拉诺的笔名于 1619 年在伦敦出版。该书抨击教皇专制主义,引起舆论哗然,教会为之惊恐万状,立即组织专人撰文反驳。《特兰托大公会议史》记载了自 1520—1564 年大公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具体议程,叙述了宗教改革运动在德、英、法三国中引起的反响,分析了教皇同主教们的冲突。作者通过回忆当时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指出大公会议未能完成其主要的使命,即加强基督教世界的团结,把福音带给全人类,相反,它进一步加剧了教会内部的权力之争,造成了严重的教派分裂。他认为,特兰托大公会议的与会者们争论不休的是政治利益，在表面的宗教理论分歧后面隐藏着不同政治利益的激烈冲突。从这一点来看,《特兰托大公会议》一书秉承了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史学观。萨尔比以冷静的头脑客观地观察和分析历史事件，但是他在书中只是罗列了翔实的史料,未曾就信仰的本质问题提出讨论,故带有一定的实用主义色彩。该书被教廷列为禁书,但 10 年间多次再版

并先后被译成 5 种文字。

第二节 重要作家和作品

15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末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进入晚期，由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掀起的这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高潮表现出了旺盛的创作能力，造型艺术、诗歌创作以及新的哲学思想均达到了全面的繁荣昌盛，并越出意大利国界，扩及欧洲各国，在英、法、德、荷兰和西班牙等国先后出现了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高潮。尤其是在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初叶的 30 余年中,艺术家们所创作的作品，即使撇开其高度的艺术水平和重大的历史意义，仅数量而言，也许可以抵得上几个世纪。

然而，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意大利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却江河日下。自 15 世纪后期起，意大利沦为法国和西班牙掠夺的对象。到了 16 世纪，意大利境内战云密布，大部分地区被西班牙所控制，政治上已处于分裂割据状态，阶级分化日趋严重。另则，美洲大陆的发现和通往印度的海上航路的开辟，改变了昔日世界贸易的格局，意大利开始失去其原先地理上的优势。与此同时，随着一些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先后在阿尔卑斯山北麓的建立，意大利市场进一步萧条，北方诸国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加之城市共和国的僭主无力抵御外国军队的进犯，意大利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这在无形中为封建统治的重新登场准备了良好的温床。实际上，15 世纪的意大利社会,已被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和教皇国等四个最有实力的封建公国所控制。因此，当意大利最需要统一起来抵御外来侵略的时候，许多无法调和的矛盾使意大利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之中。其中，以意大利当然国君自居的教皇国，因其贪婪和霸道的本性，成为意大利统一最主要的绊脚石。当 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南下进犯意大利时，沿途竟未遇到意大

利人奋力的抵抗。但是，正是在这一风雨飘摇的历史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所展现出来的灿烂文化，却让外国人侵者叹为观止，惊诧不已。

由于一系列重大的地理发现以及科学领域内的显著成就，加之欧洲各国之间彼此交往不断趋向频繁，意大利在扩大自身影响的同时，其灿烂的文化也赢得了其他国家的高度赞赏和广泛的共鸣。由于意大利国内政治形势动荡不安，人们的宇宙观和民族意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昔日城市共和国的革命精神不但没有在政治和经济危机中消失殆尽，反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挥出更加明显的作用。应该说，当时的社会环境为盛期文艺复兴的到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灿烂文化，正是意大利历史现实的艺术体现。

我们通常称作的“盛期文艺复兴”，指的是人文主义文化鼎盛时期的文学艺术,即从 1492 年佛罗伦萨僭主罗棱佐·美第奇逝世至 1529 年堪布累齐和约确立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的数十年时间。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意大利半岛上的经济和商业呈现出一派凋零的景象。尽管如此，欧洲文艺复兴的高潮，还是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璀璨的艺术光泽在意大利形成了，并随后逐渐扩大至德国、法国、英国以及荷兰等欧洲其他国家。

一、杰出的语言学家和哲学家

1. 彼埃德罗·本博(Pietro Bembo，1470—1547)和语言问题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在意大利半岛上始终没有统一的语言，各地区的居民都用当地的方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彼此间的隔阂日益加深。一部文学作品问世后，怎样才能使半岛上更多的人读懂它呢？采用什么样的文学语言才能为大部分人所接受呢？寻求全民族统一的、优美流畅的文学语言已成为一件刻不

容缓的大事，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密切关注。在意大利进入文艺复兴盛期之后，文学艺术家们开始从真正意义上认识到俗语文学的历史价值，试图用俗语创作出能与古典作品相媲美的诗歌和散文,以抒发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空虚的来世心中的无奈和怅惘。应该说，16 世纪的通俗语文学是人文主义理想的充分表现,它既表达了内容与形式、现实与理想、思想与物质的完美平衡,也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事实上,早在 13 世纪就有人致力于语言问题的研究，但丁曾专门撰著《俗语论》对此进行认真的探讨。之后,人们继续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答案。到了 15 世纪，由于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文坛上出现了通俗语创作的回潮 博亚尔多的诗歌富有明显的埃米利亚方言的特色 浦尔契则完全采用佛罗伦萨语写诗,他甚至在诗句中揉入了不少富有民间色彩的俚语。与此同时,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三位文学鸿儒在其文学作品中采用的 13 世纪佛罗伦萨语，渐渐成为许多作家写作时的语言基础。到了 16 世纪上半叶,随着文学贵族化特征的不断明朗化,文坛上展开了一场关于语言和文学体裁的激烈争论。人们普遍希望文学语言具有稳定性和统一性,表达形式更加规范,词汇和语法规则更加准确。为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统一的文学语言成为半岛上各地区文人的共同呼声。诚然，此种语言显然不应该混同于当时在意大利各地区流行的任何方言,它必须继承意大利的文化传统,集前几个世纪中各种文学语言特色之大成。在这一场就语言问题而展开的激烈争论中,文人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其中,有的主张采纳佛罗伦萨语 有的虽然承认佛罗伦萨语的长处,但拒绝它的权威性,提出采用包括各种方言因素在内的宫廷语言；有的则极力推崇彼特拉克一薄伽丘式的文学语言，因为此种语言的权威性在 16 世纪初的数十年中益臻巩固。为了在提纯意大利语的同时继续保留佛罗伦萨语的特色,佛罗伦萨的‘ 秕糠文学研究会 ’在美第奇家族的大力

支持下于 1583 年宣告成立,并于 1612 年编纂出版《秕糠辞典》,后成为意大利语词典的蓝本。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辩中，威尼斯作家本博提出的标新立异的主张，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为大部分著名作家和学者所接受。本博 1470 年出生在威尼斯一个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少年时期，他来到其父亲供职的佛罗伦萨，有机会接触和学习纯正的佛罗伦萨语；成年后，他先后在罗马、帕多瓦和威尼斯等地供职，1539 年由教皇保罗三世任命为红衣主教，1547年病殁于罗马。

本博是 16 世纪著名的柏拉图式精神恋爱专论作家、语言问题理论家，以及后来风靡整个欧洲的“彼特拉克诗派”的创始人。他不仅通晓希腊语，而且对意大利中世纪文化和普罗旺斯文学也颇有研究，曾用纯正的佛罗伦萨语写过不少文采华丽的文章和诗歌。他在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阿索洛人》(Asolani) 中,精心设计了一群阿索洛青年男女在塞浦路斯前皇后住宅花园中的一段饶有趣味的对话，谈话的主题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即女子的美貌是高尚情操和上帝仁爱的象征。这一部对话体作品文体古拙，寓意深长，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哲学思想，以及他对文学艺术、俗语和人文主义文化的看法,在 16 世纪流传甚广。本博的柏拉图式爱情观继承了普罗旺斯诗歌和意大利抒情诗的传统，在肯定爱情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同时，主张将其从中世纪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又认为，人们务必使自己的精神生活与基督教的教义相一致。

于 1530 年问世的《抒情诗集》(Rime),是他以彼特拉克《歌集》为摹本而写成的作品,以所谓的‘本博体’而闻名。《歌集》共收入 150 余首抒情诗，几乎全部用十四行诗写成，使模仿彼特拉克赋诗法的创作风格在当时成为一种文学时尚，对 16 世纪的抒情诗创作有较大的影响。

本博的代表作《俗语散文》(Prose della volgar lingua)共分三卷,于 1525 年出版。在这一部对话体著作中，他虚构了在其兄弟家中展开的一场对白：其中，第一卷记载了通俗语的发展简史，并进一步阐明了以彼特拉克 —薄伽丘式文学语言为典范的佛罗伦萨语的优越性；第二卷就词语的性质和选择，以及句子的韵律和音乐感展开讨论；第三卷则以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文学创作语言为范例，对通俗语语法做了精辟的分析。在这一本被称为“第一部意大利文学语言的语法书”中，本博指出：口语和书面语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任何方言都不能成为书面语的基础，因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文学作品中的佛罗伦萨语早就为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开了先河。耐人寻味的是，本博在捍卫佛罗伦萨语权威性的辩论中，却把但丁排除在外。他认为，但丁的诗歌语言同 13 世纪佛罗伦萨的日常语言关系过于密切，无法体现 16 世纪贵族宫廷文化的特点。他在《俗语散文》中阐述的观点揭开了持续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争论，俗语和古典语言的捍卫者们就语言问题各抒己见，莫衷一是。诚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欣然认同本博的论点，有些人主张引用一部分新词语和外来语，有些人则坚持但丁的有关论述。尽管如此，本博的理论最后还是被大多数文人所接受，甚至连原先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有关写作语言以及文学创作风格的观点,对 16 世纪初叶意大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到了 16 世纪下半叶，围绕文学语言的辩论仍在继续，但此时本博有关论说的权威性已十分巩固，辩论随之成为纯学术性的讨论。

归根结底，大凡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在语言问题上都主张推广俗语而不是拉丁语，因为他们潜心研究拉丁语的初衷，正在于借助古典文学作品，探索处于不断运动和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正如帕多瓦著名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斯佩罗尼（Sperone Speroni)在其学术著作《有关语言的对话》(Dialogo delle lingue)中所说“由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精髓的人用曼图瓦方言所写的介绍亚里士多德

的文章，要比那些拘泥于形式、用希腊语注释写成的同类文章更明白易懂。’①随着提倡俗语的呼声在 16 世纪引起人们越来越广泛的共鸣，不少人认为，应当赋予人们自由选择合适的方式表达思想的权利。从根本上来说，与拉丁语相比，俗语是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新语言，采用它从事文学创作绝不意味着语言的退化，而是语言的繁衍。由于本博的有关论点迎合了 16 世纪文人要求语言简练的愿望，故流传甚广，影响也较深。与此同时，通俗语文学创作益臻兴旺 ,并在 16 世纪之后逐步发展至颠峰。值得在此指出的是，本博及其追随者在肯定优秀作家对意大利民族语言的形成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却贬低了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用语的应有地位。

2.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妥协

随着 15、16 世纪意大利社会、经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与中世纪经院哲学明显相悖的新哲学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种实为唯物主义性质的世俗化新哲学，作为人文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已不再是神学的婢女。如果说，早期人文主义学者倾向于歌颂世俗的城市文明生活，那么到了 15 世纪末期，它已明显转变为逃避现实和对隐逸生活的向往。在萨鲁达蒂、布鲁尼和瓦拉时代居统治地位的对生活的积极颂扬，现已被带有苦行色彩的柏拉图主义和思考死亡问题的哲学所取代。诚然，这种变化绝非偶然，它与当时意大利的整个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 15 世纪末叶的佛罗伦萨，由于美第奇家族建立的僭主统治给该地区人民的自由蒙上了一道浓重的阴影，柏拉图式的沉思和神秘理想便开始兴盛起来。

在西方哲学史上，柏拉图是将唯心主义体系化的第一人。他的‘ 理念论 ”,一种客观唯心论 ,根本否认物质生活的真实性 ,主张

① 《意大利人文主义》,Eugenio Garin。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156 页。

物质世界以外还有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认为它是物质世界的原型或模式，而物质世界则是它的不完全复制品。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应用于政治领域，产生了他的"理想国"。因此，柏拉图的教育、文艺思想，亦有明显的保守性质。毫无疑问，新柏拉图主义强调沉思默想生活，而公民人文主义者则颂扬积极活跃的生活，两者是无法调和的，但是两者都自称是人文主义者。

在 15 世纪的意大利和西欧其他国家的哲学思想史上，柏拉图主义的复活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研究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新柏拉图主义抓住现实中的矛盾，能够理解和容忍各种分歧，且表现出一种温和的妥协，所以得到许多人文主义者的偏爱。实际上，柏拉图的哲学遗产在前几个世纪里在欧洲并不为许多人所知，从 15 世纪初起，首先是在佛罗伦萨，通过对希腊语以及希腊语著作的潜心研究，人们迎来了人文主义思想史的新阶段，柏拉图的哲学遗产才开始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值得在此指出的是，许多拜占庭希腊学者和哲学家在 1453 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纷纷涌入意大利，这无形中为具有反经院哲学精神的新哲学传入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君士坦丁堡哲学家普勒托内撰写的哲学著作，否定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思想，用柏拉图的彻底唯心主义同亚里士多德的唯物主义倾向相对抗。另则，普勒托内力图更新宗教生活，认为柏拉图主义，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新柏拉图主义"，是宗教生活最完善的思想基础。这位拜占庭的神智学家在佛罗伦萨开展的活动，对当时的意大利颇有影响。正是在普勒托内的鼓动下，佛罗伦萨僭主柯西莫·美第奇萌生了希望在佛罗伦萨重建古代柏拉图学园的想法，该学园后于 1459 年在柯西莫的直接参与和庇护下成立。该学园所展开的活动折射出文艺复兴时期文化和哲学复杂而矛盾的征：一方面，它具有反经院哲学的明显倾向，有助于动摇统治着意大利和欧洲的天主教会；另一方面，该学园提出的柏拉图观点带有

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力图在柏拉图哲学的基础上使基督教完善化。

柏拉图学园建立数年之后，柯西莫即任命学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费奇诺将柏拉图及其门徒们的著作全部译成拉丁文。费奇诺强调柏拉图哲学与基督教的亲密关系,企图将两者调和起来,这种认为‘和谐’和‘匀称’是宇宙根本原则的信念,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同普勒托内一样，与其说费奇诺是哲学家,倒不如说是柏拉图化的神学家。在他看来,基督教是领悟上帝太初启示的一个形式，人们通过这种启示得以了解世界各种形态、各个梯级的全部壮丽和完美,按他本人的话说“:古人的哲学无非就是有学问的宗教。”在费奇诺的眼中,整个宇宙现实也就是上帝创造的一首长诗,而它所包含的真理是活着的上帝,是长着爱的翅膀并与世长存的人的精神。如果从根本上加以剖析，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 费奇诺的哲学观点明显依从于新柏拉图主义,本身并无太大的独创性 费奇诺的神学理论结构框架的全部内容,也不外乎诗、美和爱。其实,费奇诺提出的‘智慧宗教”,只不过是把哲学和诗歌融合起来的‘宗教哲学”,与亚里士多德崇尚的自然主义及诗歌明显相悖。另外，费奇诺对柏拉图哲学以及灵魂不朽说的神学注释，对这个时期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毕柯是意大利 15 世纪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在结识佛罗伦萨的人文主义者和柏拉图派的文人之后，也加入了柏拉图学园。毕柯认为，现存的各种宗教，只是那个尚未存在的普泛宗教“真理”的不完备的表现形式。他在罗马哲学辩论会开幕式上发表的题为《论人的尊严》的演说,具有人文主义的时代特色,但其观点的理论基础同样源自新柏拉图主义的泛神论，反映了该时期人文主义者新旧思想的冲突。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都对亚里士多德灵魂不朽的观点感到不满，因为它始终摇摆于该问题的肯定解决和否定解决之间，而这正是他们提出把柏拉图哲学作为基督

教哲学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

柏拉图哲学产生于世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危机之中，是能容纳各家之言的哲学，它的对话显得十分神圣，且富有人性、世俗性和社会性。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不少人文主义者常用‘神圣的’柏拉图来反对‘僵化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思潮在整个 16 世纪久盛不衰，吸引着不少诗人和哲学家，但它对亚里士多德主义同样表现出十分宽容的态度，在驳斥亚里士多德学派宣称任何妥协都是不可能的观点的同时，还指出亚里士多德是通向庄严、崇高的柏拉图之路的起点。

除了反对经院哲学化了的亚里士多德以外，佛罗伦萨的柏拉图主义者还将矛头指向伊本·路西德(阿拉伯哲学家、医学家,欧洲人称之为阿威罗伊）主义的追随者，把他们视作亚里士多德唯物主义的主要注释者。伊本·路西德属唯理论派哲学家，主张除天启以外，一切事物都应服从理性的判决，否定个人灵魂不朽，承认物质和运动的永恒存在 ;主张‘双重真理’论,认为科学真理和宗教真理是两种完全彼此独立的真理。由于“双重真理说”成了科学和唯物主义世界观对宗教进攻的一种形式，认为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宗教哲学基础的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自然也就拒绝接受“双重真理说”。

二、优秀作家及作品

1. 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利奥内和他的《侍臣》

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下，16 世纪的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一些专门讨论人之美的文学作品，表现出鲜明的文艺复兴时代精神，成为文艺复兴美学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亮点。此类作品中，最具有影响力的当属卡斯蒂利奥内的《侍臣》（Cortigiano）。通过这部对话体作品，卡斯蒂利奥内向人们揭示：具有强壮体魄和高尚情操的

人已经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他需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安排现世生活。书中一些章节所展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思想，不失为一种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人生美学，故一直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著作之一，也为作者本人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卡斯蒂利奥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是与本博同时代的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出生在曼图瓦的一个贵族世家，年轻时代曾在米兰一所人文主义学校接受教育，并学习骑士技艺。其间，他开始接受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来曾在北方好几个宫廷供职。1504 年至 1513 年，他旅居乌尔宾诺，这是他一生中文学创作成果最为丰硕的 10 年。1516 年他返回曼图瓦，婚后不久妻子猝亡。同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派遣他去马德里出任教廷使节，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五世对他颇为赏识，并把他赞誉为“世上最有才华的骑士”。1529 年他殁于西班牙托莱多。

他在旅居乌尔宾诺期间撰写的《侍臣》是他的代表作,是 16 世纪意大利一部十分重要的文学作品。这部对话体伦理作品由 4 卷组成,经作者多年反复修改、润色,于 1528 年问世。在这部风格高雅、文字精练的作品中，作者精心设计了在乌尔宾诺宫廷内展开的一场对白，对话者除宫廷权贵外，还有作者本人和其他一些著名文人。随着对话一步步向纵深发展，他描写了理想的侍臣、贵妇人以及侍臣与王公之间的关系，并以清晰的线条勾勒出一帧栩栩如生的侍臣肖像画 品行高雅,体魄健壮,精于兵器,通晓诗文,擅长绘画,深通音乐、政治和战术。简而言之,在作者的妙笔之下,理想的侍臣成了知书达理、骁勇善战的全才，他不仅给宫廷带来荣耀，而且在处理各项事务中是君主的得力助手。卡斯蒂利奥内笔下的侍臣，形象地暴露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贵族文化的特点，同拉斐尔、提香等著名画家的人物肖像画有异曲同工之妙。确实，在 16 世纪欧洲各国的上流社会中，意大利人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实际行动中，都称得上是整个欧洲的楷模。

书中描述的这一场由权贵和文人共同参加的讨论持续了 4 天，为塑造完美的侍臣形象，他们侃侃而谈，各献良策。第 1、第 2 天，他们就"侍臣"的内涵和外延作了确切、完整的说明；第 3 天主要谈论宫廷贵妇人端庄的举止和雍容华贵的风度；第 4 天对话者们就侍臣同君主之间的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认为两者绝非是单纯的主仆关系，侍臣应该是启迪君主的贤达。《侍臣》的内容涉及当时上层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学、哲学、政治、爱情等，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学观和道德观。不少文学批评家认为，《侍臣》是卡斯蒂利奥内生动的自我写照，这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出类拔萃、性格独立不羁的廷臣，书中一些章节展示的美学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尤为重要的是，作者在建树以自然和本色为美的人文美尺度的同时，更侧重于人的内在气质，他笔下的侍臣，显然是一个集各种禀赋大成的 16 世纪文艺复兴的"完人"，充分体现了作者本人关于人之美的理念。《侍臣》是 16 世纪意大利文坛上的一部杰作，出版后很受赞赏，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当时颇有影响。

2. 德拉·卡萨（Giovanni Della Casa，1503—1556）

德拉·卡萨是 16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坛上另一位重要的品行论文作家。1503 年他出生在托斯卡纳地区穆杰洛，早年曾在佛罗伦萨、波伦亚、帕多瓦及罗马等地读书；1528 年在帕多瓦结识威尼斯著名作家本博，两人友情甚笃。1534 年他在罗马出家为僧，1544 年任贝内文托大主教，出使威尼斯；1555 年教皇保罗四世任命他为教皇国国务秘书。他在 1544—1549 年任罗马教廷驻威尼斯特使期间，写有两篇颇有影响的政治演讲词，号召威尼斯人民结成联盟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敦促皇帝将皮亚琴察归还给教会。

德拉·卡萨用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写了不少朝气蓬勃的讽刺诗

和壮丽的抒情诗，但其主要的作品是评述世俗社会规矩礼数的短文《礼范》(Il galateo)，以及模仿彼特拉克赋诗法创作的《抒情诗集》(Rime)。《礼范》创作于1550—1557 年间，1558年与他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抒情诗集》一起问世，是一部既风趣而又有人情味的诗体作品，流传甚广，曾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作者也因此名传后世。《礼范》通过一位年迈的学者对其外孙讲故事的方式，引用实例和文学名著中的名言，论述了一个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就'侍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了更为翔实、细致的说明。在《礼范》一文中，德拉·卡萨还阐述了常规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从而揭示了生活中的各种不和谐因素。

3. 彼埃德罗·阿雷迪诺(Pietro Aretino，1492—1556)

阿雷迪诺是16世纪上半叶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散文家和剧作家。他出生在阿雷佐城一户鞋匠之家，后来却冒充是某贵族的私生子，并以故乡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氏，其真名不详。年轻时他来到佩鲁贾，从事过绘画。1517 年移居罗马，在那里写下了许多辛辣刻薄的文章，支持朱利奥竞选教皇的活动。1527 年他来到威尼斯，终其一生过着豪华而放荡的生活。在威尼斯，他与著名画家提香结为挚友，曾替画家出售过不少画作给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阿雷迪诺一生著述甚丰，因敢于用傲慢的文字攻击权贵而受到当时全欧洲的赞扬，他的火一般热情的书信和对话有着传记性和时事性价值。他依靠王公贵族害怕他的讽刺而赠与的礼物致富。他的6卷书信集(1537—1557 年出版)显示出他愤世嫉俗的秉性，并为他自诩为'王公的鞭子'提出了充分的理由，集中反映了他显赫的荣耀和玩世不恭的人生哲学。

《论据》(Ragionamenti)一书较突出地反映出阿雷迪诺一贯的写作风格，与16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社会的道德标准明显相悖，

书中主要描述罗马妓女互相揭露该城许多达官显宦的淫荡和腐败。他的 5 部喜剧:《御马官》(Il marescalco)、《宫廷侍女》(La cortigiana)、《伪君子》(L'ipocrito)、《泰兰达》(La Talanta)和《哲学家》(Il filosofo) ,对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作了入木三分的评述,在 16 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御马官》,该剧以曼图瓦公爵最终劝服御马官娶妻的荒诞、诙谐的故事情节,嘲讽迂腐的学究,真实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生活面貌。另外,阿雷迪诺还写有一部取材于李维《罗马史》的悲剧《奥拉齐亚》(L'Orazia,1545) ,被认为是 16 世纪最佳的意大利悲剧。

4. 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1474—1533)

阿里奥斯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典型、最杰出的一位作家和诗人。他的不朽史诗《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rioso) 充分体现了古典艺术风格,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芒,集中反映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诗人以罕见的天赋、强烈的敏感、深邃的目光和隽永的笔触,在诗句中抒发政治理想,赞美人文主义道德精神。他的诗歌作品音韵和谐,语言鲜明生动,对后来欧洲叙事诗的发展有较大的影响。直至今日,他的《疯狂的奥兰多》仍被誉为意大利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人的创作倾向和心态的最出色的表现。

阿里奥斯托于 1474 年生于意大利北部勒佐—埃米利亚一个要塞司令的家庭。10 岁那年他随父母迁居费拉拉,并顺从父命在那里攻读法律。他早年即显示出不同凡响的诗才,1494 年后转而研习文学至 1499 年,他贪婪地阅读各种文学书籍,从而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阿里奥斯托非常喜爱费拉拉这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重镇,一直称其为自己的故乡。1500 年他父亲去世后,沉重的家庭负担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面对五个妹妹

和四个弟弟的大家庭，他被迫中辍心爱的文学研究和拉丁语诗歌创作，进入费拉拉名门望族埃斯特家族的宫廷供职。 1503 年,他开始在红衣主教伊波利多手下任职，曾追随主教出使威尼斯、罗马等地。阿里奥斯托性格内向，感情深沉，一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得以在安逸的环境中从事文学创作。但为了生存，他却不得不常因公务外出，为此心中感到怏怏不乐，并在几首讽刺诗中反映自己心中的苦闷，表达远离富丽堂皇的宫廷、寻求俭朴平静生活的愿望。大约从 1505 年起,阿里奥斯托开始写作《疯狂的奥兰多》,写成后历经多次修改增补，终其一生始定。1513 年乔万尼 · 美第奇当选为教皇，称号利奥十世。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阿里奥斯托对利奥十世奉行的保护文艺的政策寄予莫大的希望。他怀着满腔的热忱和殷切的希望，专程前往罗马寻觅求取功名的捷径，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心中不胜感慨。1517—1525 年间,他以贺拉斯的讽刺诗为范本，创作了 7 首讽刺诗,总题为《讽刺诗集》(Satire)。诗人于迟暮之年为了不致影响他按教规应享受的某些利益而秘密结婚，隐居费拉拉，以侍弄他的小花园和修改《疯狂的奥兰多》自娱。他在费拉拉买了一所小房子，终于找到了一处清静、安逸的住所，和妻儿们一起安度晚年。与此同时，他为其代表作《疯狂的奥兰多》的第三个版本作文字上的修改和提高。1533 年 7 月他与世长辞。

1） 主要作品

阿里奥斯托一生著述富宏，除了早期用拉丁语和通俗语创作的讽刺诗、抒情诗、情歌和挽歌以外，他还撰著了五部取材于埃斯特宫廷轶事的喜剧。

早年，阿里奥斯托师法罗马诗人提希卢斯和贺拉斯，用拉丁文写过一些诗，这些诗技巧虽不成熟，但感情率真。 1517—1525 年间创作的《讽刺诗集》共收入 7 首诗，第一首强调作者自尊自重，不随人俯仰；第二首批评教会的腐败；第三首劝人莫生非分的野

心；第四首议论婚姻；第五、第六两首写的是由于其主人只顾自己而使作者陷于背井离乡的凄凉境地；第七首是写给本博的，诉说自己年轻时未能完成文艺学业的悲苦心情。这 7 首讽刺诗隐晦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一些阴暗面，但就艺术而言，这些诗尚未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只是为他的成名作《疯狂的奥兰多》的创作打下了基础。

另外，阿里奥斯托还在吸取拉丁喜剧长处的基础上，写过 5 部喜剧，它们属于最早摹仿拉丁喜剧、用本国语写成的作品，开很长时期欧洲喜剧的风气之先。他以现实主义的笔触，通过诙谐的描摹手法，把古典主义艺术和现实主义的内容和谐地糅合在一起，使作品富有现代寓言式的寓意和幽默。他的喜剧拉开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创作的帷幕，他也因而成为意大利风俗喜剧的奠基人。他的喜剧均取材于费拉拉埃斯特家族的宫廷轶事，比如欢乐的节日、赏心悦目的戏剧表现、宫廷内讧等，剧中的人物通常是一些奸刁的仆人、年老的吝啬鬼、浪荡的恶少和阿谀奉承的寄生虫等。他的喜剧改变了 15 世纪拉丁喜剧的陈旧模式，在喜剧的情节、人物和场景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并有所突破，带有幽默和诙谐的趣味，在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流传甚广。其中，较著名的有《列娜》（Lena）、《妖术》（Negromante）等。尽管他的这些诗歌和喜剧作品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显得不够成熟，但是人们已经从中朦胧地看到《疯狂的奥兰多》所表现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时代精神和诗人超凡的艺术才华。

2） 《疯狂的奥兰多》与骑士文学

阿里奥斯托的代表作、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全面反映了文艺复兴后期贵族文化崇尚肉欲爱情和赞美虚浮人生乐趣的特征，是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意大利文学史上最优秀的诗篇之一。如果说，但丁以他的《神曲》预告了愚昧的中世纪的结束，薄伽丘的《十日谈》揭开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序幕，那么阿里奥斯托则以他的

《疯狂的奥兰多》最全面地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他自1502—1503 年间起开始创作长诗,1507 年完成初稿，并一再修改和补充,直至 1532 年才正式定稿出版。他不辞辛劳地花费了 30 年左右的时间，不断地对长诗加以修改和润色，为之几乎耗尽了毕生的心血。1516 年长诗在红衣主教伊波利多的资助下在威尼斯初版,共包括 40 首。之后,他又根据本博关于文学语言的论述,从语言和文体两个方面对长诗逐字逐句地进行认真的斟酌和推敲，并在原有的基础上将长诗写至 46 首,表现了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写作态度。为了提高长诗的艺术效果，他毫无保留地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利用一切机缘征求友人的建议，听取他人的箴劝，终于使长诗成为一部流芳百世的文学巨著。

就内容而言，这一部骑士史诗是博亚尔多《热恋中的奥兰多》的续篇,全诗共四千余节,三万余行,用八行诗体写成。1494 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进犯意大利，博亚尔多被迫辍笔，后战死疆场。在《热恋中的奥兰多》的末尾，查理大帝将东方公主安杰丽嘉托付给纳莫公爵，答应将她许配给击退敌军进攻中创建奇功的人为妻。《疯狂的奥兰多》则以安杰丽嘉趁混乱之际再次出逃揭开长诗的序幕，接着是一连串充满神奇色彩的惊险离奇的故事，头绪繁多，情节生动，诗人丰富的想像力和巧妙的构思令人惊叹不已。在诗人塑造的千姿百态的人物中间,既有英雄、美人,又有国王、巫师、妖精、仙女……他们交织成一幅幅壮观的画面，从各个角度生动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精神，折射出灿烂的艺术光彩。阿里奥斯托在长诗中将人文主义思想和民间文学的题材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既发扬了民间诗歌的传统，又表现出一种和谐的美。尽管长诗的内容浩如烟海，但诗人运用流丽的八行诗体，游刃有余地将全诗引向纵深,结构谨密,层次分明,韵味浓重。

同博亚尔多的《热恋中的奥兰多》相比，阿里奥斯托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方面更注意结构的严谨、层次的分明和承上启下的相

互关联。就情节而言，有三条主要线索贯穿全诗，其他许多故事则都围绕着这三条线索循序渐进：第一条是查理大帝和他的骑士们对伊斯兰教徒的战争，最后以撒拉森人的溃败告终；第二条是骑士奥兰多对东方公主安杰丽嘉至死不渝的爱情；第三条是伊斯兰教徒鲁杰罗对女兵勃拉达曼蒂充满幻想的爱情。在这三条线索中，第二条最为重要：不管是基督的臣民，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撒拉森人，都为安杰丽嘉的美貌而神魂失舍，在她身后苦苦紧追；奥兰多为寻觅她的芳踪，走遍天涯海角，历经千难万险，最后因失恋而疯狂，因为安杰丽嘉爱上了在战场上邂逅的伊斯兰教徒梅多洛，并同他结为夫妇，双双返回她东方的故土。下面所译的是选自《疯狂的奥兰多》的第一首，描述安杰丽嘉出逃时的恢宏场面：

她穿过幽邃可怕的密林，
进入人迹罕至的荒野。
风在苦栎、榆树、山毛榉树梢上穿行
呼啸作响，
带着莫名的恐惧
她沿着阴影斑斑的小路落荒而逃；
幽暗的山谷里
随处可见利那尔多的黑影。

她宛如出生在丛林里的
一头小鹿或小狍，
见一头豹的爪子抓住母亲的脖子
正撕裂她的脊背和胸部，
她飞速穿越密密的树丛
拼命逃离猛兽的血口，
成为豹子 口 中之物的恐惧

使她吓得浑身哆嗦。

一天一夜，
她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
最后来到一座苍翠蓊郁的树林，
那里和风拂面，树枝摇曳，
那里芳草萋萋
低语的小溪清澈见底，
溪水缓缓淌过洁白如玉的石子，
欢畅的乐曲令人心旷神怡。

她充满自信
仿佛利那尔多远在天际，
酷暑和长途跋涉使她疲惫不堪
她决定小憩片刻。
在花丛中她从马背上跳下
松缰任马信步自行，
马儿啃吃着水边肥嫩的青草
沿着晶莹的小溪。

不远处有一片葱绿的灌木丛
长满朱红的玫瑰，白色的山楂，
她走至平静如镜的溪水边，
在参天蔽日的栎树底下
浓荫密布的林中空地
席地而坐。
那层层叠叠的树叶
挡住了每一缕灼热的阳光。

茸茸的芳草
是来客歇息的小床，
美人儿躺在松软的草地上
渐渐进入甜蜜的梦乡。

尽管长诗的内容浩如烟海,但诗人始终未迷失方向,他运用流丽的八行诗体将全诗引向纵深。与博亚尔多和浦尔契的诗相比，《疯狂的奥兰多》结构严密,韵味浓厚,是艺术上造诣较深的一部文学作品。它犹如一面明亮的镜子，真实地反映出诗人的性格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宫廷文学的贵族化特征。长诗中千姿百态的人物和起伏跌宕的情节都是作者凭想象虚构的，同当时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是从整体来看，长诗还是勾勒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社会的主要轮廓，生动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长诗贬斥中世纪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偏见,隐喻天意不再是主宰一切的力量,颂扬生活赋予人自然美和艺术美的享受。此外,诗人要求结束封建割据局面和实现国家和平统一的愿望，在长诗中也得到了较好的体现。阿里奥斯托热情歌颂现世生活的欢乐，诗句中展示的男女之间的性爱冲破了中世纪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的束缚，显得更加具体化、物质化。在诗人的笔下,东方美女安杰丽嘉成了青春和美色的象征,是整部史诗的灵魂,即使是基督的信徒也为追求世俗幸福而跟在她身后紧追不舍。

就写作风格而言，他与卡斯蒂利奥内、本博有着一个共同点，即善于吸取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其他诗人的长处，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优美、柔和的诗体。他独具匠心地交替运用悲剧和喜剧因素、抒情和叙事手法、严肃和诙谐情调，在密如蛛网的头绪中游刃有余。他的诗句结构明朗,文辞流丽,曾受到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伏尔泰、拜伦、普希金等人的推崇。

诗人清楚地意识到,长诗的主要读者是宫廷中的权贵、侍臣和贵妇人,所以不论在情节的处理或语言的选择方面,他从不超越一定的界限,显得十分得体。在奥兰多失去理智的悲剧场面,阿里奥斯托花费了不少笔墨,细致入微地描写青年骑士的心理变化,为的是在思想感情上激起读者内心的共鸣。事实上，他的读者对奥兰多失恋发疯情节的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欣赏的是诗人巧妙的构思：在查理大帝人数众多的贴身武士中，偏偏是处事明智、品行高尚的奥兰多因得不到所恋女子的爱而癫狂。即使在发疯之后,奥兰多的举止也从未冲破理智的堤坝,这同他在宫廷中的地位和身份是相符的。再比如，在与基督教徒塞比诺决斗负伤的一段叙述中,诗人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写他严重的伤势,而是有意识地把读者的视线马上引向一位正在绣花的美丽妇人白皙的手臂上，以此来冲淡过于严肃的气氛。

《疯狂的奥兰多》问世后,在意大利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博得了普遍的赞扬，尤其是文学界人士和新兴资产阶级对它格外垂青。长诗一版再版,成了 16 世纪脍炙人口、雅俗共赏的一部文学著作,即使是一些文学素养不甚精深的社会中、下层人士,也对它赞不绝口。1575 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著名诗人塔索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出版,文艺批评家们就阿里奥斯托和塔索作品的文学地位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辩,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6 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已如西沉的夕阳，渐渐失去其迷人的风采和令人眩目的光泽。尽管如此,《疯狂的奥兰多》连同它的作者一起,已载入世界文学史册。

5. 托夸多 · 塔索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1559 年 4 月,由法国为一方,西班牙、英国、萨伏依公国为另一方，在法国卡托一堪布累齐签订和约，从此宣告了意大利战争（1494—1559 年）的结束，确认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绝对统治地

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文化艺术方面,对意大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意大利从此失去其政治上的独立，直至 19 世纪下半叶方才完成其民族统一的大业。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中,欧洲的封建制度已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民族国家逐渐形成,而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竭力维护旧的封建秩序,阻碍社会的进步，因而发展成为矛盾的焦点。尼德兰著名人文主义者伊斯拉谟于 1509 年发表其著名讽刺作品《愚人颂》,他用犀利的笔锋嘲讽教会的伪善,教士的放荡,以及世俗贵族的庸碌,从而预告了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到来。接着，基督教路德宗的创始人马丁 · 路德公开发表‘ 九十五条论纲 ”,抨击教皇出售赎罪券,揭开了斗争的序幕。面对来自波澜壮阔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大挑战，天主教自 1545 年起在意大利北部城市特兰托召开第十九次宗教会议,前后历时 18 年,对一切异教思想进行残酷的镇压,目的是反对宗教改革运动，重整天主教，维护教皇的权威。由于马丁 · 路德发动的新教运动促使欧洲一大片土地脱离罗马教皇的控制，意大利随之失去了昔日在欧洲精神世界中的统治地位。

慑于外国统治者和教会的淫威,人们不敢自由地表达思想,文艺复兴崇尚的先进思想逐渐失去昔日的感召力。更严重的是，教会下令对大批书籍进行所谓的‘ 洗涤 ’和‘ 纯净 ”,薄伽丘的《十日谈》也被‘ 整理 ’后重新出版。与此同时,耶稣会在 1540 年获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后在各地相继成立,它垄断文化的传播,创办了许多文艺研究机构，努力培养顺从基督精神的知识分子为天主教利益服务。这一系列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反宗教改革的措施，无疑给文艺创作带来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有的作家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不得不违心地接受新的宗教教义，撰文抨击文艺复兴颂扬的自由思想；另有一部分作家则一味追求文学作品形式上的美而忽视其内容实质,试图以此排遣内心的忧戚。

塔索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鲜明、

绚烂,充满丰富多彩的生活感,蕴含着他思想感情上的矛盾和内心的痛苦。一方面，天主教反动势力的高压政策使他在精神上深感恐惧 另一方面,他对世俗爱情和感官的快乐有着热烈的追求。所以，他创作的诗歌形象地体现了宗教改革时期文艺复兴的基本特征,同当时的文化危机紧密相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塔索的英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颂扬宗教改革运动精神的一座丰碑。

1） 生平

1544 年 3 月,塔索(Torquato Tasso，1544—1595)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苏连托,其父为宫廷诗人,写过一些颇有文学价值的叙事诗。塔索早年曾在耶稣会学校读书，后在罗马和乌尔宾诺等地继续求学。母亲病故后，他前往威尼斯同其父亲一起生活。正是在这一时期中,他开始写他的处女作《耶路撒冷》,后因力不从心而不得已辍笔。在帕多瓦攻读法律期间，他有幸结识当地文化界的不少名流,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学习、研究古希腊诗人亚里士多德的赋诗法，这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561 年他创作骑士叙事诗《利那尔多》（Rinaldo） ,这是一则描写查理大帝的贴身武士利那尔多和加斯科尼国王的妹妹卡拉丽琪的爱情故事。翌年,他将它敬献给埃斯特家族的红衣主教路易其,这才得以出版。在旅居波伦亚期间，曾有人指控他赋诗嘲笑当地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为此他被迫迁居帕多瓦。

1565 年他进入埃斯特家族的宫廷供职，在红衣主教路易其手下服务,同那里的上流人士接触频繁。那之后的 10 年可谓是他坎坷人生道路上的绿洲，也是他在文学创作园地里辛勤耕耘并结出丰硕成果的黄金时期。 1573 年他为宫廷盛典创作了田园剧《阿明达》(Aminta) ：描写阿明达与女神西尔维娅恋爱的故事，及悲剧《托利斯蒙多王》（Re Torrismondo） ：描写哥特王托利斯蒙多和挪威公主阿尔维达的爱情悲剧。 1575 年他完成了宏伟的叙事诗《被

解放的耶路撒冷》（Gerusalemme liberata ）的创作，当初定名为《高弗莱多》。由于他对宗教信仰心存疑窦,加之对长诗的文辞修饰不甚满意，故在创作这部气势恢宏的叙事诗的过程中，思绪万千,忐忑不安,还专程去罗马向一些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求教,希望他们帮助他重新对长诗进行修改、润色。由于惧怕上帝的惩罚和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不得不屈服于当时的道德观念和迂腐的文学思想，违心地将原诗中一些描写男女情爱的优美章节删去。人文主义的先进思想同传统的宗教道德观念之间激烈的冲突使塔索无所适从,他为此陷入莫大的痛苦之中,体力和精神上的消耗使他的情绪日趋消沉。1577 年，诗人向费拉拉教会异端裁判所诉说了自己内心的疑惑和痛苦,虽获得了宽恕,但未给他带来丝毫的精神安慰。不久,长期的忧郁症导致他精神失常,并因在盛怒之下向仆人投刀而被关进修道院。当他逃离修道院回到家中时，连他的亲姐妹都认不出他原来的面目，可见诗人在精神上蒙受了多么大的痛苦。之后，他开始了漂泊不定的生活。 1578 年他返回费拉拉时,正值埃斯特公爵第三次婚礼的盛典,他因未被邀请参加这一隆重的婚礼而大发雷霆,精神再度失常,为此他被关进费拉拉一所疯人院。在他被关押的 7 年中,他写下了各种体裁的作品(对话、诗歌、书信等),被誉为当时最富有才华的诗人之一。1595 年,也就是他谢世的那一年,罗马教皇克莱门特八世授予他‘ 桂冠诗人 ’的称号。费拉拉的公爵之所以将诗人关押在疯人院长达 7 年之久，除了诗人疯癫的表面原因以外,他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 公爵同罗马教廷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罗马对公爵虎视眈眈,欲待公爵归天后将其封地划入教廷领地范围之内。所以，对公爵而言，塔索对宗教信仰的怀疑态度无疑是一种潜伏的危险，他不愿因塔索而得罪罗马教廷。

2） 塔索的内心世界

在塔索被囚禁疯人院的数年中,他的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

冷》问世,在文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肯定和否定长诗的两大派之间,辩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前者认为,《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文学价值远远超过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后者则以充满敌意的辛辣措词抨击塔索的这一部皇皇巨著。塔索对长诗的出版原先一无所知,现在见有人百般贬低它的文学价值,心中感到十分悲痛。他以顽强的毅力对叙事诗重新加以整理和修改,并将 1593 年重版的版本改名为《被征服的耶路撒冷》。暮年的诗人体质日趋羸弱,生活漂泊不定,辗转于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曼多瓦等地,同时继续从事文学创作。1594 年罗马教皇决定给他举行诗人的加冕典礼,但此时的塔索已病人膏肓,于翌年'桂冠诗人'加冕典礼前夕凄凉地离开了人世。综观塔索传奇式的一生,他那近乎荒诞的举止实质上是对那些不通诗文、心胸狭隘的庸人一种无声的抗议;而他在长年监禁生活中始终没有泯灭的创作热情,则体现了人文主义思想同天主教经院哲学在他内心的激烈冲突。到了几个世纪以后的浪漫主义文学时期,塔索成了天才诗人的偶像和受人顶礼膜拜的英雄,而他那坎坷的人生经历则成为许多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的创作素材。

塔索早在创作叙事诗《利那尔多》时,已显露出不同凡响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创作风格。由于他自幼接受传统的文化教育,他的一些诗带有训世诗的韵味,但他不愿拘守绳墨,执意追求诗歌语言优美的音乐感。与文艺复兴时期其他诗人不同,塔索不再把权贵老爷的宫廷看做社会生活的中心。对他来说,宫廷只是实现他个人荣耀并为他提供一个舒适生活环境的阶梯。他似乎在费拉拉找到了理想中的宫廷,但不久又对它感到失望。只有诗歌和爱情才能赐予他内心的快慰,使他在精神上有所寄托。

塔索的文学作品反映了文艺复兴晚期的主要社会矛盾,流露出诗人无法摆脱这些矛盾而积压在心中的忧伤和痛楚。在文艺复兴后期,天主教会采取的一系列高压政策导致了文化的危机,新的

宗教说教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人们的自由，使他们普遍感到怅然若失，无所适从。塔索不愿在文学创作方面规行矩步，他欲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世俗爱情生活的追求，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跋前踬后，惘然若失。因此，他时而寄希望于理想的宫廷，时而沉湎在不切实际的梦幻之中，诗句中每每流露出莫名的忧悒和伤感。实质上，塔索的精神状态和内心矛盾并非完全由他的性格所致，它恰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和16 世纪末叶意大利文化界的创作倾向。塔索把自己禁锢在狭小的生活圈子里，以诗歌的形式抒发感情，描绘人生的甜、酸、苦、辣，试图以此忘却心中的烦恼和痛苦，在超然物外的诗歌意境中寻找精神慰藉。

3）《利那尔多》和《阿明达》

塔索忧郁、消沉的情绪在叙事诗《利那尔多》和田园剧《阿明达》中表现得不甚明显，因为他那乖戾的性格是在他漫长的人生道路上逐渐形成的。这两部诗人的早期作品主要表达他祈望荣耀、爱情和世俗幸福的夙愿，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和当时流行的创作风格如出一辙。

《利那尔多》是塔索的处女作，是他在18 岁那年仿照亚里士多德的赋诗法写成的八行体叙事诗，共包括 12 首，1562 年在威尼斯出版。作品叙述了查理大帝的贴身武士利那尔多为赢得加斯科尼国王的妹妹克拉丽琪的芳心所创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宣扬了人对现世生活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就诗歌的语言和韵律而言，小塔索(当时人们都这般称呼他)的写作技巧已相当娴熟，他巧妙地将自己融汇在诗歌的意境之中，使长诗具有一定的自传体特色，同他后来撰述的代表作《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的那样，《利那尔多》的格调显得有点呆滞和单调。尽管如此，它还是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

倘若《利那尔多》是诗人在文学创作上一次大胆的尝试,那么他 10 年后写成的田园剧《阿明达》则是一部在文学素养和艺术造诣上更为精深的作品。这一出牧歌式的戏剧描绘了牧人阿明达对美丽骄矜的山林女神西尔维娅诚挚、炽烈的爱情 她冷酷无情、狂妄任性,而年轻的牧人阿明达却对她一片痴情,最后女神为他的赤诚之爱所感动,答应嫁他为妻。诗人在写《阿明达》的过程中,不断地从前人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以此开拓自己的创作视野。他在剧中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均以自己熟稔的人为原型,所以说,这出田园剧是理想宫廷生活升华的结果。对爱情的讴歌和颂扬是全剧的中心思想,诗人将它咏赞成人生至高无上的感情,但它又往往给人带来莫名的烦恼、悲伤和痛楚。

4） 英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是塔索在创作《利那尔多》的同时,于 1575 年完成的一部世界文学名著，闪耀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最后的光芒，作者为之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早在诗人 15 岁那年，他就计划以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保护耶稣圣墓为题材写一部长诗，但由于当时力不从心，故在写完第 1 首后就被迫辍笔。1570 年后,他重新拿起 10 余年前未竟的作品，决心将这心中的梦想变成现实,以遂心愿。是什么精神力量鼓舞着诗人为《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焚膏继晷呢 ?自 1097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侵至塔索生活的时代,历史巨人已走过了几乎五百年漫长、坎坷的路程,但不少人对这一事件的重大历史意义依然持疑惑或费解的态度。诗人运用叙事诗的艺术形式,生动地再现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历史事件,并锲而不舍地为之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显然，塔索选择十字军收复圣城耶路撒冷为创作题材并非出于偶然 :一方面,他在文学上汲汲于成名,欲以古希腊诗人荷马和拉丁诗人维吉尔为自己师法的典范,在诗苑与阿里奥斯托的《疯狂的奥兰多》媲美 另一方面,当时欧洲正面临土耳其人入侵的严重威胁，诗人试图借助十字军东侵的历史

事件唤起意大利人民的斗争热情，抵御土耳其势力的不断扩张。他以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在描述史实的同时,揭示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社会问题，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人生哲学之间的尖锐矛盾。塔索笔下的十字军同伊斯兰教徒在耶路撒冷的激战场面惊心动魄,气势磅礴,穿插其间的一些内容各异的、动人的爱情故事,同整部作品的主题浑然一体,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在这一部由 20 首组成的英雄史诗中,作者巧夺天工地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个个具有很强的个性,他们的爱情故事尽管结局凄惨,但是他们的爱情观完全超越了中世纪的宗教偏见,宣扬了现世生活的欢乐,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时代精神。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以第一次十字军东侵为主要情节,穿插一些浪漫的甚至超自然的故事，试图在当时的道德理想和作者自己的美感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它虽然以古典作品为楷模,在风格上却达到了文艺复兴诗歌的顶峰,预言着 17 世纪巴罗克倾向的出现。叙事诗于 1575 年问世,诗人将这部包括 20 首诗的八行体长诗献给埃斯特家族的阿尔丰沙二世。塔索在长诗中穿插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同整部作品的主题显得十分和谐 骁勇善战的骑士利那尔多和魔女阿尔米达之间传奇式的爱情、邪魔为撒拉森人助战和天神出兵同基督教徒一起驰骋疆场的故事、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基督信徒奥林德和索菲罗尼亚之间的故事……正如塔索在他的论著《论诗的艺术》（Discorsi dell’arte poetica)中所说的那样,长诗生动地再现了十字军攻打圣城耶路撒冷的历史，而穿插其间的爱情故事使这部叙事诗的主题更加鲜明。长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诗人以十字军保卫耶路撒冷和最终战胜伊斯兰教徒为主要线索，把许多内容各异的故事巧妙地串联在一起。尽管长诗反映的历史事迹发生在遥远的历史年代,但他酣畅淋漓的叙述,在今天依然深深地吸引着广大的读者,并在他们的心中激起共鸣,尤其是隐含在诗

句中的对传统宗教思想的疑惑，博得了不少人的赞赏和同情。塔索试图在长诗中显示基督教信仰的精神力量，并花了不少笔墨宣传基督教思想必然战胜肉欲的多神教精神的道理，但恰恰是他刻画的一些非基督教徒的人物形象以及表现他们战斗精神的场面，使长诗的意境更富有艺术感染力。应该说，阿里奥斯托只是从远处安详地观望他笔下的人物及其充满冒险的经历，而塔索则满怀激情地介入他所描述的事件之中,他的诗文哀婉庄重,富有浓厚的抒情色彩。下面的几行诗选译自《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第 3 首 歌 ：

迫不及待想攻入圣城
十字军全速向耶路撒冷挺进，
七月骄阳似火，
大地被烤得干涸龟裂，
耶路撒冷渐渐进入视线
圣城的轮廓益臻清晰，
到处响彻
向圣城致意的欢呼声。

为抵达遥远的陆地
满载着十字军的战船起锚远航，
异乡天空下的大海诡谲多变
狂风怒吼，海浪滔天，
当心中的圣城在地平线上隐现
欢呼声响遏行云，
全部抛之脑后
航程中的危险和艰辛。

个个欢欣雀跃

幸福的暖流顿时沁入心田，
但伴随而来的却是
无限的畏惧和崇敬，
人人鼓足勇气举目远眺
基督长眠的城池，
殉难后又复活
他的遗骨就安葬在那里。

悲喜交集的十字军
啜泣着
发出轻微的叹息，
在空气中久久低迴
就好像密林里
风在树梢上穿行时的低语，
又仿佛奔腾的波涛
撞击礁石时巨大的轰鸣。

同田园剧《阿明达》相仿,《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格调也显得消极、低沉，体现了诗人的性格和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就艺术表现手法而言,诗人追求嵬然、庄重的风格,在感情的抒发上力求严肃、得体,在词语的选择上颇为慎重,带有宫廷诗歌的高雅风采。另外,他的诗歌语言富有浓厚的抒情味和悲怆、伤感的情调,阴影和光亮,欢乐和痛苦,挫折和胜利每每错综重迭,富有一定巴罗克文化的特征。

第三节　人文主义的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人文主义”一词为现代词的组合,来源

于拉丁语的 humanae litterae 和俗语的 humanista ,意即重新发掘古籍的价值和重新确立人应有的历史地位。人文主义者不仅是学者、诗人、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思想家、神学家,他们不仅在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还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人文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思想体系，也是一次全面的思想文化运动。它在为人的地位和价值大声呐喊的同时，自身的种种陈旧的中世纪思想意识依然不时地显露出来，新与旧每每互相缠绕，难以分割。初期的人文主义者希望摆脱中世纪神学的桎梏，重新认识并确立人的价值，但是他们还没有找到取代中世纪神秘主义的新的哲学理论,故内心充满各种矛盾和痛苦,彷徨迷惘,踟蹰不前。从瓦拉开始,人文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思索、批判及寻求新理论的阶段，人文主义者试图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中寻觅到建立新思想的基础和准绳。尽管如此，他们依然不可能完全摆脱教会的束缚,作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无法忘却天国的幸福,故往往把古典哲学和宗教神学思想糅合在一起。彼特拉克最早恢复了古希腊思想家提出的‘ 人是最宝贵 ’的思想,认为‘ 人 ’是上帝创造的万物中最奇妙的创造物。在此基础上,薄伽丘对人性、人生目的则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创新的见解，认为人向来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贵贱的标准。萨鲁达蒂将人和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市民应该参与政治、为国家效劳,从而把人生的目的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布鲁尼发展了萨鲁达蒂积极生活的思想，提出人只有通过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才能表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帕尔米埃利在思想理论的深度上超过了布鲁尼，明确提出了社会存在是人的本质。曼内蒂则认为，人来到世界上绝不是如圣经《创世篇》所说只是为了经受苦难,而是为了享受快乐。费奇诺指出,人具有无限的认识能力,也有创造一切的能力,人就是尘世的上帝。毕柯明确肯定了人的自我创造能力，认为人可以根

据自己的意愿形成自己的本质和面貌,人应该反对迷信权威,向一切哲学家学习。毕柯关于人的学说，是文艺复兴时期人的理论发展的顶峰,在他之后,马基雅维利进一步肯定了人的自由意志。尽管如此,在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身上,新旧矛盾的对立仍然表现得十分突出,他们反对基督教的惟我独尊,但是对基督教作为最高真理而存在的价值仍深信不疑。

人文主义摒弃基督教神学史观,反对把《圣经》中的无稽之谈视为历史,并大力搜集古籍,奉古典史学的传统为楷模,重视人事的记载，试图探索社会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人文主义犹如一阵春风,开始把人们从中世纪的迷梦中吹醒,它不仅使人们从宗教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而且还为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为近代西欧文化史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然而，人文主义者只是实践了人从信仰到理性的转变，而完全转变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4 世纪是意大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在中世纪近千年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一些禁锢文学家创作思想的陈旧观念濒于瓦解，而新型的文学尚未破土而出。在彼特拉克的作品中开始萌芽的人文主义思想,到了 15 世纪有了很大的发展，意大利文坛开始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的繁荣景象，一批富有艺术才华的文学家脱颖而出，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奏响了序曲。

人文主义不单纯是文学上的一股新潮流，它集中反映了 14、15 世纪的意大利在政治、历史、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实际情况,是 16 世纪上半叶文艺复兴运动的开端。起初,“人文主义”这一定义被用来泛指钻研、模仿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语法、修辞、诗体)的倾向,但实质上它是文艺复兴初期形成的一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人文主义者主张一切以“人”为本,反对中世纪以神学为精神支柱的封建意识形态。就时间而言，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同属一个时代,即从彼特拉克、薄伽丘的逝世至 16 世纪中叶为结束意大利战争而在法国签订卡托·堪布累齐和约为止。但是人文主义

作为一个文化运动,早在城邦时代就开始酝酿,因而有一些文学批评家把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称作" 人文主义的先驱者 "。

其实，唱出中世纪封建文学挽歌和新时代人文主义文学序曲的，是中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由于但丁生活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转折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在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即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每每与封建和宗教意识交织在一起。在他不朽的长诗《神曲》中,但丁不仅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教会的腐朽和伪善，而且还流露出对世俗爱情的同情和对现实生活的向往。不宁唯是,我们在《神曲》气势恢宏的诗句中,还可以找到推崇古典文化、反对蒙昧主义、歌颂知识和才华的内容，发现诗人反对意大利封建割据和主张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即使在创作语言方面，但丁抛弃了中世纪教会极力提倡的拉丁语,而采用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凡此种种,都使但丁的《神曲》成为人文主义文学的先声。

诚然，欧洲人文主义文学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他们的创作体现了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的基本成就。应该说，彼特拉克在肯定现实、肯定人生、反对禁欲主义方面比但丁更坚决、更彻底。他的著名抒情诗集《歌集》,就是一曲人间幸福的赞歌。如果说但丁只是对爱情表示同情，彼特拉克表现为对爱情的抽象和一般的赞美,那么薄伽丘则更具体地、多方面地描写了世俗的爱情生活,并由此抒发了' 幸福在人间 '的人文主义思想。

从年代学的观点来看，人文主义的崛起正值城邦衰亡和专制封建式的公国日趋兴旺发达的历史阶段。僭主们为了巩固和加强手中的权力，越来越感到招募贤达的必要性。在保护文艺政策的感召之下,一些确有真才实学的文人纷至沓来,成为各宫廷中的嘉宾,他们为美化市容,改革陈规陋习,推动文学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僭主们不仅是文艺最大的保护者和赞助者，而且往往也是文学创作的开拓者。此种现象在意大利中、北部地区尤为

突出，像佛罗伦萨公国僭主罗棱佐·美第奇就是其中明显之一例。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和宗教思想截然不同，人文主义在赞美个人品德高尚、举止风雅的同时，极力颂扬人的尊严、自由以及他们战胜自然的伟大力量。

作为文学思潮，人文主义的凝聚力就在于“人的发现”，一个大写的近代意义的“人”，成了文学创作的中心。人文主义文学提倡人权和人性，反对神权和神性 提倡现世享乐，反对禁欲主义 歌颂理性才智，反对蒙昧主义 提倡平等仁爱，反对等级压迫 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 提倡直面人生，反对神秘梦幻。在文学创作的体裁形式上，人文主义作家吸取古代希腊罗马文学，以及中世纪民间文学中有利的和合理的因素，经创新使近代的戏剧、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形式益臻趋向完善和成熟。在文学语言上，人文主义作家反对封建教会制定的必须用拉丁语写作的陈规，采用各区域生动活泼的地方语言写作，为统一意大利民族语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文学得以在 15 世纪有了蓬勃的发展，并继而越过阿尔卑斯山在法国播种结果，最后在英国和西班牙显出其战斗的身姿。

然而，有一些人文主义者将漫长的中世纪描绘成暗淡无光、愚昧混沌和由神权主宰一切的封建王国，这种说法显然有点过于渲染。实际上，在中世纪，有不少文人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研究和翻译古代经典著作。因此，全盘否认中世纪文化是一种偏激的观点。再则，人文主义者虽然希望摆脱中世纪神学的羁绊，重新认识人的价值，但是这种希望还没有达到要求人性解放的高度，更没有形成理论。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人文主义者不可能完全摆脱天主教的束缚，作为虔诚的教徒，他们还需要将古典哲学与宗教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但丁的《神曲》，我们将不难发现，诗句中弥漫着浓重的封建神学色彩，诗人依然将基督教和上帝视作宇宙的原动力和爱的化身。至于他采用的艺术风格，也大都是中世

纪文学常用的梦幻、寓意、象征的手法,这些都是但丁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不可避免的思想局限。同样,彼特拉克的《歌集》只是抒发了诗人对世俗感情和现世欢乐的强烈渴望，他在诗句中记录的不是爱情的外部表现,而是爱情在他内心深处的反响,以至始终未能彻底摆脱感情上的折磨。生活在欧洲社会变革时代的彼特拉克,还无法找到社会变革的真正出路,更缺乏勇气去触动作为中世纪上层建筑支柱的天主教会。

人文主义者确实在历史上起过很大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基本上属于社会中、上层的有产阶级,本人往往就是贵族或僧侣,同教会和宫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脱离社会现实，错误地把文化与生活，知识与社会割裂开来。他们每每对周围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孤芳自赏,自命不凡,无视广大民众的疾苦,把乡村描摹成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他们贬低通俗语的价值，一味颂扬只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拉丁语。显而易见,正是人文主义者的阶级地位,成了决定人文主义思想的实质、内容和演变的直接原因。

人文主义是 14 至 16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一股先进思潮，标志着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为了摆脱经院哲学和教会的束缚，人文主义者勇敢地提出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表现了旺盛的革命朝气。在文化思想领域内,人文主义者承担了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任务，他们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仅仅是为数不多的上层知识分子,而绝大部分意大利人民，只是作为旁观者目睹了人文主义发展的全过程。所以，新文化的诞生进一步加深了中世纪末期各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使下层人民同文学艺术的关系日趋疏远。

就社会意义而言,人文主义有其积极和进步的一面 它使西欧文明史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从而加速了历史发展的进程。

首先,人文主义者完成了文学世俗化的重要使命,文化第一次脱离中世纪神学法权的严密控制，人开始认识自己的力量和真正价值。在长达近千年的中世纪历史阶段中，一切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都是为神学服务的工具，而天主教的教义则被公认为世上唯一的真谛。那时,知识分子的任务只是领悟和宣传天主教的神学思想,而决不是积极反映人追求世俗欢乐的本性。人文主义者不愿继续栖身在神学的阴影底下，他们为科学文化领域早春的到来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对人文主义者作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在人文主义者中,最杰出的都是"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① 人文主义者最初的活动是搜集古代手抄本和研究古代语言、哲学、文学，他们的足迹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社会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在人文主义思想的推动下，意大利文坛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在政治理论方面,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明确提出了政治不从属于任何宗教信仰的精辟见解，主张采取一切手段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在自然科学方面，列奥纳多·达·芬奇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服从于客观规律，同时指出，人们必须从经验出发，并通过经验去探索原因。在艺术方面，画家拉斐尔和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创作了不少表现新兴资产阶级感情的人物绘画和雕塑,打击了为封建教会服务的哥德式艺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和浪漫主义的幻想，表现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他们为自由而战的精神面貌。在历史方面,罗马哲学家、历史学家瓦拉从语言的角度有力地证实,在中世纪广为流传的历史资料《君士坦丁的赠礼》(内称 4 世纪时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曾把帝国西部政权"赠与"教皇)是伪造的,从而揭穿了罗马教皇妄图在政治上统治西欧和意大利的阴谋。在社会理论方面,康帕内拉在《太阳城》

① 《〈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45 页。

一书中,阐述了他的空想共产主义,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一切公有,没有家庭或私产,人人都有劳动光荣感。

尽管下层人民无法读懂拉丁语文学作品，但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正是通过拉丁语这一语言工具同欧洲诸国的知识分子交流文化和沟通思想的。人文主义者往往都投靠在某贵族或僭主的门下,并在其宫廷内供职,权贵们则为了光耀门庭和显示自己博学多才,四方招募贤士,竭力推行保护文艺的政策。随着人文主义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罗马、乌尔宾诺、费拉拉、帕多瓦、威尼斯、米兰等地逐渐发展成为意大利的文化中心,尤其在佛罗伦萨和米兰，文化活动显得格外活跃和生气勃勃。

1438 年，罗马教皇在费拉拉城主持召开大公会议，并在会上宣布了罗马天主教会同希腊教会合并的决定。之后，许多通晓古希腊语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地从希腊进入意大利，其中的一部分人利用这一良机,去瑞士、法国和德国的一些修道院收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法典，并以自己不懈的努力保留住了作为中世纪意大利文化唯一伟大源泉的罗马法。另外，东罗马帝国的京都君士坦丁堡在 1453 年被土耳其攻克后，一大批希腊知识分子逃往意大利定居，他们也为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中心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值得在此指出的是,中国的印刷术通过西亚传入了欧洲,大大推动了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传播。

诚然，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对人文主义者极端仇视,把他们视作洪水猛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迫害和镇压。哲学家庞波那齐因对‘灵魂不朽说’表示怀疑而受到教会的迫害，其著作被付之一炬；哲学家布鲁诺反对经院哲学,主张人们有怀疑宗教教义的自由,结果被宗教裁判所判处死刑后烧死在罗马；空想共产主义者康帕内拉因组织那不勒斯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斗争和策划意大利南方喀拉布里亚人民的起义，被囚禁长达 27 年之久；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利用望远镜观

察天体所取得的大量成果，有力地证明了哥白尼的地动说，但次年，罗马教廷圣职部对他施行强制管束。为建立闪烁人文主义思想的新文学，人文主义者不畏艰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宝贵的生命。

15 世纪，正当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蓬勃发展的时候，佛罗伦萨银行家、政治家柯西莫·美第奇于 1434 年取代古老的阿尔毕齐家族，控制佛罗伦萨政权，建立僭主政治。他上台之后大兴骑士之风，复活骑士文学，以此为自己的专制政权服务。另外，由于国家的长期分裂、外来侵略以及宗教裁判所势力的猖獗，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学未充分发展起来便开始走向衰落。尽管如此，人文主义运动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为新时代的诞生开辟了道路。作为欧洲文学史上第一个具有独立完整意义的文学思潮，人文主义文学的巨大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它还波及政治、经济、宗教、军事乃至整个社会生活，即使对后世文学的发展同样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促进作用。

从 15 世纪末至 16 世纪 30 年代，即从法军入侵意大利至佛罗伦萨臣服于西班牙统治，作为一场具有特定形态的新文化、新思想运动，人文主义发展至顶峰。自 16 世纪 40 年代起，人文主义开始走向衰落，但它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影响依然余音不绝，绵延至今。

第六章　巴罗克文化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第一节　巴罗克文化的起源

在塔索谢世后的一百余年中,意大利文坛上的政治、哲学、科学著作的创作活动颇为繁荣,而相比之下,诗歌的发展却显得十分缓慢,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诗篇数量甚少,故被意大利 19 世纪著名文学史家德 · 桑克蒂斯称为“ 没落的世纪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现象反映了 17 世纪意大利社会萧条、衰落的景象。当时，由于天主教会和西班牙统治者的压制，人们的精神状态普遍处于低潮，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昔日的政治理想和抱负犹如西山之暮日，光亮徐徐黯淡。慑于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不少作家和诗人避免在文学作品中直率地抒发政治理想，也不敢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积极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在欧洲，自从哥伦布于 1492 年发现新大陆和新航路以来，海上运输的枢纽已从地中海移至大西洋。于是,尼德兰和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逐渐取代昔日意大利的重要地位,导致 17 世纪意大利社会的滞后。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巴罗克文化破土而出。

巴罗克时期艺术庄严高贵的特点，来自文艺复兴时期所发扬的古典艺术精华同礼教观念的约束作用的结合。关于“ 巴罗克 ”这一词语的来源,学者们各抒己见,说法不一。德、法两国的文学批评家认为，它来源于西班牙语的“ barrueco ” 和葡萄牙语的“ barrocco” ,后派生出法语形容词“ baroque” ,特指一种形状奇特的珍珠。意大利人则指出,“ 巴罗克 ”源自逻辑学中用来形容三段论法的一个名词“ barocco”。18 世纪末，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们对 17

世纪的文学艺术提出异议,他们通常运用‘巴罗克’这一词形容当时文学作品的怪诞和不规范化。

作为西方艺术史上的一个时代，巴罗克时期大致为 17 世纪，而其最早的表现则在 16 世纪后期。巴罗克时期的作品在风格上极为复杂,但一般来说,反映了力图寓感情于具有感性吸引力的形式之中的愿望。最常见的特点是气势雄伟，生气勃勃，有动态感，气氛紧张，充满戏剧性和鲜明性，擅长于表现各种强烈的感情色彩，颇有打破各种艺术界限的趋势。巴罗克时期的文化反对文艺复兴盛期的严肃、含蓄和平衡,追求浮夸、豪华和奇特的艺术效果，给人以感官上美的享受。这种以‘奇异’为基调的新颖风格,同 16 世纪风靡一时的古典主义大相径庭。意大利巴罗克文化的代表诗人马里诺曾直言不讳地说“:诗人的宗旨是给人以奇异的感觉……不懂得使读者感到诧异的诗人，最好还是刷马去。”①就写作艺术而言，比喻和象征是巴罗克文化时期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法。作家往往运用其异常丰富的想像力，将一个十分简单的现象大大加以渲染,以致读者阅后惊叹不已。比如,巴罗克派诗人别出心裁地将玫瑰比作‘花中的皇后’,少女乌亮的秀发比作‘汩汩的溪水’,人的眸子比作‘两个明亮、光辉的太阳’。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比比皆是。

由马丁·路德掀起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但震撼了整个欧洲的精神世界，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天主教会一方面积极策划反击，另一方面则企图通过新颖的文学艺术和布道说教重新激发人们的宗教感情。以追求动势、起伏和外形富丽堂皇而著称的巴罗克教堂建筑艺术，正是在这一特殊的政治形势下诞生的。它把建筑、雕塑和绘画合成一体,采用光亮和

① 《意大利文学史大纲》,Giuseppe Petronio，Palumbo 出版社 1973年版,第 281 页。

阴影交替的技巧,风格纤巧、浮华,以色彩美给人造成幻觉。其中,梵蒂冈的圣彼得大教堂以及圣彼得广场，就是颇具代表性的两个例子。意大利和西班牙是两个具有悠久天主教宗教传统的国家，巴罗克文化在那里比较容易地找到了适宜它滋长的土壤，并逐渐由此扩大至整个欧洲。在巴罗克文化时期，欧洲涌现出不少才华出众的诗人，其中，西班牙著名诗人贡哥拉的诗歌语言矫揉造作,诗句晦涩难懂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异常丰富的形象化语言、精妙入微的心理刻画使人耳目一新。

17 世纪末叶以前，巴罗克一词最初用于艺术批评，泛指各种不合常规、稀奇古怪的,因而也是离经叛道的事物。到了 18 世纪,它被用作贬义，一般是指违反自然规律和古典艺术标准的做法。在 19 世纪中叶之前，它依然被用作贬义，而非艺术风格的名称。直到 1888 年德国艺术家 H·沃尔芬发表《文艺复兴和巴罗克》一书,对巴罗克风格作了系统的表述,充分肯定了巴罗克文化同传统艺术决裂的积极意义。巴罗克时期出现的艺术形式各异，当代人必须按照这个时代比较广泛的各种文化倾向去探索它们的统一特性。论及巴罗克文化形成的原因,下面的三个因素至关重要 第一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出现，它不论在地区的势力方面还是在思想的影响方面都在日益扩大,巴罗克艺术中心的许多不朽之作,特别是意大利绘画和建筑中的许多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与教会采取的新的宣传态度有关；第二是君主专制政体的巩固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这从法国王室建造的凡尔赛宫及花园就可窥见当时的政治和文化发展对艺术所产生的影响；第三是随着科学发展和对地球不断的探索,人们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对自身的价值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宗教势力和非宗教势力保持着一种基本上令人乐观的新的均势。即使在音乐艺术领域，最显著的一个转折点也发生在 17 世纪初的意大利,

出现了歌剧、清唱剧和大合唱等声乐方面最重要的新的艺术形式。在意大利,继 17 世纪哥白尼的重大天文发现之后，有一部分作家产生了探索新天地的强烈欲望，他们开始以敏锐的目光仔细观察社会现实,在作品中积极反映社会生活中阴暗、鄙陋的一面,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风采。

第二节　巴罗克文化时期的代表诗人马里诺

17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艺术注重外在的美,语言倾向艳丽、洒脱,创作风格浮华。马里诺(Giambattista Marino,1569—1625)是巴罗克文化的代表诗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所谓"马里诺主义"一味追求繁丽的创作格调,较多地运用比喻和象征的艺术手法,统治着意大利 17 世纪的诗坛。马里诺以及他的追随者们宣称，诗歌应该以它的"新奇"和"怪诞"给读者在感官上造成快感,他的诗歌风格对当时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主要作品有长诗《安东尼斯》(L'Adone)、诗集《画廊》(Galleria)、田园诗《风笛》(La Sampogna)等。

马里诺于 1569 年出生在意大利南方那不勒斯一个法学家的家庭，一生坎坷，有关他生平的传奇式历险故事广泛流传于民间。他酷爱古典文学,勤奋地浏览群书,故博学广识。他年轻时因不从父命学习法律而被其父亲逐出家门，后由塔索的一位挚友将他收留。尔后，他曾在好几个贵族门下供职。1598 年他因"诱拐妇女罪"被捕入狱,两年后又因伪造证件而第二次被捕。在都灵,他博得当时萨伏依公国大公、文艺保护人埃玛努埃莱一世的青睐和袒护。从 1615 年起,诗人旅居巴黎,其间,他深得法国女王玛丽亚·美第奇及其幼子路易十三世的信赖和重用。1623 年他为路易十三世所著的长诗《安东尼斯》出版后,在法国获得极大的成功。翌年他回到意大利,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他被誉为意大利诗苑的荣耀

和杰出的诗人。1625 年 3月，他在那不勒斯与世长辞。

马里诺长于诗歌,他的许多早期作品以手稿形式广为流传,受到全欧洲的赞誉。他是一位多产作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书信、散文、抒情诗、祝婚诗和颂诗。1596 年，他以神话和田园生活为题材写出一组牧歌集《风笛》。1615 年他离开都灵赴巴黎,1623 年在离开巴黎前,他发表了经 20 年辛勤耕耘写成的卷帙浩繁的长诗《安东尼斯》(45 000 行),共包括 20 章,主要叙述爱神维纳斯和美少年安东尼斯之间的爱情,充分体现了瑕瑜互见的风格 罗马战神玛尔斯出于嫉妒,怂恿一头野猪将安东尼斯撞死 維纳斯替情人举行隆重葬礼,为表明心迹,将自己的心变作一朵美丽的鲜花。作为一位诗人,马里诺才思敏捷、感情丰富,他那独具魅力的性格和追求奇妙、美感的创作风格,使他的长诗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为此名噪一时,声誉大震。到了 17 世纪末，他的作品渐渐失去昔日的风采，有一些文学批评家甚至全盘否定他的诗作。《安东尼斯》在意大利引起了异常激烈的争论,大家对它褒贬不一 有的以辛辣的措辞抨击马里诺的写作风格,说它破坏了英雄史诗传统的赋诗法 有的则极力推崇马里诺的独创精神，对他以享乐主义为诗歌主题的做法表示赞赏。其实,他之所以深受许多人的欢迎和爱戴,是因为他在作品中反映了人们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渴望寻找新奇事物的强烈愿望和焦急心情。马里诺有意识地摒弃古典文学的传统，拒不接受但丁、彼特拉克或其他任何意大利著名诗人的诗体和创作风格,独树一帜,另立一派。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赋诗仅仅是为了给活着的人感官上美的享受,而绝不是为了讨好已死去的人,或那些炫耀学问的迂夫子。

马里诺主义是对古典主义的一种反抗，其特点是使用过多的隐喻、夸张和怪诞的文字游戏以及独创的神话，而且写得铿锵有力,刺激感官,目的在于使人惊诧不已。此种风格在十四行诗、抒情诗和叙事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到 17 世纪末,终于受到

非议，随着它所从属的整个巴罗克时代而消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化界对巴罗克的兴趣普遍复活，也导致对马里诺和马里诺主义重新发生兴趣和重新估价。

第三节　即兴喜剧

即兴喜剧又名艺术喜剧或情节喜剧，是 16 至 17 世纪意大利一种具有巴罗克文化特征的新颖戏剧形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它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精湛的喜剧艺术。除意大利以外，这种喜剧形式还在法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法国成立“意大利剧院”。即兴喜剧是一种强调集体表演的大众戏剧形式，而即兴表演被置入固定的面具和定型的情节的框架之中。这种三幕喜剧要求演员的演技专业化，每人多少要有一点音乐、舞蹈和杂技才能，演员通常随同戏班子在意大利各城市或邻近的欧洲国家巡回演出。此种喜剧没有完整的剧本，剧作者通常是剧团的演员或“舞台诗人”，作者只写剧情和每场对话的主要内容，由演员在舞台上即兴对白。正是这些演员赋予即兴喜剧以情感力量和人物性格，依靠他们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喜剧气氛，使用很少的布景和服装就使剧中的人物栩栩如生。

即兴喜剧的第一个特点是“即兴”，但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任意发挥，演员们手头都有演出的本子，上面详细地记载着最常见的场景和即兴吟诵的台词。由此可见，一出喜剧的成功与否往往不一定取决于剧作者的写作才能，关键在于演员丰富的舞台经验、娴熟的技巧和动人的表演。这就需要演员深入体验生活，熟悉观众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

即兴喜剧的第二个特征是无声的表演技巧，即剧中的一部分对白由一系列无声的滑稽动作所替代。这增加了喜剧的特殊风采，时时引起观众的哄堂大笑，演员和观众的感情交融一体。这里

我们不妨举仆人粘信的一场戏为例。当时，信封的使用尚未普及，人们一般用包药的干糊片粘在折迭起来的信纸上代替。演出时因一时找不到干糊片，扮演仆人的演员就用面包心粘信，只见他时而用拳头敲打，时而用额头顶撞，表演充分体现了喜剧戏谑诙谐的特征。一个演技精湛的喜剧演员，在每场戏中总能在传统哑剧表演艺术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或创新，收到十分满意的效果。

即兴喜剧的第三个特征是假面具的运用。每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假面具，使观众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每个演员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书呆子、西班牙军官、爱吹牛的士兵等。喜剧演员往往根据自己的性格和特长选择角色，他们总是认真地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得绘声绘色，深得观众的喜爱。

由于即兴喜剧具有独特的演出风格，尤其是充分体现了整个剧团的密切配合和集体才智，因此这种喜剧在当时的意大利颇为流行，并在西欧各国，尤其是法国，成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民间艺术。诚然，这是一种比较粗糙的文艺形式，但这种感染力很强的表演艺术对后来哥尔多尼的戏剧和现代电影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巴罗克文化时期，除了即兴喜剧以外，文艺复兴的传统戏剧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这在托斯卡纳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仿古主义的影响在那里是根深蒂固的。另外，音乐剧(即今天人们通常称作的‘歌剧’)也开始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这一新颖的艺术形式最早起源于文化名城佛罗伦萨，一般取材于牧歌式的童话和古希腊悲剧。

由于种种原因，即兴喜剧到了 17 世纪末叶开始衰落。首先，方言中的大量幽默语言在非本地观众身上失去作用，终于导致在演出中喜剧性形体动作占了上风。另则，由于每个演员扮演的都是固定的某一类人物，角色变得僵化呆滞，无法反映现实生活，因而渐渐失去其原先的重要喜剧因素。像哥尔多尼这样的剧作家开

始致力于意大利戏剧的改革，从而改变了正在衰退中的即兴喜剧的命运。

第四节　叙事体文学作品

在 17 世纪的意大利文坛上,叙事体文学作品的诞生和流传引人注目,深受读者喜爱 除意大利以外,此种文学体裁在法国也有较大的发展。在文体和语言方面,它具有巴罗克文化的特征,故事情节曲折复杂、生动有趣,故有人称其为散文体的传奇诗或英雄史诗。在这一方面，波伦亚铁匠朱利奥 · 恺萨 · 柯劳契(Giulio Cesare Croce，1550—1609) 可谓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作家。他长期从事民间诗歌创作，后期撰著的两本叙事体作品《精明机智的培托多》(Le sottilissime astuzie di Bertoldo)和《耿直可笑的小培托多》(Le piacevoli e ridicolose semplicità di Bertoldino)获得了文学界人士较高的评价。作者从一则古老的传说中撷取题材，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一位衣着邋遢、处世精明的山里人培托多的生动形象,尤其是他同国王的几段对话饶有风趣,发人深思。故事的大意是 国王将他处以绞刑,机灵的山里人恳求国王开恩,让他在自己悦意的树上系绞绳 但他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树木来执行国王的命令,国王无奈召他进宫，不久培托多却因不习惯宫廷中过于精美的菜肴而死去。作品富有浓厚的民间色彩，笑语声中掺杂着作者对权贵的嘲弄以及对平民百姓莫大的同情。然而，柯劳契的作品犹如小船在海上触礁后的残片一样,很快就被时代的潮流所吞噬,渐渐被人们所淡忘。

另外,方言文学在 17 世纪的发展较快，在意大利文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托斯卡纳方言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每况愈下，而巴罗克文化的传播激励人们在文学语言方面进行新的探索，此种寻求奇异、美感的创作风格为方言文学的繁荣创造了良好的

环境。

方言文学在那不勒斯显得尤为活跃，其中，强巴蒂斯塔·巴西莱(Giambattista Basile) 可谓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作家、诗人和童话作家。他出生在那不勒斯的一个中产家庭，年轻时曾在威尼斯军队中服役，1608 年回到那不勒斯后，长期生活在王孙贵族的宫廷和府邸里，同时从事不间断的文学创作活动，直至谢世。起初，他在写作中努力仿效马里诺体刻意雕琢的浮华风格，后期则致力于总结和推广丰富多彩的那不勒斯方言，为推动方言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擅长吸取那不勒斯地区各种不同方言的长处,对那不勒斯的民谣、风俗、文学、音乐和方言都有浓厚的兴趣，由他著述的讽刺那不勒斯社会习俗的对话体组诗《那不勒斯文艺九女神》（Le Muse napolitan ）和故事集《最好的故事》（Lo cunto de li cunti o vero lo trattanemiento de li peccerille）均于作者身后出版。巴西莱以薄伽丘的《十日谈》为创作模式,用那不勒斯方言在其代表作《最好的故事》中,分 5 天先后讲述有关冥府之神、女妖、邪魔等内容的 50 个故事，写得欢快淋漓，饶有风趣，富有巴罗克文化典型的奇妙莫测、变幻无常的特征。此外，作者运用比喻和夸张的表现手法，给书中的故事涂上一层光怪陆离、五色斑斓的异彩。比如，他以极其丰富的想像力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描绘日出时的壮观景象：“……太阳为了驱散浸沉在印度河中的湿气而出来纳凉……太阳以她金雀花般的色彩拂拭由黎明浇灌的田野中夜晚的尘埃……黎明出来寻找鲜蛋，以慰藉她那年迈的情侣……”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俯拾即是。这部作品是欧洲最早用民间故事编写的小说集之一，文字绚丽多彩,词藻艳丽,情节生动,意大利 20 世纪前半期著名文艺评论家克罗齐称它是‘最古老、最富艺术性的民间传说作品”,后成为 18 世纪意大利剧作家戈齐写作题材的重要来源。

第七章　　阿卡狄亚诗派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由于世事的重大变迁,18 世纪的欧洲政治和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人把这一百年漫长的历史分成以下两个阶段：17 世纪末至 18 世纪中叶;1748 年亚琛和约(确认玛丽亚·特利莎为奥地利女皇)至 1789 年法国革命爆发。

18 世纪初期，欧洲强国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通过迅速变化的同盟，把意大利越来越深地卷入战争的旋涡。始于 1700 年为争夺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战争，由于乌得勒支和拉斯塔特和约的签订而告结束，意大利各国领土范围的划分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不勒斯和撒丁岛连同曼图瓦和米兰公国及其行省被划归奥地利，而西西里王国及其王位则归属于萨伏依公爵。数年后,即 1718 年，萨伏依公爵又用西西里换得了撒丁岛，萨伏依王朝的疆域改称为撒丁王国。几乎在同一时期，波兰和奥地利两国的王位继承战争,也导致了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动荡,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于 1734 年为波旁王朝的查理三世所征服。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于 1737 年被洛林的弗兰西斯所代替。在这期间,萨伏依王朝统治的撒丁王国奉行扩张政策，其统治者曾一度占领米兰,波旁王朝获得了帕尔马、皮亚琴察和瓜斯塔拉,而热那亚则被迫把不断发生暴乱的科西嘉割让给法国。为保持意大利的领土现状,法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于 1745 和 1748 年先后签订条约,似乎终于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局面。此后 50 年间,意大利各国取得了相对的政治稳定和经济进步。

几经沧海桑田,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欧洲诸国的专制政体开始传入意大利,并在南方、伦巴第、托斯卡纳等地区找到了合适它

发展的空间。这不仅加速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步伐，而且也调动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文学艺术领域内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诸如法国悲剧、英国新闻体文学、随笔、讽刺作品、祭颂诗、苏格兰传奇诗等新颖文学形式开始在意大利盛行。从 18 世纪中叶至法国革命爆发的前后,意大利文坛出现了积极向上的趋势,与唯理主义的阿卡狄亚诗派截然不同的启蒙主义文化脱颖而出，对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人们通常把 18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划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即阿卡狄亚诗派和启蒙主义文学。

第一节　阿卡狄亚诗派的特点和影响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18 世纪上半叶被人们公认为阿卡狄亚诗派时期。“阿卡狄亚”(Arcadia) 源自古希腊阿卡狄亚高原地区，那里素以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而著称于世。早在 1690 年之前,常有一些诗人去前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在罗马的私邸聚会，一起吟诗作文，并就文学创作问题共同进行研究和探讨。克里斯蒂娜在逊位后放弃异教信仰而皈依天主教，为此曾受到罗马教廷的嘉奖，之后一直侨居罗马。1689 年克里斯蒂娜去世后，她的朋友们翌年在罗马创办了阿卡狄亚诗社,旨在反对 17 世纪主宰意大利诗坛的以马里诺命名的马里诺主义,摒斥平庸拙劣的文风.其成员探求一种更加自然、单纯的诗风,以古典文学,特别是希腊、罗马的牧歌为楷模，致力于恢复意大利诗歌创作鼎盛时期的威望和荣耀。据说，当时有一位西埃纳诗人在聆听他人吟诵一首牧歌之后大声惊叹，称动人的诗句似乎把他重新带回阿卡狄亚恬静、美好的世外桃源。就这样,诗社以‘阿卡狄亚’命名,且每个成员都以希腊牧人的名字起名,并提名克里斯蒂娜为诗社的女王,耶稣为诗社的保护人。18 世纪初,不少诗人为了逃离现实生活和寻求所谓隐逸的仙境,纷纷

前来入社,他们常在罗马的嘉尼科洛丘集会,并自 1725 年起在意大利各地建立分社。诗社社长是终身制，第一任社长是文学家乔万尼 · 马里奥 · 克雷欣培尼（Giovanni Mario Crescimbeni，1663—1728）.

阿卡狄亚派诗人不仅致力于抒情诗语言的改革，而且以唯理论和语言条理清楚为原则，在当时组织并领导了意大利文学的发展。18 世纪上半叶，他们对意大利文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意大利各地组织分社,普及了文化,增强了国家统一的观念。即使是 18 世纪意大利喜剧的改革者哥尔多尼在开始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之前,也曾是比萨这种群体的成员。但是,阿卡狄亚派诗人没有自己独创的东西,他们只是从彼特拉克抒情诗中汲取养料,颂扬对天主的忠诚。另则,他们在革新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说到底只是在狭小圈子里的改良,满足于解决一些文学形式上的问题,很少触及社会政治，这就大大削弱了作为一次文学运动的社会作用。阿卡狄亚诗社成立后不久，内部就出现了以克雷欣培尼和强 · 温钦佐 · 格拉维纳(Gian Vincenzo Gravina，1664—1718)为首的两个不同派别,后者追随古典主义的创作准绳,最后成立了另一个新的诗社。

阿卡狄亚派诗人鄙夷巴罗克文学奇异、浮华的风格,致力于恢复彼特拉克抒情诗流丽、秀逸的创作格调。他们鞭挞 17 世纪的文风,但自己却未能创建任何新的诗歌形式,只是引经据典,沿袭彼特拉克的赋诗法,缺乏创新的精神。阿卡狄亚诗社成立的宗旨,同当时由法国笛卡儿唯理主义哲学思想统治的欧洲文化如出一辙，它们都将理性视作生活的中心,排除理性以外包括情感、想象在内的任何其他因素。这同当时正在致力于巩固自身经济和文化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两者都把唯理主义誉为克服历史偏见的唯一的理想工具，并将诗人的一切心理活动和感情冲突统统归纳在理性主义这个狭小的范畴之内。法国 18 世纪著

名诗人、文学批评家布瓦洛有一句名言，从中我们或许能够窥见唯理主义文学作品的实质：“你们必须热爱理性，惟独她才能使你们的作品具有文学价值和瑰丽的艺术风采……不知自制的人是不懂得写作的……在动笔之前，你们应该学会深思。”

在阿卡狄亚派诗人的影响下，18 世纪上半叶改革文艺的呼声日趋高涨，并由此形成了一股潮流。但不论是喜剧、悲剧、音乐剧，还是抒情诗，此类改革只局限于肤浅的表面，故收效甚微。尽管如此，阿卡狄亚派诗歌文学的诞生和发展进一步加强了意大利各地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因而为传播文化和营造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民主气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对意大利诗歌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囿于 18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状，建立全民族统一文化的条件尚未成熟，阿卡狄亚诗派不可能在很大的范围内扩大其知音的队伍。由此可见，阿卡狄亚派诗人夸耀和引以为荣的所谓“改革”，实质上只是形式上的改良而已，它几乎没有涉及文学所肩负的唤醒广大民众觉悟的重要任务。反之，它对当时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置若罔闻，故而未在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留下明显的足迹。

阿卡狄亚派的诗作虽然以模仿他人为主，且大多比较苍白无力，但该诗派还是拥有两个杰出的诗人：特别擅长短歌的保罗·罗利（Paolo Rolli，1687—1765），以及杰出的抒情诗人和歌词作者梅塔斯塔齐奥。罗利是格拉维纳的学生，生于罗马一户建筑师家庭，1715 年前往伦敦，曾为英国国王乔治二世的子女担任过 18 年的家庭教师，写过不少优美和谐、真挚热烈和具有独特音乐感的抒情诗和颂诗，后收集在 1763 年出版的 3 本诗集中。梅塔斯塔齐奥出生在罗马一个小商人家庭，原名彼得罗·特拉帕西，1708 年他即席作诗的惊人技巧引起文学家格拉维纳的注意，并把他定为自己的继承人，因而他的姓氏也改为希腊化的梅塔斯塔齐奥，除诗集外他还写过多部歌剧剧本，较著名的有《奥林匹克竞技会》（Olimpia-

de)、《蒂托的仁慈》(Clemenza di Tito)等。除外，嘉勃利埃洛·基亚布雷拉(Gabriello Chiabrera，1552—1638)也是阿卡狄亚派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他对诗歌的韵律形式做过试验，所引进的新韵律及古希腊风格扩大了后世抒情诗的创作天地，其最优秀的作品是优雅的音乐般的短歌。

到了18世纪下半叶，尽管不少人措辞激烈地对阿卡狄亚诗派的赋诗风格提出异议，但是抒情诗的创作活动依然久盛不衰。其中，爱情诗的作者继续沿袭阿卡狄亚诗派的传统，他们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方面作了一些更改，创作出许多热情奔放和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优秀诗作，具有明显的贵族化特征。在此类爱情诗的作者中，鲁道维科·萨维奥利(Ludovico Savioli，1724—1804)可谓是一位遐迩闻名的波伦亚诗人。他模仿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哀歌体爱情诗风格，于1765年发表《爱情诗集》(Amori)，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采用拉丁诗歌的七音步赋诗法，在诗句中着力描摹18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上流社会的各种社交活动，给神话般的过去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古典主义面纱。《爱情诗集》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优美文雅的新古典主义创作模式，成为后来意大利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期的优秀诗人帕里尼、蒙蒂以及福斯科洛等人效仿的范例。

雅科波·安德烈·维托雷利(Jacopo Andrea Vittorelli，1749—1835)是阿卡狄亚诗派最后一位较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诗作追求阿卡狄亚诗派崇尚的韵律的纯洁性，一生不改初衷，似乎当时意大利和欧洲诸国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与他毫无关系一样。当许多诗人努力在诗句中积极反映新旧世界之间激烈冲突的时候，他却对新世界的诞生置若罔闻，继续陶醉在阿卡狄亚诗派创立的世外桃源之中，与他所处的时代显得格格不入。

热那亚诗人卡洛·英诺钦佐·弗鲁戈尼(Carlo Innocenzo Frugoni，1692—1768)是阿卡狄亚诗派后期的主要代表之一。他长年生活在帕尔马，一生写有许多十四行诗和抒情诗，并确立了当

时的所谓“无韵诗句”的韵律时尚。他诗作的题材十分广泛，内容和环境富于变化，文笔流丽，但语言显得比较贫乏。

在阿卡狄亚派的作家中间，乔万尼·梅利(Giovanni Meli, 1740—1815)无疑是一位富有独特风格的西西里诗人。他出生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1767 年至 1772 年.他在巴勒莫附近的奇尼西小镇行医,1787 年至 1815 年谢世前一直在巴勒莫大学教授化学。虽然他和萨维奥利和维托雷利是同时代的人，但是他接受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社会的人道主义需求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然论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梅利坚持用西西里方言写作，认为它也是一种丰富、简练、生动的文学语言，用它同样可以写出优美的诗篇。阿卡狄亚派的赋诗风格、市镇医生和化学教授的人生经历以及启蒙思想的熏陶，赋予了他探索社会现实的满腔热情，其作品明显流露出梦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的主要作品有《唐·吉诃德和桑丘·潘查》(Don Chisciotti e Sanciu Panza)、《寓言集》(Favuli murali)和《短诗集》(Poesie siciliane).

第二节　文学评论

17 世纪的文人不重视历史文献的创作和研究，在撰写文学史方面也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有的只是一些索引性的作品。到了 18 世纪上半叶，史学研究和文学评论进展很快，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不少才华出众的博学者,对当时文化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这些带有一定改革内容的史学作品和文学评论，实际上顺应了一部分人要求掌握文化和历史知识的呼声，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阿卡狄亚诗社创建人之一克雷欣培尼的《俗语诗史》(Istoria della volgar poesia)《论俗语诗的美》(Delle bellezze della volgar poesia) 杰洛拉莫·迪拉保斯基(Girolamo Tiraboschi)的《意大利文学史》(Sto-

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西皮奥内 · 马费依（Scippione Maffei）的 4 卷本《维罗纳图证》（Verona illustrata）乔万尼 · 玛丽亚 · 马祖盖利（Giovanni Maria Mazzuchelli）的《意大利作家》（Scrittori d'Italia） 路易其 · 朗齐（Luigi Lanzi）的《意大利绘画史》（Storia pittorica d'Italia）等。

莫台那牧师卢道维柯 · 安东尼奥 · 莫拉托利（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1627—1750）原为米兰图书馆馆长，后应莫台那大公诚意相邀，去那里担任宫廷图书馆管理员和案卷保管之职。与此同时，他以满腔的热情，孜孜不倦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著述涉及历史、法律、道德、文学、美学等方面的内容，为当时颇有影响的博学者之一。他的主要作品《意大利史记》（Annali d'Italia），收集了公开发表和从未出版过的 500 至 1 500 年间的历史资料，并附有序言和详细的注解，为当时最完整的一部意大利历史书。即使在今天，它仍是研究意大利历史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除此以外，莫拉托利还著有不少文学评论作品，因而被誉为意大利近代史学的先驱、阿卡狄亚文化时期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之一。他认为诗歌是一种模仿艺术，目的是娱乐人和教育人，诗歌之所以有灵魂和精神是因为它抒发的是真实的情感；他指出诗歌的使命是美化而不是阐述自然和生活，并强调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性。

另一位阿卡狄亚文化时期举足轻重的史学家是笛卡儿哲学家、诗人梅塔斯塔齐奥的保护人格拉维纳，他同时还是当时遐迩闻名的哲学家、法学家和文艺理论家。他生于意大利南方科森察附近的罗加诺镇，早年在科森察和那不勒斯学习古典语言、哲学和法学，1689 年迁居罗马，后在罗马大学讲授民法和教会法典，1711 年离职后同其他文人一起创建了一个新的阿卡狄亚诗社，1718 年赴都灵大学任职前不幸去世。格拉维纳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著述甚丰，主要作品有《论圭迪的"恩迪米奥内"》（Discorsi sull' Endimi-

one del Guidi，1692）、《古代寓言》（Delle antiche favole，1696）、《诗的理性》（Ragion poetica，1708）、《阿卡狄亚诗派的分裂》（Della divisione dell’Arcadia，1712）、《论诗律》（De disciplina poetarum，1712）、《论悲剧》（Della tragedia，1715），以及采用希腊韵律所写的5部悲剧。格拉维纳认为诗歌是知识的一种不完善的形式，当它有了一个形体的外貌才能在人类文明史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他强调艺术的严肃性，反对戏剧过多地渲染爱情的浪漫，主张悲剧应该朴实、自然。

第三节　维柯和他的《新科学》

公元前6至5世纪，那不勒斯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公元前4世纪它完全罗马化并成为坎帕尼亚地区的首府。罗马帝国灭亡后，它为哥特人所统治，后来又纳入拜占庭帝国的版图。1139年它被诺曼底人所征服，1266年成为那不勒斯王国的首都。1442年阿拉贡王朝开始管辖那不勒斯，1504年它又被西班牙所统治，这时它在经济、文化、艺术上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1707年至1734年，那不勒斯王国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1734年后它在波旁王朝统治下成为意大利南方一个独立大王国的首都，逐渐发展成欧洲的重要都城。另则，波旁王朝统治时期的大型公共建筑和庞贝地区的地下发掘工作吸引了欧洲各国的文人和学者。在新古典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各地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纷纷前来体验那不勒斯的文化氛围。到了18世纪上半叶，那不勒斯已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意大利文化中心，像嘉诺尼和维柯等政治家和学者，不仅誉满那不勒斯，而且驰名整个欧洲。

强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是阿卡狄亚文化期间一位著名那不勒斯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精通文化史和法律，尽管他的哲学观点有时自相矛盾，令人费解，但是他

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对意大利现代文明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直至今日他仍被公认为意大利文化人类史的先驱。

他出生在那不勒斯一个贫穷的书商之家,自幼体质羸弱,长年患病,上学甚少,但他阅读大量的著作,对柏拉图、塔西陀、马基雅维利等人的著作尤感兴趣，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1686 年至 1695 年，他在侯爵府中任家庭教师;1698 年起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修辞学。他虽然病魔缠身，经济拮据，并因无一知音而深感孤独，但是他还是充分利用生活环境所赋予他的客观条件，夙兴夜寐，发愤读书，从而为他以后哲学论著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701 年他加入阿卡狄亚诗社，并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意大利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拉丁语的来源》(De antiquissima Italorum sapientia ex linguae latinae originibus eruenda)。尔后,他还著有不少拉丁语作品。他的主要著作《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Principi della scienza nuova d'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于 1725 年出版,后经修改和补充,第二版于 1730 年问世。在这部著作的第 3 版付印之前不久，这位在哲学园地中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的作家不幸与世长辞。

在 60 余年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维柯一直因事业上的失意而忧郁寡欢。他的一系列哲学论著在其生前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他甚至被迫变卖钻石首饰,以凑足出版《新科学》一书所需的费用。他一生企盼讲授罗马法的机缘，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后来只得在自己的寓所开办一个修辞学研究所，以此慰藉不公正的命运给他的内心带来的悲痛。一直到 18 世纪末，他的哲学著作才经一些那不勒斯政治流亡者之手，在意大利北方流传开来，并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他的哲学思想声望益隆，曾博得浪漫主义文人和德国作家歌德的极力赞赏，直至今日，他仍被誉为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的杰出理论家。

继《新科学》之后不久,他又发表了《自传》(Autobiografia)一

书，详细记载了自己哲学思想萌发和成熟的过程，生动地再现了一个为达到理想境界而艰难行走在布满荆棘道路上的创业者的形象。在书中，他明确指出，功名的求取同神灵的指点是两个不可分割的因素。耐人寻味的是，他认为人无法认识由上帝创造的自然界，但同时又提出，历史是由人一手创建起来的，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特征。比如，他对伽利略、培根、牛顿等人的重大科学发现不屑一顾，但反过来又认为，是历史研究为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实际上，由伽利略等人所创建的新科学更新了当时的欧洲文明史，并对后来的启蒙主义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其代表作《新科学》中，他反对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思想观点，强调知识和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人创造了历史，因而人也能正确地认识历史，并能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使之成为一门新科学，而上帝并不直接影响历史的进程。他指出，世界上的每个民族都必须经过 3 个历史阶段，即神的统治(神的时代)、贵族统治(英雄时代)和人民统治(凡人时代),错误地把历史看作无休止的循环过程;他认为,人的思维必须从感觉、想象过渡到理性,而诗歌和哲学正是想象和理性的必然产物。他以历史发展的观点研究美学，认为生活在英雄时代的人按其本性都是诗人，从而挑起一场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真假荷马”的争论。他的这一论点在文学批评方面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他认为古希腊著名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荷马是一个虚构的历史人物,因为在这两部作品中有许多前后不连贯和互相矛盾的地方，故绝不可能出于同一个人之手。按他的分析，这两部遐迩闻名的古典著作，是全体希腊人民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另外，这位那不勒斯哲学家还否定缪斯、俄耳甫斯、伊索等人的存在,依他之见,他们只是古希腊人丰富想像力的象征而已。作者从美学的观点对古希腊的经典著作进行了仔细的剖析,并指出:《伊利亚特》是年轻希腊的象征，因为他生性豁达、情操高尚；而力大无比的英雄阿基里

斯则是年轻希腊的影子。他还认为，《奥德赛》是希腊文明史的产物，其主人公尤利西斯则是智慧的象征。在他看来，但丁是意大利的荷马,其《神曲》只是意大利民族洪荒时代的一部史书。

《新科学》的出版颇费周折，在作者生前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直至他死后才备受推崇。他对人和宇宙的看法独到精深，大胆提出生活感和历史感的问题；他发现，非理性可能在人的心灵中萌生,尽管难以觉察,却不时迸发出火花;他认为,谦虚和虔敬是人的基本道德情操，也是建立家庭的支柱；他指出，人性是十分复杂的，它更接近野兽而不是天使。他试图告诫人们：如果崇拜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屈从于统一的科学，邪恶将压垮他们。

《新科学》内容浩繁,全书共分为 5 个部分:《原则的奠定》、《诗的智慧》、《真荷马的发现》、《各民族新经历的行程》、《人类各种典章制度在各民族复兴时的再现》，全书的末尾还附有结论。今天，维柯已成为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新科学》一直被誉为一部划时代的哲学著作。

第四节　史学家嘉诺尼

彼埃德罗·嘉诺尼(Pietro Giannone,1676—1748)初学法律,后对"新学术"发生兴趣。他长期在那不勒斯以律师为职业,同时潜心研究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和启蒙主义的史学观点。由他撰著的《那不勒斯王国文明史》(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于1723 年问世，旋即引起整个欧洲史学界的普遍重视和关注，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与哲学家萨尔比相比，他的文笔更具有论战性和科学性,他支持世俗王权,反对教会的巧取豪夺;他认为教会是原始的、纯精神的,它不该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他的宗教观被罗马教廷视作异端邪说,《那不勒斯王国文明史》一发表即被教会列为禁书,他本人也因冒犯教廷罪而被开除教籍,后又遭一伙宗教

狂热分子不断的迫害，不得不逃往维也纳避难。1735 年他被迫隐居日内瓦，翌年在比埃蒙特因被人出卖而被捕入狱，1748 年殁于都灵的牢狱中。在长年的监禁生活中，他以顽强的毅力撰述了多部历史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有 3 卷本《罗马教皇的三重冕》（Triregno）。在这部由世俗国、天国、教皇国 3 部分组成的书中，他对教廷干预王政的做法提出异议,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思想,为此这部著作在 1895 年才得以出版。为了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他锲而不舍地奋斗了一生，但最后还是成为教廷反动法规的牺牲品。同马基雅维利和萨尔比一样,嘉诺尼始终将‘ 国家 ’这个崇高的概念深深地铭刻在心间。他十分痛恨教皇干预国家政治的蛮横做法,在作品中毫不隐讳地提出教会应服从于国家的正确主张,揭露并鞭挞某些教会神职人员腐败、卑劣的作风。

第五节　歌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

彼埃德罗 ·梅塔斯塔齐奥(Pietro Metastasio,1698—1782)是阿卡狄亚诗派另一位出类拔萃的诗人和欧洲最负盛名的歌剧歌词作家。他出生在罗马一户家境不甚富裕的小商人之家，自小聪慧过人。早在少年时代，阿卡狄亚诗社创始人之一的格拉维纳就因其惊人的文学天赋将他收留在自己的门下，在文学艺术方面悉心栽培他,并把他的姓氏改为希腊化名字‘ 梅塔斯塔齐奥 ’。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年幼的诗人认真专研古典作品，刻苦学习英雄诗、悲壮诗的赋诗法。自 10 岁起,他就开始在罗马、那不勒斯等地即兴作诗,在上层社会颇有名望。他 16 岁那年，格拉维纳为了爱惜他的身体,不让他继续过度劳累地读书、写诗,并在临终前将自己的财产和藏书赠送给他。1718 年,诗人加入阿卡狄亚诗社,受到很高的礼遇。尔后,他写出不少优秀诗作,在诗苑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为他后来的音乐剧创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经罗马著名女

歌唱家玛丽亚娜·波嘉雷利的引见，他结识了不少音乐界的名流，并于 1724 年根据一则神话故事为玛丽亚娜创作了抒情悲剧《被遗弃的狄多尼》（Didone abbandonata） ,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1730 年诗人应邀前往维也纳，奥地利君主、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六世赐予他宫廷诗人的称号。在维也纳的 10 年中,诗人成功地写出了不少清唱剧、神剧及 11 部情节剧,其中较著名的有《奥林匹克竞技会》、《蒂托的仁慈》等,查理六世因此称他为欧洲最有才华的诗人。1782 年 4 月，他在维也纳与世长辞。

梅塔斯塔齐奥写的音乐剧大多取材于神话和历史传说，明显富有仿古的风采。当时，音乐剧是一种民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但有一部分阿卡狄亚派诗人却对此持十分冷漠的态度，甚至以演出时音乐和舞台效果占比例太大为理由，将音乐剧贬低成缺乏诗歌抒情味的大杂烩。在梅塔斯塔齐奥之前，威尼斯著名剧作家、维也纳宫廷诗人阿波斯托洛·柴诺(Apostolo Zeno，1668—1750) 曾作过改革音乐剧的尝试，但是他只局限于表面形式上的改革，没有从诗歌的格式上进行真正的革新。梅塔斯塔齐奥著有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评论,认为音乐剧起源于希腊的古典悲剧,剧作者完全可以在地点、时间和表演等方面自由发挥，结局也可以写成是欢乐的。他的理论不仅在美学上有重大的价值，而且对音乐剧的繁荣和发展也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对 18 世纪欧洲正歌剧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他在音乐剧中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同传统文化大相径庭，从侧面反映了 18 世纪的社会面貌和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剧本的场景往往是阿卡狄亚派诗人憧憬的田园牧歌式的淳朴生活环境，其中，享乐与义务，感情与理智每每交织在一起。下面选译的是梅塔斯塔齐奥创作的一首小咏叹调（17 世纪初人们用这个术语来指称比咏叹调朴实、简单的短小歌曲）中的两小节：

战士渴望打仗，

渔夫希望得到
渔网和鱼钩，
猎人则钟情密林。
我渐渐进入甜美的梦乡，
梦中全是她的倩影，
我轻声呼唤她的名字，
从白昼直到黑夜来临。

倘若我的恋人打听我的下落，
询问：我的朋友在哪里？
你就回答，
你可怜的朋友已乘鹤西去。
哦,不!切莫因为我的过错
给她带来如此悲痛的消息，
你只须回答，
他已哭着离去。
就这么，
离别自己的恋人，
永远离开思慕的女子，
心中充满深重难言的悲痛。

梅塔斯塔齐奥在一生中创作了多部音乐剧，情节往往建立在爱情与理智、爱情与责任、爱情与荣誉之间的冲突上，在抒发感情的同时，揭示了生活的哲理。与阿卡狄亚派其他诗人相比，梅塔斯塔齐奥诗歌的情调更为深沉悲壮，思考也更为深远。

第八章　　启蒙主义文学

启蒙运动是欧洲的一次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17、18世纪诞生在英国，很快传遍整个欧洲，后以法国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启蒙主义者欲以理性的光芒照亮世界，使人们从封建迷信、愚昧无知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当时欧洲的资本主义尚处在成长阶段，资产阶级要求彻底改变自己同统治阶级（贵族和教会）之间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它欲借助新文化的力量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维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

启蒙运动旨在把有关上帝、理性、自然和人等诸种概念综合为一种世界观，得到广泛赞同，由此引起艺术、哲学及政治等方面的各种革命性的发展变化。启蒙运动的思想重点是对理性的运用和赞扬，因为理性乃人类了解宇宙和改善自身条件的一种力量。具有理性的人通常把知识、自由和幸福视作人生的三大目标。倘若认真地审视人类文明的发展史，我们将不难发现，其实最早对理性的威力和用途进行探索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而罗马人则继承并保存了希腊文化的大部分，尤其是那些符合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的概念。基督教思想家们逐渐发现了他们的希腊罗马遗产的可用之处，但是他们只是将理性置于基督教各种得到天启的真理之下。作为知识和政治的心灵大厦，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似乎是坚如磐石的，但也受到了人文主义、文艺复兴运动及基督教新教改革运动等思潮的冲击。文艺复兴运动重新发现古典文化之大部，再度唤起人是万物创造者的观念，而宗教改革运动则更为直接地向罗马天主教会的一统权威提出挑战，历久不衰。后由于逻辑归纳法和演绎法在科学和数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人类对求知能力的信心

不断加强，对千余年来统治人们思想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质疑。

在意大利历史上，资产阶级借用文艺这一特殊工具为其利益服务并非是第一遭，早在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就有过此类先例。马基雅维利就曾提出结束意大利政治分裂、建立统一而强大的君主国的主张，反映了意大利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启蒙主义者则强调人的权利(个人自由､财产所有权等),指出‘ 国家 ’是一种政治形式,有了公民的拥护它才富有生命力,所以‘ 国家 ’绝不是上帝赐给君主的封地。在哲学和科学领域里，伽利略的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集中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主义思想；法国 17 世纪哲学家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则在这一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宗教信仰方面，人文主义者企图摆脱经院哲学和基督教教规对人们的束缚，提出关怀人、尊重人和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启蒙主义者的宗教观则更富有自然主义色彩，对教会的权威持怀疑或反对的态度，具有自然论和无神论的倾向。在如何看待人的价值方面,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 贵 ’与‘ 贱 ’取决于他的思想情操、才能和智慧，这同他出身门第的高低毫不相干；启蒙主义者则对自命清高的贵族采取嘲讽的态度，把真正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广大民众视作社会的中坚。简而言之，启蒙主义是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思想的继续和提高，主张与过去彻底决裂，一切从头开始。

启蒙运动诞生在英国，但其发展中心很快转移至法国，在那里涌现出不少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作家,其中,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伏尔泰是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作家、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他以罕见的讽刺才能，广博的学识和高度的政治热情，用手中的笔给予封建制度和天主教会以毁灭性的打击。狄德罗是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在世界进步思想史上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他毫不畏惧反动势力的迫害，积极投身摧毁封建旧世界的神圣事业，以其睿智焕发的思想激发人们的革命热情。卢梭

是封建旧世界的掘墓人，他的著作充满激情，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解放思想，启发读者真诚坦率和热爱大自然的朴素感情。启蒙运动是一场全欧性的思想运动，为 1789 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故得名"启蒙"。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①

在启蒙思想的推动之下,数学、自然科学、医药、化学、物理等方面的新发现层出不穷，电气、蒸汽机等开始被广泛应用于手工业生产。在经济领域，法国资产阶级重农派主张经济自由和重视农业发展，呼吁国家停止干预经济建设；英国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主张自由竞争，抨击重商主义，对英国经济的发展曾起过重大作用。人们对未来普遍充满瑰丽的希冀，坚信自己完全有能力彻底铲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非理性残余势力。

在启蒙运动时期，不少知识分子通过题材迥异的文艺作品与社会建立新型的关系，努力使自己成为新文化的建设者，从而为新文化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实际上，当时一些具有启蒙思想的作家以写作为谋生的手段，已成为自食其力的脑力劳动者，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地位。昔日的宫廷文人已不复存在，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正在崛起，并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启蒙主义者革故鼎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他们欲在封建制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崭新的社会,即"理性的王国",一场剧烈的政治革

①《反杜林论》，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6 页

命运动逐渐形成。18 世纪欧洲各国之间的文化联系十分密切，启蒙主义思想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无疑也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自 1748 年亚琛和约签订之后，意大利出现了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局面。代替了西班牙的奥地利统治者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保障了意大利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朱塞比二世在位时，借助于意大利诸侯们的配合，废除了中世纪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农奴制和特权阶层免税法，宗教政策也较前宽容。随着法国启蒙思想的不断传播，意大利文坛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米兰、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帕尔马等地成了启蒙主义文化的中心。但是，面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启蒙主义者只是采取温和的手段，这反映了当时意大利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从时间上来看，在阿卡狄亚诗派与启蒙主义文化之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分界线，但这两者在文化上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从 17 世纪末到 18 世纪中叶，阿卡狄亚诗派在诗坛上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所提倡的田园诗严重脱离社会现实，是一种缺乏思想性的形式主义文学。到了 18 世纪中叶，法国启蒙主义思想传入意大利文坛，不少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觉醒，成为新文化的促进者。人们普遍感到有必要改变文化界多少年来浑浊、沉闷的空气，敞开窗户让来自阿尔卑斯山北麓的清风自由飘拂。在历史上，意大利一直同欧洲其他国家在文化上接触频繁，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此种交往逐渐减少，不少人仍陶醉于文艺复兴时期璀璨、辉煌的成就之中，自鸣得意，故步自封，以致在文化上几乎同外界断绝了联系。而今，意大利文学艺术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同其他毗邻的欧洲国家相比，自惭形秽。当时，整个文坛犹如一潭死水，显得死气沉沉，彻底改变文学艺术落后的状况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启蒙主义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的继续和发展,它为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新文化的诞生铺平了道路。随

着法国启蒙思想的传播，法语逐渐取代了昔日的拉丁语，成为欧洲各国知识分子交流思想的语言工具，这不仅加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且对欧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倘若我们不充分认识欧洲文化在语言和写作风格方面对意大利产生的深远影响，我们就无法深刻领悟帕里尼、阿尔菲耶里、福斯科洛和孟佐尼等人的文学作品的内在涵义。

第一节 启蒙运动对文学的影响

在这场震撼整个欧洲的伟大文化运动中，意大利直接或间接地被卷了进去,涌现出不少优秀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无怪有人称启蒙主义文化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意大利的文人摒弃 17 世纪盛极一时的马里诺诗派和 18 世纪中叶阿卡狄亚诗派崇尚的田园诗，对当时的宗教权威和封建制度大胆地提出异议，为创立新颖的文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启蒙主义文化激发了意大利人民的爱国热情，使他们心中再次复苏了统一国家的希望,从而为 19 世纪意大利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民族复兴运动作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启蒙运动是一场全欧性的政治思想运动，但它在不同的国家中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18 世纪初叶，奥地利代替了西班牙在意大利的统治。尽管奥地利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较为温和,但在新的外族的压迫下,意大利在政治上仍然是一个分裂、衰弱的国家，这严重影响了文学艺术的发展。随着法国启蒙思想的不断深入人心，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决意改变文坛迂腐、落后的状态,但由于长期的分裂,在大部分封建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革新思想很难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启蒙运动并不是自发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外国统治者推行的政策的影响,在文学艺术领域,意大利则仿照英、法两国的模式。所以,在米兰、那不勒斯等地区,启蒙运动的发展十分迅速,而在其他一些

地区，运动的发展却十分缓慢，遇到的干扰和阻力相对较大。另外,囿于18世纪中叶意大利的社会现实，资产阶级赢得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件尚未成熟。因此,意大利启蒙运动的热情支持者不外乎是贵族或一些同权贵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社会上层人士。启蒙主义者缺乏一支强大的生力军作为其后盾,所以,他们心中纵然有建设新文化的宏伟蓝图,但却不可能使它成为现实。不少富有启蒙思想的爱国作家处境孤独，懂得欣赏他们文学作品的人为数不多，因为在他们和广大民众之间有一道无形的、难以逾越的高墙。

意大利的启蒙主义作家也极力歌颂理性的伟大力量，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想中的完人应该具有哲学家的才思和商人的气质。威尼斯杰出戏剧家哥尔多尼在他的著名喜剧《老顽固》中,曾对商人作过精彩的刻画。而在写作技巧方面,科学、哲学、经济论著同文学作品的区别益臻模糊,因为即使是作家或诗人,他的首要任务也是凭借哲学思想理性的光芒，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阴霾。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下,不少作家致力于创新,力图在作品中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刻意描摹人物的情感和内心活动。自17世纪末叶和18世纪初叶起，新闻体作品和政论文的创作开始繁荣起来，在内容和风格上体现了启蒙主义文化的特征。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作家伏尔泰曾说过："靠20册对开本永远闹不了革命，倒是不值几个钱的袖珍书能使人望而生畏。倘若福音书当初的售价为2200个罗马古币的话，基督教就永远不可能获胜。"18世纪下半叶,《咖啡馆》、《文学批评》、《威尼斯日报》、《观察家》等先后问世,这些报章杂志意象新颖,内容活跃,在当时颇有影响。

一、伦巴第地区的启蒙主义文学

限于18世纪中叶意大利各地区不同的历史条件，启蒙主义文化在各地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当时，米兰是意大利启蒙运动文

化最重要的基地之一，即使到了 19 世纪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它取代了昔日城邦时代和人文主义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佛罗伦萨，仍然是意大利的政治风向计和一个十分活跃的文化中心。在伦巴第地区,以玛丽亚 · 特雷莎女王和朱塞比二世为首的奥地利统治集团，先后推行旨在摆脱封建约束、发展工商业、繁荣文化的文明政策。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使整个伦巴第地区的文化艺术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积极向上的可喜景象，其中，新闻创作活动显得尤为活跃。无论在维也纳还是在米兰，奥地利统治者保护文艺的政策都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和立足改革的有识之士纷纷前往那里，使两地一度成为精英荟萃的文化重镇。伦巴第地区的启蒙主义者反对各种抽象的纯理论研究和乌托邦式的空想主义，密切关注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积极参与旨在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各项活动，在各阶层人士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彼埃德罗 · 韦利(Pietro Verri,1728—1797)

彼埃德罗 · 韦利是伦巴第地区一位遐迩闻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文学家。他出生在米兰，曾先后在蒙扎、米兰、罗马、帕尔马等地学习，早年就同自己的家庭和贵族化的上流社会产生严重的分歧，十分厌恶他们的生活习俗。 1761 年他和一些情趣相投的挚友共同创建了米兰的“拳头学会”，旨在反击旧思想，改革传统文化，建立更为生动有力的文学创作语言。1764—1766 年,他与其兄弟、小说家亚历山德罗合作主编杂志《咖啡馆》，并为之写了 38 篇有关文学的文章，与传统文化展开激烈的论战。之后，他虽曾在政府内担任要职，但终因政治抱负的落空而变得颓唐衰飒，1770 之后逐渐成为一个温和、谨慎的改良主义者。他的著作甚丰，题材广泛，涉及的内容有政治、经济、心理学和历史等，较著名的有《有关幸福的冥想》(Discorso sulla felicità)、《有关政

治经济学的思考》（Meditazioni sull'economia politica）、《米兰史论》（Storia di Milano）等。除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了 12 卷的《书信集》（Carteggio），收集了他与其兄弟亚历山德罗 1710—1742 年间的来往书简，是了解 18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社会的重要文献之一。

2. 亚历山德罗·韦利（Alessandro Verri，1741—1816）

亚历山德罗是彼埃德罗的弟弟和得力的助手，年轻时政治热情饱满，积极参加各种政治和文化活动，那些年中他的主要经历与“拳头学会”和刊物《咖啡馆》紧密联系在一起。1766 年他和另一位伦巴第启蒙主义者贝卡利亚一起前往巴黎和伦敦，同那里的文化界人士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回意大利后他定居罗马，不久则渐渐丢弃年轻时的政治抱负和旺盛的斗志。他写过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较有影响的有《女诗人萨福历险记》（Le avventure di Saffo）和《罗马之夜》（Le notti romane），但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当年战斗的锐气已荡然无存，明显流露出他后期保守的思想倾向。

3. 契萨雷·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1738—1794）

贝卡利亚是另一位米兰启蒙主义思想家、经济学家及意大利刑事古典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生性多愁善感，因婚姻不遂心意，年轻时就与家庭关系破裂。1758 年他在帕维亚大学获法学学位，后曾在米兰参加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彼埃德罗·韦利一起创设文学会社；韦利兄弟对他的热忱帮助在精神上给了他莫大的安慰。1763 年经韦利建议开始从事刑法研究，1764 年发表的名著《论犯罪和刑罚》（Dei delitti e delle pene）引起欧洲舆论哗然，被公认为意大利启蒙主义文化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后由法、英、德、波兰、西班牙、荷兰和美国翻译出版，仅法国在 6 个月内就再版 7 次。1766 年他同韦利一起前往巴黎和伦敦，意欲加强同法、英两国文化界人士之间的联系，但因他生性不善交际，又加上思家心

切，不久即返回米兰；同年，他婉言谢绝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让他前往彼得堡定居的诚意邀请。1769 年他应奥地利政府敦聘，前往维也纳教授政治经济学，并在政府内任职。在旅居维也纳的 20 年中，他对奥地利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贝卡利亚撰著的两部作品《论犯罪和刑罚》、《文体性质之研究》（Ricerche intorno alla natura dello stile）具有一定的影响。在《论犯罪和刑罚》一书中，他对当时流行的惨绝人寰的刑法大胆提出异议，主张废除苛刑和限制使用死刑。他认为，犯罪者对社会造成的损害是衡量他罪行轻重的客观标准，一切罪名必须在法律上有明文的规定，主张根据法律条文按罪量刑。该书是关于犯罪刑罚原则的第一部明晰而系统的著作，尽管其中的许多概念并非是他的创见，但它还是代表了刑法思潮的一个重大进展。他对当时的刑讯、秘密诉讼程序、地方官的反复无常和腐化，以及野蛮的刑罚都加以批评，强调刑罚制度的目的应以达到安全和有秩序的适当目标为限，超过了这一点，就成为暴政。贝卡利亚是第一个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近代作家，因而被公认为废除死刑运动的创始人。在其另一部重要著作《文体性质之研究》中，他片面强调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认为艺术可以给人们在感官上带来欢乐和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贝卡利亚的后期作品同样数量可观。 1768 年他接受了米兰巴拉丁学院的邀请，开设公共经济及商业课程，后因讲授“公共经济要素”获经济分析先驱之名，其关于劳动分工以及粮食供应与人口关系等概念显然是他先于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马尔萨斯提出的。1771 年他被任命为米兰的最高经济委员会成员，潜心研究包括货币改革、劳资关系和学校教育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他通晓事理，其多方面的才能和渊博的学识，在当时的思想界颇具代表性。

二、那不勒斯地区的启蒙主义文化

那不勒斯启蒙主义文化的发展同该地区的历史条件及波旁王朝推行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起初，那不勒斯的进步知识分子热情支持王朝统治者所推行的反对教会干预王权的政策，但后来他们察觉到，广大民众在经济上一贫如洗，文化上愚昧无知，而自己同他们在感情上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他们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的试图以经济制裁的办法阻止教会势力的不断扩大；有的积极支持当权者的改革措施；有的则以反封建的平等主义作为斗争武器，但这些激进的做法严重脱离意大利南方的社会现实，到头来都成了空洞的口号。到了 18 世纪末，在那不勒斯文化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一部分人致力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另有一部分人则在法国雅各宾派的影响下，主张采取暴力行动，其中的不少人在 1799 年爆发的那不勒斯革命中光荣捐躯。

1. 安东尼奥 · 杰诺维西（Antonio Genovesi，1712—1769）

杰诺维西是意大利 18 世纪著名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712 年生于南方萨莱尔诺城附近的小镇卡斯蒂利奥内。1737 年他被任命为牧师，1738 年移居那不勒斯，1741 年起在那不勒斯大学讲授玄学。1743 年他写出 5 卷本《玄学宗观原理》（Istituzioni di metafisica）的第一卷，他提出的在那不勒斯王国进行改革的建议将人文主义思想同激进的基督教玄学体系结合起来。1745 年他发表有关逻辑学和物理学的论文。1748 年他被指控在《玄学宗观原理》一书中宣扬异端思想，不得不放弃出版另一部有关神学的姐妹篇的计划，直至他死后此书才以《一般基督教神学原理》的书名于 1771 年出版。1754 年那不勒斯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讲座，杰诺维西被任命为该讲座的第一主讲人。与此同时，他继续从事讲学和写作，并于 1758 年发表《有关宗教和伦理学的哲学冥想》

（Meditazioni filosofiche sulla religione e sulla morale）。他于1765年发表的《商业课程》（Lezioni di commercio）是意大利第一部经济学论著，较明显地流露出其重商主义观点的特点。在政治哲学方面，他认为教会的权威不应超出纯属宗教事物的范畴。由于那不勒斯统治当局日益倾向于人文主义思想，故对他所创导的国家应把教士及教团逐出境外之说深表欢迎。杰诺维西的一系列有关改革的观点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但他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积极宣传启蒙主义思想，成为意大利南方启蒙思潮的一位代表人物。

2. 菲尔迪南道·加里亚尼（Ferdinando Galiani，1728—1787）

加里亚尼生于意大利中部阿布鲁佐地区的基埃蒂城。他是一位经济学家，对价值论的研究有许多先见之明。1759—1769年间，他在巴黎任那不勒斯驻法国大使的秘书，此后在那不勒斯政府工作，协助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1750年他发表论文《论货币》（Della moneta），论述货币的性质和价值、流通和交换，发展了效用和稀少产生价值的理论；1770年发表的论文《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Dialogues sur le commerce des blés）强调了商业管制的必要性，反对完全自由放任的重农主义观点。在侨居巴黎的10年中，他同那里的社会上流人士接触频繁，并与其中的不少人保持着长期的书信联系，他的这些用意大利语和法语写的书信充分反映出他渊博的知识和敏捷的思想，对了解18世纪欧洲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颇有价值。另外，加里亚尼崇尚当代自由的欧洲文学，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由他撰写的诙谐喜剧《假想的苏格拉底》（Socrate immaginario）1775年在那不勒斯上演，获得一致好评。

三、戈齐兄弟及其戏剧创作

在 18 世纪的意大利文坛上，出生于威尼斯没落贵族家庭的戈齐兄弟无疑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卡尔洛 · 戈齐(Carlo Gozzi，1720—1806)年轻时曾在军队中服役，1744 年回威尼斯后即从事写作讽刺文章和散文。 1749 年与其兄加斯巴洛 · 戈齐一起创建“格拉内莱斯基学会”，旨在保护意大利文学不受外来影响和侵蚀，维护意大利文学创作语言的纯洁性。为了使传统的“即兴喜剧”获得新生，他在一生中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为此发表了许多文章诋毁威尼斯杰出剧作家哥尔多尼，指责他让下层人民占领戏剧舞台的做法。 1747 年他写了一首讽刺诗《传播时疫的帆船》，以此攻击现实主义喜剧作家哥尔多尼的戏剧改革。随后，他又于 1761 年创作了一部情节特别生动的即兴喜剧《三个橙子的爱情》(L'amore delle tre melarance) ，在该剧中，他把哥尔多尼刻画成一个魔术师，而把另外一位勃雷侠民间小说家、剧作家彼埃德罗 · 基亚利(Pietro Chiari，1711—1785)贬低成一个邪恶的妖精。这部剧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尔后他又继续创作了 9 部神话剧，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王变鹿》(Re cervo)、《图兰多特》（Turandot ）以及《美丽的小青鸟》（L'augellin belverde） 等。这些神话剧在意大利风靡一时，特别在德国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歌德、席勒、莱辛对这些剧本都极为推崇，席勒甚至还将《图兰多特》改写成剧本。后来，《图兰多特》和《三个橙子的爱情》都被改编成歌剧在各地上演。 1797 年，卡尔洛 · 戈齐还发表了一本文笔生动的《戈齐回忆录》（Memorie inutili） ，记叙他自己一生的经历。

戈齐采用一则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童话故事，创作出一部充满神奇色彩的戏剧《三个橙子的爱情》，首演时在威尼斯即引起很大的轰动。戈齐巧妙地将假面喜剧的传统手法同文学作品中尖锐的讽刺性描摹糅合在一起，使演出时场面生动，舞台效果甚佳。该出

喜剧的故事梗概如下：特列弗国王的太子塔尔塔利亚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只有设法逗他笑才有望将他的痼疾治愈,但经多次尝试均未果 后来由于陪伴太子的特鲁法尔金诺惹恼了莫尔加娜婆婆,才使太子笑逐颜开 莫尔加娜因受辱而怒火中烧,为了报复,她使太子产生了把仙女克列昂塔珍藏的三个神奇的橙子弄到手的无法遏止的欲望;太子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得到了橙子,但特鲁法尔金诺为解一时之渴,竟违背禁令,将三个橙子全部切开;橙子里走出三个少女,第三个幸运活下来的少女尼涅塔后成了太子的妻子 莫尔加娜不肯善罢甘休,又使尼涅塔变成一只鸽子,后经过无数次的神奇变幻，太子才得以与美丽的尼涅塔结为伉俪。

《国王变鹿》是一出取材于阿拉伯、波斯地区的童话悲喜剧,剧情充满魔术般的变幻和奇迹：塔尔塔利亚是国王德拉莫手下的一个奸臣,他因觊觎王位并贪恋王后安杰拉的美色,施计从魔术师那里窃得一种奇特的变形术;他先把国王变成一只鹿,后又将他变成一个穷老头,而他自己则钻进国王的体内;王后的美德和国王的气度感动了魔术师,他把躯壳归还给国王,而把塔尔塔利亚变成一个长着犄角的怪物；塔尔塔利亚最后因无法忍受失败的痛苦而死去。

《图兰多特》是戈齐的一部最著名的童话悲喜剧,他在这个剧本里摒弃了一切神奇的变幻和魔术，以渲染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冲突来烘托故事的情节：中国公主图兰多特生性骄矜,为不被任何向她求婚的男子所征服,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即只有猜中她谜语的人才能得到她的爱,否则就得命丧断头台 鞑靼王子卡拉夫痴迷公主的美色，决定冒死前去一试，但暗恋着他的女奴、被俘的鞑靼公主阿捷丽玛却想方设法破坏他们的婚姻；品行高贵的卡拉夫看出了被他战胜的图兰多特公主的绝望心情，于是请公主猜他本人和他的父亲的名字,如能猜中,她可以不嫁给他;阿捷丽玛出于嫉妒,将他们的名字事先告诉了公主;但是此时的公主已深深地爱上了卡拉夫,最终克服了自己傲视万物的心态,欣然同

意与他结为夫妻。

加斯巴洛·戈齐(Gaspare Gozzi,1713—1786)是一位诗人、散文家、记者和文学评论家。他和其兄弟卡尔洛同为"格拉内莱斯基学会"的早期成员。1758年,他发表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为但丁一辩》(La difesa di Dante),反对当时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培迪奈利贬低但丁的观点,赞扬但丁在意大利文学中的丰功伟绩,他为此声誉鹊起。他曾主办过两份报纸《威尼托报》、《观察家》和几份期刊,并在期刊上发表连载文章。另外,他还写过一部传奇小说、几首即兴诗和翻译过一些法国文学作品。

四、文学评论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启蒙主义文化时期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尚不能算作是真正的文学作家,尽管他们对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就文学创作的语言和风格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对阿卡狄亚诗派以及旨在纯洁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语言托斯卡纳语的"秕糠学会"提出异议,并为建立理想中的民主、具有战斗力的现代意大利文学作出过不懈的努力。受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那不勒斯地区的文艺评论家和作家,采用传统的创作模式赋诗作文,并对诗歌创作的语言问题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1. 萨万利奥·培迪奈利(Saverio Bettinelli,1718—1808)

培迪奈利生于伦巴第地区曼图瓦城,早年在神学院学习,后成为耶稣会修士,1758年之前先后在勃雷侠、波伦亚、威尼斯和帕尔马执教。尔后,他游历意大利及欧洲各地,并在巴黎结识伏尔泰和卢梭等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1773年耶稣会解散后,他回曼图瓦定居,直至1808年谢世。

他仿照18世纪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1721年发表的《波斯人信札》的创作模式,于1756年写成《维吉尔信札》(Lettere vir-

giliane），问世后随即引起文学评论界的热烈反响，被公认是启蒙主义论战文学的一部杰作。培迪奈利假设，这些信是由维吉尔从天国写给罗马阿卡狄亚诗社立法者的，在信中他们就意大利文学展开热烈的讨论。值得指出的是，作者在该书中表明了他彻底否定但丁《神曲》的立场,认为《神曲》中的诗句枯燥乏味､晦涩难懂,整部诗作只是‘一篇堆砌了说教､对话､问题……的科学论文。’实际上，培迪奈利反对的不仅是但丁或彼特拉克的赋诗风格，他真正攻击的目标是阿卡狄亚诗歌的诗律，秕糠学会式的对 14 世纪文学语言的盲目崇拜、缺乏独创精神的仿古倾向，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对意大利过于夸张的影响。他在 1766 年发表的另一部论著《英国信札》（Lettere inglesi)中,重申了《维吉尔信札》的观点,只是语气显得较为温和；他崇尚真实、理性和庄重，反对学院派的学究风气和过分自由的想象。

2. 朱塞佩 · 巴雷迪(Giuseppe Baretti,1719—1789)

巴雷迪是 18 世纪意大利另一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 1719 年出生在都灵，早年曾在帕尔马和米兰生活,1751 年起侨居伦敦,同当时英国遐迩闻名的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约翰逊友情甚笃。1760 年，他在游历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之后回到意大利，先后客居帕尔马和威尼斯。1766 年，由于他的作品在威尼斯文学界引起激烈的争辩，他再次前往伦敦，并在那里一直生活到 1789 年谢世。

他因翻译法国戏剧家高乃依的作品和发表 47 首讽刺诗而名噪一时。在侨居伦敦期间，他编纂了一部英意词典，用英语撰写了不少文学评论，其中较有影响的是一篇反驳伏尔泰抨击意大利文学而写的文章。从 1763 年 10 月至 1765 年 1 月,他在威尼斯出版半月刊《文学之鞭》，以退居乡间的一个老兵的名义在期刊上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对那些荒诞无稽的小说和歪诗拙文提出尖锐的批评。后由于威尼斯政府查禁了该期刊，最后的 8 期不得不改在

安科纳出版。分别于 1762 年发表的《致三个兄弟的家信》（Lettere familiari ai fratelli ）和 1777 年问世的《关于莎士比亚和伏尔泰先生的论述》（Discours sur Shakespeare de Voltaire）,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两部著作。其中，前者生动地记述了作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旅途见闻，对诸如斗牛盛会这样的民间节日作了精彩、详尽的描述；后者捍卫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抨击伏尔泰的文艺评论观，书中流露出来的启蒙主义美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风采。巴雷迪是一位思想活跃、文笔辛辣的文学评论家。他认为，阿卡狄亚派诗作是由‘ 事件 ’而不是由‘ 词藻 ’组成的文学作品。正由于他的写作风格趋于任性、怪诞，他的作品缺乏前后的连贯性和思想的深度。尽管如此，他仍不失为 18 世纪意大利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主张文学应‘ 雅俗共赏 ”,艺术应‘ 自由开放 ”,这对后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3. 梅尔基奥雷 · 契萨劳迪(Melchiorre Cesarotti，1730—1808)

契萨劳迪是一位天主教教士，18 世纪意大利文坛上语言问题论战中的一员主将。1730 年他生于帕多瓦，1768 年开始在帕多瓦大学教授希腊和希伯来语，后因翻译荷马、埃斯库罗斯、伏尔泰等人的作品而一举成名。他一生著述甚丰，作品体裁广泛，对 18 世纪颇有争议的文学创作语言问题有其独特的见解。他反对佛罗伦萨 “ 秕糠学会 ” 将佛罗伦萨方言誉为意大利文学语言范本的观点，主张从本国语言或外国语言中汲取有用的新词语，号召建立一种纯正、自由、流丽、通畅的意大利文学语言。他指出，意大利文学语言必须摆脱落伍的文学传统的羁绊，克服 “ 放荡自由 ” 和 “ 过于严肃、拘谨 ’的弊端，并提出‘ 在意大利，哲学天赋、科学文化和法国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 的观点。他的有关文学语言的言论遭到了卡尔洛 · 戈齐等语言纯洁派的猛烈反击。在 18 世纪下半叶

围绕语言问题的争论中，涌现出各种不同的思潮，它们打破了旧时的封闭局面,营造出一种自由、开放的现代气氛,对后来的文学、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哥尔多尼的现实主义喜剧

18 世纪上半叶，阿卡狄亚诗派崇尚的田园诗发展至鼎盛时期。与此同时,在戏剧舞台上,即兴喜剧风靡一时,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曾有一些托斯卡纳的喜剧演员致力于戏剧改革，但是他们只是单纯沿袭 16 世纪的喜剧形式,没能突破文艺复兴时期喜剧的陈旧框框，故收效甚微。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法国启蒙思想开始在意大利广为传播，喜剧这一颇受欢迎的民间艺术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改革。新喜剧不仅摒弃巴罗克文化一味追求奇异感的浮夸风格,而且致力于发扬传统喜剧的特色,强调观察现实生活。威尼斯著名剧作家哥尔多尼是这场喜剧改革的创导者。他较好地处理了即兴喜剧与梅塔斯塔齐奥音乐剧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音乐、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较为真实的人物取代假面人物，以结构紧凑的布局取代结构松散和经常重复的动作，以欢快自发的新风气取代了那些一看便知结果如何的闹剧场面。由于这些改革，他被公认为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的创始人。

一、生平

哥尔多尼(Carlo Goldoni，1707--1793 ）生于威尼斯一个没落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内科医生。他自幼随父亲辗转意大利北方的几个城市，其间，他因赋诗嘲讽巴维亚人而被开除学籍。1731 年他获得帕多瓦大学法律学位；之后，他曾在威尼斯和其他城市以律师为业，还担任过热那亚共和国驻威尼斯领事之职。

哥尔多尼的一家同戏剧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祖父一生酷

爱戏剧,对意大利及其他欧洲国家戏剧的发展十分关注,并经常为剧院撰写剧本。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哥尔多尼自幼对戏剧产生兴趣,以至后来成了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据他自己回忆,早在孩提时代他就特别爱看木偶戏，并开始贪婪地阅读他父亲收藏的各种喜剧剧本，这为他以后的戏剧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721 年他擅自离开学校，投奔一个巡游演员团。1732 年他将一则流传于民间的古罗马西哥德族国公主的悲剧故事改编成音乐剧。之后,他辗转意大利北方各地,写有许多不同题材的戏剧作品,为此声望日隆。1747 年,他创作的喜剧《高雅的女人》（La donna di garbo）被搬上舞台，首场演出就轰动了里窝那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翌年,他应一家剧团的敦聘,开始从事‘ 舞台诗人 ’的创作活动,从此他放弃了律师的职业,成为剧团的职业剧作家。

在长达 15 年的创作实践中,他以其光辉的天才和众多的剧作博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赏，从而成为蜚声意大利文坛的一位优秀剧作家。但由于长年过度的劳累，他自感力倦神疲，体质每况愈下，加之他的喜剧改革受到当时以戈齐为首的反启蒙主义批评家的肆意攻击,心中怏怏不乐,不得不于 1762 年离开威尼斯，旅居巴黎。在当时巴黎的戏剧舞台上,巴罗克式的即兴喜剧仍盛极一时,为了顺应那里的环境,他迫不得已改变写作风格,继续从事传统喜剧的创作.其间,1771 年写成的《乖戾的慈善家》(Il burbero benefico)使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后来，他为威尼斯观众重写了他的全部法语剧本,他的法语剧本《扇子》(Il ventaglio) 是他改写成意大利语的最佳剧本之一。1764 年退休后，他在凡尔赛宫廷内任国王路易十六妹妹的意大利语教师。自 1784 年起，他开始用法语著述他的《回忆录》(Le memorie),1793 年在巴黎去世。法国议会因他在戏剧创作方面卓尔不群的天才和巨大的贡献，决定归还他在法国革命前夕被扣留的薪俸。遗憾的是，这位伟大的意大利启蒙主义剧作家没能赶上领取法国议会发给他的养老金，在议会作出决定

的前一天弃世而去，给后人留下了 267 部剧本，其中的 155 部为喜剧。

二、喜剧改革

哥尔多尼的创作生涯始终与他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戏剧的不懈追求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艺术技巧而言，他的喜剧改革改变了假面喜剧由演员在舞台上即兴演出的传统。新喜剧都有固定的文学剧本,意象新颖,形式活泼,内容富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从而使喜剧起到更大的教育作用。诚然，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不是一气呵成的，它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渐臻完善的。起初，他在剧本中仅为主要人物写有详细的台词和动作要求，至于其他的角色，他只是附上一段简短的说明，由演员在舞台上任意发挥。直至 1743 年,作者才在《高雅的女人》中大胆地革新,把它写成一部完整的剧本，剧本里面既有所有上场人物的台词，也有舞台布景的详细描述，演员们只能在剧本规定的范围内各自发挥其表演特长。之后，作者又对喜剧进一步加以改革，在 1750 年根据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理查逊的长篇小说《帕美拉》改编的剧本《未出阁的帕美拉》（La Pamela）中，他取消了假面具的运用。不久，他又在剧本中删除了仆人这一角色，而在拉丁喜剧、文艺复兴时期喜剧和即兴喜剧中，仆人一直被视作喜剧演出效果的重要因素和引人发笑的人物。即兴喜剧在 16 世纪的意大利舞台上刚出现时，曾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但到了 18 世纪，此种形式已逐渐变得平庸和缺乏思想内容。新喜剧不再受传统模式的约束，而是积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丑和美，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哥尔多尼才思敏捷，智力超群，文笔遒劲，不落窠臼，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形象生动的人物：胸无点墨而又妄自尊大的封建贵族、精明强干而又质朴敦厚的商人、机灵聪明而又感情真挚的妇女等，在无情鞭挞贵族恶习的同时，对第三等级的下层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

由于种种原因，哥尔多尼的喜剧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遭到一部分喜剧演员的竭力反对，因为他们习惯于扮演某个特定的角色，而现在得根据剧情的需要刻画不同人物的性格，在舞台上演出时又不能任意更改台词，感到别扭和拘囿。其次，威尼斯观众一时无法适应新颖的喜剧形式，他们明显偏爱戈齐极力维护的即兴喜剧，因为他们能从上场人物的假面具预知情节的发展。再则，哥尔多尼是一个靠薪俸维持生计的剧团诗人，剧团班主虽然也关心演出的效果，但他更注重的是每天的票房收入，因此，剧作者在写剧本的时候，还是得设法迎合观众的情趣爱好，违心地塞进一些自己厌恶的内容。

在喜剧改革的过程中，威尼斯当时的政治形势给哥尔多尼带来了很大的阻力。那时，当权者利欲熏心，企图以建立寡头政治来获取个人特权，但又意识到每况愈下的政治趋势对其统治造成的威胁，故欲借助改革来防止局势的继续恶化。在这一场争权的格斗中，文学艺术势必也得为权贵们的私利服务，否则就会招来灭顶之灾。哥尔多尼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始终得思前顾后，十分小心谨慎，以免引起贵族老爷们对他的猜疑。比如：剧本中逗人发笑的贵族不能是威尼斯人，他得把嘲弄的对象写成那不勒斯或托斯卡纳的权贵；为了避免得罪天主教会，他尽量不让神父之类的人物出场。这些禁忌给他在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犹如紧箍咒一样束缚了他异常丰富的想像力。为此他感到痛心和苦恼，一个剧本写成后往往得多次加以修改。

哥尔多尼改革喜剧的想法不是在心中蓦然萌生的，而是在他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起初，他对改革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只是想把即兴喜剧改得更合乎情理，使剧情的寓意更为明朗而已。后来，随着创作实践的不断深入，他的写作技巧日渐谙练，改革思想也益臻成熟。倘若我们仔细阅读哥尔多尼创作的喜剧，我们将不难发现，他不仅改革了即兴喜剧的表演技巧，

而且在剧本的思想内容方面也有了重大的突破。他的喜剧忠实地反映生活,剧本往往由一系列鲜明生动的现实生活场景组成,具有明显的启蒙主义思想，与当时欧洲流行的资产阶级喜剧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哥尔多尼不仅是一个深受威尼斯观众喜爱的剧作家,他同时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意大利民族戏剧家,他的许多剧本至今仍在世界各国的舞台上上演，有的还是各国大剧院的保留节目。

在作者的早期作品中，尽管主要人物的台词和动作都有较完整的文字规定,但与拉丁喜剧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喜剧一样,剧中人仍然是一些抽象、空洞、孤立的角色。而在他后期创作的剧本《说谎人》(Il bugiardo)中的雷利奥,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人物,在他身上集中了说谎者的共同特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此以后,哥尔多尼笔下的人物不再是单纯地为剧情需要而孤立存在的角色，他们或多或少都是现实生活中某一类型人的缩影，其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均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创作于 1745 年—1753 年间的《一仆二主》(Il servitore di due padroni)是一部建立在误会、巧合、终于真相大白的情节之上的喜剧,至今仍是全世界许多剧院的保留节目。在这出喜剧里，哥尔多尼以一个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仆人为主人公,并以幽默诙谐的笔触描绘了他的机灵和聪明,歌颂了他纯朴憨厚的品德，表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赞美。正是在这位仆人巧妙的周旋之下,该剧以 3 对情人订婚而告圆满结束。而哥尔多尼在 1760 年用威尼斯方言写成的另一部著名喜剧《老顽固》(I rusteghi)中,成功地描摹了 4 个不同性格的人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较成功地反映了威尼斯的生活特色,刻画了这些顽固人物性格上的共同点。在这出喜剧中，哥尔多尼鞭挞了资产阶级的恶习，讽刺了他们为限制妻女的行动订立某些类似修道院或监狱制度的顽固而愚蠢的做法。剧终时，由于老顽固商人一位朋友之妻仗义执言，老顽固的女儿同她的情人终成眷属。

哥尔多尼在思想上摆脱了即兴喜剧和其他传统喜剧旧框框的羁绊，在剧本的写作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逐步建立起一种完全新颖的、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喜剧形式。在同一时期，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狄德罗以及德国启蒙哲学家和剧作家们，也为改革戏剧的表现形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认为，除了传统的喜剧和悲剧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戏剧形式，即资产阶级喜剧。他们借助喜剧风趣的对白和欢乐的结尾，向观众提出了一系列严肃的现实问题,为资产阶级登上戏剧舞台立下了汗马功劳。哥尔多尼的《老顽固》成功地描写了新旧家庭观念之间的冲突，情节妙趣横生，但剧中人却丝毫没有荒诞滑稽的动作或逗人发笑的台词，全剧以两种不同家庭观念的妥协进入尾声：年迈的的父亲对妻儿相敬如宾，而妻儿在要求改变旧俗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自己丈夫和父亲的尊重。哥尔多尼的另一部著名喜剧《女店主》（La locandiera） ,描写了一个机灵、美丽、泼辣、聪明的女店主米兰多丽娜耍弄几个追求她的显贵房客的故事：她容貌秀丽，风姿迷人，一些光顾她店铺的贵族老爷为之神魂失舍、忘乎所以；为了博取她的欢心，他们终日周旋在她的周围，而她对这一伙逢场作戏的纨绔子弟嗤之以鼻，百般地嘲弄和戏谑他们，最后同一个在她店里工作并深情钟爱着她的仆人结为夫妻。在这一出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喜剧中，作者无情地鞭挞了贵族的矜夸和虚伪，热情歌颂了下层平民朴素、忠贞的爱情。正因为如此,《女店主》自 1753 年在威尼斯首场演出以来,至今差不多已有 250 年的历史，但它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失去其艺术光泽，戏中聪明、美丽的女主人公米兰多丽娜至今仍活跃在意大利以及世界各国的舞台上，《女店主》依然不失为剧院保留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戏目之一。

随着喜剧改革的不断深入，哥尔多尼除了注重刻画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形象以外，还有意识地在剧本中反映渔民、手工艺匠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每日间的生活。他认为，一个剧作家如果不

深刻了解各种人物的社会地位和思想感情，他就不可能如实地在舞台上表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因为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对每个人的谈吐、举止都有极大的影响。他曾说过：“一个生性妒忌的平民在盛怒之下，或许会对向其妻子假献殷勤男子脸上击一巴掌，而一位贵族老爷，纵然内心燃烧着嫉妒的烈火，却懂得克制自己的感情上的冲动，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允许他干出鲁莽或有失体面的事来，不管他是否愿意，他得容忍几位好色之徒围着他的妻子成天打转。”在作者的妙笔之下，女店主米兰多丽娜不再是俗套而轻佻的女仆，她精明强干，使虚伪、狡黠、玩世不恭的富家子弟一一坠入情网，成了单相思的牺牲品，在满场的笑语声中，作者表达了对她的赞美和同情，给观众以深刻的启迪。

三、关于哥尔多尼喜剧改革的争论

哥尔多尼的喜剧艺术把阿卡狄亚诗派的田园诗和启蒙主义文化和谐地糅合在一起，不愧为 18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文坛上最杰出、最富有代表性的一位作家。他对传统喜剧的一系列改革在当时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挑起了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其中，勃雷侠民间小说家和剧作家彼埃德罗 · 基亚里可谓是反对派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认为，剧情的需要就是一切，而写作艺术和表演技巧都必须为这一宗旨服务。哥尔多尼在喜剧改革中遇到的最大劲敌是威尼斯贵族作家卡尔洛 · 戈齐，他虽然承认哥尔多尼新喜剧的艺术魅力，但是他又以辛辣、嘲讽的语言猛烈抨击哥尔多尼的改革思想，把传统喜剧讴歌成永恒不变的戏剧模式，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极力贬低哥尔多尼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喜剧。 1761 至 1766 年间，卡尔洛 · 戈齐写了 10 部传统童话剧，剧情怪诞，结构离奇，在这些喜剧中，皇帝、公主、女巫等人物均带有威尼斯传统的假面具，他欲以此为行将消亡的假面喜剧进行辩护，削弱哥尔多尼喜剧改革的影响。这些童话剧的剧情与民间文学有着密切联系，

带有一定的诗意和幻想成分，场面引人入深，因而博得了一部分平民和资产阶级观众的赞赏，甚至一些德国浪漫主义作家也对卡尔洛·戈齐的童话剧予以较高的评价。但是，当时具有启蒙思想的进步作家深刻理解哥尔多尼喜剧改革的社会意义，热情洋溢地支持他进行大胆的创新，因为他的喜剧改革并不单纯为了提高舞台的演出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作者观察社会、反映现实的强烈愿望，这无疑与启蒙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即兴喜剧中的固定角色是不存在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由于性格、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的矛盾和对抗是永恒的。一个表演技巧娴熟的喜剧演员应该熟悉生活，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观察和琢磨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只有这样，他才能在舞台上游刃自如，塑造出骄矜的贵族、贪得无厌的商人、满脑子偏见的顽固老头、热恋中的情人、爱评头论足的女人等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哥尔多尼晚年时，法国爆发了震撼全球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这一场波澜壮阔的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在这位伟大戏剧作家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对法国革命爆发前数十年中的启蒙思想始终持肯定的态度。他的喜剧崇尚人本无贵贱之分的精神，对妇女不公正的社会地位寄予深切的同情，具有一定的原始民主萌芽思想。正如哥尔多尼本人所说，世界和戏剧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因为世界给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素材，而戏剧则教会了他写作的具体方法。

哥尔多尼是一位多产作家，他的著作分别收集在 14 本厚厚的集子中，除了喜剧和喜剧改革理论作品之外，他还写有不少诗歌和回忆录，有的用意大利语写成，有的则采用威尼斯方言或法语著述，至今仍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

第三节 杰出的启蒙主义诗人帕里尼

1789—1794 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入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它摧毁了法国的封建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欧洲各国反封建的斗争。当时的意大利处于教皇、奥地利和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国内贫富差距悬殊，社会矛盾突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震撼了整个意大利半岛，人们似乎从中看到了改变意大利社会现实的希望之光。在法国启蒙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不少意大利作家和诗人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讽刺和批评,试图通过文学作品唤起民众的觉醒,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朱塞比·帕里尼就是这么一位嘲讽贵族生活自私和浅薄的作家和诗人,他的代表作《一天》(Il giorno)在讽刺贵族腐朽生活恶习的同时，热情歌颂了富有民主色彩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社会下层平民的疾苦寄予深切的同情。

一、生平

帕里尼(Giuseppe Parini，1729—1799)是 18 世纪末叶意大利的一位优秀诗人和启蒙运动民主主义者，他以其优美的贺拉斯体颂歌及杰出的讽刺诗《一天》著称于世,他的抒情诗、颂诗、训世诗和讽刺诗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诗人诞生在意大利北方布西亚诺风光旖旎的勃西希奥城一个丝绸小商之家。由于家境贫寒，父母无法供养他读书，全仗一位远房亲戚热心资助，年幼的帕里尼才得以在米兰就学。1754 年，这位好心肠的亲戚在病故前给诗人留下一笔数额甚微的遗产，并嘱咐他抛弃世间浮华，立志为教会服务。数年后，帕里尼当上了神父，并在一位公爵家里担任其子女的家庭教师，经济条件仍十分拮据。帕里尼的第一本诗集《里帕诺·埃乌比利诺诗选》(Poesie di Ripano Eupilino)于 1752 年问世,这为他

叩开了米兰文坛的大门创造了条件。在公爵家执教的几年中，诗人同米兰上流社会的贵族接触甚为频繁。起初，贵族彬彬有礼的谈吐、矜夸高雅的举止、聪慧博学的天资、家中豪华奢侈的排场，以及他们对下属表面上谦恭温良的态度，曾引起过他的仰慕和崇敬；但是日子一久，他逐渐感觉到，原来在他们文雅潇洒的风度背后却隐藏着他们卑鄙丑恶的灵魂。有一次，公爵夫人在盛怒之下痛打一个女仆，诗人因替她讲了几句公道话而被解雇回家，他犹如睡梦初醒，深为自己天真幼稚的人道主义思想感到羞愧。这一段痛苦的生活经历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素材，他的长诗《一天》的第 1、第 2 部分（“早晨”和“晌午”）相继于 1763 和 1765 年问世。在长诗中，他以嘲讽的笔调描绘贵族的闲情逸致和他们空虚无聊的生活，揭露了封建贵族与下层平民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当时曾引起一部分具有改良思想的上流人士的关注、同情和好感，他也因此一跃成为米兰文坛上举足轻重的诗人。之后，他曾任米兰官方报《米兰新闻》主编、巴拉丁学院文学教授和学院总监等职，成为米兰上层社会的一位显要人物。举世瞩目的法国革命爆发后，诗人惊喜交集，对此寄予无限的希望，但大革命后期的过激行为使他深感失望。1796 年法国军队长驱直入米兰，引起了意大利启蒙主义者们的强烈不满 帕里尼当时在新组阁的政府中任职，不久因坚决维护米兰人民的利益而遭到法国入侵者的排斥。然而，在当时青年一代的心目中（比如意大利浪漫主义初期著名抒情诗人福斯科洛），帕里尼早就成为新文学的象征，因为他在其作品中表达了意大利人民的爱国热忱和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 1799 年 8 月 15 日，奥一俄盟军挫败法国，诗人感慨万分，赋诗颂扬战事的胜利。就在这一天，诗人与世长辞。

二、帕里尼作品中的启蒙思想

帕里尼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力求建立阿卡狄亚田园诗与启蒙思

想之间的平衡，但他的文学评论却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他的启蒙思想和感觉论倾向。他认为，文学艺术是颂扬文明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在感官上给人以赏心悦目的快感。在对话体《贵族论》（Dialogo sopra la nobiltà)中,诗人精心设计了贵族和诗人本人死后在墓穴中一段饶有风趣、耐人寻味的对话，他们以贵族的起源、虚荣和特权为主题,将对话引向纵深。在对话的末尾,诗人点明了人本无贵贱之分的真谛，并批评了那些因出身贵族世家而妄自尊大的人的偏见。他指出 高尚的情操绝非从祖上遗传下来,它植根于人的心灵之中，只有通过长期艰苦的学习才能获得它。《贵族论》颂扬人的尊严,鞭挞富人天生高贵的错误观点,在当时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简而言之，帕里尼的诗歌在形式上保留了阿卡狄亚诗派的田园诗风采，而在字里行间却闪烁着启蒙思想的光辉。阿卡狄亚诗派着意刻画的是 18 世纪上层社会中贵族的生活画面，即一个由带假发的贵族和浓妆的贵妇组成的非理性世界；而启蒙主义文学艺术旨在讽刺和嘲弄贵族阶级的生活习俗，欲从根本上改变这一光怪陆离的世界。诚然，在阿卡狄亚诗派和启蒙主义文化之间寻求平衡是徒劳的，所以文学评论家在评价帕里尼的作品时,时而强调它们的内容,时而却注重它们的形式。

长诗《一天》是帕里尼未竟的一部重要文学著作,他在长诗中以幽默、诙谐的笔调,淋漓尽致地描摹了一位爱慕虚荣、玩世不恭、懵懂度日的年轻贵族的生动形象 他早上迟迟不起,用罢早餐后开始学习舞步、歌咏、音乐和法语,然后花费好多时间梳妆打扮,完毕后才坐上马车悠然出门而去；他坐在马车上悠悠忽忽，神情骄矜,对路上擦肩而过的平民百姓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晌午时分,他在贵妇人的私邸同她一起共进午餐,餐桌上觥筹交错,菜肴丰盛,在毫无内容的闲谈中,风流雅士向珠围翠绕的贵妇人百般献殷勤,而贵妇人则矫揉造作,故作媚态。按作者的原意,全诗共包括 3 个部分，遗憾的是，他未能实现夙愿就弃世而去。1801 年他的弟子佛

兰西斯科·雷依那将《一天》第3部分整理出版，其中"黄昏"主要描写礼节性的拜会和饭后的散步；"夜晚"则描绘盛大、豪华的宴会。下面的一段诗文选译自《一天》中的"清晨篇"：

广阔的地平线上显露出
日出前黎明的第一缕晨曦，
动物、植物、田野、河川
一片欣喜。
勤劳的农夫离开
留有妻儿微暖体温的被窝，
从床上一跃而起；
他们肩上扛着土地神、畜牧女神
发明创造的农具，
赶着耕牛沿小径朝田畴走去，
从低垂的树枝上
掉下一串串的露珠宝石般晶莹。
起身后的铁匠推开店铺的门窗
叮当叮当，继续干着未完的活儿，
为忧心如焚的富人打造
加固首饰盒的钥匙和铁皮，
或在金银首饰和花瓶上镂刻花纹，
将祭台和新娘装饰一新。
听了我的一番话你为何
像一头满身硬刺的豪猪，
吓得毛发一根根全部竖起？
老爷，我说的可不是你。
日落时分你不会在昏暗的光线下
端坐在破旧的餐桌边，

也不会躺在简陋的床上就寝，
可穷人却只得接受凄惨的命运。
你是血统高贵的老爷，
是世间至高无上的臣民。
朱庇特赐予你高尚的生活，
让我带领你走上新的路径。
你周旋在晚宴、歌剧和舞会之间，
漫漫长夜似乎永不消逝，
直至筋疲力尽方回到宅邸，
等着你的是
消磨时光的新招，丰盛的酒席，
桌上摆满精美的菜肴，
还有法国、西班牙、托斯卡纳的美酒
等着你畅饮，
被誉为‘ 餐桌皇后 ’的匈牙利葡萄酒，
瓶上印有酒神赐予的常青藤标记。
最后睡神亲自替你盖上
柔软的毯子，
忠诚的仆人
放下丝织的窗幔。
公鸡的啼叫催你入睡，
而芸芸众生此时却
不得不睁开睡意正浓的眼睛。

长诗的作者以温和的嘲讽笔调揭示了贵族懒散、昏聩、腐朽的生活恶习，但他毕竟是一个改良主义者，故不切实际地期待当权者采取明智的措施根治社会弊病，憧憬着一个以农民和手工艺匠为主体的理想社会的早日到来。他的诗句显示出阿卡狄亚诗派陈旧

的形式和启蒙思想新内容之间的矛盾 就语言论,长诗显得单调和枯燥。

除《一天》外,帕里尼在 1757 年至 1769 年间还写有不少颂诗和抒情诗,积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表达了对新生活的无限向往。帕里尼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颂歌集》(Odi),共包括 19 首贺拉斯体的诗歌,内容涉及人生、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表达了他追求人类尊严和社会文明的愿望。正因为如此,19 世纪意大利著名浪漫主义诗人福斯科洛和历史小说家孟佐尼把他称颂为' 艺术大师 "。1899 年在他逝世 100 周年之际,意大利政府在米兰修建纪念碑,以表彰这位杰出的诗人和文学家。

第四节 悲剧作家阿尔菲耶里

创建具有民族特色的悲剧一直是 18 世纪意大利文人始终不渝的共同心愿,他们为意大利文坛缺少这一文学形式而深感内疚和不安。早在阿卡狄亚诗派田园诗盛行期间,就有一些人以法国悲剧为学习的楷模,为创建意大利的悲剧作准备,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的探索。他们认为,悲剧不能单纯描写缠绵悱恻的风流韵事或纠缠不清的情场风波,它应该积极反映社会现实,把具有坚强个性的英雄人物搬上舞台。18 世纪上半叶,出身贵族门庭的作家、历史学家西庇阿 · 马费依(Scipione Maffei,1675—1755)根据希腊神话故事改编成神话悲剧《梅洛佩》(Merope),这是阿尔菲耶里之前最优秀的意大利悲剧作品。嗣后,一度被人们认为艺术技巧拙劣的莎士比亚悲剧,随着时代的前进和人们鉴赏能力的提高,越来越显示出其璀璨的艺术光华。到了 18 世纪下半叶,在激烈的争辩和热切的盼望中,阿尔菲耶里以独特的天赋和顽强的毅力完成了第一部历史悲剧,成为 18 世纪意大利古典主义悲

剧的创始人。他那诗体自由的悲剧，即他自己所称的“意志的悲剧”,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大多抒发启蒙主义思想及反暴政、拥护共和的政治观点。阿尔菲耶里是一位悲剧诗人，反暴政是他作品的主要题材，他希望以自己的悲剧作品为意大利提供堪与欧洲各国文学媲美的戏剧,促进意大利民族精神的复兴。但是,作者拒不接受启蒙主义以下的两个基本观点：推行改革或许能改善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理性是人征服自然和历史的唯一手段。

一、生平

阿尔菲耶里(Vittorio Alfieri,1749—1803)诞生在比埃蒙特地区阿斯迪城一个殷富的贵族家庭。正如他自己在自传中叙述的那样:他一生坎坷,生活动荡;生性乖戾、易怒;为人倔强、自信。幼年丧父后，他曾因过度悲伤而有过轻生的念头。1758 年他被送入都灵军事学院就学，但因学习科目不遂心意，8 年学成后一无所获。退役后，他成天闷闷不乐，无法安心在一地定居,5 年中他几乎游遍了整个欧洲。他总是怀着嘲讽的目光观察周围的世界，似乎四周没有一件事能悦他的心意。生活中的多次爱情波折使年轻的诗人濒于绝望的境地，他几乎陷入孤独、忧伤之中而不能自拔。

他接受启蒙思想后，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认真研读伏尔泰、卢梭,尤其是孟德斯鸠的作品,体验和向往着政治自由,同时进行悲剧的创作。1775 年他完成了处女作《克娄巴特拉》(Cleopatra)，在都灵上演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此决心献身文学事业，开始系统研究经典著作和意大利诗人的作品。不久，他的另两部悲剧《腓力普》(Filippo)、《波利尼塞斯》(Polinice)也相继问世。1777 年，阿尔菲耶里在佛罗伦萨结识觊觎英王位的斯图亚特公爵夫人(当时她因与其丈夫性情相悖,正过着独居的生活),并同她结合，这对诗人的文学创作活动起了重要的影响。自 1786 年起，诗人偕同公爵夫人一起迁居法国巴黎，并出版了一本悲剧集

子。数年后，震撼全球的法国革命爆发。阿尔菲耶里是一位自由的热情歌颂者，他以遒劲的文笔写下了颂诗《摧毁了巴士底的巴黎》（Parigi sbastigliato），诗文情感激荡，恣意挥洒，高度赞扬了法国革命战士 1789 年 7 月 14 日攻克巴士底狱的伟大壮举。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诗人逐渐对雅各宾党人的专政深感不安和痛心，并于 1792 年逃离巴黎返回佛罗伦萨。晚年他潜心撰著卷帙浩繁的《阿尔菲耶里自传》（La vita）及讽刺诗集《米索格洛》（Misogallo）等，1803 年卒于佛罗伦萨。

二、政治理想和悲观主义

阿尔菲耶里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反对专制和虐政，但是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色彩。他不相信新的社会制度和政治机构能根除虐政造成的祸害；他更不相信废黜君主能改变政权的性质，所以他对任何形式的专政体制均持否定态度，而惟独对法国人民在革命初期砸碎旧制度的壮举大声喝彩。他认为，人若想得以自由地生存，仅仅依靠社会改革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通过自杀或隐居的途径才能彻底与社会隔离。他这种消极悲观的论调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另外，他把诗歌称颂成表达无政府主义理想最完美的文学艺术，因为诗歌赋予了人最高的荣耀。

阿尔菲耶里于 1790 年起撰述的《自传》，无疑为我们打开他内心世界的大门提供了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有助于我们剖析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作品深邃的寓意。在《自传》中，阿尔菲耶里以细腻的笔触记载了他一生中不同时期思想感情上的变化：幼年时他厌恶自己所受的教育，热烈追求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试图以此驱散心中不可名状的忧愁 成年后，他为寻找‘安逸的’生活环境而漂泊异乡，但在如此寥廓的世界上竟没有一处他悦意的地方，面对满目疮痍的现实社会，他感慨万端；他执意不见阿卡狄亚派诗人、剧作家梅塔斯塔齐奥，因为他曾在皇家花园内亲眼目睹梅塔斯塔齐奥

屈膝向奥地利女王玛丽亚·特利莎行礼，而他平素深恶痛绝的正是奴颜媚骨的小人；他极端鄙夷当时普鲁士国王腓特列大帝和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因为他们推行的是维护农奴制及向外扩张的政策.荒凉的自然景色时时在他心中激起层层感情的涟漪,并赋予他写诗的灵感;他突然逃离心爱的女子,孤身回到都灵,为了逼迫自己将恋人遗忘，他歇斯底里地将自己的头发剪得凌乱不堪，甚至还让仆人把自己紧紧绑在椅子上……

三、悲剧作品

他在 1775 至 1786 年间共写有 19 部悲剧，大部分取材于罗马和中世纪史,其中较著名的有《克娄巴特拉》、《索尔》(Saul)、《安提戈涅》(Antigone)、《布鲁图》(Bruto)、《米拉》(Mirra)等。他的早期作品受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影响，表现出对国家统一和民族自由的渴望；后期作品大多描写爱情和家庭生活。

18 世纪下半叶，五幕剧在意大利和法国颇为流行。这种戏剧一般取材于神话、古代传说或圣经故事，剧中出场的人物寥寥无几。阿尔菲耶里的悲剧所遵循的虽然也是相同的创作原则，但他在撰述剧本的过程中,往往删去游离于主题以外的内容,如风流韵事和情场纠葛等,使剧本的结构明朗,层次清晰,重点突出。另外，作者喜欢在大处用墨，注意把观众的视线吸引到剧中一个或几个主要角色(暴君或为自由浴血奋战的英雄)身上来,故事情节一般都围绕着自由和爱情这两条线索向纵深展开。剧中的英雄总是孤身奋战，而且在剧终时往往以自杀来表示对命运的屈从或对自由的无限向往,故有人把阿尔菲耶里的悲剧称作"悲壮的英雄史诗"。

《索尔》(1782)、《米拉》(1787)和《布鲁图》(1786—1788)是阿尔菲耶里的 3 部代表作。作者在剧中刻意雕琢主人公内心世界的矛盾和冲突,并借此烘托他们豁达、豪爽的英雄气概,剧情跌宕起伏,引人入深,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索尔》的故事梗概如下：

在巴勒斯坦捷尔波平原上，以色列王索尔率领大军，积极准备同来自地中海东岸的腓力斯人决一死战；索尔的女婿大卫曾被国王出于妒忌逐出宫廷，但他不记旧仇，此时也赶来参战；大卫虽然年轻，但治军有方,无往而不胜,他所到之处,男女老少一起出迎 赞颂大卫的歌声传到索尔耳中后，他大为不悦，怀疑是祭司在背后搞鬼，逐下令将他处死；大卫为此感到忿忿不平，毅然离索尔而去；索尔预感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最后在腓力斯人胜利的进军声中自尽身亡。《米拉》叙述的是塞浦路斯公主米拉的悲惨故事：塞浦路斯皇后因一件小事得罪了希腊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蒂，女神为徇私仇，在公主米拉的心中点燃了对其父王不可克制的情欲之火，但米拉的父母和奶妈却对她心中的隐情全然不知；米拉的未婚夫断定公主另有新欢，因而悲痛欲绝以致轻生丧命；国王惊慌不已，再次询问公主原由，米拉终于吐露真情，同时拔出父王的宝剑，刎颈身亡。毋庸置疑,《索尔》是阿尔菲耶里创作的最成功的一部悲剧,在以色列王索尔身上，作者的性格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索尔欲独揽大权,但力不从心 ;大卫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战功显赫,威名大震，索尔为此满腹狐疑，心烦意乱，夜不能寐，以致神经失常，最后只能以自尽来结束内心永远无法平息的矛盾。《米拉》则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处于绝望境地的少女形象：宇宙纵然如此浩瀚，但竟没有一个人能慰藉她那颗破碎的心，她无法向旁人透露冒犯天意的邪念，即使一死也未能减轻她的罪孽。《布鲁图》是阿尔菲耶里最有力量的反对暴政的悲剧之一，他将它献给“未来的意大利人民”。这出悲剧取材于罗马史，着意描写罗马将军布鲁图拥护共和政体、保卫自由的英雄胆略。据史实记载：恺撒企图在罗马建立独裁专政，遭到元老院贵族的一致反对，布鲁图为此参与密谋刺杀独裁者恺撒；元老院命他指挥与安东尼作战的全部军队，但终因士兵倒戈,全军溃败,他企图逃往马其顿,在途中被哥特人首领擒获,后由安东尼下令处死。阿尔菲耶里为了渲染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并让

理智占据上风，独具匠心地在剧中构思了布鲁图大义灭亲的情节：即使当布鲁图发现自己是恺撒的儿子，仍然没有动摇惩治暴政和保卫罗马自由的决心；按照布鲁图的授意，密谋者最后在元老院前将不肯放弃暴政主张的恺撒处死。而事实上，布鲁图在公元前 44 年 3 月参与刺杀恺撒后，被迫逃离罗马，且他的行动事先也不曾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是阿尔菲耶里却在这出悲剧中将布鲁图置于民众支持之下，充分显示出人民为反对暴政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从而使这出悲剧放射出光芒。

阿尔菲耶里的晚期作品具有一定的民族复兴思想，在呵责法国入侵者野蛮行径的同时，热情讴歌意大利民族的伟大和光荣。为此，意大利烧炭党领袖、民族复兴运动领导者马志尼和意大利 19 世纪杰出文学批评家德·桑克蒂斯等，都把阿尔菲耶里称颂为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先驱。就艺术而言，他的诗体剧本对 19 世纪浪漫主义优秀诗人福斯科洛和莱奥帕尔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他坎坷的一生、奇特的心理和倔强的个性对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启迪。

第九章　新古典主义文学

拿破仑一世 1799 年发动雾月政变之后，于 1804 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登基称帝。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法国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被入侵国的反法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拿破仑的统治地位逐渐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812 年对俄战争失利则进一步加速了帝国的崩溃。1813 年欧洲反法联军在莱比锡一战中严重挫败法军,翌年攻克巴黎,迫使拿破仑退位。但是,拿破仑一世不久即从流放地厄尔巴岛逃走，并于 1815 年重返巴黎，建立百日王朝。之后,英、奥、普、俄等国结成第七次联盟,在比利时南部滑铁卢一战中给了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军队以致命一击，显赫一时的法兰西帝国的开国大帝从此彻底倒台。欧洲各盟国虽然为维持欧洲大陆政治上的均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在拿破仑政权垮台后的数十年中,整个欧洲阶级矛盾激化,政治危机四伏,即使维也纳和平会议和神圣同盟条约也未能解决法国革命及拿破仑执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大堆严重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等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呼声日趋高涨。各国当权者试图恢复法国革命以前的社会政治局面，但是旧制度的砸烂和新国家的诞生进一步加剧了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暴动和起义时有发生。

在拿破仑政权崩溃后的头几年中，整个欧洲大陆的上空笼罩着疲惫、沮丧、失望和忧虑的气氛,历经沧桑的人民普遍对意味着进步、幸福的启蒙思想失去信心。在意大利，1799 年爆发了那不勒斯革命,它的失败标志着启蒙思想家预言的破产,一些逃往米兰的那不勒斯政治流亡者也清醒地意识到，启蒙主义的抽象概念铸

成了大错，因为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理性的王国”只不过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王国。人们重新如饥似渴地学习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布鲁诺、康帕内拉、萨尔比，以及18世纪那不勒斯哲学家维柯等人的政治、哲学思想，从中寻觅精神食粮，为建立统一、自由的意大利而不懈地努力。

世事的变迁和严峻的现实促使广大知识分子从虚无中惊醒，面对动荡不定的社会形势，他们忧心忡忡，感慨万千。如今，富有启蒙色彩的理想、感情和信念逐渐失去了昔日的锐气和魅力，人们普遍要求寻找一种新颖的文学来抒发感情。在这样的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新古典主义破土而出，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起着过渡的作用。应该说，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复古思潮，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哲学观念，体现了人们欲以古典美的形式表现新内容的愿望。 18世纪下半叶，随着意大利南方坎巴尼亚地区地下古城埃尔科拉诺和庞贝挖掘工程的顺利进展，不少珍贵的古代艺术品得以重见天日，在文学和形象艺术领域再度激起人们对古典世界的无限崇敬。德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温克尔曼(1717—1768）被公认为欧洲新古典主义最杰出的理论家之一，他的主要著作《希腊雕塑绘画沉思录》和《古代艺术史》不仅有助于古典艺术的普及，而且对西方的绘画、雕塑、文学乃至哲学，都有重大影响。新古典主义主张运用民族规范语言，把14世纪誉为文学语言的黄金时代；新古典主义以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学艺术为典范，甚至大量采用古代题材，作品富有现实主义风采，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这种新的文学思潮一度统治着意大利文坛，并对绘画、雕塑、建筑等形象艺术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直至以浪漫主义为主体的新的文学运动兴起之后，新古典主义的过渡作用才告终结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诗人温钦佐·蒙蒂

在意大利文学从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蒙蒂无疑是一位最有代表性的新古典主义诗人，他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特征和文学倾向。

蒙蒂(Vincenzo Monti，1754—1828)出生在意大利北部的阿尔丰西尼城，早年曾在神学院和费拉拉大学攻读法律和医学。1778 年迁居罗马后，开始在教会供职，并同那里的文学界人士有了频繁的接触，在思想上受到他们一定的影响；其间，写有长诗和悲剧多部。起初，诗人对法国革命持敌对立场，但对革命的进展以及它在各阶层人士中的反响十分关注。1793 年，他根据法国驻那不勒斯公使馆秘书巴斯维勒在罗马遇害的史实，创作了梦幻长诗《巴斯维勒》(La Basvilliana)，但长诗中描述的主要情节是由作者杜撰的：巴斯维勒罹难后，天主不但宽恕了他生前的罪孽，而且还拯救了他的灵魂，让天使陪伴他飞回被革命军蹂躏、毁坏的法兰西，在腥风血雨中目睹了巴黎城内一幕幕怵目惊心的景象，告诫人们警惕法国革命可能带来的危害，诗句中流露出罗马教会对法国革命的极端仇视和惶恐不安的心理。由于当时革命的气势如火如荼，拿破仑军队挺进的步伐迅猛异常，蒙蒂在法军连战皆捷的形势之下，未能将梦幻诗写完就被迫辍笔，带领全家秘密逃往米兰。然而，一年前曾被拿破仑军队占领过的米兰，如今已成为意大利的革命中心。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蒙蒂的日子甚为艰难，他的政治对手常拿他未写完的梦幻诗《巴斯维勒》呵责他。拿破仑建立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崩溃后，诗人被迫逃离意大利；在法国侨居期间，他生活潦倒，经济拮据。拿破仑倒台后，蒙蒂继续为新主子奥地利政府服务，赋诗颂扬新的统治者，但诗句中已没有昔日那种激荡的情感。在同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激烈冲突中，诗人凄凉、孤独地度

过了晚年,加之病魔缠身,女婿猝然去世,女儿横遭诬陷,他更觉人生的悲 怆凄恻;1828 年 10 月，他在米兰忧郁地离开了人世。

蒙蒂是一位具有丰富想像力的诗人，善于从拉丁、希腊和意大利诗人作品中吸取养料，以扩大创作视野，使自己的写作技巧益臻完美。他的诗句优美柔和、和谐悦耳，具有较强的音乐感。 1810 年，他以优雅无韵诗的形式将古希腊诗人荷马卷帙浩繁的长诗《伊利亚特》从拉丁语译成意大利语，译文虽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但再现了荷马史诗的英雄业绩，富有新古典主义的风采，被公认为蒙蒂的代表作，至今仍是新古典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品之一。

蒙蒂的文学作品记载了他一生中经历过的世事变迁，几乎是一部用诗句写成的编年史册，顺着年代的渐进，读者可以重温意大利自 18 世纪下半叶至 19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诚然，诗人只是从表面反映史实，没有阐明问题的实质。意大利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孟佐尼曾说过，在蒙蒂的诗句中，干草和鲜花每每掺杂在一起，而这正是蒙蒂诗歌的特征。倘若我们仔细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将不难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到阿卡狄亚派诗人梅塔斯塔齐奥和德国诗人歌德的影子。诗人认为，时新的题材应该同仿古的文学形式结合起来，他正是依照这一创作准绳写出了一部又一部作品，遭到了一些人的严厉批评，也赢得了一部分人的热情赞扬。

蒙蒂一生著述甚丰,除了梦幻长诗《巴斯维勒》和译著《伊利亚特》之外，还写过爱情诗3 个悲剧、一些有关语言学的著作,并翻译了一部伏尔泰的作品。另则，蒙蒂和他的追随者们还领导开展了有关文学语言的论战，他们认为：理想的文学语言应该是意大利语,而不是佛罗伦萨方言 随着生活、文化的进步,语言也在发生着变化，且变得越来越丰富;14 世纪之后的意大利语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变得更加丰富和成熟，完全有能力表达新思想和新生活。综合蒙蒂一生的文学创作实践，应该说，他是新古典主义时期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他的著作见证了意大利文

学从启蒙主义过渡到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无怪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巴尔迪将他与帕里尼相提并论，称他们是“诗人，更是判断细微的文学家”。

第二节　其他新古典主义作家

一、温钦佐 · 古奥格(Vincenzo Cuoco,1770—1823)

古奥格是一位史学家，以所著 1799 年那不勒斯革命史论而闻名。古奥格出生在意大利中部莫利泽地区契维达坎波马拉诺镇。为学习法律，1787 年他来到那不勒斯，但后来转而对政治、经济、哲学、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那里的启蒙主义者对他哲学思想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1789 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他成为雅各宾派的支持者。1799 年法国军队入侵意大利，那不勒斯爆发波澜壮阔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起义者最终赶走了波旁家族,建立起那不勒斯王国。古奥格积极参加那不勒斯王国的革命，尽管后来没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但他极力拥护新政权。在这一时期中,他写有《致温钦佐 · 罗索的书简》（Lettere a Vincenzo Russo），就共和主义者正在拟定的旨在加强自主权的宪法提出自己的看法。后来，反革命势力卷土重来,并取得了最终胜利,古奥格被投入监狱并判以 20 年流亡。在被迫流亡法国期间，他于 1801 年发表 3 卷本《1779 年那不勒斯革命史论》（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79），深刻分析运动失败的原因，因此声名大振。1805 年 6 月回米兰,创办和编辑《意大利日报》,宣传建立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他的另一部名著 2 卷本《柏拉图在意大利》（Platone in Italia）发表于 1804 年。1806—1815 年拿破仑统治那不勒斯时期,曾担任国家顾问、财政大臣等职务。1815 年斐迪南一世复辟后,他精神失常,1823 年殁于那不勒斯。

《1779 年那不勒斯革命史论》无疑是古奥格最重要的一部著

作，他在书中指出：革命不应该只是一种理性的行为，它必须基于广大民众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具体需求；革命者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企图将法国的政体和宪法原封不动地搬过来，错误地认为它们是理性的产物。以创作风格言，古奥格的文笔朴实无华，罗列的事实令人信服，他在书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后来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思想核心。《柏拉图在意大利》是一部书信体哲理小说，作者在书中通过虚构的柏拉图游历意大利南方的故事，再现维柯的形象，赞扬希腊殖民前意大利南方的古老文明，预言意大利将在继承和发扬其光荣传统的基础上获得新生。

二、伊波利多 · 平代蒙特（Ippolito Pindemonte，1753—1828）

平代蒙特是 18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文坛上另一位重要作家，以其前浪漫主义的抒情诗和备受推崇的《奥德赛》的译本著称。他出生在中世纪古城维罗纳一个贵族世家，曾在莫台纳一所大学接受教育，与当地的文化界人士关系甚密。1778—1790 年间，他一直在意大利和欧洲各地旅行，结识了蒙蒂和阿尔菲耶里等著名作家。他在法国逗留期间，写出《田园诗集》（Poesie campestri，1788）和一部关于欧洲政治形势的小说《阿巴里泰》（Abaritte，1790）。法国革命的恐怖统治使他的理想幻灭，遂离开法国前往伦敦、柏林、维也纳。返回意大利后，他发表了《田园散文集》（Prose campestri，1794）。此外，他还写过两部悲剧、一些论述道德的书信和布道文。

平代蒙特的作品和哲学思想标志着意大利文学从阿卡狄亚过渡到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特征。事实上，他作品中的新古典主义不及蒙蒂的那样绚丽多彩，他的文笔凝重、深沉，语言质朴清丽。他的秉性、自幼接受的贵族化教育、长年在外的旅行生活，加之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国家诗人作品的影响，使他在创作中注

重描摹置身于大自然怀抱中的人类的美丽幻想，以及他们对人生转瞬即逝的悲叹。蕴含在他作品中的忧郁和伤感，更多的是抒发了一个孤独者在寻觅栖身处过程中的复杂心绪。

平代蒙特一生著述甚丰，包括悲剧、抒情诗、讽刺文、书简、布道文和译作等，其中较著名的是《田园诗集》和《田园散文集》。在这两部作品中，他歌咏了乡村恬静淳朴的田园生活：秀丽怡人的景色，千鸣百啭的鸟儿，温柔幽静的暮色，乡间简朴的农舍……富有浓重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节爱国主义诗人乌哥·福斯科洛

一、生平

福斯科洛(Ugo Foscolo，1778—1827)生于希腊爱奥尼亚群岛的堪特岛上一个原籍威尼斯的外科医生之家，母亲是希腊人。少年时代，他曾在神学院读书；父亲不幸病故后，他随同母亲迁居威尼斯继续就学，同时开始习诗，虽然写作技巧尚欠谙练，但已引起不少人的关注。法国革命的爆发使年轻的诗人大为震惊，他虽汲汲于功名，但还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投身于政治斗争。1798至1815年是诗人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作品记载了这10余年中意大利历史的风云变幻，其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描述了拿破仑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创立的惊人奇迹以及他最终的失败。福斯科洛的诗作铿锵、遒劲，诗句中隐含着拿破仑时代意大利年轻一代的理想、情操和爱憎，清晰地勾勒出意大利文学从启蒙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的时代特征：18世纪风靡一时的启蒙思想渐渐被时代的潮流所吞噬，而为意大利的独立、统一而英勇奋战的新一代正在崛起。

在福斯科洛的一生中，爱情的梦幻、汲汲于成名的希冀，以及对自由和独立的向往，始终交织在一起，赋予了他丰富的创作素材和无穷的诗歌灵感。当他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少年时，就曾和一些

与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一起巧妙地救出被关押在堪特岛上的犹太犯人,他因此被捕入狱。对拿破仑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诗人曾寄予满腔的热望，尤其是拿破仑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下取得节节胜利的捷报，在年轻诗人的心中燃起了为自由而战的熊熊烈火。他十分崇敬拿破仑的雄才大略，期待着拿破仑将意大利从奥地利统治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为此他第二次锒铛入狱。获释后,年方 19 岁的诗人前往波伦亚,毅然加入了拿破仑的军队,并在一首题为《致解放者拿破仑》（A Buonaparte liberatore ）的颂诗中极力赞扬拿破仑的所谓英雄气概和卓越贡献。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福斯科洛有幸看到拿破仑本人,他发现自己心目中的‘ 救世主 ’却是一个贪图虚荣、一心为己、冷漠无情的平庸之辈,他顿时大失所望,懊悔不已。同其他拥护共和政体的爱国者一样,诗人不久便识破拿破仑为意大利准备新枷锁的暴政计划。拿破仑无视意大利人民的利益和尊严,于 1797 年同奥地利签订坎坡佛尔米和约，把威尼斯拱手让给奥地利人。为此,诗人百感交集地写道“: 倘若我们奋勇自卫至最后一滴血,战胜者绝不会出卖威尼斯,战败者也不可能再次获得它 !”他怀着深切的悲痛和满腔的愤懑,无限失望地离开了威尼斯,辗转于意大利北方各城市,后旅居巴黎,但他对意大利必胜的信念始终坚如磐石，为自由而战的崇高理想至死不渝。正因为如此,他在 1799 至 1800 年间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反法战争和热那亚的反围攻战役，决意同拿破仑抗争到底。有人让他撰文颂扬拿破仑的丰功伟绩，他却在演说词中抨击拿破仑出卖意大利民族利益的卑鄙行径。在巴维亚大学教授修辞学时，他只字不提拿破仑,为此教了几节课后就被校方逐出学校大门。另外,他写了一出影射拿破仑的悲剧，但只公演了两次即被上峰下令禁演。毋庸置疑,诗人的倔强性格招来了不少异议和责难,连他的挚友蒙蒂也加入了批评他的行列。诗人在给蒙蒂的信中感慨万端地写道“: 我亲爱的蒙蒂,我恳求你想一想,为了我那永不动摇的信念，

我离开了舒适的生活环境，抛弃了功名的诱惑，甚至丢弃了在亲朋怀抱中死去的快慰……我知道,你在我的《坟场哀思》上抹黑,企图以此威胁我。我的蒙蒂，我们不妨一起下坟地走一遭。当然，人们一定会对你赞声不绝，而对我或许会齐声哀叹：一个在狂热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异端分子！但是，我的笔可从未跟在人后亦步亦趋地编写谎言。”他的诗句情感激荡，充满着爱国主义的热忱。为此，年轻的一代对他十分崇拜和钦佩，他们在感情上同他是心心相印的。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恢复了奥地利在意大利的统治，福斯科洛拒绝效忠宣誓，先逃亡瑞士，翌年旅居英国。在流亡期间（1815—1827），他向英国人民介绍意大利文学,同时从事意大利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工作,著有《论意大利新的戏剧流派》（Della nuova scuola drammatica in Italia）和《彼特拉克论文集》（Saggi sul Petrarca）等文学评论,并为《神曲》和《十日谈》作注释。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靠教书和撰写评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作品的文章维生，生活潦倒，病魔缠身，常为躲避债务而不得不过着隐居的生活，最后在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与世长辞。为了缅怀这位刚正不阿的民族诗人，在意大利统一之后，人们将他的遗体运回意大利，安葬在佛罗伦萨专门安置名人灵柩的圣十字教堂内。诗人坎坷而浪漫的一生,是一部由祖国、自由、爱情、荣誉和死亡组成的悲壮交响曲，里面既有拿破仑时代意大利世事的风云变幻，也有人们对自由和新生的无限向往。正因为如此，后来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爱国志士们把他的诗篇视作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和为建立自由、统一的意大利而冲锋陷阵的动力。

在福斯科洛浪漫而又坎坷的一生中，有欢乐也有悲伤，有严肃的写作生活也有食不果腹的苦难经历。与阿尔菲耶里相比，他的内心世界更为丰富，也更具有复杂性和矛盾性。他的许多闪烁着浪漫主义思想光芒的著作，为浪漫主义文化运动的到来奏响了序

曲。下面一首题为‘黄昏’的十四行诗选译自《诗集》：

或许因为你是死亡和宁静的象征
你的降临才会使我感到如此亲近，
哦，黄昏 当夏日的云彩，和煦的春风
欢快地伴你同行，
当你从大雪纷飞的天际
给大地带来不安的长夜，
无论夏天或冬季，你翩然降至，
在我心中注入无限的温馨。

在通向虚无，永眠的路上
你使我浮想联翩，
充满苦难、忧伤的时光转瞬即逝，
忧虑和烦恼也随之烟消云散；
当我凝望着你安详的面容
心中渐渐平息斗士澎湃的激情。

二、主要作品

1. 《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Le ultime lettere di Jacopo Ortis）

书信体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是福斯科洛的一部重要著作，体现了意大利前期浪漫主义的文化特点，被评论家认为是意大利第一部现代小说，1789 年初版时的原名为《一对可怜情侣的真实故事》，但其中只有一部分出自福斯科洛的手笔，另一部分则由一个名叫安琪罗·萨索利的人所写。当时，由于福斯科洛决心投入火热的政治斗争，小说未完稿就被迫辍笔，直至 1802

年才将原先未写完的手稿重新整理修改，续完后出版。 1816 和 1817 年小说再版之前，作者又对它进行了一番加工和润色。

书信体是 18 世纪末叶意大利颇为流行的一种文学形式。福斯科洛博采众长，在他的《雅科波 · 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中吸收了一部分西方文学名著的精华，其中，歌德的第一部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他这部文学作品的创作影响尤为明显。福斯科洛以帕多瓦大学学生奥尔蒂斯作为这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的原型，叙述了一个年轻的爱国者因报国无门、失去恋人而走上自戕道路的感人故事。作者对他小说中的主人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独具匠心地将自己爱情生活中的欢乐和痛苦同小说的情节糅合在一起，甚至把自己恋人的名字以及他向恋人倾吐衷肠的书简也巧妙地搬进了小说。就内容而言，小说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十分相似，但奥尔蒂斯与少年维特不一样，他的自杀并不完全是由失恋的痛苦而引起的，而主要是由于他在意大利各地目睹了一幕幕封建专横、异族压迫的景象后自感无回天之力的无奈造成的。在小说的开端，即坎坡佛尔米和约签订后不久，奥尔蒂斯为逃避奥地利政权的追捕，毅然离开威尼斯，隐匿在帕多瓦南边的叶甫盖尼山中。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描绘中，蕴含着作者因政治理想破灭而产生的绝望和愤恨。福斯科洛感慨万端地写道：“我从阿尔卑斯山眺望意大利，热泪盈眶，战栗不已；我大声呼喊着要向侵略者报仇，但我的呐喊却被古代史上许多国家人民振聋发聩的呼声所淹没。当时的罗马人称霸世界，到处践踏他人的利益，在大海的彼岸和荒野的尽头寻觅、征服新的土地……”另外，在奥尔蒂斯写给友人罗楞佐的书信中，沸腾着一个爱国志士满腔的政治热情，流露出他对那些不顾民族荣誉、一味追求安逸生活的小市民的厌恶，以及自己失去恋人后内心的巨大痛苦。正因为如此，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人和民族复兴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感情上同福斯科洛是相通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倡导者、理论家马志尼就曾把他誉为意大利民族

复兴运动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

2. 《坟场哀思》(又译作《冢 》(I sepolcri)

1804 年拿破仑颁布新法令：为了保持环境卫生，死者的遗体必须一律掩埋在新建的墓地内，不得擅自安葬在教堂或住宅附近；墓碑必须符合统一的规格，碑文得由一个专门委员会审核批准。拿破仑俨然以救世主自居，肆意践踏意大利人民的习俗，激起了福斯科洛极大的愤慨。诗人于 1806 年在米兰着手创作抒情诗《坟场哀思》,翌年在勃雷侠城付梓出版。

实际上，死者遗体的安葬场所和具体方式纯粹是个表面现象，诗人在这方面并无独到的见解，倒是坟墓本身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勾起他无穷的遐想。在《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及一些十四行诗中，他曾多次流露出由死者的墓穴而产生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情感。他认为，墓穴是连接死者与其家人的无形感情纽带，死者可通过它向活着的人倾诉内心的欢乐与痛苦；墓穴又是历史的见证、宗教信仰的标志和荣誉的象征，人们在伟人的墓穴中可以看到希望的光亮，获得写诗的灵感；历代英雄的墓穴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仍可通过诗人颤抖的声音，重新勾起人们对往事的追忆。作者指出：纵然墓穴改变了人死后灵魂永不泯灭的谬说，但它却无法割断活人与死者之间感情上的联系，因为情愫和哀思是永存的，而人们必须依靠幻觉才能生存下去。他认为，文明生活建筑在幻觉的基础之上，幻觉和伟人的墓穴赋予人们有益的启迪，赐予人们克服悲观厌世情绪的力量，使他们勇敢地生活下去；诗歌是活着的人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倘若失去它，幻觉就有可能变得干枯萎蔫，或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在他看来，希腊古城特洛伊虽在历经 10 年战争的灾难后被毁，但它在墓穴中继续生存着，诗人荷马就是从墓穴中获得的灵感,写出了不朽的英雄史诗《伊利亚特》,以颂扬这座与日月共存的光荣之城。

福斯科洛的《坟场哀思》不仅对拿破仑的独裁政权是一种无声的反抗，而且还抹去了天主教会给墓穴和死亡涂上的一层神秘莫测、阴森可怕的色彩。他认为，在混沌时期，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部野蛮、原始的历史，只有建立了婚姻、家庭、宗教和国家等概念之后，人们才得以安宁和文明地生活；墓穴只是封住了亡者的躯体，但他的英灵尚存，这对活着的人无疑是一种莫大的精神安慰，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幻觉同早已亡故的亲友叙旧，表达对他们的悼念。随着长诗画卷的逐渐展开，诗人热情讴歌墓穴的伟大功能，甚至把它称誉为人类文明生活的根基，全诗最后以古希腊著名诗人荷马在特洛伊墓穴中获得创作史诗《伊利亚特》的灵感作为尾声。

就艺术言，诗人采用了警句式夸张和比喻的手法，语言简明凝练，笔力雄健有力，诗意隽永深沉，全诗如碑文一样的苍劲、优美，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长诗中的一些诗句至今仍被人们引用作含意深长的警句。

3.《三美女神》(Le Grazie)

早在 1803 年，福斯科洛在为自己翻译的古希腊著名诗人卡里马瞿斯的诗篇撰写评论时，心中就萌生了写诗颂扬希腊神话中象征美丽、欢乐的三女神的想法。1812 至 1813 年间，他着手创作这部酝酿已久的颂诗。当时，诗人的爱情生活一帆风顺，另外也没有其他不悦之事烦扰他，故写诗的速度较快。在颂诗中，他仿照维柯的写作风格，以清雅、秀逸的笔触，细腻地描摹了三美女神绰约的风姿和婀娜的体态，诗句如汩汩的溪水，优美、柔和。颂诗的第 1 部分叙述了三美女神在海上诞生的经过和希腊文明史的发展；第 2 部分主要描写人们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为三美女神建造祭台的壮观场面，并以诗人自己三位恋人为偶像，赞美了音乐、舞蹈和诗歌的功德；在颂诗的第 3 部分，诗人把读者带回到上新世沉人大西洋的一个神话世界，智慧女神将三美女神从邪恶的情欲

中解救出来，并让众女神编织神秘的薄纱遮盖她们的裸体，以保住她们的贞节。

就写作风格言，颂诗富有典型的新古典主义色彩：诗人自感无力同充满邪恶的时代抗争，只得栖身于美丽的神话世界，以此忘却内心的忧伤。诗人在这部暮年著述的作品中，以优美、抒情的语言表达了对青春的留恋，以及因政治理想破灭后心中的悲怆，如今死神正向他步步逼近,岁月倥偬,他深感惆怅。

第十章　浪漫主义文学

浪漫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文学思潮，产生并盛行于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的欧洲。它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资本主义制度逐渐确立和巩固,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时期的产物，体现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它与古典主义分庭抗礼，以直抒胸臆、歌颂理想、颂扬自然、追求人性美为主要特征,富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浪漫主义同时也是一种势如破竹的反对权威、传统和古典模式的思想运动,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横扫西方文明。浪漫主义同个性、主观、非理性、想象和感情共为一体,并往往以历史、民族奋斗和壮美的自然为其素材;在历史上,浪漫主义立场是对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的一种自觉反抗。

第一节　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

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19世纪首创。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方法，它是古已有之。整个人类文化发展伊始，在思想文化和艺术上就存在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认识世界的不同方式了。先人们最早是用浪漫的幻想去对待客观世界，于是创造出宗教、神话、戏剧以及各类艺术。这是浪漫主义的最早起源，它体现在人类童年时代的所有艺术创造之中。古代希腊、罗马的神话、史诗、传说、悲喜剧、寓言和抒情诗等作品，在它们理想模式的表层结构下蕴含着人们主观地把握世界的深厚意义，为后来的浪漫主义文学提供了文化史的基础和借鉴。

“浪漫主义”(romanticism)一词的语源词根来自南欧一些古罗马省府的语言和文学。这些地区的不同方言原系拉丁语和当地方言混杂而成，后来发展成罗曼语言。在 11、12 世纪,大量地方语言文学中的传奇故事和民谣就是用罗曼语言写成的。这些作品着重描写中世纪骑士的神奇事迹、侠义气概及其神秘非凡，具有这类特点的故事后来逐渐被称为 romance，即今天所谓的骑士故事或传奇故事。

严格地讲，浪漫主义起源于德国，其最早的表现形式是德国的“狂飚运动”(1770—1780)。作为资产阶级的文学运动，“狂飚运动”反对封建割据，抨击迂腐的封建文艺和虚伪的道德，主张重新评价感情和想象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狂飚运动”未能发展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运动，它来势迅猛，倏忽即逝。1799 年,由德国文学家席勒格尔、诺瓦利斯、蒂克、歌德和席勒等人主办的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在柏林初版,他们撰文把当时新诗的艺术风格称作“浪漫主义”,因为它同古典诗歌大相径庭，在反映现实上善于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采用热情奔放的语言构成瑰丽的想象，凭借夸张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人物的形象。到了 18 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德国作家、批评家弗·施莱格尔(1772—1829)成为德国浪漫主义的领袖；他联合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文人，形成一个文学中心。作为早期浪漫派的杰出理论家,弗·施莱格尔系统地阐明了浪漫主义的文学理论，宣称“只有浪漫主义的诗篇才能像史诗那样成为整个周围世界的镜子，成为时代的反映……它不仅能够从内部向外部，同时也能够从外部向内部达到最高的、多方面的发展”。然而，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在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和荒诞不经的色彩，作品中出现渲染神秘气氛、流露消极颓废情调的现象。但从总体来说，德国浪漫派仍是欧洲文学中一股涓涓清泉；它和英法等国的浪漫主义文学汇成了统一的文学思潮，有力地推动了浪

漫主义运动的发展。

第二节　浪漫主义文学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

继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之后，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学也逐渐形成，其间，新古典主义文学为浪漫主义文学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8 世纪初叶，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一场由法国浪漫主义女作家史达尔夫人(1766—1817 ）挑起的有关浪漫主义文学的激烈争辩。史达尔夫人是一位浪漫主义文学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动者，她早在 1800 年就发表她的著作《论文学》，介绍她对浪漫主义的观点。在这部著作和另一部于 1810 年发表的著作《论德国》中,她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问题，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史达尔夫人充分肯定浪漫主义文学富于感情和哲理，认为浪漫主义文学在表现本国的宗教思想、历史和社会情况、抒发人的情感上，有着无穷的灵感源泉，它是唯一可以成长的文学。后来，她在米兰一家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论翻译的方式和效用》的文章，以严厉的措辞猛烈抨击意大利平庸落后、迂腐陈旧的文学，呼吁意大利知识界人士翻译和研究欧洲现代文学的代表著作。史达尔夫人直截了当的批评在意大利死气沉沉的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拘守绳墨的传统文人为之感到惶恐不安，但青年作家却惊喜交集，极力赞扬史达尔夫人标新立异的主张。死死抱住传统文学不放的顽固派一味阻挠浪漫主义文学在意大利的流传，企图将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掐死在襁褓之中。奥地利统治者们十分赞赏回避社会现实而片面强调外形美的古典主义作品，他们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意大利的统治地位，不遗余力地扶持传统文学。由青年作家创办的半月刊文学杂志《调解人》（Il Conciliatore）具有明显的浪漫主义倾向，因而引起奥地利政府的猜忌和反感，在该刊物出版一年之后，当局即以企图颠覆奥地利政

权的罪名下令停刊，几位主编锒铛入狱。《调解人》阐发了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强调建立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服务的新文学的必要性，主张现代文学应积极反映社会现实和时代的呼声，同那些对沸腾的时代采取袖手旁观或无动于衷态度的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这一场文化领域内的白刃战中，伦巴第地区的浪漫主义文人一马当先，为建立意大利民族的大众文学作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

《调解人》在 1818 至 1826 年间的近 10 年中，先后发表了许多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论文，得到了知识界进步人士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意大利浪漫主义杰出小说家孟佐尼和诗人莱奥帕尔迪都曾为该刊物撰写过文章，抒发政治理想。在这一方面，米兰爱国诗人乔万尼·白尔谢于 1816 年发表的《格利索斯托莫致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一封信》可谓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篇有力的檄文。作者在文章中虚构了一个名叫格利索斯托莫的人，他就其儿子提出的一系列有关借鉴外国文学的问题，在信中逐一作了详尽的回答，但在信的末尾却亦庄亦谐地否认了自己的观点。白尔谢在信中对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诗歌必须大众化的主张。他独辟蹊径地指出：在拉丁诗人维吉尔和古希腊诗人荷马的作品中，也有一定的浪漫主义因素，因为他们的诗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宗教信仰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白尔谢的文章在意大利文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蒙蒂为首的新古典主义文人把它视作洪水猛兽，担心它会毁坏由意大利文艺、美术和音乐女神创建的‘美丽王国”。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在伦巴第和比埃蒙特地区逐渐形成了浪漫主义的文学潮流，它很自然地同当地风起云涌的民族复兴运动结合在一起，为意大利人民赢得民族的独立和统一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欧洲其他国家先进文化运动的推动和鼓舞下，意大利文坛上涌现出不少富有艺术才华和爱国热忱的作家和诗人，从他

们身上，人们仿佛看到了福斯科洛塑造的形象高大的英雄奥尔蒂斯的影子。紧接着,孟佐尼的《1821 年 3 月》、白尔谢的《巴尔嘉难民》等感人肺腑的优秀作品相继问世，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豪感。在浪漫主义思潮的促进下，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如火如荼，很快席卷整个意大利半岛，涌现出像马志尼那样为意大利的自由而奋斗终生的英勇战士，以及意大利国歌作者、热那亚爱国诗人马梅利那样为国捐躯的英雄。即使在作曲家贝里尼（Vincenzo Bellini）和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音乐作品中，也跳跃着爱国主义的旋律。

应该说，浪漫主义文学同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浪漫主义归根结蒂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因为资产阶级在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渴望有统一的国家机构为它的利益服务，而浪漫主义思潮正是资产阶级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工具。白尔谢的作品积极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意识，比如他在《格利索斯托莫致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一封信》中，首先肯定了人人都有欣赏诗歌的自然天赋，但他却把假内行、矫揉造作的庸人及社会下层的平民排斥在文学的大门之外。在当时的意大利，文盲现象仍十分严重，文学尚未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而浪漫主义文学却对此不屑一顾，这正是它的局限性及导致它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浪漫主义文学反映了意大利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为意大利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但是，资产阶级只是把新文学视作宣传自己思想意识和行动纲领的舆论工具，它一开始并未估计到无产阶级可能会对自己构成任何威胁。资产阶级之所以积极支持富有民间色彩的新文学，是为了让社会中下层广大人民欣然接受它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际上，社会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资产阶级原先的估计：其一，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初战告捷，传统的社会结构出现了难以弥缝的罅隙；其二，昔日的阶级关

系已被破坏，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尚未确立，他们已不再是自命清高的绅士、宫廷诗人和教会的御用文人，但也尚未成为像记者和教师那样的专职知识分子，他们正在十分艰难地寻觅着悦意的归宿；其三，在一个金钱高于一切的阶级社会中，正在谋求立足之地的知识分子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资产阶级出于其阶级本性，一旦大权在手就幡然改图，文学艺术家们则因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得不到掌握政治、经济实权的资产阶级的尊重，开始对新的制度由不满逐渐发展到敌对，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转变成为反叛者、唯美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在浪漫主义文学期间，不少文学艺术家游离于现实社会之外，试图以栖身美丽的梦幻来表明自己狷介的心迹；另有一部分伦巴第知识分子则反对后期浪漫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崇尚不拘形式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同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交流，以跟上社会工业化前进的步伐。

第三节　杰出的浪漫主义文学家孟佐尼

一、生平

孟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是19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领袖。他的小说《约婚夫妇》在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对意大利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被认为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部杰作。

孟佐尼出生在米兰的一个贵族世家，他的外祖父是当地一位遐迩闻名的文学家和经济学家。他自幼在宗教修会学校读书，耳濡目染地受到启蒙思想，尤其是法国启蒙文学泰斗伏尔泰的影响；成年后，他断然与贵族阶层决裂，并且放弃了伯爵的爵位。他的早期作品带有古典主义的痕迹，他的长诗《自由的胜利》(Il trionfo della libertà，1801)热情讴歌法国革命，猛力抨击天主教迷信思想，鲜明地表现出他的爱国热忱及捍卫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决

心。1805 年他的继父英勃纳迪病故后，他偕同母亲一起侨居巴黎,其间写有诗篇悼念英勃纳迪。在这首祭颂诗里,诗人虚构了他同死者之间的一段对白，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强烈不满，在写作风格上同古典主义作品明显不一。在旅居法国的 5 年中,他同法国文化界人士接触颇为频繁,受到了欧洲浪漫主义新文化的熏陶，从而在同欧洲文化建立联系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 1808 年,他与侨居米兰的一个笃信天主教的瑞士籍女子勃朗苔结为伉俪，她对天主教虔诚的信仰促使他改变了原先的宗教思想，潜移默化地向天主教步步靠拢，并最后导致了他皈依天主教的行动。回意大利之后,他定居米兰。其间,由于家中屡遭不幸,他感到孤独失意,性情也变得越发乖戾和缄默∶1833 年他的妻子勃朗苔去世;1841 年母亲亡故;1861 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又过早地离开人世 不久,他的 6 个孩子先后夭殇，真是厄运缠身，祸不单行。1861 年意大利统一之后,孟佐尼被任命为参议员,翌年担任‘ 统一意大利语委员会 '主席 罗马光复后,他又荣获‘ 首都名誉市民 '之称。1873 年 5 月 22 日，这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诗人因患中风在米兰去世，在意大利文学发展史和历史前进的道路上留下了他永不泯灭的足迹。为此,他受到了国葬的待遇。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意大利著名作曲家威尔第专门写了《安魂曲》悼念他。

他的宗教思想‘ 突变 '是他在宗教信仰问题上多年思想剧烈斗争的必然结果，为我们今天深刻领悟他的作品隽永的含意提供了一把珍贵的钥匙。否则,我们就无法潜入他作品的纵深处,探索他创作的灵感和动机。他写的 5 首宗教诗没有太多的宗教说教，立意新颖,想象丰富,亲切感人,着意描写宗教是人类崇高理想的象征,是社会和道德的工具,它能给人带来正义、和平。正如 19 世纪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德 ·桑克蒂斯所说，孟佐尼艺海沉浮的一生以及他体裁各异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 受基督教思想洗礼过

的时代精神”,即谴责压迫者,讴歌受压迫者,颂扬自由、平等、博爱。正是启蒙思想同宗教信仰的结合，促使孟佐尼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积极宣扬“基督面前人人平等”的福音，激励他拒绝任何形式的迷信思想，直言不讳地暴露教会的腐败，把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不幸命运以及他们对未来所寄予的殷切希望作为写作的题材。

1812 至 1827 年是孟佐尼创作生涯中的鼎盛时期。在这 15 年中，他以隽永的笔触和满腔的热忱，写了纪念宗教节日的组诗《圣歌》(Inni sacri):《复活》(La Resurrezione)、《玛丽亚的名字》(Il nome di Maria)、《耶稣受难》(La passione)、《圣诞节》(Il Natale);浪漫主义悲剧:《卡马诺拉伯爵》(Il Conte di Carmagnola)、《阿达尔齐》(Adelchi);颂扬爱国精神的政治抒情诗:《五月五日》(Il Cinque Maggio)、《1821 年 3 月》(Marzo 1821)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I Promessi Sposi),以及理论著作《论浪漫主义》(Lettera sul Romanticismo)和其他文章、书信若干。他运用手中的笔，在意大利人民心中点燃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希望之火，表达了对进步文学刊物《调解人》的热情支持，宣传了浪漫主义流派的思想观点。比如 诗人在颂诗《1821 年 3 月》中，呼吁意大利实现统一，热情讴歌了在烧炭党发动的伦巴第起义中为意大利的独立、自由而光荣捐躯的战士。尽管这首诗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认为人民的自由必须由神律来保护，但它后来在 1848 年成了鼓舞米兰起义者的战歌。《五月五日》是 1821 年拿破仑逝世时他写的一首抒情诗，歌德认为该诗是纪念这一事件的许多作品中最杰出的一篇，并亲自将它译成德文。1827 年之后，孟佐尼积劳成疾，加上旧病复发,从此一蹶不振,性格也随之变得越发缄默、执拗,他手中的笔虽没有停歇，但他的作品已失去昔日的锐气和风采。

孟佐尼在他的诗篇中，鞭挞用权势强制别人服从自己的压迫者，鄙夷软弱无能的统治阶层，渴望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对广大受压迫的民众寄予深切的同情，并为他们的历史贡献得不到应有的

肯定和重视表示痛惜和不平。他认为：诗人的首要任务是运用手中的笔积极反映周围的事和物，杜撰史实或在创作中任凭想象驰骋都是不足取的；诗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仅能潜入作为历史主人公的下层平民的内心世界，洞察他们感情上的微妙变化，而且也能暴露他们的痛楚和缺点，从而重新替他们编织希冀和幻想之网。他批评历史学家对社会下层平民的存在置若罔闻，不予理会；他主张文艺作品应该注重写实，努力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他指出，艺术应以真实为题材，写作风格力求新颖、生动，内容务必给人以有益的启迪。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孟佐尼第一个提出文学作品应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疾苦，他的这一观点明显具有浪漫主义的思想风采。但是在政治方面，孟佐尼采取中庸的立场，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改革要求相去无几。

二、悲剧作品

1816—1822 年间，孟佐尼在莎士比亚的影响下，以伦巴第地区的历史事件为素材，采用借古喻今的创作方法写了两部历史悲剧。

《卡马诺拉伯爵》是一部历史悲剧,取材于 15 世纪上半叶米兰与威尼斯的交战史，刻画了卡马诺拉伯爵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卡马诺拉伯爵原名弗朗西斯科 · 布索尼，原先只是比埃蒙特地区的一个普通的牧人,后因他骁勇善战,屡建奇功而一跃成为米兰大公的乘龙快婿，并荣获卡马诺拉伯爵的称号。伯爵因精明强干而声望日隆,以致引起米兰大公的嫉妒和猜疑,后被迫离开卡马诺拉,转而为威尼斯共和国效劳,并战胜了米兰大公 威尼斯统治者怀疑他是奸细,将他投入监狱并斩首处死,昔日的亲朋好友全部远离他而去,连他的挚友也没有勇气公开为他蒙受的耻辱申辩,惟独他的妻儿始终为他四处呼号伸冤。卡马诺拉伯爵坎坷不平的一生和凄惨的结局博得了作者莫大的同情，他为之感到忿忿不平。

他仔细地查阅了有关的史料,断定卡马诺拉伯爵是无辜被杀,这激起了他内心的创作热情。在这部历史悲剧中，孟佐尼把伯爵描摹成一个智勇双全、刚正不阿、豁达大度的将帅。在创作该部历史悲剧的过程中，作者对悲剧的写作技巧作了创新，除了在幕间写有“插曲”之外,还对剧中的某些情节和人物附上评论。比如:他在描绘战斗激烈场面的同时,悲叹内战的残忍,呼吁人们在基督精神下和睦相处,携手共进。但是他写的按语比较拘谨,语言也欠直率明朗。尽管如此,孟佐尼为《卡马诺拉伯爵》所写的序言后来成了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一纸宣言。

相比之下,孟佐尼于 1820—1822 年间创作的《阿达尔齐》,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历史悲剧。它主要描述公元 774 年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大帝废黜伦巴德王国国王泰西特留斯的一段历史。作者古为今用,有意识地在剧中揉进一些引人入胜的情节,表达了他对被奴役的祖国、民族的命运和未来的关切。伦巴德王国公主埃曼嘉达遭受查理大帝的凌辱和抛弃后，悒郁成疾，惨死在一座修道院里;王子阿达尔齐遵父命被迫上战场,后被法兰克军队击败,死于万洛纳；渴望自由的意大利人民翘首企盼着伦巴第人溃败的捷报,但没料想却引狼入室，使自己置于两个主子的双重压迫之下。作者在几处作了一些艺术上的加工，但悲剧的主要情节同史实基本相符。他通过伦巴第人、法兰克人和意大利人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的命运,抒发自己内心的忧郁和惆怅,影射当时意大利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斗争屡遭失败的惨痛教训。《阿达尔齐》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时期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戏剧作品，反映了作者当时悲观失望、颓唐衰飒的内心世界:虽然他皈依了天主教,但是宗教信仰并未给他带来精神上的丝毫慰藉,面对不合理的社会,他深感痛心悲怆；尽管手持真理的人能够在天国重新获得失去的荣誉和欢乐,但天国可望而不可即,离尘世毕竟是如此的遥远;瀛寰纵然广袤无比,但是有权势者到头来总是获胜,所谓的权力只不过是暴

力的一个代名词而已。在历史悲剧《阿达尔齐》中,孟佐尼花费了不少笔墨细腻地描摹了伦巴德王国公主埃曼嘉达和王子阿达尔齐的生动形象，文字感人至深。他笔下的埃曼嘉达可谓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中最典型、最生动的女子形象:她被查理大帝遗弃后悲痛欲绝，往日的欢乐也成为痛苦的回忆；在天国获得了光明、清净和快乐之后，她才得以把蒙受的耻辱融化在对天主的一片赤诚之爱中。作者以超逸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刻画了她感情上的变化,并通过她的不幸遭遇向人们启迪:痛苦是永恒的,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痛苦将始终伴随着他们。悲剧的主人公阿达尔齐是一个超时代的英雄,他具备忠诚、宽仁、豁达、虔诚等美德;他明知其父王卷入的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但他既无权力,又无能力阻止战事的发展，直至法兰克人的铁蹄在意大利美丽的国土上到处践踏;临终前的他感到万念俱灰,寓意深长地揭明了人世间的不公正:邪恶、凶残的人总是获胜,而笃信基督福音的人却永远逃脱不了死亡的厄运。孟佐尼塑造了体现浪漫主义理想的典型形象阿达尔齐,并通过他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复仇过程中的犹豫彷徨及其他的悲惨结局，表达了自己要求民族统一的强烈愿望。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阿达尔齐同莎翁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颇为相似。

三、《约婚夫妇》

《约婚夫妇》是孟佐尼的一部代表作,也是意大利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平民为主人公的长篇历史小说。小说创作迄今已有 170 余年,但它依旧以其跌宕起伏的情节,丝丝入扣的描绘和宏大的生活图景深深吸引着广大读者，在意大利至今仍被列为中学生必读的一部文学著作。

《约婚夫妇》以年轻的丝织工兰佐和农家姑娘鲁齐娅悲欢离合的婚姻风波为主要线索,通过描绘 17 世纪 30 年代伦巴第地区人

民在异族统治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的悲惨遭遇，影射 19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人民反对奥地利侵略和渴望民族统一、独立的迫切心情。故事发生在 1628—1630 年间西班牙人统治下的伦巴第地区科摩湖畔一个小村子里。质朴敦厚的纺丝工兰佐同纯洁善良的农家女鲁齐娅是一对约婚夫妇,两人心心相印,恩爱异常。当地恶贯满盈的乡绅堂·罗德里戈对鲁齐娅的美貌垂涎三尺，他串通司铎安保迪,企图霸占这位美丽的少女,为此千方百计地阻挠兰佐和鲁齐娅结为夫妇。堂·罗德里戈唆使雇佣来的爪牙恐吓胆小怕事的安保迪,不许他为这对年轻人主持结婚仪式。为满足私欲,堂·罗德里戈密谋策划劫持鲁齐娅，但最终未能得逞。由于这个无法无天的恶霸地主得到当地法官和西班牙当权者的庇护，兰佐和鲁齐娅有怨无处申,最后只得屈服于权势的淫威被迫远离家乡,各奔东西。兰佐在米兰不知不觉地被卷入抢面包的民众暴动，出于无奈只得再度出走；鲁齐娅则在仁慈的神父克利斯托弗洛的关怀和保护下,终于入修道院,得以暂且忘却心中的悲愤,在对天主一片虔诚的热爱中静心度日。不久,瘟疫袭击米兰,全城十室九空,尸横遍野,作恶多端的堂·罗德里戈一命呜呼，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拨开乌云见青天,有情人终成眷属,兰佐和鲁齐娅在饱尝了人间辛酸后结为夫妇。

孟佐尼在《约婚夫妇》中把兰佐和鲁齐娅等社会下层平民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让他们和人民大众一起,共同忍受着异族侵略者及其卵翼下的封建贵族带给他们的痛苦和磨难,饱尝着战争、饥饿和瘟疫的无情摧残，作者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的同情。作者笔下的劳苦大众不再是一群缺乏个性、鄙陋无知、逆来顺受的平庸之辈，他们在小说中成了具有反叛精神的英雄人物，他们勤劳淳朴、忠厚善良的形象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作者以雄遒的文笔，形象地描绘了充满戏剧性的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浩繁画面,满腔愤怒地鞭挞了荒淫无耻的贵族、阿谀奉承的法官、专横跋

扈的乡绅、悠闲懒散的天主教僧侣以及凶恶残暴的异族统治者。在小说中,作者着意刻画人物宗教感情上的细微变化,把宗教信仰描写成劳苦大众精神上的慰藉、鉴别善恶的准绳和赢得理想生活的希望之光,它犹如一根无形的线,将整部巨著串连在一起。在作者宗教思想的左右下,小说中的神父克利斯托弗洛和红衣主教腓特列等社会上层人物伸张正义,在感情上同受压迫欺凌的平民百姓站在一起;兰佐、鲁齐娅、手工艺匠、农民和船夫等' 下贱 '百姓则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试图以自己洁白无邪的心灵同邪恶势力抗衡,而滥用权势、悖逆而行的坏人,纵然他们狡狯、残忍,最后还是逃不脱神灵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完美地勾勒小说中许多不同类型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绘乡绅豪华的私邸、富人丰盛的午宴、穷人粗粝的晚餐、社会上流人士的社交活动、神父感人肺腑的箴劝、尘土飞扬的巷陌、可怕的瘟疫、穷人的暴动等情节。在孟佐尼之前,还没有一个意大利作家能够运用简明朴素的语言描摹如此浩繁的历史画卷;也没有任何人具有这样的勇气和胆略,在文艺作品中对劳苦百姓表示如此深切的爱;更没有人能像他那样直言不讳地鞭挞和嘲弄身居高位的权贵老爷。尽管《约婚夫妇》渲染宗教迷信思想,并表现出一定的资产阶级局限性,但是它作为意大利历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现代小说,在 19 世纪民族复兴运动期间,对意大利民族的觉醒仍然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已同作者的名字一起载入了史册。

就创作风格言,孟佐尼的《约婚夫妇》同遐迩闻名的苏格兰小说家、诗人瓦尔特 · 司格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如出一辙。司格特是历史小说体裁的创始者,擅长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小说主人公的命运融汇在一起,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特征。司格特的优秀小说《罗布 · 罗伊》、《清教徒》、《艾凡赫》、《密得洛西恩的监狱》、《昆廷 · 窦沃德》等在 19 世纪初叶的欧洲十分流行,这无疑对孟佐尼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酝酿创作《约婚夫妇》的过程中,

孟佐尼认真、仔细地研究了故事发生前后的历史背景,阅读了大量的有关史料和回忆录。这不仅开阔了他的创作视野，而且为他提供了丰富翔实的写作素材。作者打破陈旧的传统历史观念,向‘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一崭新的观念勇敢地跨前了一大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婚夫妇》是一部讴歌人民的英雄史诗。

孟佐尼于 1821 年 4 月着手创作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后因撰著悲剧《阿达尔齐》而辍笔,直至 1827 年小说方才问世。小说的原名为《费尔莫与鲁齐娅》,后经作者几番修改和润色,删除了一些过于浪漫抒情的章节。至于小说的语言,按他本人的话来说,是经过佛罗伦萨阿诺河洗涤的。我们今天阅读的《约婚夫妇》,是 1840—1842年间付印的最后一个版本。

尽管《约婚夫妇》反映的是 19 世纪初叶伦巴第地区的历史，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作者巧妙地揉进了自己的人生观和政治理想,给读者以有益的启迪。倘若我们留神阅读的话,不难在字里行间寻觅到作者的影子，我们的情绪也将随着作者手中的神笔起伏变化 忧伤与欢乐,愤慨与同情,沉思与遐想,时而穿插交错,时而合成一体。孟佐尼是一位天才的语言大师，他在小说中成功地描摹出许多形象各异的人物,栩栩如生,真切感人,思想感情的抒发毫无拘束呆板之感。这里，我们不妨仅举一例加以说明：小说中，兰佐和鲁齐娅同家乡的群山告别时的一段淋漓尽致的描写，语言简洁清晰、优美感人,充满着浓厚的抒情味,突出了这一对青年男女对家乡山水无限的眷恋及与亲人依依惜别时的惆怅和悲痛：

……兰佐登上小路上的一处高地极目远望，米兰大教堂巍峨的身躯孤零零地矗立在一大片平地上，它似乎不在米兰城里，好像坐落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他驻足良久，眺望着远方的景色，心中的忧愁和烦恼顿时烟消云散，因为从孩提时代起，他就听人说过，米兰大教堂是世

上的第八奇迹。过了一会儿，他回转身去，在地平线上连绵起伏的山峰中，一眼就认出了家乡的雷赛科尼山。蓦然间，他感到周身的血液全都凝固了。他纹丝不动地伫立在那里，满心忧伤地望着前方，然后愁容满面地回过身,继续往前走去……

显然，这一段浪漫主义韵味浓重的描写与这一对年轻恋人的精神境界是不太合拍的,它实际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感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

孟佐尼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家，他始终不渝地为创建意大利现代叙事体文学而不懈地努力，宗教信仰与爱国热忱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有机的统一。《约婚夫妇》标志着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它不愧是意大利文学的一部扛鼎之作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

四、对统一意大利民族语言的贡献

孟佐尼对意大利历史上悬而未决的民族语言问题始终十分关注,并在他一生的最后 30 年中为建立民族语言呕心沥血，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对于语言问题，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认为：语言是一个由词汇和语法规则组成的复杂整体；每个民族都应有它统一的语言,而统一的民族语言不应该是各地方言的大杂烩,它必须是以某一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综合体；作为民族语言基础的方言不能按少数人的意愿进行选择，应该任凭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并逐渐获得人们普遍的认同 对于意大利来说,民族语言的支柱无疑是佛罗伦萨语，因此推广和普及这种方言是作家和诗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孟佐尼把语言视作文学创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并为寻求一种能为全体意大利人民所接受的统一的民族语言作出过

不懈的努力。他的悲剧和抒情诗，在某种程度上是他进行语言改革的大胆尝试，而他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则在建立新颖文学语言方面有了重大的突破，从而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扫除了语言上的障碍。从那时起，孟佐尼开始为他的论著《论意大利语》(Sulla lingua italiana）收集资料和素材，并于 1845 年推出这部书。全书共分 3 卷 第 1 卷主要论述语言的性质；第 2 卷解释了意大利语的真正含义,并为其下了定义 第 3 卷分析了意大利民族统一语言的性质和特征。孟佐尼为创建生动、亲切并为广大民众所接受的富有浪漫主义和民间文学色彩的语言不断探索，矢志不渝，使数百年来文学语言与日常用语之间的隔阂渐臻消除。他认为：任何语言都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使文学语言也不例外；民族统一语言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容不得半点姑息和迁就，也不能以个人的意志和偏爱作出抉择，因为它在作家与读者、讲话人与听者之间起着沟通思想的桥梁作用。孟佐尼直率、明朗的观点博得了不少人的赞许，他用充满生气的佛罗伦萨语和他手中的那支神笔，悄然开启了意大利人民心灵智慧的窗户，对意大利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第四节　莱奥帕尔迪的田园抒情诗

一、生平

贾科莫 · 莱奥帕尔迪(Giacomo Leopardi，1798—1837）的田园抒情诗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另一座丰碑，也是继彼特拉克之后意大利文坛最富有艺术魅力的诗作。莱奥帕尔迪出生在意大利中部教皇国版图内的雷卡纳迪城，那是一个几乎被世人所遗忘的角落，一个启蒙思想和新文化潮流的清风吹拂不到的地方。由于生活环境偏僻、闭塞，自幼多愁善感的诗人从懂事起就深感人生的渺茫和生活的孤独，以致他后来对人生持全盘否定的消极态度。

他的抒情诗正是他伤感主义和灰色人生观的生动写照。

诗人出生于贵族之家，他父亲虽有一些家产，但因不善经营，家境每况愈下；他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生性执拗，家教甚严。10 岁那年，他因不满两位家庭教师的教学方法，开始独自一人贪婪地阅读父亲的藏书，这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锲而不舍，像着了魔似地坚持了 7 年之久孜孜不倦的学习，以致他原先多病的身体变得更加羸弱。不久，他成了当地遐迩闻名的一个神童：他钻研希伯来语，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在语言学方面的独特见解甚至使赫赫有名的德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尼布尔都惊叹不已，故人们一致称他为博学者。莱奥帕尔迪才思敏捷,著述甚丰,仅青年时期的作品就有 240 多篇,其中包括诗歌、悲剧、随笔和译著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尽管它们在文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但对他哲学思想和写作风格的形成无疑有着很大的影响。在这些艺术上尚未完全成熟的习作中，诗人热情颂扬具有启蒙思想的当权者，号召建立统一的意大利，抒发宗教思想以及他对功名的向往。

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诗人主要以 17、18 世纪意大利传统写作风格为楷模，其中，阿卡狄亚诗派和法国文学对他的影响较大。自 1815 年起，诗人开始把全部精力放在诗歌创作上，并把这一突变称作“ 美学上的皈依 ”。他认真研究各种诗体，热情翻译古希腊诗人荷马、赫西俄德以及拉丁诗人维吉尔的诗作，仔细揣摩蒙蒂的新古典主义诗篇，同时开始习诗。诗人同福斯科洛等浪漫主义诗人交往甚密，相比之下，他自叹命蹇；他欲走出雷卡纳迪狭小的生活圈子，到广袤的天地里去呼吸自由、清新的空气，去寻觅人生的真谛,他把这称作“ 哲学上的皈依 ”。

1819 年之后，他因患眼疾被迫中辍学习，为此，他深陷在可怕的绝望之中，不可名状的烦恼摧残着他的心灵，折磨着他的躯体。1822年，诗人终于获许去罗马投亲，他犹如挣脱樊笼的小鸟，对罗

马寄予无限美好的希望，满心以为那里就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世界。但是,到了罗马以后,他发现那里的一切同雷卡纳迪没有多大的区别,惟独塔索的墓穴激起他无限的遐想;尤其使诗人感到痛心的是,面对毫无生气的社会,罗马人竟置若罔闻,表现出盲目的乐观。翌年 4 月,诗人失望地返回家乡。迫于生活,他同一个出版商签订合同，负责编辑古罗马雄辩家、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的著作，同时为彼特拉克的抒情诗撰写评论。1828 年,诗人在比萨找到了较为满意的生活环境,创作了《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Il Risorgimento ）和《致西尔维娅》(A Silvia ）等优秀抒情诗篇。

莱奥帕尔迪一生为寻找有固定报酬的工作环境颠沛流离，但始终未能如愿以偿,即使后来波恩和柏林聘请他前去讲学,也由于健康的原因而没有成行。他穷困潦倒,迫不得已回到雷卡纳迪,在几乎疯癫的绝望心情中离群索居,同家人和亲朋断绝往来,一心想逃出‘ 活人的坟场 ”。1830 年 2 月,佛罗伦萨‘ 秕糠学会 ”决定将价值一千块金币的文学奖授予都灵历史学家保尔塔，莱奥帕尔迪闻讯后颇感失落,精神上又一次遭受严重的打击。嗣后,诗人先后在佛罗伦萨、罗马和那不勒斯等地居住。在那不勒斯,诗人居住在维苏威火山脚下的一所小房子里,于 1836 年写了另一著名诗篇《金雀花》（La ginestra）。当时，诗人已病人膏肓，该诗作的最后一章《月儿西沉》由他躺在病榻上口述完成。1837 年,那不勒斯霍乱蔓延,莱奥帕尔迪身患哮喘和水肿病,于 6 月 14 日凄凉地离开人世。1938 年，诗人的遗体被移至曼杰利纳，安葬在拉丁诗人维吉尔墓穴的旁边。

二、莱奥帕尔迪与浪漫主义文学

19 世纪初叶浪漫主义文学的崛起引起了文人的激烈争论，颇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调解人》应运而生。在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下，莱奥帕尔迪的浪漫主义倾向日趋明朗，尤其是他撰写的两篇随笔

评论《致史达尔夫人的一封公开信》(Lettera ai compilatori della Biblioteca italiana)和《一个意大利人对浪漫主义诗歌的看法》(Discorso di un italiano sopra la poesia romantica),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与其他浪漫主义文人一样，莱奥帕尔迪反对把古代神话视作诗歌的唯一创作源泉,并摒弃拘守绳墨、因袭陈规的仿古派写作风格。但他提出,这绝非是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举,因为早在两个世纪之前，人们就围绕着文风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辩。尽管他认为悲哀婉约的诗歌格调是连接诗人同浪漫主义之间的一座桥梁，但他指出,这种写作风格并不是由浪漫主义诗人首创的,因为早在荷马、维吉尔和彼特拉克的诗歌中就蕴含着浪漫主义的韵致,浪漫主义诗人只是对此加以渲染而已。他把诗歌看成表达感觉、幻想和本能的一种自然现象,是同理性没有什么关联的东西,因为诗歌是原始社会,而不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认为古典诗,比如荷马气势澎湃的诗篇,都创作于原始社会,故富有浓厚的自然美现代诗则是诗人遐想的结果,而人为的东西显然不可能具有纯朴、自然的特征。诚然,他同浪漫主义之间的分歧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从根本上来说，他的作品亦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

三、作品中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

1819 年诗人不幸患眼疾，视力随之衰退，连阅读书卷也颇感困难。他成天陷于沉思之中,其哲学思想亦益臻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从充满想象的青年时代(即原始阶段)过渡到现代阶段,因为沉思使他失去了遐想的能力。他认为,在人生道路上闪现的任何希望之光都是一瞬即逝的虚假的东西，只有痛苦才是永恒的,它始终折磨着人的心灵。在他看来,生活本来就是一出毫无意义的戏剧。

在诗人早期哲学思想形成的过程中，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自然—理性对抗论无疑起着较大的影响。诗人认为，自然给人带

来了幸福的生活,但理性(即社会、习俗和文明)却毁坏了自然创造的美,使人们陷于痛苦之中;自然是伟大的,而理性是渺小的,它是自然的敌人。由此，他得出结论：科学夺去了人们幻想的乐趣，因为它揭示的只是干枯、贫乏的事实；尽管幻想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但是人们依旧将它看做生活中极大的欢乐；原始社会的人要比现代人来得快乐和幸福，因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古代世界赋予了人们极其丰富的想像力。与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不同，莱奥帕尔迪将现代社会视作颓唐、停滞的历史时期，但从根本上来说，他的哲学思想同浪漫主义文学的基本观点和立场还是一致的。诗人在一生中始终是启蒙思想的热情讴歌者，他对启蒙主义者为根除人类社会弊病所作出的努力予以高度的评价，并十分赞赏举世瞩目的法国革命风暴，因为它在人们的心中唤起了幻想和希望。但是，后期的法国革命使诗人大失所望，在他看来，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原先“野蛮的文明”。

综上所述，莱奥帕尔迪的早期哲学思想可归纳成以下两点：一、人无限向往幸福，自然赐予人生活的欢乐，但是罗马帝国衰亡后的文明史却破坏和践踏了人享受幸福的神圣权利；二、启蒙文化和法国革命为重建人类的文明史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波澜壮阔的法国革命风暴到头来以惨败而告终，整个世界又一次陷入麻木不仁的愚昧状态，人也随之失去了精神生活中的欢愉。

莱奥帕尔迪把自己个人生活中遇到的不幸看成是他同时代人的共同灾难，是由于历史进程偏离航向所致。在“历史悲观主义”的影响下,诗人在 1818—1823 年间写有不少题材广泛的抒情诗，其中既有留恋往昔的痛惜，也有厌倦现实的伤感。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他模仿彼特拉克抒情诗的风格，诗句悲切哀愁，委婉动人。在这一时期中,《年轻的布鲁图》（Bruto minore)和《萨福的最后一支歌》（Ultimo canto di Saffo ）可谓是诗人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另外,在 1819—1821 年间,诗人还写有《广大无比》（L’infinito)、《 节

日的傍晚》(La sera del dì di festa)、《致月亮》(Alla luna)、《梦幻》(Il sogno)和《孤独的人生》(la vita solitaria)等田园诗,后于 1826 年收入《田园诗集》出版。在《广大无比》中,一望无垠的田野万籁俱寂，只有树叶在和风的吹拂下发出轻轻的沙沙声，诗人抚今追昔,回首那"早已死去的季节";《节日的夜晚》描写人们在节日过去后心中的感叹，耳边仿佛又响起古人的遗训，眼前似乎又呈现出古罗马帝国的盛景。作者在这些田园诗中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他与世无争，孑然一身，惟独自然赐予他一丝怜悯，诗句中充满了忧伤的情调。

诗人在后期写的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包括生活轶事、文学评论、语言探讨、诗稿等),集中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诗人谢世后，这些杂乱的文稿一直由他的一位生前好友保存着，直至 1898 年方陆续出版问世。1823 年诗人从罗马返回家乡后，一面修改文稿，一面着手撰著充满幽默和幻想的哲学散文集《对话》(Dialoghi)。《对话》于 1827 年 6 月在米兰出版，共收入 25 篇散文,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集中体现了他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早在 1819 年，诗人就开始构思《对话》的内容，并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他的一位佛罗伦萨挚友，表示要为创建意大利哲学语言而努力，以达到启迪读者之目的。

在莱奥帕尔迪后期的著作中,从"历史悲观主义"向"宇宙悲观主义"过渡的痕迹显而易见。为了更好地从感性上理解莱奥帕尔迪人生观的变化，我们不妨以《对话》中的两例加以说明。在第一篇对话中，作者描写了古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海格立斯的形象：他从双肩载天柱之神那里回来，发现地球犹如一只干瘪的苹果，世界仿佛也没了昔日的生气，所有的一切都处于停滞的状态之中。作者巧妙地采用隐喻的艺术手法，借海格立斯之口，重申自己早就提出过的"自罗马帝国衰亡后世界开始没落"的论点。在另一篇题为《一个冰岛人与大自然的对话》(Dialogo della Natura e di

un islandese ）中，诗人塑造了一个饱览人间沧桑的冰岛人的形象：他在非洲大陆与大自然邂逅，就人类无止境的痛苦、无穷的灾难及充满辛酸泪水的命运，向大自然求索答案；大自然安详地告诉他，她在创建世界的时候，并未思及人的欢乐或痛苦；冰岛人接着大声询问道：“有谁会喜欢这种由灾难和死亡组成的世俗生活？人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裨益？”大自然默默无言，不予回答；尔后，冰岛人原因不明地死去，他也许被狮子吞噬，也许被风沙掩埋。作者在第二篇充满哲理的对话中流露出来的“宇宙悲观论”，是他后期作品的主要精神支柱。早年，他曾认为大自然为人类创造了幸福，而历史则因偏离航向而无情地剥夺了人类世俗生活的欢乐。到了暮年，他悲观地得出结论：人理想中的幸福境界是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他将永远是一个不幸的人儿；大自然是人的后母，泪水和死亡注定将伴随着他的一生；人维护自己尊严的唯一方法是清醒地正视现实，默认自己不幸的命运，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生存下去的勇气。每当莱奥帕尔迪想起人们因幻想破灭而悲痛欲绝的时候，每当看到年轻人对未来寄予的殷切希望变成泡影的时候，他总感到有一种兄弟般的哀怜之情在拨动着他的心弦，促使他默默地为自己和他人的命运悲泣。反之，对于那些缺乏勇气正视现实和沉湎于梦幻中的人，他总是设法以嘲讽、诙谐的口吻启迪他们，帮助他们撕下蒙在脸上的五色斑斓的面纱，让他们看清冷酷的现实。

孟佐尼的长篇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出版后不久，莱奥帕尔迪的田园诗集也相继问世，它无疑是继彼特拉克之后意大利诗苑中的又一朵绚丽的奇葩，标志着意大利浪漫主义诗歌的顶巅。这些闪烁着璀璨艺术光辉的诗篇写于 1828—1830 年间。当时，由于经济拮据，疾病缠身，诗人不得已回到犹如“活人坟场”的家乡。他遗世独立，离群索居，无限感慨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感人肺腑的诗歌。这些田园诗的主旋律不外乎是哀叹命蹇，与前不同的是，诗人擦干了泪水，勇敢地面对现实。他在《一个亚洲流浪人的夜歌》（Il

canto notturno di un pastore errante dell'Asia ）中写道：

空中的月亮,你在作甚？
告诉我，你为何默默无声？
一缕晚烟
正向上袅袅升腾，
快把你的光亮
撒向弥漫沙尘；
你将在荒漠深处
安息栖身。
难道你还不甘心
沿着永恒的小路西沉？

同牧羊人枯燥无味的生活一样，月亮日复一日地往返在同一条小路上 牧羊人把月亮当作知心的女友,向她提出萦绕在心头的问题,希望得到满意的答复。诗人以隽永的笔触启迪人们 痛苦和灾难是永恒的，死亡则是人生唯一的归宿；在凄凉的人生道路上，人有时会下意识地回首童年时代欢乐的时光，有时会沉湎在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之中，那是因为他们尚未饱尝无情的现实带给他们的辛酸和痛苦。在莱奥帕尔迪的诗作中，现实生活中的痛楚每每与往昔的美好回忆交织在一起,这不仅渲染了诗歌的抒情色彩,而且在描写人物感情的细微变化方面较好地起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比如,他在著名诗篇《致西尔维娅》的开头,万般感慨地写道：

西尔维娅,你可曾记得
倥偬流逝的美好时光？
你那双含笑羞怯的眸子

闪烁着妩媚的光芒。
你欢乐、多思
跨入青春的门框。

静谧的小屋
毗邻的深巷，
你那永不止息的歌声
四处回荡。
你专 心致志
端坐在织布机旁；
脑际浮现未来朦胧的影子，
一团喜悦的红晕泛上脸庞。
五月飘溢馥郁的芳香，
生活充盈瑰丽的希望。

在早年，莱奥帕尔迪接受启蒙主义哲学和烧炭党人的思想影响，曾写过充满激情的颂歌《致意大利》（All'Italia） 和《但丁纪念碑》（Sopra il monumento di Dante） ，讴歌古代爱国志士的英雄业绩，缅怀意大利光荣伟大的过去，悲叹当时祖国的命运。然而，在抒情诗《致西尔维娅》中,我们能寻觅到的,只有对岁月蹉跎的嗟悔和对不幸命运的悲叹。在《致西尔维娅》的最后一节中，诗人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得到了更为集中的体现，其颓丧的情绪达到了顶峰：

瞬息即逝
我心中美好的憧憬，
命运之神遮住了
照亮我青春脚印的明星。

啊,希望的光亮
亦随死神同行，
充满泪水的希冀
你曾是我新生的知音！
难道这就是妩媚的青春？
这就是我俩多年共同追求的
理想与功名，欢乐与爱情？
难道这就是人类注定的命运？
可怜的梦幻，
你在胜利朦胧的曙光中
消失殆尽。
远处依稀可见
死神冰凉的双手
墓穴光秃的黑影。

莱奥帕尔迪为创新意大利传统的抒情诗，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他的诗作在语言方面富有通俗诗和宫廷诗的韵味，但诗句中几乎没有明朗、欢快的色彩或丰富的想象，凄切、优美的文辞和耐人寻味的诗意往往使读者陷入沉思，嗟悔流逝的往昔。在这些富有田园情调的抒情诗中，诗人一面追忆着他所热爱和留恋的往事，一面为倏忽即逝的年华嗟叹和悲泣。在西尔维娅那双含笑羞怯的眸子里，充满着对未来美丽的憧憬，但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青春的梦幻均成南柯一梦。从这层意思来说，莱奥帕尔迪的诗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反映了现今和往昔之间永远得不到解决的矛盾。

莱奥帕尔迪是一位才思敏捷的诗人，他对现实社会的一系列问题总是十分关心，这在他早年的诗歌以及致友人的书简中曾有过明显的流露。到了后期，处于桑榆暮景中的诗人更感世态炎凉和人情淡薄，渐渐对周围的人持怜悯和鄙夷的态度。在青年时代，

他曾追求过真诚的友情，但到了晚年，他形影相吊，心中无限惆怅。

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中，每当回首往事，他总是百感交集。1836 年,他奋笔写下了最后的抒情诗篇《金雀花》,诗句含意隽永,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人将飘溢着淡雅芳香但又不惹人注意的金雀花人格化：它无畏地翘首仰望着命运之神，既不无谓地同身旁顶天立地的维苏威火山抗衡，也不怯懦地默认自己的失败；它泰然自若，安详地等待着，直至火山口喷射出炽热的浓烟和奔流般的褐色火焰，这才垂下了它那洁白的花冠；直至临死前，它依然散发出怡人的清香，慰藉着一望无垠的荒野。在全诗的末尾，诗人用哀婉动人的诗句表达了对金雀花的赞美和爱怜：冷漠无情的维苏威火山顶端正冒着滚滚的黑烟,而‘卑微’的金雀花却含苞待放,用它那沁人心脾的芳菲抚慰着灼热的大地……此情此景，珠圆玉润地烘托出人类无上的尊严和人与人之间高尚的友爱之情。

除诗歌以外，莱奥帕尔迪还写有哲学散文《道德小品集》（Operette morali，1824）,共收入古典散文 28 篇,文笔简练、朴实,以论说或对话的形式，阐述作者的历史悲观主义的哲学观点，对话者几乎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为后人深刻领悟作者的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诠释。1817—1832 年间,莱奥帕尔迪还写了数量极其可观的随感和笔记，记载了诗人的哲学思想,论述了他对人类、民族、宇宙的看法,涉及的内容颇为广泛,后收入《杂记》（Zibaldone）一书,并于 1898 年他诞辰 100 周年时正式出版。对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来说，以上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莱奥帕尔迪文学作品和哲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第五节　其他浪漫主义作家

继拿破仑垮台和维也纳会议之后，意大利重新遭到奥地利的蹂躏,加之封建王朝和天主教会伺机卷土重来,再次夺得政权,复

辟的气焰甚嚣尘上。1831 年，马志尼创立资产阶级政党“青年意大利”,明确提出建立独立、自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口号。从此以后,争取民族统一和独立的斗争如火如荼,很快席卷整个意大利半岛,其中,1848—1849 年间巴勒莫、米兰、罗马、威尼斯等地先后爆发大规模的民众起义，奥地利侵略者的世俗封建统治处于风雨飘摇、行将崩溃的边缘。

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运动无疑对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坛上涌现出不少爱国主义作家和诗人,他们把时代精神、社会生活同文学创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努力在诗歌、历史剧、历史小说等不同体裁的作品中热情讴歌为赢得民族独立、国家统一而奋斗的爱国志士的英勇事迹,颂扬民族尊严,抒发人民渴望独立和自由的理想，以唤醒人民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著名米兰爱国诗人白尔谢在诗集《幻想》的序言中曾写道“:你们将会察觉到,我并不等量齐观诗歌艺术和唯美主义，我经常得放弃纯粹追求外形美的观点，以一个公民的义务取代诗人的职责。在这两者的冲突中,我常因难以取舍而感到苦恼。”意大利的浪漫主义作家,至少是第一代作家,勇敢地选择了第二条道路,即把公民的神圣义务毫不犹豫地放在艺术之上。诚然，浪漫主义文学也暴露了民族复兴运动时期一部分文人的弱点和不足：一部分作家受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较深,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回避社会矛盾,另一部分作家则悲观失望,甚至公开反对革命。

一、乔万尼 · 白尔谢(Giovanni Berchet,1783—1851)

白尔谢是意大利浪漫主义的杰出理论家和爱国诗人，1783 年出生在米兰一个商人之家,是烧炭党成员和《调解人》杂志创办人之一。1821 年,他因参加比埃蒙特起义受株连,不得已出走米兰，先后在英、法、德和比利时等国长期过着政治流亡生活，1847 年回国后参加著名的米兰武装暴动。起义失败后，他逃往都灵和托斯

卡纳地区,晚年生活在都灵,曾任撒丁王国议会议员,政治上持温和态度。

白尔谢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颇有影响的爱国诗人和浪漫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大部分诗作同当时各个时期的政治事件相联系,洋溢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节奏鲜明,悲壮有力。法国女作家史达尔夫人的一篇文章在意大利挑起了一场大辩论，而白尔谢的《格利索斯托莫致儿子的亦庄亦谐的一封信》（Lettera semiseria di Grisostomo al suo figliuolo　)则被誉为浪漫主义的一纸宣言。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诗歌必须积极反映现实和时代精神,成为‘活人的诗’和‘心灵的镜子”;诗歌必须摒弃一味崇尚、沿袭古人的恶习,它应该面向人民,以唤醒广大民众的觉悟为创作的原则,直接抒发他们的思想感情。白尔谢所说的‘人民’实际上是指资产阶级，所以他的观点表达了在民族复兴运动中登上政治舞台的资产阶级的心声。他的诗篇抒发炽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的无限思念，在悲叹处于奥地利统治者蹂躏下的意大利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时，以美好的感情回忆中世纪伦巴第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历史，借此激励人们的爱国热忱和奋起斗争的勇气。就艺术而言,白尔谢努力将文学语言与日常口语糅合在一起,富有明显的民歌风采和现实主义的特征,感情奔放,铿锵雄健。但是在他的诗作中,古代与现今、传统与现实,每每穿插交错,诗句豪迈有力,寓意古奥晦涩。

白尔谢在 1821 年创作的长诗《巴尔嘉的逃亡者》（I profughi di Parga），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遐迩闻名的一首英雄史诗。作者通过巴尔干半岛巴尔嘉共和国一个流亡者的叙述，以高昂的激情歌颂巴尔嘉人民在抗击土耳其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大无畏精神，揭露英国政府背叛巴尔嘉人民利益的卑劣行径。在长诗中，巴尔嘉人民在被迫离乡背井逃往爱奥尼亚海上一个希腊岛屿之前,在坟场上焚烧了死者的遗骨,表达了他们宁死不屈的

决心。诗人借古喻今的艺术手法赋予了长诗强烈的时代气息，鼓舞了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意大利人民的斗志。

二、尼古洛 ·托马泽奥(Niccolò Tommaseo,1802—1874)

托马泽奥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另一位出类拔萃的作家，19世纪初出生在现南斯拉夫海港城市塞培尼科。早年他在塞培尼科和帕多瓦学习，后开始为报刊撰写文章。1820 年,他前往米兰,同孟佐尼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早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27年之后，他迁居佛罗伦萨，其间因被指控撰文反对奥地利政府，被迫迁居巴黎。1839 年回国后，他参加过保卫威尼斯的斗争，并因而被捕入狱；威尼斯共和国崩溃后，他流亡希腊。1854 年他双目失明，但仍坚持写作，后迁居都灵,1874 年殁于佛罗伦萨。

托马泽奥是一位多产作家，在文学园地里辛勤地耕耘了一辈子，著述了许多不同体裁的作品，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如语言学、历史、文艺批评、政治、教育法、传记、小说、诗歌等。继 1830 年完成《同义词词典》(Dizionario dei sinonimi)的编写后,1859—1879年间他又编纂了《新意大利语词典》(Nuovo dizionario della lingua italiana)，至今仍为一部内容完整的语言工具书。此外，他还写有小说《信仰与美感》(Fede e bellezza) 、诗歌、文学评论,并整理、翻译、出版希腊和科西嘉岛的民歌。其中,有关但丁《神曲》的评论充分显示出他深刻的洞察力和娴熟的写作技巧；他的诗作则摆脱了学院派的窠臼,语言优美,韵律新颖,文笔细腻,较好地表达了他的思想感情。《信仰与美感》是一部自传体小说，托马泽奥通过小说主人公乔万尼和玛丽亚哀婉、忧伤的爱情故事，叙述了自己早年的感情生活，以及始终处于宗教信仰和世俗欢乐矛盾之中的心路历程,读来感人至深。

作者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同时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和

宗教理论家,即使 1849 年罗马教皇公开宣称反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之后，他依然对天主教笃信不疑。正由于如此，他的不少作品明显流露出政治热情与宗教信仰在他内心的冲突，无怪孟佐尼称他的小说《信仰与美感》是“升天节与耶稣殉难日的产物”。

三、卡尔洛·波尔塔（Carlo Porta，1776—1821）

波尔塔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时期能与孟佐尼和莱奥帕尔迪相媲美的一位米兰方言诗人。他出生在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家庭，早年便显露出超群的文学天赋。成年后，他曾是当地财政局的一名职员,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住在米兰。当时,伦巴第是意大利北方一个政治和文化都颇为活跃的地区,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下,波尔塔自幼受启蒙思想的陶冶，积极参加围绕浪漫主义新文体而展开的辩论，并同米兰著名浪漫主义作家孟佐尼和白尔谢等人交往甚密，在思想上深受他们的影响。

波尔塔采用米兰方言写诗,他的诗歌朴实、清新,生活气息浓厚,形象生动,积极反映民族复兴运动初期伦巴第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他以遒劲有力的笔触,无情鞭挞教会和保守派势力的腐败和反动,热情讴歌善良淳朴的平民,并对他们寄予莫大的同情。他的诗作启迪人们：生活在社会边缘和遭受剥削的穷苦人,尽管貌不惊人,但是他们的心灵是纯洁高尚的,他们的感情也是丰富真挚的。在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波尔塔写出了他的两部代表作,《韦尔柴的尼奈达》（La Ninetta del Verzee ）和《跛子马尔基昂的苦恼》（El lament del Marchionn di gamb avert）：前者叙述一个女子受人引诱堕入烟花巷的故事；后者描写跛子音乐家马尔基昂遭受一个人格卑微的女子背叛和抛弃的厄运。

波尔塔才思敏捷,文笔明朗直率,独具匠心地将米兰方言和现实主义手法巧妙地糅合在他的诗句中，故被誉为意大利文学史上

一位笔意超逸的叙事诗作家。

四、朱塞比 · 乔阿基诺 · 贝利(Giuseppe Gioachino Belli, 1791—1863)

贝利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的罗马方言诗人。1831—1837 年间,他写了 2 000 多首十四行诗,刻意描摹罗马下层平民的音容笑貌和喜怒哀乐，为他们建立了一座用诗作砌成的丰碑，也表达了他对天主教制度下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抗。但是他的诗作缺乏奔放的激情和理想的光芒，显得沉郁压抑。

倘若我们认真阅读一下他的诗作,我们将不难发现,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显然,这同诗人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独特的个性是分不开的。贝利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开朗、通达事理的女子;而他的父亲却专断强横、生性执拗,这无疑在诗人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成年后，他从被法国人侵占的罗马城出逃，在那不勒斯受尽了苦难生活的煎熬。他父亲离开人世后,家里的经济变得十分拮据,年轻的诗人为之郁郁寡欢;直至后来，事业上的腾达和美满的婚姻才为他提供了舒适安逸的生活环境及打开文学大门的钥匙。

综观贝利一生中创作的文学作品，仿佛有两条相悖的线索始终贯穿其中:他时而是一个拘守绳墨、因袭旧习的保守者,时而又是一个富有反抗精神的叛逆者;他时而骄矜傲慢,时而又显得卑微低下。一些文学批评家把他诗篇中矛盾着的两重性归咎于罗马教廷推行的愚民政策。当时的罗马在政治上十分闭塞，文化方面犹如一潭死水，任何先进的民主思想都很难在那里传播开来。贝利自幼接触到的只是意大利启蒙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具有改良倾向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他的世界观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跟不上急速前进的时代步伐。所以，他在诗句中抒发的政治思想蕴含着改良、消极的因素;他对“公正、平等”的现代社会充满美好的憧憬,但

对蕴藏在人民中间的巨大动力却感到惶恐不安，担忧民众的奋起会招来不幸的灾祸。他内心世界的矛盾在他的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他所描摹的罗马下层平民的形象缺乏昂扬的斗志，他们的脸上往往蒙着一层阴暗的面纱。他积极反映罗马广大民众的生活，对他们苦难的命运寄予无限的同情，但基调孱弱无力，缺乏洋溢在波尔塔诗篇中的那种奔放的热情。

五、朱塞比·朱斯蒂(Giuseppe Giusti，1809—1850)

朱斯蒂是一位讽刺诗作家，出生在比萨附近的一座小城，早年在比萨攻读法律，后去米兰，成为孟佐尼的知交。他积极参加1848年托斯卡纳地区的革命活动，曾任国民卫队少校和托斯卡纳地区的议员，1850年因患肺病在佛罗伦萨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孤独中度过的，政治上倾向于温和派，极力反对民主派的政治观点。他十分关心他所处时代社会形势的发展，在作品中表达了托斯卡纳地区小资产阶级温和派的改良呼声。1831—1845 年间，他针对奥地利统治写了许多政治讽刺诗，以辛辣、幽默的笔调嘲弄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和人们的道德观念，抨击暴政，赞美自由和正义，对民族复兴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作品继承了古典抒情诗优雅的风格，具有民歌轻快的特征，简练有力，朴素清新，生动幽默。他的政治讽刺诗在当时的意大利文坛上颇有影响，但由于诗人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的理想，这些诗作反映的只是一些社会的表面现象。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富有浓厚的漫画色彩和现实主义倾向，给人以较深的印象 看风使舵的庸人，骄矜专横、平步青云的野心家，不择手段、卑鄙无耻的暴发户……

除了政治讽刺诗之外，朱斯蒂还写有《书信集》(Epistolario)和散文作品《托斯卡纳谚语》(Proverbi toscani)，因对托斯卡纳语的娴熟运用而被人们所喜爱。

六、伊波里托·涅沃(Ippolito Nievo，1831—1861)

涅沃生于帕多瓦一个贵族家庭，是意大利民族复兴时期一个在政治上十分激进的爱国主义小说家和诗人。早年他曾追随民族复兴运动著名政治活动家马志尼,并参加了1859年意大利抗击奥地利侵略者的战争。1860年他加入由意大利民族英雄加里波第率领的“千人义勇军”,从热那亚出发南下收复西西里岛翌年,在“千人义勇军”凯旋返回途中，因船只失事不幸罹难。尽管涅沃年仅30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是他给后人留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作品，他在文学方面的天赋也引起了文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作为一名记者，他曾为不少进步刊物撰稿，写过《威尼斯和意大利的自由》(Venezia e la libertà d'Italia)和《民族革命片断》(Frammento sulla rivoluzione nazionale)等优秀政论文章，阐述意大利争取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关键问题。他说过：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大风暴中，必须有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群众的参加，否则革命取得成功只是纸上谈兵而已。另外，他还写有许多讽刺诗和抒情诗,著有《卡普阿人》(I Capuani)、《斯巴达克斯》(Spartaco)等历史剧，并出色地翻译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作品。

1857—1858年间，涅沃在弗里乌利写成长篇小说《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Confessioni di un italiano)，这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也是19世纪意大利进步浪漫主义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犹如一幅硕大无朋的壁画，展示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浩繁的历史画卷。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深，具有浓厚的抒情味，是一部富有哲理性的历史小说。在小说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形式,以1775至1855年间的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叙述了八旬老人卡尔洛坎坷的一生，反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意大利民主主义、爱国主义力量的觉醒和成长。小说的故事梗概如下：小说的男主人公卡尔洛自幼由一个有伯爵封号的亲戚抚养长大，成年后开始热恋起他的表妹比萨娜；在爱国思想的熏陶下，卡尔洛在帕多瓦学

习期间开始向往政治自由；比萨娜受坏人唆使蔑视卡尔洛的所作所为,后嫁于一个年迈、阔绰的贵族为妻;卡尔洛撇开爱情生活中的不幸和烦恼，为民族的复兴不辞辛劳地奔波于那不勒斯、波伦亚、热那亚之间;后来比萨娜与他重归于好,并在卡尔洛病倒后悉心照料他；拿破仑政权全面崩溃后，卡尔洛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双目渐渐失明;获释后,卡尔洛在比萨娜的陪伴下去伦敦求医，他的一位医道高明的朋友治好了他的眼疾,使他重见光明,但比萨娜却因长年的劳累和颠沛猝然病故。

作者笔下的卡尔洛积极投身政治运动，是一个热情饱满的爱国者。在小说中，卡尔洛的一生始终与争取意大利自由的战士们的命运紧密相连。作者在短短的 8 个月中写完这部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历史小说,后来又没能加以修改和润色,但它至今仍是意大利人民十分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小说细腻而鲜明地描写了许多历史人物和虚构的人物，指出了意大利民族复兴的希望，对人物、生活和斗争场面的描写明快、自然,洋溢着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气息。

七、朱塞比 · 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1805—1872)

马志尼是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民主派领袖和思想家、文学批评家。 1805 年出生在热那亚一个医生家庭，年轻时曾学过法律。1827 年加入烧炭党,1830 年被捕,并被驱逐出国。 1831 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首次提出废除君主专制、保障公民民主自由权利等进步主张。 19 世纪 30 至 40 年代,曾多次组织起义,但因缺乏群众支持,均告失败。1834 年在瑞士建立“青年欧罗巴”,1846 年建立“人民国际联盟”。1848 年意大利革命爆发后,来到米兰,主办《意大利人民报》。米兰陷落后,移居瑞士,1860 年支持加里波第远征南意大利。那不勒斯解放后，要求加里波第进军罗马未成，被迫再次迁居国外。他一生著

作甚丰,大多收入《马志尼出版的和未出版的著作》和《马志尼的生平和著作》等书中。

应该说,马志尼不言失败、从不妥协的个性,以及他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奋斗的一生具有浓厚的浪漫色彩,对他同时代的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827—1832 年间,马志尼写有许多文学评论文章,如《但丁的爱国热忱》(Dell'amore patrio di Dante)、《欧洲文学》(Di una letteratura europea)、《拜伦与歌德》(Byron e Goethe)、《音乐的哲学》(Filosofia della musica)、《论小说与〈约婚夫妇〉》(Del romanzo in generale e anche dei Promessi Sposi)、《19世纪欧洲文学的若干倾向》(Saggio sopra alcune tendenze della letteratura europea nel secolo XIX)等。在这些作品中,马志尼始终将文艺应有的教育作用作为中心议题,因为在他看来,文艺是人类进步的工具。他曾说:"诗歌描绘的是个人灵魂的信仰,正如信仰是集体灵魂的诗歌一样。"这就是说,诗歌表达的是精神的全部实质,具有浪漫主义典型的特征。尽管他十分崇拜富有伟大创造力的诗人,如但丁、福斯科洛、拜伦等,但是他认为这绝不是一种个人的崇拜,因为说到底,诗歌的艺术魅力正在于它反映了民众的心声。

八、西尔维奥·贝利科(Silvio Pellico,1789—1854)

贝利科是意大利爱国者、戏剧家。他生于比埃蒙特地区萨鲁佐城,在都灵完成其早年的学业后,1806 年移居法国里昂,与欧洲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有了直接的接触。1809 年回意大利,定居米兰,与福斯科洛成为挚友,并结识了不少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他曾一度加入浪漫主义革命作家团体,其中有蒙蒂、福斯科洛、白尔谢和孟佐尼等人。与此同时,他发表浪漫主义悲剧《弗兰契斯嘉·达·里米尼》(Francesca da Rimini),1815 年初次公演时获得巨大成功。1818 年他与别人一起创办浪漫主义自由派刊物《调解人》,

并积极撰稿。该刊物遭奥地利警方查禁后不久，他在米兰参加秘密组织烧炭党活动。1820 年 10 月他因叛逆罪被捕，1822 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但仅服刑 8 年。1830 年获释，迁居都灵，健康状况和精神面貌每况愈下，开始远离政治生活，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宣扬基督教的逆来顺受精神。

贝利科的剧作、诗歌和散文，尤其是《我的狱中生活》（Le mie prigioni）一书，文字质朴明晰，具有启发心灵和基督教虔诚的特色，至今仍拥有众多读者，并有多种译本。这本叙述作者本人作为政治犯所受迫害的回忆录，赢得了不少人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的广泛同情。该书揭露奥地利奴役者的残暴，激发意大利民族情感，享有很高的声誉。书中描述的牢狱生活单调乏味、灰色阴暗，几乎没有任何色彩或激情，作者以朴素的文笔抒发深陷囹圄之人对尊严和自由的向往。

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化运动有较大的局限性，它只是调和了新旧文化的矛盾和冲突。在德国，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场包括哲学、思想和文学领域在内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而在意大利，由于天主教会的种种干扰，浪漫主义运动未能彻底摆脱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传统的羁绊，新文化的发展遭遇到来自政治、经济、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阻力。几个世纪以来，意大利一直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之中，其统治者积极推行的是家长式的愚民政策，对任何主张自由交流思想的大胆设想均持敌视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化运动与民族复兴运动所颂扬的自由和民族精神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为民族复兴运动构建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对于祖国、民族、民主及被压迫人们争取自由的权利等概念的深刻内涵，人们开始有了全新的诠释。在宗教启示的感召之下，民族复兴的斗士们充满旺

盛的斗志，为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勇往直前。

19 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文学具有明显的战斗性，不少作家和诗人将唤醒民族觉悟、改变社会现实和民众落后的思想观念、传播爱国主义思想，当作文学创作的宗旨和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在文学领域内进行勇敢的探索，为建立一种以历史、民族复兴和壮美的自然为素材，具有现代内容并真实反映民众心声的新文学，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就艺术而论，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并未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除了福斯科洛、莱奥巴尔迪和孟佐尼以外，没有产生其他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家或诗人。另则，囿于自身的局限性，福斯科洛和莱奥巴尔迪的作品，从广义上来说，并没有真正同意大利的浪漫主义文化运动融合在一起；他们只是在内容和形式上对古典主义的传统模式作了革新，但未触及其实质，在他们的思想观念和民族复兴者的政治理想之间尚有明显的距离。相比较而言，孟佐尼的《约婚夫妇》可谓是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范例，无论在内容或创作风格上，它均折射出浪漫主义的思想光芒，对当时的意大利文学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总而言之，在整个民族复兴运动时期，意大利文坛上涌现出许多充满政治激情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诗人。

第十一章　统一后的意大利文学

1848 年的意大利革命沉重打击了外国统治者和本土的封建反动势力。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外族奴役和封建割据成了阻碍意大利社会继续前进的主要障碍。以马志尼、加里波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以武力结束异族的统治，推翻国内的封建政权，最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自 19 世纪 50 年代末叶起,民族复兴运动发展至高潮，但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妥协和动摇，大资产阶级最后窃取了民族复兴运动的胜利果实。 1860 年,由萨沃依王朝领导的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历经数十年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民族复兴运动旨在统一意大利的大业基本告成。在这之后的十几年中，意大利的政治形势仍动荡不安，行动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冲突日趋尖锐：前者极力主张依靠人民的武装力量解放罗马，彻底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后者则反对暴力行动，希望借助外交攻势的威力和平解决罗马问题。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政权反对广泛的社会改革，资本主义只是在北方地区发展比较迅速，而国内大部分地区仍然保留着落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民众沦于资本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曾几何时，人民对民族复兴运动曾寄托着美好的希冀，但如今心中的梦想却成了泡影，悲观失望的情绪犹如一块大石重压在人们的心头。与此同时，反映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日趋衰落，并逐渐失去了它原先的风采和光泽。正如 19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著名爱国诗人卡尔杜齐所说：意大利演完了一出悲哀雄壮、振奋人心的戏剧之后，另一台内容平庸、艺术拙劣的闹剧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同欧洲其他国家相仿，19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社会，阶级矛

盾日趋尖锐，广大工人、农民同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冲突上升为主要矛盾，从而产生了不少令人不安的消极因素。其次，19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上几个世纪的分裂割据造成了各地区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令人怵目惊心的差距，尤其是日益加剧的南、北之间的差异使人深感不安。诚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南北方矛盾形成的原因由来已久。在风起云涌的民族复兴运动中，绝大部分农民置身局外，他们感到这场资产阶级运动与己无关，对意大利统一后的新政体态度十分冷漠，诸如“黑手党”之类的秘密犯罪组织在西西里的扰乱活动日益猖獗。

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文化界人士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的鄙夷广大劳苦大众，但同时又畏惧他们的力量；有的致力于建立人民大众的文化，积极反映他们的精神面貌；有的则把文学视作社会上层人士的精神财富，对社会现实置若罔闻，陶醉在一片虚无的良辰美景之中，拒广大民众于文化大门之外。

由于欧洲一连串世事（举世瞩目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拿破仑的登台和惨败，震撼全球的巴黎公社等)的重大变迁，意大利自 19 世纪起重新回归欧洲文坛，尤其是同毗邻几个国家的文化联系变得日益密切起来。1870 年，罗马解放，教皇被剥夺世俗权力，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最后终告完成。事实上，自 18 世纪下半叶起，欧洲的文明史和文化史已将欧洲诸国的命运和前途紧紧连在了一起。渐渐地，一些欧洲国家的新文化思潮开始在意大利广泛传播，对当时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自惭形秽的意大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848 年，法国爆发了推翻七月王朝的革命，2 月 22 至 24 日，巴黎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迫使国王路易·腓力普退位。囿于意大利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1848 年的法国人民武装起义使很多意大利人得了“社会主义恐怖症”，这在比埃蒙特和伦巴第地区的反响尤为强烈。尔后，1871 年的巴黎公社则进一

步加剧了上述的“恐怖症”，这在不少意大利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有过充分的反映。

第一节 实证主义的影响

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意大利统一之后的文学艺术，不管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与浪漫主义文学大相径庭。广大社会中下层人民不满现状，迫切要求继续进行社会改革，对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海市蜃楼渐渐失去信心。当时，有一部分人主张以具有实证的确凿事实为依据重新估价一切，这种新的哲学观点被称之为“实证主义”,其创始人是法国著名哲学家孔德。他认为,人类的思想已经不可避免地从神学阶段进入形而上学阶段，而且正在步入实证的或科学的阶段；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而不能认识其本质，从而否定客观世界和客观规律的可知性。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都十分迅速。铁路、电气和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在短短的数十年中大大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步伐，人民的生活，尤其是都市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科学探索的积极成果不但促进了技术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统治阶层则在实践中深刻领悟到人潜在创造力的伟大。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为经济领域表面的繁荣沾沾自喜，沉湎在一片盲目的乐观中。这一时代特征不禁使我们想起 18 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的盛景，两者颇为相似。但事实上，实证主义绝非是什么崭新的启蒙思想，它只是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资产阶级为巩固和提高自身政治地位的一种思想武器。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对立面的是刚登上政治舞台并正在崛起的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正以其新的世界观征服人们的思想，而处于防御地位的封建贵族和天主教会对资产阶级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倘若不深刻理解 19 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在捍卫既得利益中

的畏惧和倦怠心理，我们就无法解释当时意大利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状况。

尽管如此，19 世纪下半叶的人普遍迷信科学的神威，坚信科学能改善人的生活条件，能给人带来美好的明天。实证主义者极力反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把哲学视作科学新发现的综合和成果；他们努力创建新文化，积极宣传科学促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思想。可是有些实证主义者自称是“科学的哲学家”，但他们只承认主观经验，错误地认为科学只是主观经验的反映，无法解释客观规律。

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科学家简直是一个“完人”。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因献身科学以及他在力学、光学、天文学方面的重大发现而成为 18 世纪受人崇拜的偶像；19 世纪下半叶，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以他的进化理论赢得了人们普遍的爱戴和尊敬，从而成为举世瞩目的伟大科学家……毋庸置疑，科学的发展和实证主义理论的形成一定会在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中反映出来。意大利著名诗人埃米利奥·布拉嘉（Emilio Praga，1839—1875）和卡尔杜齐都曾在诗句中颂扬过蒸汽机和火车的神奇功能，这显然不是出于作者一时感情上的冲动。

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学家、艺术家同社会的关系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一批富有生气的新型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知识分子已渐渐适应资产阶级社会新的生活环境，他们不再感到忐忑不安或茫然不知所措，因为现实赋予了他们极为丰富的写作素材和舒适的工作条件。昔日的宫廷诗人已不复存在，作家已逐渐成为自食其力者，文坛上呈现出一派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出版社相继成立，报刊杂志的发行量也相应有了明显的增加，读者队伍不断扩大。但是，文盲现象在当时仍然十分严重，免费教育尚未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

第二节　写实主义的文学倾向

1860—1890 年间，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一股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思潮。诚然，它的形成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浪漫主义理想的危机和实证主义思想的流传，科学的发展及作家、科学家社会地位的提高，社会学的广泛应用，新科学理论（比如‘遗传学’）的建立及外国文学的影响等。然而，在当时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浪漫主义的创作风格依然盛行：抒情与写实，社会利益与家长式统治，悲壮与诙谐，每每互相交错，融为一体。法国著名小说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和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就是在这一时期中问世的文学巨著，它们在意大利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寻求作品‘真实性’和‘社会性’的过程中，米兰文坛上形成了“豪放不羁派”。它是 19 世纪中叶意大利文学中的一个先锋派运动，其宗旨是反对浪漫主义的写作风格，取代古典的、阿卡狄亚的和道德的传统，主张吸收欧洲其他国家文化艺术的有益经验，从而创建不拘泥形式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豪放不羁派文人在生活上放荡不羁，在文学创作方面则极力反对题材和语言相统一的模式，探求带有怪诞、病态的因素和现实主义描写性的叙事体作品。他们的作品带有明显的法国象征主义和自然主义色彩，主题和格调往往比较低沉，流露出无政府主义的情绪。但是，他们刻意暴露社会的真实面目，哪怕是阴暗、污秽或不堪入目的内容，他们也如实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在语言方面，他们摒弃孟佐尼式的文学语言，主张从日常用语和方言中采撷养料，使作品给人以新颖、奇特的感觉。由于该文学流派的作家大多生活在米兰，因此它的地区局限性较大，作品也无法恰如其分地反映意大利各地区表现形式各异的现实生活。另则，豪放不羁派作家只是从外部观察社会现状，他们往往满足于披露一些表面现象，没能潜入社会的纵深

处仔细分析客观现实，因此收效甚微。

豪放不羁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产物，它的创作格调类似法国革命后期的一些文学作品。这些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不愿意，也不甘心接受资产阶级政权的领导，因为他们唯恐自己的功名、地位、希冀、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化为泡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一些被时代前进的浪潮抛至一边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现实感到强烈不满，采取无政府主义态度同社会分庭抗礼，但又不设法寻觅较为理想的社会制度取代它，表现得犹豫彷徨，畏缩不前。他们就像真实主义代表作家维尔加在其长篇小说《玛拉沃利亚一家》的前言中所描绘的那些人“:为了赢得进步,他们往往兴奋地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着……他们是一些被撇在路旁的弱者，一些企盼海浪淹没头顶的疲惫不堪的人，一些在残忍的战胜者脚下耷拉着脑袋、绝望地挥动着手臂的失败者”。

19 世纪下半叶，米兰成了意大利半岛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传统观念和陈旧的社会体制在那里已被彻底砸碎，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矛盾表现得尤为尖锐和突出。米兰的客观历史条件为豪放不羁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温床。该流派的创始人之一克莱托·阿利吉(Cletto Arrighi,1830—1906),在他的小说《豪放不羁派文学与二月六日》(La Scapigliatura e il 6 febbraio)中为该运动杜撰了这个名称，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有埃米利奥·布拉嘉、乔万尼·卡梅拉那(Giovanni Camerana,1845—1905)、伊奇诺·乌哥·泰盖迪(Igino Ugo Tarchetti,1839—1869)和阿利各·波依多(Arrigo Boito,1842—1918)等,后来又有一些比埃蒙特的散文作家陆续入伍。另外，维尔加的早期作品和卡尔杜齐的抒情诗也带有一些豪放不羁派文学的特征。豪放不羁派片面追求外表形式，不注重实质内容，意境显得软弱无力，不久就为真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所取代。

第三节　维尔加和真实主义文学

“真实主义”指的是 1875—1895 年间由一些叙事体文学作家和喜剧作家共同创建的一种意象新颖的文学流派，它的宗旨是使用平铺直叙的语言、明晰畅达的细节描写、现实主义的对话，客观地表现生活，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真实主义文学最初的代表人物是西西里作家卡普安纳和维尔加。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后兴起于欧洲，特别是通过巴尔扎克和左拉，以及一部分被称为豪放不羁派的米兰文人，影响了卡普安纳和维尔加。真实主义文学同以法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左拉在他创作的由 20 部小说组成的《卢贡—马尔卡家族》中，以自然主义的笔法描摹了第二帝国时代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热情颂扬了下层人民的朴实和勇敢，对当时的意大利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意大利统一之后，不少作家和诗人的视线开始从喧闹的都市转向南方广阔的农村。他们厌恶城市里上层社会奢侈挥霍的生活方式，开始以深厚的同情心在广大民众中寻找创作的源泉，在作品中努力反映当时意大利南方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真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维尔加撰写的长篇小说《玛拉沃利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老爷》就是在现实主义文学思潮推动下诞生的优秀文学作品。作者以深邃的目光观察意大利南方社会，运用隽永、敏锐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西西里人民的精神面貌、思想感情和苦难的命运，勾勒出一幅幅富有浓厚生活气息的、由农民和渔夫组成的浩繁的劳动及生活图景。他在作品中刻意描绘了一群“失败者”的悲怆和痛楚，反映了西西里岛上穷苦农民贫困、苦难的不幸生活遭遇。在维尔加之前，意大利文坛上虽然曾数次出现过积极反映社会现实的创作思潮，但态度不甚明朗，同以维尔加为代表的真实主义文

学相比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无论是法国的自然主义,还是意大利的真实主义,两者都把文学(更确切地说是小说)看作表达时代精神最理想的文艺手段。左拉曾说过":小说是我们科学时代的文学,就如同古典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一样，它们在历史上也曾是经院哲学和神学时代精神的体现。"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涌现出许多叙事体文学作品,主题均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背景则为某一地区狭隘的生活环境，作品借此烘托人物的不同性格和细腻的心理活动。至于小说中的主人公,作者在素描的过程中,总是有意识地把他们同其所属的社会阶层联系在一起，并对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精神世界加以分析,贴切详明,层次清晰。小说中,自然环境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通常占据较大的篇幅，作者采用的语言和文体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读来真实感人,天趣盎然,同孟佐尼极力提倡的以佛罗伦萨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迥异。

所谓真实主义作品,顾名思义,作者必须科学地、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和刻画人物形象，尽量避免在作品中揉进自己的思想观点。诚然，要作者纯粹以旁观者的身份叙述故事同样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加之民族复兴运动后意大利社会虚假的升平景象,维尔加对前途丧失信心,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光明前景,因而在作品中流露出较为浓厚的悲观哀伤的情调,宣扬处于资产阶级新秩序和旧的封建关系双重羁轭下的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是不可改变的。

一、生平与作品

乔万尼 ·维尔加(Giovanni Verga,1840—1922 ）出生在西西里文化中心卡塔尼亚城的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烧炭党成员。他在家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 20 岁入大学攻读法律，并开始为报刊撰稿。与此同时，他模仿当时颇为流行的法国小说家、戏剧家

大仲马的写作文体,撰著了《爱情与祖国》(Amore e patria,1855)、《山里的烧炭党人》(I carbonari della montagna,1861—1862)和《滨海湖上》(Sulle lagune,1863)等长篇历史小说,描写19世纪意大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史实，宣扬方兴未艾的民族复兴运动的精神。1865年，作者离开西西里，先后旅居佛罗伦萨和米兰等地，同那里的政治家和文化界进步人士接触十分广泛。其间，他同文艺理论家、小说家加普安纳之间的友情日益加深，这对他的思想及文学创作都有较大的影响。20世纪初,意大利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真实主义文学日趋没落，维尔加亦随之失去创作的灵感，隐居家乡卡塔尼亚,1922年凄凉地离开人世。

维尔加的早期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欠成熟。他在1874年创作中篇小说《奈达》(Nedda)之后，开始对上层社会和文学界的现状进行认真的观察和研究，在写作风格方面向真实主义迈开了可喜的第一步。在19世纪60、70年代，尤其是他迁居米兰之后，相继写了《女罪人》(Una peccatrice,1866)、《黑帽雀的故事》(Storia di una capinera,1871)、《夏娃》(Eva,1873)、《真虎》(Tigre reale,1873)、《厄洛斯》(Eros,1875)等以上层社会的生活为题材的、描述悲欢离合和缠绵悱恻情节的作品，富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作者在这些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感情，抨击社会生活中的邪恶，但是作品缺乏思想深度，同他后期创作的几部小说相比大为逊色，社会效果甚微。在这几部以爱情为主题的小说中，有因情场失意而自尽的名门闺秀，有因家人利欲熏心而被迫出家修行的无辜少女，有怀才不遇、失去爱情的年轻画家，也有身患肺病、一命呜呼的多情的俄罗斯伯爵夫人……

维尔加在1874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奈达》,从主题到写作风格均与他的早期作品迥然不一，是他的第一部真实主义小说。《奈达》描写的是一个采橄榄农妇的爱情生活和苦难身世，揭示了意大利南方社会的痛疸。作者在《奈达》中所描写的不再是米兰或佛罗

伦萨上流社会中绅士的闲情逸致或贵妇的矫揉造作，他着意反映的是西西里穷苦农民的贫困、苦难、忧虑和烦恼。继《奈达》之后，维尔加又写了几部反映上流社会奢侈浮华生活的小说，但是《奈达》给了他追求朴实、真切文笔的热情和勇气。在 19 世纪 80 年代，作者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真实主义的优秀著作，并因此声望益隆、颂声日高，其中较有影响的有《田野生活》（Vita dei campi，1880）、《乡村故事》（Novelle rusticane，1883）、《玛拉沃利亚一家》（I Malavoglia，1881）、《埃雷娜的丈夫》（Il marito di Elena，1882）、《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Mastro don Gesualdo，1888）等。其中，《玛拉沃利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是作者原先计划写作的以"失败者"为总题的 5 部长篇小说中的 2 部。这 2 部真实主义作品均以卡塔尼亚为写作背景，主人公都是作者熟稔的农民、牧人、渔夫和工匠。就题材和写作风格言，《玛拉沃利亚一家》和《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同作者的早期作品截然不同。作者怀着深切的同情，在这两部小说中细腻地描摹了劳苦大众遭受剥削、压迫和欺凌的不幸境遇，同时对新兴资产阶级贪婪、冷酷的本性予以无情的鞭挞。

《田野生活》是维尔加最著名的一部短篇小说集，描写了西西里岛贫苦农民备受压迫、丧失人权而又受古老偏见束缚的苦难生活，描绘出一幅幅充满戏剧性的组画。在这些短篇小说里，作者怀着深厚的同情描写了农民、渔夫等劳动者同饥饿进行的斗争，以及他们对生活所寄予的最微薄的希望的幻灭，其中有他们受辱的感情和野性的勃发，有他们在同高利贷者、法官和教堂执事的冲突中企图维护自己权益的绝望心情，也有他们对地主、乡绅、法官、神父相互勾结、欺压百姓的罪恶行径的有力控诉。正如维尔加本人所说："这是一个寄生虫和食利者肆虐的时代。"

维尔加的剧作《乡村骑士》（Cavalleria rusticana）于 1884 年在都灵首次搬上舞台。这个剧本是根据他的短篇小说集《田野生

活》中一篇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狙击兵多利托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富有的小酒店女掌柜的儿子，在他退伍回家之后，发现他的恋人罗拉嫁给了有钱的车夫阿尔斐奥；而可怜的姑娘桑塔已与多利托有了身孕，即将分娩，她万分妒忌多利托对罗拉至今念念不忘的旧情，便将多利托与罗拉藕断丝连的暧昧关系告诉了阿尔斐奥；车夫决心为自己受到玷污的名誉进行报复，在复活节的一场持刀决战中，将多利托刺死。在这出戏剧中，维尔加刻意描绘了西西里人民的传统习俗，揭示了他们的道德准则和古老的偏见。

按维尔加的原意,包括《玛拉沃利亚一家》和《堂 ·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在内的 5 部长篇小说,旨在描绘‘ 失败者 ’为赢得理想生活而进行斗争的 5 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但遗憾的是，作者的夙愿最终没能实现。《玛拉沃利亚一家》的故事发生在西西里一个“ 被上帝和世人遗忘了的 ”偏僻渔村，禀性敦厚的老渔民玛拉沃利亚原先想凭借儿孙的强壮劳力摆脱苦难的命运，但在残酷的现实生活中，他的希望破灭，濒于家破人亡的边缘，最后仍作为一个永恒的“ 失败者 ”痛苦地在医院里死去。维尔加在小说中大量选用民间词汇和谚语，运用谙练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典型人物，使人读后久久难以忘怀。他的文笔精练准确，感情强烈，构成了具有抒情特色的现实主义，在意大利掀起了创作地方色彩作品的高潮。在作者的神笔之下‚‘ 山碴子树旁 ’渔民祖孙三代辛酸、悲惨的生活遭遇被刻画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全书充分展现了意大利统一初期西西里的社会生活。小说问世后，受到各界的称赞，有人甚至称它是继孟佐尼的《约婚夫妇》之后意大利文坛上最优秀的一部小说。《堂 · 杰苏阿多工匠老爷》的主人公杰苏阿多原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不甘心受压迫和欺凌，一心想发家，但在同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拼搏中最后还是沦为一个众叛亲离的失败者，孤独地弃世而去。小说以一心向上爬和拼命跻入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杰苏阿多的发迹和惨败为主要线索，无情地揭露了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

钱关系，以及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者所造成的危害。

二、思想与艺术

维尔加在他的短篇小说《幻想》（Fantasticheria)中 ,独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位阔绰的贵妇在玛拉沃利亚家乡的一段经历：第一天，这位经常出没上流社会社交场合的“ 高雅 ”夫人被乡间恬静、简朴的生活环境所深深陶醉，似乎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勾起她无限美好的遐想 ;但第二天她就无法再忍受乡间‘ 粗野 ’的习俗 ,她简直不能理解 ,是什么精神力量在支撑着那些‘ 卑微 ’的人们 ,因为在她看来，在那偏僻贫穷的渔村中“ 虚度 ”人生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作者通过达官贵人态度的骤变，有力地抨击了所谓的“ 城市文明 ’和‘ 高贵者 ’玩世不恭的处世哲学 ,同时对那些敢于正视现实的善良人们寄予无限的同情。他曾说：“ 依我之见，他们这种忍受生活艰难的勇气及反映在职业、房屋和家园四周石头上的家庭观念，同样使人肃然起敬。 ”

维尔加在其作品中，对“ 卑贱者 ”的道德观念和思想情操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重新赋予他们人的尊严。在他之前，曾有不少作家对“ 卑贱者 ”苦难的命运表示过家长式的怜悯和同情，或者给他们在田野或作坊里的劳动生活涂上一层田园牧歌式淳朴、美丽的色彩。而在维尔加的笔下，我们看不到丝毫隐逸生活的影子，也听不到弓着腰在地里劳动的人们的欢声笑语。在他的作品中，既没有侵犯人权的家长式口吻，也没有盲目的乐观主义。但是，维尔加往往用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解释社会矛盾，表现出一定的悲观主义和宿命论思想。

在意大利文学史上，维尔加是继孟佐尼之后努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伟大作家。他对当时的现实生活抱着悲观失望的消极态度，在作品中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由劳动与斗争、热情与死亡组成的世界。但是，他塑造的众多的人物并不寄希望于神灵或天

意,他们只是逆来顺受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他消极地认为,任何改变现实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作品中充满伤感的情绪,唤不起人们的斗争热情。

就写作技巧而言，维尔加以法国的自然主义文学作品为创作模式,把小说视作社会调查和暴露痛疽的理想文学形式,强调作者必须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文学艺术家不可在作品中留下丝毫自己的痕迹，小说应不折不扣地再现史实。这样,艺术品就会如同自然现象一样,自发形成,自由发展,并同作者本人没有任何关联。”在写作语言方面,维尔加独树一帜,是当时唯一敢于大胆创新的真实主义文学的开拓者,他的文学语言有西西里方言的特点，较好地起到了烘托小说中意境和人物性格的作用。维尔加对其独创的写作语言的艺术魅力深信不疑，并为确立它在叙事体文学创作中的合法地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曾有一位文学批评家在赞扬维尔加代表作品《玛拉沃利亚一家》的同时,对小说的语言提出过异议,但维尔加在给他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倘若我得以重写《玛拉沃利亚一家》的话,我仍将采用同样的语言格式，因为我认为这是为主题和内容服务所必需的语言形式”。维尔加的文学语言生动、形象、优美、柔和,正由于如此,他才能在作品中游刃自如，舒畅地抒发思想感情。他塑造的众多的西西里渔夫和农民的形象栩栩如生，身上散发出泥土的芳香和海水的苦涩,读来感人至深,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第四节　其他真实主义作家

由于种种原因,在 19 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文学史上，真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日趋明朗，且越来越深入人心。一方面，随着民族复兴精神的衰微，许多人对旨在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的历史小说逐渐失去兴趣;另一方面,国家统一之后,资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各地

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队伍益臻壮大的读者群要求作家或诗人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他们不仅希望文学作品能满足他们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而且能给予他们艺术上的享受和精神上的慰藉。在时代精神的鼓舞下，涌现出一批颇有建树的真实主义小说家和剧作家,不少优秀的作品相继问世。然而,在他们之间,在他们与维尔加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为他们中无人能像维尔加那样，在作品中忠实地反映处于资本主义新秩序和旧封建关系双重压迫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另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追随 1890 年之后开始在欧洲广为流传的心理主义，成为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法的宣传者。

一、路易其 · 卡普安纳(Luigi Capuana，1839—1915)

卡普安纳是意大利真实主义文学另一位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1880 年他和维尔加一起发表了自然主义宣言，为法国自然主义的传播以及意大利真实主义文学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生于西西里岛卡塔尼亚一个富有的家庭，曾在卡塔尼亚大学攻读法律，年轻时写过诗歌和诗剧。他的文艺观点深受法国福楼拜、左拉等人的影响。此后,他移居佛罗伦萨,任《民族报》戏剧评论员，后去米兰。卡普安纳是意大利真实主义的理论家，主张文艺必须真实地、客观地反映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的状况，作家应该从现实生活中采撷创作素材，把目光投向社会下层的劳苦大众。他在自己的论著中极力推崇自然主义和客观性，而不喜用象征主义。他著有长篇小说《嘉琴达》（Giacinta，1879）、《洛卡维迪纳侯爵》(Il marchese di Roccaverdina，1900)和短篇小说集《乡村妇女》（Paesane，1894）等，主题和内容均以西西里为背景，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嘉琴达》以西西里为背景，描写了一个自幼受到社会歧视、凌辱而最终被迫走向叛逆的妇女的人生境遇，对不公正的社会和封建礼教提出有力的控诉。《洛卡维迪纳侯爵》是作者比较成功

的一部小说，描写一位侯爵老爷卑鄙无耻的灵魂和内心的隐痛，无情地鞭挞了达官贵人道貌岸然的伪君子面目。短篇小说集《乡村妇女》描绘 19 世纪末西西里的社会、经济生活和人情世态，反映了意大利农村封建关系的崩溃，其中对人物的性格、心理也有细致入微的刻画。卡普安纳把目光投向西西里贫穷、落后的农村，在作品中努力反映下层平民悲惨的命运，但格调低沉，忽视了穷苦百姓潜在的革命热情。

二、格拉齐埃·黛莱达(Grazie Deledda，1871—1936)

黛莱达是一位撒丁岛真实主义流派女作家，擅长运用细腻的笔触素描撒丁岛农民和牧人的困苦生活，家乡的传统、风俗和历史是她的作品之魂。她通过丰富的想象，将撒丁岛旖旎的自然景色像一幅幅水彩画似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作品表现了资本主义文明同撒丁岛古老文明之间的冲突以及后者的解体，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诺罗镇，虽家境殷富，但当地的风俗和传统观念不允许她求学深造，后成为一位自学成才的女作家，早年写有不少短篇小说，先后发表在一些妇女杂志上。继 1895 年出版第一部小说《诚实的人》(Anime oneste)之后，陆续写了《伊里亚斯·波尔塔罗》(Elias Portolu，1903)、《灰烬》(Cenere，1904)、《常青藤》(L'edera，1908)、《风中的芦苇》(Canne al vento，1913)、《玛丽亚娜·西尔嘉》(Marianna Sirca，1915)、《母亲》(La madre，1920)、《活人的神》(Il Dio dei viventi，1922)等作品。1926 年，黛莱达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她是个“给人带来甘露，使人的身心因此有了生机和活力”的女作家。迄今为止，黛莱达是唯一获得该殊荣的意大利女作家。

《常青藤》是黛莱达的名著之一，小说如诉如泣地讲述了女仆安内莎苦难的命运：她出于对东家少爷帕乌鲁炽烈的爱，绝望中将暴戾、悭吝的东家老爷掐死，负疚的心理致使她远走高飞；与帕乌

鲁割舍不断的情愫迫使她再一次回到他的身边，但是时过境迁，原先她当女仆的那户人家早已败落，贫困和疾病笼罩着那里的房舍和庭院。《风中的芦苇》是黛莱达的另一部力作，它反映了封建式大家庭的解体，揭示了僵死的封建庄园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正如庄园的老长工埃非克斯在临死前对庄园主的女儿所说："我的女主人，我们都是风中的芦苇！我们的命运就像是风中的芦苇！"黛莱达的叙事体文学作品具有神秘主义和宿命论思想，体现了维尔加真实主义和邓南遮颓废主义的风格；主题往往围绕着爱情、痛苦和死亡展开，抒情味醇厚，展现了撒丁岛人豪迈的气质，并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和冲突，为此人们把她誉为"撒丁岛的心声"。她的近 50 部小说均抒发类似的主题,自传体小说《科西玛》（Cosima）在她死后于 1937 年出版。

三、埃特蒙多·德·亚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

德·亚米契斯是一位小说家、诗人、游记及儿童读物作家。军校毕业后在炮兵部队服役，为陆军杂志《意大利军队》写过多篇报道军队生活的短文,后来汇编成《军营生活》（Vita militare，1868）出版。随后,他又推出《短篇小说集》（Le novelle，1872）。有些评论家认为这是他最优秀的作品。另外他还写了一些诗歌、长篇小说、游记及散文,其中较著名的有《西班牙》（Spagna，1872）、《摩洛哥》（Marocco，1876）等。他 21 岁时来到历史名城佛罗伦萨，有幸结识了不少当地政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这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使他后来有 4 年的时间放弃军旅生活，从事专职新闻工作。德·亚米契斯曾怀着十分眷恋的心情回忆起文学沙龙里和谐气氛中的社交活动,并写下了诸多感人肺腑的佳作,如《朋友们》（Gli amici，1883）、《在海洋》（Sull'oceano，1889）等。

德·亚米契斯的人生阅历十分丰富。这位利古里亚人，当过

步兵军官，写过反映军队生活的稿件，发表过游记作品；他逐渐成为朦胧派诗人和一名社会主义者，曾为支持意大利首相克利斯比推行的放弃共和、狂热维护君主制度的政策效命。他根据其儿子的小学生日记改写而成的日记体小说《爱的教育》（Cuore）于 1886 年问世，被公认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表现的对儿童入木三分的剖析、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师生关系以及带有感伤色彩的故事使人们对小说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也使作者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小说先后被译成 25 余种文字出版。德 · 亚米契斯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通过对小说主人公的描写，以浓墨重彩，反映了意大利的社会状况，把读者带入一个童话般的世界。这部作品像一面明镜，映照出意大利民族当时正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人口外流，贫穷落后的南方，以及人们对意大利王国的向往。《爱的教育》为世俗人士描摹了保障社会各阶层之间平衡的生活理念：用善举代替怜悯，用教师代替神甫，用学校代替教堂，用医院代替济贫所，用参军服役代替宗教礼仪。除外，该书还向读者指出“爱书籍，爱祖国，爱人类”是世俗教育中三股伟大的激发力量。

四、巴斯夸莱 · 维拉利（Pasquale Villari，1826—1917）

维拉利生于那不勒斯，是著名文学评论家、自由主义爱国者德 · 桑克蒂斯的挚友及弟子、当地闻名遐迩的一位史学家和教育家。1848 年因与一起反奥地利案有牵连，他被迫迁居佛罗伦萨，因为佛罗伦萨是他心目中的英雄萨伏纳罗拉生活的城市。直至谢世，他一直居住在那里，曾先后任大学教师、众参两院议员及公共教育部部长等职。他著述的一些历史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并在欧洲广为流传，比如：《杰洛拉莫 · 萨伏纳罗拉的生平及其时代》（Storia di Gerolamo Savonarola e dei suoi tempi）、《尼古洛 · 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Niccolò Machiavelli ed i suoi tempi）、《佛罗伦萨史初 200 年》（Primi due secoli della storia di Firenze）等。维

拉利对萨伏纳罗拉的研究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他看来,萨伏纳罗拉就是与美德融为一体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象征，而佛罗伦萨共和国时代则标志着意大利追求自由、奋起反抗的开始。在分别于1860 年和 1861 年出版的两卷本《杰洛拉莫 · 萨伏纳罗拉的生平及其时代》中,维拉利在前言的末尾写道“:那个标志着中世纪结束和现代文明开始的世纪，对萨伏纳罗拉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其实,对他的许多东西我们原先并不真正了解。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从零开始,重新撰写他的生平。”接着,维拉利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的文章,后均收入两卷本《佛罗伦萨史初 200 年》,分别于1893 年和 1894 年出版。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著作反映了维拉利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除外，他还写有不少政论文章，以唤醒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觉悟，鼓励他们勇敢地克服国家统一后出现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在这一类政论作品中,最重要的当属 1875 年他发表在报上的《南方来信》（Lettere meridionali）。在该书中,他指出:南方问题是意大利社会潜在的最大危险;那里的黑手党、克莫拉恐怖分子秘密组织及土匪的猖獗活动，是一个以剥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腐败社会及不平等制度造成的恶果。他还说:说到底,民族复兴只是一场资产阶级运动,为了更好地完成其使命,并保障广大民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惟独实现社会平等,意大利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而妥善地解决南方问题则是建立新国家的先决条件。

维拉利的政治观点标志着意大利 19 世纪下半叶进步知识分子的现实主义思想倾向，是真实主义文学形成的前提。但遗憾的是,这种现实主义风格在 19 世纪末受到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抑制。

五、埃米利奥·德·马尔基(Emilio De Marchi,1851—1901)

德·马尔基是19世纪末叶豪放不羁派文学和真实主义文学盛行时期的一位重要作家，他的叙事体文学作品继承了伦巴第文学和孟佐尼创作风格的传统。他的主要著述有：《教士的帽子》(Il cappello del prete,1888)、《特曼德利奥·比亚奈利》(Demetrio Pianelli,1890)、《阿拉培拉》(Arabella,1892)、《理想主义者贾科莫》(Giacomo l'idealista,1897)、《不要玩火》(Col fuoco non si scherza,1901)等。

他出生在米兰，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后，曾在米兰高中和文学院执教，后在政府管理部门和慈善机构任职。米兰爆发人民起义之后，他努力调解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尖锐矛盾，并试图通过教育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暴力冲突。为此，他写有《值得回忆的岁月》(L'età preziosa)，里面收集了许多针对青年人的戒律和范例；1898年他还为民众创办读物《有益的话语》(La Buona Parola)。

德·马尔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十分推崇孟佐尼的作品，坚持认为文学作品不应该只是“无所事事者的消遣品，它应当为人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提供精神上的帮助”。他还指出：文学作品务必忠实反映生活；宣扬友爱、仁慈等美德要比科学发现或社会进步来得重要。他继承了孟佐尼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坚信痛苦能转化成赎罪的动力，道德价值是苦难人生的唯一精神安慰。然而，他笔下的人物与孟佐尼作品中的不尽相同，他们的激情往往源自命中早已注定的性格。与其同时代名噪一时的作家福加扎罗和邓南遮相悖,德·马尔基始终将反映劳苦大众的贫穷生活视作创作的主题。正因为如此，他拒绝采用邓南遮浮华、颓废的写作风格，着意在作品中描绘芸芸众生每日间阴郁、灰暗的生活。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是一些小职员或中小资产阶级人士，这些生活中的“失败者”为生存艰难地挣扎在社会的底层，努力保持自己的尊严。

小说《特曼德利奥·比亚奈利》中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内向的

未婚小职员，经济拮据，生活单调乏味。他兄弟契萨利诺也是一个小职员，为了能让其妻子贝雅特丽齐过上富裕的生活，他不惜铤而走险，挪用公款，东窗事发后自戕身亡。特曼德利奥不得不照料弟媳和两个小侄子的生活起居，久而久之他渐渐对弟媳产生了爱慕之意，但始终没有勇气向她表白心迹。贝雅特丽齐后来另嫁他人，特曼德利奥为此陷入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

《理想主义者贾科莫》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民族复兴运动的失望情绪，在控诉现实社会的同时，对穷苦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

六、马迪尔代 · 赛拉奥(Matilde Serao, 1856—1927)及其他作家

女作家赛拉奥出生在希腊港市帕特雷，母亲是希腊人。那不勒斯师范学院毕业后，曾在电报局任职员。 1882 年移居罗马，婚后与丈夫一起创办《罗马邮报》、《那不勒斯邮报》和《晨报》。与丈夫分居后，她在 1904 年创办《那不勒斯日报》，并任主编，直至 1927 年谢世。赛拉奥一生著述甚丰， 1880—1905 年是她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共写有 40 余部长、短篇小说，均以那不勒斯为写作背景，刻意描绘社会中下层人士的不幸遭遇，富有明显的真实主义的特色，故被认为是一位同维尔加和卡普安纳齐名的真实主义代表作家。她擅长描写那不勒斯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境遇，揭示那不勒斯社会的阴暗面。她的主要作品有：《幻想》（Fantasia, 1883）、《契基娜的美德》（La virtù di Cecchina, 1884）、《女孩子的故事》（Il romanzo della fanciulla, 1886）、《利加尔多 · 乔安娜的生活和历险》（Vita e avventure di Riccardo Joanna, 1887）、《乐土》（Il paese di cuccagna, 1890）、《芭蕾舞女演员》（La ballerina, 1899）等。

马里奥 · 普拉泰西(Mario Pratesi, 1842—1921)生于托斯卡纳地区圣达一费奥拉，曾任著名作家托马泽奥的秘书，后在意大利

各地执教。他的主要作品有：《追忆我的朋友特利斯达诺》（Le memorie del mio amico Tristano，1869）、《雅各波与玛丽亚娜》（Jacopo e Marianna，1872）、《乡间》（In provincia，1883）、《遗产》（L'eredità，1889）、《多尔契达的世界》（Il mondo di Dolcetta，1894—1895）、《医生的罪孽》（Il peccato del dottore，1902）等。她的作品大多以西埃纳为创作背景，描写当地农民悲惨、忧郁的生活，富有真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写作特色。

萨尔瓦托雷·迪·贾科莫（Salvatore Di Giacomo，1860—1934）生于那不勒斯，是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文学史上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他同维尔加友情甚笃，他写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及用那不勒斯方言写成的诗篇，具有明显的真实主义流派特征。他的文笔哀婉感人，其作品均描绘那不勒斯社会下层人民沦为贫困、愚昧和犯罪活动牺牲品的凄惨遭遇。他的代表作是一些短诗（十四行诗、抒情诗和小咏叹调），以现实主义的描述，刻画那不勒斯平民每日间的生活及他们的爱情故事：那不勒斯海湾秀丽的景色、湛蓝的大海、明净的天空、月光如水的夜晚等。

第五节 德·桑克蒂斯和文学评论

早在浪漫主义文学盛行期间，意大利的文学批评就显得十分活跃。随着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关注。人们通过文学批评这一新颖的文学形式，重新发现了但丁和莎士比亚作品的深刻社会意义和重大文学价值。法国著名女作家史达尔夫人曾说过：“倘若有人问我，是一部包含许多不足之处的优秀文学著作有价值，还是一部无瑕可寻的平庸作品更有社会意义，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们应该选择即使只有一星半点独创精神的作品。”她的这番话体现出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评论的准则，即评论一部文学作品时，必需将它的艺

术效果与其社会意义及作者的创作思想联系在一起考虑。在 19 世纪末叶的数十年中，意大利文坛上涌现出一批才华横溢的文学批评家，其中较有影响的有：马志尼、卡塔奈奥、卡尔洛 · 登加(Carlo Tenca，1816—1883)等，而德 · 桑克蒂斯则把文学评论推向了另一个新的高度。

弗兰契斯科 · 德 · 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1817—1883) 生于意大利南方坎巴尼亚地区莫拉城，早年曾在那不勒斯求学，1833 年起在那不勒斯纯粹派作家巴西利奥 · 波奥迪(Basilio Puoti) 门下攻读诗文，不久应聘在一家军事学校执教。1848 年，他同学生一起，为反对异族统治和争取意大利独立，积极参加那不勒斯街头激烈的巷战，因而被捕入狱；1853 年获释后被迫逃往国外。尔后，他曾在都灵一所女子学校执教，1856 年迁居瑞士苏黎世，并在当地一所理工学院教授意大利文学。他于 1860 年返回意大利南方，被加里波第任命为坎巴尼亚地区阿凡利诺的总督；翌年，因意大利总理加富尔的推荐，他被晋升为公共教育部部长。嗣后，他先后 3 次出任众议院副议长之职，同时在那不勒斯大学教授比较文学 1883 年病故。德 · 桑克蒂斯一生著述富宏，主要作品有《意大利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1870 ）和《批评论文集》(Saggi critici，1866)等。

如以时间来划分的话，德 · 桑克蒂斯的文学批评大致可分成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848 至 1856 年侨居苏黎世为止 第二阶段从 1856 至 1869 年计划撰著《意大利文学史》为止 第三阶段指的是 1869 年之后他的暮年期。在第一阶段中，德 · 桑克蒂斯就文学批评的方向及如何估价法国文学等问题，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在那 8 年中撰写的论文观点明朗，锋芒毕露。在这一场唇枪舌战中，他与众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和独辟蹊径的艺术观点已崭露头角，表现出他非凡的才能。他拒不接受当时颇为流行的抽象强调作品内容的美学观点，尽管持这种观点

的人每每从浪漫主义或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理论中引经据典，企图以此作为有力的佐证。德·桑克蒂斯认为,黑格尔的观点只是在理论上抽象地承认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而实质上,内容与形式,形式与思想却被截然分隔开来,因为抽象的概念往往使文学作品的艺术光华黯然失色。他指出：抽象地从美学角度肯定或否定一部文学作品的观点都是不足取的，正确的态度是历史地对它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仅仅以道德观念或抽象内容来鉴别艺术作品是错误和荒谬的，因为这两者都不是检验作品艺术效果的准绳,而只是它的先决条件或前提 同样,简单地按内容将文学作品划分成入时或过时、进步或落后的主张也是不值得推崇的，因为一部作品的思想内容也许同时代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相吻合，但它却因情节平庸乏味而收效甚微。德·桑克蒂斯对那些盲目追求形式美的修辞学家、语法学家十分反感,并把他们贬低成一群舞文弄墨、不厌其烦高唱‘ 形式是诗歌的根本 ’的拙劣文人和耍弄漂亮句子的油漆匠。

德·桑克蒂斯特别讨厌那些纯艺术的鼓吹者,他指出 启蒙运动民主派诗人帕里尼赋予了意大利文学以新的生命，因为他是第一个富有思想和情感的新文化诗人，他的诗句充盈着宗教、政治、道德的激情；帕里尼不是一个拘泥于形式而不顾内容的纯艺术诗人,他通过诗歌抒发思想感情,他既是一个爱国者、天主教信徒和哲学家，又是一位感情奔放的情人和诚挚的朋友。德·桑克蒂斯对纯艺术论的热心支持者们说“: 是的,人们要求文学艺术家创作出珍贵的艺术品。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这也是千真万确的。我也知道,鸟儿啼啭是为了唱歌,但是鸟儿美妙的歌声所表达的是它自己本能的需求和感情。一个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人，倘若他缺乏灵感,因袭旧习,没有信念、感情和抱负,那么他能表达些什么呢 ?’

德·桑克蒂斯反对内容抽象、形式空洞的文学作品。他认为：

文学批评的关键在于寻求和研究理想的情景。何谓情景呢？它是内容、素材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体，是有血有肉的、富有生命力的客观事物。以妻子另有新欢为例，这本是一个抽象的内容，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它并不构成富有诗意的情景，因为它向人们启迪的，只是爱情和义务之间永恒的矛盾；但是但丁在《神曲》“地狱篇”第5歌中描写的佛朗齐斯嘉与其小叔保罗之间的男女私情却使人潸然泪下，并成为民间脍炙人口的佳话，那是因为但丁以他旷世少有的天赋，把这出爱情悲剧写成13世纪流行的爱情诗，使原先抽象的内容具体化，并使它转化为感人肺腑的情景。一个现代诗人完全可以从古代神话中采撷创作素材，但他必须揉入新的具体内容，这样的诗篇才具有新的生命力，并给人以清新的感觉。

德·桑克蒂斯具有独创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使人耳目一新，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天赋。他的文学评论充满旺盛的战斗力，每一篇论文仿佛都是战斗的檄文，锋芒直指意大利陈旧、落后的文化传统。诚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弊端的形成是由来已久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意大利文化长期以来被置于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民族特色益臻衰微。其次，不少文人陶醉于意大利古典文化的荣耀和它在欧洲昔日煊赫的声势之中，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璀璨夺目的文学艺术使他们骄矜自夸、故步自封，因而对17、18世纪欧洲日新月异的文化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在上几个世纪的意大利文坛上，曾涌现出不少出类拔萃的作家和诗人，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只是埋头揣摩作品优美的文体，而从来不自觉地通过作品去唤醒人们的觉悟。至于那些宫廷文人，则更是闭目塞听，谨小慎微，唯恐失去主子的宠爱和欢心；他们对革新文化态度冷漠，更谈不上努力去完成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重任了。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改革的迫切性，并决意改变传统文化迂腐、落后的面貌和舞文弄墨、过度斟字酌句的拙劣文风；但是这场席卷

个欧洲的文化运动只是运用热情奔放的语言、瑰丽的想象、夸张的手法抒发对理想世界的热烈追求，它那抽象、含糊、不切实际的海市蜃楼没能激起广大民众的政治热情。纵观一千余年来的意大利文学的发展史，由于没有广大民众的直接参与，这种缺乏生命力的文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头来往往沦为少数文人抒发狭隘政治理想的工具。德·桑克蒂斯在文化艺术领域内挑起的论战旨在敞开文化窗户，让清新的凉风驱散浑浊、沉闷的空气，从根本上消除艺术家与民众、文化与国家生活、科学与社会之间长期存在的隔阂，进而建立起全民族统一的新文化。他的文学评论总是把理想与现实、普遍与特殊、一般与具体和谐地糅合在一起，对每一个作家及其作品加以全面的、历史的评论，对每行诗，甚至对每个字都以一丝不苟的严谨态度加以分析。

在第二阶段中，他集中精力研究但丁、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三位佛罗伦萨大文豪的作品及其创作思想。他撰写的许多评论但丁作品的文章具有很重要的文学价值，同那些吹毛求疵、捕风捉影地贬低但丁的迂腐们的观点大相径庭。他认为，但丁是文学家和人互为一体的光辉典范，因为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时代紧紧地连在一起，并通过诗句生动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思想、热情和斗争。在德·桑克蒂斯之前，还未曾有人能真正领悟但丁作品深渊的历史意义和不可忽视的社会价值，也没有任何人对《神曲》作出过如此精辟的剖析。事实上，在彼特拉克和人文主义文学之后，文学同国家生活成了跑在两股道上的马车，各奔东西，互不关联。德·桑克蒂斯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人文主义和文艺复兴的消极因素：在当时的意大利，知识分子几乎全部荟萃在贵族的宫廷中，文学成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艺术形式；文学既不来自民众，又不反映民众的呼声，惟独在马基雅维利的作品中，闪烁着积极向上的文艺复兴精神的火花。马基雅维利鄙夷中世纪的保皇党、禁欲主义、城邦政治体制和抑制人们思想的天主教会，勇敢地提出国家和民族统一的问

题，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意大利之所以长期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主要原因在于意大利缺乏如法国、西班牙那样团结全民族力量的魄力和勇气；圭恰尔迪尼生活的时代正值文艺复兴鼎盛期，不少人依旧躺在荣耀的桂冠上，故步自封，不求上进，以致无法看清隐藏在表面繁荣昌盛后面的危机。德·桑克蒂斯认为，圭恰尔迪尼愤世嫉俗，宣扬不可知论，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作品形象地体现了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社会外强中干的特征。

到了晚年，德·桑克蒂斯不仅继续为撰著《意大利文学史》积累素材，积极支持正在日益深入人心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他还致力于发展意大利民族文学，试图把经历过民族复兴运动革命风暴洗礼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1870—1871年间，他的代表著作《意大利文学史》在那不勒斯出版，它不仅叙述了意大利文学的发展史，而且还记载了意大利古今往昔的政治、文化、道德等方面的发展史，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意大利文明史的十分珍贵的参考书。翌年，作者又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批评论文集》，后由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于1897年整理出版，并改名为《19世纪意大利文学》，书中收集了作者生前撰写的对19世纪主要作家和诗人(如福斯科洛、帕里尼、孟佐尼、马志尼、莱奥帕尔迪等)的评论文章，可谓是《意大利文学史》的续篇。晚年的作家，文学思想益臻成熟，他不再满足于逐个评论意大利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家和诗人，而是努力描绘意大利文学发展的蓝图。他指出：现实主义文学的实质就在于突出作品中人物的个性和力量，作家必须以实际行动反对夸夸其谈的文风；创作态度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必须少谈自我，多让事实去打动读者的心。

德·桑克蒂斯为建立正确的文学评论观点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最后在对新文化的美好憧憬中结束了他战斗的一生。德·桑克蒂斯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遗憾的是，在他身后，没有人能继承和发展他的理论，唯心主义哲学家、史

学家克罗齐在数十年后甚至唯心地概括和解释他所创建的学说。到了 20 世纪，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在重新评价德 · 桑克蒂斯的文学评论思想时指出，它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原则上是相一致的。

第六节　乔埃苏 · 卡尔杜齐

19 世纪上半叶，叙事体文学作品在意大利文坛独占鳌头，而诗体文学则相形见绌。这一倾向对抒情诗的创作无疑产生较大的影响，促使诗人改变写作风格，力求语言的通俗化。正如卡尔杜齐所说，诗的语言必须高于散文语言。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人们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现实表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加上真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诗歌语言的散文体化和口语化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一件事。但当时也有一部分诗人一味追求庄重、高雅、洒脱的诗体，因而形成两种迥然不同的写作风格。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当时颇为盛行，抒情诗的创作显得缺乏生气，即使是欧洲象征派和颓废派诗歌，对意大利诗苑的影响也仅仅局限于学术界狭小的范畴之内。在意大利统一之后诗歌创作的低潮时期，卡尔杜齐的诗篇可谓是诗苑中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成为意大利文学继孟佐尼和莱奥帕尔迪之后的一面旗帜。1906 年，卡尔杜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当时意大利文学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卡尔杜齐(Giosue Carducci，1835—1907 ）生于托斯卡纳北部维尔西利亚一个医生之家，他的父亲是烧炭党秘密成员，曾热情支持过马志尼复兴意大利民族的革命活动。诗人在风景如画的托斯卡纳度过童年时代，1849 年随全家迁居佛罗伦萨，后因天赋超群，被送往比萨师范学校继续深造，毕业后开始执教。青年诗人在政治上异常活跃，因与崇古派朋友一起组织反浪漫主义社团而引起警方怀疑，被迫离开任教的学校，以零星工作维生。在这一时期

中,他厄运缠身,灾祸接踵而来 父亲病故,兄弟自尽,而他自己婚后的经济条件又非常拮据，故内心十分悲痛。1860 年,他先后在比斯陶亚和波伦亚大学教授修辞学,1890 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王国议会议员，被意大利人尊为民族诗人。诗人一生勤奋工作，晚年体质每况愈下，但仍满腔热忱地从事教学， 1907 年 2 月在波伦亚与世长辞。

卡尔杜齐毕生致力于发展意大利的传统文化，将诗歌视作表达人民心声、促进社会进步的工具。卡尔杜齐总是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民族复兴运动的进程，他的一生始终同意大利的政治命运紧密地连在一起。在 19 世纪 50 至 70 年代民族复兴运动高涨期间,他创作了诗歌《撒旦颂》(Inno a Satana)、《致朱塞比 · 加里波第》(A Giuseppe Garibaldi)，热情赞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意大利人民抵抗异族侵略的英勇斗争，称颂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为民族独立建树的不朽功勋。为了意大利统一大业的完成，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以致引起当局的猜疑和不满，下令把他调往那不勒斯教授拉丁语，但遭到诗人的断然拒绝。在这一时期中，诗人还写了一些优秀的讽刺诗，揭露上层阶级攫取胜利果实、背叛人民的卑劣行径。

1871 年意大利王国成立之后，卡尔杜齐的反叛精神渐趋温和，他的诗歌也逐渐失去昔日锋芒毕露的战斗性。他的后期作品大多从史实中采撷素材，吟咏自然景色，抒写个人缅怀往昔的感情，艺术上则追求形式的美和诗句的韵律，流露出一定的颓废主义情调。他的主要著作有《新诗集》(Rime nuove,1861—1887)、《撒旦颂》(1862)、《野蛮颂》(Odi Barbare,1877—1889)、《诗歌与韵律》(Rime e Ritmi,1898)等,其中,《撒旦颂》歌颂撒旦大无畏的反叛精神，抨击天主教会扼杀自由、阻碍历史前进的罪恶，赞扬理性的伟大和世俗生活的欢乐；《野蛮颂》则体现了诗人的艺术魅力及共和派人士的战斗激情，也显示出其反教会的感情。卡尔杜齐崇

拜古典主义诗歌，批评浪漫主义文学缺乏英雄气概的伤感情调。他认为，诗人应以丰富的感情颂扬国家的光荣历史以及人民的情操、美德和力量。他在《新诗集》的结束部分耐人寻味地写道“：诗人既不是让人取笑的寄生虫，也不是骄矜自夸、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者或惟利是图的小贩。他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手艺人，善于运用历史赋予他的浩如烟海的创作素材，为自由制作宝剑，为力量制作盾牌，为胜利和荣耀制作花环，为美女制作华贵的帽子，为信仰和爱情制作神龛。”然而，卡尔杜齐把诗歌视作纯美的艺术，他在《新诗集》中感慨地写道“：可怜的手艺人为自己制作了一支金箭，把它射向太阳，望着它扶摇直上后在空中闪烁着金光，除了这一享受外，诗人别无他求”。尽管如此，卡尔杜齐运用手中的笔，始终不渝地表达他对祖国赤忱的爱，诗文笔力雄浑，字里行间蕴含着他诚挚、深沉的情感和怀古的忧伤。

除了写诗之外，卡尔杜齐还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散文作家及文艺批评家、理论家，作品涉及文学、历史等不同的题材。他的散文简洁、庄重，注重古朴、高雅的词汇与通俗语的并用，追求句子结构的音乐感和散文体诗的神韵；他的文艺评论自成一体，遵循人文科学和浪漫主义的两个原则，既强调作品的语言和形式，也重视其内容和历史脉络，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下面节译的《童年的学校》是诗人于 1871 年 11 月在波伦亚创作的一首抒情诗：

童年的学校

……

新校舍的窗口
探出一株樱树，
略带红晕的树梢

在微风中轻轻摆动，
眨巴着眼睛的果实
晶莹透红，
它对清风叙述着
奇异的美梦。

我从窗边移开视线
回眸凝望，
远方的海湾、群山、碧空。
鸟儿欢快的啼啭，
太阳灿烂的火龙，
汇成和谐的旋律
响遏行云。
参天的古树
仿佛是守卫鸟窝的老翁，
葱茏的灌木
屏蔽着嗡嗡作响的蜜蜂，
蝴蝶翕动着双翼
亲吻花朵的脸庞

霎时间，
死亡可怕的阴影
笼罩住
生命的清泉一泓。
良辰美景
瞬息即逝，
消失殆尽
无影无踪。

我回首顾盼，
僵硬的身躯
深埋黢黑的土中，
哑然无言
纹丝不动。
耳际闻听，
鸟儿欢快的啁啾，
树枝轻声的低诉，
小溪流水淙淙。
大地回春
一派盎然的生机，
阳光底下
万物红似丹枫，
而我却觳觫不已
死亡缠绕我的命运。
直至今日，
脑际时时闪现
孩提时的朦胧，
犹如冰凉透骨的水柱
洒落心胸。

（选自《新诗集》）

第十二章 20 世纪初的意大利文学

19 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异常迅速，导致了帝国主义阶段的最后形成。为了争夺国际市场和保障经济繁荣，这些国家积极推行向外扩张的侵略政策，从而引起被压迫、被剥削民族的反抗，加剧了各列强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欧洲大陆上充满火药味的政治形势，无疑对意大利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为民族复兴运动令人失望的结果深感忧虑和苦闷。在意大利统一后的数十年中，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社会，连同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残酷的历史事实使人们清醒地看到，建立一个坚固、团结的欧洲的政治理想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而已。曾几何时，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壮志凌云，决心为希腊的自由而光荣捐躯；不少波兰和匈牙利的自由战士追随加里波第，毫不犹豫地加入为意大利独立而战的队伍；加里波第在法国中部同普鲁士军队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文学艺术领域，米兰浪漫主义诗人白尔谢为希腊巴尔嘉难民挥笔赋诗；马志尼热情洋溢地撰文颂扬欧洲的联合……遗憾的是，美好的憧憬到头来都逐一化为泡影，因为欧洲各国关心的只是狭隘的既得利益，它们对建立一个强大欧洲的计划不屑一顾。

在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下，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不再相信民主是管理国家的有效工具和文明史发展的唯一动力，认为即使是实证主义者笃信的科学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沮丧、彷徨、消极的情绪笼罩在人们的心头，有人甚至认为历史背叛了他们的理想，躲在一边为自己在轰轰烈烈的民族复兴运动中‘徒劳’的努力向隅而泣。当时意大利的情况同欧洲其他国家又不完全一样：经

济上它缺乏雄厚的基础；政治上没有坚强的领导机构，推行强权政治或向外扩张的政策纯属纸上谈兵。以交通运输为例，由于当时尚未建成全国性的交通网，国内市场迟迟无法建立，工业仍处于落后的状态。至于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南北差距则日益加深，南方各省的广大人民挣扎在贫穷、苦难的边缘线上。19 世纪末,意大利的国民经济曾一度出现过表面上的虚假繁荣，但由于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悬而未决，扩大国内市场和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南方农民生活水平的蓝图，仍为一纸空文。当时的意大利统治阶层没有能力进行大胆的社会改革，资产阶级谨小慎微、墨守陈规，缺乏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魄和胆略。人们的精神面貌普遍萎靡不振，感到前途十分渺茫，即使那些寄希望于军事实力的人，也因意大利政府借助外交攻势解放威尼斯和罗马而感到十分气愤。 20 世纪初,德、英、日等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雄厚,不少意大利人除了羡慕和妒忌以外，把繁荣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战争上，企图凭借武力来恢复意大利在历史鼎盛时期的荣耀。当时，这种企图以战争致富的思想颇有市场，致使民族主义狂热分子对软弱无能、瞻前顾后的政府产生强烈不满，收复德兰托和的里亚斯特失地的呼声日趋高涨。在整个欧洲，民族主义情绪犹如疾风中的野火一般到处蔓延，德意志帝国宰相俾斯麦式的现实主义强权政治博得了欧洲各列强的高度赞扬。

第一节　颓废主义文学

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 其一,极力反对 19 世纪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把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视作‘ 散发出大众汗水酸味的糟粕 ”其二,不加鉴别地全盘接受欧洲其他国家非理性主义的文化艺术，把理想和现实搁在对立、抗衡的位置上。欧洲的颓废主义文学思潮（尤其是法国的象征派和

高蹈派),以及在美国颇为流行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唯灵论等哲学思想，得以轻而易举地在意大利找到了繁衍的温床。正如意大利颓废主义代表作家邓南遮所说：“试验已经结束，科学无法充实那已被摒弃的天地，平静安宁的灵魂已被科学毁灭，科学无法使那些历经沧桑的灵魂重新得到安慰……我们不想要什么真理，给我们梦幻吧，唯有生活在未知世界的阴影底下，我们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

简而言之，颓废主义反映了 20 世纪初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彷徨、苦闷和误入歧途的精神状态，其思想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它宣扬个人中心主义、悲观主义和人的变态心理,竭力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采取逃遁世俗的消极态度，以此与功利主义的现代社会相抗衡。

颓废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几种：

1. 宣扬极端个人主义,促使他人与个人、社会、历史的关系破裂 提出人不是‘政治动物”,而是一个“没有门窗的单元”,人在绝对的孤独中生活，无法同其他人建立任何联系；认为 19 世纪文人欲创建的平等、公道的社会只不过是一枕黄粱而已。

2. 迷信暴力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只有凭借战争的威力才能达到统治其他国家的目的；主张“超人”凌驾于一切普遍规律和道德观念之上，专政必须取代软弱无能的议会制。

3. 否定科学、理性以及人认识现实的可能性；认为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外部世界是一个不存在客观规律的非有机整体，只有诗歌的直觉才能建立人与生活的联系。

4. 贬低散文、诗歌创作中的逻辑推理，反对采用民间语言从事文学创作，追求超然物外、富有音乐感的语汇。

5. 提倡形式主义，否定文化遗产，拒绝文化传统。

诚然，20 世纪初的欧洲文学并非一团漆黑，颓废主义思潮只

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现实消极、失望的精神面貌，它使许多文学艺术家成为同社会分庭抗礼的反对派。尽管如此，他们在作品中还是从侧面暴露了当时社会的政治危机、艺术家的孤独和人们的绝望心情，从这一层意思来说，颓废主义也有其一定的积极因素。比如，意大利著名小说家、戏剧家皮蓝德娄擅长在他的小说和剧作中，以离奇、荒诞的情节表现主人公双重人格的冲突，寓意隽永，耐人寻味，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没落意识。

颓废主义文学诞生在 19 世纪末拿破仑三世执政的法国,后逐渐传播至其他欧洲国家，其代表作家有法国的魏尔伦、兰波、马拉美 英国的王尔德 德国的里尔克 奥地利的霍夫曼斯塔尔 意大利的帕斯科里、邓南遮、福加扎罗等。近年来，不少西方文学批评家把‘ 颓废主义 ’视作一种中性文学流派 ,并将 1890 至 1945 年这一历史时期称作‘ 颓废主义文学阶段 ”。

一、嘉勃利埃莱 · 邓南遮 (Gariele D’Annunzio 1863—1938)

邓南遮是意大利 19 世纪后期至 20 世纪前期最富有艺术才华和政治影响的一位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 ,他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以及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才智和声望至今在意大利仍是脍炙人口的美谈。

1. 生平和创作

邓南遮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风光旖旎的海滨城市佩斯卡拉，其父在政治上颇为显赫 ,是当地十分富有的地主。早在少年时代 ,他读书勤奋 ,博览群书 ,逐渐显露出超群的文学天赋。1879 年 ,年方 16 岁的邓南遮从卡尔杜齐的《野蛮颂》中得到启迪 ,他为此诗兴大发 ,奋笔疾书 ,不久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诗集《早春》(Primo vere),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1881 年 ,他读完中学后迁居罗马 ,开始

同当地的文学界和新闻界的名流人士有了频繁的接触。在侨居罗马的十余年中，这位一头金发的年轻诗人充分发挥他在文学方面的聪明才智,以另一部诗集《新歌》(Canto Novo，1882) 博得了文学界人士的普遍赞扬。诗集抒情色彩浓重，抒发了对宇宙的神往，热情讴歌了生活的欢乐和大自然的美，体现出自然主义的艺术风格。由于他才思敏捷,英俊潇洒,风度翩翩,不久便成为罗马名流人士门上的嘉宾。在这一时期中，邓南遮沉湎于罗马上流社会豪华奢侈的生活,频繁出入文艺沙龙;他多次坠入爱河,甚至为了自己心爱的女子而与他人决斗。这一段放荡、纵欲的生活经历后成为他不少文学作品的主旋律:颂扬及时行乐的人生观,美化个人主义的颓废生活，追求华丽、细腻但脱离现实的唯美主义写作风格。1889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欢乐》(Il Piacere) 描写的正是作者熟悉的罗马上流社会的风流韵事，反映了罗马上层人士的艺术鉴赏力和对高雅风格的追求；它与随后发表的《无辜者》(L'innocente，1892)和《死亡的胜利》(Trionfo della morte，1893)组成了当时在意大利文坛风靡一时的"玫瑰三部曲",为作者在欧洲文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

邓南遮在他早年的文学创作活动中,善于从各种文学流派(不管是法国的自然主义还是意大利的真实主义)中吸取养料,以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开阔自己的创作视野。不久,他便开始厌倦自然主义的写作风格,认为这种文体过于单调,语言也欠凝重洗练,不能给人以艺术上美的享受。他指出：自然主义或真实主义作家没有精深的文学造诣,他们运用的词汇局限性很大,故句子的段落千篇一律,缺乏节奏和韵律,表达的思想也含糊不清。尔后,他开始模仿俄国著名小说家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写作风格，但不久又因新的尝试不合心意而半途而废。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以法国高蹈派的风格为楷模,致力于改革意大利传统的赋诗法,但后来又对 19 世纪法国诗人魏尔伦和比利时象征派诗人梅特林克倦

怠、孱弱、忧伤的诗歌情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从邓南遮变化多端的创作风格中，我们可以窥见他那热情奔放、追求新奇和不愿规行矩步的性格。

1895 年前后，邓南遮自称“新一代的先驱”，开始以唯美主义理论颂扬民族主义精神和“超人”的作用，在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激起很大的反响。他曾为一家杂志社撰写文章，以明确的语言毫不隐晦地号召青年人振作起精神，无畏地荡涤污泥浊水和沉渣浮沫，以夺回列奥纳多·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所描摹的美好、理想的世界。他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不畏艰险的骑士风范以及迷惑人心的唯美主义观点，赢得了不计其数的年轻人的景仰和崇拜，激励着他们为建立一个“强大、光荣的意大利”而至死不渝地努力奋斗。

邓南遮在文学上才华出众，在政治上狂妄自大，生活上放荡不羁，为此蜚声意大利文坛。在 1895 年的希腊之行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众议院议员，其政治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将这一突变称为“走向生活”。至于他的个人生活，有关他风流、淫荡的绯闻不胜枚举，其中名噪一时的要数他同当时遐迩闻名的戏剧演员杜珊之间的一段艳史，他为此著述小说《火》（Il fuoco，1900）。他在富丽堂皇的别墅里下榻，过着文艺复兴时期王孙贵族式浮华奢侈的生活，同时积极参加飞行试验。由于他挥金如土，不久就把万贯家产挥霍殆尽，为逃避债主的纠缠，他不得已逃往法国。1915 年他返回祖国，表示支持政府对奥地利和德国宣战的决策，并先后在陆、海、空服役，拥护法西斯主义，效忠墨索里尼；1918 年 2 月 10 日，他在南斯拉夫布加利港口的海面上奇袭奥地利军舰；1915 和 1918 年他两次驾驶飞机前往的里亚斯特和维也纳，并因飞行事故失去右眼；1919 年，他率领部下奇迹般地占领了坐落在亚德里亚海上的费乌麦港口（1947 年巴黎和约后归南斯拉夫管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邓南遮的文学作品为法西斯上台作了舆论上的准

备，他所极力宣扬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法西斯的精神实质是一脉相承的。正由于如此，墨索里尼授予他封号，并下令印行其作品的全国版作为回报。但此后，邓南遮对意大利政治不再有任何影响。他退隐于伦巴第地区加尔多内一里维耶拉，写下了一些回忆录和忏悔录。1938 年 3 月 1 日，邓南遮因脑溢血猝死。翌日，墨索里尼亲自去他的别墅向其遗体告别，不少法西斯党魁参加了他的庄严肃穆的葬礼，葬礼上奏的是他本人事先选定的贝多芬四重奏交响曲。邓南遮丰富多彩的一生、他的臭名远扬的桃色新闻、他在战时的骁勇、他的能言善辩以及他在两次全国性危机中的政治领导作用，使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最引人瞩目的公众人物之一。

邓南遮的文学作品集中体现了意大利中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们的许多难以兑现的梦想似乎在他的身上均成了现实，无怪乎意共创始人葛兰西曾饶有风趣地说过：“邓南遮同意大利中产阶级一样，将古炮当作现代大炮的部件一样在摆弄着”。尽管如此，邓南遮仍不失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他在一生中不知疲倦地写下了大量体裁不一、主题各异的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诗集《新歌》、《赞歌》（Laudi）剧本《死城》（La città morta）、《琪娥康陶》、（La Gioconda）、《春日之梦》（Sogno di un mattino di primavera）；小说《火》、《死亡的胜利》、《无辜者》自传体作品《夜》（Notturno）以及《铁槌底下的火星》（La fiaccola sotto il moggio）等。

邓南遮的文学作品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这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实属罕见。作者在早年模仿自然主义和真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在诗歌方面则以卡尔杜齐的抒情诗为学习的楷模；后期，他吸收左拉、莫泊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象征派文人的写作特色，渐渐形成了他自己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他感情丰富，变化无常，在作品中追求美的享受和感官刺激，试图以栖身欢乐的大自然（浪花、雨水、灌木丛、浓郁的芳香、殷红的果实……）来躲避现实生活，以放纵情欲来忘却心中的倦怠和忧伤，字里行间充满着

作者反复无常的感情和颓废消沉的情绪。此外，邓南遮在他的作品中宣扬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鄙夷民众的力量，鼓吹帝国主义战争的强大威力，塑造的人物形象往往严重脱离现实，故事情节荒诞、离奇，给人一种虚无、空洞、炫耀的感觉。诚然，他的写作风格在不同时期中的表现形式亦不尽相同。下面的一首题为‘新月’的短诗选译自《新歌集》，是邓南遮 20 岁时写下的作品，后由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托斯蒂(Francesco Paolo Tosti，1846—1916)谱成音乐：

啊，钩形的月斜挂在西天角上，
在恬静的海面上，洒上朦胧的雾光，
啊，银色的新月，你的清辉照亮无数的梦幻，
宛如麦田里滚滚的麦浪。

和风吹拂，树叶和花朵轻轻摇曳，
林中没有歌声或呐喊的音乐
一直飘向沧溟的大海，
弥漫在万籁俱寂的夜空。

失去爱情和欢乐的生灵，
渐渐进入梦乡……
啊，弯弯的月芽，你的清辉照亮无数的梦幻，
宛如麦田里滚滚的麦浪。

2. 作品风格

邓南遮文学作品的特色是它们的自我中心的视角，流畅而音韵铿锵的文句及一种对感官的满足，无论是对女性和自然的爱，都强调到了压倒一切的程度。作为诗人，他认为诗歌是至高无上的

宇宙的和谐,他的诗歌得力于他对情感敏锐的感觉,是声音和色彩的交响乐。在《早春》和《新歌》中他已经显示出惊人的天赋,把一个爱上了自然和女人的年轻人的蓬勃朝气和青春活力精确有力地表现出来。虽然他在以后的诗作中转而写病态颓废的主题，但仍能在他成熟期的出色诗作中恢复他的灵感和生气，并且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富音乐感的形式来表现它，表达了他与自然神会时感官上的欢悦之情。

邓南遮认为生活应该像艺术一般美，将文学作品视作镶嵌画一样的艺术品，努力用文学语言雕琢出生活中美好的意境。在唯美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他的小说和剧作风格高雅,人物性格化,叙事流畅,富有雄辩力和逻辑性。邓南遮于 1894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死亡的胜利》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作者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创作特色。小说中的主人公乔尔乔面对支离破碎的家庭无所适从，心中因充满各种矛盾而深感生活的无奈;他向往完美的精神生活,但无力平息父母之间的情感纠纷,又无法抵御情欲的巨大诱惑,绝望中他想到了"死亡",最终同情人一起跳崖身亡,让"死亡"战胜了意志和感情的冲突。另外,《琪娥康陶》也是体现邓南遮唯美主义创作思想的一部典型剧作。剧中的雕塑家卢乔酷爱艺术，认为艺术是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他深爱着他的模特儿琪娥康陶,把她视作生活的激情和艺术的化身，但是妻子对他的温存和关爱使他陷入痛苦的深渊,为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他无奈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他自杀未遂,琪娥康陶和他妻子之间的公开冲突使他痛不欲生,只得以发奋的工作来忘却心中痛苦的记忆。通过这部剧作，邓南遮似乎想告诉他的读者:为探求艺术的真谛和追求生活中真正的美,人就得摆脱世俗伦理道德的约束,因为生活中美好的回忆转瞬即逝,惟独艺术的美是永恒的。

二、安东尼奥·福加扎罗（Antonio Fogazzaro，1842—1911）

福加扎罗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意大利一位遐迩闻名的唯灵论作家，他的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理智与信仰之间的冲突。

福加扎罗出生在威尼托地区维琴察城一户家境殷富的人家，1864年从都灵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后迁居米兰，婚后第3年回维琴察定居，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1860至1870年间，作者对宗教信仰产生怀疑，精神状态一度陷于危机之中，甚至对生活也失去了信心。后经友人的启迪，尤其是一个法国天主教徒虔诚的箴劝，他又一次回到基督的身边。福加扎罗的创作生涯始于1874年发表的传奇诗《米兰达》（Miranda），后期写有小说多部，较著名的有《达涅莱·科尔迪斯》（Daniele Cortis，1885）、《诗人的奥秘》（Il mistero del poeta，1888）、《古老的小世界》（Piccolo mondo antico，1895）、《现代的小世界》（Piccolo mondo moderno，1900）、《圣者》（Il Santo，1905）等。在这些作品中，作者采用"现代主义"（19世纪末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方面的一种颓废派）的写作风格，把社会、科学和基督精神糅合在一起，他擅长运用民间语言，作品的情节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罗马天主教会于1905年指控作者在小说《圣者》中宣扬现代主义思想，并把其作品列入禁书，不许在教徒中流传。作者对教会粗暴干涉创作自由的恶劣行径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毫无反抗地忍受着教会的不公正裁决，内心为此十分悲痛。

福加扎罗是意大利统一前后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他极力反对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创作思想，其作品没有真正反映时代的精神和现代主义的改革倾向，同他所处的时代有较大的罅隙。正因为如此，思想保守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他的作品颇为赏识，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与他作品中描写的世界是一致的。尽管福加扎罗在他的作品中也涉及一部分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作家。到了20世纪，

人们对他的印象渐渐淡薄，他在意大利文坛上的影响也益臻减弱。

福加扎罗的作品深刻反映了处于国家统一前夕的意大利社会在伦理道德和精神文明方面的危机，反映了现代人，尤其是贵族资产阶级面对社会变革，心中的彷徨和不安。作者擅长描摹大自然美丽的景色、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和秘密幽会，作品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创作于 1888 年的小说《诗人的奥秘》描绘了人物下意识的神秘的感受，以及人物内心的疑团和令人难以捉摸的精神状态。小说《圣者》集中反映了他的天主教自由主义思想，但小说既没有给予热心宗教改革的人任何有益的启迪，也没有积极反映当时人们的宗教感情，塑造的“圣者”形象显得模棱两可,孱弱无力。

作者在 1895 年创作的小说《古老的小世界》是他的一部比较成功的著作，故事以一对年轻情侣的婚姻风波为主要线索，情节跌宕起伏：佛朗哥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和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同露易莎的结合遭到祖母的极力反对；虽然面对失去财产继承权的威胁，这一对情人还是毅然结为伉俪，婚后寄宿在一个亲戚家里；不久，夫妇俩添了一个爱女，但因祖母从中作梗，好心肠的亲戚被革去公职；露易莎出于无奈，背着丈夫离家，为赢得财产的继承权而四处奔波，不幸爱女溺水身亡；佛朗哥闻讯悲痛欲绝，祖母则在临终前宽恕了他；佛朗哥为了意大利的独立和统一，毅然弃家上前线作战，心中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小说在问世后的数十年中颇受读者欢迎，尤其博得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的喜爱。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自传的性质，人物形象的刻画显得真切和生动，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意大利 20 世纪上半叶著名文艺评论家克罗齐在评论这部小说时说：“小说的作者运用诙谐的表现手法展示主题，对人物心理的剖析入木三分，全书凝聚了艺术家精深的文学修养,它无疑是福加扎罗最好的一部作品”。

三、乔万尼 · 帕斯科利(Giovanni Pascoli，1855—1912)

1. 生平

帕斯科利和邓南遮、福加扎罗是同时代的人，不少文学批评家把他们视作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上的三位主要作家。帕斯科利的抒情诗尽管不及邓南遮的诗文那样繁丽，但寓意深沉，韵味隽永，更具有现实主义的风采。

帕斯科利出生在意大利中部圣莫洛一个农场主的家庭，在田野中度过的童年生活为他以后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1867 年他父亲遇害，不久他的母亲、姐姐和三个兄弟也相继离开人世，这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不幸使诗人幼小的心灵蒙上了可怕的阴影。他在乌尔宾诺、利米尼和佛罗伦萨念完了中学和大学预科的全部课程，其间，由于杀害他父亲的凶手逍遥法外，加之家庭经济拮据，他在政治上开始向社会主义思想靠拢。在波伦亚大学继续深造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国际。他积极参加政治运动，赋诗颂扬无政府主义思想，故于 1879 年 9 月被捕入狱。数月的监禁生活使帕斯科利的精神世界发生突变：他心灰意懒，踟蹰不前，认定有一种超人的力量在控制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命运；他翘首企盼人人皆兄弟的理想社会的早日到来，在作品中宣扬基督教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1882 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开始在一所中学执教，同时研究拉丁文学，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在文坛渐露头角。卡尔杜齐逝世后，诗人应聘接替他在波伦亚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学，后殁于该城。

2. 政治理想与创作风格

1871 年意大利统一之后，人们对前途普遍丧失信心，昔日的政治热情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日趋减弱。巴黎公社和无政府主义

思潮使欧洲资产阶级胆战心惊,他们进退维谷,被迫在接受和抵制社会主义这两者之间作出抉择。对卡尔杜齐这一代人来说“社会主义”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可是到了 20 世纪初,知识分子已不得不就“社会主义”表明自己的立场,容不得半点含糊。

帕斯科利是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之后第一代抒情诗人中的佼佼者。他曾倾向社会主义,但同时又接受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以及蛊惑人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影响。诗人曾百感交集地表示 神话永远不能把人们从痛苦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它只能使他们丢弃信仰,而信仰曾慰藉过他们破碎的心,使摆脱了痛苦和死亡威胁的人们对未来尚存一丝希望。到了晚年，他转而支持意大利的侵略战争。

帕斯科利的诗歌风格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他来说,童年生活的回忆是诗歌创作的唯一源泉。他认为 童年是人生最富有诗意的时光，真正的诗诞生在对童年生活的追忆之中 童年是诗人的象征,因为人在孩提时代有着无穷的想象力,在美丽的梦幻中,他同牲畜、树木、石头、云彩、星星等一切生灵都能沟通思想感情。帕斯科利在论述其诗篇同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时说“:诗人总是生活在梦境与幻想、往昔与未来之间……他逃离小资产阶级的世界,犹如苍鹰一样,展翅飞往夕阳照耀下的一望无垠的神秘原野”。他指出 诗人无法披露社会现实,因为艺术不是认识现实的工具,它只是一首充满痛苦、奥秘、热情和忧伤的抒情诗；诗歌存在于事物的内部，要靠我们用敏锐的目光去发现它，而惟独纯洁无瑕的孩子才有此种天质，因为人在童年时代是凭直觉认识事物的,它不夹带任何矫揉造作的因素 诗歌犹如天真烂漫的孩子一样,帮助人们忘却旧日的冤仇,使他们在互助互爱精神的感召下团结起来 世界正处在大风暴的前夜,童年生活的回忆使人们忘却心中的忧伤,赋予他们大自然美丽的景色和生活的欢乐,即使是离乡背井和在异国谋生的人，仍时刻思念着家乡的山水和孩

提时代金色的梦幻。

帕斯科利生性易怒，感情丰富，对事物有强烈的好奇心，在艺术方面追求感官上美的享受，这在他的抒情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的作品都以童年为主题，但是诗人笔下的童年生活不光是他多愁善感的秉性和他家庭悲剧的组合，它还反映出诗人的政治态度和日趋成熟的宗教仁爱思想。诗人在回首往事的描述中，每每把客观历史事实和个人的思想感情糅合在一起，但由于他世界观的局限，诗篇中反映的客观现实往往显得抽象和空洞，童年岁月的描绘也给人以单调、乏味的感觉。诗人的社会主义思想空洞朦胧，他既不理解工人运动的理想和需求，也没有广大民众砸碎锁链从被压迫的境地中解放自己的气魄。他的作品没有积极暴露现实社会中的弊病，也没有为人们指出新的生活道路，就气质而言，它同真实主义文学的作家迥然不同。

诗人擅长运用象征和比喻的艺术手法，惟妙惟肖地勾勒大幅自然画面，启示人们以基督精神为准绳友好相待。 1891 年，帕斯科利的第一本诗集《柽柳》（Myricae)问世，初版时共收入 20 多首诗。与此同时，诗人开始用拉丁语从事诗歌创作活动，并因成绩卓著而蜚声国际诗苑，曾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诗歌比赛中多次荣获金奖。在诗集《柽柳》中，年轻的诗人以洒脱、流畅的笔调描摹了大自然旖旎的风光和他自己心中的感受；作品采用比喻的手法，赋予广阔田野中一些微小的生物以深沉的含意。尔后，他还写有《小诗集》（Poemetti）、《宴会》（Poemi conviviali）、《颂诗和赞美诗》（Odi e Inni）、《意大利颂》（Poemi italici）、《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诗集》（Poemi del Risorgimento ）等诗作和散文作品若干。下面的一首短诗选译自诗集《柽柳》：

田野里，铁锈红的树丛中
葡萄叶折射出片片阳光

灌木丛中弥漫着轻纱般的晨雾，
有人轻声吆喝着耕畜
有人慢慢赶着乳牛；
有人播撒着种子，
有人挥动锄头在垄上松土。
栖立在光秃秃桑树上的麻雀
留神望着没盖上土的种子
那是它们日后充饥的食物，
灌木丛中到处闻听
长尾鸲银铃般的歌声。

另外，帕斯科利还是一位有独特见解的文学评论家。他除了写评论和注释但丁的作品外，还在 1895 至 1897 年间著述了两本拉丁语作品评论选集,为此,他在文学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第二节　佛罗伦萨的文学刊物

在意大利收复罗马到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段时间（1870—1915）里，意大利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均取得了全面的发展，因为当时平静的国际政治形势有利于意大利整顿国内的经济和改组行政机构。国内的某些关键经济部门，如铁路网和基础工业,在外国资本的参与下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同时,意大利竭力加强它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同俾斯麦的德国和弗朗兹·约瑟夫的奥地利组成三国同盟，采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仍然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虽然其农业由于国外市场价格下跌、大部分农村条件落后和疟疾流行而遇到重重困难，但是其工业在此期间却取得了全面的增长。然而，城乡之间明显的差异导致了南方频频发生农民反对沉重捐税负担的抗议活动；工业无产阶级

则渐渐组成一些政治团体和工会。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以焦利蒂首相为代表的温和派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1914 年 7 月 28 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意大利国内的中立派和主战派处于相互对峙的僵持局面。面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文化界人士普遍显得彷徨和不安，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各种幻想，探索着自己该走的道路。在 20 世纪初的 15 年中，不少文学杂志社在佛罗伦萨相继成立，无论是杂志创办的宗旨还是刊载的文章内容，都反映了意大利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形势和文化踟蹰不前的状态。

这些文学杂志一般都由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士担任主编，目的是为了寻求新颖的文学创作题材，打开通向欧洲其他国家的窗户，更新长年来文学领域内沉闷、迂腐的学术空气。就创办时间的先后言，名列前茅的要数安乔洛 ·奥尔维埃多(Angiolo Orvieto)于 1896 年创办的《马尔左各》（Marzocco ,佛罗伦萨城标 :一头举前足而跃起的雄狮，右足持有一块刻着百合花纹的盾牌）。该杂志在传统文学与唯美派、未来派以及民族主义文学中间起着协调的作用，邓南遮和帕斯科利都曾为它撰写过文章。

由乔万尼 · 巴比尼（Giovanni Papini)和朱塞比 • 伯雷佐利尼（Giuseppe Prezzolini)主办的《列奥纳多》（Leonardo，1903—1907)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上一本颇有影响的哲学性刊物。一开始,该杂志并没有明确的文学方向,邓南遮的唯美主义和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唯心主义对它都有较大的影响 尔后,它成为实用主义者的战斗武器,具有明显的反社会主义、反民主精神倾向,带有一定的神秘主义色彩。追随这本刊物的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政治上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在艺术上则把生活理想化，追求唯美主义 ,反对墨守陈规 在生活上,他们崇拜自然,向往高尚的精神生活,富有探索精神。《列奥纳多》犹如一面明镜,清晰地折射出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要求革新的强烈愿望，他们决心摆脱陈规陋习的羁绊,快步跟上欧洲其他国家文学前进的步伐。《列奥纳多》开拓

了意大利文艺界的视野，为传播欧洲新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03—1907 年出版的《王国》(Il Regno)是民族主义的喉舌，它为反对意大利政府懦弱卑怯的政治态度以及日益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声呐喊。该杂志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他们竭力摆脱纯文学的倾向，热切希望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向往建立一个“强人”的社会。应该说,他们的政治态度同社会上憧憬帝国主义、颂扬战争的右翼势力是一脉相承的。1904—1906 年出版的期刊《赫耳墨斯》(Hermes)由西西里作家、文艺评论家鲍尔杰赛创办，它颂扬唯心主义哲学、贵族文化和个人主义，把邓南遮誉为意大利最伟大的现代诗人。该期刊年轻的合作者们积极探索真理，对意大利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复兴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呼声》(La Voce) 由朱塞比·伯雷佐利尼创办于 1908 年,它遵循浪漫主义初期《调解人》的文学路线,就意大利南北差异、全民选举、学校教育、利比亚战争以及收复失地等重大社会、政治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呼声》派文人在政治上反对政府采取的调和折衷政策，在文学上摒弃邓南遮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主张建立彻底改变文人形象和文艺作品创作风格的新文化。1913 年之后，《呼声》内部人员思想上产生分歧，后逐渐发展成为纯粹致力于文学创作的一本杂志。不久，伯雷佐利尼辞去主编职务,《呼声》在朱塞比·德·罗贝尔迪斯(Giuseppe De Robertis)的领导下，将重点转向介绍文学作品和刊登文艺批评。尽管如此，《呼声》仍不失为当时佛罗伦萨的一本重要文学刊物，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以及他们对社会现实所持的不同立场，介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和创作思想。

继《呼声》之后，巴比尼和另一位佛罗伦萨作家兼画家阿尔登格·索费奇(Ardengo Soffici)于 1913 年创办文学杂志《拉切尔巴》(Lacerba)。与《呼声》派文人在政治上反对政府调和折衷政策

不同的是,《拉切尔巴》的追随者主张与传统决裂,提倡通过革命把人们的思维方式从一切陈旧的政治、历史、宗教及道德观念中解放出来，因为真正的革命是从“清洗头脑”开始的。就艺术观而言，《拉切尔巴》向一切传统的文学艺术提出论战,追求“纯艺术”的道路。正因为如此,未来派文人同《拉切尔巴》互相呼应,尤其在鼓吹民族主义精神和战争的威力方面更是一拍即合。直至 1915 年停刊,《拉切尔巴》发表过未来派主要作家马利奈迪、巴拉柴斯基、戈沃尼和福尔格雷等人的作品，还介绍过当时一部分意大利著名诗人和欧洲文坛上颇有影响力的法国诗人的诗作。

以上这些文学杂志创办的时间前后交错，但主编总不外乎是那么几个人：他们对现实不满，对未来缺乏足够的信心，这在客观上助长了右翼势力的抬头。事实上，当时小资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人极力反对政府旨在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一味宣扬战争的有利因素，热情支持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伯雷佐利尼曾在 1912 年 12 月出版的《呼声》上撰文写道“:战争是历史号召各国人民进行力量总检阅的一种形式。一切健康的力量，即使是隐藏在内部的力量，都将在战争中显露原形。”撇开佛罗伦萨文学杂志的局限性和消极因素不论，应该说，它们对 20 世纪初意大利的政治和文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造就了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新闻和散文体作品的创作铺平了道路。

第三节　黄昏派文学

20 世纪初,抒情诗和叙事体文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作家们摒弃 19 世纪传统的写作风格，努力探求新颖的创作路子，涌现出一些不同的文学流派。其中，不少人创作思想十分活跃，往往具有不同流派的倾向，并不断在文学创作方面进行新的探索和尝试。

在众多的文学流派中，黄昏派文学是当时一种颇有影响的诗

歌流派，其名称是西西里作家、文学评论家鲍尔杰赛提出来的，指的是意大利诗苑继福斯科洛、莱奥帕尔迪、孟佐尼之后出现的黯淡无光的衰落现象。“黄昏派”这一名称恰如其分地综合了当时一些抒情诗人的精神面貌和写作特点：他们擅长描写小城镇中灰暗、单调的生活,阴暗的小房子,惊惶失措的女仆,偏僻的小车站,修道院的会客室，医院里凄凉的氛围等。他们作品的特点是毁灭、怀念，喜欢简朴的事物，以及直率、毫无修饰的风格，表现出诗人落寞苍凉的心态。黄昏派诗歌不注重反映工业化世界的面貌，主旋律不外乎是人们每日间的不幸遭遇或在暗中流泪的可怜人儿。黄昏派诗人将自己视作一个心灵深处蒙受创伤的失败者，喜欢栖身于想象中的过去或神话般的童年之中。

黄昏派诗人采纳 19 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和豪放不羁派文学的创作风格，模仿帕斯科利、邓南遮，尤其是法国和比利时诗人的赋诗法，善于在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上花笔墨，人物形象生动而富有感情。黄昏派的代表诗人是戈拉齐尼，21 岁时他就因患肺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著有抒情诗集《痛苦的酒杯》（L’amaro calice）、《散文诗》（Poemetti in prosa）、《无益的书》（Piccolo libro inutile）、《周日的傍晚》（Libro per la sera della domenica）等。他的诗歌富有颓废派的风格，诗句往往带有倦怠、哀伤的情绪，抒发自己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忧闷和惆怅，流露出诗人厌世的伤感和对爱情的失望。黄昏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都灵诗人戈扎诺，他的诗歌长于描写，风格精巧，幽默而不事声张。除诗集外，他还写有两册短篇小说集和印度游记《世界摇篮之行》（Verso la cuna del mondo），主要描写主人公在实现了游历印度这一神秘、美丽国土的夙愿后心中的失望和惆怅，带有明显的颓废情调。戈扎诺的诗歌熔唯美主义和自然主义于一炉，奔放的激情与嘲弄的口吻每每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与未来主义一样，黄昏派诗歌接受欧洲颓废思想的影响，是对邓南遮堆砌华丽词藻的修辞的反动。黄昏派没

有形成影响力很大的文学流派，入伍者对任何哲学、宗教、政治和科学上的理想一概不相信，对现实和历史持冷漠和嘲讽的态度，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意大利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黄昏派诗人通过诗歌语言启迪读者，历史已处于黄昏落日的阶段。所以，从反映当时的社会精神面貌来说，黄昏派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这个文学运动就归于沉寂。

黄昏派诗人注重描写平庸的小事，格调凄切而低沉；而未来主义派文人却恰恰相反，他们积极颂扬‘无畏和叛逆’的精神，呐喊声中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在反对虚文俗套的同时，对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一、安东尼奥 ·鲍尔杰塞(Antonio Borgese，1882—1952)

鲍尔杰塞生于西西里巴勒莫省波利齐－杰奈洛萨，毕业于佛罗伦萨大学文学系。他是一个富有战斗力的文学评论家，曾在意大利的两家主要报纸《新闻报》和《晚邮报》，以及由意大利 20 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哲学家克罗齐创办的《评论》杂志上发表过一系列评论文章，后收入 3 卷本《生活与书》（La vita e il libro，1910—1913）中。1904 年，鲍尔杰塞在佛罗伦萨创办文学杂志《赫尔墨斯》。旅居德国多年回到意大利后，曾在罗马大学教授 7 年德国文学史，后又在米兰大学开设美学课。他讲授的课引起了青年学生广泛、浓厚的兴趣，为此他在意大利文化界名声大振。1931 年，由于政治原因，他迁居美国，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一直在芝加哥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学。其间，他还用纯正的英语出版过几本评论集子，引起美国评论界广泛的关注。1951 年他回到祖国，翌年殁于罗马。

鲍尔杰塞是一位思想十分敏锐的文学评论家，其观点颇为新颖。除文学评论，如《嘉勃利埃莱 · 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评论史》（Storia della critica

romantica in Italia ）和《意大利统一时期的诗学》（Poetica dell’unità ）以外，他还写有一些叙事体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小说《罗培》(Rubè) 和《生者与死者》（I vivi e i morti）:《 罗培》主要描述小说主人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无法找回心态的平衡；《生者与死者》则描写人类面临死亡时惊惶失措的心情。他的长短篇小说文笔独特,行文明畅,寓意深远,富有浓厚的抒情味。

二、萨尔乔 ·戈拉齐尼(Sergio Corazzini，1887—1907)

戈拉齐尼生于罗马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破产后,家庭生活陷于贫困,不得已在一家保险公司供职,过着凄惨、阴郁的生活。后又不幸患上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20 岁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他的诗歌正是他一生的写照,诗作充满了低沉、忧郁的情调,抒发他生活中无尽的忧伤和痛苦，体现了诗意和命运融为一体的独特创作风格。以下所译的三节诗选自《戈拉齐尼抒情诗集》（S. Corazzini ，Liriche）:

你为何把我称作诗人？
我不是诗人，
我只是一个终日掩面而泣的少年。
你看，我能奉献给寂静的只有哀痛的泪水。
你为何把我称作诗人？

我有着同许多人一样的悲痛
我喜悦的原因又是如此的简单，
如实说，我会羞得满脸绯红。
今天我产生了死亡的冲动。

我想死，只因为我心力交瘁，

只因为教堂花玻璃窗上的天使
让我想起了爱与愁，
我浑身不停地颤抖。
如今的我就像一面镜子
像一面充满忧伤的镜子，
惟命是从。
你看，我不是诗人，
我是一个忧伤的少年，
死亡的阴影笼罩心头。

三、圭多 ·戈扎诺(Guido Gozzano，1883—1916)

戈扎诺生于比埃蒙特地区阿利埃，早年学过法律，不久便开始习诗。戈扎诺思维敏捷，感情细腻，始终渴望能过上淳朴、健康的生活。遗憾的是，他自幼患有肺结核，成年后不得不远离上流社会的社交圈。为了康复，他去印度旅行，但徒劳而回，为此他写有散文集《世界摇篮之行》。1916 年他殁于都灵,时年仅 33 岁。他的 2 本童话集和 2 本短篇小说集，均于他身后出版。

戈扎诺的生活体诗作富有散文的韵味，其意境与黄昏派文学作品如出一辙 歌咏低沉、沮丧的心绪,描绘每日间阴郁、灰暗的生活，抒发失去信仰的人内心的怅惘。与其他黄昏派诗人不同的是，戈扎诺的抒情诗以敏锐的目光看待人生，在嘲弄中抒发人作为没有了神话的时代之子的悲痛，略微带有莱奥巴尔迪抒情诗的韵味。戈扎诺的诗歌既有现实主义的特征，又有浪漫主义的色彩；既有奔放的生活激情，又有讥讽的嘲弄。在他看来，生活犹如一场梦，而梦是没有时间或空间限制的。

像其他黄昏派诗人一样，戈扎诺也将邓南遮的抒情诗视作自己效仿的楷模,在这一方面,他于 1907 年发表的第一部抒情诗集《逃遁之路》(La via del rifugio)便是明证。1911 年问世的《对话》

（I colloqui ）则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和黄昏派文学的倾向，该诗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代文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荡涤了黄昏派作家和诗人自命清高、谦卑恭顺的处世哲学，取而代之的是未来主义充满激情、语言浮夸以及号召横扫一切传统文化的文艺思想。

下面所译的几节诗选自诗篇《当她不在的时候》（L'assenza）：

我弯腰趴在阳台边上
面颊轻轻贴着栏杆
爱人今晚就要回来
我不再感到忧伤

夏季正匆匆离去
朱红色天竺葵上的一只大蝴蝶
蹁跹飞舞
不停地扇动着双翼

瓦蓝色无边的天幕
宛如绷紧的绸缎
暮色中依稀可见
斜挂在西天角上的半痕新月

池塘里的水波光潋滟
青蛙却哑然无言
蓦然眼前闪过一抹光亮
羽毛艳丽的翠鸟跃出了水面

我并不感到忧伤

花园里的景色让我惊诧不已
若问原由,那是因为
心中初次萌发童真的感情

为何我如此诧异?
因为花儿已面目全非
尽管玫瑰和天竺葵
依旧如绣似锦

四、马里诺·莫雷迪(Marino Moretti,1885—1979)

莫雷迪生于意大利中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福尔利省契赛纳迪科。1902年,他随其父亲迁居佛罗伦萨,在那里的一所戏剧学校学习舞台表演。由于他自幼酷爱托斯卡纳方言,不久便放弃当一名演员的初衷,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后来,他旅居罗马,结识了黄昏派主要诗人戈拉齐尼,并同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对他早期抒情诗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05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友爱》(Fraternità),接着又于1910年推出《铅笔写的诗》(Poesie scritte col lapis)。他的早期诗作秉承了帕斯科利和法国诗人、小说家亚默作品中的田园风格和亲切笔调,充满了对童年岁月的回忆和对恬静乡村生活的遥想,富有浓重的黄昏派诗歌特征。除诗歌以外,莫雷迪还创作了不少叙事体文学作品,文笔朴实,格调平和,往往以社会下层人民卑微的生活环境为写作背景,其中较主要的有:《周末的太阳》(Il sole del sabato,1916)、《上帝的声音》(La voce di Dio,1920)、《纯洁的心灵》(I puri di cuore,1923)、《菲奥拉万迪寡妇》(La vedova Fioravanti,1941)、《绿色的蝴蝶结》(Il fiocco verde,1948)、《节操》(Il pudore,1950)、《新人的婚房》(La camera degli sposi,1958)。进入暮

年后,莫雷迪重又发表诗作,较著名的有《最后的夏天》(L'ultima estate,1968)和《三年零一天》(Tre anni e un giorno,1971),抒发一位桑榆暮景中的诗人内心的感受，具有训世格言式的风格。1979 年莫雷迪死于故乡,终年 94 岁。

第四节 未来主义文学

1909 年 2 月 22 日,意大利诗人马利奈迪在法国《费加罗报》上发表《未来派文学宣言》(Manifesto della letteratura futurista),全面阐明该流派成立的宗旨和发展方向，在当时颇有号召力。他在声明中指出:诗歌应该义不容辞地赞咏现代生活中诸如机器、战争等生气勃勃的新生事物，因为暴力乃是反对传统习惯势力和反映个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真正的美来源于斗争,一辆带有引擎盖板和通过汽缸中气体的爆炸呵着气的炮车，要比古希腊著名的胜利女神雕像来得美;必须取消博物馆、图书馆和一切艺术团体,人们应该行动起来为反对道德观、女权运动和机会主义思潮而出力;诗人应努力赞颂战争的威力、爱国主义的热忱、民众的叛逆精神,以及工业和科学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声明的结束部分，诗人慷慨激昂地写道：我们在意大利向全世界发表这一气壮山河的公告，我们以它为未来主义的准绳,因为我们欲将我们的国家从教授、考古学家、西塞罗的门徒和仿古者们的重围中拯救出来。该宣言提倡暴力和冲突，号召横扫一切传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标准。宣言的文笔充满激情,语言浮夸;宣言的格调是进攻性和煽动性的,并且故意要刺激群众愤怒和惊异,挑起论战和吸引举世的注目。

在马利奈迪的支持下,意大利画家、雕刻家翁贝尔托·波丘尼(Umberto Boccioni,1882—1916)联合其他一些画家在 1910 年发表了几篇绘画方面的宣言,美化艺术的独创性,鄙夷传统的文化艺

术，强调把情绪投入现代生活的动态。未来主义派画家喜欢用奔驰的汽车和火车、正在比赛的自行车运动员、舞蹈者、动物和熙熙攘攘的城市群众作为题材，它们所作的画颜色鲜艳活泼，并且显示出充满动感和活力的构图。1912 年春，波丘尼又发表了一个关于雕塑的未来主义宣言，并运用这一艺术手段完成了具有高度创造性的雕塑作品。波丘尼后来于 1916 年在服军役期间死去，未来主义也逐渐衰落，不再是视觉艺术中的一支重要历史力量。

除了 1909 年的宣言之外，马利奈迪还自己动笔或参加草拟一系列关于诗歌、戏剧、建筑以及其他艺术的宣言。马利奈迪曾先后到英、法、德、俄进行宣传，对那里的文化艺术，尤其是俄国的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腓利波·托马索·马利奈迪(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1876—1944)

马利奈迪是意大利裔法国散文家、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是 20 世纪初期一种文学艺术和政治运动“未来主义”的意识形态创始人。他于 1876 年出生在埃及亚历山大港，曾在埃及、法国、意大利和瑞士受过教育，后在米兰一家意大利文和法文杂志社工作，同时开始其写作生涯。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但常去意大利访问，并同时运用两种语言写作。他的早期作品均用法文写成，已显示出他以后作品所采用的形式，主要作品有嘲讽资产阶级民主的《老水手》(I vecchi marinai，1897)、《征服星球》(La conquista delle stelle，1902)、《毁灭》(Distruzione，1904)等；后期著有战争日记和戏剧作品若干。1905 年他在米兰创办期刊《诗歌》，传播法国颓废主义诗歌和自由体的赋诗法。

与其说马利奈迪是一位艺术家还不如说是理论家，青年时期所创作的诗歌是他一生中的佳作，富有明显的象征派和颓废派特色。他的作品《未来派文学宣言》1909 年在巴黎《费加罗报》发表

后，未来主义即宣告成立。他的思想很快在意大利为人们所接受，比如作家巴拉柴斯基、戈沃尼和索菲奇都是其主要的追随者。在他看来，一切传统的东西(如博物馆、图书馆、心理学等)都必须加以摒弃，甚至连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和语法关联(形容词、代词、连接词、副词和标点符号）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他还提出，动词只需保留其不定式形式就行了，而词语的运用应该放任自由。1910 年马利奈迪发表一本混乱的小说《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Mafarka il futurista），进一步阐述《未来派文学宣言》中的全部理论观点。同时，他还将未来主义理论应用于戏剧中，如法文本《饕餮的国王》(Re Baldoria，1905 ）等。在 1915 年发表的诗集《战争，世界唯一的救星》(Guerra，sola igiene del mondo)中，他狂热欢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煽动意大利参战，后成为活跃的法西斯分子，以及墨索里尼的狂热支持者。在《未来主义和法西斯主义》(Futurismo e fascismo，1924） 一书中，他声称法西斯主义是未来主义的一种自然扩展，主张意大利参战，因而终于失去绝大部分追随者。 1929 年他任意大利科学院院士；晚年积极支持法西斯政权， 1944 病殁于意大利北方科摩湖畔的贝拉乔城。

未来主义大肆宣扬个人、暴力和战争的威力，在写作风格方面则力求跟上时代急速前进的步伐，对绘画、雕塑等艺术领域影响较大。未来主义流传甚广，即使在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中，它也有不少追随者。前苏联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作揭露和嘲讽资本主义制度，但也带有一定的未来主义因素。

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化处于动荡、迷惘的危机之中，许多知识分子企图通过变革来寻求出路，当时出现的黄昏派和未来主义，就是从不同的两个侧面反映了他们的这一要求。未来主义崇拜个人的作用，宣扬战争和暴力的威力，反对传统的观念。这虽然对结束意大利当时故步自封的文化现状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在政治上却为法西斯专政唱赞歌，并得到了墨索里尼的赞赏，随后逐

渐成为宣传法西斯暴力和战争政策的工具。从这层意思上来说，未来主义不单纯是一种诗歌流派，它也是一次思想运动。马利奈迪去世后，随着法西斯的失势，未来主义逐渐消亡。

二、阿尔多 · 巴拉柴斯基(Aldo Palazzeschi，1885—1974)

巴拉柴斯基是 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他的作品具有黄昏派和未来主义派的特色。他把未来主义视作“时代的先进精神”,认为它的诞生是出于文化和精神革新的需要，相信它能洞察现实社会中无法预见的和不合逻辑的侧面，深刻理解生活中多元化的内涵,使文学更加贴近生活。为此,他的文学作品富有奇异的幻想,他笔下的人和物既具有讽刺意味,又使人陷入沉思默想。

巴拉柴斯基原名阿尔多 · 朱拉尼，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富商之家,早年曾在商业学校和戏剧学校就读,后多次旅居巴黎,但他对佛罗伦萨始终怀有十分深厚的感情。 1941 年他迁居罗马，直至 1974 年谢世，他一直生活在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巴拉柴斯基的创作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转而反对未来主义派文人狂热的民族主义思想,开始采用幽默讽刺的写作手法,努力在作品中揭示幻想与现实之间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在他笔下人物荒唐可笑的言谈举止背后，隐约可见一抹哀婉悲怆的伤感。

巴拉柴斯基以诗歌创作开始文学创作生涯，早期的作品《白马》(I cavalli bianchi，1905)、《提灯》(Lanterna，1907)、《思索》(Riflessi，1908)、《诗集》(Poemi，1909)和《纵火者》(L’incendiario，1910),后汇编成《诗集》(Le poesie，1930),先后出版过多次。显然，他早期的诗作对他日后叙事体文学作品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事实上,在 20 世纪初叶的意大利文坛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如此坚定地反对包括帕斯科利和邓南遮在内的一切传统的诗歌格律。他认为，诗歌不必追求华丽的词藻或严谨的修

辞，真正的诗人应该有勇气嘲笑人们通常为之哭泣的事物。他的诗作别具一格，诗歌的意境往往介于幻想与童话之间。如果说他刻意在诗作中营造一种漫不经心、哀婉悲怆的氛围,那么他的这种写作风格在其叙事体作品中则显得更加突出。他笔下的人物无拘无束、滑稽可笑,但内心却充满着忧伤 尽管他们形似木偶,但仍然热切渴望宁静、自然的生活。

巴拉柴斯基的主要作品均写于 1930 年之后 短篇小说集《 19 世纪复印画集》(Stampe dell'Ottocento,1932)、《 丑角锦标赛》(Il palio dei buffi,1936)、《20 世纪蠢人》(Bestie del'900 , 1952) 长篇小说《马泰拉西姐妹》(Sorelle Materassi,1934)、 《古格利兄弟》(I fratelli Cuccoli, 1948)、《罗马》(Roma,1955)等。《马泰拉西姐妹》被认为是巴拉柴斯基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描写了生活在佛罗伦萨的一对姐妹的悲凉人生 马泰拉西姐妹是两个老处女,长年坐守在家中织布刺绣,日复一日地过着单调枯燥的日子 外甥雷莫的到来打破了她们俩往日平静而又僵死的生活节律，但也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气息和乐趣；雷莫是一个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青年,在耗尽了两位姨妈所有的家产和私人积蓄之后离家出走；一贫如洗的两姐妹再一次回到织布机旁,终日织布刺绣,但心中依然十分怀念那一段与外甥在一起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岁月，欢愉和痛楚使她们不能自已。小说无情地讽刺和嘲弄了 20 世纪初叶意大利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隐喻新旧观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 1957 年，林琴科学院(1603 年由植物学家腓特列・契西亲王创建于罗马)授予巴拉柴斯基" 国际文学奖 "。

三、科拉多・戈沃尼(Corrado Govoni,1884—1965)

诗人戈沃尼生于费拉拉一户农家，一生中大部分时光生活在罗马，早年曾在多种行业谋职，甚至还当过牲畜饲养员。他写有散文体长、短篇小说,但是其主要著作是抒情诗,富有浓厚的幻想

色彩。1903年他发表了第一部抒情诗集《玻璃管形瓶》(Le fiale),着意刻画青少年对生活的渴望和他们忐忑不安的心绪。他的诗作见证了从邓南遮惟美主义过渡到黄昏派和未来派的历程。他创作的最优秀的抒情诗分别被收入在诗集《魔笛》(Il flauto magico)、《无声的歌》(Canzoni a bocca chiusa)以及《阿拉迪诺》(Aladino)中。戈沃尼擅长描写每日间发生在乡间的平凡小事:破旧的宅院、淅淅沥沥的小雨、凄凉的修道院……他以纯朴的笔调描摹费拉拉乡村的自然景色和自家的祖宅,在诗句的颤音里融汇了幻想以及他对家乡浓浓的深情。

四、阿尔登格·索菲奇(Ardengo Soffici,1879—1965)

索菲奇是一位作家兼画家,出生在托斯卡纳地区阿诺河畔利亚诺镇。1900至1903年,他旅居巴黎;回意大利后,他为文学刊物《呼声》撰稿,并同巴比尼一起创办《拉切尔巴》,致力于宣传法国的文学艺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志愿参军,后成为恢复古典文学艺术传统的积极支持者。

在艺术上索菲奇倾向于立体派,他的风景画模仿法国普罗旺斯油画家、后印象派杰出画家塞尚的绘画风格,色彩强烈而朴素,着意描摹托斯卡纳乡村的土丘、橄榄树和柏树。他还是把法国19世纪象征派诗人兰波的诗作介绍到意大利的第一人。尔后,索菲奇在巴比尼和伯雷佐利尼的影响下,开始采用马利奈迪的未来主义风格写诗,1915年发表的《抒情的化学机理》(Chimismi chimici)和散文体作品《阿莱基诺》(Arlecchino,1914)具有明显的未来主义特征。进入暮年后,他继续在文学创作园地里辛勤笔耕,写有《英国游记》(Itinerario inglese,1948)和《一束青草》(D'ogni erba un fascio,1958)。

第五节　杰出的小说家、戏剧家、批评家

一、依达洛·斯韦沃(Italo Svevo,1861—1928)

斯韦沃和皮蓝德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意大利文坛上的两位优秀作家，他们的作品注重分析和披露颓废主义文学期间意大利的政治、社会、文化危机,但只是消极地暴露社会现实,没有指出根除社会弊病的根本办法，对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掊击也显得软弱无力。

伊达洛·斯韦沃(原名埃雷托·斯基米兹）出生在的里雅斯特港市，他父亲是德国人，母亲系犹太人后裔。他早年在德国南方读书，1879 年回到奥匈帝国领地的里雅斯特，在当地一所商业学校继续就学。翌年，因家庭经济拮据，他无奈进了一家银行任职，后在那里工作了 20 年之久。银行小职员枯燥乏味的日常琐碎事务令他十分厌烦，他开始孜孜不倦地阅读德国哲学著作、法国小说和意大利经典文学作品，汲汲于文学创作上的功名。为了圆心中的梦,他焚膏继晷,锲而不舍;1892 年他的处女作《人生》(Una vita)问世，但小说的出版未引起文学界足够的重视，他为此懊丧万分，情绪十分低落。长篇小说《人生》叙述的是一位从农村到的里雅斯特谋职的青年的不幸遭遇：为了谋生，阿尔丰沙在的里雅斯特一家银行找到了一份小职员的工作，但他对每日间单调、乏味的工作毫无兴趣，转而把全部精力倾注在文学创作上；命运似乎微笑着向他伸出了双手，银行经理的女儿倾心于他，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成为他事业上的同路人，但实际上她在文学方面一无所长，只是以此博取他的欢心而已；不久，阿尔丰沙对自己情场上的失足悔恨莫及，遂以母亲病重为藉口，中断了与她的来往；母亲病故后，他惊悉自己所爱的女子与他人订婚的消息，精神上遭到了极大的刺激，以至失去生活的勇气，最后走上了轻生的道路。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

阿尔丰沙的不幸遭遇,试图向读者揭示 美好的愿望同平庸的资产阶级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1898 年,斯韦沃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说《暮年》(Senilità)。没料到《暮年》的命运比《人生》更惨,为此他几乎失去继续挥笔著书的热忱和生活的信念。在这一部自传体小说中,作者刻画了的里雅斯特小职员埃米利奥坎坷的一生 埃米利奥文采出众,在的里雅斯特城颇有名声,他同自己善良、纯朴的妹妹阿玛丽亚一起过着毫无生气和缺乏感情的生活 后来,他爱上了活泼开朗、聪慧机灵的安乔丽娜,但不久即发现她原来是一个品行不端、轻佻浮夸的女子 他在感情上与安乔丽娜难舍难分,故恳求好友巴利相助,可没料到巴利竟与安乔丽娜私下相爱,他因此内心极度悲痛 可怜的阿玛丽亚因无法忍受长期的孤寂而对巴利产生了真挚的爱情,为此她精神恍惚,每日以酗酒来麻醉自己,加之肺病缠身,体质每况愈下,埃米利奥终日守在她的病榻旁,陪伴着她凄凉地度过晚年。

在《暮年》问世后的 20 多年中,斯韦沃坚持不懈地阅读和写作,但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他试图违心地把' 文学创作 '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抹去。其间,他接受欧洲颓废主义文学的影响,文学素养益臻精深,心中开始酝酿新的创作计划。再则,的里雅斯特是意大利一座边境城市,文艺领域里的学术空气历来比较自由,欧洲诸国,尤其是斯拉夫和日耳曼国家的文化在那里较容易得到传播。斯韦沃同当时侨居在的里雅斯特城的爱尔兰著名作家乔埃斯友情甚笃,这对他的写作风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乔埃斯善于运用内心独白来表现主人公的' 潜意识 ",追求繁琐的细节描写和奇特的用语。后来,正是由于乔埃斯和 20 世纪初意大利隐逸派代表诗人蒙塔莱的不懈努力,斯韦沃才在 1925—1926 年间赢得了他一生梦寐以求的名誉和地位。另外,由于法国作家克雷米欧的极力推荐,斯韦沃的作品在法国亦颇受欢迎。

经过 25 年的沉寂,斯韦沃于 1923 年发表了他最负盛名的第

三部长篇小说《柴诺的意识》(La coscienza di Zeno) ,为此他被誉为意大利心理小说的先驱。这是作者长年学习、研究和思考的成果，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比较成熟的文学作品。作者以一个患者对精神病医生自白的形式,运用凝重、讥讽的笔调,惟妙惟肖地勾勒出主人公柴诺的生动形象。柴诺是一位年迈的商人，他决心遵照医嘱,采用精神分析法,即通过回首往事来医治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 父亲在临终前误解了他的一番诚意,含愤死去 挚友圭多因妒忌而自戕 同曼尔芬迪家第 3 个女儿的联姻不悦心意；与民家女子卡拉 · 杰可的爱情风波迭起……这些片断生活的回忆，实际上是一个意志薄弱、丧失生活勇气的人的凄切的哀诉,作者藉此向读者揭示：现代人欲逃遁现实是绝对不可能的。在小说的末尾作者预言，人类将面临一场大灾难，也许这才能使人类醒悟过来。在《柴诺的意识》中,斯韦沃别具一格地通过回首往事来寻觅流逝的时光,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表现了人物对现实失去信心后的孤独和惆怅。

意大利隐逸派著名诗人蒙塔莱曾把斯韦沃的 3 部小说《人生》、《暮年》和《柴诺的意识》看成是不可分割的三部曲,看来这不无道理。《人生》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主人公对前途感到渺茫的彷徨心态,揭示了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精神危机;《暮年》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在发掘现代人潜意识的同时,隐喻他们因心中的梦想归于破灭而丧失生活的信心;《柴诺的意识》则以辛辣的讽刺手法对现代人的内心世界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表现了他们在现实面前的无奈和怅惘。

正当斯韦沃着手写《柴诺的意识》的续集时，不幸死于车祸。在他身后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善良的老人与漂亮的姑娘》(La novella del buon vecchio e della bella fanciulla, 1930) 、《短暂和令人伤感的旅行及其他故事》(Corto viaggio sentimentale, 1949)、《随笔与杂记》(Saggi e pagine sparse, 1954) 、戏剧集《喜

剧》(Le commedie,1960) 及未完成的小说《柴诺的意识续集》(1969)。另外,他与蒙塔莱的往来书简经汇编成册后也于 1966 年出版,题名《书信集》。

二、路易其 · 皮蓝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

皮蓝德娄是 20 世纪意大利著名戏剧家、小说家。历经 30 余年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他的写作技巧益臻谙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举成为蜚声整个欧洲文学界的著名作家,并于 1934 年因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卓越成就荣膺诺贝尔文学奖。

1. 生平与创作

皮蓝德娄生于西西里岛阿格利琴托一个商人之家,早年曾在巴勒莫、罗马和波恩等地求学,对语言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891 年毕业于波恩大学,著有论文《希腊一西西里方言》。回意大利后,由挚友加普安纳引见,皮蓝德娄同罗马文化界人士开始有了频繁的交往,并在佛罗伦萨文学杂志《马尔左各》上先后发表一系列文章,严厉批评邓南遮的颓废主义写作风格。他婚后定居罗马,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家庭经济破产,妻子精神失常。1897 至 1922 年间,他在罗马师范学院教授文体学和意大利文学,并同时发表随笔和长、短篇小说。他最初写诗,发表过一两本诗集,后来却以短篇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作品受到 19 世纪后期意大利真实主义作家加普安纳和维尔加的影响。他著有短篇小说集《没有爱的爱情》(Amori senza amore,1894)、《生与死的玩笑》(Beffe della morte e della vita,1902—1903),长篇小说《被遗弃的女人》(L'esclusa,1901)、《轮流》(Il turno,1902)。皮蓝德娄的成功来自他的第 3 本长篇小说《已故的巴斯加尔》(Il fu Mattia Pascal,1904),这部被公认为他最好的作品显示出他的心理观察之敏锐,后来这种能力便向探索作品中人物的潜意识方向发展。为此,他写有《论幽默》

(L'umorismo,1908) ，阐述他的艺术见解，研究人类的潜意识活动。

1898 年起他开始转向戏剧作品的创作，写出了两部伟大的剧本《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1921)和《亨利四世》(Enrivo IV,1922) 前者表现了皮蓝德娄关于艺术和生活冲突的观点,认为艺术不变,而生活则在反复无常地流动；后者的主题是疯狂，这种疯狂隐藏在日常生活的表象之中，就剧本结构而言又高于日常生活。1923 年《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在巴黎上演,使皮蓝德娄获得世界声誉,影响了法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戏剧。他的剧本按照真实主义的传统，描写的都是社会中下层的人物，从他们的生活遭遇中得出他自己对生活意义的结论“:生活是一场十分悲哀的插科打诨,因为我们在内心里总是需要创造一个现实以欺骗自己(各人有各人的现实,彼此从不相同)……我的艺术对于欺骗自己的人充满着辛酸的同情，但是又必定会随之而对逼人去欺骗的命运加以狠狠的嘲讽。”他因在《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中发明“戏中戏”而成为现代戏剧的重要革新者。

皮蓝德娄似乎从以上的两部怪诞剧中找到了自信，相继写出了《给裸体者穿上衣服》(Vestire gli ignudi,1923)和《各行其职》(Ciascuno a suo modo,1924)两部剧本 其中,前者被誉为皮蓝德娄的戏剧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著作，通过一位女教师的悲惨遭遇,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人是如何“赤裸裸地”沦落到孤立无助并完全失去自卫能力的地步。由于皮蓝德娄在戏剧创作方面建树的杰出功绩,1929 年被任命为意大利科学院院士。皮蓝德娄一生共写有长篇小说 7 部,短篇小说 300 多篇(后汇编成《一年的故事》Novella per un anno) ,剧本 44 部，从而成为驰名欧洲的一位举足轻重的剧作家,他的剧作在德、法以及南、北美洲均享有很高的声誉。1936 年 12 月 10 日,当他在创作剧本《山里的巨人》

（I Giganti della montagna ）时，因患肺炎医治无效而猝死于罗马。

2. 创作风格

皮蓝德娄以真实主义为楷模，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学创作生涯。他善于运用含蓄、嘲讽的笔调刻画资产阶级的没落意识，表现主人公双重性格的冲突，作品寓意隽永，情节荒诞离奇。他的作品与其说是运用写实法反映现实，毋宁说是有意识地毁灭现实。在他的笔下，人由于本身或社会的原因，到头来总是沦为习惯势力的阶下囚，因为人意识到自己同现实社会无法共存，但又无法同他人沟通思想。在作者看来，人除了毁灭自己或杀死自己的敌手之外，别无它路可走。尽管如此，作者在他的小说和剧作中，通过他塑造的人物，无情鞭挞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他对束缚自由的邪恶势力的无声反抗。他笔下的一些人物个性突出，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留恋往昔、举止怪诞，但这些厄运缠身的人热切地盼望着自由和富有感情的生活，不愿忍气吞声地求生，渴望成为命运的主人。在他的叙事体文学作品中，短篇小说《独轮小车》（La carriola）较为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内心世界：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终日忙于家庭琐事和社会事务的律师，他犹如误入迷宫，为完成每日间的使命而四处奔波；有一天，他坐在火车上，透过车窗眺望乡间一望无垠的自然景色，心中百感交集，喃喃自言道：“不知为什么……脑际时时闪现光怪陆离的景色，或许你能得到它，但它不是属于你的；它不在这里，也不在眼前，它隐藏在那遥远的地方”。在皮蓝德娄的作品中，麇集着这些生活中的失败者，世俗之见的精神枷锁使他们感到窒息，他们向往神圣的自由，憧憬着充满温馨的新生。

皮蓝德娄的人生观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就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它犹如一条无形的线索，自始至终贯穿在他所有的文学作品之中，体现在他塑造的无数人物的谈吐和举止上。小说《被遗弃的女人》

和《已故的巴斯加尔》为其中突出的两例,尤其是后者,被意大利文学批评家称为意大利 20 世纪叙事体文学作品的一则范例。

作者在 1908 年撰著的《论幽默》中,从理论和美学两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他指出：幽默是现代人的特征，它是在思索的冰水中熄灭的感情之火，也就是说，人们往往沉湎在感情之中，但同时又是思索的牺牲品，因为思索使感情编织的美好形象解体。他认为，一个幽默作家所揭示的事实要比喜剧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更为生动，因为他不仅发现和贬低虚伪的言辞和迷惑人心的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他还能让人们看清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严肃而又令人痛心的事实，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皮蓝德娄对现实生活持嘲讽的态度，虽然他偏爱讽刺的写作手法，但同时又因自己缺乏回天之力而流露出悲观的情绪。《论幽默》后来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准绳，因为他力求创建的，正是与传统艺术手法截然不同的新颖文体。他认为：传统的艺术表现手法往往以作者的想象为基础，然后运用逻辑推理塑造人物，评价社会和人生；新的文体务必在大处着墨，即毫不隐晦地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无法调和的各类矛盾，以便把满目疮痍的现实生活和盘托出，让它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面前。皮蓝德娄指出，文学艺术作品应该是现实生活的生动写照，它像埋在淤泥中的金子一样，闪烁出炫目的光泽。遗憾的是，皮蓝德娄虽然意识到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端，但他在作品中既没有分析矛盾形成的原因，也没能给人们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就写作技巧言，他的作品不落窠臼，有独到之处：他不追求浮华、繁丽的词藻，善于运用细腻的笔调刻画人物精神世界复杂的感情变化，故事情节往往离奇怪诞，给人以古怪、费解的感觉。从小说到剧本，他总是不断地进行大胆的探索，勇于撕下蒙在表面的一层面纱，使现实还其本来面目；他总是让故事主人公热情洋溢的脸上挂着一丝凄凉的苦笑。

皮蓝德娄的文学语言起伏的动势较大，结构谨严，感情激昂，表现力异常丰富。他塑造的各种人物都有较强的个性，讲话时大声疾呼，感情容易冲动。作者对他笔下的人物总是怀着深切的同情，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宛如被扔进了火堆里的蜗牛，在临死之前发出一阵阵的爆裂声，好似在大笑一样，然后被无情的火焰所吞噬，在蓝色的火苗中渐渐化成灰烬。

3. 叙事体文学作品

在作者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早期作品主要是长、短篇小说。他注意吸收真实主义的写作特色，逐渐建立起独树一帜的风格。在 300 多篇短篇小说中，作者生动地描述了家乡西西里岛上的风土人情,农民、手工艺匠以及官吏们的悲凉境遇,揭示了西西里这块土地上潜在的社会危机和人们的心理危机，含蓄地抒发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谬关系。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形象逼真,都是一些‘不得已来到地球上旅居的人”，描述中蕴含着作者对他们的怜悯和同情。苦难深重的西西里赋予皮蓝德娄的作品一种神秘的色彩，一种荒谬的现实造成的沉郁的格调，他通过自己笔下的各种不同的人物，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正如 1934 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的授奖词所说：皮蓝德娄的短篇小说无论从主题到人物都富有变化,生活被描写得纯正意切,既充满哲理,又荒诞不经，且带有幽默、嘲讽的色彩。

1904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已故的巴斯加尔》无疑是一部在构思上独具匠心的文学作品。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巴斯加尔厌恶夫妻之间的口角和岳母的斥责,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后在摩洛哥蒙特卡洛赌场赢了一大笔钱 家人误认为他早已离开人世,而他却试图组织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但最终未能如愿以偿 他原先的妻子改嫁了他人,出于无奈,他只得忍气吞声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每天在一家古老的图书馆里孤独地消磨时光；他孑然一身，感慨万

端，每天在自己的坟墓前放上一束鲜花，自嘲地回答过路人的询问,自称是已故的巴斯加尔。同作者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已故的巴斯加尔》也是以真面目和假面目、现实和幻想为主题 巴斯加尔虽然具有反抗的精神，但是他全然无力改变现实。作者通过巴斯加尔的奇特遭遇向读者启示 生活揭穿了虚假 ,摧毁了幻想 无论在现实还是在幻想中，人只能在世俗社会所强加给他的虚假关系中生活下去。

皮蓝德娄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伟大作家，一生都在为寻觅生活的真谛进行着不断的探索。即使到了后期，他的创作实践依然没有停顿下来。1926 年，他发表了优秀长篇小说《一个，什么也不是,十万个》(Uno，nessuno e centomila) ,向人们展示了现代人的个性和自我价值的瓦解。纵观皮蓝德娄艺海沉浮的一生，他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和剧作）的特点似乎可以归纳如下：

(1)表现幻想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幻想只是一场骗局而已，而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无情和令人失望；

(2)当剧情发展至高潮时，主人公总是经过思索后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使可能产生的幻觉消失殆尽；

(3)现实生活中充满着各种无法预料的偶然现象；

(4)不追求繁丽炫目的词藻，恰如其分地描绘现实，情节跌宕起伏 ,在浅俗平易中见深沉 ,在含蓄恬淡中见浓烈。

4. 戏剧作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皮蓝德娄开始以满腔的热情致力于剧本创作风格的改革，写出了一系列质量上乘的佳作，并因此一举成名，许多国家先后把他的戏剧作品搬上了舞台。于是，意大利的戏剧越出了国界，在国际上赢得了从未有过的声誉。

他的剧作的主题富有哲理，在写作技巧上注重心理分析。他摒弃戏剧作品传统的创作模式，独辟蹊径，改变了过于强调情节发

展的惯常手法，善于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将幻觉与现实之间的悲剧性冲突推向高潮。诚然，他之所以能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除了他惊人的创作天赋以外，当时的社会现实也为他提供了浩瀚的写作素材，激发他挥笔著书的灵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辉煌胜利，国际政治舞台上顿时出现了两军对垒的局面，整个世界处于重重矛盾和激烈的冲突之中。历经 4 年的战争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期望中美好、升平的生活环境，倚仗战争威力获取幸福的梦幻已成泡影，失望、沮丧和忧虑犹如一块巨石重压在人们的心头。尽管皮蓝德娄的剧作带有较为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和悲观主义情绪，但是他熟练地运用辛辣的讽刺笔调烘托人物‘ 幻觉的 ’和‘ 现实的 ’双重性格,成功地描绘了 20 世纪初一幅幅充满各种矛盾的意大利社会生活图景，表达了对小人物的深切同情。

皮蓝德娄的剧作与 19 世纪的自然主义戏剧截然不同，他贬斥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消遣性舞台艺术，拒绝邓南遮的唯美主义和‘ 超人 ’哲学 ;他以巧妙的构思,在舞台上生动地再现了当代人的形象，并通过一系列似乎超现实的人物和情景，勾勒出现代生活的一幕幕悲剧。

皮蓝德娄戏剧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属于中小资产阶级阶层，故事的情节往往围绕着家庭风波向纵深展开，但他有意识地塑造“ 皮蓝德娄式 ”的人物，并通过他们抒发自己的理想和感情，提出不同凡响的观点。一般说来，剧中的主人公一出场就以其强烈的个性或富有戏剧性的表演把剧中人全部卷入旋涡，犹如在一泓平静的池水中扔进一块巨石，溅起无数的涟漪。

到了后期，皮蓝德娄开始意识到：用戏剧形式表现非理性和主观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生活悲剧是不可能的；同样，把剧中的人物描写得与自己截然不同或完全一样也是枉费心机的。他的作品超越现实的界限，剧情中往往出现幻想式的人物，所以他希望演员能运

用娴熟的演技赋予人物以奇特的色彩。在这一创作思想的指导下,他先后写出了《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亨利四世》(1922)、《各行其是》(1924)、《今晚的即兴演出》(Questa sera si recita a soggetto,1929)等优秀剧本。

1)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1921)

该剧的故事梗概如下 某一天,一个剧团正在排练皮蓝德娄写的一出戏《各尽其职》,突然从场外闯进六个人,自称是某一出戏中的六个角色,而剧本的作者现在却不让他们上台演出,也就是说,作者只是塑造了他们的人物形象,但没有说明他们"自我存在的价值"为此,他们要求剧团负责人取代剧本的原作者,帮助他们做好角色的定位,并把这出戏重新排出来 然后,他们各自根据主观的臆想,全然无视对方的反应,拒绝理解他人的感受,只顾在舞台上吟诵自己的台词,演出的效果充分体现了皮蓝德娄剧作"超现实"的特色。

在原剧中,这六个剧中人分别扮演父亲、母亲、儿子、继女、男孩、女孩的角色:婚后不久,母亲因无法同父亲进行感情上的交流,便爱上了一个她自认为真正理解她的男人,并与他组织了新的家庭,除继女之外,又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多年之后,这个男人去世,继女沦落风尘,父亲则在逛妓院时结识了继女,幸好母亲及时赶来才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百般无奈之中,父亲决定同母亲以及 3 个孩子重新生活在一起,但是一家人始终生活在充满耻辱、悔恨、误解的氛围之中,最后小女孩溺水身亡,小男孩开枪自尽。

在这部剧作中,皮蓝德娄独具匠心地安排剧中人与演员、演员与剧务领导、观众与作者、演员与观众之间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并通过戏剧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隐喻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磨难,揭示了人们欲与传统的家庭模式彻底决裂

的强烈愿望。该剧在罗马首次公演时，引起舆论哗然；戏散场后，有人在剧院门口向皮蓝德娄喝倒彩和扔硬币。但第二次在米兰上演时，情况大有好转，公众对这出情节离奇的戏剧报以热烈的掌声。嗣后，该剧被译成各种文字，并成为活跃在世界各地舞台上颇受观众喜爱的保留剧目之一。

2)《亨利四世》(1922)

在一次由上流社会人士组织并参加的节日盛会上，一位化妆成 11 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青年绅士突然从马上摔落在地，因重创而导致神经失常。实际上，这一起好似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是由另一位绅士贝尔克雷迪出于妒忌一手策划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深爱着同一个美丽非凡的女子玛蒂尔达。疯癫后的青年绅士自称是亨利四世，家人为了减轻他的病情，特意将他的住所改装成亨利四世的宫殿，还找来四名仆人化妆成皇帝的侍从专门侍候他。12 年以后的某一天，"亨利四世"突然恢复了记忆，并识破了他的情敌贝尔克雷迪当年的阴谋诡计，但无奈此时的玛蒂尔达已成了贝尔克雷迪的情人；见自己已无法重新回到真实生活中去，他只得强忍内心的悲痛，继续违心地扮演"亨利四世"的角色。8 年后的某日，玛尔蒂达在其女儿弗丽达的陪同下前来探视他，见到酷似其母亲的弗丽达，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 20 余年以前玛尔蒂达美丽的容貌，盛怒之下拔剑将贝尔克雷迪刺死，后凄凉地在仆人们的陪伴下度过余生。

《亨利四世》是皮蓝德娄最有代表性的一部怪诞剧，寓意深邃，富有哲理，隐喻现代人只能以"装疯"来调和自己同现实社会之间永远无法平息的矛盾，靠"假面具"苟且偷安。

三、贝内代托 · 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

1. 生平与哲学思想

克罗齐是 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唯心主义哲学家、史学家、新黑格尔主义者和文艺批评家，对当时意大利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他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阿勃鲁佐地区贝斯卡赛洛利，殁于那不勒斯。在风景秀丽的港市那不勒斯，他念完了中小学的全部课程，并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克罗齐的双亲和妹妹在一次地震中不幸罹难，他不得已去罗马投亲，并在那里攻读法律。他年轻时就是一个博学之士，对各种学科都有浓厚的兴趣，早年曾致力于研究 1799 年爆发的那不勒斯革命，以及自文艺复兴至 18 世纪的那不勒斯戏剧艺术。此外，他还钻研哲学和经济理论，曾一度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但不久即否定马克思主义原理,并将它贬斥成‘ 僵死的 ’科学。与此同时,他的古典唯心主义倾向日趋明朗，对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尤为崇拜。他在 1902 年写成的《美学》(Estetica ）一文，标志着他在文学批评和艺术观点方面的一个重要转折。翌年，他同他的学生秦梯利一起创办双月刊《批评》(La Critica) ,直至 1943 年停刊，他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许多篇具有重要文学价值的文章，对意大利的知识界和文化界都起过指导的作用。在 50 余年中，他手中的笔始终未停歇过，给后人留下了涉及哲学、历史、经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民俗等不同内容的著作，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其中,较著名的有《精神哲学》(Filosofia dello spirito)、《 美学浅谈》(Problemi di estetica)、《有关美学的若干新论文》(Nuovi saggi di estetica)、 《诗歌》(La poesia)、《但丁的诗作》(La poesia di Dante)、《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和高乃依》(Ariosto, Shakespeare e Corneille)、《诗作与非诗作》(Poesia e non poesia)、 《民间诗与艺术诗》(Poesia popolare e poesia d'arte)、 《新意大利文学 》(La let-

teratura della nuova Italia)、《1871—1915 年的意大利历史》（La storia d'Italia dal 1870 al 1915）、《19 世纪欧洲史》（Storia d'Europa del secolo XIX）、《历史是思想和行动的组合》（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等。

除了奋笔疾书外，克罗齐在政治上亦相当活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坚决支持意大利政府的中立政策，对法西斯主义，他开始举棋不定，但后来成为反法西斯专政的骨干。 1945 年意大利解放之后，他当选为自由党主席，并为重建该党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倾向。

上世纪初，克罗齐为清除实证主义的消极因素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而建立起具有 20 世纪资产阶级思想特征的新文化和现代文学批评。在哲学方面，他对其“精神哲学”进行系统的阐述。他提出以古典浪漫主义哲学的理性主义为雏形建立一个哲学体系，它的原则是在体系结构中和历史长河中的精神“循环”。在他的这个哲学体系中，精神的诸环节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它们分别被划分为美学的、逻辑学的、经济学的和理论学的。关于历史方法论，克罗齐指出：历史是全部精神环节的唯一的仲裁原则，而精神，即人类意识，是完全自然的、没有先验结构的。有人认为这是历史实证主义，克罗齐本人则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并把它作为他思想的最后形式。他的保守立场不仅引起愤世嫉俗者的不满，即使是唯灵论和反理性主义的追随者们也称他的哲学思想为“一枚充满理性的炸弹”。尽管克罗齐是上世纪初意大利文化界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他的理论并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理解，他的作品也未能引起很大的反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克罗齐的哲学思想出现倒退，其保守倾向日趋明朗，原先代表先进思想的积极因素也显得孱弱无力。

2. 美学与文学批评

克罗齐认为，客观的美是不存在的，美只是直觉创造出来的价值，这一理论后成为资产阶级新文艺学说“表现主义”的依据之一。在他看来，诗作与非诗作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糟粕中撷取的精华，是纯直觉的产物。他既忽视了诗人的个性和周围文化环境对诗人的影响，也不注重诗歌的内容和风格，一味强调直觉的奇异功能。当然，克罗齐也承认诗人在进入创作之前必须有一个考虑主题的过程，但他认为这只是创作的前提和积累非理性的原始素材所需，只有当直觉在诗人脑际蓦然闪亮时，诗歌才获得生命。他还认为，诗歌的内容和形式在直觉闪现的一刹那间得到统一；艺术作品的美与丑不取决于它的主题内容，只有通过直觉的媒介使内容与形式组合在一起的时候，艺术品才会闪烁出奇异的光彩。毋庸置疑，他这种一概否定语言学、文体和诗学的美学观遭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事实上，在意大利诗歌发展史上，为数众多的诗人曾经就诗的内容展开过激烈的争辩。浪漫主义诗人为破除“古典神话是诗歌唯一创作源泉”的陈旧观念曾作出过不懈的努力，而根据克罗齐的美学观，浪漫主义诗人所付出的辛劳纯属多此一举。

克罗齐的直觉论将艺术视作“纯粹的感情沉思”,也就是说,它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与任何人和物都毫无关联。按他的说法，这种脱离现实、历史和生活的艺术是美的永恒的象征，它既不微笑或哭泣，也不讴歌斗争的热情或倾诉生活中的痛楚，但它总是蒙着一层由安详、和谐织成的面纱。他认为：一个称职的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高度的美学鉴赏能力，否则他就无法从内心感受文学艺术的魅力，以及它优美、和谐的旋律；文学批评家还得在哲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因为若想正确地评论一部文学作品，光靠文学素养和艺术鉴赏力显然是不够的。诚然，克罗齐的评论方法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以他之见，如果一部诗作无法在文学评论家内心激起美的共鸣，它就算不上是一件精湛的艺术作品。

克罗齐把但丁的不朽诗作《神曲》比喻成镶嵌在非诗体结构上的一串珍珠，一旦将这些珍珠取下来，它们随即变成一颗颗铅球。同样,在他看来,莱奥巴尔迪的抒情诗、莎士比亚的悲剧、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是一些非诗体的作品。克罗齐的纯直觉论和文学批评法否认文学与历史之间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将爱情、死亡和痛苦视作评论文学作品永恒的准绳。他不明白,薄伽丘、彼特拉克和莱奥帕尔迪的文学作品之所以被人们誉为意大利文学史上的扛鼎之作,是因为薄伽丘的《十日谈》反映了意大利城邦时代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彼特拉克缠绵悱恻的诗句反映了意大利 14 世纪的时代特征；莱奥帕尔迪凄切、婉约的抒情诗则描绘出 19 世纪初意大利社会动荡不安、分崩离析的现实。

第十三章　法西斯专政时期的意大利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标志着意大利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几乎从根本上改变了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故有人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看作是 20 世纪意大利文学的开端。由于法西斯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力，大部分知识分子曾因迷惘而不知所措，无法对它提出自己的观点。克罗齐在 1924 年之后才明确他的反法西斯政治立场，但当他撰文指责法西斯限制各种文化活动的恶劣行径时却说：“法西斯主义是一次旨在维持社会秩序的运动，它得到了工业实业家和大地主的支持。正因为如此，它对文学艺术不仅态度冷漠，而且十分仇视……墨索里尼了解形势十分透彻，他说，一个法西斯别动队员要比一个文学家或哲学家更有价值。”起初，克罗齐以疑惑的态度密切地注视着法西斯运动的发展，曾毫不犹豫地支持过法西斯改革选举的措施，并过于天真地认为，这些措施确保了立宪体制在意大利的建立。当时，克罗齐不仅在文化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就是在政治上，他的观点同样起着相当大的影响，反映了整个领导阶层的政治倾向。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少知识分子在思想感情上开始向法西斯主义靠拢。

法西斯主义的形成对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具有双重破坏作用：一方面，它瓦解和破坏无产阶级组织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通过狂热的宣传和军事上的积极筹备，加速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以便实现向外扩张领土的野心。法西斯主义是意大利社会危机的产物，因为当垄断资产阶级对外扩张和对内加重压迫、剥削的措施均告失败后，它势必采取特殊的政治手段，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

恶目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形成靠的是以下三个有利因素：其一，由于投资金额的局限，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遇到了一系列无法克服的困难，人们对扩大资本解决社会问题的措施普遍丧失信心；其二，处境不佳的中产阶级感到前途渺茫，法西斯主义信条征服他们心灵的时机业已成熟；其三，无产阶级尚未完全觉醒，它的政治力量仍十分薄弱，无法有效地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抵御外来的压力。

简而言之，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白刃格斗中，法西斯主义阴险、狡黠地把中产阶级、城乡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中上层全部拖入这一阶级对抗中去。法西斯主义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支持和加强资产阶级的法权和势力；中产阶级则受到法西斯主义的笼络，妄图一跃成为历史的主人，对未来充满着美丽的憧憬。

由于连绵的战争未能解决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凭借暴力重建国家的“ 宏伟计划 ”宣告破产，失望和沮丧犹如一块大石重压在人们的心头，大家纷纷抱怨战争欺骗和背叛了他们。再则，战后的意大利经济出现了新的危机（通货膨胀、失业人数猛增、物价指数急骤上升），广大人民对现状强烈不满，民众暴动接二连三地发生，政府面对剑拔弩张的形势一筹莫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使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成了惊弓之鸟。意大利传统的议会体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因为它既反对“ 超人 ”的神话，又不主张诉诸武力去恢复意大利昔日的强盛和荣耀。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思潮比较容易地找到了适合它繁衍的温床，开始迅速蔓延。民族主义者有意识地将爱国主义精神同虔诚的宗教感情连在一起，反法西斯者被指责为‘ 意大利的叛徒 ’或‘ 外国的代理人 ’,这种做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迷惑力和欺骗性。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20 年中，法西斯主义并没有建立起自

己的文学，它压制新闻自由，严格控制各种文化活动，妄图以此将文化艺术纳入其独裁专制的轨道。对于法西斯的文化高压政策，知识界人士的反应各不相同，其中不少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不闻不问，以埋头创作来表明其狷介的心迹。事实上，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他们不能自由地表达思想，只得利用纯粹的文学研究聊以自慰。一般说来，当时知识分子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倾向不够明朗，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往往给人以模棱两可的感觉。但是，意大利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屈服于法西斯专政的淫威，所以法西斯最终没能建立起属于它自己的文化艺术。

第一节　文学杂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文坛上，文学杂志的出版工作显得十分活跃，出现了花团锦簇的繁荣景象。一些政治观点一致、情致趣味相投的知识分子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创办各类文学杂志，针对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共同研究和探讨国外的各种文学流派。鉴于当时特殊的政治气候，这些文学杂志的编辑人员惟恐得罪法西斯当局，在政治上十分谨慎，作品缺乏战斗力和锐气；他们孤芳自赏，把文学创作看作是和光同尘、与世无争的园地。

一、《巡逻哨》（La Ronda 1919—1923）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社会，意大利人民深感焦虑，热切地盼望社会秩序能早日恢复安定。文学月刊《巡逻哨》正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一份杂志。它由诗人温钦佐·卡尔达雷利（Vincenzo Cardarelli）担任主编，利加尔多·巴盖利（Riccardo Bacchelli）等6人为编委，一部分撰稿人原先是《呼声》杂志的工作人员。

《巡逻哨》的创办者从一开始就把他们的文学月刊称之为一份纯粹从事文学研究而不带任何政治倾向的杂志，谓其宗旨是恢复古典文学和贵族文化传统。在战后纷乱的年代里，《巡逻哨》试图逃遁政治和现实，致力于继续和发扬莱奥帕尔迪浪漫主义抒情诗的优美诗体，以此慰藉人们忧虑、不安的心绪。他们极力推崇莱奥帕尔迪的抒情诗和道德小品，并将它们视作自己效仿的楷模；他们对富有诗意的散文体情有独钟，开创了用篇幅较短的艺术散文就简单的题材抒发情感的先河。然而，《巡逻哨》所谓的与世无争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已，实际上它以矜夸和失望的目光注视着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运动和摇摇欲坠的政局，保障了保守势力的利益。《巡逻哨》的编辑者把法西斯主义看成是一种政治过渡形式，他们既不重视民众的觉悟，又不相信法西斯主义建立独裁政权的可能性，也不寄希望于资产阶级的力量，只是企图栖身于文学研究的世外桃源，并以此表明自己超然物外的政治立场。他们的保守主义思想在《巡逻哨》刊登的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一方面，他们对20 世纪初 20 年中的文学予以一概否定；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宣扬莱奥帕尔迪和孟佐尼以前的意大利传统文学的光荣和功绩。

尽管《巡逻哨》的编辑者自称与政治无缘，但他们否定议会制度，反对社会主义，把法西斯主义称作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政治运动，反映了当时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巡逻哨》一味宣扬自己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高贵品行，并以此猛力抨击未来主义、颓废主义和佛罗伦萨的《呼声》杂志，尤其是帕斯科利的创作思想。总之，它追求所谓的“纯粹文学”，任何不符合这一准绳的文学流派都是它的攻击对象。

法西斯主义代表了意大利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其信徒一贯从事暗杀、破坏等恐怖活动，宣扬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竭力推行侵略政策。在 1922—1943 年间的 20 余年中，法西斯给意大利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巡逻哨》的编辑者却给文学作品贴上了

“纯艺术品”的标签。尽管如此，《巡逻哨》对于活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意大利文学还是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并为隐逸派诗歌和抒情散文体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除了卡尔达雷利和巴盖利以外，《巡逻哨》派的主要作家还有埃米利奥·契基(Emilio Cecchi)、卡尔洛·利纳迪(Carlo Linati)、安东尼奥·巴尔迪尼(Antonio Baldini)、布鲁诺·巴利里(Bruno Barili)等人。

1. 温钦佐·卡尔达雷利(Vincenzo Cardarelli，1887—1959)

卡尔达雷利生于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地区达尔圭尼亚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作家和诗人。他早年从未上过正规的学校，但他通读了歌德、19世纪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莎士比亚和尼采的作品，尤其喜爱但丁和莱奥巴尔迪的优秀诗作。1906年他去罗马谋生，曾干过不同的工作，后涉足新闻业，同时为《马尔左各》、《呼声》和《抒情诗》等杂志社撰稿；1919年创办文学刊物《巡逻哨》，并任主编。

卡尔达雷利在继承意大利传统文学创作风格的基础上，追求一种具有新古典主义优雅风采的文体，他的写作语言清新、婉约，抒情色彩浓重。在他散文和诗歌作品中，清晰可见传统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莱奥巴尔迪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影子。然而，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纯粹追求优美文体的诗人，他总是将文学和道德糅合在一起，在作品中不断地同自己对话，并以此抒发内心的悲痛和忐忑不安的心绪。他的诗律摆脱了印象派诗歌艺术形式的窠臼，诗句严肃而又刚劲，具有强烈的表现力。他的诗作，尤其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序诗》(Prologhi，1916)，在20世纪初的意大利诗苑中不失为一朵绚丽的奇葩；他写的诗后汇编在1942年出版的《诗集》(Poesie)中。他的抒情诗与隐逸派的“纯抒情诗”不同，以交谈和对话的形式体现对生活的思索。他的其他诗作还有：《寓言与回忆》(Favole e memorie，1925)、《耳语》(Parole all'orecchio，1929)、

《未寄出去的书简》(Lettere non spedite,1945)、《达兰多拉别墅》(Villa di Tarantola,1948)等。

与《巡逻哨》派其他文人一样，卡尔达雷利也对富有浓厚抒情韵味的艺术散文情有独钟，善于借助逻辑思维和推理的力量，着力抒发自己的内心感受。他的优秀诗体散文作品均收入以下4个集子中：《漫游在时光隧道中》(Viaggi nel tempo,1920)、《西沉的太阳》(Il sole a picco,1928)、《城市上空的天》(Il cielo sulla città,1939)和《阿卡狄亚的孤独者》(Solitario in Arcadia,1947)。

下面选译自《诗集》的是一首歌咏夏季的短诗，里面没有太多的诗情画意，它通过精神上的幻觉，抒发诗人对夏季的思索和感慨;它像一支咏歌,表达了夏季生活的欢乐、恬静和安宁,隐喻人处于顶峰时期的幸福感受：

一望无垠的夏季
碧空如洗，
绚丽的晨光中
万籁俱寂；
像水族馆里缓缓而动的水流
万物渐渐苏醒，
时光如永恒不变的行星；
夏日的天空
多么的清朗、恬静，
欢乐的想象自由翱翔
在那寥廓的天际；
尘世间万千生灵
惟独璀璨的阳光
能给予我永世的安宁；
广漠的天宇

布满夏日火一般的金辉，
给无尽的梦幻涂上万道霞光
象征着生命灿烂的永存；
金色的夏季，
你那漫天匝地的光芒
拖住了时光匆忙的脚步；
在循序渐进的时光隧道里，
不时地闪现
夏日不朽的永恒。

2. 埃米利奥 · 契基(Emilio Cecchi，1884—1966)

契基1884年出生在文化名城佛罗伦萨，是一位文艺评论家、特派记者和随笔作家，还曾经担任过电影制片厂厂长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大学意大利文学教授等职务。早年，他积极支持意大利20世纪中期著名评论家、诗人、小说家及未来主义派领袖乔万尼 · 巴比尼创办的文学杂志《拉切尔巴》和《呼声》,他早期的评论文章均发表在这两本文学刊物上。后来，他转而拥护《巡逻哨》派作家的文学主张，努力寻求一种富有古典主义风采的诗体散文。

契基的文学创作生涯从早期的文学评论逐渐转向后来的叙事体作品创作,其主要论著有:《论帕斯科利》(Saggio critico sul Pascoli，1912)、《英国文学史》(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nglese，1915)、《英美作家》(Scrittori inglesi e americani，1947)、《肖像与侧面像》(Ritratti e profili，1957)、《绘画的欢乐》(Piaceri della pittura，1960)等。在叙事体作品的创作方面，继1920年发表了他的第一本书《随笔、随想曲和幻想曲》(Saggi，capricci，fantasie)之后，直至上世纪40年代初他陆续写有不少作品：《金鱼》(Pesci rossi，

1927)、《恶劣天气中的小酒店》(L'Osteria del cattivo tempo, 1927)、《某些事情》(Qualche cosa, 1931)、《墨西哥》(Messico, 1933)、《希腊旅行日记》(Et in Arcadia ego, 1936)、《疾步行走》(Corse al trotto, 1936)、《苦难的美国》(America amara, 1939)等。由于契基对绘画等造型艺术一直有着特殊的偏爱，故后期开始关注起形象艺术的评论,著有《14世纪西埃纳夸张派画家》(Pittori secenteschi senesi del Trecento, 1928)和《乔托》(Giotto, 1937)等。

契基的散文体作品富有清新的诗意和浓厚的抒情味，他善于以自己内心细腻、敏锐的感受和超人的才智，抒发对故乡深深的眷恋，以及面对瞬息即逝的岁月心中的惆怅和伤感。应该说，他的散文体作品具有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在西方绘画及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即以高度写实的手法表现想象中的形象与神秘或象征的题材，所以他的散文体作品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文学史上继邓南遮之后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散文。

3. 利加尔多 • 巴盖利(Riccardo Bacchelli, 1891—1985)

巴盖利生于波伦亚，是当代意大利文坛上一位举足轻重的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曾是《呼声》的主编之一和米兰《晚邮报》的戏剧评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上前线作战，曾写过一些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1919年与他人一起创办文学期刊《巡逻哨》,他的艺术散文具有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的风采,充分体现出一种他所推崇的集‘知识性’‘历史性’和‘社会性’之大成的多向性文学创作倾向。他贬低同时代先锋派作家，反对意大利实验主义派作家的创新，极力拥护文艺复兴及19世纪文学大师的写作风格；他擅长从历史和政治的视角细腻地描摹在特定的社会中人们的的风尚习俗、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作品体裁各异，字里行间蕴涵着浪漫主义作家曼佐尼和古典主义诗人卡尔杜齐作品

的特色。他的著名诗集《抒情诗》(Poemi lirici,1914)和《爱的语汇》(Parole d'amore,1935)熔抒情和哲理于一炉,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巴盖利写过不少叙事体作品，普遍具有教育和启示作用。他的第一部叙事体作品《长桥上的魔鬼》(Il diavolo al puntelungo,1927)描写的是发生在 1874 年波伦亚的一次无政府主义暴动的革命尝试。其杰出历史小说《波河上的磨房》(Il mulino del Po,1938—1940),被称为"普通人的史诗",它的文学价值在于它的不偏不倚的人文主义和对小人物陷于政治事件的罗网之中所受苦难的怜悯之情。《波河上的磨房》由《上帝拯救你》、《船上的痛苦生活》和《不断变化中的旧世界》等 3 个部分组成，它以拿破仑从俄国撤兵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为写作背景，叙述波河上磨房工人斯卡切尔尼一家几代人的生活遭遇。在书中，波河好似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见证了斯卡切尔尼祖孙几代同饥饿、贫困和战争相抗争的痛苦家史：马扎科拉迪是在拿破仑军队中服役的一名军官，为了答谢曾悉心照料过他的士兵拉扎罗·斯卡切尔尼,他在临终前将一笔遗产留给了拉扎罗；拉扎罗回意大利后，用这一笔钱在波河上建造了一座磨房，结婚生子，后因其岳父的过失被迫卷入一起政治纠纷之中，无奈成了费拉拉黑手党的眼中钉；拉扎罗的儿子朱塞佩(人称"食人的兔子")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致富,而朱塞佩的儿子对其父亲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毅然离开家乡投奔加里波第的千人红衫军，后战死在罗马附近的曼达纳城；不久，波河大肆泛滥，朱塞佩的家园被洪水淹没，面对丧子和家产毁于一旦的残酷现实，朱塞佩终因神经失常而被送进了疯人院；为了维持家中的生计，朱塞佩的妻子不得不在充满饥饿、灾荒和农民暴动的环境中艰难度日；朱塞佩的第二个儿子为替其姐姐报仇，打死了凌辱她的男人，后被投入监狱；朱塞佩的第三个儿子因婚后一直未有生育，过继了一个弃儿，但这个斯卡切尔尼家族唯一的继承者却在 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在比亚维河畔。

除此以外,巴盖利还著有小说《金枪鱼知道》(Lo sa il tonno, 1927)、《情人的城市》(La città degli amanti, 1929)、《伊利黛》(Iride, 1937)、《拉伊斯儿子的眼泪》(Il pianto del figlio di Lais, 1946)、《耶稣的目光》(Lo sguardo di Gesù, 1948)、《斯大林的儿子》(Il figlio di Stalin, 1953)、《恺撒的三个奴隶》(I tre schiavi di Giulio Cesare, 1958) 戏剧作品《斯巴达克和奴隶》(Spartaco e gli schiavi, 1920)、《哈姆雷特》(Amleto, 1923)、《费加罗一家》(La famiglia di Figaro, 1926)等。

二、哥白迪创办的杂志

彼埃德罗·哥白迪(Pietro Goberti 1901—1926)在他短暂而充满战斗激情的一生中,创办和主编过好几本杂志,它们观点明朗,锋芒毕露,同《巡逻哨》大相径庭。哥白迪出生在都灵,在中学时代,他接受克罗齐和秦梯利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创办了他的第一本杂志《新精神》(Energie nuove 1918—1920)。不久,在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葛兰西的热情帮助和指点下,他开始关心政治问题,并逐渐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22 年,哥白迪创办反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理论杂志《自由革命》(Rivoluzione liberale); 1924 年,他担任《巴雷迪》(Il Baretti) 的主编,从事研究欧洲政治和文化,反对意大利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的文化政策。尔后,《自由革命》被法西斯当局查封停刊,哥白迪也遭到法西斯分子的残酷毒打;他被迫只身逃往法国,但终因伤势过重,在巴黎离开人世,时年才 25 岁。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意大利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残酷的社会现实教育了哥白迪,其反法西斯立场日趋明朗,《自由革命》正是反映他这一时期思想情操的一本杂志,具有旺盛的战斗力。哥白迪通过《自由革命》阐述自己对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的

看法，公开表示反对意大利政府的政治立场。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意大利的民族复兴运动是一场人民大众的政治运动，但到头来，统治阶级背叛了广大民众的利益；现在务必重新组织人民群众，坚决将这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法西斯党于1921 年成立之后，在国内积极推行独裁专制政策，哥白迪对此极为反感，他在杂志上撰文，对一些知识分子软弱无能和畏葸不前的政治态度进行猛力的抨击。另外，哥白迪在由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意大利隐逸派代表诗人蒙塔莱的著名诗集《乌贼骨》中的若干诗篇。显然，此举并非出于偶然，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意大利确实在走向荒芜的沙漠，为了维护社会公德和文学的尊严，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简而言之，哥白迪主编的几本文学杂志对当年的意大利文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索拉利亚》（Solaria 1926—1936）

在法西斯统治的 20 余年中,《索拉利亚》也是一份颇具价值的文学杂志。它在 1926 年由阿尔贝托 • 卡劳齐(Alberto Carocci)创办于佛罗伦萨,1936 年被法西斯当局下令停刊。《索拉利亚》发表过不少具有一定文学价值的作品，尤其是在后期，它曾刊登过一些欧洲颓废主义代表作家和意大利同时期著名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当时，意大利文化界的一些名流显士经常在该杂志社聚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

尽管《索拉利亚》的发行量并不大，但它在文学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它在批评法西斯政权推行文化封锁政策的同时，对意大利和国外的文化艺术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把当时不为人们所熟悉，甚至遭受歧视的一些欧美文学家的优秀作品介绍给意大利人民，活跃了意大利文学领域内的学术气氛。由于《索拉利亚》编辑人员的不懈努力，一部分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通过上世纪初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维多里尼、帕韦泽等人的翻译，得以在意大利广为流

传。另外，《索拉利亚》还组织了对玛雅可夫斯基和海明威文学作品的讨论，对斯韦沃的小说和隐逸派诗人翁贝尔托·萨巴的诗作加以精辟的分析，并就意大利的电影艺术提出自己的建设性建议和看法。

简而言之，《索拉利亚》在吸取和推广欧洲其他国家的文化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政治上具有明显的反法西斯倾向，在文学上则反对迂腐的文学传统和拘泥形式的创作风格。

四、《文学》(Letteratura 1937—1947)

1936 年,《索拉利亚》被法西斯当局查封。翌年,由佛罗伦萨小说家亚历山德罗·庞桑迪(Alessandro Bonsanti)担任主编的《文学》问世，它的创办宗旨是从事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纯文学研究。20 世纪 30 年代，意大利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5 年，墨索里尼政权派兵入侵阿比西尼亚，翌年 5 月全面占领该国，并宣布意大利国王为阿比西尼亚皇帝；经过 10 余年的苦心经营，法西斯党的政治地位在表面上日益巩固。面对令人忧心忡忡的政治形势，何去何从是摆在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前的严峻问题。《文学》选择的是一条‘与世无争’的文学道路,以表明它拒绝同政治纠缠在一起的立场。但事实上，正如当时许多人所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因为完全脱离政治的‘纯文学’是不存在的。

五、《荒野》(Selvaggio 1924—1943)

“文学国家主义”是 1926 至 1932 年间活跃在意大利的一种文学倾向，旨在重新发掘意大利文学的优良传统，拒绝外国文学和全球文学的影响。这一文学倾向反映了一部分具有反法西斯倾向的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抱怨法西斯政权背叛了他们的利益，试图以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意大利传统文学艺术同当局分庭抗礼，进而跻身欧洲文化发达国家的行列。它的组织者通过杂志《荒野》表达

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文学思想，颂扬意大利传统文学淳朴、优雅的风格，对异国文化和现代文明持否定的态度。《荒野》积极宣扬民族主义思想，它指出：意大利若要赢得世人的尊重和敬仰，必须不遗余力地维护它昔日的尊严和荣耀。正因为如此，《荒野》吸引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政治上反对随波逐流，痛恨法西斯当局利用文化为其政治服务的做法；在写作技巧方面，他们摒弃学院风气和浮夸、修饰的文体。1930 年《荒野》载文指出：一个艺术才华平庸的作家可能是赤诚的爱国主义者，但其质量低劣的作品却破坏了意大利的民族尊严。不久，《荒野》的主编米诺 · 马嘉利（Mino Maccari）被开除出法西斯党。

六、《二十世纪》（Novecento）

“文学世界主义”是与“文学国家主义”观点截然不同的另一个文学潮流，《二十世纪》是该潮流的喉舌，1926 年由小说家、戏剧家马西莫 · 蓬坦贝利（Massimo Bontempelli）创办。它同浪漫主义及 19 世纪的文学针锋相对，主张学习欧洲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蓬坦贝利指出：意大利文学自孟佐尼之后进入了一个黯淡无光的衰落时期，这是浪漫主义运动造成的恶果。此外，《二十世纪》派文人反对《巡逻哨》派复古和纯艺术的文学思想，他们认为意大利文学最大的弊端是缺乏生活、想象和交流，而若想扭转这一局面，必须批判唯美主义和浮华的文体，揭穿 19 世纪文学的欺骗性，并消除它的迷惑力。

《二十世纪》主张从近处描写生活，提倡新闻体和章回小说等新颖的文学形式。但是在它推崇的作品中，幻想与现实既相互排斥，又融为一体。在最初阶段，《二十世纪》以法文出版，为的是让欧洲各国人民都能读懂它。参加编辑工作的除意大利人以外，还有一部分外国人，这无形中促进了西欧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二节　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学评论

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在法西斯执政的 20 余年中，他以坚定的信念和满腔的热忱投身政治运动，在文学上同样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由于种种原因，葛兰西在死后的数年中，在意大利文坛上一直淹没无闻，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他在长期监禁期间呕心沥血写成的《狱中日记》和《狱中书札》才得以出版，并成为意大利现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珍贵财富。

一、生平与政治思想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出生在撒丁岛亚雷斯城一个小职员家庭，全家兄妹 7 人，全靠父亲微薄的薪俸勉强度日，经济颇为拮据。葛兰西的童年是在疾病和贫困中度过的，他自幼体质孱弱多病，加上营养不良，不久背部隆起，身体变成畸形。尽管如此,他在后来 10 余年的监禁生活中，仍流露出对孩提时代深情的怀念和留恋。葛兰西在早年求学期间已显露出超人的智慧和异乎寻常的才华;1911 年，他离家前往都灵大学文学系继续深造。撒丁岛人民贫穷落后的生活环境无疑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并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都灵求学期间，葛兰西生活清贫，虽享受奖学金，但他还得靠外出勤工俭学补贴经济上的不足。由于学习刻苦，成绩优秀，他得到了教师们的一致赞赏和好评。当时，都灵的工潮日趋高涨，他申请加入当地的社会党组织，并被委派组织“工人互助会”。他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并为社会党领导的报刊撰稿。

1914 年 11 月,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都灵大学,在事业和革命的十字路口，他依然选择了后者，从此在政治上日趋成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政治斗争，曾担任都灵社会

党周刊《人民之声》的主编，同广大工人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第二国际失败之后，为了能了解由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治路线和发展纲领，他开始贪婪地阅读各种不同语言的“非法”刊物，政治立场益臻坚定。

1917 年 8 月，都灵工人持续 5 天的武装暴动不幸失败。不久，葛兰西被选为社会党主席。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他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和老练；他以敏锐、深邃的目光仔细分析和观察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对社会党的一些具体做法直言不讳地提出异议。 1919 年 5 月 1 日,由他主编的政治杂志《新秩序》（L’ordine nuovo ）正式出版，它提出成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等革命口号，在 1920 至 1921 年间的工潮中起了指导作用。由于政治观点的分歧，社会党领导集团内部出现罅隙，以葛兰西为首的一派拟定了一个列宁主义的革新纲领，列宁公开委任葛兰西为第三国际特派员。不久，葛兰西试图从内部改革社会党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成立意大利共产党随之成为意大利左翼力量唯一的选择。 1921 年 1 月 21 日,意大利共产党在托斯卡纳地区里窝那港市宣告成立。

1922 年 3 月，意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派遣葛兰西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届大会。在莫斯科，他有幸结识了不少苏维埃革命的上层领导人物，这加深了他对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了解。在此期间，他认识了朱丽亚·斯科达，不久便与她结为伉俪。1923 年，他迁居维也纳。在他的倡议下,意共机关报《团结报》（L’Unità）于 1924 年 2 月问世。他在为该报撰写的文章中说：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懂得如何维护‘团结”,即它的最高利益,那它就无法完成其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有力地打击法西斯主义，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和工人的国家；工人阶级应该团结在党的周围，工人与农民、北方与南方以及全体意大利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在 1924 年 4 月举行的政治选举中，葛兰西被选为众议院议

员，为此他从维也纳返回意大利继续参加工作和斗争。同年 6 月，法西斯别动队绑架并杀害了社会党著名活动家嘉科莫·马特奥蒂，葛兰西闻讯后拒不回众议院工作，以示抗议。与此同时，他四方联络其他政治进步人士，积极筹备大罢工。1925 年 1 月墨索里尼颁布特殊法令后，葛兰西满腔义愤，斗争热情越发旺盛，并在工厂和其他劳动人民聚集的地方积极筹建意共基层组织，以扩大反法西斯统一阵线。

法西斯的魔爪终于伸向这位无畏的革命战士。1926 年 11 月 8 日，葛兰西被法西斯警方逮捕并投入监狱，最后被判处 20 年 4 个月零 5 天的徒刑，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监禁生活。由于长年的奋战，葛兰西的体质每况愈下。在狱中，他与外界的政治斗争完全失去了联系，惟独寥寥无几的书籍和杂志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他冷静、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重新整理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写下了闪烁思想光辉的《狱中日记》（Quaderni del carcere）。在 20 余年的铁窗生涯中，他给家人和朋友写了大量的信件，后被收入一本题为《狱中书札》（Lettere dal carcere）的集子中。这两本书都是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1947 年 4 月 27 日，葛兰西在获大赦后一周，在罗马的一家疗养院里与世长辞。

二、《狱中日记》和《狱中书札》的现实意义

葛兰西逝世以后，人们根据他在狱中写的 32 本日记的不同内容，汇编成 6 本集子出版：《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哲学思想》（Il materialismo storico e la filosofia di Benedetto Croce，1948）、《知识分子和文化组织》（Gli intelletuali e l'organizzazione della cultura，1949）、《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Il Risorgimento，1949）、《学习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及他的现代国家论有感》（Note sul Machiavelli，sulla politica e sullo stato moderno，1949）、《文学与民族生活》（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1950）、《往昔与今日》

(Passato e presente,1952) .

葛兰西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给后人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字资料。比如，他曾对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的阶级斗争、南北方差异以及梵蒂冈在意大利历史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这些笔记对于后人学习意大利近代史无疑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葛兰西在《狱中日记》中，对意大利文化的历史作用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文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璀璨夺目的瑰丽景象，但由于它缺乏群众基础，最终只成了一时的辉煌和荣耀；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化没有能从人文主义和阿卡狄亚诗派的窠臼中完全摆脱出来，故内容显得空洞乏味。葛兰西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历代的意大利文人往往陶醉在昔日文学鼎盛时期云蒸霞蔚的美景之中而孤芳自赏、故步自封，他们严重脱离社会现实，即使像维尔加这样的优秀作家也不能全面、深刻地反映社会下层群众的要求和心声。葛兰西立场鲜明地反对克罗齐的‘ 感觉先于观念和行动 ’和‘ 纯艺术 ’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了文化深刻的内涵；他认为，文学作品是特定社会环境的艺术体现,在着力表现‘ 艺术美 ’的同时,它必须具有丰富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否则它不可能真正地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除了《狱中日记》和《狱中书札》以外,葛兰西还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他的影响远远超越政治的范畴，他在文学上的独特见解以及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成了现代知识分子学习的楷模。

第三节　反对文学和新现实主义

1930 至 1945 年间，意大利文坛上涌现出一批不同凡响的青年作家,他们才思敏捷,风格新颖,思想活跃,文笔超逸,逐渐成为

一支颇有影响的文化骨干队伍。其中，有一部分作家和诗人即使到了上世纪 50、60 年代依然坚持文学创作,锐气仍不减当年 少数人在进入耄耋之年后，继续锲而不舍地在文学园地里辛勤耕耘。由于法西斯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这些作家的政治倾向在 1945 年之后才日趋明朗。在他们的作品中，出现了新现实主义的萌芽，体现了战后意大利文学的主要特征，故被人称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现实主义 ”或“ 反对文学 ”。同战后的隐逸派诗人和抒情散文作家相比，他们的反法西斯立场较为明显，作品中充满着开拓现实主义文学的创新精神。

法西斯政权为了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文化、知识界中所谓的“ 政治异己分子 ”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罗马作家莫拉维亚于 1929 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法西斯当局敏感地嗅出小说中的‘ 反叛 ’味,下令禁止小说的出版。 1941 年,莫拉维亚的另一部小说《假面人》问世,他采用隐喻的艺术手法,嘲讽法西斯党魁墨索里尼，为了避免法西斯的猜疑，作者用的是化名。西西里作家维多里尼的小说《红石竹花》,也因《索拉利亚》文学杂志社被法西斯查封而未能如期出版。比埃蒙特作家帕韦泽因反对当局罪而被判处流放 3 年的徒刑。这些在政治上不愿随波逐流的作家，努力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反映和暴露战后的意大利社会现实，意象新颖，风格迥异，其中较突出的有莫拉维亚的《冷漠的人们》(1929)、阿尔伐洛的《阿斯勃洛蒙特的人们》(1930)、培尔纳利的《三个工人》(1934)、帕韦泽的抒情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1936)、维多里尼的《西西里见闻》(1938—1941)等。这些题材不一的作品形象地勾勒出战后意大利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精神境界，同意大利的传统文学大相径庭，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和深邃的含意。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崛起也受了美国文学的一定影响。帕韦泽和维多里尼不仅翻译了不少美国进步文学作品，而且

还撰写了一些文学评论，为美国文学在意大利的传播作出了贡献。由于他们两人的努力,意大利人民开始阅读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安德生、海明威、福克纳、多斯·帕索斯、斯坦贝尔、德莱塞等人的作品，从而对战后美国社会中尖锐的阶级矛盾加深了认识。

一、科拉多·阿尔伐洛(Corrado Alvaro 1895—1956)

阿尔伐洛出生在意大利南方喀拉布里亚，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迁居北方之后,他一面从事文学创作,一面为都灵《新闻报》和《世界》、《二十世纪》等文学杂志撰稿。1930 年发表的《阿斯勃洛蒙特的人们》(Gente in Aspromonte) 揭开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帷幕。小说叙述了一个青年牧人为抗议主子的残酷欺压而沦为盗匪的故事。后来,随着法西斯政权的日益巩固,作者的政治立场变得模棱两可和动摇不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曾一度担任意大利作家工会主席之职,1956 年殁于罗马。

阿尔伐洛在一生中写了许多不同题材的作品,主要有《灰绿色的诗》(Poesie grigioverdi，1917)、《篱笆与菜园》(La siepe e l'orto,1920)、《迷路的人》(L'uomo nel labirinto,1926)、《窗前的恋人》(L'amata alla finestra,1929)、《阿斯勃洛蒙特的人们》(1930)、《苏维埃俄国之行》(Viaggio in Russia,1935)、《人的伟力》(L'uomo è forte,1938)、《短暂的岁月》(L'età breve,1946)、《大半人生》(Quasi una vita,1950)、《时代与希望》(Il nostro tempo e la speranza，1952)、《75 则故事》(75 racconti,1955)等。

在阿尔伐洛生活的时代，意大利社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他自幼目睹了北方工业的迅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高潮带来的一系列令人担忧的严重社会问题。他是一位南方作家，但没有被北方工业虚假的繁荣所迷惑,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在工业化和都市化的背后,隐藏着导致南北方平衡失调的危机,这在他的文学作品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他接受欧洲颓废主义文学思想的影

响，在揭示南方贫穷落后面貌和描摹农民凄凉悲惨生活境遇的同时，对不切实际的理想世界充满瑰丽的憧憬，时而沉湎在对美好童年生活的回忆之中，时而把景色迷人的乡村描绘成都市居民向往的世外桃源。

阿尔伐洛较成功的作品要数他的长篇小说《阿斯勃洛蒙特的人们》和若干富有新现实主义风采的日记体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笔下的喀拉布里亚已不再是富有浪漫主义和颓废主义色彩的人间乐园或沙漠中的绿洲，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南方牧羊人每日艰难困苦的生活。在作品中，牧羊人的形象被描摹得惟妙惟肖，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们蹲在破屋前，嘴上叼着烟斗，时而仰首遥望,企盼着久旱之后的甘霖;时而长吁短叹,山区贫困、凄凉的生活使他们的脸上布满愁云；时而思念心上的恋人，想象着有一天成为财主家的嘉宾，吝啬、贪婪的老爷亲自把着酒壶给他们斟酒，而他们则举杯痛饮；时而以毫无表情的目光，回首凝望着用碎砖垒起来的小屋和烈日下破旧的村舍……在作品的字里行间蕴含着作者对财主的鞭挞和对穷苦百姓深切的同情。

二、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07—1990)

1. 生平与创作

莫拉维亚是 20 世纪意大利文坛的一位主要人物，他以描写世态炎凉的现实社会及缺乏爱情内容的性生活而闻名于世。他原名阿尔贝托·宾盖莱，出生在罗马一户殷富的家庭，其祖父是以色列人。他自幼患骨结核，9 岁起长年住在疗养院里。在 10 余年的休养期间,他潜心研习法语、德语、英语,阅读薄伽丘、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作家的作品，文学素养日趋深湛，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9 年,年仅 22 岁的莫拉维亚在患病期间,以顽强的毅力写成了他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Gli indif-

ferenti），这是一部描写一个中产阶级母亲和她的两个孩子道德败坏的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出版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他因此声名大振，引起了文学界人士的普遍关注，新闻界也为他敞开了大门。

在德国占领意大利期间，莫拉维亚随着避难的人流到了罗马附近的方迪，战争的炮火使他在逃难的过程中同社会中下层人民有了频繁的接触。正是从那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中，他撷取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写成了长篇小说《乔恰利亚两妇人》（La Ciociara）他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形象栩栩如生的人物，给人们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莫拉维亚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在大战之后写了许多作品。他笔下的妇女形象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每个都被刻画得十分生动，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真实感，他因此成为蜚声国际文坛的意大利小说家。他的许多作品已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尤其在美国颇受公众的赞赏和喜爱；他的一些主要著作也先后被搬上了银幕。《乔恰利亚两妇人》改编成电影后，在片中扮演女主角的意大利著名影星索菲娅·罗兰于 1961 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金像奖。

在将近半个世纪中，莫拉维亚共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近 40 部，曾多次荣膺意大利各种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冷漠的人们》（1929）、《奢望》（Le ambizioni sbagliate，1935）、《假面人》（La mascherata，1941）、《阿科斯迪诺》（Agostino，1944）、《瘟疫》（L'epidemia，1944）、《罗马女人》（La romana，1947）、《忤逆》（La disubbidienza，1948）、《随波逐流》（Il conformista，1951）、《罗马故事集》（Racconti romani，1954）、《鄙视》（Il disprezzo，1954）、《乔恰利亚两妇人》（1957）、《罗马故事新编》（Nuovi racconti romani，1959）、《烦闷》（La noia，1960）、《不由自主》（L'automa，1962）、《天堂》（Il paradiso，1970）、《我和他》（Io e lui，1971）、《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La vita interiore，1978）、《1934 年》（Il 1934，1981）等。

莫拉维亚的大部分作品都写感情脆弱、离群索居、生活渺茫、既不能情投意合相爱，又不能乱伦放纵的尴尬处境。评论家都称道莫拉维亚的写作风格朴实无华、不加修饰，能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奥秘，叙述笔调巧妙，能写出令人信服的人物，对话写来如见其人。莫拉维亚关于文学和现实主义写作风格的见解都收入评论集《人就是目的》(L'uomo come fine，1963)和他的自传《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一生》(La vita di Alberto Moravia，1990)中。

莫拉维亚在谈到《冷漠的人们》一书时，曾这样说过："小说通过两天中发生的一切，从侧面剖析了罗马上层人士的家庭生活。我原想采用小说与戏剧形式相结合的体裁，但后来却勾勒出暴露和抨击罗马资产阶级的画面……"小说中揭示的家庭丑闻有影射现实生活之嫌，故引起了法西斯当局的警觉。新闻媒体对《冷漠的人们》进行措辞严厉的公开抨击，其中还有墨索里尼弟弟撰写的文章。小说出了第5版后，法西斯当局就下令禁止再版，作者同法西斯政权的关系为此日趋恶化。显然，莫拉维亚在《冷漠的人们》中所描写的社会现实，同法西斯鼓吹的强盛的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小说所展示的世界阴霾笼罩、黯淡无光，小说中的人物对社会政治倦怠、冷漠，徒劳地试图以放纵情欲来忘却内心的不安和悲痛。作者采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细腻地描写人物内心的空虚和忧伤，在语言上力求简洁，尽量避免过于抒情的描述。

莫拉维亚的叙事体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在揭露资产阶级颓废、消沉的精神状态的同时，没有注意从社会内部寻找病根。他没有意识到：在冷漠和厌世的背后隐藏着信仰和理想的危机；人物的变态心理绝非是个人性格突变所致，它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比如，在中篇小说《阿科斯迪诺》中，他描绘了一个富家少年刚跨入青春期后对异性的好奇和追求。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他对童年时光的无限留恋，以及对青春突然到来茫然不知所措的心理状态。在同一群劳动人民子女的相处中，阿科斯迪诺

觉得他们举止粗野、谈吐庸俗,但他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不少他前所未闻的有关性的知识，从而心中产生了对异性热烈追求的欲望。

莫拉维亚在 50 年代前后所写的小说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在《罗马女人》中,作者叙述了一位贫家少女误入青楼沦为妓女的故事,并通过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揭露了法西斯警方的种种丑恶内幕。《随波逐流》中的主人公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正常人”,甘心充当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的成员，并参与了 1937 年暗杀著名反法西斯战士罗赛利兄弟的罪恶活动，沦为这一起鼓噪一时的丑闻的制造者。《乔恰利亚两妇人》描绘了一群逃离战祸的平民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并通过来自罗马附近乔恰利亚地区的母女俩的不幸遭遇，无情地控诉了罪恶的战争。小说中故事的高潮是在荒废了的、被炸得只剩下一付空架子的教堂里展开的:为了躲避盟军轰炸机对村子的袭击,母女俩逃至教堂,一伙摩洛哥士兵突然从教堂的黑暗处涌出,在圣坛前野蛮地糟蹋了她们;母女俩蜷缩在教堂的瓦砾场上,身心备受摧残;母亲绝望地扶起纯洁、善良的罗赛达,心中痛苦万分,为了保护罗赛达,母亲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历经艰辛,但是最后还是失去了她生活中唯一的精神寄托。

60 年代之后，莫拉维亚的小说在题材上有较大的变化，主要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病态心理和厌世情绪，色情描写渐渐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西方消费社会中上层人士精神上的需要。其中,短篇集《不由自主》主要表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失衡:现实就如梦幻一般令人费解,而生活则好似一架自动电唱机,唱针随时有可能不由自主地滑出槽纹。长篇小说《烦闷》叙述了一位青年画家的故事：他把艺术创作和放纵情欲作为逃离孤独和忧愁的唯一出路,最后以自戕结束生命,表现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小资产阶级精神空虚的不治之症。作者经过 7 年的酝酿,在 1978 年发表对话体小说《一个少女内心的独白》,刻意反映西方世界青年一代的痛苦和彷徨，以及他们妄图以纵欲同现实抗

衡的精神状态;小说尽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内容颓废、荒诞,出版后即引起意大利社会各界人士极大的反响，小说也因色情描写过甚而一度停版。

就艺术言,莫拉维亚的文笔直率简洁、明确生动,不甚讲究文辞的修饰,即使在写景和叙事的段落里,也很少有大段的抒情的描写。他擅长运用一些不起眼的常用词，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富有真实主义文学的韵致。他的小说,尤其是后期的作品,在人物精神世界的分析和情景描写方面有独到之处，但故事情节的结构显得较为松散。

莫拉维亚一生共写了 17 部长篇小说,10 部评论集和游记,12 部短篇小说,10 部剧作，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学执着的追求。他的作品已被译成 37 种不同的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流传。正因为如此,他被誉为‘ 意大利的巴尔扎克 ’和‘ 20 世纪划时代的伟大作家 ”。

2. 成名作《冷漠的人们》

据莫拉维亚自己的回忆，《冷漠的人们》的创作始于 1925 年 10 月,1928 年 3 月脱稿。从内容上分析，这部小说与当时为法西斯政权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大相径庭，鞭辟入里地抨击了资产阶级的冷漠自私和庸俗虚伪；从形式上说，它恢复了被现代派完全否定的现实主义传统，并在许多地方有所突破。正因为如此，小说问世后好评如潮，短短数月内便连印 5 次。法西斯当局认为这部小说离经叛道,具有潜在的危险性,故下令禁止印行;梵蒂冈也以‘ 伤风化罪 ” 将它列入禁书。与之相反，个别意大利左派评论家却认为《冷漠的人们》是新现实主义文学的发轫之作,并称:在法西斯统治史和意大利文化史上,1929 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两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即莫拉维亚的《冷漠的人们》和阿尔伐洛的《阿斯勃洛蒙特的人们》在同一年中付梓印行。

小说的主人公卡拉和米盖莱是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两个纨绔子弟,富裕的物质生活使他们丧失了激情和信念,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成天浑浑噩噩地打发日子。他们的母亲格拉齐亚是一个十足的拜金主义者，她穷奢极侈，整天沉湎在荒淫、糜烂的生活之中。当米盖莱得知道貌岸然的商人莱奥是其母亲和妹妹共同的情夫时,心中不禁怒火中烧,欲开枪将他杀死。然而,米盖莱缺乏勇气将复仇的计划付诸实施,最后屈从于现实的安排,竟然与莱奥合伙做起了投机生意。与米盖莱一样,卡拉也是一个“冷漠的人”,当改变现实和开创新天地的梦幻破灭之后，她对生活完全失去了信心，变得对什么都麻木不仁。卡拉和米盖莱虽然对莱奥恨之入骨，但是在虚荣心的支配下，他们最终还是默认了命运的安排。

莫拉维亚以细腻入微的叙述、发展缓慢的情节以及变化不多的句型,刻意营造出一种沉闷压抑的气氛,对突出小说的主题起了烘云托月的作用。《冷漠的人们》无情地撕下了蒙在资产阶级脸上的一层面纱，使它的丑恶本质暴露无遗。莫拉维亚在小说的末尾独具匠心地安排了一场假面舞会，隐喻小说中戴着假面具的人物，继续无奈地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三、埃利奥 · 维多里尼(Elio Vittorini 1908—1966)

维多里尼是 20 世纪意大利著名小说家、翻译家、文学评论家。他写有多部新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记录了意大利遭受法西斯统治的经历以及 20 世纪的人在社会、政治和精神方面的苦难。他和帕韦泽同为译介英美一些作家作品的先驱。

1. 生平与创作

维多里尼出生在西西里岛希拉戈萨一个铁路员工的家庭，母亲是希腊人的后裔。1924 年，他为了更好地认识和了解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毅然中辍学业,离乡外出。为了谋生,他从事过筑路工

等各种不同的职业。迁居佛罗伦萨后,他担任《民族报》的审稿工作，同时又是文学杂志《索拉利亚》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1934 年起,他开始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为美国文学在意大利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36 年 7 月，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在德、意法西斯军队的直接参与下,发动了西班牙内战。世界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政府，组织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作战。在这一形势的鼓舞下,维多里尼以旺盛的斗志投身于政治运动,其文学思想也日趋革命化。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红石竹花》(Il garofano rosso)写于 1933—1935 年间,在描写一个青年的学习及性问题的同时，公开揭露法西斯统治下的邪恶政治气氛。1941 年，维多里尼发表了他的代表作《西西里见闻》(Conversazione in Sicilia)。由于该书明显的反法西斯政治色彩，出版数日后就被法西斯当局列入禁书。作者在思想上追随意共的政治路线，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1945 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他立即创办期刊《综合工艺》(Politecnico),提出革新意大利文化的主张,并就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展开讨论，对战后的意大利文学有一定的影响。1947 年,维多里尼脱离意共,《综合工艺》也随之停刊。简而言之,维多里尼是一位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勇于实践,敢于创新,是 20 世纪前几十年中意大利文坛上颇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晚年,他居住在罗马,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维多里尼的主要作品有：《小资产阶级》(Piccola borghesia，1931)、《西西里见闻》(1941)、《人与非人》(Uomini o no，1945)、《红石竹花》(1948)、《墨西拿的妇女》(Le donne di Messina，1949)、《公开的日记》(Diario in pubblico，1957)等。他的评论文章均收在《公开的日记》中。他死后出版的作品有文艺思潮评论集《两种紧张形势》(Le due tensioni，1967)。

1936 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极大地震动了年轻作家的心，成为维多里尼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政治上的激情促使他于同

年 9 月开始创作题材与早年作品迥然不同的《西西里见闻》,藉此倾吐心中的义愤。小说记述了作者想象中的一次回乡之行，书中的主人公在阔别多年的西西里岛上同家人及许多不同的人物进行诚挚的交谈,和他们一起回首往事,叙谈今日之生活,淋漓尽致地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末意大利南方浩繁的生活画面。作者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生动人物形象：望着无人问津的柑桔而神情茫然的桔园工人,以洋葱充饥、病魔缠身的穷人,面对疟疾、肺病肆虐而一筹莫展的农夫,迫切希望改革现状的赶车人，骄矜专横的警察……作者通过在家乡西西里耳闻目睹的一切,试图给读者这样一个启迪 纵然世界是如此的广袤和美丽,但它却蒙受着耻辱,因为每个人只是关心自己的命运,而无人为遭受贫困、疾病和暴力折磨的世界哭泣,世界将在无休止的痛苦中继续生存下去。在作者看来,世上的人共分为‘ 人 ’与‘ 非人 ’两类 所谓的‘ 人 ’即遭受迫害和对社会履行义务者,而‘ 非人 ’指的是那些迫害他人和只顾既得利益的凶残者。他认为,贫困、疾病、战争、剥削和压迫是人类的公敌,而法西斯专政压制自由,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1941 年维多里尼迁居米兰，并在那里参加意共地下组织，配合游击队一起工作。《人与非人》就是以米兰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背景的一部小说。随着法西斯政治面目的日趋明朗，作者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把文化领域中的政治斗争看成是超越历史和拯救人的斗争，认为法西斯专政的反动在于它对人的危害，而不是对整个社会的破坏。他的观点受到当时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严厉批评。

就艺术而言，维多里尼擅长运用富有音乐感的诗歌语言描写人和物,抒情韵味浓重。他在写《西西里见闻》时曾意味深长地说过“:现在我已习惯于通过人物的举止和谈吐表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至于他们具体感受什么，想些什么，我自然无法加以描绘，

否则就会显得牵强附会。”

2. 代表作《西西里见闻》

《西西里见闻》被公认是维多里尼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较形象地体现了作者富有抒情韵味和象征意义的写作风格，曾于1938—1939年间在《文学》杂志上以《名字与眼泪》为题连载。小说中的主人公希尔维斯托洛，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他在阔别西西里多年后想象中的回乡之行，并通过与其母亲及其他许多人物的交谈，展现了30年代末意大利南方贫穷、落后的社会生活画面，抒发了作者对受欺压的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现实与象征在叙述中每每和谐地交融在一起。通过希尔维斯托洛西西里之行的所见所闻，维多里尼向人们揭示了这么一个可悲的事实：人人只关心自己的命运，无人为这充满痛苦和遭受蹂躏的世界担忧或哭泣。尽管希尔维斯托洛的叙述具有象征性和超现实的特点，但是它确实反映了意大利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精神境界。在一系列人物凄切的诉说背后，读者似乎看到了西班牙战争和法西斯的魔影，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不切实际的理想世界的憧憬。西西里岛上旖旎的自然风光把希尔维斯托洛重新带回遥远的童年时光，美好的回忆不仅是作者逃避现实的一种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人们重新找回生活之真谛的决心。归根结蒂，正是作者笔下的人物维护着生活的真理，揭明了世界的虚伪，而他们痛苦的人生经历正是人类必须获得拯救的实证。

四、契萨雷·帕韦泽(Cesare Pavese 1908—1950)

1. 生平与创作

帕韦泽是诗人、评论家、小说家和翻译家，曾将许多英美现代作家的作品介绍给意大利。他出生于意大利北方比埃蒙特地区古

奈奥省一个小镇,其父是该镇的一名官员,拥有一些产业。后来他随全家迁至都灵,并在该地上中学和大学。在都灵生活期间,葛兰西和哥白迪等反法西斯战士在政治上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1930 年大学毕业后,他一面担任期刊《文化》(La cultura) 的编辑工作,一面翻译美国文学作品。1935 年《文化》被法西斯当局查封停刊,几位主编也被先后投进监狱,帕韦泽也遭株连,被捕入狱,后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监狱》(1949)和《同志》(1947)中。1943—1945 年间,他与比埃蒙特山区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生活在一起。回都灵后,他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并兼任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的主编。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以及大战结束后,他始终未直接参与政治斗争,但在政治上倾向意共,并在意大利解放之后加入意共组织。1950 年因失恋而陷入精神危机,后在都灵一家旅馆里自戕。

帕韦泽的主要作品有:《令人疲惫的劳动》(Lavorare stanca, 1936)、《你的家乡》(Paesi tuoi, 1941)、《海滩边》(La spiaggia, 1942)、《八月的瞻礼日》(Feria d'agosto, 1946)、《同志》(Il compagno, 1947)、《与雷乌库的谈话》(Dialoghi con Leucò, 1947)、《山坡上的房子》(La casa in collina, 1948)、《监狱》(Il carcere, 1949)、由《美丽的夏天》(La bella estate)和《山坡上的魔鬼》(Il diavolo sulle colline)及《三个孤独的女人》(Tre donne sole, 1949)组成的短篇小说集《美丽的夏天》,以及《月亮和篝火》(La luna e i falò, 1950)等。

1930 至 1935 年间,帕韦泽发表了不少译著和文学评论,在他身后被汇编成集,题为《美国文学、小品文和评论》(La letteratura americana e altri saggi, 1951)。他撰著的长、短篇小说对 20 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他被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家,但实际上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颓废主义色彩,他在 1950 年的悲惨结局以及他身后出版的题为《生活的本领》

（Il mestiere di vivere，1952）的日记体作品就是一个有力的明证。他的一些主要著作在他死后才被发表，较著名的有一卷爱情抒情诗和短篇小说集《节日之夜及其他故事》（Notte di festa，1953）。1966 年他的一部书信集问世，收入了他 1924—1950 年的信札。

帕韦泽作品的内容不外乎以下几个方面：由于城乡生活惊人的差异，南方农民大量流入北方工业城市谋生 富有美丽自然景色和简朴生活方式的农村，是文明的发祥地和都市人理想的自由王国；人与人之间无法进行思想上的交流 对死亡的冥想和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追忆。在他的叙事体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描写童年生活的片段，他把孩提时代视作文学创作灵感的本源及人认识世界的开端。他认为，人成年后的生活经历只不过是澄清和证实童年时代对世界的初步认识，故成年人的思想意识往往受到童年生活的影响和限制。基于上述理论，作者进一步提出城市与乡村、原始时代与文明时代的关系问题。他认为 泰坦精神，即对社会、文艺创作等方面习俗的造反精神，是 20 世纪文艺作品的核心；英国作家吉卜林和意大利颓废主义作家邓南遮在其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方面积极反映这种精神，爱尔兰作家乔埃斯和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则努力在形式上表现它 即使在意大利浪漫主义诗人莱奥帕尔迪、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的作品中，泰坦精神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指出：都市化和文明化是进步和美好的象征，然而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却给人们带来痛苦和约束 尽管如此，人们对未来还是充满着美好的憧憬，而欢乐和幸福则来自他们对童年瑰丽梦幻的追忆。他的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试图告诉读者“：青少年对都市生活充满美好的想象，但他们对乡村仍怀有一种自豪的感情。一旦他们在都市中定居之后，则又会感到孤独无依，只得以放纵情欲来慰藉自己。这只能是毁了他们，使他们在感情上远离乡村和城市，陷于凄凉、寂寞的境地而不能自拔，这就是青少年的结局。”在他看来，人生是一出由欢乐、痛苦和孤独组成的

悲剧,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给人们创造了沟通思想的理想环境,因为并肩作战的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感情。由于帕韦泽在人生道路上始终未能找到一位真正了解他内心世界的挚友，加之爱情生活不遂心意,故无法从莫名的孤独中解脱自己,最后以轻生来结束内心的悲痛。

帕韦泽著述富宏,较著名的有短篇集《美丽的夏天》和长篇小说《月亮和篝火》。《美丽的夏天》由 3 个短篇组成,均以都灵为写作背景,其中,第 1 篇叙述贫家姑娘齐尼娅的初恋生活；第 2 篇描写富家子弟波利如何遭受肺病和毒品的痛苦折磨；第 3 篇中的主人公克莱丽亚在外走运后回到都灵,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但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虚伪、腐朽的关系使她从梦幻中醒悟,最后青年工人培科乔的爱情使她重新获得了生活的勇气。长篇小说《月亮和篝火》是一则阴郁而又充满同情心的故事,讲述男主人公如何想通过回到他幼年时代成长的地方来找回自我，被公认为他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曾获得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小说中的主人公,在侨居美国多年后重归家园,但故土除了景色依旧外,一切已变得面目全非,他同昔日的好友一起回首往事,感慨万端,最后他打消了在家乡安度晚年的念头，步履踉跄地再次踏上去美国的旅途。

2. 作品分析

自 30 年代起，帕韦泽就开始介绍美国文学，但由于法西斯政权采取文化高压政策，他只得翻译一些上世纪 30、40 年代美国作家的作品,其中他特别推崇美国 19 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家、诗人梅尔维尔和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的作品。由于受到梅尔维尔的影响,他变得热衷于神话、象征和原型,1947 年发表的《与雷乌库的谈话》用诗意的语言谈人类的境遇,给人的印象尤深。帕韦泽通过回忆希腊的神话传说，表现人生的孤独以及对童年神话时代的向

往,并将之视作人类命运中亘古不变的重要因素,而这正是贯穿帕韦泽所有作品的两个主题。

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以叙事式的诗体着力表现的也是同样的主题 异乡游子因精神空虚、生活孤寂而产生的对故土的无限神往；梦中美丽的神话破灭后人们再次回到痛苦的现实中去的无奈和沮丧。诗集中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均因无法融入现实生活而陷于绝望之中 前者富有幻想,对摆脱孤寂的生活境遇仍充满希冀,试图借爱情的力量驱散积压在心底的惆怅；而后者则生活在绝望的孤寂中，徒劳地以酗酒来暂且忘却内心的忧愁。这些来自贫穷农村、无法适应都市生活节奏的可怜人儿,深情地回忆起家乡的山山水水，对故土的一草一木充满深深的眷恋。下面的几小节诗选译自帕韦泽的第一部诗集《令人疲惫的劳动》,诗中描写农村青年进城后遭受社会排挤的孤独与苦闷，以及他们对故土的无限神往：

只有少年才会
穿过大街从家里出走，
可这个成年人不是离家的孩子
却整天在街上四处游荡。

夏日的午后
空寂的广场
夕阳渐渐西沉，
沿着两旁长满无名树的林阴路
他来到这里停下脚步。
他独自在空荡的广场和街上不停转悠，
何必如此孤独
难道他注定将孑然一身？
得叫住一个女人，

同她讲话，并劝她与之共度一生。
否则他只得自言自语，
惟独夜间的酒鬼，
才会对他讲述梦中美丽的人生。

他独自走在空寂的广场上
不时地驻足四下环视
等待着另一个人的出现。
假如他有一个两人世界，
即使走在路上
想起家中妻子期待的目光，
再大的苦难也会烟消云散。
夜晚的广场空无一人，
他双目低垂
看不到朦胧灯光下的房子，
脚下的石板路面
是同他一样手上长满老茧的人
一块一块铺成。
他不该停留在寂寥的广场上，
路上定有一个女人，
经恳求，愿意与他共度人生。

《山坡上的房子》是一部自传体短篇小说，被公认为帕韦泽最出色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主人公科拉多是一位对生活缺乏激情的知识分子，他生性内向、不善言辞，深陷于莫名的孤寂之中，久而久之变得对周围的一切麻木不仁。面对战争，许多人作出了投身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抉择，而他却固执地不与他人“同流合污”，继续孤独地生活在完全的自我之中。为此，他逃离城市，回到了梦寐萦

怀的家乡，试图栖身于大自然秀丽景色的怀抱之中，在对神话般童年岁月的追忆中忘却世上的一切烦恼。可是没过多久，战火蔓延到了他蛰居的山村，那里的一草一木同样沾满了殷红的鲜血，他那不切实际的梦幻随之变成泡影。这时，他犹如大梦初醒，开始为试图陶醉在自我世界里的自私举动感到羞愧。他终于意识到：只有为他人或某项事业活在世上，一个人的人生才有意义。

五、埃米利奥·嘉达(Emilio Gadda 1893—1973)

嘉达是 20 世纪意大利的一位随笔作家和小说家，自幼在米兰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中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毅然从军，在一次山区作战时不幸被敌军俘获。 1931 年之前，他一直以电气工程师为业。1926 年起,他在文学杂志《索拉利亚》上陆续发表了不少作品，随即便显示出他在运用语言方面出众的才能，以及冷静犀利的心理分析和社会分析能力，曾先后 4 次获得意大利文学奖，1973 年殁于罗马。

他的主要作品有：《哲学家的圣母》(La madonna dei filosofi, 1931)、《乌迪奈城堡》(Il castello di Udine, 1934)、《阿达琪莎》(L'Adalgisa , 1944)、《曼罗拉纳路上的惨案》(Guer pasticciaccio brutto de via Merulana, 1957)、《痛苦的认识》(La cognizione del dolore, 1963)、《厄洛斯与伯利亚波》(Eros e Priapo, 1967)、《机械》(La meccanica, 1970)等。

在 20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史上，嘉达可谓是一位独树一帜的作家。为了在作品中生动、形象地反映社会现实，他大胆采用方言、俚语、术语和外来语烘托气氛,语言生动活泼,不落俗套,对 20 世纪意大利的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在战争年代，大部分欧洲散文体作家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和过分渲染的修饰，着意反映人们孱弱的精神面貌。为此,嘉达一针见血地指出 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血就是血,作家在描述战争场面的时候,切不可采

取迂回手法,用另一个温和的词语来取代它,这就好像不能把意大利对利比亚宣战的理由自圆其说地解释成“因为到了采葡萄和无花果的季节”一样。他还说,为了保卫神圣的国土,意大利人民同入侵者展开了浴血奋战，倘若用悠扬悦耳的曼陀林曲烘托激战的气氛,那同样是荒谬绝伦的。

在他看来，一个真正的作家，务必是一位出色的语言组织者，他好比是一个技术高超的泥水匠，得设法使每一块砖瓦的位置都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他拒绝传统的文学语言或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俗套语，擅长运用各种不同人物的行话来描摹他们的性格和内心世界。他笔下的人物,不管是公证人、工程师,还是律师或银行的董事，个个形象生动逼真，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他认为,战士逢人便叙述激烈的战斗场面,水手爱谈论大海的浩瀚,产妇总是喜欢唠叨分娩时的痛苦,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诚然,嘉达所追求的并不单纯是语言的艺术感染力，他努力运用手中的笔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繁荣和现代化的技术,主张诉诸武力来维持社会秩序,极力反对法西斯中的右翼分子。

嘉达的笔锋犀利、尖刻,常采用夸张的手法,无情地鞭挞战后意大利现实社会的虚假和堕落。1957 年,嘉达的代表作《曼罗拉纳路上的惨案》发表后,一下子便成为畅销书,他也因此蜚声意大利文坛。小说以法西斯统治时期为背景，叙述了发生在曼罗拉纳路上的两起凶杀案，并通过南方出生的检察官调查这两桩似乎互不关联的案件的全过程，向人们揭示了意大利小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种种内幕，隐喻法西斯专政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故事自始至终围绕着现实社会矛盾的两重性展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意大利美丽而懦弱,虔诚而纷乱,纯洁而多疑,即使罗马的气候也是温暖而闷热。作者采用的语言辛辣而幽默,寓意深长,表达了人们对战后意大利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失望。

嘉达的另一部重要作品是《痛苦的认识》，小说以南美洲某个国家为背景，着意刻画主人公贡萨洛的感情变化，隐喻法西斯专政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贡萨洛生性乖戾，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同他母亲争吵不休，最终导致两人感情破裂。他同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格格不入：他厌恶父亲留给他的乡间别墅，憎恨粗鲁的农民和大声吆喝的流动小贩，即使对夜巡队也是满腹猜疑；母亲遇害后，贡萨洛深感内疚，痛苦万分，陷于绝望的境地之中。

六、伊亚乔 ·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

西洛内出生在意大利中部阿勃鲁佐地区贝西纳一个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母亲是纺织女工。14 岁那年,他的父亲和 5 个兄弟均在地震中罹难，年幼的西洛内被迫中辍学业。他自幼对社会政治十分敏感，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农民贫困的生活使他对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推翻旧世界的坚强决心逐渐在他的脑际形成。他满怀革命的热忱投身政治斗争，毫不掩饰他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积极参加意共的筹建工作，并在法西斯统治时期担任意大利共产主义青年联盟主席和意共内部的重要职务。为此，他参加编辑工作的几家出版社多次遭受法西斯别动队毁灭性的破坏。法西斯当局颁布特殊法令之后，西洛内被迫转入地下，继续和意共领导人葛兰西等一起并肩战斗。 1930 年因躲避法西斯的追捕，他逃往瑞士，同年因对斯大林的一些做法持有异议，被开除出意共组织。

1933 年,他在苏黎世发表处女作《方塔玛拉》（Fontamara）后一举成名。有人将《方塔玛拉》称誉为表现意大利南方贫苦农民生活的一部悲壮的英雄史诗。在意大利文学史上，南方贫苦农民还是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形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由于法西斯的政治迫害，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版前后曾遇到重重阻力。《方塔玛拉》发表后，得到了一部分欧洲作家的赞赏。作者的好友劝他将小说译成德文出版，但希特勒推行的纳粹政策使作者在波恩发表《方塔玛

拉》的计划化为泡影,最后只得改在瑞士出版。小说的问世引起了欧洲各国文化界人士的强烈反响，波兰和美国不久即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搬上银幕，托洛茨基曾把它称颂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在这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文学作品中,作者用人民党的思想，揭示了家乡农民遭受欺凌和剥削的不合理社会现象。小说曾先后被译成 25 种外国文字出版。

西洛内对哺育他成长的家乡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事实上，他的文学作品(小说、剧作、评论等)几乎都是以阿勃鲁佐地区为写作背景的。但是，他在作品中提出的以人道主义缓和阶级矛盾的主张带有明显的基督教色彩,这是他作品中较大的缺陷,后成为文学批评家们争论的焦点。1937 年，他的第二部反法西斯小说《面包与葡萄酒》（Pane e vino）的德文版在苏黎世发表，翌年意大利文版也相继问世,并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国文字出版,畅销整个西方世界。这部小说的背景是 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罪恶战争，故事情节以政治流亡者施毕纳在家乡的革命活动为主要线索展开，政治热情与宗教思想每每融为一体。正如作者本人所说,《面包与葡萄酒》标志着他孤独斗争的继续。

在国外 10 余年的流亡生活，使西洛内在精神上饱尝痛苦。在那些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里,他先后两次被异国政府驱逐出境,只是在大战结束后，他才获准前往英国和美国。西方世界的一些进步作家和文艺批评家对西洛内政治上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并在道义上给予了他很大的支持。1944 年，西洛内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在这以后的 15 年中，文学批评家们对他的文学思想和写作风格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往往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如同他坎坷的人生经历，西洛内创作的文学作品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他在无情鞭挞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同时,表达了人们对自由的无限向往。他善于通过作品中的不同人物表现其独特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思想,作品带有明显的宗教意识。在后期,西洛内

文学作品中的道义学说和宗教色彩有增无减。 1956 和 1968 年他曾两次荣获意大利文学奖，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一个可怜基督教徒的奇遇》（L'avventura di un povero cristiano，1968)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另外，他还写有小说《雪地里的种子》（Il seme sotto la neve，1942）、《一把桑葚》(Una manciata di more，1952)、《罗嘉的秘密》（Il segreto di Luca，1956）、《狐狸与茶花》（La volpe e le camelie，1960） ,以及政治评论作品《独裁者的学府》(La scuola di dittatori，1938）、《安全出口》（Uscita di sicurezza，1965） ,均以颂扬人的自由和尊严为主题思想。他撰写的一些政论文章具有明显的反共产主义倾向的社会民主思想。

七、埃米利奥 ·罗梭(Emilio Lussu 1890—1975)

罗梭出生在撒丁岛一个富裕家庭。 1914 年大学毕业,翌年应召入伍,开往前线作战,并因屡建战功,荣膺两枚银质勋章。战后，罗梭回到家乡,并于 1919 年创建具有社会主义政治倾向的撒丁岛“行动党”。1926 年被法西斯当局判处流亡 5 年的徒刑，1929 年逃往法国。1943 年回意大利后，他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并先后两次出任部长，1948 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他的主要作品有《锁链》(La catena，1929)、《向罗马及周围地区挺进》(Marcia su Roma e dintorni，1933)、 《高原上的一年》（Un anno sull'alpino，1938 ）等。在挚友的热情鼓励下，他在法国流亡时期写了反映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高原上的一年》，1938 年小说在法国出版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1916 至 1917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当时，年轻的罗梭是一位中尉军官。与其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一样，他也积极主张意大利参战，并满怀信心地投入这一场残酷的大屠杀。然而，战争的炮火驱散了他心中的迷雾，残酷的现实开阔了他的视野，也使他明白了许多道理。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有机会结识不少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并对他们的政

治理想和生活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小说《高原上的一年》中，作者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切，给人以真实、亲切的感觉。小说中丝毫没有邓南遮所宣扬的“光荣地死去”的传奇色彩，即使当战争的受害者勇敢地面对死亡的挑战时，他也从不流露出颓废主义的情绪。

小说中有下面这么一段描述，感人肺腑，寓意深沉：

> 我正在各连队巡查,迎面走来一位炮兵上校,后面跟着两名中尉。他耷拉着脑袋，手中提着一支枪，四周的爆炸声震耳欲聋，他大声吼叫着：“杀死我们吧，杀死我们吧!”我走上前去,让他通知我的部下同炮兵连取得联系，以改变炮击的方位。他没有认出我的军衔，故不搭理我，继续语无伦次地高声嚷嚷着。两个中尉军官目光失神，默默地跟在他的后面……我在一个小山洞里找到了团部总指挥官，他手持报话机端坐在那里。我匆忙向他汇报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神情沮丧，木然地倾听着我的诉说。我讲话的语气十分激昂，但他却安之若素。我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团长先生,我们今天干了多少蠢事啊!”团长蓦然站起身来,我以为他会轰我出去,但出乎意料，他走近来紧紧地抱住我，哽咽着对我说：“孩子,可这是我的职责啊!”

从以上的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战争的残酷事实正在教育着人们,使他们从‘武力创造美好未来’的梦幻中猛醒过来。从这一层意思来说,《高原上的一年》是一部颇有教育意义的写实小说。

第四节 隐逸派文学

20 世纪初,意大利现实社会中诸类矛盾纵横交错,面对前途，人们普遍感到忐忑不安和犹豫彷徨，不少文人便借助抒情诗这一较为理想的语言工具，抒发对现实的不满，表达自己对未来的憧憬。其中，有一部分诗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探索和开拓新诗的疆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们致力于寻求直率、简洁的语言和清澈、明朗的诗体,采用特殊的写作技巧,往往以寥寥数语来烘托隽永的含意。这种新颖的赋诗法,显然同 19 世纪的传统诗歌相去甚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意大利抒情诗吸收了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象征派诗歌的流派风格，力求在平易中见深沉，含蓄恬淡中见浓烈。诗人们认为：大自然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统一体,世界则是一座充满各种象征的、一望无垠的森林。他们摒弃诗歌创作中过于注重修辞的俗套赋诗法和在文字上精雕细镂的唯美主义积习,以新颖的意象和独辟蹊径的象征、比喻艺术手法,给冷隽、深沉的诗歌画面勾上了一道神秘、温馨的彩边。他们认为，诗人肩上所担负的重任不再是单纯围绕着诗歌直觉的核心堆砌感情和生活，他必须找到恰如其分的词语来表达富隽的寓意。他们提出,诗歌是摆脱绝望境地最理想的幻象,它宛如荒漠里的海市蜃楼和瓦砾堆上蓦然隐现的美丽童话，给人以莫大的鼓舞和积极向上的力量。

所谓的“隐逸派”是 20 世纪初发端于意大利的现代派诗歌运动,其作品的特点是非常规的结构,不合逻辑的顺序,以及高度主观性的语言。“隐逸”这个词是根据希腊人所称的古埃及月神赫尔墨斯・特里斯美吉斯托斯名字命名的，它产生于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梅和瓦莱里曾加以运用的 19 世纪诗歌理论。在意大利文坛上,人们普遍将 193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抒情诗称为隐逸

派诗歌，它的主要代表诗人有：翁嘉雷迪、蒙塔莱、夸齐莫多及萨巴；除此以外，另有一些散文作家和随笔作家也属于此种新颖的文学流派。隐逸派抒情诗人提倡“纯诗论”，主张用暗示和隐喻手法表达诗人的直觉，追求用词的新奇和语言的音乐感；在作品中，他们每每颂扬沿海的小镇、遥远的国土以及大海上的绿色小岛等美丽诱人的景色，以此隐喻现实与梦幻之间的矛盾，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隐逸派的形式主义手法，部分地派生于未来主义。但隐逸派诗人那种暧昧的简洁、晦涩和繁杂，乃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统治对文学严加控制所造成的结果，反映出处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诗人精神上的孤寂感及对生活的绝望；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丢弃传统的价值信仰，着力探索和挖掘各人的内心世界，表现自我心灵深处细微而又神秘的感受。他们的作品将人们引入一个抽象而又充满奥秘的世界，富有浓厚的感伤主义色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隐逸派抒情诗人以自己的独特风格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但是，战争的腥风血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他们对未来寄予的瑰丽希冀，迫使不少隐逸派诗人改变赋诗的主题。他们开始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旨在扩大和加深隐逸派抒情诗的深邃含意。在这一方面，隐逸派杰出诗人夸齐莫多为其同行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以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潜入生活的纵深处去开拓诗歌的意境，他的抒情诗着力表现人们向往民主和自由、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感情，具有新的生活气息和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夸齐莫多和蒙塔莱分别于 1959 和 1975 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作为一次文学运动，隐逸派开始时的领袖人物是翁嘉雷迪。他在巴黎接受的教育，使他更接近法国象征主义；他在其第一本诗集《被埋的港口》中,创作了一种强劲而纯净的抒情短诗,其中标点、句法、结构都被免除,以加强个别词汇的表达能力。他的《时代的感情》具有一种晦涩而深奥的象征主义韵味，因而使评论家在

一系列论文中,把这个运动命名为‘隐逸主义”。

一、朱塞佩 · 翁嘉雷迪(Giuseppe Ungaretti,1888—1970)

翁嘉雷迪是意大利隐逸派创始人。他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港，父母是意大利移民。直至 21 岁,他一直生活在亚历山大,因此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常出现埃及荒漠的景色。1912 年他去巴黎,在学习期间结识了一些当代诗人和艺术家，这对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14 年他回到意大利，积极主张意大利参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参加意大利军队,在战场上创作了他的第一卷诗集《被埋的港口》(Il porto sepolto,1916) ,诗不押韵,没有标点,却表现出摆脱传统形式、不受拘束的自由清新格调和深刻感情。1919 年,他又发表了抒情诗集《遇险者的欢乐》(Allegria di naufragi) ,抒发了他心中的迷茫、悲怆,以及对诚挚友情的向往，表现出莱奥帕尔迪式完美的古典风格。发表于 1933 年的《时代的感情》(Sentimento del tempo)收集了他从 1919—1932 年所写的诗,诗中使用了晦涩难懂的象征派语言,明显地反映了他创作风格上的变化。1936—1942 年他去南美，在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学。他 9 岁的儿子死在巴西,为此他在诗集《痛苦》(Il dolore,1944) 中表达了丧子和对纳粹主义及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暴行的悲愤。1942 年，他回到罗马，被委派在罗马大学教授意大利当代文学直至到 1957 年退休。在这期间出版的重要作品有《福地》(La terra promessa,1950)、《呐喊与风景》(Un grido e paesaggi,1952) ；后期作品有《失散的诗篇》(Poesie disperse,1959)和《老人的笔记》(Il taccuino del vecchio,1960)等,诗中充满了神秘的隐喻描写，悲伤与怜惜每每交错在一起。他的诗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幅在死亡威胁下凄凉、悲惨的生活画面,启迪人们去沉思人类的命运,谛听时代的呼声。此外,他还翻译了 14 世纪法国悲剧诗人拉辛的《费德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6—17 世纪西

班牙诗人贡戈拉、法国诗人马拉梅的作品及 18 世纪英国前浪漫主义诗人布莱克的作品，所有这些译作均收入在 2 卷本的《译文集》(1946—1950)中。

翁嘉雷迪曾说过“:死亡正威胁着文明世界,迫使人们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对永恒的来世来说，生命只是瞬息间的浮华。人的肉体渐渐衰老,直至死亡。想至此,人们不禁颤栗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使诗人陷于无限的悲怆之中,他越发觉得,传统抒情诗的意境和风格已无法反映时代的精神。翁嘉雷迪的诗歌意境深邃,他笔下的人物好似海上遇难的一叶轻舟,在沉入海底的瞬间产生强烈的求生欲望。下面选译的一首题为《守夜》的短诗,描绘了诗人在战争中的苦难经历，揭示战争只能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

整整一夜
我默默无语地伏在一个
被杀害了的
战友身旁
他龇牙咧嘴
脸庞朝着银盘似的月亮
他的双手
血迹斑斑
他的模样深深印在我的脑际
我挥笔写下了
充满爱的诗篇

我从来也没有
像现在这样
对生有如此强烈的欲念

翁嘉雷迪的抒情诗在不同的时期题材不一，风格各异：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的抒情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语言简练凝重，具有法国象征派诗人马拉梅诗作的韵味；他于 1933 年出版的抒情诗集《时代的感情》,标志着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阶段,文笔果断、敏捷,寓意隽永,着意表现人们在战争残酷现实面前的虚弱、孤独、沮丧、失望、犹豫和彷徨。继 1947 年《痛苦》问世后,诗人陆续发表了《福地》、《呐喊与风景》、《老人的笔记》等诗作,叹惜人类不幸的命运和自己丧子的痛苦。晚年的诗人以冷漠、悲愁、嘲弄的目光看待人生,面对桑榆暮景,他百感交集,诗句中除了感伤,依然残留着生活的欲望，以及对人生的眷恋。他的抒情诗朴实无华，凝练而又隐晦，蕴涵在字里行间的淡淡的苦涩总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种赋诗的风格对后来的隐逸派诗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埃乌杰尼奥 ·蒙塔莱(Eugenio Montale,1896—1981)

1981 年 9 月 12 日,20 世纪意大利最杰出的抒情诗人、 1975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埃乌杰尼奥 ·蒙塔莱在米兰与世长辞，终年 85 岁。翌日，意大利各报都以醒目的标题刊登悼念和缅怀他的文章，国际文化界也为失去一位当代的著名诗人而深感惋惜和痛心。

1. 生平与创作

蒙塔莱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港市热那亚的一个商人之家，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风光秀丽、景色宜人的利古里亚海滨度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中辍大学的学业应召入伍，担任步兵军官,曾在 1917—1918 年间参加过第一线的战斗。退役后，他迁居都灵,同当地一些反法西斯青年知识分子一起合编进步刊物,抒发政治理想。1927 年，诗人客居佛罗伦萨，先后担任出版社的编辑

和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的职务。1938 年,他因拒不加入法西斯党而被开除公职。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高涨的年代里，他积极参加抵抗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诗人迁居米兰,为《晚邮报》撰写稿件，并担任该报的音乐评论员和文学编辑。1967 年,意大利总统朱塞比 · 萨拉嘉特为表彰他在文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授予他“终身参议员”的荣誉称号。

他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Ossi di seppia,1925)表达了人们战后痛苦的悲观主义情绪。继《乌贼骨》之后发表的作品有《境遇》(Le occasioni,1939)、《菲尼斯特雷》(Finisterre,1943)。后期作品《暴风雨与其他》(La bufera e altro,1956)较之早期作品具有更高的技巧和激情。进入暮年后发表的诗集有《萨图拉》(Satura,1971)、《1971—1972 年日记》(Diario del 1971 e del 1972,1973)。其中,《萨图拉》中的《西尼亚》(Xenia)是一组温存而充满招魂感的爱情诗,用以纪念他 1964 年去死的爱妻。除诗作以外，蒙塔莱还翻译了莎士比亚、艾略特、霍普金斯等人的诗以及梅尔维尔、奥尼尔等人的散文作品。1956 年,他把同年发表在《晚邮报》上的短篇小说和随笔汇编成集,题名《迪纳尔的蝴蝶》(La farfalla di Dinard)

2. 作品分析

1870 年，意大利以罗马的光复完成其统一大业，但持续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并没有给人们带来预想中的美好前景，残酷的现实使他们对前途感到茫然和失望，沮丧和忧虑犹如两块大石重压心头。颓废派文人宣扬真理已失去昔日的光华，规劝人们栖身于梦幻和无知的影子底下，以赢得心灵上暂时的安宁。蒙塔莱就是在这种政治气氛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于他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蒙塔莱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者如马拉梅、兰波、瓦莱里等人的影

响,但在他后期的诗作中,却常常以直接、纯净和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博得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他的抒情诗具有强烈的象征主义特点,寓意深长,现实与幻觉,现今与往昔,景物与回忆,每每跌宕重迭，反映了意大利中小资产阶级面对战后社会现实犹豫不决的精神世界。1925 年,诗人的第一部诗集《乌贼骨》问世,他因此声誉鹊起，一举成为蜚声意大利文坛的抒情诗人。他博得了公众的普遍赞赏,被誉为‘生活之恶’歌手。在《乌贼骨》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诗句“……莫问我什么是历史进程的准绳，我有的只是弯扭的音节,干枯如树杈。我今天可以告诉你的,只是虚假的自我和内心摒弃的一切……”诗人采用象征主义的隐喻手法,沉湎在自我的感情世界里，抒写生活中抽象的和超阶级的邪恶。他把宇宙描写成不可幸免的失败的象征，痛苦则是人生永恒的伤痕。实际上,他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中现实社会的矛盾和实质,只是消极地把生活之恶归纳成一切痛苦的根源，这显然是蒙塔莱抒情诗的不足之处。

1939 年,蒙塔莱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境遇》。一方面,他丢弃伤感的情调,渲染象征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把目光从大自然的风光移向往事的回忆，描写迷路之人在徘徊中朦胧见到的一线光明,隐喻人生道路上不可捉摸的痛苦,以此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无限的惆怅。

蒙塔莱在《境遇》中题为《官吏之家》的诗篇中咏叹道“:啊,渐渐消隐的地平线上，输油船上闪烁着依稀的灯光！难道通路就在这个地方？你将把我这黄昏之家遗忘，不知谁人留待，谁人前往……”毋容置疑,诗人试图向人们启迪:摆脱孤独和和哀伤的道路是不存在的，战争的灾难和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全面崩溃不可能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光亮。诗人将自己比喻成坎坷人生道上一个永恒的失败者。《境遇》描绘的是,在一个由碎岩作为标志的世界里，人们为脱离痛苦而进入一个超越自然、虚无飘渺的境界。显然，

诗人看来,倘若没有天意相助,人们要想突破人生邪恶的重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充满疮痍和弊端的现实社会，诗人寄希望于一个不切实际的理想世界。他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在寻找幻象和护身符，而他的优秀诗作正是诞生在这一无止境的寻觅之中。

当然,这并不是说,蒙塔莱与其他当代意大利或欧洲诗人的赋诗风格毫无共同之处 反之,他那箴言式和富隽句的诗体,对欧洲的诗歌创作起着重要的影响。他以犀利的目光洞察历史的发展，对他所处的时代始终持否定态度；他把现实生活视作疾病暂时发作的症候,不知其起因,也无法预测可能会引起的恶果。

就文学艺术言,蒙塔莱的抒情诗语言优美感人,讲究诗句的韵律和音乐感。他喜欢用一些固定的词语，有时甚至从方言中寻找合适的词汇来丰富自己的诗歌语言，使他的诗句具有明显的节奏感。例如 栖立在鸡舍木栏上的戴胜鸟、手持快燃尽的蜡烛和马车灯的孩童、在搁浅中来回晃动的轻舟等,这样的例子在他的诗句中枚不胜举，俯拾皆是。另外，诗人总是想方设法避免语言的累赘，以最确切的词藻描写景和物,常以他那惊人的天赋,把相当复杂的思想感情归纳在一个词里。正因为如此，他笔下的风光景色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不落窠臼，往往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和艺术上美的享受。

蒙塔莱是一个哲理诗人，他从不陶醉于表面印象之中而停步不前。勾起他创作灵感的利古里亚的旖旎风光，赋予了他沉思默想的动力和丰富的创作源泉。《柠檬》(Limone)是他的代表作《乌贼骨》中比较著名的一首抒情诗,创作于 1921 年 桂冠诗人因其诗歌雅致的诗句和优美的韵律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但是他们往往歪曲大自然的形象，只是以猎取迂腐罕见的词藻来抒发他们肤浅的感情;一个真实的诗人应该懂得抓住时机,通过外部世界的美,去发现存在于物体内部的真理,以及由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人生奥秘。诗人在诗篇的开始部分抒情地写道：

桂冠诗人
为寻觅罕觏植物
成天价漫步草丛：
水蜡属黄杨
爵床科花木。
而我却偏爱
杂草蔓生的沟渎，
半干涸污泥坑里
蹲着逮小鱼的孩童；
但我更喜欢
芦花婆娑的沟边小路，
踽踽伸向果园
穿越柠檬株株。

在《柠檬》的结尾处,诗人百般感慨地叹息道：

幻觉烟消云散，
时光带我们
重返喧闹的京都。
高大的建筑鳞次栉比
缝隙中显露出
块块瓦蓝的苍 穹。
大地上淫雨绵绵，
房顶上覆盖着
寒冬稠密的阴霾凄雾。
天色渐冥
人生凄凉的归宿。

待等透过虚掩的大门
翘首望见院中橙黄的柠檬，
心 中的忧伤顿时消融。
胸中沐浴太阳的金辉
美妙的歌声响遏行云。

在《乌贼骨》中还有一首题为《葵花》（Girasole)的抒情诗,它比较集中地表现了蒙塔莱的内心世界和人生哲学。诗人启示人们荆棘丛生的人生路上充满着无休止的痛苦,但人依然寄希望于明天。诗人以渴望阳光而濒于枯萎的葵花，暗喻残酷的现实同不切实际的遐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试图告诉人们，明媚的阳光似乎给绝望的人指出了一条希望之路，但这毕竟只是虚无的幻觉而已。

葵 花

快让我看看
我栽种的那株葵花
它在盐碱焦灼的土中长大。
枯黄的脸庞
终日忧虑地凝望
明镜似湛蓝的天空。

禁锢在黑暗中的人
谁不翘企光明？
乐曲此起彼伏
色彩光怪陆离
生命悄然渐尽。

消亡——
一切生灵的命运。

快让我看看那株葵花
它终日朝着
金色明亮的阳光。
人生犹如花朵的芳香
轻风拂过就无处寻访。
快让我看看
那株正在枯萎的葵花。

蒙塔莱在诗歌中全神贯注于自我，刻意反映人的个性的危机，表现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徘徊和苦闷。在艺术形象的提炼上，他常常借助于象征和隐喻的手法，注重突出人内心世界的细微感情。1975 年，他荣膺诺贝尔文学奖，那是因为他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的诗独树一帜，以巨大的艺术敏感性以及排除谬误和幻想的生活的洞察力，阐明了人的真正价值”。

三、萨尔瓦多雷·夸齐莫多(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

夸齐莫多出生在西西里莫迪加，父亲是当地的一个火车站站长。1908 至 1920 年，他居住在西西里港市墨西拿，并在那里读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尔后，他去罗马攻读工程学，但迫于生活，2 年后不得已中辍学业，进一家土木工程公司谋职。夸齐莫多自幼喜爱写作，最初追随隐逸派诗人翁嘉雷迪和蒙塔莱。1926 年迁居南方喀拉布里亚后，他在著名文学杂志《索拉利亚》上陆续发表不少诗作。1930 年他发表第一部诗集《水与土》（Acque e terre）后，逐渐成为隐逸派诗歌的一位领袖人物。1938 年起，他放弃工

程师的职务，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由于他在文化界的声望日隆，1941 年应聘在米兰音乐学院教授意大利文学。后来出版的诗集《消失的笛音》（Oboe sommerso，1932）、《桉树的芳香》（Odore di Eucalyplus e altri versi，1933）、《伊拉托与阿波利翁》（Erato e Apollion，1936）等都具有隐逸派的象征主义色彩，但也有许多诗抛弃个人天地转而注意当代社会问题。在两部诗集《新诗抄》（Nuove poesie，1942 ）和《瞬息间是夜晚》（E'subito sera，1943 ）出版后，他的隐逸派诗歌创作也宣告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的社会信念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死前所写的作品《日复一日》（Giorno dopo giorno，1947 ）里。在许多诗篇中，他追忆了法西斯政权的暴政、战争的恐怖以及它对意大利人民犯下的罪行。后来出版的作品还有《乐土》（La terra impareggiabile，1958 ）和《给予和占有》（Dare e avere，1966）。从 30 年代中期起直至谢世，他还出版了不少丰富多彩的译作。另外，他还编辑了两部意大利诗歌选集，并写了许多评论文章，均收集在《诗人、政治家及其他随笔》（Il poeta e il politico，1960 ）一书中。1959 年，由于“他的抒情诗以高贵的热情表现了我们时代生活的悲剧经历”而荣膺诺贝尔文学奖，1968 年殁于那不勒斯。

夸齐莫多的早期作品具有明显的隐逸派诗歌风格，在诗句中，西西里的秀丽风光和童年生活的回忆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经过 20 余年的不断总结和摸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诗人的写作技巧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创作思想亦益臻成熟。他运用谙练的艺术手法，努力在诗篇中反映不断遭受战争和暴力威胁的人们的心声，以及他们对建立一个既无恐怖又无仇恨的自由国家的憧憬。应该说，是他饱经沧桑的人生经历，尤其是风起云涌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和极其丰富的写作素材。他善于捕捉发生在瞬间的东西，然后将自己强烈的感受倾泻在他的诗句之中，使他的诗作给人以鲜明的形象和生动的色彩，诗句富有浓重的

音乐感。例如，他在《日复一日》中一篇题为《柳树》(Alle fronde dei salici）的短诗中感慨地写道：

侵略者的铁蹄
蹂躏着神圣的土地，
路边冰硬的草丛中
横倒着一具具尸体，
远处传来
牧羊少年羔子的叫声
咩、咩、咩、咩……
如诉如泣。
一位步履踉跄的妇人
朝电线杆径直跑去，
万恶的敌人
将她的儿子吊死在那里，
绝望的号啕
令人觳觫不已。
谁有心舒展歌喉
面对这满目的疮痍？
六弦竖琴
倒悬柳树枝头，
在凄清的寒风中
发出轻微的叹息。

夸齐莫多一生坎坷，但他对生活始终有着崇高的信念和严肃的责任感，对未来充满着火一般的热情。他善于采用梦幻与真实、现实与回忆相结合的手法写诗,诗句寓意深刻,真切感人,字里行间蕴涵着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夸

齐莫多以献身诗歌创作的一生，实践了他生前立下的“诗人和作家应以变革世界为己任”的豪迈誓言。

四、翁贝尔托·萨巴(Umberto Saba,1883—1957)

萨巴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的另一位著名隐逸派诗人。他出生在的里雅斯特港,母亲是以色列人的后裔,父亲在他未出世前就离家出走，家庭生活的不幸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由于家庭的原因，萨巴早年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维持生计,他在家乡开了一家古籍书店,同时开始致力于诗歌创作。法西斯当局颁布反动的种族法令后，开始对犹太人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为躲避政治迫害，萨巴逃往巴黎，后又隐居罗马,直至意大利解放后,才得以重归的里雅斯特。萨巴把他的毕生精力全部奉献给了文学事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始终在诗苑不辞辛劳地耕耘着。他对意大利文坛上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甚为敏感,其中,翁嘉雷迪和蒙塔莱的抒情诗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在20世纪上半叶的意大利文坛上，各种文学思潮齐头并进，不知凡几。但是，萨巴像一棵橡树那样，抵住了各种势力的袭击，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拒绝与人云亦云者为伍。诗人始终以深邃的目光密切注视着当时意大利社会的发展趋向，在努力保持自己别具一格的诗体的同时,和皮蓝德娄和斯韦沃一样,更注意潜入现实生活的纵深处，去寻找和领悟造成社会危机的历史原因。

1945年意大利解放之后，萨巴在给他的一位罗马好友的信中耐人寻味地写道“:你是一位政治家(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里,你都是一位政治家,因为你有这样的的天赋)。按逻辑推理,你以斗争和侵犯他人为生。而我,由于多灾多难的童年,攻击力受到了很大的抑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我生来就比你驯服。其结果是,攻

击力就冲着我来了。说到底,这是我的弊病。’实际上,萨巴所谓的“弊病’’并不是他个人,而是 20 世纪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共同弱点。在现实面前,他们无非采取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驯服地随潮流而动,对生活和理想充满瑰丽的希冀;另一种则是悖逆而行，同时代精神分庭抗礼，对前途丧失信心，内心充满忧伤。萨巴用他的诗启迪人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设法同他人建立联系,并努力去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感情，因为这是战胜失望情绪的唯一出路;人应该热爱现实生活,热爱世上所有的生灵,应该为自己能生活在人群中间而感到欣慰和快乐。

正因为如此，萨巴在他的作品中刻意描摹的里雅斯特宁静的风光，古老的民宅，人声喧哗的酒铺，周日电影院前熙攘的人群……并在诗句中倾注了他对失业工人、乞丐、病人、出售冰淇淋的小贩、水手等社会下层平民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抒情诗中,悲伤与希望每每交融在一起，这一对矛盾是他诗歌的主旋律。下面选译的是一首题为《二月之夜》(Sera di febbraio)的短诗,诗人通过对二月夜晚景色的描写，抒发自己面对麻木不仁的青年人痛苦忧郁的心情：

明月冉冉升腾
夜晚旋即而至
灯光下，大街如同白昼一样通明，
麻木不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
漫无目的地走向
迷茫的险地，
是死亡的念头
最终给人类带来生活的希冀。

他在 1900 至 1944 年间所写的诗作均收入在《抒情诗集》

(Canzoniere,1945)中。此外,他还著有《捷径与其他》(Scorciatoie e raccontini,1946)、《历史与'抒情诗集'的年代记事》(Storia e cronistoria del Canzoniere,1948)、《飞禽》(Uccelli—Quasi un racconto,1950),以及小说《埃尔奈斯托》(Ernesto,1975)等。

第十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一片火海和焦土的废墟中，曾经专断横蛮、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政权崩溃倒台。人们犹如从一场恶梦中惊醒，面对危机四伏、阶级矛盾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他们普遍感到忐忑不安和茫然不知所措。意大利著名政治家、拉丁语学者贡契托·马尔盖西(Concetto Marchesi)在对帕多瓦大学青年学生的一次演讲时说：“一代人摧毁了你们的青春和祖国，把你们扔进了废墟堆中。你们应该将激情化为行动,夺回你们的青春,重建自己的家园。”在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中，从意大利北方反法西斯游击队战斗过的山峦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风，它驱散了压抑在知识分子心上的愁云凄雾。

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这一股来自北方的强劲有力的风吹走了多少年来沉闷迂腐的浑浊空气，滋润着人们干涸的心田。在法西斯执政的20余年中，克罗齐的新唯心主义思想被视作自由的象征。可现在,饱经沧桑的人们形象地把它比作‘蚕茧’,因为它割断了意大利文化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些被昔日的专制独裁者、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所摒弃的19世纪优秀作家和诗人，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应有的声誉。不宁唯是，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贪婪地阅读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认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意大利共产党缔造者们的政治思想，针对法西斯执政20余年中的文学艺术展开热烈的讨论，立志为重建意大利新文学而努力。

在游击战争火热的生活中诞生的文学作品，以新颖的意象和强大的感召力，宣告了同战前传统文学的决裂，这是意大利文学史

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具有深远的革命意义。例如,在战壕里写成的诗篇以及反法西斯战士在光荣就义前致亲人最后的书信，由于它们如实反映了作者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故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五色斑斓的艺术光泽，在读者心中引起了普遍的共鸣。

第一节　新现实主义文学

新现实主义是一场意大利的文学和电影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为繁荣；它努力以写实手法描绘那些最终导致这场战争的事件，以及那些在战争期间和随后产生的社会问题。该文学运动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后受法西斯统治压制达 20 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蓬勃发展。其生命力在于法西斯压迫、抵抗运动,以及战争在那些富有才华的作家心中注入的痛切的感受、经历和信念 而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译成意大利文的、具有社会觉悟意识的英美等国家的作品，则对这一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意大利的社会形势和文化面貌，新现实主义文学正是直接表现这一历史时期特征的文化运动。它经过了一个阶段的酝酿后，在 1930 至 1940 年间渐臻成熟,并在 1940 至 1950 年间发展至顶峰。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一开始就以积极的姿态反映现实生活，表达广大民众的呼声。面对贫穷落后和矛盾重重的意大利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们，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尽管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体裁不一，但是其反映现实和改革现状的宗旨是一致的。在意大利文学史上，曾出现过多次“ 文学先驱运动 ”,但它们往往只是局限于形式上的改革,始终未能从统治阶级的桎梏中彻底解脱出来，而新现实主义文学以它崭新的意象和独特的风格傲然挺立。新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态度严肃

认真，他们反对追求单纯形式美的写作风格，毫不掩饰地暴露意大利的社会现实，在作品中大胆表现崭新的内容：游击队员紧张而欢乐的战斗生活、工人的罢工斗争、敌机惨无人道的轰炸、船工和擦鞋童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等。

新现实主义运动的代表作家有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夸齐莫多，小说家莫拉维亚、西洛内、莱维、普拉托利尼、马拉帕尔泰（Curzio Malaparte ）和嘉达等人。莫拉维亚在 1929 年出版的《冷漠的人们》也许是这一运动的第一部代表作。西洛内在流亡瑞士期间写出了《方塔玛拉》（1930）等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维多里尼则在《西西里的见闻》（1941）这部海明威式的精彩小说中对法西斯政权进行了隐晦的批判。

战后，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普拉托利尼停止了自传体作品的创作，发表了描写佛罗伦萨贫民生活的《科尔诺住宅区》（1944）和这一运动最优秀作品之一的《可怜的情侣》（1947）。马拉帕尔泰出版了两部描写战争的震撼人心的小说《毁灭》（Kaputt，1945 ）和《皮肤》（La pelle，1949） 维多里尼在《人与非人》（1945）中公开叙述了他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经历；莱维则因在《基督停留在埃波利》（1945)中成功地刻画了意大利南部农民的苦难处境而获得国际声誉。其他的作家也产生了描写当时以及过去生活的冲动。夸齐莫多摆脱了隐逸派的窠臼，开始发表关于战争和社会问题的诗歌；莫拉维亚继续从事创作活动，发表了许多新现实主义小说；帕韦泽则奉献出两部关于他在法西斯监狱中生活的小说，以及一些描写他自己当时绝望情绪的内省小说。

由于文化领域中各门艺术的性质和特点不尽相同，新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也不可能完全一样，其中，新现实主义思潮在电影界较早地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电影在当时还是一门年轻的艺术，它在推陈出新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相对地说要小得多。再说,在法西斯专政的 20 余年中，意大利的电影艺术接受了法国的

自然主义和苏联早期著名电影导演普多夫金（1926 年导演根据高尔基小说改编的无声电影《母亲》,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和爱森斯坦（1925 年执导的影片《战舰波将金号》被公认为当时世界电影的杰出作品）的影响，这为新现实主义在意大利电影界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事电影工作的导演、编剧和演员为了在银幕上完美地再现社会现实，不辞辛劳地进行探索、研究和改革，涌现出一批在国际舞台上颇有声望的电影导演。新现实主义影片的风格特点在于纪实的客观性；片中演员本身就是或者很像是普通生活情景中的普通人。虽然这类影片往往因制作过于匆忙而显得略微粗糙，但它们与传统影片那种逃避现实的理想化做法大相径庭，它们直面人生，大胆处理当代主题，因而在国际上颇具影响。第一部新现实主义影片是由罗赛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执导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1945），这是一部揭露纳粹占领期间意大利人民惨遭迫害的反法西斯影片。罗赛利尼的另一部影片《游击队》（1946），表现发生在战争中的 6 个小故事，也具有同样的悲惨性质。其他重要的新现实主义影片有德 · 西 卡(Vittorio De Sica)的《擦鞋童》（1946)和《偷自行车的人》（1948），以及维斯贡迪（Luchino Visconti)的影片《大地在战栗》（1948）,最后这一部影片描写西西里的贫苦渔民生活，其中角色无一是职业演员。 1950 年之后，意大利影片的倾向由新现实主义逐渐转向神秘幻想、象征主义和文学题材。

在新现实主义文化运动中，电影艺术一马当先，对整个文化界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比之下，文学领域内的改革步伐显得缓慢和艰难，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其一，为了更新文学作品的内容，作家得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仔细观察和分析现实社会；其二，为了适应新的文化形势的需要，作家必须采用新颖的文学形式和写作语言，恰如其分地反映现实。

在文学领域里，纪实作品的问世揭开了新现实主义的帷幕，同

时宣告了新文化同传统文学的决裂。例如：新闻记者、作家罗马诺·彼兰基(Romano Bilenchi)在第一期《社会》杂志上发表报告文学作品,记述了1943年10月德寇在罗马城里大肆搜捕犹太人的法西斯行径；一位原先在阿尔卑斯山上作战的中士撰文报道了意大利军队从苏联撤退时的悲惨遭遇；卡尔洛·莱维于1945年发表他的成名作《基督停留在埃波利》,他采用了叙事体和随笔相结合的写作手法，如实记载了他本人被法西斯法庭判处流放后在意大利南方巴西利加达的生活经历。诸如这样的写实作品不胜枚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简而言之，新现实主义是意大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场文化革命运动，是在法西斯专政期间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他们反对法西斯政权,为了赢得民主和进步,他们在政治和艺术上都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这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主要荟萃在罗马、米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比萨等意大利主要城市，其中大部分人是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或热情支持者。

一、嘉意曼·平托尔(Giaime Pintor,1919—1943)

平托尔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化运动中一名年轻的先驱者。他出生在罗马，早年接受欧洲颓废主义文化的影响,20岁时就已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他酷爱文学，在文化上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为了能开阔自己的创作视野,他像海绵一样吸收欧洲各国文化的长处，因而较早地从意大利传统文化的陈规俗套中解脱出来。40年代初，在反法西斯斗争的感召下，年轻的作家毅然跨出狭小的文学圈子,以满腔的热情投入政治运动。在斗争的实践中,他的文学作品在思想上日臻成熟，艺术上也渐趋完美。正如他自己所说,倘若没有大战中的亲身经历,他或许仍然是一个思想狭隘的纯文学作家。

平托尔于 1943 年加入游击队，参加过那不勒斯英国盟军的反法西斯战斗。同年，在通过德军封锁线的途中，他不幸踩上地雷被炸身亡,时年仅 24 岁。他的主要作品是《欧洲的气质》（Il sangue d'Europa，1950），里面收集了他所有的文学评论、政论文章。另外，他还有若干译作留存于世，其中较著名的是德裔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作。

在《欧洲的气质》一书中,有平托尔写给他弟弟的一封书简,字里行间充盈着他对时局的忧虑，以及对意大利一片赤忱的热爱：

> ……这场以法西斯专政胜利为最后终结的战争，对我们造成的伤害远比事先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事实上，战争改变了人们原先的思维方式，迫使他们举起双手采取行动，让他们看到个人生存的必要条件正遭受威胁的危险，并使他们醒悟：中立政策或逃避现实的方法都是绝对不可取的。对弱者来说，暴力毁坏了他们生存世界的外墙，使他们的前程彻底被毁，从而沦为“迷失方向的一代”；对于强者而言，战争却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原始材料和新的数据，他们得以在此基础上积累新的经验。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我或许将永远只是一个从事纯文学创作的知识分子……
>
> ……意大利是一个孱弱的民族，它在法西斯专政的 20 余年中已变得腐败堕落，任何轻微的压力就会使它屈服投降。然而，有些人却继续在高喊代表极少数人的革命口号：我们的哲学家和工人代表着欧洲最先进的力量。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意大利一样，在生存的可能性和实际的条件之间有一条深不见底的鸿沟。我们应该肩负起填平这一鸿沟的重任，并告诫人们：意大利正处在危急的关头。

二、卡尔洛 · 莱维(Carlo Levi，1902－1975)

卡尔洛 ·莱维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工业城市都灵，毕业于医科大学，曾从事新闻、绘画、文艺评论等工作。他在政治上十分活跃，曾参加哥白迪领导的“自由革命”组织。在法西斯专政时期，他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并且是“行动党”的成员。1963 年，他作为意共代表当选为意大利参议院议员。

频繁的政治活动赋予了他丰富而翔实的创作素材，除小说外，他还写有不同题材的新闻报道、随笔、评论及政治演说词。大战期间,他在法国撰著的《自由的恐惧》(Paura della libertà) 一书论述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阐明了赢得自由的必要性。 1950 年他发表了带有明显巴罗克文化特征的作品《钟》(L’orologio) ,以战后罗马一次内阁危机为主题，采用象征比喻的艺术手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战后罗马社会的腐败，表达了一个曾经为自由而战的知识分子面对意大利现实社会失望和沮丧的心绪。 1955 年问世的《铁证如山》(Le parole sono pietre) ,揭示了意大利南方‘黑手党’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隐喻当时意大利社会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潜伏着的政治危机。

1935 至 1936 年，法西斯当局将他流放至意大利南方巴西利加达。这一段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给他提供了直接了解南方农民苦难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机缘。他在 1945年发表的代表作《基督停留在埃波利》(Cristo si è fermato a Eboli)一书就是从中撷取的创作素材。事实上，小说的标题是流传在巴西利加达的一则谚语，意即被历史遗忘的角落，作者独具匠心地用它直接点出了小说的主题。这是战后意大利文坛上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纪实性长篇小说，反映了他作为画家的敏锐观察力和作为医生的深切同情心，曾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被搬上银幕。作者采用比喻和回忆的艺术手法，揭示意大利南方的贫穷落后面貌，谴责警方和国家

官僚机构对农民的残酷压迫，描摹乡村秀丽的山水，刻画农民的传统习俗，以及他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禀性。小说中的农民尽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有所反抗，但在厄运和暴虐面前，他们的斗争总是以惨败而告终。尽管小说展现的是一幅在法西斯统治下湮没无闻的农村生活画面，但小说中勤劳、敦厚的农民同样具有朴实的自尊和高尚的人格。卡尔洛·莱维的纪实性文学作品引起了意大利文坛很大的轰动，加强了战后意大利文学走向社会现实主义的趋势。另外，莱维还著有反映德国战后情况的《椴树》（La doppia notte dei tigli，1959）.

三、勃利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

勃利莫·莱维是出生都灵的一位犹太裔作家和化学家，以撰写他本人在纳粹集中营中感人至深的自传性回忆录而闻名。194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都灵大学化学系。两年后参加朋友们在意大利北部企图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取得联系的活动，但他随即被捕，送至奥斯威辛集中营为德国法本资本集团的一家人造橡胶厂服苦役。1945年集中营被苏联军队解放之后，勃利莫·莱维回到都灵。1961年任该地一家生产油漆、搪瓷和合成树脂的工厂的总经理30余年。其第一本著作《如果这是一个人》（Se questo è un uomo，1947），描写了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灭绝人性的迫害，以及集中营中犹太囚犯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痛苦经历，显示了作者在分析目睹的暴行时冷静而又充满人道精神的异乎寻常的秉赋。后来的自传体作品《休战》（La tregua，1963）与《被淹死的和得救的人》（I sommersi e i salvati，1986)进一步反思自己的战时经历。《元素周期表》（Il sistema periodico，1975)为21篇沉思录的汇编，每篇以一化学元素命题，论述物理的、化学的和道德的范畴之间的相似之处，隐喻现实生活中人的品行和心态的转化与蜕变。在其所有的著作中，《元素周期表》可谓是最为出色的批判性通俗作品。除

外,他还写有诗歌及长、短篇小说。有迹象表明,他系自杀身亡。

勃利莫·莱维的文笔简洁、朴实,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极少数幸存者中的一个见证人，他在叙述犹太人所受到的种种非人待遇时,尽量让事实来说话,在表现人为维护其起码的自尊而进行反抗的同时，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纳粹惨绝人寰的暴行。

四、瓦斯哥·普拉托利尼(Vasco Pratolini,1913—1991)

普拉托利尼是新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作家，尤以对法西斯统治年代佛罗伦萨的贫民充满同情的描述而闻名。他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平民家庭,父亲是酒吧招待,母亲是裁缝。他幼年丧母,其父续弦后,他一直同外祖父母生活在一起。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小学 4 年级起即开始在一家杂货铺里当学徒，以后还当过印刷工人、服务员、饮料销售员等,这一段丰富的人生阅历后为他的文学创作积累了翔实的素材。他自幼酷爱文学,即使在工作之余,仍锲而不舍地坚持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来不是一个糊涂的自学者,也从不漫无边际地阅读书籍,这使我慢慢在文学上走了运。我的大学是桑佐亚出版社，当然，我还看了不少历史书。奇怪的是，我特别喜欢两个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杜勃林……在工作之余，我练习写一些短小的故事……就这样,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严肃地扪心自问 我为什么而写作 ?尽管我读过许多书,但我意识到,自己仍然是无知的。于是,我下定决心辞去工作,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从但丁的《神曲》到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他手不释卷,专心攻读，文学素养日趋精深。1934 年，他结识了维多里尼。从此，他的反法西斯政治观点变得更为坚定。1935—1937 年他因病住院，在疗养期间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科尔诺住宅区》生动描写了一伙佛罗伦萨青年的情况。1937 至 1947 年,他曾任《文学》编辑和《军事操练场》的主编。《军事操练场》被法西斯当局查封停刊后,他迁居罗马,在公共教育部任办事员 后化名罗道

尔弗·嘉萨迪，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斗争的实践使他那富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写作天赋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开始全力以赴地投入文学创作活动。

普拉托利尼的主要作品有《绿色的地毯》（Il tappeto verde，1941）、《马嘉齐尼路》（Via de' Magazzini，1942）、《科尔诺住宅区》（Il quartiere，1944）、《家庭纪事》（Cronaca familiare，1947）、《可怜的情侣》（Cronache di poveri amanti，1947）、《当代英雄》（Un eroe del nostro tempo，1949）、《曼德洛》（Metello，1957）、《奢华》（Lo scialo，1960）、《永恒的真理》（La costanza della ragione，1963）、《比喻和讥讽》（Allegoria e derisione，1966）等。

《曼德洛》、《奢华》和《比喻和讥讽》是作者创作计划中以《意大利历史》为总题的三部曲，内容描写 1875 至 1948 年所发生的事件。第一部小说《曼德洛》叙述的是发生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有关一个青年泥水匠政治上成长的故事。小说问世后，引起了文学批评家们的激烈争论：一部分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将小说称作从新现实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的标志；另一些政治上更为激进的人则批评小说中过于抒情的描写。第二部小说《奢华》以法西斯专政为背景，描写 1902 年至 20 年代中期法西斯当政前下层人民的消沉和沮丧。第三部《比喻和讥讽》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它刻画了在法西斯政权摇摇欲坠的政治形势下，佛罗伦萨知识界道德和文化方面的冲突。

普拉托利尼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佛罗伦萨的中下层人民，作者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了莫大的同情。他在暴露都市生活阴暗面的同时，热情歌颂青春的活力和生活的美好，两者每每穿插交错，和谐地融汇在一起，字里行间渗透着他对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缱绻深情。在这一方面，《科尔诺住宅区》中年轻的主人公瓦莱里奥去农村后的亲身感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当春夏一过、秋天来临的时候，田里的农活渐渐空闲起来，人们都在家里准

备过冬的东西；瓦莱里奥不由自主地思念起佛罗伦萨城里的生活——黎明时分开始营业的咖啡馆、才出车场叮当叮当在大街上来回奔跑的电车、华灯初上时分在电影院和其他娱乐场所前喧闹的人群､街道转弯处青年恋人的初吻……事实上,他的不少文学作品都是以佛罗伦萨科尔诺住宅区马嘉齐尼路作为创作背景展开故事情节的,他自己 1913 年就出生在这条普普通通的街道上，童年生活的回忆赋予了他写作的灵感和丰富的素材。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读起来亲切感人，尤其是他塑造的一系列妇女形象,性格各异,生动逼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家庭纪事》是作者对其亡弟的亲切描述,是一部以作者凄凉的童年生活为创作素材的优秀小说,感情真挚,文笔朴实,不少文学批评家把它看作是普拉托利尼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以细腻入微的描写，平铺直叙了一出感人肺腑的家庭悲剧。他借小说中主人公之口寓意深长地写道“:在这个社会中,洋溢着互助友爱的气氛｡人们感到集体的温暖,即使是彼此间偶尔的龃龉,也会变成争取生存的动力。你在这样的环境中生长，现已满 20 岁，但你却缺乏做人的信念｡”显然,作者是想告诉我们:在友谊､团结和信任的后面蕴藏着社会革命的征兆，而这正是他叙事体文学作品中的主导思想,反映了战后意大利年轻一代的心声｡另外,作者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是工人､手工艺匠､搬运工､车夫等劳苦大众,他常以他们艰难的生活及其中的欢乐和痛苦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作品总是给人指出希望之路,即使主人公在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光荣牺牲，他在临死前仍然对明天充满着必胜的信念，在正义事业的鼓舞下含笑而去。另一部同样发表于 1947 年的长篇小说《可怜的情侣》描绘了 1925—1926 年间法西斯得势时佛罗伦萨穷苦大众的全貌，被誉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曾获得两项国际文学奖。

普拉托利尼是在 20 世纪初成长起来的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耳

濡目染地受到了佛罗伦萨隐逸派文学的一定影响。事实上，在他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可寻觅到隐逸派创作风格的痕迹。他在1945 年发表的小说《科尔诺住宅区》，标志着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部小说的扉页上，他引用了隐逸派代表诗人蒙塔莱的诗集《乌贼骨》中的绝句"我们今天能够告诉你的,只是虚假的自我和内心摒弃的一切"。这显然不是出于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了他们两人在创作思想上的共同点。在这部小说中，普拉托利尼以娴熟的写作技巧，运用第一人称成功地塑造了青年工人瓦莱里奥的生动形象：他无忧无虑地度过了青少年时代，但当他一踏上社会，便开始意识到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矛盾的激烈。在小说的末尾,作者感叹道"：即使是空气和阳光,人们也都得在防御工事后面才能够得到。"

1991 年 1 月 31 日普拉托利尼殁于罗马，根据他本人的遗愿，他的遗体被安葬在他的故土佛罗伦萨。

五、培贝 · 费诺利奥(Beppe Fenoglio,1922—1963)

费诺利奥是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新现实主义作家。他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比埃蒙特地区阿尔巴城，殁于都灵，主要作品有《阿尔巴城的 23 天》(I ventre giorni della città di Alba,1952)、《灭亡》(La Malora,1954)、《美丽的春天》(Primavera di bellezza,1959)、《激战的一天》(Un giorno di fuoco,1963)、《游击队员约尼》(Il partigiano Johnny,1968)、《周末的酬答》(La paga del sabato,1969)等。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总是同游击队员的战斗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的写作风格敏捷、简洁、客观、明朗,他的作品读起来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作者在谈及他的代表作《阿尔巴城的 23 天》时说,他从事文学创作是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其一，他自幼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虽历经 16 年含辛茹苦的学习，但仍未能获得大学文凭，他欲以写

作来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其二，他意欲通过对往事的回忆重新找回昔日生活中自我的影子。

费诺利奥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作家。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始终如一地遵循新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坚定地沿着自己的路子往前走。他的短篇小说集《阿尔巴城的 23 天》,真实记述了游击队员在阿尔巴城与法西斯军队展开激战的 23 天,热情讴歌了游击队员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长篇小说《灭亡》是费诺利奥的一部力作，作品通过对两个青年长工和一户佃农家庭贫苦生活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人与现实世界内在的矛盾与冲突。 1959 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美丽的春天》问世,小说记述 1943 年末发生在一群青年军官中的故事，表达了年轻一代对法西斯专政的强烈不满，以及他们心中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当时，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正处于发展的低潮阶段。在文学界，一大批作家渐渐脱离新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重新回到渲染人物心理活动的老路上去；而费诺利奥毅然坚持从现实生活中撷取创作素材，积极反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和法西斯专政崩溃前夜的社会危机。

作者笔下的游击队员约尼，可谓是战后意大利一个十分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约尼在学校念书时就十分喜欢英语，并对英国文明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在一位具有反法西斯政治倾向的教师的影响下，政治上逐渐成熟，并对法西斯的反动行径有所警觉；停战后，意大利军队内部的涣散现象以及指挥官的孱弱无能使他深感忧虑，为此他决定加入比埃蒙特游击队组织，后在一次袭击德军兵营的战斗中不幸阵亡。约尼的牺牲绝不是反法西斯斗争失败的象征，在瞑目前，当他听到战友投掷出去的手榴弹的爆炸声，脸上露出一丝安详的微笑，表现出一个游击队员坚强的斗志和崇高的品格。

尽管费诺利奥是一位年轻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方面从未接受过正规的训练,但他的写作技巧颇为谙练,写作语言明快、直率,不

拘泥于形式。再则，在写作中他喜爱运用一些俚语、术语和方言，有时甚至整句地引用英语，读来通俗易懂，舒坦流畅。

六、彼埃罗·保罗·帕佐利尼(Pier Paolo Pasolini，1922—1975)

帕佐利尼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文化运动另一位杰出的诗人、作家和电影编导，以其社会批判性的、非正统风格的影片著称。他用罗马方言撰著的两部长篇小说《流浪街头的青年》（Ragazzi di vita，1955）、《充满暴力的一生》（Una vita violenta，1959），以及用弗里乌利方言写成的抒情诗集《葛兰西的骨灰》（Le ceneri di Gramsci，1957），在 20 世纪的意大利文学史上均占有一定的地位。

帕佐利尼出生在意大利北方波伦亚城，父亲是一位陆军军官，幼年时曾随同他的父亲辗转意大利各地，并在其父驻防的意大利各城市读完小学和中学的课程。1943 年，因躲避战争的炮火，他被迫迁居他母亲的家乡弗里乌利，并在那里捱过了数年的疏散生活，这一段经历导致他成为一个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迁居波伦亚之后，他继续求学，后毕业于波伦亚大学文学系，同时创办并主编杂志《文艺创作室》（1955—1959）。定居罗马后，他开始涉足影界，并编导了不少颇有影响的影片，其中由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文学名著改编而成的影片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除电影剧本外，帕佐利尼还写了不少诗歌、随笔和评论。1975 年，在一起发生在罗马的原因不明的凶杀案中，帕佐利尼不幸丧生。

帕佐利尼在他不同体裁的作品中，着意描写人的本能和自发的感情冲动。他认为，命运赋予了人们改造历史的重任，但是人们往往是在无意识中完成这一使命的，因此作家应该努力在作品中反映人本能的活力和丰富的感情。同绝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一

样，他的内心也充满了各种矛盾：他憎恨现代世界中人与人之间虚与委蛇的关系，但又坚信人的力量和觉悟；他赞美劳动人民朴实、直率的性格，然而却鄙夷他们粗鲁的举止和谈吐；他对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资产阶级社会丧失信心，但又不愿意放弃自我；他贬斥旧世界，但又因无法预见新世界而感到惆怅和迷惘，于是失望低沉的情绪成了他文学作品中的主旋律，爱和恨每每交织在一起。他喜欢选择现代化的大都市，尤其是罗马作为写作的背景，因为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人的活力表现得尤为充分，无产阶级同现实社会的矛盾亦显得更为突出。

帕佐利尼的诗作在读者面前展现了罗马都市生活一幅幅阴暗的画面，给人留下颇为深刻的印象 皎洁的明月、灼热的阳光、狭窄的小巷、青年人的狂热、低矮的木板房、市郊肮脏不堪的贫民住宅区、杂乱的小铺子……诗集《葛兰西的骨灰》是帕佐利尼的一部力作，收集了他自 1951 至 1956 年间写的诗篇，反映作者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的悲惨境遇深切的同情，以及面对现实社会惶惑惆怅的心理。

50 年代在罗马度过的极端贫困的生活成为他最初两部长篇小说《流浪街头的青年》和《充满暴力的一生》的素材。这两部小说是对贫困和肮脏的罗马贫民窟赤裸裸的真实写照，故事情节与他的第一部影片《乞丐》(1961）如出一辙。所有这三部作品都是在同样的创作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描写窃贼、妓女及罗马下层社会其他居民的生活。所不同的是，第二部小说中的主人公托马索在贫民区遭受洪水威胁的情况下，下意识地以侠义心肠奋力抢救他人的生命财产，表现出他善良的本性，这是作者在创作思想上的一个突破。小说中人物的对话采用的是罗马方言，甚至还采纳了一些粗俗淫秽的语言，读来使人产生一种真实感。

帕佐利尼最著名的影片《马太福音》(1964)以质朴的记录片形式重述耶稣基督的生活和殉教。在寓言喜剧《鹰与雀》(1966)之

后，接着他又拍摄了两部企图以现代观点再造现代神话的影片：《俄狄浦斯王》(1967)及《美狄亚》(1969)。另外,帕佐利尼在《定理》(1968)和《猪圈》(1969)等影片中,运用情欲、暴力、邪恶作为其政治和宗教思想的工具，这使他与天主教的保守分子发生冲突。之后,他又在《十日谈》(1971)及《坎特伯雷故事》(1972) 中大胆描述中世纪的性爱。除了电影以外，他还出版了多部诗集和几部文学评论。

在帕佐利尼的后期作品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描写第三世界，尤其是亚、非两洲前殖民地人民的生活和情感的，并对他们的处境寄予莫大的同情。他批判种族主义者将这些被西方文明遗忘了的人视作‘野蛮人’或‘原始人’的错误观点,反对不顾他们的民族传统而试图将他们全盘欧化的做法，主张对他们的过去和现状进行客观的、历史的分析。他指出，由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条件与欧洲各国迥然不同,即使是‘自由’‘民主’或‘社会主义’等概念在那里也有着不同的含义;比如刚果人和法国人追求的‘自由’各不相同;几内亚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不一；加纳人民和英国人民对“民主”的理解大相径庭。然而，帕佐利尼的思想具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心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疑惑，这正是他后期作品的主要特征。

七、维达利亚诺·勃朗加迪(Vitaliano Brancati, 1907—1954)

勃朗加迪出生在西西里岛巴基诺城，1954 年殁于都灵。他早年曾在卡塔尼亚求学，后在当地的中学执教，并同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他的早期作品受到非理性主义，尤其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唯心主义思想及意大利法西斯行动主义的影响。迁居罗马后，他同那里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来往甚密，这不仅开阔了他的文化视野，而且促使他的政治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逐渐

成为一位反对派作家。

他作品中的场景和人物均取材于西西里贫穷落后的社会现实，字里行间蕴含着对法西斯的讥讽和嘲弄，主要作品有《蹉跎岁月》(Gli anni perduti,1941)、《堂·乔万尼在西西里》(Don Giovanni in Sicilia,1942)、《穿靴子的老头》(Il vecchio con gli stivali,1945)、《漂亮的安东尼》(Il bell'Antonio,1949)、《热情的保罗》(Paolo il caldo,1955)等。此外,他还写有若干随笔和剧作,如《拉斐尔》(Raffaello,1948)和《女管家》(La governante,1952)等。

勃朗加迪擅长运用娴熟的讽刺技巧勾勒西西里的社会生活图景。他塑造的人物，不管是自负的士兵、无知的狂热者，还是矜夸的情场老手、敦厚的无产者、狂妄的君主、怯懦的穷人,个个都是个性强烈，近乎怪诞，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他小说的末尾，遭受欺凌的平民百姓总是屈服于爱慕虚荣、专断蛮横的压迫者的淫威。诚然，作者在其作品中所展现的世界并非出于主观臆想，而是基于他在法西斯专政下 20 余年中的生活经历。勃朗加迪是在 1930 至 1942 年间逐渐成长起来的一位作家。他的处女作《蹉跎岁月》问世后，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直至 1942 年《堂·乔万尼在西西里》出版后，他才誉满文坛，一跃而为深受公众喜爱的作家。正是在这 10 余年中，法西斯主义在城市实业家和农村大地主的支持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不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软弱无力地同法西斯政权进行着抗争。在勃朗加迪的某些作品中，性爱与政治常融为一体。作者有意识地塑造一些放纵情欲、妄自尊大的反面人物，借此影射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现实社会。

通过机智俏皮的幽默，勃朗加迪在他的作品中（尤为成功的是《穿靴子的老头》和《漂亮的安东尼》)嘲笑法西斯统治下丑恶的社会现象以及人们的变态心理，愤怒谴责专横霸道的“要人”，并对“小人物”的悲惨命运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他未能潜入生活的

纵深处，向读者揭明社会弊端形成的根源。另则，他笔下众多的人物几乎如出一辙，他花了不少笔墨描写他们怪诞的举止和待人接物的态度，但很少刻画他们的思想感情及内心的爱和恨。在这一方面，1955 年出版的小说《热情的保罗》表现得尤为充分，失去了他早期作品中锋芒毕露的锐气。

《堂·乔万尼在西西里》和《漂亮的安东尼》是勃朗加迪的两部力作，标志着他的创作风格从极富幽默感开始转向更具悲剧性的色彩，生动地描摹了法西斯统治下中、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世界，辛辣地嘲讽了当时西西里社会的庸懦无用。第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乔万尼出生在西西里岛卡塔尼亚城，40 年来一直浑浑噩噩地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在其三个对他惟命是从的姐妹的精心照料下，他饱食终日，悠闲自在，每天除了午后长长的午睡和谈论女人以外，无所事事。后来他邂逅侯爵家容貌出众的千金尼奈达，随即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与尼奈达结婚后他迁居米兰，但他同那里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大都市里的喧闹及人际关系的冷漠让他无所适从，他为此深感失望和沮丧。无奈之下，他决定回日夜思念的卡塔尼亚小住几日。家中美味的菜肴、柔软的毛毯和三姐妹的细心呵护使他改变了原先的主意，迟迟不愿动身，尼奈达最后只得独自一人返回米兰。勃朗加迪通过小说主人公乔万尼吟风弄月、及时行乐的处世态度，揭示了在法西斯统治下意大利社会的腐朽没落，以及人们企图超脱现实生活的浮躁心态。尤为重要的是，作者笔下倦怠、慵惰的西西里现实社会，与法西斯吹嘘的英姿勃发的意大利毫无共同之处，这正是勃朗加迪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主要特征。

《漂亮的安东尼》是一部悲剧色彩浓重的作品，与作者先前的写作风格有明显的区别，隐喻法西斯专政走向衰亡的必然结局以及人们空虚、惆怅的心理状态。安东尼是西西里某小镇上一个相貌异常俊朗的年轻男子，他与家境殷富的漂亮姑娘巴尔芭拉婚后 3 年仍膝下犹虚。妻子的娘家人发现安东尼原来是一个阳痿患

者，心中大为恼火；安东尼年逾古稀的父亲为证实他家族的男子并没有性功能低下的隐疾，竟去烟花巷以身试法，后在一次飞机轰炸中丧命，人们还在他的鼻子底下找到一只女式皮鞋。在这部小说中，勃朗加迪通过近乎荒诞的故事情节，嘲讽法西斯统治下畸形、丑恶的社会现象，读来发人深思。

第二节　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危机

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意大利文学的发展史上出现了新的转折。随着意大利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新现实主义渐渐失去昔日的英姿，其战斗力和艺术风采也较前大为逊色。导致新现实主义文化运动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那些取材于社会政治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如出一辙,人们开始对它们感到厌倦 其二,在大战结束之后的 10 余年中，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冷战 ’的局面,人们在大战期间对‘ 行动主义 ’所寄予的殷切希望化为乌有,他们转而栖身于大自然和神话式的美景之中,以致逃避现实的虚无主义情绪有所抬头，不少作家对现实社会缺乏信心,对前途充满疑惑,写作风格方面亦出现了回潮,开始注重抒情描写和渲染人物内心世界的细微变化 其三,意大利社会出现政治上的倒退，这不仅削弱和瓦解了在反法西斯斗争实践中结集起来的进步力量，而且冲垮了一度激励人们反法西斯斗志的精神支柱，颓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趁虚而入，并在文化领域找到了繁衍的良好温床 其四,大部分知识分子缺乏主观能动性,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将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取得的成功经验继续发扬光大，以致最后被落潮所吞噬。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巩固和迅速发展，在 20 世纪 40 年代崛起的新现实主义文学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许多作家的精神状态消极、倦怠,错误地认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经验背叛了他们

的政治理想，不切实际地憧憬着另一场大革命的到来，无益地叹息自己在昔日政治斗争中所作出的努力纯属徒劳无功。在这一方面，1958 年西西里作家托马齐 · 迪 · 兰佩杜萨的长篇小说《豹猫》的发表，以及它在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中激起的强烈反响，无疑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豹猫》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时期：加里波第的军队已在西西里登陆，权贵老爷们预感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惶惶不可终日，贵族堂 · 法勃利齐奥毫无反抗之意，消极地等待着他本阶级的灭亡和自己家庭的破产；尽管他不喜欢新生事物，但他也不愿意为维护旧的习俗去冒险，即使是参议员议员的宝座也无法引起他丝毫的兴趣，因为他意识到旧世界的崩溃已成定局，故静心地等待着死神的到来。

事实上，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维多里尼、帕韦泽、莫拉维亚、阿尔伐洛等作家在开拓新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同时，为了让意大利能快步跟上欧洲文化前进的步伐曾经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他们接受欧洲其他国家颓废主义文学的影响，努力在作品中反映当代西方社会的特征。例如，帕韦泽将童年视作文学创作灵感的本源以及人认识世界的开端；阿尔伐洛笔下意大利南方的喀拉布里亚地区几乎成了躲离都市喧闹和与世隔绝的幸福乐园；维多里尼在他后期的作品中，把法西斯主义描写成隐藏在每个人心灵深处的兽行的表现。即使在战后脱颖而出的纪实文学作品中，作者往往也通过罗列事实强调事物的客观性，忽视了人的重要作用，具有一定的自然主义倾向。

在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处于危机的时刻，《当代》和《文艺创作室》两家文学杂志社依然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并为之作出了不懈的努力。由罗马诺 · 彼兰基等人任主编的《当代》杂志创办于 1954 年 3 月，其宗旨是将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当代》的编辑者以匈牙利著名哲学家、文学批评家乔治 · 罗嘉斯和意共创始人葛兰西的思想为理论基础，主张发扬资产阶级的先进文

化,抵制任何非理性思想的渗透。《当代》追求革命的新文艺,它认为 20 世纪一些所谓的文化先驱运动的经验不宜推广，因为它们使一些醉心于单纯文学形式改革而又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逐渐脱离社会现实。《当代》的编辑者指出,现实主义是反映 20 世纪 50 年代社会特征的最理想的文学形式，而新现实主义文学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必须由现实主义文学来取代它，只有这样，文学艺术才能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 1956 年，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一连串急剧的变化：继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斯大林之后，在匈牙利又爆发了反革命叛乱事件，这使欧洲的左派知识分子队伍陷于严重的涣散状态，他们振兴社会和改革文化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在坚持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上，《当代》亦遭受到很大的冲击，艰难地向前迈着沉重的步子。

《文艺创作室》由帕佐利尼等人创办于 1955 年,它试图在新现实主义文学处于危机的情况下重建传统的意大利文学。该杂志强调在文艺领域内进行新的尝试，主张运用新的艺术表现技巧反映社会现实。

一、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Giuseppe Tomasi di Lampedusa,1896—1957)

迪·兰佩杜萨是一位西西里作家，同时又是帕尔马公爵和兰佩杜萨亲王。他出生于西西里首府巴勒莫，是当地一个贵族世家兰佩杜萨大家族的后裔。他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通晓多种外语，深受欧洲文化艺术的熏陶。他曾先后在热那亚和都灵大学攻读法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迫中辍学业，奔赴前线担任炮兵军官，后被捕关进战俘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赴利比亚作战，为此自由党人捣毁了他家祖宅。由于精神崩溃，他未能从事他所渴望的外交工作，因而闲居在其曾祖父一度居住过的楼房里，欣赏文艺，并以写作自娱。1955 年起，他开始写作他的著名历史小

说《豹猫》(Gattopardo, 1958),该书后来在作家乔尔乔·巴萨尼的力荐下才得以出版，并受到国内外文学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在这部小说中,迪·兰佩杜萨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萨利纳亲王法勃利齐奥复杂的心理活动：眼看着由古老的波旁贵族掌握的西西里政权在 19 世纪 60 年代即将落入意大利新王国和贪婪的自由资产阶级手中,以及他侄子投机革命、与新权贵联姻的卑劣行径,萨利纳亲王表面上却泰然自若，无动于衷。作者以富丽多彩的文笔和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情节，表示了对老亲王保守观点的支持。书中堂·法勃利齐奥被认为是现代意大利文学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个人物,作品也曾荣获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并由意大利著名导演维斯贡迪于 1963 年搬上银幕。

《豹猫》一书以 1860 年 5 月加里波第率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拉开序幕,贵族老爷们担心自己的万贯家产将毁于一旦;诡秘奸诈的资产阶级则虎视眈眈，伺机侵占胜利的果实。而萨利纳亲王堂·法勃利齐奥却对周围发生的一切熟视无睹，泰然自若地等待着本阶级和本家族的衰亡;他虽然热爱新生活,但又不想拯救行将灭亡的旧世界。亲王的侄子丹克雷迪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他为了贪图钱财和政治上的平步青云，开始热恋起新任市长的女儿安杰丽嘉，并请求亲王前去替他求婚；市长最终不仅答应了这桩婚事，而且还许诺为其女儿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2 年后,加里波第的军队在阿斯勃洛蒙特惨遭失败，巴勒莫城里的达官贵人大摆宴席,并举行大型舞会庆贺胜利。此情此景使亲王百感交集,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迪·兰佩杜萨借助小说中亲王法勃利齐奥和新任市长两个人物，隐喻曾不可一世的封建贵族必将由新生资产阶级所替代，而后者却是一头阴险狡猾的豺狼。小说成功地刻画了法勃利齐奥亲王这个没落封建贵族的人物形象,逼真地反映了他面对革命风暴内心的彷徨、惆怅、无奈和沮丧。

二、乔尔乔 · 巴萨尼(Giorgio Bassani,1916—)

巴萨尼生于波伦亚，是费拉拉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族的后裔。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费拉拉度过的，以致他以后的作品几乎均以费拉拉犹太人社区的生活为主题。 1939 年他毕业于波伦亚大学文学系。翌年，为躲避法西斯的种族迫害，他用化名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散文诗集《平原上的一座城市》(Una città di pianura)，朴实、细腻的写作风格及哀婉的诗句不禁使人联想起德裔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意大利隐逸派诗人蒙塔莱诗歌的格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萨尼曾参加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1943 年被捕入狱，出狱后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同年迁居罗马。大战期间的坎坷经历和残酷的社会现实使他很快放弃隐逸派的诗歌创作风格，开始积极探索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真谛，他的作品以考察现代历史背景中耗尽的个人生命著称。 1956 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费拉拉故事五则》(Cinque storie ferraresi),1973 年再版时改名为《大墙后面》(Dentro le mura) ,描写法西斯主义和排犹主义的产生，反映犹太人的痛苦生活和心路历程，使巴萨尼初次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以及意大利每年授予最优秀文学作品的斯特雷加文学奖。长篇小说《芬齐—孔蒂尼家的花园》(Il giardino dei Finzi—Contini,1962 ）同样以费拉拉为创作背景，它的问世确立了巴萨尼在意大利文坛上的地位。小说的叙述者以其本人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与同为犹太人的没落贵族家庭芬齐一孔蒂尼家族相比，后者过着隐匿的生活，最后被法西斯分子消灭。继而发表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苍鹭》(L'airone,1968) ,刻画一个在狩猎中的孤独的费拉拉地主。这部小说获最优秀的意大利散文坎皮耶洛奖。另外，巴萨尼还写有若干诗集。

《芬齐一孔蒂尼家的花园》好似一首挽歌，富有浓厚的抒情味和感伤色彩，在追忆青少年时代美好岁月的同时，控诉了法西斯纳

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滔天罪行。巴萨尼采用倒叙法，以小说主人公参观罗马古城墙下一座古柏森森的墓地揭开故事的序幕：他在犹太人公墓里看到了芬齐一孔蒂尼家族的墓地，往事像奔腾的波涛,一霎间涌满他的脑海,死去的友谊、死去的爱情、死去的人在他的眼前旋转着，来回晃动着。在 1938 年法西斯纳粹颁布种族主义法之前，孔蒂尼一家在费拉拉城郊一栋带花园的别墅里过着幸福、安宁的生活。孔蒂尼家的长子阿尔贝托和女儿米科尔都是小说主人公高中时代的同学，彼此的友情甚笃，在他与米科尔之间还曾有过一段朦胧及富有诗意的初恋。孔蒂尼一家因拒绝领取法西斯党证而遭他人的指责和冷落，惟独小说主人公继续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交往。随着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进一步加剧，孔蒂尼一家于 1943 年在德国集中营里全部惨遭杀害。通过小说主人公对往事纷乱而又热烈的回忆，作者把读者的思绪再一次带回到大战期间那久远的年代，如诉如泣的叙述实际上是对人类悲惨命运的哀叹。

三、伊达洛 · 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985)

1. 生平与创作

卡尔维诺是 20 世纪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和文学批评家，祖籍意大利北方利古里亚地区圣莱莫，出生在古巴港市圣地亚哥，父亲是园艺师，母亲是植物学家。2 岁时，他随全家迁回圣莱莫。1942 年高中毕业后，他开始在都灵大学农学系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维诺与他弟弟一起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后毕业于都灵大学文学专业。在此期间，他参加意大利共产党，参与意共机关报《团结报》的编辑工作，同时兼任埃伊纳乌第出版社文学顾问。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通过这家出版社公开发表的。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卡尔维诺翌年在《团结报》上发表公开信,宣布退出

意共。1959 年,他同维多里尼一起创办杂志《雏形文学》,就知识分子在各政党内部的作用及文化先驱等问题展开颇有价值的讨论。1985 年 9月，卡尔维诺在意大利佩斯卡拉城病故。

卡尔维诺是一个勤奋、多产的作家,他为探索文艺创作的新天地奉献了一生,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笔耕不止。他早期的作品均以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题材,例如新现实主义小说《蜘蛛网似的山路》(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1947),通过一个少年的经历描写抵抗运动，叙述他在紧张而又欢乐的战斗生活中结识的不同政治理想的军官，以及性格各异的游击队战士，整部小说宛如发生在大森林里的一则童话故事，历史与童话和谐地融合在了一起。卡尔维诺于 1949 年发表的《姗姗来迟的乌鸦》(Ultimo venne il corvo)，也是一部以反法西斯游击战争为题材的小说。

20 世纪 50 年代卡尔维诺从现实主义转向幻想和寓言，发表了 3 部幻想小说，使他获得国际声誉。第一部是《一分为二的子爵》(Il visconte dimezzato,1952),写一个人被炮弹击中,分成两半:一半是好人,一半是坏人,后来他爱上了一位农村姑娘,两半才重合为一。第二部是《跃立的男爵》(Il barone rampante,1957),描写一个 19 世纪的贵族后裔决定栖居树上，不再下到人世间生活，饶有风趣地探索现实与想象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紧张关系。第三部是《不存在的骑士》(Il cavaliere inesistente,1959),是一个模拟骑士的史诗故事，深刻揭示了现实社会的各种弊病。发表于 1956 年的《意大利童话集》(Fiabe italiane)收集了将近 200 篇意大利各地的传统民间故事和童话，被人誉为“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卡尔维诺的后期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马可瓦多》(Marcovaldo,1963)、《宇宙奇趣》(Le cosmicomiche,1965)、《命运交叉的城堡》(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1969)、长篇小说《无形的城市》(Le città invisibili,1972)、《寒冬夜行人》(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tore,1979)和《帕罗马尔》(Palomar,1983)等。

2. **作品分析**

有人说卡尔维诺是一位‘ 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之中 ’的作家,这似乎颇有道理。他善于游戏似地以新颖的结构和变化不定的视角,来考察各种机遇、巧合和变化。在长达 40 余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卡尔维诺一直尝试着用各种艺术手法最贴切地表现当代人真实的生活和心灵。有的文学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以奇特的角度叙述超乎想象的、富有浓厚童话色彩的故事，比较集中地反映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特征。为此，作为意大利当代最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位作家，卡尔维诺于 1985 年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后因他当年猝然去世而与之失之交臂。即使在进入 21 世纪之后,卡尔维诺的各类作品依然受到各国读者的广泛关注。

《蜘蛛网似的山路》是卡尔维诺的处女作,故事叙述了一个生活在热那亚贫民区的少年比恩在大战期间的亲身经历：比恩从德国士兵那里窃得一支手枪后，将它藏在山涧小路旁的一个洞穴里；为盗窃枪支一事,德国兵将他逮捕后严刑拷打;比恩越狱成功,在山路上巧遇一位游击队战士，他带着比恩投奔游击队；在游击队里,比恩有幸结识来自各社会阶层的人,后因与连长发生口角,赌气下了山;比恩发现,他藏在洞穴中的那支手枪已不翼而飞,后在他姐姐处看到了与他丢失的那支一模一样的手枪，他取了枪再次离家出走；途中，他又遇到了那个当初领着他投奔游击队的战士，两人高高兴兴地手拉着手走在蜘蛛网似的山路上，四周到处飞舞着点着小灯笼似的萤火虫,它们像镶嵌在树丛里的蓝宝石,把夜色点缀得分外瑰丽神奇。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主义的风格和作者极其丰富的想像力有机地融为一体，比较集中地体现出他的写作特点。卡尔维诺通过少年比恩的奇遇，向读者展示了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各种人的心态，带有童话色彩的故事结尾则表达了作者对

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坚定信念。小说问世后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帕韦泽为此在《团结报》上撰文称它为“反映意大利游击战争的一部最优秀的文学作品。”

正如有的当代学者所说，卡尔维诺一生的文学创作可以归纳成八个字：无限追求，追求无限。卡尔维诺擅长于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以辛辣、隐喻的艺术手法暴露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并用文学语汇把自己在人世间所经历的忧伤和欢乐告诉后人。被称为“纹章三部曲”的《我们的祖先》(Antenati) 的问世，进一步确立了卡尔维诺作为寓言式作家在意大利文坛上的地位。它由《一分为二的子爵》、《跃立的男爵》和《不存在的骑士》三篇组成,情节古奥晦涩，文笔幽默含蓄，寓意深长，比较形象地体现了卡尔维诺另一个重要的写作特点。这三则情节怪诞的寓言式故事，在创作风格上不落窠臼，隐喻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现实社会中，人不得不生活在具有双重真相的世界里：人渴望逃离现实，以重新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但在不间断的寻寻觅觅中，他发现自己的一切努力最终都成了一场梦幻；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出现危机，致使人无奈地生活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尽管如此，在卡尔维诺的作品中，我们仍可看到乐观主义人生哲学的影子，它产生于人对理性的信仰，以及人对生活的热爱。

《一分为二的子爵》叙述的是发生在 1716 年抗击土耳其入侵者战争中子爵老爷被炮火击成两半的故事：“善良的子爵”以行善为己任,替天行道,劫富济贫;“邪恶的子爵”放火焚烧农舍,强抢民女,遭人唾弃,后竟然派人前去行刺“善良的子爵”经过一场生死搏杀，两位子爵合扭成一团，重新成为一个完好如初的整体，“善良”与“邪恶”亦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在这一部近乎魔幻小说的作品中，卡尔维诺借助超现实的题材，抒发了被现实社会截成两半的现代人欲成为完美整体的愿望。

《跃立的男爵》中的主人公科西莫是一个贵族世家年仅 12 岁

的少年,他无法忍受令人窒息的家庭气氛,痛恨家里所有的人 趋炎附势、觊觎高位的父亲,庸庸碌碌、规行矩步的母亲,心怀叵测、阴险诡谲的叔叔,歇斯底里、不可理喻的姐姐。因放走了木桶里的蜗牛遭受毒打，科西莫一气之下爬上一棵大树，从此再也不愿下来。科西莫在树上栖息了长达 65 年之久,经历了种种的磨难和考验,在残酷的环境里他学会了各种生存的本领,也目睹了世事的变迁和人间的沧桑，最后随一个英国人驾驶的热气球飘向远方。通过科西莫之弟所讲述的这一则荒诞的故事,卡尔维诺启迪人们: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水火不相容，人若想赢得自由的生存空间，他只有逃离现实。

《不存在的骑士》是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叙述的是发生在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查理大帝（公元 768—800 年)统治时期的一则情节离奇古怪的故事:一日,查理大帝在阅兵时,惊奇地发现队伍里有一位没有躯体但全身装束洁白严整的骑士，他自称是一个“不存在的骑士”骑士既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每天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各种动作 骑士徒劳地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以便在历史上能留下自己的足迹，故对未来充满了疑虑和惶惑。卡尔维诺之所以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这个“不存在的骑士”形象,是想借此渲染现代人自我存在的意义，并暗喻现代人焦躁不安的心态及其无形的社会地位。

用“迷宫”来形容卡尔维诺的小说,无疑是一个最为恰当的比喻。在他的笔下,小说简直成了一只变幻无穷的魔方,似乎“游戏小说”给了他无尽的欢愉。在他后期创作的 3 部小说中,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世界依然是那样的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命运交叉的城堡》的结构宛如一副由 78 张牌组成的纸牌，卡尔维诺以纸牌随意的排列构筑情节,然后将他脑海中早已成型的、发生在森林中一古堡中的故事娓娓道来 故事中的人物互不认识,也不知道彼此的来历,但是他们都急于向对方讲述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 他们的故

事在内容上各不相同,暗喻每个人的生命好像是一条印痕,启迪人们采取正确的人生态度,即孜孜不倦地寻觅、追求和探索自身存在的价值。《无形的城市》叙述的是发生在中国元代的一则类似《天方夜谭》的故事:元代皇帝忽必烈决定采纳其宠臣马可·波罗的建议,在帝国遥远的疆土上兴建大城市,并要求他前去实地巡察,然后向他描述那些无形城市的概貌。通过马可·波罗在访问 11 座城市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作者巧夺天工地塑造了一系列各种不同层面上的普通人物,在书中展示了一个充满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魔幻般的世界,一个死亡和希望共存的世界,隐喻生活在"无形城市"中的现代人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寒冬夜行人》则是卡尔维诺后现代派的一部力作,较全面地体现了他不断创新的美学追求。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卡尔维诺笔下的主人公竟然是正在阅读他新作《寒冬夜行人》的一位读者,故事也因为该读者发现小说页码有错去书店要求调换而展开:由于印刷厂装订工作的混乱，读者换回的书页码始终有差错，致使他最后读完了 10 部不同的小说;在调换书的过程中,读者在书店结识了一位名叫柳德米拉的女读者，对文学的共同爱好使他们在换书的风波中双双坠入爱河，并最终结为伉俪。这一部采用时空交错和超现实艺术手法写成的小说,无疑是对传统文学作品的一个有力的挑战,而卡尔维诺独特的构思使这部小说中的小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张力。

四、卡尔洛·卡索拉(Carlo Cassola,1917—1987)

卡索拉是 20 世纪意大利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他出生在罗马，但自幼生活在他母亲的家乡意大利中部托斯卡纳地区的伏尔泰拉，大战期间又曾在那里参加反法西斯游击战争。他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以伏尔泰拉一带秀丽的山川为写作背景，他在感情上同这座历史古城始终保持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自 23 岁那年起，卡索拉定居伏尔泰拉，1956 年出版的小说

《费拉第尔路上的房子》（La casa di via Valadier）,叙述的正是作者对这一段罗马生活的回忆。他 20 岁左右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并先后在一些文学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抒发人生的悲凉。大战爆发后,他毅然辍笔,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政治斗争,直至 1945 年意大利解放之后才重新挥笔著书。数年颠沛流离和动荡不安的生活给卡索拉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创作素材,其中,《福斯特和安娜》(Fausto e Anna,1952)、《老战友》(I vecchi compagni,1953)等都是以游击战争为写作题材的长、短篇小说,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的经历及其丰富多彩的个人感情生活，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1954 年出版的题为《伐木》（Taglio del bosco）的中篇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誉满文坛。故事主要描写一位伐木工人缄默的性格以及他在丧妻后内心深切的痛苦。在这一时期中，卡索拉还先后在几所高级中学执教,同时为报社和《当代》、《世界》等杂志社撰稿。尔后,他又写了好几部在文学艺术方面均十分成功的作品,为此先后荣获多项意大利文学奖,1960 年他的长篇小说《布培的未婚妻》(La ragazza di Bube)再度获奖。

就写作风格言，卡索拉擅长运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些不为人们所注目的生活琐事，刻画普通人内心的欢乐和痛苦，文笔朴实、素静,但作品的内容显得比较平板,起伏不大。他在后期创作的作品有《干涸的心》（Un cuore arido,1961)、《猎人》（Il cacciatore,1964)、《难忘的岁月》(Tempi memorabili,1966)、《本地的铁路线》(Ferrovia locale,1968)、《阿达的故事》(Storia di Ada,1967)、《重温旧梦》(Una relazione,1969)、《人与狗》(Uomo e cane,1977)等。

卡索拉的作品不受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的影响，始终保持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擅长在每日间平凡的小事上着墨,以此努力发掘人生的意义和普通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追求的是朴素、淡雅的文笔,以‘赤裸裸的事实’描摹小人物平淡、简朴的生活,作品中很少有过于浪漫主义的描写。倘若我们剖析卡索拉一生的著

述，我们将不难发现，他的早期作品带有一定的隐逸派特征，60 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标志着一个新的转折，即更加关注当代的社会现实，并对彻底改变意大利社会的可能性寄予殷切的希望。

《伐木》和《布培的未婚妻》是卡索拉的两部佳作，语言简洁、朴实，情节亲切感人，富有浓厚的人情味和乡土气息。《伐木》叙述的是一则凄切、伤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古里埃莫是一位 38 岁的伐木工人，3 个月前刚丧妻，心中充满了忧伤；为了抚平内心的伤痛，他和另外几个人合伙买下了一片林子，并雇佣工人一起去那里伐木；从寒风萧瑟的秋天到呵气成霜的严冬，工人们忍受着种种的困难和艰辛，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不辞辛劳地干了 5 个月的活儿；与工人们的朝夕相处使古里埃莫暂且忘却了精神上的悲痛，也让他深刻领悟了人生的坎坷；5 个月过后，古里埃莫回到家中，当他看到自己幼小的女儿，莫名的孤寂和忧伤再一次笼罩在他的心头。卡索拉以平铺直叙的写作手法，通过伐木工人们的举止和谈吐，细腻地描述了他们日复一日的单调、枯燥的生活，抒发他们内心的感受和直面人生的勇气。在小说的末尾，卡索拉巧妙地安排古里埃莫与一位烧炭工人之间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两人都意识到：尽管每日间乏味的劳动使他们深感疲惫，但也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自豪感，因为它是构筑他们人生价值的一个重要元素。在小说的最后一段，古里埃莫出于对亡妻罗莎深切的思念，在她的墓穴前驻足良久，迟迟不愿离去：

> ……他的情绪从未这么低落过，即使在罗莎刚去世的那几天里，他的神情也没有如此的沮丧。此时的他，脑海中甚至闪现随罗莎同去的念头。
>
> “罗莎”，他喃喃自言道。“罗莎”，他大声地呼唤她的名字。“罗莎，你帮帮我！罗莎，你给我一些活下去的勇气！”

……他想，罗莎一定会帮助他。他实在无法继续这样活在世上。她在天上应该给他生活下去的勇气。

他仰望天空，黑沉沉的天幕上看不到一颗熠熠闪光的星星。

《布培的未婚妻》是一部以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为写作背景的纪实性小说,在意大利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曾被搬上银幕。小说讲述了年轻的游击队战士布培因无法融入战后的现实社会而触犯刑律被捕入狱的故事。小说通过布培与其未婚妻玛拉相恋、分手和最终和好的心路历程,揭示了人们在战后精神上的彷徨和痛苦。布培原是一个血气方刚、性情暴躁的游击队战士,战争结束后,他仍以战时的行为准则处理个人之间的恩怨 为替一位死去的战友报仇,他竟然无视法律的存在,擅自处死了一个宪兵上士和他的儿子 后来他被警方逮捕,并被判处 14 年徒刑 面对残酷的事实，玛拉最终勇敢地作出了等他出狱与之结为夫妻的决定。在这部小说中，卡索拉充满柔情地描绘了家乡秀丽、娇娆的山川，以及布培与玛拉之间美丽、纯洁的爱情，借此烘托人物的思想感情，以及人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五、莱奥纳尔多 ·夏侠(Leonardo Sciascia,1921—1987)

夏侠是意大利当代著名小说家和随笔作家。他生于西西里岛阿格利琴托一座偏僻小镇上一个世代矿工之家，在阿格利琴托度过了少年时代之后,他进入省师范学校就读,直至 20 岁那年方返回家乡，并在当地一家粮食公司当职员。1949 至 1956 年,他在家乡的一所中学执教 翌年,他迁居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城,直至谢世,他一直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在西西里生活的数十年中，夏侠与农民接触频繁，渐渐对他们的生活习俗和喜怒哀乐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给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另外,他自幼酷

爱文学,除广泛阅读意大利经典著作和当代文学作品以外,他还涉猎法国、俄国和美国文学,这无疑为他日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夏侠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早期他曾写过两本诗集,他的处女作是 1956 年发表的《莱加尔佩特拉教堂》(Le parrocchie di Regalpetra) ,文笔犀利,格调沉郁,描述了他在中学执教期间体察到的西西里人民世世代代所遭受的苦难和不平。他早年的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均欠成熟,因而未引起文学评论界足够的重视。1958 年问世的短篇集《西西里大叔》(Gli zii di Sicilia) 使他声誉鹊起,在新现实主义趋向消亡的形势下一跃成为蜚声意大利文坛的西西里作家。《西西里大叔》中的每一个短篇都是以西西里作为写作背景的,分以下 3 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反映西西里人的生活与斗争、苦难和希冀:从 1848 年 1 月巴勒莫爆发西西里革命至加里波第率领"千人义勇军"在西西里登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至 1948 年意大利的经济复苏;从 1953 年斯大林逝世至批判"个人崇拜"浪潮的形成。夏侠的文学作品饱含冷峻的哲理和悲愤的讥讽,艺术结构曲折有致,以真切的笔触描摹西西里的日常生活、社会风情、灾祸苦难和沉疴恶疾。他运用手中的笔,倾注了对西西里深沉的眷恋之情,对厄运缠身的穷苦人寄予满腔的同情和爱怜,在作品中着意刻画他们的痛苦与欢乐、习俗与偏见,悲哀和希望每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正如作者本人所说:"西西里人不善言辞,尽管他们内心痛苦万分,但从不轻易表露他们的感情。我信赖他们。"然而,由于西西里黑社会势力十分猖獗,夏侠的某些作品带有一抹淡淡的哀婉色彩,显出几分苍凉和悲壮。

1961 年出版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白天的猫头鹰》(Il giorno della civetta) ,以黑手党在其巢穴西西里的罪恶活动为写作素材,叙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宪兵上尉在侦查一起凶杀案中所表现

的机智和果断，揭露政界同社会反动势力沆瀣一气的丑恶内幕。尔后，他又发表了借古喻今的历史小说《埃及提案》（Il consiglio d’Egitto，1963）和《宗教法庭检察官之死》（La morte dell’-inquisitore，1964），从法国革命和中世纪天主教宗教法庭审判异端的史实中撷取创作素材，反映扑朔迷离的社会现实。此外，夏侠还写了不少具有侦探小说特色的社会小说，情节的描述同哲学理性的议论作为两条主要线索，始终贯穿其中，它们同平庸的商业性侦探小说相去甚远。在《各得其所》（A ciascuno il suo，1966）等作品中，作者借鉴侦探小说的某些特殊手法，通过西西里这面镜子，鞭辟入里地揭示了意大利社会的种种黑幕。夏侠在文学园地里勤勉地耕耘了 30 余载，写出包括小说、剧本、随笔、评论等不同体裁的作品近 30 余部，在当代意大利文坛上深孚众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部分意大利知识分子对新的社会政治形势普遍感到失望和沮丧，而夏侠的创作热情却依然不减当年。这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或麻木不仁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同样饱含着失败者的悲怆。当时，昔日鼓舞人心的新文化运动已如深秋的花朵一样凋谢零落，大战初期人们旺盛的斗志和激昂的感情也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世事的变迁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夏侠对现代人的觉悟仍充满信心，始终憧憬着一个没有剥削或压迫的正义社会。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作者对未来所寄予的热切希冀日趋淡薄，他的后期作品，例如《前因后果》（Il contesto，1971），流露出疑惑和失望的情绪，因为他认为历史给西西里留下的创伤和弊病是无法根治的。

夏侠毕生致力于唤醒西西里人民的政治觉悟，通过作品揭示西西里的社会面貌，为家乡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大声呐喊，自始至终对西西里满怀着缱绻深情。在他的临终遗言中，他嘱咐家人将他的遗骨埋葬在西西里这一片神奇、美丽的土地上。

第三节　工业文学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不少知识分子对历史和政治感到厌倦，他们拒绝从理性的角度认识人的历史作用,否定今昔社会的积极因素,徒劳地企盼革命新潮流的到来。在文学界，这种颓废情绪引起了非理性主义的繁衍，相当一部分作家转而反对包括新现实主义在内的所有现实主义创作风格，他们从活跃在 20 世纪初欧洲文坛上的一些文学流派中吸取养料，并将此作为自己在艺术上的借鉴。这种在 50 年代中期形成的实验主义新文学，企图摆脱传统文学创作风格的桎梏，以非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揭露和抨击社会现实。但是，这纯粹是一种带有颓废派思想色彩的、近乎绝望的呐喊,因为它完全否定人改变历史航程的可能性,以无政府主义的态度看待社会现实,致使 20 世纪 30 年代的悲观论再次在文坛回潮。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经过战后的重建，意大利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并创造了人们所称的"经济奇迹",国民收入明显增加,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国际舞台上,意大利在 1955 年加入联合国之后，与其他欧洲和北美洲国家结为军事同盟,并与之签订了若干经济合作协议,意大利重新取得了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所赋予的尊严和国际威望,跻身世界先进现代化国家的行列。这一系列的变化对意大利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乃至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毋庸置疑,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面对社会变革,不可能不作出迅速的反应,因为作为文化工业(电影、出版社、报社、电视台、电台等)工薪阶层中的一员,作家对所谓的"经济奇迹"尤为敏感。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工业文学在 1960 至 1961 年间脱颖而出，它旨在分析处于机械化时代的人的处境及工业高度发展给社会带

来的恶果。自 1961 年 9 月起，由卡尔维诺和维多里尼主办的《装帧样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工业同文学的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工业的迅猛发展使人渐渐不由自主地沦为工业产品的奴隶；当代文学家应该努力将人从这一被动的地位中尽早解救出来。工业文学家指出：在我们周围，正发生着巨大而可怕的变化，文学艺术(不管是哲学、社会学，还是绘画、音乐)总是落后于急速前进的社会形势，而不少文学艺术家对于这一切却置若罔闻，安之若素地继续挥笔讴歌大自然秀丽的风光和描摹少数人的闲情逸致。在新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之下，涌现出一批致力于积极反映工业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作家，他们在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创作了不少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

在当代作家中，维多里尼首先在《装帧样本》1961 年第 4 期上发表评论文章，就文学与工业的关系展开热烈的讨论。他指出：与国家经济带来的新的社会形势相比，文学相对滞后；如果文学不想因为置身于国家生活之外而变得枯竭，那么由这种滞后现象所造成的“空洞”必须迅速加以填补。他还说，为了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仅仅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作一些更改是远远不够的，作家务必从人类学的视角领悟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变化，采用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文学语言，透视工业社会的现实。这一场由维多里尼挑起的辩论推动了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文学的形成，作家们相继发表了不少积极反映工业世界的、颇有思想深度的叙事体作品。

罗马作家奥迪埃利于 1957 年发表的《严酷的年代》，揭开了意大利工业文学的序幕。小说的主人公是米兰郊外一家工厂的技术员，他起初对老板惟命是从，但后来残酷的现实教育了他，促使他从世俗的偏见中醒悟，渐渐在感情上同工人群众融为一体。作者在小说中描摹了米兰郊外阴暗荒僻的小路、工人简陋的住房、机声隆隆的厂房和令人讨厌的大雾，对挣扎在生活线上的穷苦工人寄

予深切的同情。奥迪埃利在 1959 年发表了另一部日记体小说，叙述了南方那不勒斯城外一家工厂失业工人的暴力反抗，以及招聘进厂的工人为提高工资待遇而举行的罢工斗争。

伏尔波尼分别于 1962 年和 1965 年发表的小说《回忆录》和《奇妙的机器》,揭示了工业化带来的恶果,刻意描写了工人同厂主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一部分工人逆来顺受，强忍着体力和精神上的折磨；另一部分工人则采取无政府主义的态度，进行着无力的反抗。《回忆录》的主人公是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他对未来充满着美好的憧憬和奇妙的幻想，误认为工厂生活像神话般尽善尽美。尔后，他有机会进工厂工作，他为自己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而欣喜若狂。但厂医不久即发现了他的病态心理：他怀疑有人陷害他，于是工厂一下子又成为他心目中最凶残的敌人。

巴利赛在 1965 年发表的小说《厂主》揭示了正常人在工业化世界里沦为机器人的惨痛事实：厂主不仅是厂房和机器的主人，他还掌握着手下雇员的意志和命运，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从而把他们推向饥饿和死亡的边缘。作者启迪人们：杀死厂主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保障了他手中的生杀大权，新厂主也许比他更为凶残。

彼安恰迪的小说《辛酸的生活》(1962)描绘了受欺压的人们如何采用无政府主义暴力行动同工业世界进行抗争：矿区发生了严重的生产事故之后，小说主人公出于报复的心理离家前往米兰，企图炸毁一幢摩天大楼，但最终未能如愿；迫于生活，他最后还是进厂当了工人。作者运用含蓄隐晦的艺术手法，借助生动丰富的语言，把主人公在矿区遭灾后的复杂心理活动刻画得惟妙惟肖。

一、奥迪埃洛·奥迪埃利(Ottiero Ottieri,1924—)

奥迪埃利生于罗马，大学文科专业毕业后移居米兰，进一家出版社的新闻办公室工作。 1952—1965 年,他在奥利韦蒂公司(意

大利一家制造办公室用具和信息系统的跨国公司)供职,负责公司的人事工作。与此同时,他在维多里尼主办的期刊《装帧样本》上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无意识的记忆》(Memorie dell'incoscienza,1954),描述一个集镇战后的生活。1957 年,他又推出了《严酷的年代》(Tempi stretti) ,描摹米兰作为一个工业大都市的社会面貌,揭示农民大量涌入城市的现状,以及他们孤独、忧郁、空虚的精神状态。数年后,奥利韦蒂公司在意大利南方城市波佐利建立分厂,奥迪埃利被调往那里工作,这一段生活经历后为他的另一部日记体小说《多纳洛马的袭击》(Donnarumma all'assalto,1959)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部小说叙述一位被委于挑选工人任务的心理医生的人生体验,以第一人称在日记中详尽记载了他每天的内心感受,最后得出了知识分子无法真实反映工人思想感情的结论。在书中,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心理医生同多纳洛马的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读来发人深思 多纳洛马对医生提出的问题一概不予回答,他甚至不明白,在城里找一份工作为何事先必须递交书面申请 对多纳洛马而言,现代社会中官僚机构拘泥于形式的做法违背自然规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数百年来,农民对于写成文字的东西有一种本能的逆反心理,总认为这是城里人对目不识丁或文化程度低下的农民的欺骗。

60 年代之后,奥迪埃利再次采用回忆录的形式记述事件的创作风格,努力探索深不见底的"自我世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剖析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以精神分析法揭明人的异化现象。直至上世纪末,奥迪埃利陆续又发表了若干小说、剧作和诗集,只是作品中又多了几分嘲弄和讥讽。

二、保罗·沃尔波尼(Paolo Volponi,1924—1994)

沃尔波尼生于乌迪内,1947 年毕业于乌迪内大学法律专业,1956 年进奥利韦蒂公司任社会服务处处长职务。自 1972 年去菲

亚特公司任企业关系顾问之后，他不再像旧式文人那样将自己禁锢在象牙宝塔里面，而成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与代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工业世界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后在左翼思想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公司的管理体制感到不满，并于 1975 年毅然离开菲亚特公司。1983 年他作为意共代表被选为意大利参议员议员。 1991 年意共解体后重组意大利左翼民主党，沃尔波尼参与重组工作，1994 年病殁。

沃尔波尼以写诗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早期的诗作有《绿蜥蜴》(Il ramarro，1948)、《古币》(L'antica moneta，1955)、《亚平宁之门》(Le porte dell'Appennino，1960) ,诗歌格调与当时风行一时的隐逸派诗歌迥然不一。60 年代初，沃尔波尼开始创作叙事体作品,其中于 1962 年发表的《回忆录》(Memoriale) 被誉为反映工业社会现实的一部力作。与新现实主义派作家从民粹主义角度颂扬无产阶级社会价值的做法不尽相同，他力求在作品中真实反映工人的悲惨生活境遇，揭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小说中的主人公萨洛嘉原本是一个农民，后进了奥利韦蒂的一家机械厂做铣工，繁重的体力劳动使他得了肺结核和神经官能症，最后他的情绪因疾病的折磨而经常处于恐惧和狂躁不安之中。 1965 年问世的另一部小说《奇妙的机器》（La macchina mondiale)同样取材于工业世界，描写一位来自意大利中部马尔凯地区的农民进城后的痛苦遭遇，表现人们试图缓和现实与假象之间冲突的乌托邦式理想的破灭。长篇小说《圣布》(Corporale，1974) 的主人公是一位名叫阿斯勃利的知识分子，同沃尔波尼其他叙事体作品一样，他也是个受社会排挤和异化的“另类人”。作者运用幻想与现实交替的艺术手法，通过阿斯勃利害怕原子威胁的奇特心理，反映当代人的精神危机。1975 年,沃尔波尼又推出一部佳作《公爵府的帷幕》(Il siparo ducale) ，通过两位并行而又交叉出现的主人公的命运，揭示古城乌尔比诺和现代工业城市米兰的社会阴暗面，隐喻现实世

界和人们美好憧憬之间的矛盾。通过发生在乌尔比诺城内奥迪诺公爵府邸内的罪恶事件，以及 1968 年岁末米兰中央喷泉广场的爆炸案，作者无情地抨击了充斥各种阴谋和纷繁复杂的现实社会。在 1989 年发表的小说《肮脏的资本》（Le mosche del capitale ）中，沃尔波尼对作为当代社会象征的繁华消费市场、高额商业利润和电脑技术取代人工劳动的倾向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1991 年问世的《通往罗马的路》（La strada per Roma） 是作者早在 60 年代就开始构思的一部叙事体作品，书中讲述了三位充满美丽幻想的乌尔比诺年轻学生去罗马寻觅理想生活而遭受挫折的故事。

三、鲁齐奥 · 马斯特罗纳尔迪（Lucio Mastronardi，1930—1979）

马斯特罗纳尔迪出生在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地区维吉瓦诺城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母都是小学教师。1959 年他在由维多里尼创办的《装帧样本》上发表他的处女作《维吉瓦诺的鞋匠》（Il calzolaio di Vigevano），是一部采用表现主义手法和伦巴第方言写成的叙事体作品。之后，他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均以他的家乡维吉瓦诺为写作背景，抨击和讥讽处在所谓“经济奇迹”前夜的意大利现实社会。维吉瓦诺当时是意大利制鞋工业的一个重要中心，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财富落入少数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暴发户手中，金钱使他们变得盛气凌人、目空一切。这种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冲突在他的下一部小说《维吉瓦诺的小学教师》（Il maestro di Vigevano，1962）中，则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表现，故被誉为他最成熟和最富有社会意义的一部小说。书中，作者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小学教师为摆脱家庭经济拮据的困境，弃教从商但最后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心中无法排遣的郁闷和愤懑致使他性格异化，言谈举止显得荒诞、怪谲。1964 年，马斯特罗纳尔迪推出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小说《维吉瓦诺的南方人》（Il meridionale di Vige-

vano），主要阐述工业化和移民之间的关系问题。70年代之后，作者又发表了两部小说《他们在你家中大笑》（A casa tua ridono，1971）和《保险商》（L'assicuratore，1975）。1979年他在家乡自杀身亡。

四、高弗雷多·巴利赛（Goffredo Parise，1929—1986）

巴利赛出生在意大利北方威尼托地区维琴察城，年轻时在帕多瓦大学攻读法律，但学业未竟。1954年起投身新闻事业，同时为意大利好几家重要报纸撰稿。作为特派记者，他写过不少旅行杂感，真实反映当代不同国家的社会面貌：《可爱的中国》（Cara Cina，1966）、《有关越南的二、三事》（Due，tre cose sul Vietnam，1967）、《比夫拉》（Biafra，1968）和《纽约》（New York，1977）等。

22岁那年，巴利赛发表第一部叙事体作品《死去的男孩和彗星》（Il ragazzo morto e le comete，1951），在这一部超现实小说中，历史事件被涂上了一层迷幻的色彩，鬼影和幽灵彻底打破了生与死，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1953年推出的小说《伟大的假期》（La grande vacanza）表现的也是同一主题。1954年问世的小说《漂亮的神父》（Il prete bello）标志了他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转折，引起了意大利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先后再版10余次之多。在这一部以揭露天主教会黑幕为主题的小说中，作者将法西斯专政时期一个居民小区作为写作背景，讲述了几户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人家各自的命运。小说情节围绕着主人公，即一位体魄健壮、长相俊朗的年轻神父而展开，无情地鞭挞和嘲讽了一些道貌岸然但政治上随波逐流的伪君子。与此同时，长篇小说《订婚》（Il fidanzamento，1956）和《恋爱与激情》（Amore e fervore，1959）相继问世，展现社会下层人民凄凉的生活及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

1965年，巴利赛的另一部取材工业社会的长篇小说《厂主》（Il padrone）问世，在这一部日记体小说中，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了

不知名的男主人公的亲身经历，充分展现了工业社会如何改变人的生活环境，以及现代人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如何失去良知的过程。接着，巴利赛又于 1966、1967 和 1969 年相继发表《维琴察的美国人》(Gli americani a Vicenza)、《绝对自然》(L'assoluto naturale)和《维也纳的焚尸炉》(Crematorio di Vienna)等小说，以超现实的写作手法，剖析现代人异化的根源。1972 和 1982 年，巴利赛发表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识字课本第一册》(Sillabario n. 1)和《识字课本第二册》(Sillabario n. 2)，文笔洗练娴熟、明快轻松，富有浓厚的抒情味和梦幻色彩，着力表现当代人因无法与他人沟通而产生的孤独心理。1986 年 8 月，巴利赛在威尼斯附近的特雷维索镇去世，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血腥的味道》(L'odore del sangue)于 1997 年问世，描写人耽于声色的致命弱点。

第四节　新先锋派文学和“63 学社”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意大利出现了同左翼党派日益合作的多党联合政府。在社会党同共产党的亲密关系逐渐瓦解后，天主教民主党开始与共产党建立起合作关系。另外，随着 1962 年电力工业的国有化，社会党人也加入了联合政府。与此同时，由天主教民主党领袖阿明托雷·范范尼领导的历届政府推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实施征收利润税与房地产税相结合的方针，以筹措建造公共住房的资金。然而，这一所谓的“范范尼计划”使人们对政府丧失信心，并导致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广泛的不安，投资金额和股票交易锐减。这样，一度使意大利跻身最发达工业化国家行列的长期经济增长，于 1963—1964 年间出现停滞不前的状态。

正是在同一时期，意大利文学也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折，曾盛行一时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开始衰微。对于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时期涌现的内容如出一辙的反对文学作品，人们开始感到厌倦。

另则,由于美国和苏联在 60 年代初因竞相发展洲际导弹而引发导弹危机，二次大战后出现的冷战局面进入另一个紧张阶段，世界性左派势力严重受挫。为此，人们原先对“行动主义”寄予的希冀和幻想逐一破灭,形成了一股新的、令人痛心的‘对历史失去信心’的思潮，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蔓延：人们拒绝从理性的角度看待历史和人的作用，不再乌托邦式地期待新的革命运动的到来，摒弃任何交流的工具，认为它们是妥协和异化的表现。在历史不可知论和不公正论思潮的影响下，不少文人不仅反对新现实主义，而且拒绝任何形式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惟独非现实主义的写作技巧才能揭示现实社会深邃的内涵，恰如其分地反映人在新资本主义时代的境遇。

新先锋派文学诞生于 1956 年左右，它注意吸收新现实主义走向消亡前后各种文学思潮的积极因素，致力于重建意大利的传统文学。新先锋派作家认为，在灾难深重和动荡不安的年代里，文学同社会的关系日趋疏远，以致不少作家以含蓄隐晦、节制谨饬、乔装掩饰的艺术手法反映当代的历史悲剧，但最终被时代的潮流抛之一边。他们指出：意大利的当代文学既不积极反映变幻莫测的社会形势或战后的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推行的“冷战”政策，又不倾力揭露原子战争的威胁，故大大落后于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当代文学。

当时，有不少作家追随新先锋派的文学路线，尽管他们的经历和需求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致力于创新文学语言，主张文学同科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尤其是绘画和音乐）结为联盟。一些具有开拓思想的作家和诗人于 1963 年 10 月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集会，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故被称为‘63’派,从而掀起了一个新颖的文学运动，涌现出不少在思想内容和创作技巧方面与传统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作品和论著，活跃了意大利文坛的气氛，揭开了意大利现代派文学的序幕。但是，与会者的观点并不一致，在巴勒莫

会议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以安琪罗·古利埃米(Angelo Guglielmi)为首的一派提出在工业社会内部建立新文学的主张，即文学不应肩负任何历史或思想任务，作家必须不偏不倚地在作品中剖析现实；以埃道瓦尔多·桑圭奈迪（Edoardo Sanguineti）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拒绝工业社会，主张文学作品应积极反映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建立语言和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巴勒莫会议之后,“63 ”派文人曾以新先锋派的思想原则为基础,致力于内部的联合，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继 1964 年雷乔埃米利亚会议和 1965 年巴勒莫会议之后，新先锋派的内部分歧日益加剧，一度鼓舞人心的新文学运动再度陷入危机，以致最后发展成为只有少数作家参加的学术性探讨和研究。“63 学社”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均是非理性的，它否定现实与传统之间的必然联系，坚持认为任何语言方式都无法反映现实社会，有的甚至在写作中摒弃语言规范，排斥语法结构和使用标点符号，致使不少作品带有虚无主义的色彩，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也显得古怪和荒诞。正因为如此,到了 60 年代末，新先锋派文学运动开始走向衰亡，作品中也没有了原先那种锋芒毕露和荡涤一切的锐气。

新先锋派是迄今为止意大利文学史上最后一场文化运动，它带着矛盾着的两重性在文坛上活跃了 10 余年,对意大利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 1965 年起，由于以下主要原因，新先锋派开始走向衰亡：其一，内部思想无法统一，矛盾和分歧日益加深,最终导致解体 其二,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发展,西方文学逐步沦为一种高档消费商品,加之收音机、电视机、电影、期刊杂志、图解小说的日益普及，人民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意大利文学史上其他文化运动一样，新先锋派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参加者局限于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不重视建立同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没有觉悟到人民群众是 20 世纪历史的真正主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其他资产阶级世界观，尤其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混同起来（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成意识和潜意识的两个对立部分，声称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是摆布个人命运和决定社会发展的永恒力量）。

1968 年爆发的声势浩大的意大利学生运动，给新先锋派以致命的一击。尽管这场政治运动的具体做法显得有些幼稚、偏激，但它提出了知识分子必须同社会进步政治力量相结合的革命主张。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新先锋派渐渐湮没无闻。

一、乔尔乔 ·曼加奈利(Giorgio Manganelli，1922—1990)

曼加奈利生于米兰，年轻时曾在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助教之职，后放弃教学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和新闻事业，为多家意大利主要报纸和期刊撰稿。他是“63 学社”的积极参加者之一，发表于 1967 年的评论集《谎言文学》（La letteratura come menzogna），抨击某些文学作品渲染虚假道德的现象，主张当代作家应该同传统文学决裂，从而为“63 学社”新实验主义理念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反对随波逐流和一成不变的创作风格，拒绝接受文学应肩负教育作用的说法，认为文学作品必须揭示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虚于蛇委的关系。他的这些观点在其两本评论集《令人焦虑的风格》（Angosce di stile，1981）和《费时的琐事》（Laboriose inezie，1986）中得到了比较详尽的阐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其作品中抒发的感慨同新现实主义作家嘉达的创作思想如出一辙，即作家惟独通过对个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思索和默想，才能发现自己生活的社会的荒谬和虚伪。所不同的是，曼加奈利采用更加冷峻、锋锐的文笔，以伤感的“黑色幽默”唤醒并驱除人们头脑中的妖魔，与奥地利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和瑞士心理学家容格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1964 年，曼加奈利发表第一部叙事体作品《希拉罗德拉哥埃迪亚》（Hilarotragoedia），它的标题就给人一种离奇、荒诞的感觉，

且故事情节滑稽可笑，喜剧和悲剧色彩融汇在一起，是对当代现实社会冷峻的嘲弄。1979 年发表的《百人组》(Centuria) 包括 100 篇虚构的微型小说,有的几页,有的甚至只有一页,结构简单,内容空泛，揭示叙事体作品在思想和结构方面空虚的特征。

曼加奈利著述甚丰,从 60 年代末至 80 年代末,他写有不少叙事体作品、评论及旅行杂记,其中主要有:《新评论》(Nuovo commento,1969)、《最后的神仙》(Agli dèi ulteriori,1972)、《萨姆尼孤儿的年历》(Lunario dell'orfano sannita,1973)、《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Cina e altri Orienti,1974)、《A 与 B》(A e B,1975)、《毫无结果》(Sconclusione,1976)、《塞浦路斯统治者卡西奥》(Cassio governa a Cipro,1977)、《爱情》(Amore,1981)、《幻影与纹章》(Discorso dell'ombra e dello stemma,1982)、《地狱》(Dall'inferno,1985)、《所有的错误》(Tutti gli errori,1986)、《噪声与声音》(Rumori e voci,1987)、《沙龙》(Salons,1987)、《打字机即兴曲》(Improvvisi per macchina da scrivere,1989)、《个人文集》(L'Antologia privata,1989)等。1990 年曼加奈利殁于罗马。

二、南尼·巴雷斯德利尼(Nanni Balestrini,1935—)

巴雷斯德利尼出生在米兰，新先锋派和"63 学社"最积极的发起人之一，1961 年发表的《60年代诗篇》(Poesie per gli anni Sessanta) 被认为是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宣言书。为创立富有实验主义风采的写作风格，他在诗苑进行了多年的积极探索，并善于采用不同的语汇（甚至包括新闻语言和广告语等）从事诗歌创作，透过诗句隐喻当代社会荒唐、无序的特征。除了诗作之外，他还写有一部表现同样主题的小说《德利斯达诺》(Tristano,1964)。

"63 学社"于 60 年代末瓦解后,他开始从政,加入了议会外的一个左翼政治党派。与此同时，他于 1971 年推出另一部小说《一切属于我们》(Vogliamo tutto)，以都灵菲亚特汽车公司为写作背

景，讲述了一个移居北方的南方青年政治上成长的过程。在这一部叙事体作品中，作者一改以往文字晦涩的写作风格，有意识地采用通俗易懂、便于交流的口语和平铺直叙的手法，使整部小说的文字显得简洁平易。翌年，他又完成了一本包括 3 个短篇的集子,描写工人斗争，谴责社会现实。1976 年，他的另一部小说《罪行昭著》(La violenza illustrata)问世。

巴雷斯德利尼善于以间接的方式在作品中抒发自己的政治观点，如短篇集《里士满小姐的叙事曲》(Le ballate della signorina Richmond,1977)和诗作《灯火管制》(Blackout,1980)等。为了躲避‘参加武装暴动’的指控,1979 年他迁居法国，直至 1985 年被免于起诉才回到意大利。之后，他写有诗集《伊波卡利赛》(Ipocalisse,1986)、《迷宫中的人们》(Il pubblico del labirinto,1992) 叙事体作品《无形的人》(Gli invisibili,1987)、《编者》(L'editore,1989)和《愤怒者》(I furiosi,1994).

三、路易其·马莱尔巴(Luigi Malerba,1927—)

马莱尔巴生于意大利北方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帕尔马附近的贝尔契托，原名路易其·波纳尔迪(Luigi Bonardi),1950 年起移居罗马。他曾是电影导演和电影剧作家，并同时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撰稿，还创办过一家广告公司。

马莱尔巴是新先锋派的一位代表作家,“63 学社”的骨干成员。他的叙事体作品题材广泛，风格亦不尽相同。60、70 年代,他追随实验主义的创作路子，写有《字母表的发现》(La scoperta dell'alfabeto,1963)、《鲨鱼之后》(Dopo il pescecane,1979)、《蛇》(Il serpente,1966)、《斤斗》(Il salto mortale,1968)和《主角》(Il protagonista,1973) 等，表现了他绝不向现实世界屈服的强硬态度。其中，短篇小说集《字母表的发现》以喜剧形式描写了农村现实生活中的悲剧 长篇小说《蛇》、《斤斗》和《主角》则臆造了一个非

理性的客观世界，揭示了充斥各种潜伏危机的社会中人们的变态心理,书中主人公的言谈举止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完全把自己禁锢在自我封闭的世界里，无法与外部世界的人进行沟通。在这些叙事体作品中,作者还有意识地杜撰了几起近乎‘侦探片’的凶杀案,而寻找凶犯的调查工作往往游离于主题以外,借此隐喻生活在现实世界的人麻木不仁、笨拙鲁钝的秉性。1975 年问世的小说集《帝国的玫瑰》(Le rose imperiali) ,以隽永的冷嘲抨击当权者的残忍和强暴，书中象征权力的玫瑰沾满了死囚殷红的鲜血。1978 年发表的《碑文》(Il pataffio) 则以想象中充满饥馑和暴力的中世纪为创作背景,书中不规范的拉丁语、古意大利语和意大利中部拉齐奥地区的乔恰利亚方言交替使用。1986 年推出的另一部小说《蓝色的行星》(Il pianeta azzurro)进一步对传统叙事体作品的结构提出异议,通过一位工程师的日记、另一主人公的评论和故事叙述者的介入，着重刻画主人公的人格异化。该小说借助一位政界要人沦为杀人凶手的事实，无情地嘲弄意大利政治体制的腐败。

到了 90 年代，马莱尔巴放弃他一直推崇的实验主义创作倾向,转而采用传统的平铺直叙的笔路和平易、简练的语言,以致在这一时期中创作的好几部历史小说均取得了可喜的成功：其中，《希腊之火》(Il fuoco greco，1990) 描述了发生在拜占庭宫廷里一系列扑朔迷离的凶杀案;《飞石》(Le pietre volanti，1992)取材于当代社会,着力刻画一位成功画家的生活,残酷的现实迫使他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作了一番贴切详明的剖析;《假面具》(Le maschere，1995)则以 16 世纪初叶教廷内部的矛盾为写作背景，叙述两位红衣主教之间的权力之争。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永恒的伊萨卡》(Itaca per sempre，1997) ,是希腊史诗《奥德赛》最后一部分的翻版，作者巧妙地以现代手法叙述奥德修斯回到希腊伊奥尼亚群岛 7 个主要岛屿之一的伊萨卡复仇的故事，着重描写他与其妻子珀涅罗泊之间微妙和难以捉摸的关系。与荷马的原著讲述的故事不

同的是，在马莱尔巴的笔下，珀涅罗泊一下子就认出上门行乞的丈夫，但她默不作声，只是扪心自问，他为何对儿子忒勒马科斯和牧羊犬而不向她袒露自己的身份。整部小说的构思充分显示出作者后现代派的创作风格。

四、埃利奥·巴利亚拉尼(Elio Pagliarani,1927—)

巴利亚拉尼是生于艾米利亚一罗马涅地区福尔利城的一位诗人，新先锋派主要作家之一。1945 年移居米兰，毕业于帕维亚大学政治学专业，后投身教学和新闻事业。迁居罗马后，他开始从事编辑顾问和戏剧评论工作，1972 年出版的评论集《观众的呼吸》(Il fiato dello spettatore)就是汇编了他在那几年中撰写的戏剧评论。除此之外，他还与他人合写剧作《驴皮》(Pelle d'asino,1965)、文集《意大利故事中的大师》(I maestri del racconto italiano, 1964)和《实验诗集》(Manuale di poesia sperimentale,1966)等。

巴利亚拉尼的文学创作生涯是从 1954 年的《评论与其他诗篇》(Cronache e altre poesie)开始的，接着又于 1959 年发表《个人财产清单》(Inventario privato)，显示出他对带有实验主义倾向的通俗文体的偏爱，富有叙事诗的诗韵。1960 年，他在维多里尼创办的文学刊物《装帧样本》上发表叙事诗《卡拉姑娘》(La ragazza Carla)，翌年编入《新诗集》(I Nuovissimi)中，同时公开宣布加入"63 学社"。在《卡拉姑娘》中，诗人继续在叙事诗的创作风格方面进行探索，诗句着意表现在一个异化的世界中，神经官能症如何像蛀虫一样蛀蚀消费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石。在诗人的笔下，现实成了模糊不清和已被解体的构象。巴利亚拉尼正是以这种近乎"蒙太奇式"的赋诗法，与"63 学社"的诗歌风格融汇在一起，以至他后来的诗作始终保持着同样的格律。他的后期主要作品有：《物理的教训》(Lezione di fisica, 1964)、《物理和费卡劳洛的教训》(Lezione di fisica e Fecaloro, 1968)、《南迪的双重三部曲》(Doppio

trittico di Nandi, 1977)、《柏拉图式操练》(Esercizi platonici, 1985)、《树林中的睡美人》(La bella addormentata nel bosco, 1987)、《短诗集》(Epigrammi, 1988)和《露迪的叙事曲》(La ballata di Rudy)等。

五、埃多瓦尔多·桑圭奈迪(Edoardo Sanguinetti, 1930—)

桑圭奈迪出生在热那亚，毕业于都灵大学，后曾在都灵大学、萨莱尔诺大学和热那亚大学教授意大利文学。他写有许多篇介绍意大利古典和当代文学的重要学术论文,如《对〈神曲〉地狱篇上下各层的诠释》(Interpretazione di Malebolge, 1961)、《自由与黄昏派文学》(Tra liberty e crepuscolarismo, 1961)、《有关但丁研究的三篇论文》(Tre studi danteschi, 1961)、《阿尔贝托·莫拉维亚》(Alberto Moravia, 1963)、《思想与语言》(Ideologia e linguaggio, 1965)、《但丁和圭多·戈扎诺的现实主义》(Il realismo di Dante e Guido Gozzano, 1966)、《调查与阅读》(Indagini e letture, 1966)、《评论的责任》(La missione del critico, 1987)、《保守的但丁》(Dante reazionario, 1992)等。桑圭奈迪是一位富有战斗力的文学评论家,长年为《晚报》撰稿,其评论文章先后被收入《内刊》(Giornalino 1973—1975)和《内刊续集》(Giornalino secondo 1976—1977)。除外，他还对意大利 19、20 世纪的一些作家及其作品重新加以评价,并于 1969 年发表《20 世纪诗选》(Poesia del Novecento),显示出他独特的赋诗风格和评论观点。

桑圭奈迪是新先锋派文学最主要的一位支持者和鼓动者，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他就以坚决的态度断然否定新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他曾担任多家重要文学期刊的编辑，并为之撰写不少颇有价值的评论文章阐述自己鲜明的观点。除此以外，他还写有不少诗作,小说《意大利随想曲》(Capriccio italiano, 1963)、《跳鹅

游戏》(Il giuoco dell'oca,1967)和《萨蒂利孔的花招》(Il giuoco del Satyricon,1970),以及若干剧作,后汇编在集子《戏剧》(Teatro,1969)和《自然的故事》(Storie naturali,1971)中。

同其他新先锋派作家一样，桑圭奈迪也拒绝接受传统的文学创作语言，认为它是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反映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语言工具，只能致使颓败的文艺作品进一步商品化。所不同的是，他采用时尚的精神分析法，尤其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瑞士心理学家容格的精神分析法，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彻底暴露现实生活中人们迷乱的精神状态和内心的痛苦，进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诸类矛盾和各种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问题。另则，桑圭奈迪将诗歌视作神话的创造者，认为人们只有通过诗歌才能深入了解当代的现实社会。正因为如此，桑圭奈迪的诗作具有明显的实验主义风采,致力于反映当代动荡不安的世界的方方面面,使读者原先坚定的信念在现实面前崩溃瓦解，进而提出令人不安的疑问。

下面译出的一首短诗选自《3 × 1》(Triperuno),比较形象地体现了桑圭奈迪诗歌的独特风格：

小孩你哭吧，我给你买一把蓝色的塑料长剑，一台微型的“博施”牌冰箱,一只赤陶的储蓄盒,一本 13 行的练习本，以及蒙特加迪尼化工联合企业的股份；
小孩你哭吧，我给你买一个防毒面具，一瓶强身的滋补剂，一个机器人，一本带有彩色插图的教理问答手册，以及绘有胜利小旗子的地图；
小孩你哭吧，我给你买一头泡沫橡胶的巨头鲸，一棵圣诞树,一个木腿的海盗,一把折刀,以及手榴弹的弹片；
小孩你哭吧，我给你买好多纪念阿尔及利亚反法战争的邮票,好多果汁,好多木制的头颅,摩尔人的头颅,以

及好多死人的头颅；
小孩你笑吧，我给你买一个小弟弟，你就管他叫“米盖
莱”。

六、迪诺·布扎蒂(Dino Buzzati，1906—1972)

布扎蒂是一位新闻记者、戏剧家和小说家，其小说和戏剧作品在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享有盛誉。他出生于意大利北方威尼托地区阿尔卑斯山下风景秀丽的培罗诺镇，家庭富裕的经济条件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为他成年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家乡的北国风光和自家 19 世纪建筑风格的祖宅也赋予了他浪漫主义的想象，并开启了他对童年时光无尽的回忆，以致他的作品往往给人以纯朴、明净的神秘感。在家乡读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后，他前往米兰继续深造，后毕业于米兰大学法律系。1928 年他受聘在米兰《晚邮报》任专栏记者，这一段人生经历充实和开拓了他的创作视野。布扎蒂一生的著述并不多，仅若干长、短篇小说而已，但在上世纪下半叶前 20 年的意大利文坛上却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布扎蒂对其母亲虔敬孝顺，为此 60 岁时方才步入婚姻的殿堂，以致他作品中的人物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他的作品充满寓意、讽喻及超现实的幻想，努力表现人在无情的命运面前内心的忧伤。早年，他采用传统的写实风格写有两部小说《山中的巴尔纳博》(Barnabo delle montagne，1933)和《古树林的秘密》(Segreto del bosco vecchio，1935)。发表于 1940 年的《鞑靼人的沙漠》(Il deserto dei Tartari)是一部有关前线驻军的很有力度的讽刺小说，被认为是他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体作品，也为他在意大利文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一部意大利当代文学的佳作是作者于 1933 年在米兰《晚邮报》任夜班编辑期间陆续完成的，体现了他对时光瞬息即逝的悲叹，以及对充满各种灾难的人生的忧虑和伤感。在

书中，某国北部边境上的那座神秘荒寂的军事要塞成了主人公、年轻军官德力戈情感的寄托和逃遁现实的理想去处，而谷底那条通往要塞的蜿蜒曲折的山路则象征漫漫人生路上永无止境的跋涉。应该说，《鞑靼人的沙漠》是布扎蒂超现实想象的产物，书中的年轻军官德力戈一生都在翘首企盼也许根本不存在的鞑靼人的入侵，在美好的憧憬中无谓地等待着人生的终结，而这正是布扎蒂想要表现的富有哲理的主题以及这部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

继《鞑靼人的沙漠》之后，布扎蒂又发表了两部颇有深度的短篇小说集《七位信使》（I sette messaggeri，1942）和长篇小说《斯卡拉剧院的恐惧》（Paura alla Scala，1949），描写人类生活的孤独和痛苦，以及对死亡的恐惧，着力表现人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性格的异化。综观布扎蒂一生的著述，他擅长在其作品中渲染介于现实与幻想之间梦一般的意境，隐喻现代人惟独借助超现实的梦幻才能摆脱生活的重负，同捷克出生的德语幻想小说家卡夫卡的作品颇为相似。自上世纪 50 年代直至谢世，布扎蒂陆续发表了包括小说、剧作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其中叙事体作品有《巴利韦尔纳的崩溃》（Il crollo della Baliverna，1954）、《六十个短篇故事》（Sessanta racconti，1958）、《一个爱情故事》（Un amore，1963）、《困惑的夜晚》（Le notti difficili，1971）剧作有《临床病例》（Un caso clinico，1953），描写一位医学专家和机器如何毁掉一个健康人的恐怖故事。另外，布扎蒂还为一些画册撰写文字说明，如《连环诗画》（Poema a fumetti，1969）和《莫雷尔山谷的奇迹》（I miracoli di Val Morel，1972）等。布扎蒂的作品曾先后被译成各种欧洲文字出版，并受到各国读者的赞赏。

七、乔万尼 · 阿尔比诺（Giovanni Arpino，1927—1987）

阿尔比诺生于现南斯拉夫西北部城市波拉。他在比埃琴察度过童年，1941 年迁居比埃蒙特地区的勃拉城，并在那里读完了高

中的课程。1946 年他人都灵大学继续深造,1951 年毕业于该大学文学系,写有评论 20 世纪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作品的毕业论文。

1952 年，阿尔比诺发表他的第一部小说《你曾经是欢乐的乔万尼》(Sei stato felice Giovanni);1959 年出版的小说《年轻的修女》(La suora giovane)被公认为他最优秀的一部叙事体作品。与此同时，他还为多家意大利报纸和期刊撰写文章。1961 年他的另一部小说《情杀》(Un delitto d'onore)问世,被推荐为当年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的获奖图书之一，最后因一票之差而与该奖项擦肩而过。继 1962 年的《勃然大怒》(Una nuvola d'ira)之后,他又于 1964 年推出《山坡上的影子》(L'ombra della collina) ,当之无愧地登上当年斯特雷加文学奖的宝座。尔后，他继续在文学创作园地里不辞辛劳地辛勤笔耕，先后发表了好几部颇有建树的长、短篇小说:《失去的灵魂》(Un'anima persa,1966)、《蠢驴和其他故事》(La babbuina e altre storie,1967)、《27 个短篇故事》(27 racconti,1968)、《黑暗与甜蜜》(Il buio e il miele,1969)和《流浪英雄汉》(Randagio è l'eroe,1972)、《意大利兄弟》(Il fratello italiano,1980)等。阿尔比诺后期作品的故事情节趋于"荒诞不经",着意刻画人与动物之间奇妙的关系和潜在的亲合力。

除此之外，阿尔比诺还写有若干儿童读物和剧作，其中有《虚张声势》(Bluff)和《可爱的情人》(Donna amata dolcissima)等。他的不少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八、马里奥·索尔达迪(Mario Soldati，1906—)

索尔达迪生于都灵，在家乡一所耶稣会学校读完高中课程之后,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学习,后毕业于该校文学系。不久他迁居罗马，在一所艺术院校攻读艺术史。23 岁那年，他发表处女作中篇小说集《萨尔马契》(Salmace),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尤其是他娴熟的写作技巧和清朗的笔调给人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1929 年至 1931 年，他获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回都灵后，他开始涉足电影制作业，成功执导过多部颇有影响的影片，如根据福加扎罗同名小说改编的《古老的小世界》(Piccolo mondo antico)、《蒙苏·德拉维特的悲惨故事》(Le miserie di Monsù Travet)、《马隆勃拉》(Malombra)和《乡下女人》(La provinciale)等。

1935 年,索尔达迪推出日记体小说《美国,我的初恋》(America，primo amore)，该书对美国人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作了鞭辟入里的剖析，不失为一幅生动逼真描摹美国社会的肖像画，受到评论界人士的一致好评。50 年代他又陆续发表了好几部叙事体作品,如《与受过勋的骑士共进晚餐》(A cena col commendatore，1950)、《卡波利岛的来信》(Lettere da Capri，1954)、《忏悔》(La confessione，1955)、《真实的西尔维斯特利》(Il vero Silvestri，1957)等,其中《卡波利岛的来信》获 1954 年意大利斯特雷加文学奖。1962 年问世的《幽灵的故事》(Storie di spettri)是一个由 20 则短篇故事汇编而成的集子,充分显示出作者一贯清新明快、简洁凝练的文笔。尔后,他先后推出《两座城市》(Le due città，1964)、《橙色的信封》(La busta arancione，1966)和《男演员》(L'attore，1970)等小说。对于索尔达迪创作的叙事体作品,不少文学评论家指出:作者擅长透过表象描摹生活在一个捉摸不定、动荡不安世界里的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感受,温馨与浪漫,神秘与荒诞,嘲讽与玄奥每每和谐地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他那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

九、马里奥·托比诺(Mario Tobino，1910—1991)

托比诺生于托斯卡纳地区维亚雷焦城，曾是该地区鲁嘉省立精神病院主任医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召前往北非的一家军事医院担任军医，这一段人生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翔实的素材。他以写诗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早期发表的诗作有:《诗集》(Poesie，1934)、《友谊》(Amicizia，1939)、《仇恨与爱情》(Veleno e

amore,1942)等。回忆他随其父亲学医经历的第一部叙事体作品《药剂师的儿子》(Il figlio del farmacista)和另一本短篇小说集《爱嫉妒的水手》(La gelosia del marinaio)同时于 1942 年问世,充分显示出他超凡的写作天赋,并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战后,他陆续推出了好几部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体小说,故事充满浓厚的抒情味:《黑旗》(Bandiera nera,1950)《利勃纳特的天使》(Angelo del Liponard,1951)、《利比亚的沙漠》(Il deserto della Libia,1951)、《马利亚诺的自由妇女》(Le libere donne di Magliano,1953)、《比亚索利的火炭》(La brace dei Biassoli,1956)等。其中,《利比亚的沙漠》被认为是一部以回忆录形式描写二次世界大战难得的力作;《马利亚诺的自由妇女》则描写作者在精神病院担任主任医师时期内心的感受,赞颂即使在精神病院那样特殊环境里人与人之间珍贵的友爱精神。

进入 60 年代之后,托比诺先后又发表了不少佳作:《偷渡者》(Il clandestino,1962)、《海滩和堤道那边的地方》(Sulla spiaggia e di là dal molo,1966)、《沿着古老的楼梯》(Per le antiche scale,1972)、《镜子中的美人》(La bella degli specchi,1976)、《在马利亚诺的最后几天》(Gli ultimi giorni di Magliano,1981)、《女贼》(La ladra,1984)和《花神般的契达》(Zita dei fiori,1986)等。其中,《海滩和堤道那边的地方》从美国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含有极其细腻的、高度审美的感受能力的作品中汲取创作灵感,获维亚雷焦文学奖;《沿着古老的楼梯》先后获斯特雷加和康比埃洛文学奖;《偷渡者》获斯特雷加文学奖;《镜子中的美人》获维亚雷焦文学奖。

十、纳达丽亚·金兹伯格(Natalia Ginzburg,1916—1991)

金兹伯格原名纳达丽亚·莱维,是意大利当代的一位优秀小说家、随笔作家、翻译家及剧作家,其作品素以冷静描写家庭关系

著称。1916 年她出生在西西里首府巴勒莫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父亲是一位犹太籍著名解剖学教授。她自幼接受无神论教育，这使她的行为举止同与其他年龄相仿的孩子显得很不一样。1919 年她父亲去都灵大学执教,她也随其一同前往,并在这座文化氛围浓厚的北方城市中渐渐长大。由于政治原因，她的家后来成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经常聚会的场所。1935 年她入都灵大学求学，1938 年嫁于当时任一家杂志社主编的里昂纳 · 金兹伯格为妻,共生有 3 个子女。里昂纳是一位出色的斯拉夫语言文化研究者，政治上则反对墨索里尼，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活动。为躲避警方的迫害,他不得已去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隐居 后被捕,并于 1944 年在狱中被折磨致死。1944 年起，金兹伯格担任埃伊纳乌迪出版社编辑部顾问一职;1950 年与罗马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加勃利埃雷 · 巴尔迪尼结为伉俪,1969 年她再次丧夫。1983 年，她被选为意大利议会左翼参议员;1991 年死于癌症。

1933 年,金兹伯格在佛罗伦萨的文学杂志《索拉利亚》上发表短篇小说《孩子们》（I bambini），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生涯。第一部中篇小说《通向城市的路》（La strada che va in città,1942）叙述的是一位乡村少女为城市的繁荣所诱惑，误入歧途并与一个自己不爱的男人结婚的故事。第二部中篇小说《事情的原委》（E'stato così,1947）,也是描述一桩不幸的婚姻,女主人公原是一位教师，述说了她出于无奈杀死丈夫的原委。在《我们的昨天》（Tutti i nostri ieri,1952）中,金兹伯格讲述了一个富裕家庭和一个贫困家庭的故事,书中穿插了有关法西斯、战争、德军入侵、抵抗运动和盟军最后胜利的内容，描写了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青年一代的危机。《傍晚的声音》（Le voci della sera,1961）则是一部以二次大战期间比埃蒙特地区为写作背景的叙事体作品。《家庭琐语》（Lessico famigliare,1963）采用幽默的笔调，以小说的形式回顾了她的童年和成长的经历。她在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发表的

小说悲观地探讨了现代社会中家庭关系的解体。金兹伯格著述甚丰,除了小说以外,还写有几部剧本和几本评论集。

金兹伯格擅长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发生在每日间的家庭琐事,字里行间折射出充满温馨的嘲弄。70 年代之后,她发表了两部书信体长篇小说《亲爱的米盖莱》(Caro Michele,1973) 和《城市和家》(La città e la casa,1984) ,着力刻画母子之间无法得以沟通的冷漠关系,表现作者对人情淡薄的现实社会的无奈和悲叹,读来发人深思。金兹伯格通过她塑造的人物向读者揭示:家庭原本是人们精神世界中的一片圣土,及生活中安全、温馨的港湾,而如今人们心中这一偶像已经支离破碎。《亲爱的米盖莱》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冷漠的世界,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彼此之间视同陌路,不知道如何与他人进行情感的交流,久而久之便失去了与别人沟通的欲望。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的故事始于一个大雪纷飞、凄雾迷漫的寒冬,而在小说的末尾当春回大地之际,小说中的人物却感受不到春的暖意,那是因为漫长的冬季已经冻僵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个个显得神情呆滞、木讷寡言。显然,金兹伯格是借景烘托小说中人物麻木的感情世界,隐喻世态炎凉的现实社会。金兹伯格曾十分感慨地说:“如今的世界犹如旷寂的沙漠,人们觉得一切都是靠不住的,以至有人对石头产生了感情。”这番话言简意赅,较为形象地为我们勾画出一位女性作家独特视角中的现实世界。

除叙事体作品以外,金兹伯格还翻译过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和法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作品。她的主要剧作有:《我因一时高兴而嫁给你》(Ti ho sposato per allegria,1967)、《海上城市》(Paese del mare,1972)、 《采访记》(L'intervista,1989)等。

第十五章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意大利文学

在 60 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过后，意大利于 1966—1969 年又出现了一次新的经济繁荣，但这一次的增长速度明显不如前一次。加之 1968 年以来，在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无政府主义抗议浪潮，意大利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主要由年轻人参加的抗议活动。1968—1969 年，学生和工会运动的浪潮席卷整个亚平宁半岛，且呈上升趋势，并造成了一些不幸的集体暴力事件。诚然，这些活动之所以能在意大利迅速展开，是以经济方面的很大让步为前提的。这种让步的副作用很快便在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而此时的国民经济原本就因为高消费及其带来的国际贸易逆差而受到削弱。因此，当促使世界经济陷入混乱的 1973 年能源危机发生时，意大利的处境尤为困难。意大利不得不承受每年高达 20% 的通货膨胀的严重后果；同时由于企业大幅度裁员和弱小企业纷纷倒闭,失业人数超过了 200 万。政治和信仰的危机致使原本已困难重重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恐怖主义活动一时十分猖獗，1978 年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主席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恐怖分子谋杀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例。直至 80 年代的前 5 年,历届联合政府渡过了政治危机，并采取了严厉的经济手段控制消费，国民经济才有所改善。

由于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在 70 年代之后的意大利现实社会，各种扑朔迷离的现代思潮和挫人锐气的消费主义犹如两颗重磅炸弹，摧毁了广大文学工作者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大大改变了他们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出现了一种日益严重的文学衰退现象：一部分作家因无法同现实对话而感到无所

适从,往往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倾力刻画个人的内心感受,或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反映社会现实，以致不少作品的内容显得怪诞、晦涩；一部分作家在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面前彷徨若失、一筹莫展,他们厌恶现今和未来,把目光投向古代文明,致力于重新发掘古代文化中值得今天的人们借鉴的亮点；另有一部分作家则缺乏信心,无意描写变幻莫测的社会现实,热衷于写一些科幻、侦探或推理小说。简而言之,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特点是‘ 多元化 ”,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指导作家们的创作思想，作家们各行其是,采用自认为最合心意的表达方法抒发感情,艰难地走着各自的探索之路。再则,一些出版商为了追求单纯的商业利润,热衷于翻译出版在美国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和所谓的‘ 消遣文学 ’作品,以迎合一部分读者的情趣爱好，致使美国的通俗文学作品充斥整个意大利小说市场。

到了 80 年代，不少蜚声国际文学界的当代意大利作家（如蒙塔莱、卡尔维诺、莫拉维亚、夏侠等)相继谢世,意大利文坛上一时显得黯然失色，昔日文学创作园地里的繁荣景象似乎也与他们同去。然而，意大利毕竟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和文化传统悠久的国家,在沉寂、忧郁的表象后面,不少作家还是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潜心致力于塑造新的文学。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一部分作家对各种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及人自我存在的价值，开始有了更为深切的体察和认识，他们通过不断的实践寻求意象新颖的写作风格，试着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自我以及现实社会。在这种努力求索新的创作路子的氛围中，涌现出一批卓尔不群的优秀作家,他们独辟蹊径,不事张扬,默默耕耘在文学创作园地里,写出了许多颇有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意大利文学以多元化的新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并获得了大众的普遍认知。

第一节　女性文学

近 30 余年来，意大利现代社会的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日益膨胀的物欲致使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意识形态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少原本在家庭和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地位的妇女,开始对社会现状表示不满,产生了一种反世俗、反传统的逆反心理，她们要求彻底摆脱感情生活羁绊的呼声日益高涨。一部分女作家开始厌倦传统文学作品中将爱情和亲情神圣化的陈旧观念,对妇女的个性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她们的文学作品的创作题材和指导思想也有了重要的突破，越来越引起公众的密切关注。她们的不少作品着重反映妇女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意象新颖,表现手法不落窠臼,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到了 70 年代后期，一部分女作家的创作思想产生了质变，她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赢得同男子一样的公民权利，其中一些思想比较前卫的人甚至丢弃了通过就业获得自身解放的幻想,明确提出了彻底改变现实社会的要求,将矛头直接指向不公正的政治体制和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经济模式，努力在作品中反映现代社会中妇女的政治要求，抒发她们的内心感受。诚然,始于 70 年代并迅速席卷整个欧洲的女权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性文学的发展趋向。

一、艾尔莎 · 莫兰黛(Elsa Morante,1918—1985)

莫兰黛是一位颇为引人注目的罗马女诗人、小说家。她生于罗马，父亲是一位犹太籍少年教养院的管理员；她早年学习不甚正规,18 岁那年即离家独立生活，靠授课和为报刊杂志撰稿维持生计。1941 年她与罗马著名作家莫拉维亚结为伉俪，这使她有幸结识不少当时颇有知名度的小说家和诗人。 1962 年她与莫拉维亚

开始分居，后结识的男友又跳楼身亡，她为此在心理上遭受了很大的打击。她于 1968 年发表的诗集《被孩子拯救的世界》（Il mondo salvato dai ragazzini）反映了她对老年生活的恐惧以及对人类安全的忧虑。80 年代初，在接受了一次外科手术后她长期卧床不起，一种飘浮、寂寞、孤独的感觉涨潮似的不时向她袭来。1983 年 4 月她曾开煤气企图自杀，被女佣发觉未果；后再次手术，1985 年 11 月 25 日因心肌梗塞死于罗马寓所中。

莫兰黛自幼对生活充满浪漫的激情和天真的幻想，故她笔下的人物似乎生活在另一个超脱尘世的奇特世界里，个个都富有神奇的想像力，与现实生活中的人相去甚远。莫兰黛以其作品的史诗和神秘性闻名，大多集中写年轻一代与成人世界之间的冲突。1941 年,她发表了一本短篇小说集《秘密的游戏》（Il gioco segreto）和一本童话集《美丽的小辫子姑娘卡黛丽的历险故事》（Le bellissime avventure di Caterì dalla trecciolina）.

二次大战的最后几年，为躲避战乱她隐居在拉齐奥地区的卡西诺农村，这一段乡间生活经历后为她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她的第一部小说《谎言与魔术》（Menzogna e sortilegio，1948）在创作风格上受到新西兰出生的英国女作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的影响，通过一个年轻女人的记忆与想象写意大利南方一个家族错综复杂的历史,富有独特的诗体散文特色。小说出版后好评如潮,并获得意大利维亚雷焦文学奖。第二部小说《阿尔图罗岛》（L'isola di Arturo，1957）是幻想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及潜意识论的产物，描写一个男孩从童年时的美好憧憬直至成年后梦想幻灭的成长过程，抒情而细腻，细节写得十分真实但又蒙上一层虚幻的面纱：他痛苦地发现父亲的同性恋癖好及自己对继母天理难容的性爱,为逃避现实,他与好友一起去服兵役。

1974 年她的长篇小说《历史》（La storia）问世,顿时好评如潮，被公认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力作，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她也因此声誉鹊起。这一部被评论界誉为“20 世纪小说”的叙事体作品长达 750 页，讲述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的 1941 年至 1947 年的故事，揭示残酷的战争给善良的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无情地抨击了法西斯政权的专制独裁。小说中的主人公依达是罗马城里一位出身贫苦的小学女教师，遭德国兵强暴后怀孕生下一个患有先天性癫痫的男婴，取名朱塞佩；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依达在战后漫长的岁月里受尽磨难，但朱塞佩最终还是因精神受刺激而癫痫病发作，凄凉地倒毙街头；依达因此神经失常，最后默默地离开了人世。莫兰黛通过依达饱经沧桑的坎坷人生，深刻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生活的无情，并以女作家特有的敏感，从侧面歌颂了母爱的神圣和伟大，展现了朱塞佩充满童年幻想的精神世界。1982 年出版的《阿拉格埃莉》（Aracoeli）是莫兰黛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采用倒叙法讲述了一个粗野、低俗的西班牙女人可悲的一生，她生前对儿子的溺爱到头来导致了他的堕落。作者对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寄予深切的同情，并借此揭示了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变幻莫测。该书出版后，评论界对之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莫兰黛在书中一反她原先长于描写年轻人和无辜者心理活动的写作风格，暴露出她愤世嫉俗的态度。

在长篇小说《历史》的末尾，依达望着已咽了气的儿子朱塞佩欲哭无泪，深重难言的悲痛使她神色恍惚，目光呆滞。莫兰黛如诉如泣地写道：

> 翌日,罗马的多家报纸报道了一则消息 泰斯达乔街区发生了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一位神经失常的母亲寸步不离地守护着她儿子的尸体。在文章的末尾记者写道：连畜生也显得万分沮丧。众所周知，这里提及的畜生是指她家的那头名叫贝拉的牧羊犬。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贝拉突然变得凶猛异常，对那些根据司法程序破门而

入依达在波道尼路上的房子执行公务的陌生人，它始终睁大着一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说什么也不让他们将朱塞佩和依达从屋子里抬出去。大家都说，失去了生育能力的畜生一般都不再具有攻击力。但是贝拉，至少是它在此刻的表现，显然同这一生理现象相悖。它依靠自己的力量足以让一小队敌人胆战心惊，即使他们中还有几个是武装警察，但是竟没有一个人敢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就这样，贝拉始终没有违背它在朱塞佩回家那天对他立下的誓言：“从今往后，在这世上，没有人能将我们俩分开。”

二、奥丽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30—)

法拉奇是一个蜚声国际文坛的意大利女记者和女作家，1930年生于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她才思敏捷，文笔遒劲，由她撰写的一系列世界名人采访记不落窠臼，别具一格。此外，她还写有不少题材各异的叙事体文学作品，其中较著名的有：《写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Lettera a un bambino mai nato，1975)和《一个男子汉》(Un uomo，1979)。

在《写给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信》中，法拉奇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为第一人称，描述了一位身怀六甲的妇女临产前的矛盾心理，在是否该让自己肚子中的孩子降临人世的问题上，她难以作出抉择。在女主人公同未出世的孩子无声的对话中，她向他讲述了尘世生活的痛苦和烦恼，揭明他将来到的人间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那里自由只是一个美丽的梦，正义不过是一场骗局，而爱情则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在同孩子对话的过程中，她扪心自问：为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奉献自己的一生值得吗？随着对话的进一步深入，小说中还出现了小孩的父亲、主张女权主义的女友、雇主、愚钝的医生、思想新潮的女大夫以及她自己年迈的双亲，但是他们

中无人能对她提出的疑问作出解释。当孩子的父亲要她去堕胎时，她愤怒地拒绝了，并为自己曾深爱过这个男人而感到耻辱。对作者而言，“男女之间的爱情犹如季节一样，在绿树成荫的花季里，它给人带来的是欢愉，而在树叶干枯凋落的季节里，它只不过是一堆腐烂的败叶而已。”耐人寻味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扉页上万分感慨地写道：“谨将此书献给世上所有的女人，面对该不该让小孩降世的抉择,她们无所适从 有的义无返顾 有的则扪心自问,为孩子操劳一生,然后在历经磨难后走向死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法拉奇在这一部对话体小说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心理描述，形象地表现出现代女性否认和拒绝现实社会要她们扮演某种角色的逆反情绪：

> 如果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同样会感到高兴,也许我会感到更满意，因为你将不会遭受那么多的凌辱，别人也不会轻易把你当做奴仆或欺凌的对象。你倘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必担心在街道的暗处遭人强暴，也无须有一张漂亮的脸蛋让人一见你就答应聘用你，更不需要用你窈窕的身材来掩盖自己低下的智商；要是你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睡觉，没有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假如你是一个男人，没有人会对你说：你那罪恶的一生就是从你偷摘一只苹果那天开始的。你若是一个男人，你就不会活得这么累，你甚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如果世上果真有上帝，她兴许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妪或年轻美貌的女子。假如你是一个男人，当你表示不从的时候不必担心旁人会取笑你；即使你爱上一个人，半夜醒来也不会产生坠入万丈深渊的恐怖感觉，你可以名正言顺地捍卫自己的权益而不受污辱。当然你也明白，做一个男人也并非一件易事，因为你将遭受其他方面的奴役和不公正的待遇。就因为

你有发达的肌肉，他们会让你肩挑沉重的担子，或蛮横无理地强迫你承担重任。就因为你长着胡须，如果你想哭或者需要别人的柔情，你就有可能成为被人取笑的话柄。就因为你前面长着那个玩意儿，他们会命令你开赴战场参与屠杀或者被他人杀死；他们会要求你与他们沆瀣一气，并为延续他们在洞穴里建立的独裁统治卖命。然而，正因为如此，做一回男人才是一次美妙的人生经历，你永远不会有失落感。至少，我是这么想的。倘若你生下来是一个男孩，我希望你能成为我心目中的那种人：对弱者和蔼可亲，对专横跋扈者毫不手软，对爱你的人宽宏大量，对左右你命运的人冷酷无情。要是有人对你说，基督耶稣是上帝和圣灵的儿子而不是女人生育的孩子，那人便是你的不共戴天之敌。

法拉奇在 1979 年完成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一个男子汉》中,则更直率地表明了自己对爱情和婚姻的悲观态度，认为是命运之神在冥冥之中左右着爱情的结局。《一个男子汉》是一部叙述真人真事的传记体小说,法拉奇把它献给她的爱人、希腊抵抗运动英雄亚历山达罗 · 帕纳古利斯。法拉奇把自己作为第一人称的叙述者，独具匠心地采用同长眠地下的帕纳古利斯促膝长谈的方式展开故事,情感激荡,恣意挥洒。她通过帕纳古利斯的许多斗争事迹，刻意描绘他的痛苦与欢乐,彷徨与刚毅,颓唐与坚贞,犹豫与果断,以及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死亡的无所畏惧，从而使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发人深思的是，法拉奇在这部小说中直言不讳地写道“爱情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的话,也只是一个骗局……我终于认识到，爱便意味着痛苦，而能解除痛苦的唯一方法是不爱；如果你无法不爱,那你就注定要被痛苦压垮。”毋庸置疑,作者想以自己的切肤之痛告诫世间所有的女人：切莫让自己成为爱情的奴

仆，否则你将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

三、达恰 ·玛拉依尼(Dacia Maraini，1936—)

玛拉依尼是意大利当代随笔作家、小说家、诗人、电影制作人和剧作家。她是 20 世纪 70 年代意大利女权主义的一位主要代言人，一生著有 50 余部作品，为妇女赢得合法的社会地位制造舆论，创造条件，其中有不少已被译成英语在欧洲各国出版。她出生在佛罗伦萨，父亲是一个有一半英国血统的著名生态学家，母亲是西西里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她小时候，由于其父母的反法西斯倾向，有 2 年是在集中营里度过的。数年后她回到罗马，一面工作，一面继续就学，同时与其他年轻人一起创办文学杂志《文学时代》，并为其他刊物撰稿。60 年代，除了发表小说之外，玛拉依尼还积极从事戏剧创作，与其他作家合作创建“豪猪剧院”，上演巴利赛、嘉达和莫拉维亚等人的剧作。 1973 年玛拉依尼在罗马创建“马达雷娜女子剧院”，并为这一座全部由女子经营管理的剧院写了不少颇有思想深度的剧作，其中有的后成为欧洲各国剧院的保留节目。

玛拉依尼的第一部小说《假期》(La vacanza)发表于 1962 年，描写一位 14 岁少女在海滨小镇度假期间有关男女情爱的短暂亲身体验。故事的背景是 1943 年夏天，意大利军事力量严重受挫，法西斯政权彻底垮台，而《假期》中的女孩却对意大利的前途置若罔闻，沉湎于男女性爱的欢愉之中，并在不经意中步入了成人的世界。1963 年发表的《困惑的年代》(L'età del malessere)描述一个女青年成长的心路历程：受周围生活环境的影响，她自幼对男女之间的性爱只限于一种似懂非懂的朦胧认识，等到她有了亲身的体验，开始深切地感受到两性关系给她带来的失望和沮丧，以及在男权主义统治的社会中女人的困惑和痛楚。

就写作原则而言，玛拉依尼接受‘63 学社’派的观点，为此她于 1966 年和 1967 年先后发表的诗集《野外生活的疾苦》

（Crudeltà all'aria aperta ）和小说《回忆录》（A memoria ）均富有新先锋派文学作品的特征，以失去记忆的情节表示人物对一成不变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中固定的游戏规则的反抗。

玛拉依尼始终密切关注着当代妇女的前途和命运，努力通过自己的作品为她们在男权社会中的不公正待遇大声呐喊。《一个女贼的回忆》（Memorie di una ladra，1972)和《战争中的女人》（Donna in guerra，1975 ）着力反映女性与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提出了彻底改变当代现实社会的明确目标。其中，前者如诉如泣地叙述了一个年轻女子遭受暴虐和凌辱的一生；后者则以 20 世纪 70 年代女权主义者反对大男子主义的艰苦斗争为写作素材，揭示她们在家庭和男性社会双重压迫下的境遇，反映她们要求实行人工流产以及从性奴隶的桎梏中彻底解放自己的呼声。1978 年发表的《把我吃掉吧》（Mangiami pure）描写一群女权主义者自我觉醒的过程；1981 年问世的《致玛丽娜的书简》（Lettere a Marina）讲述的是一则有关两个女人之间情爱的故事。在这些自传体作品中，玛拉依尼几乎总是采用日记或书信的形式进行内心世界的自我剖析，读来亲切感人。1985 年出版的《伊索利娜》（Isolina）在写作风格上与作者以前的小说有较大的区别，小说以 20 世纪初报上披露过的一起凶杀案为创作素材，叙述了一位维罗纳姑娘的凄惨遭遇 伊索利娜是某军官的情人，怀孕后在施行人工流产手术中不幸身亡，尸体被肢解后抛入河中 由于这起抛尸案与军方有牵连，当权者急忙销毁罪证，要挟证人，致使案情的调查半途搁浅，伊索利娜为此永远成为一个冤魂。1990 年，玛拉依尼推出以 18 世纪初西西里首府巴勒莫城为写作背景的历史小说《玛丽亚娜·乌克莉亚漫长的一生》（La lunga vita di Marianna Ucria），被认为是反映妇女生存环境的一部力作：玛丽亚娜出生在巴勒莫城里一户贵族家庭，幼年遭其一位比她年长好多的长辈强暴后双耳失聪，13 岁那年被迫嫁于他为妻 婚后玛丽亚娜生育了许多子女，但始终无

法与其乖戾、孤僻和冷漠的丈夫进行感情上的交流，每天靠看书打发毫无生气的日子；丈夫死后，40 多岁的她爱上了家中一位年轻的男佣，为此遭到社会和家族的严厉谴责；处于无奈，玛丽亚娜远走他乡，先后旅居那不勒斯和罗马，但返回西西里的念头始终萦绕脑际，使她久久不能释怀。1993 年发表的《巴盖莉亚》（Bagheria）是作者又一部自传体小说，书中回忆了她在西西里岛上度过的童年生活，描摹了西西里岛旖旎的自然风光，以及她自己成长的心路历程。进入 90 年代之后，玛拉依尼依旧笔耕不止，先后于 1994 年和 1997 年发表小说《呼声》（Voci）和《为自己留下一份甜食》（Dolce per sé），均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四、拉拉·罗马诺(Lalla Romano，1906—)

原名嘉勃利埃拉·罗马诺，1906 年生于意大利比埃蒙特地区德蒙特，在家乡读完了文科中学的全部课程，后去都灵投亲，并在那里入都灵大学文学系继续深造，其间有幸结识著名作家帕韦泽和索尔达迪。1928 年，她大学毕业，写有评述柔美新诗体代表诗人契诺·达·比斯陶亚创作风格的论文。1924—1928 年，她还攻读过绘画专业。尔后，她曾执教于古奈奥和都灵等地的中学，1932 年在古奈奥结婚，战后迁居米兰。1941 年她发表诗集《花》（Fiore），接着又于 1951 和 1974 年出版诗集《秋》（L'autunno）和《青春年华》（Giovane è il tempo）。除此之外，她还分别于 1944 年和 1984 年译有法国 19 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福楼拜的《三故事》和长篇小说《情感教育》。

罗马诺的第一部叙事体作品《变形》（Le metaformosi）于 1951 年问世，维多里尼称其为“一部由梦幻编织而成的书”；1953 年发表的《玛丽亚》（Maria）则以福楼拜的作品为创作蓝本，讲述了一个可怜女佣的故事。接着，1957 年和 1961 年她又推出小说《砖砌的屋顶》（Tetto murato）和《自言自语的人》（L'uomo che parlava

solo)。她擅长在这些自传体作品中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虚构的情节和她对往事的回忆每每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1964年发表的小说《追忆似水年华》(La penombra che abbiamo attraversato) 是一部从心理学观点、以寓言方式写出的意识流作品，记述了作者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在写作风格上同法国小说家普鲁特斯的小说如出一辙。1969 年问世的另一部作品《我们之间的话语》(Parole tra noi leggere)，剖析了作者与其儿子之间缺乏理解和沟通的不可捉摸的关系，揭示两代人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在人物内心世界的描绘方面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1973 年和 1981 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客人》(L'ospite) 和《形影不离》(Inseparabile) 均以作者小孙子为创作原型，而 1979 年出版的《虚构的青春》(Una giovinezza inventata)则叙述了作者在都灵上大学期间的生活经历。1987 年，罗马诺推出了另一部小说《大海尽头》(Nei mari estremi)，回忆了发生在她与丈夫之间的往事。除此以外，她还写有若干日记体小说：《希腊日记》(Diario di Grecia，1959)、《度假者》(La villeggiante，1975)、《北方的梦》(Un sogno del Nord，1989)。其他作品还有：《画像的释读》(Lettura di un'immagine，1975)、《巫师》(Lo stregone，1979)、《人物》(Romanzo di figure，1986)、《达迪亚娜的辫子》(La treccia di Tatiana，1986)等。

五、安娜·玛丽亚·奥尔黛珊(Anna Maria Ortese，1914—1998)

奥尔黛珊生于罗马一户经济条件颇为拮据的家庭，小时候曾住在那不勒斯，后迁居米兰、佛罗伦萨和巴勒莫等地。早年，她曾从事过不同行业的临时工作，同时为报刊撰稿。晚年，她一直生活在利古里亚地区拉巴洛城，1998 年殁于该地。

奥尔黛珊的处女作是于 1937 年发表的短篇集《天使般的痛

苦》(Angelici dolori),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特色。她在战后发表的另一部短篇集《不靠海的那不勒斯》(Il mare non bagna Napoli,1953)为她在意大利文学界赢得了较高的声誉，书中披露了贫困、堕落的城市生活，具有明显的新现实主义特征。奥尔黛珊的文学作品不仅像纪实影片一样如实反映客观现实，而且善于通过各种矛盾和突变，深刻揭示社会生活的内涵。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奥尔黛珊写有不少作品,如《寂静的米兰》(Silenzio a Milano,1958)、《穷苦人和幼稚的人》(Poveri e semplici,1964)、《墙上的月亮》(La luna sul muro,1968)、《灰色的光环》(L'alone grigio,1969)、《托莱多港市》(Il porto di Toledo,1975)、《饰有羽毛的帽子》(Il cappello piumato,1979)等,但这些作品均未引起文学界人士的特别关注。1965 年出版的小说《鬣蜥》(L'Iguana)却因其与众不同的独特风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者重新采用 18、19 世纪的创作格式，使读者与书中叙述的故事融为一体。《鬣蜥》讲述的是一位家境富裕的米兰伯爵达多的故事：达多感情脆弱、反应敏锐,为继承其母亲购置的地产,他穿越直布罗陀海峡后在一座无名小岛上登陆;岛上仅有的居民是古兹曼兄弟和一位受尽欺凌、过着非人生活的年轻女佣;出于怜悯,达多想帮助女佣跳出苦海,企图把她带走并收养她；后来，岛上来了一对来自美国的霍宾斯夫妇(隐喻资本主义制度的粗暴和残忍),他们意欲买下小岛后在那里建造一个大饭店;女佣嫁于古兹曼兄弟中年轻的伊拉利奥后,其命运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华丽的衣装使她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和对生活的信心。随着故事一步步向纵深发展，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充满悬念和超现实的情节逐渐失去其内在的联系。在小说的末尾，分别象征弱者和无辜者的女佣和达多伯爵先后弃世而去，女主人公最后沦为残酷的人性和社会偏见的牺牲品。整部小说宛如一则带有讽喻性的寓言故事，作者通过女佣悲凉的结局对现实社会进行了无情的谴责。

1979 年出版的《饰有羽毛的帽子》隐喻人们对现实生活丧失信心的悲观情绪，反映革命理想的破灭和战后令人沮丧的苏联现实社会；1993 年发表的《痛苦的卡尔迪洛》(Cardillo addolorato) 则是一部以 18 至 19 世纪欧洲世事变迁为写作背景的叙事体作品，着力描写它们对当代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除外，奥尔黛珊还著有小说《半梦半醒之间》(In sonno e in veglia，1987)、《阿龙索和幻想者》(Alonso e i visionari，1996)，及游记《俄罗斯列车》(Il treno russo，1983)和《墨镜》(La lente scura，1991)等。

六、苏珊娜 · 达玛洛(Sussana Tamaro，1957—)

达玛洛生于的里雅斯特港市，现居住在人称“意大利绿色心脏”的翁勃利亚地区一座农庄内。电影实验中心学校毕业后，她曾为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拍摄过几部纪录片。她的第一部叙事体作品《心不在焉》(La testa tra le nuvole) 发表于 1989 年，是一部以流浪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幻想小说，她在书中描摹了一个远离现实的魔幻般的童年世界。同样以童年生活为写作题材，达玛洛还撰有其他小说，如《肉心》(Cuore di ciccia，1992)、《托比亚与天使》(Tobia e l’angelo，1998)等。1991 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为了孤独的声音》(Per voce sola)，尽管中心主题依然是童年时代，但是书中的童年生活不再是纯真和梦幻的组合，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比如，其中有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小男孩如何为反抗成年人的性虐待而沦为多起凶杀案的主犯；另一个短篇则描写了一个吉普赛少女遭受强暴的耸人听闻的故事。这些短篇小说文笔犀利、直率，节奏明快、洗练，叙述中没有太多的幻想成分。这本集子中的最后一篇故事以独白形式讲述了一个中年妇女悲凉的一生：母亲发疯，父亲因其犹太血统遭受德国纳粹的残害，丈夫逃出纳粹死亡营后无法治愈心灵上的创伤，最后导致其女儿精神失常。

1994 年问世的日记体小说《跟着感觉走》(Va’dove ti porta il

cuore）一改原先的创作模式，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迟暮之年的老妇，她明白自己将不久人世，故以写信的方式向其外孙女叙述自己的一生，对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往事的追忆如冲破闸门的水流喷涌而出：她出身在一个家教甚严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心情压抑的氛围中度过了缺乏欢乐的童年生活；婚后受尽欺凌，惟独在与情人幽会时才真正尝试到男女性爱的欢愉，但不久情人却凄凉地弃世而去；她的私生女后成了 1968 年风起云涌的意大利学潮的积极参加者，母女之间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无法逾越的代沟，尤其当女儿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视母亲为陌路，最后不幸在一起车祸中丧生；老妇与外孙女的关系同样不融洽，正因为如此，她才决定写下许多日记体的书简，希望外孙女在她作古之后能通过这些信件了解她内心的隐痛。这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近似'言情小说'的叙事体作品，作者借助一位油尽灯枯的老人对往事的回忆，给年轻的读者留下一些经验教训和人生的感悟。达玛洛在小说的末尾万般感慨地写道："当你身处人生的十字路口而不知选择哪条路的时候，切莫随意作出轻率的抉择。你应该坐下来静心地等待，像当初你来到世上的那一天一样充满自信地呼吸，不要受任何事情的干扰，静心地等着。你应该纹丝不动地静心等待，静听你自己的心跳。一旦你内心产生了感觉，赶快起身跟着它走。"正是由于小说中蕴涵着的充满智慧的火花和感人至深的人生哲理，小说面世后立刻成为一本炙手可热的畅销书，被译成各种文字，在很短的时间内数百万册书随即告罄。

第二节　叙事体文学

对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意大利叙事体文学的概况下一个定义，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首先，自意大利文学史上最后一个文学运动'新先锋派'衰亡至今仅过去了 40 年左右，若想对近数十年

中的叙事体作家及其作品作出公正、客观和恰如其分的评价，恐有过于轻率之嫌。再则，到了 20 世纪末叶，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于对经济效益的考虑，出版商每年除了继续大量重新印刷和出售莫拉维亚、卡尔维诺、斯韦沃和皮蓝德娄等人的著作外，不得不推出数量甚多的风格各异的书籍，以满足不同社会层面的读者的需求，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为了顺应市场对消遣文学作品的需求，一部分小说家写出了不少迎合大众情趣爱好的庸俗作品，尽管他们积极维护文学的尊严，也有运用手中的笔揭示社会弊端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原先一些推崇实验主义创作风格的作家再次采用传统的写作模式，写出了一些颇具影响的佳作，曾是‘先锋派’文学理论家之一的翁贝尔托·埃科 1980 年发表的以中世纪为创作背景的著名幻想小说《玫瑰的名字》便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他们这种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新颖创作倾向，标志着当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但也有人将其视作一种缺乏创意、体现颓废和衰微的文学潮流。

在近 40 年中，意大利文坛上出现了一群才华横溢的“野兽派”年轻作家，他们把写作的主题聚焦当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倾力在作品中反映青年人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生活处境和生存空间，以及他们视角中的现实社会，甚至采用他们特有的俚语来丰富自己的创作语言。这些具有较强商业意识的年轻作家，一般崇尚恐怖影片，喜欢从连环画、卡通片、电视广告、电视剧和电子游戏中汲取创作灵感，写出了不少具有后现代主义特色的大众文化作品。

一、翁贝尔托·埃科（Umberto Eco，1932-- ）

应该说，与先前相比，近 30 年来的意大利社会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现实社会中，作家的写作视野开阔了，有的采用富有现实主义风采的客观直叙的白描手法，有的则以

隐晦曲折的表现方式反映现实，使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原则通过不同的走向重新得以体现。其中，有一些作家开始将目光投向灿烂的古代文化，充满激情地从中世纪文明史中寻觅创作的灵感，借此隐喻现实社会的弊端和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在这一方面，埃科无疑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创作才能，成功地写出了两部惊世之作：1980 年出版的《玫瑰的名字》（Nome di rosa），以及即将问世的另一部同样取材于中世纪史的长篇小说《保多利诺》（Baudolino）。

埃科是一位文学批评家、小说家和才华横溢的符号学家，1932 年出生在意大利西北部中世纪古城亚历山德里亚，年轻时就对中世纪文明史情有独钟，其大学毕业论文以及后来写的一些随笔均取材于中世纪史。1954 年都灵大学毕业之后，他在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台任文化编辑，1958 至 1959 年服兵役，后在佛罗伦萨、米兰、波伦亚等地执教。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埃科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同时为《晚邮报》、《快报》及其他文化艺术类期刊撰稿，这些文章涉猎的范围甚广，后被收入好几本集子中。最初，他研习美学，在这领域的主要著作为《开放的作品》（Opera aperta，1962）。该书提出 许多现代音乐、象征派诗歌和乱中有致的文学(如卡夫卡、乔伊斯的作品)，从根本上讲，其含意是暧昧的，因而吸引读者更积极地参与阐释和创作过程。以此为起点，他在用英文写成的《符号学理论》（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1976)及《符号学与语言哲学》（Semiotica e filosofia linguistica，1984)两部作品中，继续探讨和传播符号学的其他领域。他的许多批评、历史及传播学方面的著作，被译成各种文字。1979 年起，埃科任国际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之职。

经过前后 10 余年的构思和写作，中世纪式侦探小说《玫瑰的名字》于 1980 年面世，随即引起整个西方文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时好评如潮，除了赢得意大利斯特雷加和维阿雷乔文学奖外，还荣获

法国美第奇奖,被誉为 20 世纪 80 年代西欧文坛的一部力作和世界性畅销书,先后被译成各种文字,连根据这部小说拍摄的电影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小说的创作素材源自 13 世纪本笃会见习修士阿达索的部分手稿,埃科阅后心中顿时萌生创作的冲动。在《玫瑰的名字》中,埃科巧妙地以阿达索为第一人称,向读者讲述了阿达索于 1327 年 11 月下旬随其师父、方济各修会一位博学多才的修士古利埃莫,在一座山顶隐修院 7 天暗访中的所见所闻，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在小说中,埃科详细讲述了发生在隐修院中的好几起神秘的凶杀案，以及阿达索和古利埃莫两修士为探明凶案真相而展开的一系列暗访活动,从神学、哲学、学术以及历史的角度探讨了"真理",并借此影射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恐怖活动猖獗一时的意大利现实社会。正由于埃科成功地采用了借古讽今的写作手法,《玫瑰的名字》才能以其扣人心弦的故事和富有哲理的心理剖析，在读者心中产生强烈的共鸣。1983 年,埃科专门为《玫瑰的名字》撰写书评,他在文中耐人寻味地写道:"中世纪乃人类共同的童年,那是一段永远值得我们回忆的日子……其实,小说只是叙述了一则发生在一座中世纪隐修院里的离奇故事，它本身并不具有现代意识,但它却向我们揭示:在当代人和中世纪文明史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情结……"

《玫瑰的名字》是一部用虚构手法写成的小说,书中有许多拉丁语句子、文学引喻、中世纪历史和神学知识、解剖学和符号学理论，扑朔迷离的故事情节充满各种扣人心弦的悬念，但书中的主要人物均以历史上的名人为创作原型，让人读后不免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这正是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比如:书中的主人公古利埃莫·迪·巴斯克维尔修士的名字不禁使人联想起英国作家阿瑟·柯南·道尔爵士创造的传奇人物福尔摩斯大侦探，两人都擅长运用药物使人产生嗜眠症症兆；书中的另一个主人公阿达索修士形似福尔摩斯的忠实朋友华生医生；前图书馆管理员西班

牙盲人乔治·达·博尔赫斯的人物形象与擅长描绘梦幻世界、以独特的文风讽刺现实的阿根廷著名小说家、诗人博尔赫斯如出一辙，博尔赫斯修士也在小说中描摹宛如迷宫一般的图书馆。除此之外，埃科还在《玫瑰的名字》中写进了不少意大利战后政治家的名字，这同但丁在《神曲》中罗列了许多佛罗伦萨政界人物的写作手法何等相似乃尔，比如小说中的多尔契诺神甫使读者联想起意大利恐怖组织“红色旅”的头目雷纳托·古尔乔，两人都为了寻求一个安宁的世界而不惜诉诸暴力……总而言之，小说中的人物富有寓言和比喻作用，每一个人物均同另一部书或某一历史时期中的某人相似。其中，古利埃莫修士象征理性，阿达索修士象征神秘主义，乔治代表邪恶势力，修道院院长则代表自满……

1988 年问世的《傅科摆》(Il pendolo di Foucault)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书中的主人公是三位出版社的编辑，他们试图通过电脑破译圣殿骑士团（成立于十字军行动时代的一个宗教军事修会）成员当年绘制后放在傅科摆底下的一张神秘的图纸，以推翻多少世纪来一直引起激烈争论的所谓圣殿骑士团是千古罪人的说法。1994 年,埃科的第 3 部长篇小说《前日之岛》(L'isola del giorno prima)出版,书中讲述了一位 17 世纪的贵族海上遇险的奇特故事 在一次航行途中,罗贝尔托·德拉·格瓦利乘坐的船只偶遇暴风雨，被海涛冲至南太平洋的一座荒岛上，无所事事的他便开始回忆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岁月来打发时间，后在一位神甫的帮助下试图抵达附近的另一座小岛。2000 年岁末，埃科又推出一部同样取材于中世纪史的力作《保多利诺》。这是一部寓言式小说，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源自 13 世纪初亚历山德里亚城的主保圣人。1204 年 4 月在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保多利诺挽救了拜占庭著名历史学家尼契达·科尼亚特的性命，并对他讲述了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他原是比埃蒙特地区一户农家之子，后过继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并跟随他参加了多次

摧毁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战役；后来他前往巴黎求学，返回朝廷后即面临神圣罗马帝国攻打其家乡亚历山德里亚的尴尬局面，但他最终想出了一条精囊妙计，让腓特烈一世放弃了攻打该城的计划……埃科笔下的保多利诺，痴迷于乌托邦式的遐想，坚信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有时不一定就是坏主意，甚至认为“有时连上帝也觉得有必要相信犯人所说的话”。保多利诺坚信，乌托邦式的假象完全有可能变成现实，从而对本原提出了怀疑。应该说，保多利诺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埃科本人的哲学观和世界观。

二、卡尔洛 ·斯戈隆(Carlo Sgorlon，1930—)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面对充斥各种矛盾的社会和怪谬、捉摸不定的现实，有一部分作家试图通过文学作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独辟蹊径地从生态学的角度审视人的生存问题，并以超越时空的精神境界，抨击所谓的“现代文明”,鼓励人们寻觅人类文明进化的源头，重新找回生活的真谛。在这一类作家中，出生在意大利东北边陲弗留利农村的的卡尔洛 ·斯戈隆无愧为他们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的作品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富有奇异、魔幻色彩的弗留利农村生活图景，展现了人性之美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唇齿相依的关系,风格独特,意味深长。

1930 年斯戈隆出生在弗留利自治区所辖的乌迪内市郊农村一户贫苦农家，早年他曾在比萨师范学校和德国南部巴伐利亚一所学校读书，现住在乌迪内，深居简出，过着宁静的写作生活。弗留利位于意大利东北部，北与奥地利接壤，东南面是南斯拉夫，南面濒临亚德里亚海，境内大部分地区为险峻陡峭、岩石嶙峋的山峦和丘陵，大部分居民讲的是独成一格的弗留利方言。斯戈隆自幼受到这一偏远、纯朴乡村世界悠久民间文化传统的熏陶，对弗留利乡村地区的一草一木以及该地独特的风尚习俗、人情世故充满深厚的感情，后成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应该说，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贯穿斯戈隆文学作品的一根红线，在他的每一部作品里都蕴涵着他对家乡近乎神圣的眷恋和崇敬。正如作者 1999 年初在为《木头宝座》和《阿纳泰的贝壳》的中译本所写的"致中国读者"中所说："……我写的许多小说都是讲弗留利地区历史的，包括对它历史的回忆，以及对那些人们历代都能看到的典型事件的记叙：战争与和平，劳动与情感，家庭的兴旺与衰落，居民的迁移与回归……每当我看到中国城市的照片或图像，看到那里的街道上比汽车多得多的自行车，我就会想，那里的人民比西方都市里的居民幸运得多。在意大利或其他欧洲国家，城里的街道上到处挤满了汽车，城市上空的空气因汽车排放的大量尾气而受到严重的污染……"在他看来，现代文明正遭受工业文明和物欲化的严重破坏，人只有使自己融入无限广大的自然，才能找回上帝所赐予的生活的全部欢愉。

斯戈隆自幼聪明好学，中学时代就迷上了俄罗斯文学，后对荷兰籍犹太哲学家斯宾诺莎的哲学及托马斯·曼和卡夫卡的作品产生浓厚兴趣。大学毕业后，他回故乡执教，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自 1960 年写了长篇小说《葡萄园的风》至今，他共发表了 10 余部长篇小说，3 部文学评论，以及论述戏剧、艺术、美学的专著和译著多部。他的主要作品有：《葡萄园的风》（Il vento nel vigneto，1960）、《安乐椅》（La poltrona，1968）、《蜘蛛人的黑夜》（La notte del ragno mannaro，1970）、《木头宝座》（Il trono di legno，1973）、《诸神即将归来》（Gli dèi torneranno，1975）、《铜马车》（La carrozza di rame，1979）、《街区》（La contrada，1981）、《阿纳泰的贝壳》（La conchiglia di Anataj，1983）、《德拉瓦河上的部队》（L'armata dei fiumi perduti，1985）等。另外，斯戈隆还著有研究卡夫卡和意大利当代著名女作家艾尔莎·莫兰黛的论著《小说家卡夫卡》（Kafka narratore，1961）、《艾尔莎·莫兰黛作品释读》（Invito alla lettura di Elsa Morante，1972）。他的作品迄今已 34

次获得国内外各种文学奖和荣誉称号，为此他曾被意大利文学界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1960 年,斯戈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葡萄园的风》以弗留利方言出版,随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文学界反响热烈,从而为他以后的写作奠定了丰厚的底蕴。这一部富有浓烈人文精神的小说描写了一名马车夫结束长期牢狱生活后被社会和家庭抛弃的凄凉境遇,是大自然使他重新树立起坚定的生活信念,赋予了他再次扬起生活风帆的勇气。1973 年问世的《木头宝座》是一部介于现实和童话之间的小说，斯戈隆在小说中独具匠心地向读者讲述了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朱利亚诺外出寻访其祖父“荷兰人”行踪的种种历险和奇遇，揭示农村文明正在悄悄地被工业文明所取代的残酷社会现实。在小说的末尾,朱利亚诺终于在阿尔卑斯山下一个小村子里找到了心仪已久的清静、安宁的生活，安坐在一张宝座似的椅子上,向人们讲述自己奇特的经历。《木头宝座》反映了作者对现代工业社会深刻的思考，认为它是对维系地球上所有人的神话的致命破坏。小说被誉为意大利战后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斯戈隆于 1983 年完成的另一部佳作《阿纳泰的贝壳》,则以 20 世纪初的俄罗斯为写作背景，叙述了一群弗留利人迫于生活流落至远东参加修建铁路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对大自然纯真的热爱和虔诚的景仰成了弗留利人和俄罗斯人的精神寄托和生存象征,正如作者在小说中所说:“……我们或许被某种神秘莫测的东西连在了一起。我们团结得好像一只手上的五个指头，我们的命运互相交错在一起，就像盘根错节的常青藤”。发表于 1985 年的《德拉瓦河上的部队》叙述的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鲜为人知的人间悲剧，斯戈隆在书中描写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对峙和碰撞，字里行间蕴涵着对弗留利农民和哥萨克人侵者深切的同情：1944 年夏，一支哥萨克部队带着家人、帐篷和圣像，骑着马匹和骆驼,来到意大利北方的的弗留利山区,因为德国人在

要求他们军事上予以支持的同时，答应在战后将弗留利送给他们作为其永久的居留地；结果，德国人将哥萨克人和弗留利人都推入了苦难的深渊。1999 年,斯戈隆又推出一部新作《春蚕吐丝》,描写堪称中意文化交流先驱者之一的弗留利人鄂多里克的传奇一生。斯戈隆是一位才思敏捷、不同凡响的意大利当代作家，其质朴、淡雅的文学语言具有鲜明的个性。他的作品也因其回归自然的深刻内涵，以及字里行间浸润着的人性的温馨，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赏，在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享有显赫的声誉。

三、阿尔贝托 · 阿尔巴希诺(Alberto Arbasino, 1930—)

阿尔巴希诺生于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地区沃盖拉城，早年曾是“63 学社”成员之一。1965 年前他担任过大学助教，讲授国际法；之后,他全身心地投入叙事体作品的创作,同时为《日报》、《共和国报》和《快报》撰写文学、政治和习俗方面的随笔和文章。1983 至 1987 年，他作为共和党代表当选意大利众议院议员。

他反对采用精神分析法及人物、情节浑然一体的写作手法，其作品的格调与传统的创作模式截然不同，具有明显的新先锋派实验主义倾向。他是一位富有强烈求知欲的作家，对当代文学、哲学、艺术和音乐的走向十分关注，擅长将各种素材和信息融合在自己的作品中。与其他新先锋派作家一样，他也把嘉达视为自己效仿的楷模，尽管他并不像嘉达那样偏爱冷静、犀利的心理剖析和社会分析。另则，阿尔巴希诺十分推崇并积极模仿英国女作家康斯顿一伯内特夫人采取的几乎完全使用对话的写作风格，他所描写的人物不但广泛，且活灵活现。在这一方面，他的处女作《匿名的伦巴第人》（Anonimo lombardo, 1959）已显示出其娴熟运用不同语汇的超凡才能，而这一写作特色在 1963 年发表的另一部小说《意大利兄弟》（Fratelli d’Italia） 中则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这一部被作者本人称之为“千层糕”的作品内容丰富，涉及面

甚广，堆砌的各种素材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如万花筒似的反复交叉出现在文化沙龙、艺术展览会、节日晚会、时装演示会等不同的场合。小说的背景定格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意大利经济奇迹时期，作者以此为依托，详尽地记载了一群人物就文学、艺术、戏剧、电影及音乐等话题在不经意中展开的谈话，鞭辟入里地剖析了知识分子在意大利资产阶级“福利社会”中的行为举止和恶癖。

除了《意大利兄弟》之外,阿尔巴希诺采用同样的写作手法,还著有小说《自恋者》(La narcisista，1964)、《午间休息》(La controra，1964)、《超级埃拉加巴卢斯》(Super Eliogabalo，1969)、《坚贞的君主》(Il principe costante，1972)、《洛迪城的美女》(La bella di Lodi，1972)、《热望的真实写照》(Specchio delle mie brame，1974)等。除此以外，他还写有不少随笔、评论和游记，涉及文化、习俗、政治及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严厉抨击当代意大利现实社会中迂腐落后及非理性的现象。

四、杰苏阿多·布法利诺(Gesualdo Bufalino，1920—1996)

布法利诺出生在西西里岛上的科米索城，早年执教于该城的一所师范学院并任系主任。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他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直至 1981 年才由巴勒莫一家规模虽小但久负盛名的出版社推出他于 1970 年至 1971 年间写成的小说《传播瘟疫者的谎言》(Diceria dell'untore),随即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一致好评,并获康比埃洛文学奖，他也因此成为当代意大利文坛上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之后,他又陆续发表了不少叙事体作品,其中有:《双目失明的百眼巨人》(Argo，il cieco，1984)、《夜晚的谎言》(Le menzogne della notte，1988)、《误会》(Quiproquò，1991)、《圭埃林·曼斯基诺》(Il Guerin Meschino，1993)、《托马索和盲人摄影师》(Tommaso e il fotografo cieco，1996),以及短篇小说集《遭受

袭击的人》（L'uomo invaso，1986），诗集《苦涩的蜂蜜》（L'amaro miele，1982）和若干随笔。除此以外，他还译有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983）。

布法利诺是一位博览群书、通晓欧洲各国文化的作家，在他一生的著述中，《传播瘟疫者的谎言》无疑是一部较为成功的佳作，描写的主题同许多 20 世纪的欧洲文学作品如出一辙，隐喻疾病是影响人们生存条件的一个抽象的敌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部小说中的肺病疗养院不禁使人联想起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魔山》中叙述的情节，实际上疗养院里隐匿着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希望和危险。布法利诺采用的是一种富有想象和暗喻的艺术手法，选用的形容词往往趋于矫揉造作和过分夸张，同巴罗克文化崇尚的华丽、奇崛的文体颇为相似。正因为如此，《传播瘟疫者的谎言》被称为"不合时令但芳香可口的果子"。如作者本人所说，这部小说以主人公为第一人称，叙述的是一些生命垂危的战争幸存者 1946 年在一所疗养院里的共同生活经历：小说的主人公与女病人玛尔达之间爆发出爱情的火花，但他们的爱情故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以失败告终，最后玛尔达在海滨一家旅馆里弃世而去，而她的恋人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满怀深情地向人们讲述着自己与死亡搏斗的件件往事。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以触摸得到的实体，故事的情节富有象征意义 对于正在走向死亡的人而言，从疗养院这一与世隔绝的地方逃脱意味着赢得自由的希望的最后破灭，因为死亡乃整个宇宙的末日，它象征着灾难的极点。

五、温钦佐·贡索洛（Vincenzo Consolo，1933— ）

贡索洛生于西西里墨西拿城一小镇，现生活在米兰。1963 年，他发表了处女作《四月的伤痕》（La ferita dell'aprile）；1976 年问世的第二部小说《无名水手的微笑》（Il sorriso dell'ignoto marinaio）引起了文学评论界和公众的广泛关注，被誉为近 30 年来意

大利文坛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历史小说以 1852 年至 1860 年间发生在西西里一个小村镇的农民起义为写作背景，叙述了加里波第军队到来之后在当地爆发的一连串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事件，同维尔加在其作品中描述的西西里卡塔尼亚省勃朗苔的农民暴动如出一辙。小说的主人公恩利科 · 比拉诺是一位富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的男爵，长年生活在一个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离的地方，他远离政治，潜心研习科学文化知识。男爵坚持认为，历史是一部"由世代相传的特权者撰写的书"，所以参加暴动的贫苦农民将注定逐一被押往法庭受审。为了替那些无权书写历史的穷苦人伸张正义，他毅然放弃对蜗牛的研究，并将自己所有的书籍付之一炬。他本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恢复历史原来的真实面目，但后来却发现，匡正那些所谓"贤达名士"的诡辩实非易事，穷人也无法理解当权者对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祖国"等词语的诠释。经反复思考，男爵终于明白纸上谈兵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采取果断的行动，为此他决定倾其所有的家产为穷人的子女开办学校，让孩子们长大后记载自己的历史。最后，在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检察官的帮助下，那些参加武装暴动的农民被宣判无罪。

1987 年发表的另一部小说《带框的神龛》(Retablo) 表现的主题同《无名水手的微笑》十分相似，主人公也是一位贵族知识分子，一次西西里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顿时萌生逃离现实的想法，而"神龛"则象征梦幻，它掩盖着无法抵御的、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在《夜间的每户人家》(Nottetempo，casa per casa，1992) 中，作者则将描述的主题聚焦在法西斯主义 20 世纪初形成的根源上，进而对意大利的近代史作了一番认真的探索：年轻的小学教师彼埃罗 · 马拉诺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运动和无政府主义，遭受法西斯别动队的残酷迫害后，他在鼓吹法西斯主义的男爵府邸内投掷了一枚炸弹，后被迫流亡在外，严酷的现实使他放弃了自己原先的无政府主义立场。

贡索洛于 1998 年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巴勒莫的剧痛》（Lo spasimo di Palermo），取材于近年来严重困扰意大利南方的恐怖主义和黑手党传统犯罪集团：小说主人公是一位饱受黑手党欺凌的作家，他儿子因支持恐怖主义活动被迫逃往巴黎，无奈之下作家本人也离开巴勒莫迁居他地。在这部小说中，儿子的形象颇具代表性，他和他的同龄人对父辈们重建战后文明和公正社会的想法不屑一顾；作家则把传统文学视作社会灾难的同谋，欲在文学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以彻底铲除传统文学的羁绊，但他的一切努力到头来均以失败告终。在小说的末尾，一位法官被黑手党杀害，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不禁使人联想起轰动一时的巴勒莫检察官保罗·鲍尔赛利尼惨遭杀害的命案，隐喻在野蛮和暴力面前，理性的孱弱及其失败的必然结果。

除外,贡索洛还著有 对话体童话《月长石》（Lunaria，1985）、描写西西里今昔对比的短篇集《班达利加的石头》（Le pietre di Pentàlica，1989）、诗体随笔《橄榄树和野橄榄树》（L'olivo e olivastro，1994 ）等。

六、萨巴斯迪亚诺·瓦萨利(Sebastiano Vassali，1941—)

瓦萨利生于意大利北方的热那亚港市，大学毕业后曾担任过多年教学工作,后全身心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自 1982 年起一直住在意大利北方比埃蒙特地区纳瓦拉省一个小镇上。他的著述甚丰，且作品的写作风格在不同的时期各具特色。起初，他追随‘ 63 学社 ’的创作模式,发表过带有实验主义倾向的诗作《迪斯法索》（Disfaso，1968） ,以及与传统创作模式相悖的反对小说《水仙花》（Narcisso，1968 ）和《大屠杀》（Tempo di massacro，1970） ,拒绝牵强附会地采纳常用的文学、政治词汇，表现出对文字游戏的偏爱。不久,他脱离‘ 63 学社 ’,开始探索一条新颖的创作路子。1980 年出版的《住在风中的人》（Abitare il vento）标志着瓦萨利创作生涯

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开始将关注的目光转向 20 世纪政治动荡不安的 70 年代：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恐怖分子，因无法改变历史的进程而深感沮丧，最后自戕身亡。在这一部独白体的叙事体作品中，作者巧妙地将经典作品中的引文、方言中的习惯用语糅合在一起，借此衬托当代世界荒诞不经、疯癫狂热的特征。 1982 年问世的《蓝色的海洋》(Mareblù) 表现的也是同样的主题思想，描述一位 70 年代的' 革命者 '反对' 资产阶级恶魔 '的斗争。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瓦萨利创作了一系列历史小说:《彗星的夜晚》(La notte della cometa,1984)取材于 20 世纪初叶佛罗伦萨疯癫诗人迪诺·康巴纳的生平事迹，但并不完全依据事实进行创作，叙述的情节带有明显主观和象征的色彩；《带电的壁龛》(L'alcova elettrica,1986 ）追忆一部分佛罗伦萨未来主义者 1913 年接受审判的历史事件，再现了当年佛罗伦萨文学界的真实面貌；《世间的黄金》(L'oro del mondo,1987 ）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社会现实为写作背景，通过一个年轻淘金者的故事记述了意大利士兵在希腊切法洛尼亚岛上惨遭德寇杀害的事实，暗喻意大利民族懦弱的劣根性。

在瓦萨利的著述中,《幻想》(La chimera,1990) 和《马可与马迪奥》(Marco e Mattio,1992) 被誉为他两部最具代表性的力作，曾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这两部小说分别取材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言“:在今天,已没有什么值得讲述的事情。当今世界有的只是各种噪音的汇合:上百个,甚至上亿个声音,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大声呼喊,每个声音都试图盖过其他的声音,而其中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字便是 ' 我 ' ……”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被社会遗弃的人，两个社会偏见和世态炎凉的社会风气的牺牲品：一个是被人过继的弃儿,后像女巫一样被活活烧死;另一个则是可怜的农民，自认是基督耶稣的化身，后因患蜀黍红斑而变成痴呆。值得指出的是,瓦萨利的这两部小说格调舒缓、明畅,故事情节富

有浪漫主义色彩，与曼佐尼的叙事体作品十分相似，且具有一定“后现代主义”小说的特征。

上世纪 90 年代之后,瓦萨利还撰有:《天鹅》(Il cigno,1993)、《3010》(3010,1994)、《冷酷的心》(Cuore di pietra,1996)、《狼的夜晚》(La notte del lupo,1998)等,但均缺乏创意,故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特殊的关注。

七、安东尼奥·达布基(Antonio Tabucchi,1943—)

达布基生于比萨，年轻时曾在热那亚大学讲授葡萄牙文学，现执教于西埃纳大学。1971 年发表葡萄牙超现实主义诗选《禁忌的话语》(La parola interdetta)，显示出他善于在作品中描写梦幻和无意识内省的写作特点。除外，他还通过翻译和评论，将葡萄牙 20 世纪著名现实主义诗人佩索阿介绍给意大利广大读者，尤其是诗人在诗句中描摹的梦幻世界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达布基于 1975 年推出他的第一部叙事体作品《意大利广场》(Piazza d'Italia)，在这一部采用 19 世纪现实主义风格写成的家世小说中，他描摹了托斯卡纳地区一座小村庄从意大利统一至今日的浩繁生活画卷，内容几乎包罗了这一历史时期中的所有重大事件。作者采用了民间说书者寓言般的艺术手法，通过大量支离破碎的素材叙述故事,无怪有评论家将达布基的这部小说称为“超现实主义”作品，字里行间时时隐现出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领袖、哥伦比亚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子。

1978 年，达布基发表他的另一部以 20 世纪初历史为背景的叙事体作品《小船队》(Il piccolo naviglio)，叙述了小说主人公寻觅自我的悲剧。尔后,从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达布基转而从事短篇小说的创作，推出了一系列作品，着意描写令人思绪纷乱的梦幻、对心理活动阴暗面的好奇、毛骨悚然的死神形象、操纵生命的神秘力量、如字谜般充满奥秘和悬念的人生、存在于真实和虚假之

间的不确定性、人的两面性和虚伪面目、人性的沉沦，以及世事的不可知论等。正由于如此，有的文学评论家将达布基归入“后现代主义派”作家之列。

分别于 1994 年和 1997 年出版的《贝雷伊拉的辩护词》（Sostiene Pereira）和《达马谢诺·蒙德意洛丢失的脑袋》（La testa perduta di Damasceno Monteiro）是达布基的最后两本小说，表现的虽则也是对死亡意义和“自我”多面性的探索，但字里行间浸润着作者对政治和社会的关切，同他的第一部小说《意大利广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贝雷伊拉的辩护词》描写的是一位年老体衰的葡萄牙《里斯本报》文化专栏记者贝雷伊拉在 1938 年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一段人生经历 贝雷伊拉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爱妻谢世后过着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但对萨拉查执政的葡萄牙专制政权极为不满；为帮助意大利籍进步青年罗西逃脱警方的追捕，贝雷伊拉将他藏匿在自己的家中 警察为逼供将罗西活活打死，贝雷伊拉巧妙地躲过警方的审查，成功地在《里斯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对警方的法西斯暴行予以严厉的谴责 最后贝雷伊拉决定离开葡萄牙，移居他乡。《达马谢诺·蒙德意洛丢失的脑袋》的写作背景也是萨拉查执政时期的葡萄牙社会，故事情节围绕着一起真实的凶杀案展开：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 20 多岁的记者，他意外发现了杀害达马谢诺·蒙德意洛的凶手 凶手是一名警察，在萨拉查执政期间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因害怕达马谢诺·蒙德意洛揭发他的贩毒罪行，残酷地在树林里将他的首级砍掉，以免尸体被辨认出来 在庭审过程中，一位原先对现实社会已不抱任何幻想的律师为伸张正义，勇敢地站出来为受害者辩护。达布基的这两部小说，尤其是第一部，依然保留着他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被公认为作者最为成功的佳作，

八、比埃尔・维多里奥・汤代利（Pier Vittorio Tondelli，1955—1991）

汤代利生于勒佐・艾米利亚省科齐城，毕业于波伦亚大学文学系艺术、音乐、表演专业。他于 1980 年发表的处女作《其他浪子》（Altri libertini）是一部由 6 个短篇组成的叙事体作品，书中描写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一群年轻人的生活,涉猎的范围甚广,包括学生运动、吸毒、性爱、同性恋、异国旅游、摇滚乐、迪斯科舞厅、私人电台，以及乡间空虚无聊的生活等内容，反映青年人积极要求自治，以及逃离现实和寻觅乌托邦式自由乐土的渴望。在这部短篇小说集中，汤代利刻意描摹了一群 70 年代至 80 年代不同类型的青年人和他们编织的五彩缤纷的神话，其中既有 70 年代他们抵制现实社会的反叛精神，也有他们在 80 年代消费社会中追求功名和地位的欲望，充满激情的生活常被沮丧、消沉、孤寂和空虚的心绪所困扰。就创作风格而言，汤代利反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句法结构，喜欢在作品中揉入许多当代年轻人常用的俚语，致使字里行间跳跃着风靡一时的摇滚乐的节奏，并不时隐现出 50 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垮掉的一代”文学运动领袖人物、美国诗人和小说家凯鲁亚克 1957 年发表的小说《在路上》的影子。另外,《其他浪子》还受到阿尔巴希诺的小说《意大利兄弟》的一定影响。

1982 年,汤代利推出他的第二部小说《常规武装纠察队》（Pao Pao）。在这一部堆砌各种类型人物和不同情节而写成的作品中，作者花费了不少笔墨描绘军营里年轻战士的生活，集中反映耽于声色、活泼好动的青年战士与军营里铁一般严明纪律之间的冲突。1986 年问世的《利米尼》（Rimini）标志着汤代利叙事体作品的一个重要转折,书中的 6 则故事盘根错节,相互缠绕,描写了罗马涅地区利米尼这座被称为“幻想中神话世界”的海滨城市杂乱无序的生活。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书中援引了不少文学和电影作品中传奇人物的话语。

汤代利的最后一部小说《隔开的房间》(Camere separate) 于1989年问世，叙述的是一则两个同性恋人之间凄婉、缠绵的故事：莱奥和托马斯是一对同性恋人，托马斯在两年前不幸死去，这在莱奥的心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伤痕，促使他对自己的内心世界和自我生存的价值作了一次痛切的内省。尽管作者原想把《隔开的房间》写成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但是故事的情节仍然没有能摆脱前人的窠臼,书中对机场、时尚、瑞士名表、健身绒衣、随身听等高消费倾向的描写，最后使之成为一部迎合大众情趣爱好的消遣类作

九、安德烈亚·德·卡尔洛(Andrea De Carlo,1952—)

德·卡尔洛出生在米兰，早年从事摄影，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尤其是他的第一、第二部叙事体作品的创作风格产生明显的影响。德·卡尔洛的作品大多反映当代青年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处境，与其他两位当代青年问题作家汤代利和布齐肆意宣泄心中愤懑的风格形成较大的反差。德·卡尔洛总是以客观、冷峻的目光审视现实社会,善于从外部翔实地记载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表面现象。尽管他的早期作品均以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但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并没有让人产生空泛之感，因为作者从不对叙述者行为举止的心理因素作明确的诠释。他擅长以冷峻的笔触，采用迂回的方式间接反映人物的内心感受，在某种程度上与卡尔维诺的早期作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德·卡尔洛的处女作《抛锚的火车》(Treno di panna,1981),叙述了一个意大利青年毫无目的地去美国洛杉矶谋生的故事，作者通过该青年在美国短暂的生活经历,以及诸如意大利餐馆、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好莱坞女明星的豪宅等景况的描写,揭示美国现实社会的荒唐、虚无、浮躁和愚昧,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充满令人忧伤的苦涩。

1982 年，德 · 卡尔洛发表了他的第二部小说《大小鸟笼中的鸟》(Uccelli da gabbia e da voliera)，叙述了一个出身资产阶级富裕家庭但移民美国的意大利青年菲奥道尔的人生轨迹：这位被人称为'孽子'的年轻人，奉父命回他父亲在米兰的一家分公司担任主管，后因无法适应快节奏的生活而陷入痛苦的深渊，惟独对马拉伊蒂娜炽烈的爱驱散了积压在他心中的郁闷，但她却对他若即若离，他为此心神不定，惶惶不可终日。1984 年问世的《马可诺》(Macno) 讲述的是一个假想国家的独裁者如何依靠自己手中控制的信息工具发号施令，隐喻现代高度工业化社会中传媒至关重要的作用。1986 年，德 · 卡尔洛推出了另一部叙事体作品《尤卡丹》(Yucatan)，讲述了一位著名电影导演和他的助手如何在印第安萨满教巫术学者、作家卡洛斯 · 卡斯塔奈达的指点下，在神秘、奇妙的墨西哥的历险故事。1989 年发表的《二对二》(Due di due) 是作者采用传统创作风格写成的一部作品，反映 6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意大利青年人的精神面貌：故事的叙述者和圭多在同一所米兰高中求读，是一对情趣相投的挚友，出于对随波逐流、一成不变的现实社会的厌恶和憎恨，两人一起参加了 1968 年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但不久因对一些运动领导者武断、专制的态度和醉心于政治小集团利益的做法不满而退出学潮，试图以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和吸食毒品来麻醉自己的灵魂，最后，故事叙述者隐居翁勃利亚一座农庄，一心从事农活和绿色食品的包装，圭多则发表了一部引起轰动效应的小说，借此发泄积压在心中的愤懑，最终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90 年代初，德 · 卡尔洛又写了好几部小说，在创作风格方面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中，1991 年的《诱惑的技巧》(Tecniche di seduzione) 抨击了当代的现实社会，谴责文化沦为社会工业化工具的反常现象；1993 年的《爱之箭》(Arcodamore) 讲述的是一则构思巧妙的爱情故事；1995 年的《乌托》(Uto) 则描写一位 19 岁

的米兰天才钢琴演奏者因无法融入现实社会而最后成为美国一个宗教团体领袖的奇特经历。

1997 年,德 · 卡尔洛推出了他的最后一本小说《咱们三人》(Di noi tre),通过两个青年爱上同一位朝三暮四、捉摸不定的姑娘的故事,揭示自 1978 年以来西方社会中青年一代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以及遭受挫败后的沮丧。书中,利维奥是一位年轻的画家,虽反对艺术创作的商品化,但最终还是没能摆脱资产阶级的俗套,婚后逐渐放弃了原先的理想 马可是一个思想前卫的电影导演,但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违心地拍摄一些艺术品味不高的录像片。同《二对二》中的两个主人公一样,利维奥和马可一开始不甘沉沦,试图以妥协和退让作为现实心中梦想的代价,但到头来均以失败而告终。

十、阿尔多 · 布齐(Aldo Busi,1948—　)

布齐出生在意大利北方伦巴第地区蒙迪基亚利城,14 岁辍学后离家出走,曾在餐馆和旅店做过服务生。1969 至 1974 年,他几乎游遍欧洲各国,先后在巴黎、伦敦、慕尼黑、巴塞罗那、柏林等地一边打工,一边学习语言,直至 1981 年才大学毕业。尔后,他从事德语和英语的笔译工作,同时为一家出版社负责编撰外国经典著作文集。与其他一些逃避现实而悉心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不同,布齐能完全将自己融入当代社会,喜爱炫示自己超群的才干,且毫不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

布齐的作品充分体现出他那不同凡响的文学天赋、敏锐的洞察力和娴熟表达语言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的不少叙事体作品以‘ 自我 ’为中心,充满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善于以幽默、荒诞、冷嘲的现实主义笔法,揭示男女性爱的深刻内涵。一方面,布齐从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中采撷创作素材,甚至借鉴刊登于报上通俗文艺栏小品文的写作特色 另一方面,他又尽力突破素材的限制,通

过与他人以及与自己对话的形式表现自我，给人用假嗓子唱歌的感觉。

1984 年，布齐推出了他的另一部自传体作品《有关青春的讨论会》(Seminario sulla gioventù) ，描述了一位游历欧洲诸国的青年流浪者的冒险经历。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出生意大利北方勃雷侠城的青年形象：度过了充满艰辛和痛苦的童年之后,他去了欧洲不少国家,浪迹天涯的生活经历使他对贫困和饥饿有了刻骨铭心的体察 ;为谋生,他曾干过酒吧招待、洗碗工、搬运工、舞蹈演员和模特儿等各种不同的营生,有时甚至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肉体；为了同企图迫使他在现实社会中扮演某个特定角色的邪恶势力抗争,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和重新找回自我,他无奈一次又一次地逃离模式化的生活环境。小说中的主人公以 20 世纪 60、70 年代如火如荼的欧洲学生运动为背景，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清晰地勾勒出当代青年躁动不安、拒绝束缚的逼真形象，如一面' 流动的镜子 '折射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性,揭穿其精心编织的为大众营造所谓' 团结、安全氛围 '的骗局。

继《关于青春的讨论会》之后,布齐在 90 年代又陆续推出 10 余部作品,可谓是一位多产作家。

十一、达尼埃莱 ·德尔 ·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 1949—)

德尔 ·朱迪契生于罗马，现居住在威尼斯。 1983 年,他发表其处女作《温布尔登体育场》(Lo stadio di Wenbledon) ,卡尔维诺还专门为之写有书评。小说讲述了一位年轻作家努力寻找谜底的始末，他欲知道为何对其他作家曾产生影响的意大利 20 世纪上半叶著名文人罗贝尔托 · 巴兹兰(Roberto Bazlen, 1902—1965)自己几乎从未写过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小说的主人公从意大利港市的里雅斯特至伦敦，四处寻访尚活在世上的巴兹兰的亲友，试图从他

们那里找到答案。虽然调查最终未果，但这位年轻作家却悟出了一个道理：巴兹兰创作记录空白的奥秘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自己想当一位作家，绝不能成为巴兹兰第二。在书中，德尔 · 朱迪契通过文学创作意义的思考，创建了一种新颖、独特的叙事风格，叙事者成了让人获得感性认识的工具，没有人物内省的叙述由一系列清晰、准确且产生视觉效果的画面组成，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忽隐忽现，含糊其词的对话精妙深奥。

上述独辟蹊径的写作风格，在德尔 · 朱迪契的第二部小说《西方地图册》（Atlante occidentale，1985）中则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小说叙述了年轻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年迈的德国作家两位挚友之间的故事：物理学家悉心研究加速器的构造，试图找到某种材料的微粒子；作家则决定停止写作，以寻觅存在于文学形式以外的自己喜欢的故事。作者欲告诉读者的是，在一个由亚核粒子和电子技术操纵的时代，物体失去了原先的形状，它已由电脑和电视屏幕发出的光束所取代，最后导致人改变对物体的认识。小说标题中的“地图册”隐喻人们若想要在新的视觉世界里找到正确的方向，必须想法设定新的坐标；两位知识渊博的智者之间的对话则明确无误地告诉读者，物理和文学似乎是两门互不相关的学科，但实际上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

作者这种不断探索和寻觅的理念，在他 1988 年推出的另一部小说《兰斯博物馆》（Nel Museo di Reims）中再一次得到了更为淋漓尽致的表述，整部小说充满高深莫测的寓意：一位即将失明的青年希望最后看一眼他心仪已久的兰斯博物馆，那里有一位不相识的女孩向他详尽地介绍了馆内收藏的画作，但对他而言，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个模糊不清的图像。德尔 · 朱迪契的第三部叙事体作品《驱散笼罩在大地上的阴影》（Staccando l’ombra da terra）于 1994 年问世，描述了主人公饱经人间沧桑后试图重新找回自我的心路历程，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多种语汇烘托主题，丰富的想象

深刻的内省和科学术语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作者的最后一部作品《躁狂症》（Mania）发表于1997年，书中收入了他在1984年至1996年间创作的6个短篇故事，揭示了藏匿在后现代主义虚假幻影背后的种种社会弊端。

十二、斯坦法诺·培尼(Stefano Benni，1947—)

培尼生于波伦亚，1976年发表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体育酒吧》（Bar sport），是一部近乎中世纪式的“动物寓言集”，书中对聚集在酒吧里的各类动物的特性作了一番贴切的分析。1983年，培尼推出一部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佳作《陆地》（Terra），采取消费文学作品常用的叙事手法，成功地将探索地球奥秘的考古历险与科幻世界糅合在一起。小说描述2157年三艘宇宙飞船寻觅适宜于人类居住的星球的飞行经历，宇宙飞行员的叙述明显具有薄伽丘《十日谈》式的幽默，以及传统叙事体作品的写作特色，字里行间不时隐现出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史诗《奥德赛》、东方故事集《一千零一夜》、英国中世纪民谣《罗宾汉》及19世纪下半叶意大利维罗纳著名作家埃米利奥·萨尔加利(Emilio Salgari，1862—1911)历险小说的影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均欠完整，具有连环画人物典型的二维性。培尼的作品之所以可读性较强，是因为他喜欢独辟蹊径地采用独特的口语化文学语言，并借此反映被胜利者掩盖的受害者的历史，即使荒诞、可笑的叙述也隐含着明显的政治观点。由此可见，培尼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欲以自己的作品唤醒人们的良知。

1986年问世的《受惊的可笑勇士》(Comici e spaventati guerrieri）标志着培尼一系列侦探小说的开端，小说中的人物不但被冠以动物的名称，而且还具有动物的特性。小说的情节围绕着一起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展开，无能的警察和死者的私人朋友(一位足球运动员）共同参与了案件的侦破工作。如同其他的后现代派侦

探小说,培尼的这部小说既不揭示疑案的真相,也不讴歌法律的公正和胜利。作为被社会抛弃的受害者，儿童和退休职工在书中左右着侦查工作的进展，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城乡接合部一排排数不清的破旧公寓房子，荒凉的场景实际上成了对现实社会的无声抗议。就这部侦探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写作风格而言，它同意大利 20 世纪初叶著名随笔作家、小说家嘉达的某些作品颇为相似，显示出培尼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以及冷静、犀利的心理和社会分析能力。

作者于 1990 年发表的《保尔》（Boal）是一部充满神秘和恐怖气氛的侦探小说，描述一位魔术师般的侦探如何与政治集团头目抗争的故事,超现实的情节荒诞可笑,与 20 世纪美国‘ 硬汉派 ’侦探小说的开创人哈米特的写作风格如出一辙。 90 年代,培尼陆续又推出了好几部类似风格的长、短篇小说：《切莱斯廷公司》(La compagnia dei Celestini, 1992)、《最后一滴眼泪》(L’ultima lacrima, 1994)、《向日葵属植物》(Elianto, 1996)、《2000 体育酒吧》(Bar sport Duemila, 1997)等。

十三、亚历山大罗 · 巴利科(Alessandro Baricco, 1958—)

巴利科是一位极富天赋的都灵年轻作家，善于用智慧激发热情,创造出一种既有青春气息又有文化底蕴的新文体,著有《愤怒的城堡》、《蚕丝》和《浩瀚的海洋》等名噪一时的力作。人们称其为文学的‘ 埃利厄尔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精灵),因为他在都灵创建杰尼 · 霍尔登(20 世纪美国作家塞林格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主人公)写作学校时,成功地使出了魔鬼般的手法让文学与电视联姻。

巴利科还是一位出色的音乐评论家. 1992 年曾发表一篇评论先锋派音乐的论文《黑格尔的灵魂和威斯康星的奶牛》(L’anima di Hegel e le mucche di Wisconsin)。除外,他曾在电视台成功地

主持过有关歌剧和书籍的文化类节目。他的第一部小说《愤怒的城堡》(Castelli di rabbia)发表于 1991 年，讲述了发生在欧洲 19 世纪一座城堡里的一连串故事,尽管众多人物(空想家、疯子、白痴、梦乡家、乖僻的发明者和叛逆者等)的言谈举止怪诞不经,但严谨的科学精神和艺术性熔为一炉，使整部作品的创作风格富有独特的艺术魅力。1993 年，巴利科推出他的第二部叙事体作品《浩瀚的海洋》(Oceano mare)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因此声誉鹊起，并确立了自己在当代意大利文坛上的地位。这部小说叙述的故事发生在既没有年代也没有地名的一个海滨旅店里，客居在那里的人均是一些性情怪僻的人：喜欢用海水描绘浩瀚大海的画家帕拉松、专门研究海洋学的巴特雷波教授、在帕拉谢神父陪伴下来海滨寻觅医治痼疾良方的名门千金伊利斯温、因失恋而来海边疗养心灵创伤的美丽、富有的姑娘安·德弗莉亚、神秘的水手阿达姆斯、一个直至小说末尾才露面的行踪诡秘的客人,以及一群具有特异功能的小孩。故事的叙述采用的是电影蒙太奇剪辑和组合的手法,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命运起初似乎互不关联,读者也无法将他们各自离奇的人生经历串连在一起：伊利斯温最后投入水手的怀抱而治愈了自己的痼疾，而水手却为了替安·德弗莉亚的恋人复仇而将她杀死。小说中叙述的一个个故事均以大海为背景，形成了一张由超现实素材组成的密密匝匝的网，蕴涵着深邃、晦涩的寓意。《浩瀚的海洋》具有明显的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作者在传统的主题中融入了抒情、心理描写、幽默、历险等不同的写作元素，海滨旅店成了一群来历和命运各不相同的人萍水相逢的地方，然而这一切似乎是由某种神奇的力量在冥冥之中事先安排好的。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中那家海滨旅店的店名“阿尔马耶”源自 20 世纪初波兰出生的英国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1889 年创作的小说《阿尔马耶的蠢事》中主人公的名字,而巴特雷波教授的人物原型,出自以描写海洋的小说而著称

的19世纪美国后期浪漫主义小说家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作品。另则，在小说的末尾才露面的神秘人物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当他最后离开那家“从来都没有存在过的”海滨旅店时，身子蓦然腾空而起，并立即化为许许多多轻轻的碎片随风向四处飘去，同时也带走了有关海洋的所有文字和故事，隐喻小说中描述的世界只是瞬间即逝的、虚无飘渺的梦境而已。读者在阅读这部小说时，耳畔仿佛一直响着咆哮的海涛声。

1994年，巴利科曾为意大利阿斯迪戏剧节写过一个题为《二十世纪》(Novecento）的独幕剧，主人公是一位天资超群的钢琴家，他出生在一艘来往于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远洋游船上，尔后他一直生活在船上，从未在沿线的任何港口上岸。独幕剧后被拍摄成影片《大洋上一位钢琴家的传奇故事》（La leggenda del pianista sull'Oceano），获得巨大的成功。接着，巴利科又在1996年推出了另一部长篇小说《蚕丝》（Seta），以他擅长的写作风格，通过“似曾经历过的错觉”，讲述了一则发生在19世纪一位欧洲青年和一位日本青年之间的爱情故事，富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巴利科的最后一部叙事体作品《城市》（Città）于1999年问世，对这部以无赖、骗子的流浪冒险事迹为题材的小说，文学评论界褒扬有加，并将它誉为一则美丽动人但充满苦涩味的寓言故事。

十四、卡尔洛·鲁嘉雷利（Carlo Lucarelli，1960— ）

鲁嘉雷利生于意大利北方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帕尔马城，1990年发表处女作《白纸》（Carta bianca），其中由他塑造的德·鲁卡这一警方探长的形象后成为他另两部小说《动乱的夏天》（L'estate torbida，1991）和《鹅之路》（Via delle Oche）的主人公。就内容而言，这3部叙事体作品纯属侦探小说，但它们在意大利当代文坛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其平铺直叙、不加修饰的写作风格不禁使人联想起皮蓝德娄和莫拉维亚的某些作品。再则，从写

作背景来看,这 3 部小说叙述的故事均发生在意大利近代史上的关键时刻:1944—1945 年间由法西斯执政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时期,1945 年夏天,以及 1948 年 4 月至 8 月(其间,天民党在大选后成为执政党,意共领袖陶里亚蒂被刺受伤)。

鲁嘉雷利先后于 1993 和 1994 年推出的两部小说《武装部队》(Falange armata)和《狼的白昼》(Il giorno del lupo),则以当代历史为写作背景,分别反映了新法西斯分子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威胁和犯罪分子作案的新动向。这两本书均采用第一人称作为故事的叙述者,以一名年轻警察的口吻,鞭辟入里地刻画了警察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的热爱以及他们头脑中各种偏执的想法,比如他对摩洛哥人、年轻人和妇女始终怀有不可理喻的刻骨仇恨。实际上,鲁嘉雷利是一个正气凛然的伦理主义者,他通过自己塑造的一系列决心维护法律尊严的警察形象,揭示现实社会的种种腐败现象。比如,他在 1994 年发表的小说《狼人》(Lupo mannaro) 中,成功塑造了千里追捕杀人凶手的洛迈奥警长的形象,一个德·鲁卡式的英雄人物。

1996 年问世的《圭尔尼嘉》(Guernica)被公认为是鲁嘉雷利较为成功的一部作品,综合了他以前的写作经验,文字洗练,充满伦理道德的叙述更具有表现主义的特征。故事发生在 1937 年夏季西班牙内战期间,当时的国民军在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的支援下,攻克巴斯克各省,然后夺取阿斯图里亚斯,10 月控制了北岸全线。小说描写的正是这一时期中各种敌对势力展开生死搏斗的真实历史事件,叙述中一再出现的狼人正遭受法西斯党魁齐亚诺的好友、一名小偷兼嫖客的密探的追杀。显然,所谓的狼人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作者欲借此暗喻残酷的西班牙内战。

1997 年发表的恐怖小说《似蓝非蓝》(Almost blue) ,在创作风格上被认为缺乏创新精神,迎合了近年来西方消费社会中一部分读者的情趣爱好 而 1998 年出版的《自动的太阳》(Autosole)

是根据作者原先在报刊上发表过的若干小品文汇编而成的一本集子，主题聚焦高速公路上的严重塞车现象，借此嘲讽社会现实，隐喻当代人生活环境的拥挤和混乱。

十五、恩利科·勃立兹(Enrico Brizzi,1974—)

勃立兹出生在波伦亚，早年曾在该城攻读信息学，1994 年发表处女作《离群的杰克·佛罗桑特》（Jack Frusciante è uscito dal gruppo），以十分细腻的笔触描绘了一个青少年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以致小说一出版随即成为广大青少年读者喜爱的一本书。这一本青少年读物的主人公阿莱克斯是就读于波伦亚一所高中的学生，他与同校的女学生阿伊蒂一起去美国学习一年，发生在这一对少男少女之间朦胧的爱情故事富有浓厚的理想化和柏拉图式的情调，书中还穿插了不少描写年轻学生与家庭及学校关系的情节，读来发人深思。从根本上来说，阿莱克斯对家庭和学校均持敌对态度，因为在他看来，那是两个由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僵死的原则条例控制之下的陌生世界。但是，他并没有为了赢得个人自由的生活空间而同校方发生公开的冲突，相反，他尽量设法让自己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勃立兹的第 2 部小说《巴斯托涅》（Bastogne ）于 1996 年问世，书的内容同一度盛行于西方社会的恐怖影片如出一辙，讲述了 4 个小青年如何通过抢劫、凶杀、强奸等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对虚假的现实社会进行血腥和近乎狂癫的报复。至于写作语言，作者依然采用了许多痴迷摇滚乐和毒品的当代青年人常用的俚语，具有后现代派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 1998 年推出的第 3 部小说《三个虚构的青年人》（Tre ragazzi immaginari） 则以狂欢节为写作背景，描写了青少年在告别昨天走向明天前夜的复杂心理，抒发他们对瞬息即逝的青少年时代的无限眷恋。就故事内容而言，它简直是作者处女作《离群的杰克·佛罗桑特》的翻版 青少年朦胧的爱

情、中学同学之间的友谊、摇滚音乐会、驾驶轻便摩托在大街上飙车、吸食含有大麻的香烟、荷兰之旅……

十六、安德雷亚·G·宾盖兹(Andrea G. Pinketts, 1961—)

宾盖兹是一位年轻的米兰作家，曾在该城创建了一所自称为“硬汉子学校”的文化机构,欲通过警方调查探索社会现实,重建昔日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和谐关系。20 世纪 90 年代，宾盖兹创作了一系列自传体侦探小说，主人公都是热衷于自我表现的拉扎罗·圣达德雷亚，一个作者偏爱的业余侦探：《拉扎罗，你快出来》(Lazzaro，vieni fuori，1992)、《羊羔的恶习》(Il vizio dell'agnello，1994)、《句子的意思》(Il senso della frase，1995)、《最后一顿晚餐的账单》(Il conto dell'ultima cena，1998)等。在这些小说中，圣达德雷亚没有固定的职业，终日喝得酩酊大醉，且嘴上总是叼着一根雪茄烟，即使他的朋友也是一些言谈举止怪诞不经的人，这不禁使人联想起 20 世纪 40、50 年代美国著名电影演员博加特饰演的“硬汉子”形象。为了追求一种冒险的生活，圣达特雷亚整日在充满各种暴力事件的米兰街头转悠，采用夸张、荒诞的手段，到处捕捉反常或过激行为的蛛丝马迹。除外，宾盖兹还著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食人青年》(Gioventù cannibale，1996)。基于宾盖兹作品的内容，以及他擅长运用俏皮话和年轻人俚语的写作风格，文学评论家一般将他归入“后现代派”之列。

第三节　诗歌创作

随着新先锋派文学运动的衰亡,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意大利诗苑中，欲将政治与艺术区分开来的创作倾向再次占据上风。其中，有一部分诗人通过借鉴未来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文艺流派

达达主义的经验，继续进行着日趋没落的纯艺术创作探索，欲建立所谓的‘具体派’和‘视觉派’诗歌,主张词语和形象之间的自由关系，以及其他元素的介入，使所选择的单位（文字片段、标点符号、字素、词素、音节或词）和印刷间隔构成一幅激起人们想象的图画。在这一方面,安德雷亚·扎诺托(Andrea Zanotto，1921—)无疑是一个佼佼者；他在继承新先锋派传统的同时，对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的现象提出质疑，并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极具个性的研究。同样热衷于实验主义创作风格的诗人还有阿曼利亚·罗赛利(Amelia Rosselli，1930—)和阿尔达·梅莉尼(Alda Merini,1931—),前者擅长在诗句中刻画遍体鳞伤、心痛欲裂的‘自我’形象 后者则早在 50 年代就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诗人,经 20 余年的沉寂后再次在诗苑引起广泛的关注。

另有一部分诗人在继续同现实对话的基础上，通过诗歌对现实社会提出批评和质疑，这一诗歌创作倾向后被称为“伦巴第路线”。实际上,“伦巴第路线’的名称源自 20 世纪初一位著名米兰随笔作家、20 世纪新诗的发起人罗齐亚诺·安契斯基（Luciano Anceschi ）于 1953 年发表的题为《伦巴第路线》的诗选,其中收入了好几位 20 世纪初伦巴第地区诗人的作品，并将他们的赋诗格调同意大利启蒙主义文化时期杰出散文作家、诗人帕里尼和波尔塔，甚至浪漫主义代表作家、诗人孟佐尼等所创建的文学传统联系在一起。“伦巴第路线’派的诗人以人与具体事物的关系作为创作基础，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抨击现实社会。同属这一诗歌流派的诗人还有 乔万尼·朱迪契(Giovanni Giudici,1924—)、乔万尼·拉波尼(Giovanni Raboni,1932— ）和马乌利齐奥·古基(Maurizio Cucchi,1945—)等人。

与此同时，一部分更为年轻的诗人，如瓦莱里奥·马格雷利（Valerio Magrelli,1957—)、巴德利齐亚·瓦尔多嘉（Patrizia Valduga,1953—)和朱塞佩·贡特(Giuseppe Conte,1945—)

等，坚持不懈地探索着诗歌创作的新路子，试图在和旧传统分道扬镳的同时，找到新颖的赋诗风格。

下面选译的 4 首短诗选自被称为‘ 新生代诗人 ’的扎诺托、梅莉尼、古基、贡特等人的诗作，透过飘溢时代颤音的诗句，我们似乎可以闻到一股清新的现代气息扑鼻而来：

一、《多莱的溪水》（L’acqua di Dolle）

这首诗选自扎诺托 1994 年发表的《诗选》。诗人通过想象的地名‘ 多莱 ’，描绘了人们熟稔和倍感亲切的一处景致，将读者的视线引向隐匿在自然表象后面的种种变化。诗人描摹的诗歌画面上没有任何现实元素，有的只是颇具象征意义的标记，赋予常见的自然景观以丰富的幻想色彩。溪水只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小股水流，但这一自然元素却与人们每日间的生活和遐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蕴涵着深邃的内涵。诗人将萦绕回转的小溪比喻成自己心中仰慕的女子，以彼特拉克抒情诗式的格律追忆那曾经充满温馨的美好时光，借此抒发内心对爱情的无限向往。然而，多莱的溪水同样也见证了地貌自远古以来的种种变化，奔流的水波里孕育着令人愉快的回忆。扎诺托的诗歌语言丰富多彩，情感跌宕起伏，每每借助宇宙和行星的奥秘烘托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

多莱的溪水
一路奔跑
给我带来了一丝宽慰，
它缓缓流过十座小山
轻轻擦过心中的沙丘，
空气中飘溢蜂蜜的芬芳
那是我心中渴望的溪水。
清凌凌的水面上

荡漾着你清晰的倒影，
弯道口树阴浓密
无花果似守护神一般
探出绿色的枝桠，
阳光下碧空绽放欢乐的笑容
苔藓和蕨类植物却不见了踪影。
淌过板结的白垩块
溪水奔流向前，
盛开的红花
如海如云，
而美丽的景致却无法驱散
你心头的孤独：
我是一只卑微的蜗牛
只需要一丝微弱的光亮；
我是一个小小的菜园
无需众人的浇灌。
溪水传递着
自然界千万个神秘的声音，
熠熠闪光的繁星
给多莱的山川
裹上了素净的银装，
溪水捎来象征明天的
月色清朗的夜晚。

二、《骁勇善战的夜间医生》(Il dottore agguerrito della notte)

在当代意大利文坛上,有不少作家把‘精神病院’选作叙事体作品的写作背景，揭示那些专为精神病患者治病的医生心中的矛

盾和迷茫。正如法国当代结构主义哲学家傅科（M. Foucault）在其著作中提出的命题：精神病院这类机构都是社会实行“清洗原则”的一种手段，而通过分析社会对这类机构的态度，便可以对权力的发展和运作状况进行考察。正因为如此，诗歌作品中频频出现的“精神病院医生”往往是一个反面角色，他成天同精神上遭受巨大痛苦的精神病人呆在一起，心中已没有了丝毫同情心或人道主义精神。不宁唯是，这些医生宛如恶魔，对病人态度冷淡，专以戏弄人作为乐趣。在米兰女诗人梅莉尼的笔下，精神病院简直成了一座阴森可怕的监狱，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着一道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墙。

《骁勇善战的夜间医生》选译自梅莉尼 1984 年发表的诗集《圣土和其他诗篇》（La Terra Santa e altre poesie）：

脚步轻盈地走来主宰你的命运，
他望着神色忧愁的病人
嘴角上挂着阴险的奸笑，
他为你开了一支大剂量的镇静剂
针头插入了你手臂上的静脉
流入针筒的却是你诗人殷红的血。
他这才满意地离去
他的狂癫行为
使值班医生吓得面如土色，
昏睡中的你
神情痴呆地望着铁栅栏
口里吟唱着殉难者的赞歌。

三、《泉水的诗篇》(Poesia della fonte)

这是古基于 90 年代创作的抒情诗集《泉水的诗篇》中的一首

自由诗,发表于 1993 年。诗人通过赞颂父子间的亲情，追忆早已流逝的童年时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米兰的圣西洛足球场，时间是 50 年代初某年春天一个周四的下午，一场激烈、精彩的足球赛正在进行着。在意大利诗苑，以足球赛为创作主题实属罕见。诗句中描述的童年岁月足以勾起读者对往事的回忆，字里行间蕴含着诗人儿时心中的梦幻，以及逃离现实的渴望。诗歌以第三人称开始,但末尾处却转换成了第一人称,诗人通过对深沉的父爱的赞美,抒发对失去的欢乐的无限眷恋,暗喻充满各种矛盾的现实生活。

那是一个青壮年汉子
身披一件质地考究的灰大衣。
手上牵着一个小男孩
不言不语但幸福无比，
球场上一片寂静
场中央站着爱冒险的“纳卡”
“毒药”“无国籍者”和“神风飞机”。
1953 年夏天，
那是我记忆犹新的日子。
路易其 · 古基
是我心中至高无上的骄傲，
尽管他对这一切全然不知。

（注 纳卡 瑞典籍球员 Lennart Skoglund;“毒药”球员 Benito Lorenzi;“无国籍者”匈牙利籍球员 Niers;“神风飞机”意大利 Inter 队守门员 Giorgio Ghezzi　路易其 · 古基：诗人的父亲）

四、《或许他们会记得我》（Mi ricorderebbero）：

这首诗选译自贡特 1992 年发表的诗集《诗人与使者的对话》（Dialogo del poeta e del messaggero），比较集中地体现出贡特晚期作品的写作特色。作为贡特诗作表现力基础的“神话”，在现实面前，尤其是年轻人喜爱的海上生活中，逐渐失去其往日的魅力；“乐土”的幻景(欢乐、嬉戏、性爱)也在每日间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消失殆尽。《或许他们会记得我》描绘的是英贝利亚城以东利古里亚海滩上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图景：高档跑车、迪斯科舞厅，以及让小伙子们心醉神迷的姑娘。然而，被年轻人称作“充满激情和狂热的周六夜晚”,最后却因一起车祸而成为不堪回首的往事,他们的‘神话”也随之烟消云散。诗歌末尾的几行诗烘云托月般地渲染了人物内心的愧疚和困惑，迷茫和不安。被诗人称作“我”的人仅仅是一个‘幸存者”,而逝者在他人的心目中留下的只是模糊、零碎的记忆。

我们相约在海边
尼科刚买了一辆‘朱利亚’跑车。
约好一起去迪亚诺和阿拉西奥城，
开怀大笑、跳舞、泡妞。
他赤裸着身子
在一间间更衣室之间转悠
同女孩子做爱；
而我却不愿与他为伍，
即使现在想起来，
也说不出任何缘由。

那晚在阿乌雷利亚路上
车上坐着两个英国姑娘

和另一位我不认识的朋友，
一辆小车前灯的炫目光束
照得尼科迷失了方向，
汽车突然驶向一边
女孩受伤，朋友不幸身亡，
而他却安然无恙。

受了惊吓的他
有一个月足不出户，
我以在米兰迎考为由
从没去探望过他。
我羡慕他的命运
和他的潇洒，
但我的性情依然如故
冷漠、孤僻，
它使我幸免于难。
倘若我以他为楷模
跟着他一起寻花问柳，
我将丢弃自己的本色
为生命的短暂抱憾终身
记得我的或许只有
尼科和我的妈妈。

第四节　戏剧作品

近 40 年来，意大利文坛上戏剧作品的创作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先前不同的是，专业剧作家写完剧本后由剧院组织公演的传统做法也不复存在。反之，几乎所有优秀的戏剧作品均出自

一些与舞台演出密切相关的人员之手。尤其是一些演员，他们往往既是剧作家，又是舞台演出的导演。在这一方面，德·菲利波、达里奥·福和培尼无疑是三位功勋卓著的剧作家和演技超群的天才演员。

一、埃特瓦尔多·德·菲利波(Eduardo De Filippo,1900—1984)

德·菲利波生于那不勒斯，其父是那不勒斯戏剧界著名的剧作家和演员。在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之下，德·菲利波早在孩提时代就对戏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与其兄弟和妹妹贝比诺和迪蒂娜一起组建剧团，由他编写那不勒斯传统滑稽剧和喜剧，并组织舞台演出。德·菲利波是一个具有天才哑剧表演技巧的演员，其超群的表演才能甚至博得了意大利戏剧家、小说家、1934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皮蓝德娄的高度赞赏，德·菲利波 1937 年首演的戏剧《新衣裳》（L'abito nuovo）就是根据皮蓝德娄的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后搬上舞台的。战后，他和迪蒂娜创办“埃特瓦尔多剧团”，上演了许多由他自己编写的喜剧。1984 年,德·菲利波殁于罗马。

德·菲利波擅长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惟妙惟肖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他丰富的创作实践不仅为那不勒斯的戏剧艺术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而且在意大利各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且为意大利民族戏剧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他有意识地将 19 世纪的传统喜剧形式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和谐地糅合在一起，巧妙地运用那不勒斯方言中独特的喜剧元素，真实反映下层民众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成功地塑造了那不勒斯喜剧中典型的小人物普尔契奈拉的形象：长鼻驼背，身着内衣，脸上带着黑色的小面罩，善变且惯于耍弄小花招，但性格刚毅，内心有着强烈的自尊。

德·菲利波在一生中创作的剧本甚多，主要有：《特别富有的那不勒斯》(Napoli milionaria,1945)、《费路梅娜·马尔多拉诺与幽灵》(Filumena Marturano e Questi fantasmi,1946)、《发自内心的呐喊》(Le voci di dentro,1948)、《我的家,我的爱和我的心》(Mia famiglia e Bene mio e core mio,1955)、《初审法官德·温钦佐》(De Pretore Vincenzo,1957)、《周六、周日和周一》(Sabato, domenica e lunedì,1959)、《萨尼达地区的审查员》(Il sindaco del rione Sanità,1960)、《普尔契奈拉的儿子》(Il figlio di Pulcinella,1962)、《喜剧艺术》(L'arte della commedia,1965)、《契约》(Il contratto,1967)、《纪念碑》(Il monumento,1970)、《没完没了的检查》(Gli esami non finiscono mai,1973)等。

《费路梅娜·马尔多拉诺与幽灵》创作于 1946 年,是一出典型的德·菲利波式喜剧。剧中的女主人公费路梅娜是一个“卑微”的妓女,25 年来一直甘心情愿地充当索利亚诺的情妇；索利亚诺丧偶后，不但拒绝娶费路梅娜为妻，而且又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女人；无奈之下费路梅娜想出了一个花招逼索利亚诺就范：她装作病人膏肓、生命垂危的样子，骗得了索利亚诺答应同她结婚的承诺，因为索利亚诺以为费路梅娜已不久人世，一旦她命归西天，他们的婚姻也就名存实亡了；索利亚诺发现自己受骗，委托律师宣布婚姻无效；费路梅娜叫来她瞒着众人含辛茹苦抚养长大并帮他们找到体面职业的她的 3 个儿子，索利亚诺原先对此一无所知，故谴责费路梅娜装疯卖傻；见索利亚诺如此绝情，费路梅娜被迫道出真情，说 3 人中有一个是索利亚诺的亲生儿子，且不管索利亚诺如何追问她哪一个是他的儿子，她就是闭口不言；见此状，索利亚诺表示理解费路梅娜的举动，并决定与她结为伉俪。

二、达里奥·福(Dario Fo,1926—)

1997 年 10月 9 日，瑞典皇家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

予意大利先锋派剧作家、导演和演员达里奥 ·福,为的是表彰他以敏锐的思辨力和深邃的洞察力，效仿中世纪弄臣，鞭笞当权者，维护被压迫者的尊严，以及他对戏剧艺术孜孜不倦、富有成效的探索。达里奥 · 福是一位人民戏剧家，他写的政治讽刺剧已赢得广泛的国际声誉，被认为是一位能与古希腊著名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齐名的艺术家。数十年来，他一直是欧洲政治讽刺剧领域中的带头人，其主要作品攻击对象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及意大利政府的种种腐败行为。但作为一个具有社会鼓动天赋的戏剧讽刺家，达里奥 · 福却经常得面对政府和教会的指责。当他获奖的消息传来，意大利文坛一片哗然，批评界褒贬不一，梵蒂冈更是迫不及待地将他贬低成‘ 小丑 ”。然而 ,综观达里奥 ·福为创建富有战斗力的人民戏剧而殚精竭虑的一生，我们不得不为他在创作实践中所显示出来的火一般的热情，以及痛砭社会弊病的过人胆力所深深折服。

达里奥 ·福于 1926 年出生在意大利北部凡雷赛省雷丘诺一桑贾诺镇一个铁路员工之家。他自幼酷爱民间说唱艺术，这无疑为他从艺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年，他曾在米兰勃雷侠美术学院学习建筑学，但学业未竟便中途辍学。 50 年代起，他开始与他人合作在电台录制喜剧节目，并将它们搬上舞台，其中的时事讽刺剧《一针见血》（Il dito nell’occhio，1953 ）和《十足的健康人》（Sani da legare，1954 ）为他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与此同时，达里奥 · 福还涉足影视作品的创作，曾在 1956 年主演过影片《脾气古怪的人》（Lo svitato）。他曾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一档颇受大众欢迎的电视节目的兼职作家、导演和演员，但不久政府便下令取消这档节目 ,只因为他饰演了 12 世纪一位生性残暴的意大利籍教皇。70、80 年代，美国里根政府也曾拒绝给达里奥 ·福发放入境签证 ,直至 1986 年他应美国国立剧院的邀请才得以访美。

他最初的戏剧实践是参与餐馆、酒吧小型夜总会或剧院时俗

讽刺剧的演出。1959 年他和妻子拉梅创建福 — 拉梅剧团，除了写剧本以外，他还兼任导演、舞美和服装设计，并为演出谱写音乐。在此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了一种政治鼓动剧，它虽鄙俗又侮慢不敬，但却植根于意大利即兴喜剧的传统，并与达里奥 · 福称之为的“非正式左倾”的创作风格融合在一起。此类富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喜剧因贴近现实而深受大众的欢迎，其中有：《大天使不玩电动台球》(Gli arcangeli non giocano al flipper，1959)、《第七个偷的东西不多》(Settimo：ruba un pò meno，1964)、《该丢弃的太太》(La signora è da buttare，1967)等。1968 年达里奥 · 福和拉梅又创建了另一个与意大利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剧组“新舞台”；1970 年他们又建立了一个剧团“公社”，并开始在工厂、公园和体育场巡回演出。自 1953 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剧作《一针见血》之后，达里奥 · 福迄今共写了 70 多部戏(其中有一些是和拉梅合写的)，包括讽刺剧、广告剧、独幕滑稽剧、黑色喜剧、荒诞剧等，体裁繁多，但影响最大并受到公众热烈欢迎的当属他的政治讽刺剧。值得指出的是，他的政治讽刺剧均取材于现实生活，或从发生在意大利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中汲取创作灵感，加之其诙谐滑稽的独特表现手法，观众在发出会心的笑声之后，每每陷入一片深思，而这正是他的戏剧作品取得巨大成功的秘诀所在。

在艺术上，达里奥 · 福注意借鉴 16 世纪风靡一时的即兴喜剧的表现手法，剧中故事的展开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的情节始终将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地吸引住，并在他们内心产生强烈的共鸣。他最受欢迎的剧作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Morte accidentale di un anarchico，1970)和《拒不付款》(Non ti pago，non ti pago，1974)。而作为表演者，他最拿手的是《滑稽神秘剧》(Mistero buffo，1969)中的独角绝技。该剧以中世纪的神迹剧为基础，由一系列短剧组成，素材采撷自中世纪史和宗教传说，以社会下层民众独特的视角直率、尖锐地讽刺教会，抨击时弊，嘲讽统治者的虚

伪和道德沦丧，但演出时的话题却因每场观众而不同。在演出的过程中，舞台上只有达里奥 ·福一个演员，没有任何道具或布景；他既不化妆，也不换服装，先后饰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有时甚至还同台下的观众进行直接的对话或交流，观众则不时地为他精湛的演技和令人深思的发噱情节捧腹大笑，大声喝彩。

达里奥 ·福是一个十分勤奋的剧作家，在数十年中写了许多剧作,除了上面提及的以外,主要的作品还有:《总是魔鬼的不是》(La colpa è sempre del diavolo,1965)、《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对不起，那个不是老板吗？》(Tutti uniti，tutti insieme! Ma scusa，quello non è il padrone? 1971)、《喔，这是上帝的命令！》(Ordine per Dio，ooo. ooo. ooo! 1972)、《砰,砰,谁来了？警察！》(Pum! Pum! Chi è? La polizia! 1972)、《被绑架的范范尼》(Il Fanfani rapito,1975)、《爱丽莎贝达几乎成了一个女人》(Quasi una donna，Elisabetta,1985)、《教皇与女巫》(Il Papa e la strega,1990)、《大胸脯的魔鬼》(Diavolo con le zinne,1997)、《自由的马里诺！》(Marino libero! 1997)等。另外，70 年代末出版的 5 卷本《达里奥 · 福的喜剧》(Le commedie di Dario Fo)收入了达里奥 · 福 1974—1977 年创作的最具代表性的剧作；1987 年推出的《达里奥 · 福言论集》(Manuale minimo dell'attore)则收集了达里奥 · 福 1984—1985 年间在罗马的"阿根廷剧院"所作的一系列报告,忠实地记载了他作为一位剧作家、演员兼导演深切的心得体会。

达里奥 ·福的政治讽刺剧直面人生，及时反映平民百姓最为敏感的社会问题，在力砭权贵、指陈时政的同时，维护了被凌辱者的尊严，对人物的讽刺和嘲弄达到了淋漓尽致、入木三分的地步。他于 1970 年推出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是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政治讽刺剧，取材于 1969 年发生在米兰火车站的一起扑朔迷离的炸弹爆炸案，揭露了司法当局隐瞒事实、陷害进步人士的卑鄙伎俩。正因为如此，该剧的演出场场爆满，在两个戏剧季节

里，连演 300 场，观众超过 30 万人次，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轰动效应，博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1974 年创作的《拒不付款》也是一部讽刺剧，写一群家庭妇女不堪忍受物价的飞涨，一起去超级市场窃拿商品，拒不付款，表现了她们面对物价高涨的资本主义剥削的无奈和抗争。

达里奥·福创作的政治讽刺剧独树一帜，富有旺盛的战斗力。他在近 50 年的戏剧创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超群的睿智和勇气，在当今物欲横流的西方社会里实属罕见。

三、卡尔梅洛·培尼(Carmelo Bene，1937—)

培尼出生在意大利南方普利亚地区莱契城，是 20 世纪下半叶意大利戏剧界一位遐迩闻名的演员和剧作家。在 1959 年后的 20 余年中，他身兼演员和导演，与此同时，在借鉴莎士比亚、王尔德、英格兰作家史蒂文森、佛罗伦萨作家科洛迪及剧作家培奈利等作品中戏剧元素的基础上，写出了许多优秀剧作。除了潜心于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培尼还涉足影视、广播和唱片制作等方面的工作，并为此写有包括剧本、小说、随笔等体裁各异的作品。

培尼著述甚丰，其中戏剧作品有：《加缪的'卡利古拉'》(Caligola di Albert Camus，1959)、《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Lo strano caso del dottor Jekyll e del signor Hyde da Stevenson，1961)、《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Pinocchio da Collodi，1963)、《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Amleto da Shakespear，1961)、《王尔德的'莎乐美'》(Salomé da Wilde，19764)、《普雷沃的"曼侬·莱斯科"》(Manon da Prévost，1964)、《我们的土耳其太太》(Nostra signora dei Turchi，1966)、《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Don Chisciotte di Cervantes，1968)、《培奈利的'遭人笑话的晚餐'》(La cena delle beffe da Benelli，1974)、《罗米欧与朱丽叶》(Romeo e Giulietta，1976)、《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Macbeth da Shakespear，

1983)、《哈姆雷特套房》(Hamlet Suite,1994)等。除外,培尼还写有不少广播和电视作品。

附　录

重要作品意汉双语对照

A

Abaritte　阿巴利泰
Abitare il vento　住在风中的人
A Buonaparte liberatore　致解放者拿破仑
Ab urbe condita libri　罗马史
A casa tua ridono　他们在你家中大笑
A cena col commendatore　与受过勋的骑士共进晚餐
A ciascuno il suo　各得其所
L'acqua di Dolle　多莱的溪水
Acque e terre　水与土
L'Adalgisa　阿达琪莎
Adelchi　阿达尔齐
L'Adone　安东尼斯
A e B　A 与 B
Africa　阿非利加
A Giuseppe Garibaldi　致朱塞比·加里波第
Agli dèi ulteriori　最后的神仙
Agostino　阿科斯迪诺
Ahi lasso, or è stagion de doler tanto　啊！苦难何时终结
L'airone　苍鹭
Aladino　阿拉迪诺
Al cor gentil rempaira sempre amore　爱情藏在他温柔的心里
L'alcova elettrica　带电的神龛
Alercazione　争辩
Alla luna　致月亮
Allegria di naufragi　遇险者的欢乐
Allegoria e derisione　比喻与讥讽
All'Italia　致意大利
Almost blue　似蓝非蓝
L'alone grigio　灰色的光环
Alonso e i visionari　阿龙索和幻想者
Altri libertini　其他浪子
L'amaro calice　痛苦的酒杯
L'amaro miele　苦涩的蜂蜜
L'amata alla finestra　窗前的恋人
Le ambizioni sbagliate　奢望
Ambra　琥珀
A memoria　回忆录
America amara　苦难的美国

America, primo amore 美国,我的初恋
Gli americani a Vicenza 维琴察的美国人
Gli amici 朋友们
Amicizia 友谊
Aminta 阿明达
Amleto 哈姆雷特
Amleto di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
Amore 爱情
Un amore 一个爱情故事
Amore e fervore 恋爱与激情
Amore e patria 爱情与祖国
L'amore delle tre melarance 三个橙子的爱情
Amores 恋歌
Amori 爱情诗集
Amori senza amore 没有爱的爱情
L'Amorosa visione 爱的幻影
Amorum libri tres 三部爱情书;歌集
Angelici dolori 天使般的痛苦
Angelo del Liponard 利勃纳特的天使
Angosce di stile 令人焦虑的风格
Un'anima persa 失去的灵魂
Anime oneste 诚实的人
Gli Annales 编年史
Annali d'Italia 意大利史记
Gli anni perduti 蹉跎岁月
Un anno sull'alpino 高原上的一天
Anonimo lombardo 匿名的伦巴第人
Antenati 我们的祖先
L'antica moneta 古币
Antigone 安提戈涅
L'Antologia privata 个人文集
Arabella 阿拉培拉
Arcadia 阿卡狄亚
Aracoeli 阿拉格埃莉
Gli arcangelli non giocano al flipper 大天使不玩电动台球
Arcodamore 爱之箭
Argo, il cieco 双目失明的百眼巨人
Ariosto, Shakespaere e Corneille 阿里奥斯托、莎士比亚和高乃依
Arlecchino 阿莱基诺
L'armata dei fiumi perduti 德拉瓦河上的部队
Ars Amatoria 爱的艺术
L'arte della commedia 喜剧艺术
Arte medica 医术
A Silvia 致西尔维娅
Asolani 阿索洛人
L'assenza 当她不在的时候
L'assicuratore 保险商
L'assoluto naturale 绝对自由
Atlante occidentale 西方地图册
L'attore 男演员
L'augellin belverde 美丽的小青鸟

Il candelaio 举烛人
Canne al vento 风中的芦苇
Il cantico delle creature 万物颂
Il canto notturno di un pastore errante dell'Asia 一个亚洲流浪人的夜歌
Canti Carnascialeschi 狂欢节之歌
Canto Novo 新歌
Canzoni a bocca chiusa 无声的歌
Il canzoniere 歌集
Il cappello del prete 教士的帽子
Il cappello piumato 饰有羽毛的帽子
Capriccio italiano 意大利随想曲
I Capuani 卡普阿人
Cara Cina 可爱的中国
I carbonari della montagna 山里的烧炭党人
Il carcere 监狱
Cardillo addolorato 痛苦的卡尔迪洛
Caro Michele 亲爱的米盖莱
La carriola 独轮小车
La carrozza di rame 铜马车
Carta bianca 白纸
Carteggio 书信集
La casa di via Valadier 费拉第尔路上的房子
La casa in collina 山坡上的房子
Un caso clinico 临床病例
Cassio governa a Cipro 塞浦路斯统治者卡西奥
Castelli di rabbia 愤怒的城堡
Il castello dei destini incrociati 命运交叉的城堡
Il castello di Udine 乌迪奈城堡
La catena 锁链
Cato Maior de senectute 论老年
Il cavaliere inesistente 不存在的骑士
Cavalleria rusticana 乡村骑士
I cavalli bianchi 白马
La cena delle beffe da Benelli 培奈利的"遭人笑话的晚餐"
Cenere 灰烬
Le ceneri di Gramsci 葛兰西的骨灰
Centuria 百人组
La chimera 幻想
Chimismi chimici 抒情的化学机理
Ciascuno a suo modo 各行其职
Il cielo sulla città 城市上空的天
Il cigno 天鹅
Cina e altri Orientali 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
Il Cinque Maggio 五月五日
Cinque storie ferraresi 费拉拉故事五则
La Ciociara 乔恰利亚两妇人
Città 城市
Una città di pianura 平原上的一座城市
La città degli amanti 情侣的城市

Città del sole 太阳城
La città di vita 生命之城
Le città invisibili 无形的城市
La città e la casa 城市和家
La città morta 死城
Il clandestino 偷渡者
Clemenza di Tito 蒂托的仁慈
Cleopatra 克娄巴特拉
La cognizione del dolore 痛苦的认识
Col fuoco non si scherza 不要玩火
I Colloqui 对话
La colpa è sempre del diavolo 总是魔鬼的不是
Comici e spaventati guerrieri 受惊的可笑勇士
Le commedie 喜剧
Le commedie di Dario Fo 达里奥·福的喜剧
Commentarium 回忆录
La compagnia dei Celestini 切莱斯廷公司
Il compagno 同志
La conchiglia di Anataj 阿纳泰的贝壳
La confessione 忏悔
Confessioni di un italiano 一个意大利人的自白
Il conformista 随波逐流
La conquista delle stelle 征服星球
Il consiglio d'Egitto 埃及提案
Il Conte di Carmagnola 卡马诺拉伯爵
Il contesto 前因后果
Il conto dell'ultima cena 最后一顿晚餐的账单
La contrada 街区
Il contratto 契约
La controra 午间休息
Conversazione in Sicilia 西西里见闻
Il convivio 飨宴
Il corbaccio 大鸦
Corinto 科林托
Corporale 圣布
Corse al trotto 疾步行走
La cortigiana 宫廷侍女
Cortigiano 侍臣
Corto viaggio sentimentale 短暂和令人伤感的旅行及其他故事
La coscienza di Zeno 柴诺的意识
Cosima 科西玛
Le cosmicomiche 宇宙奇趣
La costanza della ragione 永恒的真理
Crematorio di Vienna 维也纳的焚尸炉
Cristo si è fermato a Eboli 基督停留在埃波利
Il crollo della Baliverna 巴利韦尔纳的崩溃
Cronaca familiare 家庭纪事

Cronache di poveri amanti 可怜的情侣

Cronache e altre poesie 评论与其他诗篇

Crudeltà all'aria aperta 野外生活的疾苦

Lo cunto de li cunti o vero lo trattanemiento de li peccerille 最好的故事

Cuore 爱的教育

Un cuore arido 干涸的心

Cuore di ciccia 肉心

Cuore di pietra 冷酷的心

D

Dall'inferno 地狱

Daniele Cortis 达涅莱·科尔迪斯

Dare e avere 给予和占有

David 大卫像

De amore coniugali 婚姻之爱

De antiquissima Itarorum sapientia ex linguae latinee originibus eruenda 意大利古老的民族文化和拉丁语的来源

De avaritia 论贪婪

De bello Neapolitano 那不勒斯战记

Il Decameron 十日谈

De consulatu 我的执政

De cristiana religione 论基督教

De dignitate et excellentia hominis 论人的尊严与卓越

De disciplina poetarum 论诗律

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Costantini donatione 论伪造的"君士坦丁赠礼"

De fato, fortuna et casu 论命运、幸运和偶然性

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 论善与恶的定义

De fortuna 论运气

Dei delitti e delle pene 论犯罪和刑罚

Gli dèi torneranno 诸神即将归来

De infelicitate principum 论不幸的君主

De l'infinito universo et mondi 论宇宙的无限性和诸天体

De la causa principio et uno 论原因、本原和一

De legibus 论法律

De libero arbitrio 论自由意志

De lingua latina 拉丁语论

Un delitto d'onore 情杀

Della divisione dell'Arcadia 阿卡狄亚诗派的分裂

Della famiglia 论家庭

Della moneta 论货币

Dell'amore patrio di Dante 但丁的爱国热忱

Della nuova scuola drammatica in Italia 论意大利新的戏剧流派

Dell'arte della guerra 战术论

Della tragedia 论悲剧

Della vita civile 论公民生活
Delle antiche favole 古代寓言
Delle bellezze della volgar poesia 论俗语诗的美
Dell'India antica e moderna 论印度的古代和现代
Del romanzo in generale e anche dei Promessi Sposi 论小说与《约婚夫妇》
Demetrio Pianelli 特曼德利奥·比亚奈利
De Monarchia 帝制论
De natura deorum 论神之本性
De natura rerum iuxta propria principia 论物体的本性
De partu Virginis 圣母玛丽亚的分娩
De Pretore Vincenzo 初审法官德·温钦佐
De professione religiosorum 论僧侣的誓言
De prudentia 论深谋远虑
De Republica 论国家
De rerum natura 物性论
De re rustica 论农业 农业志
De saeculo et religione 论世俗与宗教
Il deserto dei Tartari 鞑靼人的沙漠
Il deserto della Libia 利比亚的沙漠
De temporibus suis 我的时代
De tyramno 论暴君
De vita 论生活
De vita et moribus Julii Agricolae 拉格里科拉传
De voluptate 论快乐
De vulgare eloquentia 俗语论
Dialectcae disputationes 辩证的论辩
Dialoghi 对话
Dialoghi con Leuco 与雷乌库的谈话
Dialogo della Natura e di un islandese 一个冰岛人与大自然的对话
Dialogo delle lingue 有关语言的对话
Dialogo del poeta e del messaggero 诗人与使者的对话
Dialogo sopra due massimi sistemi de mondo 宇宙两大体系论
Dialogo sopra la nobiltà 贵族论
Dialogus de oratoribus 演说家对话录
Dialogus sur le commercee des blés 关于小麦贸易的对话
Diario del 1971 e del 1972 1971—1972 年日记
Diario di Grecia 希腊日记
Diario in pubblico 公开的日记
Il diavolo al pontelungo 长桥上的魔鬼
Diavolo con le zinne 大胸脯的魔

骁勇善战的夜间医生
Le due città 两座城市
Due di due 二对二
Le due tensioni 两种紧张形势
Due, tre cose sul Vietnam 有关越南的二、三事

E

L'edera 常青藤
L'editore 编者
Elegantiae latinae linguae 优雅的拉丁文
L'Elegia di Madonna Fiammetta 菲娅美达的哀歌
Elianto 向日葵属植物
Elias Portolu 伊里亚斯·波尔塔罗
L'Eneide 埃尼德
Energie nuove 新精神
Enrico IV 亨利四世
L'epidemia 瘟疫
Epigrammi 短诗集
Epistole 信札 书札
Epistolario 书信集
Epistulae ex Ponto 黑海书简
Epodi 长短句集
Erato e Apollion 伊拉托与阿波利翁
L'eredità 遗产
Ernesto 埃尔奈斯托
Un eroe del nostro tempo 当代英雄
Gli eroici furori 英雄的狂热
Eros 厄洛斯
Eros e Priapo 厄洛斯与伯利亚波
Gli esami non finiscono mai 没完没了的检查
L'esclusa 被遗弃的女人
Esercizi platonici 柏拉图式操练
E' stato così 事情的原委
L'estate torbida 动乱的夏天
Estetica 美学
E' subito sera 瞬息间是夜晚
L'età breve 短暂的岁月
L'età del malessere 困惑的年代
L'età preziosa 值得回忆的岁月
Et in Arcadia ego 希腊旅行日记
El lament del Marchionn di gamb avert 跛子马尔基昂的苦恼
Eva 夏娃

F

Falange armata 武装部队
La famiglia di Figaro 费加罗一家
Il Fanfani rapito 被绑架的范范尼
Fantasia 幻想
Fantasticheria 幻想
La farfalla di Dinard 迪纳尔的蝴蝶
Fasti 岁时志
Fausto e Anna 福斯特和安娜
La favola d'Orfeo 俄耳甫斯
Favole e memorie 寓言与回忆
Favuli murali 寓言集

G

H

I

J

K

L

佐·罗索的书简

Lettere da Capri 卡波利岛的来信

Lettere dal carcere 狱中书札

Lettere familiari ai fratelli 致三个兄弟的家信

Lettere inglesi 英国信札

Lettere meridionali 南方来信

Lettere non spedite 未寄出去的书简

Lettere virgiliane 维吉尔信札

Lettura di un'immagine 画像释读

Lezione di commercio 商业课程

Lezione di fisica 物理的教训

Lezione di fisica e Fecaloro 物理和费卡劳洛的教训

Liber facetiarum 滑稽故事集

Le libere donne di Magliano 马利亚诺的自由妇女

Libro per la sera della domenica 周日的傍晚

La locandiera 女店主

Lo sa il tonno 金枪鱼知道

La luna e i falò 月亮和篝火

Lunaria 月长石

Lunario dell'orfano sannita 萨姆尼孤儿的年历

La luna sul muro 墙上的月亮

Una lunga vita di Marianna Ucria 玛丽亚娜·乌克莉亚漫长的一生

Lupo mannaro 狼人

M

Macbeth da Shakspeare 莎士比亚的"麦克佩斯"

La macchina mondiale 奇妙的机器

Macno 马可诺

La madonna dei filosofi 哲学家的圣母

La madre 母亲

I maestri del racconto italiano 意大利故事中的大师

Il maestro di Vigevano 维吉瓦诺的小学教师

Mafarka il futurista 未来主义者马法尔卡

La Malora 灭亡

Una manciata di more 一把桑葚

Mandragola 曼陀萝花

Mangiami pure 把我吃掉吧

Mania 躁狂症

Manifesto della letteratura futurista 未来主义文学宣言

Manon da Prévost 普雷沃的"曼侬·莱斯科"

Manuale di poesia sperimentale 实验诗集

Manuale minimo dell'attore 达里奥·福言论集

I Maravoglia 马拉沃利亚一家

Il marchese di Roccaverdina 洛卡维迪纳侯爵

Marcia su Roma e dintorni 向罗马及周围地区挺进

Marco e Mattio 马可和马迪奥

Marcovaldo 马可瓦多
Mareblù 蓝色的海洋
Il mare non bagna Napoli 不靠海的那不勒斯
Il marescalco 御马官
Maria 玛丽亚
Marianna Sirca 玛丽亚娜·西尔嘉
Marino libero 自由的马里诺
Il marito di Elena 埃雷娜的丈夫
Marocco 摩洛哥
Marzo 1821 1821 年 3 月
La mascherata 假面人
Le maschere 假面具
Mastro don Gesualdo 堂·杰苏阿多工匠老爷
La meccanica 机械
Meditazioni filosofiche sulla religione e sulla morale 关于宗教和伦理学的哲学思想
Meditazioni sull'economia politica 有关政治经济学的思考
Melope 梅洛佩
Memoria di una ladra 一个女贼的回忆
Memoriale 回忆录
Le memorie 回忆录
Memorie dell'incoscienza 无意识的记忆
Le memorie del mio amico Tristano 追忆我的朋友特利斯达诺
Memorie inutili 戈齐回忆录
Menzogna e sortilegio 谎言与魔术
Le menzogne della notte 夜晚的谎言
Meravigliosamente un amore mi stringe 奇妙的爱情
Il meridionale di Vigevano 维吉瓦诺的南方人
Messico 墨西哥
Il mestiere di vivere 生活的本领
Le metaformosi 变形
Metodo nella medicina 药物治疗
Metello 曼德洛
Metamorfosi 变形记
Mia famiglia e Bene mio e core mio 我的家、我的爱和我的心
Le mie prigioni 我的狱中生活
Il milione 马可·波罗游记
Il 1934 1934 年
Miranda 米兰达
Mi ricorderebbero 他们或许会记得我
Mirra 米拉
Misogallo 米索格洛
Il mistero del poeta 诗人的奥秘
Mistero buffo 滑稽神秘剧
Il mondo di Dolcetta 多尔契达的世界
Il mondo salvato dai ragazzini 被孩子拯救的世界
Il monumento 纪念碑
Il Morgante 巨人莫尔甘特

Morte accidentale di un anarchico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
La morte dell'inquisitore 宗教法庭检察官之死
Le mosche del capitale 肮脏的资本
Mosè 摩西像
Il mulino del Po 波河上的磨房
Le muse napolitan 那不勒斯文艺九女神
Myricae 柽柳

N

Napoli milionaria 特别富有的那不勒斯
Il narcisista 自恋者
Narcisso 水仙花
Il Natale 圣诞节
Naturalis Historia 自然史
Nedda 奈达
Negromante 妖术
Nei mari estremi 大海尽头
Nel museo di Reims 兰斯博物馆
Nencia da Barberino 巴培利诺的牧羊女南琪亚
New York 纽约
Niccolò Machiavelli ed i suoi tempi 尼古洛·马基雅维利及其时代
La Ninetta del Verzee 韦尔柴的尼奈达
Il Ninfale d'Amedo 亚美托的女神
Il Ninfale Fiesolano 菲爱索莱的仙女
La noia 烦闷
Il nome di Maria 玛丽亚的名字
Nome di Rosa 玫瑰的名字
Non ti pago, non ti pago! 拒不付款
Nostra signora dei Turchi 我们的土耳其太太
Il nostro tempo e la speranza 时代与希望
La notte della cometa 彗星的夜晚
La notte del lup 狼的夜晚
La notte del ragno mannaro 蜘蛛人的黑夜
Notte di festa 节日之夜及其他故事
Nottetempo, casa per casa 夜间的每户人家
Le notti difficili 困惑的夜晚
Le notti romane 罗马之夜
Notturno 夜
Novecento 二十世纪
La novella del buon vecchio e della bella fanciulla 善良的老人和漂亮的姑娘
Novella per un anno 一年的故事
Le novelle 短篇小说集
Novelle rusticane 乡村故事
Nuove poesie 新诗钞
Nuovi racconti romani 罗马故事

Poesia e non poesia 诗作与非诗作

Poesia popolare e poesia d'arte 民间诗与艺术诗

Poesia siciliane 短诗集

Le poesie 诗集

Poesie campestri 田园诗集

Poesie disperse 失散的诗篇

Poesie grigioverdi 灰绿色的诗

Poesie di Ripano Eupilino 里帕诺·埃乌比利诺诗选

Poesie per gli anni Sessanta 60年代诗篇

Poesie scritte col lapis 铅笔写的诗

Poesie siciliane 短诗集

Il poeta e il politico 诗人、政治家及其他随笔

Poetica dell'unità 意大利统一时期的诗学

Polinice 波利尼塞斯

La poltrona 安乐椅

Le porte dell'Appennino 亚平宁之门

Il porto di Toledo 托莱多港市

Il porto sepolto 被埋的港口

Poveri e semplici 穷苦人和幼稚的人

Il prete bello 漂亮的神父

Primavera di bellezza 美丽的春天

Primi due secoli della storia di Firenze 佛罗伦萨史初200年

Primo vere 早春

Il Principe 君主论

Il principe costante 坚贞的君主

Principi della scienza nuova d'intorno alla comune natura delle nazioni 关于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原理

Problemi di estetica 美学浅谈

I profughi di Parga 巴尔嘉的逃亡者

Prologhi 序诗

I Promessi Sposi 约婚夫妇

Pro Milone 为米洛辩护

Prose campestri 田园散文集

Prose della vulgar lingua 俗语散文

Il protagonista 主角

Proverbi toscani 托斯卡纳谚语

Il pubblico del labirinto 迷宫中的人们

Il pudore 节操

Pum! Pum! Chi è? La Polizia! 砰,砰,谁来了?警察!

I puri di cuore 纯洁的心灵

Q

Quaderni del carcere 狱中日记

Qualche cosa 某些事情

Il quartiere 科尔诺住宅区

Quasi una donna, Elisabetta 爱丽莎贝达几乎成了一个女人

Quasi una vita 大半人生

Questa sera si recita a soggetto 今晚的即兴演出

Quiproquò 误会

R

Racconti romani 罗马故事集

Raffaello 拉斐尔

La ragazza Carla 卡拉姑娘

La ragazza di Bube 布培的未婚妻

Il ragazzo morto e le comete 死去的男孩和彗星

Ragion poetica 诗的理性

Ragionamenti 论据

Ragazzi di vita 流浪街头的青年

Il ramarro 绿蜥蜴

Randagio è l'eroe 流浪英雄汉

Re Baldoria 饕餮的国王

Re cervo 国王变鹿

La Resurrezione 复活

Una relazione 重温旧梦

Retablo 带框的神龛

Re Torrismondo 托洛斯蒙多王

Ricerche intorno alla natura dello stile 文体性质之研究

Ricordi politici e civili 杂感

Riflessi 思索

Rime 诗集 抒情诗集

Rime e ritmi 诗歌与韵律

Rime nuove 新诗集

Rimini 利米尼

Rinaldo 利那尔多

Il Risorgimento 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

Ritratti e profili 肖像与侧面像

Roma 罗马

La romana 罗马女人

Il romanzo della fanciulla 女孩子的故事

Romanzo di figure 人物

Romeo e Giulietta 罗米欧与朱丽叶

Le rose imperiali 帝国的玫瑰

Rubè 罗培

Rumori e voci 噪音与声音

I rusteghi 老顽固

S

Sabato, domenica e lunedì 周六、周日和周一

Saggi, capricci, fantasie 随笔、随想曲和幻想曲

Saggi critici 批评论文集

Saggi e pagine sparse 随笔与杂记

Saggio critico sul Pascoli 论帕斯科利

Saggio sopra alcune tendenze della letteratura europea nel secolo XIX 19世纪欧洲文学的若干倾向

Saggio storico sulla rivoluzione napoletana del 1779 1779年那不勒斯革命史论

Saggi sul Petrarca 彼特拉克论文集

Salmace 萨尔马契

Salomé da Wilde 王尔德的“莎乐美”

Salons 沙龙

Il salto mortale 斤斗

La sampogna 风笛

Il sangue d'Europa 欧洲的气质

Sani da legare 十足的健康人

Il Santo 圣者

Satire 讽刺诗集

Satura 萨图拉

Saul 索尔

La scapigliatura e il 6 febbraio 豪放不羁派文学与二月六日

Lo scialo 奢华

Sconclusione 毫无结果

La scoperta dell'alfabeto 字母表的发现

S. Corazzini, Liriche 戈拉齐尼抒情诗集

Scorciatoie e raccontini 捷径与其他

Scrittori d'Italia 意大利作家

Scrittori inglesi e americani 英、美作家

La scuola di dittatori 独裁者的学府

Il secretum 我心中的隐秘

Segreto del bosco vecchio 古树林的秘密

Il segreto di Luca 罗嘉的秘密

Sei personaggi in cerca d'autore 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Sei stato felice Giovanni 你曾经是欢乐的乔万尼

Selve d'amore 爱神的森林

Il seme sotto la neve 雪地里的种子

Seminario sulla gioventù 有关青春的讨论会

Semiotica e filosofia linguistica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Senilità 暮年

Il senso della frase 句子的意思

Il sentiero dei nidi di ragno 蜘蛛网似的山路

Sentimento del tempo 时代的感情

I sepolcri 坟场哀思 冢

Se questo è un uomo 如果这是一个人

La sera del dì di festa 节日的傍晚

Il serpente 蛇

Il servitore di due padroni 一仆二主

Sessanta racconti 六十个短篇故事

Seta 蚕丝

75 racconti 75 则故事

I sette messaggeri - 七位信使

Settimo: ruba un po' meno 第七个偷的东西不多

Se una notte d'inverno un viaggia-

tore 寒冬夜行人

Lo sguardo di Gesù 耶稣的目光

La siepe e l'orto 篱笆与菜园

S'i' fossi foco 倘若我是一团火

La signora è da buttare 该丢弃的太太

Silenzio di Milano 寂静的米兰

Sillabario n. 1 识字课本第一册

Sillabario n. 2 识字课本第二册

Il sindaco del rione Sanita 萨尼达地区的审查员

Il siparo ducale 公爵府的帷幕

Il sistema periodico 元素周期表

Socrate immaginario 假想的苏格拉底

Il sogno 梦幻

Un sogno del Nord 北方的梦

Sogno di un mattino di primavera 春日之梦

Il sole a picco 西沉的太阳

Il sole del sabato 周末的太阳

Solitario in Arcadia 阿卡狄亚的孤独者

I sommersi e i salvati 被淹死的和得救的人

Sopra il monumento di Dante 但丁纪念碑

Sorelle Materassi 马泰拉西姐妹

Il sorriso dell'ignoto marinaio 无名水手的微笑

Sostiene Pereira 贝雷伊拉的辩护词

Le sottilissime astuzie di Bertoldo 精明机智的培托多

Lo spaccio della bestia trionfante 驱逐趾高气扬的野兽

Spagna 西班牙

Spartaco 斯巴达克斯

Spartaco e gli schiavi 斯巴达克和奴隶

Lo spasimo di Palermo 巴勒莫的剧痛

Specchio delle mie brame 热望的真实写照

La spiaggia 海滩边

Staccando l'ombra da terra 驱散笼罩在大地上的阴影

Lo stadio di Wenbledon 温布尔登体育场

Stampe dell'Ottocento 19 世纪复印画集

Stanze per la giostra 比武篇

La storia 历史

Storia civile del Regno di Napoli 那不勒斯王国文明史

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 历史是思想和行动的组合

Storia della critica romantica in Italia 意大利浪漫主义文学评论史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nglese 英国文学史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意

时高兴而嫁给你

Tobia e l'angelo 托比亚与天使

Tommaso e il fotografo cieco 托马索和盲人摄影师

Trattato di pittura 绘画论

Trattato di semiotica generale 符号学理论

Tre anni e un giorno 三年零一天

La treccia di Tatiana 达迪亚娜的辫子

Tre donne sole 三个孤独的女人

La tregua 休战

3010 3010

Treno di panna 抛锚的火车

Il treno russo 俄罗斯列车

Tre ragazzi immaginari 三个虚构的青年人

I tre schiavi di Giulio Cesare 恺撒的三个奴隶

I trionfi 凯旋

Il trionfo della libertà 自由的胜利

Trionfo della morte 死亡的胜利

Triregno 罗马教皇三重冕

Tristano 德利斯达诺

Tristia 哀歌

Il trono di legno 木头宝座

Turandot 图兰多特

Il turno 轮流

Tutti gli errori 所有的错误

Tutti i nostri ieri 我们的昨天

Tutti uniti, tutti insieme! Ma scusa, quello non è il padrone? 所有的人都集中在一起！对不起，那个不是老板吗？

U

Uccelli da gabbia e da voliera 大小鸟笼中的鸟

Uccelli--Quasi un racconto 飞禽

L'ultima cena 最后的晚餐

L'ultima estate 最后的夏天

L'ultima lacrima 最后一滴眼泪

Le ultime lettere di Jacopo Ortis 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

Gli ultimi giorni di Magliano 在马利亚诺的最后几天

Ultimo canto di Saffo 萨福的最后一支歌

Ultimo venne il corvo 姗姗来迟的乌鸦

L'umorismo 论幽默

Una peccatrice 女罪人

Una vita 人生

Uno, nessuno e centomila 一个，什么也不是，十万个

Uomini o no 人与非人

Un uomo 一个男子汉

L'uomo che parlava solo 自言自语的人

L'uomo come fine 人就是目的

Uomo e cane 人与狗

L'uomo è forte 人之伟力

L'uomo nel labirinto 迷路的人

L'uomo invaso 遭受袭击的人
L'Urania 乌拉尼亚
Uscita di sicurezza 安全出口
Uto 乌托

V

La vacanza 假期
Va' dove ti porta il cuore 跟着感觉走
I vecchi compagni 老战友
I vecchi marinai 老水手
Il vecchio con gli stivali 穿靴子的老头
La vedova Fioravanti 费奥拉万迪寡妇
Veleno e amore 仇恨与爱情
Venezia e la libertà d'Italia 威尼斯和意大利的自由
Il ventaglio 扇子
27 racconti 27 个短篇故事
I ventitre giorni della città di Alba 阿尔巴城的 23 天
Il vento nel vigneto 葡萄园的风
Verona illustrata 维罗纳图证
Il vero Silvestri 真正的西尔维斯特利
Verso la cuna del mondo 世界摇篮之行
Vestire gli ignudi 给裸体者穿上衣服
Via delle Oche 鹅之路
La via del rifugio 逃遁之路
Via de' Magazzini 马嘉齐尼路
Viaggi nel tempo 漫游在时光隧道中
Viaggio in Russia 苏维埃俄国之行
Villa di Tarantola 达兰多拉别墅
La villeggiante 度假者
La violenza illustrata 罪行昭著
La virtù di Cecchina 契基娜的美德
Il visconte dimezzato 一分为二的子爵
La vita 阿尔菲耶里自传
Vita dei campi 田野生活
La vita di Alberto Moravia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一生
Vita e avventure di Riccardo Joanna 利加尔多·乔安娜的生活和历险
La vita e il libro 生活与书
La vita interiore 一个少女的内心独白
Vita militare 军营生活
La vita nuova 新生
La vita solitaria 孤独的人生
Una vita violenta 充满暴力的一生
Vite dei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i 绘画、雕刻、建筑名人传
I vivi e i morti 生者与死者
Il vizio dell'agnello 羊羔的恶习
La voce di Dio 上帝的声音

Y

Z

重要作家意汉双语对照

A

Alberti, Leon Battista 阿尔贝蒂，莱昂·巴蒂斯塔

Alfieri, Vittorio 阿尔菲耶里，维多里奥

Alvaro, Corrado 阿尔伐洛，科拉多

Arbasino, Alberto 阿尔巴希诺，阿尔贝托

Aretino, Pietro 阿雷迪诺，彼埃德罗

Ariosto, Ludovico 阿里奥斯托，卢多维科

Arpino, Giovanni 阿尔比诺,乔万尼

Arrighi, Cletto 阿利吉,克莱托

B

Bacchelli, Riccardo 巴盖利，利加多

Baldini, Antonio 巴尔迪尼，安东尼奥

Balestrini, Nanni 巴雷斯德利尼，南尼

Baretti, Giuseppe 巴雷迪，朱塞佩

Baricco, Alessandro 巴利科，亚历山大罗

Barili, Bruno 巴利里,布鲁诺

Basile, Giambattista 巴西莱，强巴蒂斯塔

Bassani, Giorgio 巴萨尼,乔尔乔

Beccaria, Cesare 贝卡利亚,契萨雷

Belli, Giuseppe Gioachino 贝利，朱塞比·乔阿基诺

Bembo, Pietro 本博,彼埃德罗

Bene, Carmelo 培尼,卡尔梅洛

Benni, Stefano 培尼,斯坦法诺

Berchet, Giovanni 白尔谢，乔万尼

Bettinelli, Saverio 培迪奈利，萨万利奥

Bilenchi, Romano 彼兰基，罗马诺

Boccaccio, Giovanni 薄伽丘，乔万尼

Boccioni, Umberto 波丘尼，翁贝尔托

Boiardo, Matteo 博亚尔多，马德奥

Boito, Arrigo 波依多，阿利各

Bonsanti, Alessandro 庞桑迪，亚历山德罗

Bontempelli, Massimo 蓬坦贝利,马西莫
Borgese, Antonio 鲍尔杰塞, 安东尼奥
Bracciolini, Poggio 勃拉丘利尼, 波乔
Brancati, Vitaliano 勃朗加迪,维达利亚诺
Brizz, Enrico 勃立兹,恩利科
Bruni, Leonardo 布鲁尼,莱奥纳多
Bruno, Giordano 布鲁诺,乔尔达诺
Bufalino, Gesualdo 布法利诺,杰苏阿多
Busi, Aldo 布齐,阿尔多
Buzzati, Dino 布扎蒂,迪诺

C

Calvino, Italo 卡尔维诺,伊达洛
Camerana, Giovanni 卡梅拉那, 乔万尼
Campanella, Tommaso 康帕内拉,托马索
Capuana, Luigi 卡普安纳, 路易其
Cardarelli, Vincenzo 卡尔达雷利,温钦佐
Carducci, Giosue 卡尔杜齐, 乔苏埃
Carozzi, Alberto 卡劳齐, 阿尔贝托
Cassola, Carlo 卡索拉,卡尔洛
Castiglione, Baldassare 卡斯蒂利奥内,巴尔达萨雷
Cato, Marcus Porcius 大加图
Cavalcanti, Guido 卡瓦尔坎蒂, 圭多
Cecchi, Emilio 契基, 埃米利奥
Cecco, Angiolieri 契可,安乔里埃利
Cesarotti, Melchiorre 契萨劳迪, 梅尔基奥雷
Chiabrera, Gabriello 基亚布雷拉,嘉勃利埃洛
Chiari, Pietro 基亚利,彼埃德罗
Cicerone, Marco Tullio 西塞罗
Cino da Pistoia 契诺,达·比斯陶亚
Columella, Lucius Junios Moderatus 科卢梅拉
Consolo, Vincenzo 贡索洛, 温钦佐
Conte, Giuseppe 贡特,朱塞佩
Corazzini, Sergio 戈拉齐尼,萨尔乔
Crescimbeni, Giovanni Mario 克雷欣培尼,乔万尼·马里奥
Croce, Benedetto 柯劳齐,贝内代托
Croce, Giulio Cesare 柯劳契, 朱利奥·恺萨
Cucchi, Maurizio 古基,马乌利齐奥

J

L

M

N

O

P

Q

R

S

后　记

意大利是一个拥有三千余年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的欧洲国家,其古罗马、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文化曾对欧洲,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其优秀作品至今仍不愧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遗产。

早在 13 世纪下半叶的人文主义初期，意大利文坛就因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三位佛罗伦萨文学鸿儒的扛鼎之作《神曲》、《歌集》和《十日谈》而大放异彩,从而为欧洲文艺复兴的到来揭开了序幕。后在阿里奥斯托、马基雅维利等人的笔下,人文主义作品达到了一个高峰 阿里奥斯托以传奇叙事诗《疯狂的奥兰多》传世；马基雅维利则以遐迩闻名的政治著作《君主论》而被誉为“新科学的奠基人”。塔索创作的英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取材于首次十字军东侵的史实，是一部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以来久享盛名的文学巨著。

进入启蒙时代之后，威尼斯戏剧家哥尔多尼创造性地对传统的喜剧进行大胆的改革，建立起贴近生活的新喜剧，作品意象新颖,形式活泼,内容富有一定的现实主义色彩,像《一仆二主》、《女店主》、《老顽固》等优秀剧作至今仍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作为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和诗人，曼佐尼创作的著名历史小说《约婚夫妇》开创了以平民为文学作品主人公的先河,抒发了意大利人民复兴民族和统一国家的爱国热情；莱奥巴尔迪的田园诗被公认为是继彼特拉克之后意大利文坛最富有艺术魅力的优秀抒情诗,诗句里浸润着诗人对往事的无限留恋,以及对倏忽即逝的年华的嗟悔和悲叹。

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由维尔加等人共同创建了反映时代精神的真实主义文学，作者运用隽永、敏锐的笔触，淋漓尽致地刻画西西里劳动农民的苦难命运，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精神面貌。 20 世纪初，意大利文坛因邓南遮的颓废主义作品和皮蓝德娄革新实验性质的戏剧而重显活力，尤其是皮蓝德娄，他的戏剧作品因致力于探索现实与表象、艺术与生活、清醒的理智与疯狂之间变幻不定的界限而赢得了国际声誉。在同一时期出生的里雅斯特港市的小说家斯韦沃和隐逸派代表诗人蒙塔莱、翁嘉雷迪等人也为意大利文学在欧洲文坛上赢得一席之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文学界形成了新现实主义文学运动,涌现出一批诸如莫拉维亚、维多里尼、帕韦泽、西洛内、卡尔维诺、夏侠等才华超群的年轻作家，作品大多取材当代历史的一些异常经历，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五色斑斓的艺术光泽。其中，莫拉维亚以描写世态炎凉的现实社会及缺乏爱情内容的性生活而闻名于世,他的处女作《冷漠的人们》赢得了意大利文坛高度的赞扬;卡尔维诺则被誉为一位“一只脚跨进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中”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意大利当代作家，他擅长于运用丰富的想像力，以辛辣、隐喻的艺术手法暴露当今西方社会的现实，并用文学语汇把自己在人世间所经历的忧伤和欢乐告诉后人。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不少蜚声国际文学界的当代意大利作家相继谢世，在沉寂、忧郁的表象后面，一些年轻作家依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潜心致力于塑造新的文学，写出了不少颇有思想深度的现实主义作品，使意大利文学以多元化的新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并获得了大众的认知。其中，较著名的作品有：埃科的中世纪式侦探小说《玫瑰的名字》、斯戈隆赞咏农业文明的《阿纳泰的贝壳》和《木头宝座》、女作家达玛洛的日记体小说《跟着感觉走》、巴利科既有青春气息又有文化底蕴的力作《愤怒的城堡》和《浩瀚的海洋》,以及达里奥·福直面人生、抨击权贵、针砭时政的政治讽刺

剧。

1986 年，编者根据自己在多年从事意大利语言、文学教学工作中积累的素材和心得,编写并出版了《意大利文学史》,虽则篇幅不长，但它是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意大利文学的书籍。 1992 年，《意大利文学史》一书荣获国家教育部颁发的“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学术专著特等奖”，这对编者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如今，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决定推出《意大利文学史》的修订本，编者除了对原书中每一个章节的内容进行充实以外，还补写了有关古罗马文学、文艺复兴和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意大利当代文学的若干章节，又选译了一些优秀诗作及部分小说中的精彩片断，以加深读者对有关作家及其作品的理解。

限于编者水平，加之书中探讨涉及的领域甚广，本书疏漏谬误之处在所难免，竭诚希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世华

2002 年 9 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